

SULIANJIETI QINLIJI SULIANJIETI QINLIJI

作者作为美国驻苏大使　目击了
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
他在苏11年
对苏联问题了解得透彻而明晰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苏联解体亲历记

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



SULIANJIETI QINLIJI SULIANJIETI QINLIJI

作者作为美国驻苏大使　目击了

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

他在苏11年

对苏联问题了解得透彻而明晰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苏联解体亲历记

下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苏联解体亲历记

（上 卷）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著
Jack F. Matlock, Jr.

吴乃华 魏宗雷 胡仕胜 青 琳
廖耀文 刘 博 梅 红 张敏谦 译
仲平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2

苏联解体亲历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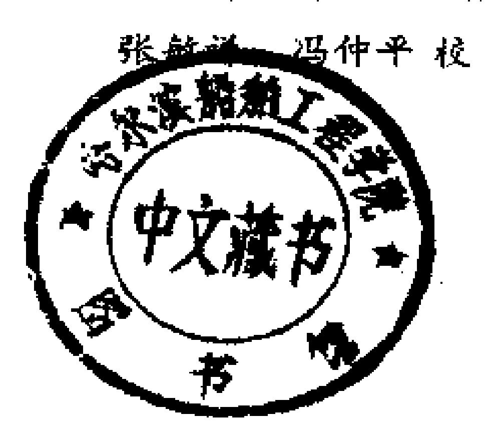
（下　卷）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著
Jack F. Matlock, Jr.

吴乃华　魏宗雷　胡仕胜　贵　琳　廖耀文　刘　博　梅　红　张敏谦　译
张敏谦　冯仲平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Inc.

根据兰登出版公司 1995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雪　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解体亲历记/(美)马特洛克(Matlock, J. F.)著；吴乃华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书名原文：Autopsy on An Empire Random House Inc.

ISBN 7-5012-0787-9

Ⅰ. 苏… Ⅱ. ①马… ②吴… Ⅲ. ①政治-概况-苏联②政治事件-苏联-1991 Ⅳ. 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785 号

图字：01—96—0837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32.75　插页：4　字数：754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2001－24000

定价：48.00 元　(上、下二卷)

谨将此书献给1987—1991年间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及基辅和列宁格勒总领馆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以其才智和献身精神服务于国家

目　　录

第一章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俄罗斯是一个难以预言其历史进程的国家。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93年5月①

1991年12月25日的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访客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当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七下时，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正对摄像机的桌前，开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以前，他讲话大多是预先录制，这一次则是现场直播。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宣布道。虽然他的声明含义清楚，但他所选择的词语却显得奇怪，似乎在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总统职位仍然存在。如果他是说因他所领导的国家崩溃而使得他所承担的工作不

复存在，那么含义会更明确些。

[4] 在对全国讲了20分钟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办公室，并吃惊地得知苏联的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这会晚些时候发生，或许应是在年底、而非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即将升起，但出现了问题。行动笨拙的守旗卫兵未能将旗帜套紧旗杆，只得再套，然后用力一拉，才使旗帜升到旗杆顶端。

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了历史——令人猝不及防，但却有其必然。

这一新的旗帜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权力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沙皇一直在距现苏联总统办公地不远的乌斯宾斯教堂举行加冕仪式，但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除和谋杀后象征帝王统治的王冠和节杖一直静静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中。不过，在1991年，权力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因为苏联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性超出任何一个俄国帝王的想象更具实质意义。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庆祝游行对加强统治者权力已不再必要，此外，继位者——俄罗斯总统还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两天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一致同意，在戈氏发布辞职声明后立即在戈氏的办公室会面，正式移交控制苏联核武库的密码和装置。

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期得那样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告别演讲中的某些话不满，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

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纽"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但苏联却是悄悄地瓦解。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瞬息之间就取代苏联，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2] 〔5〕

俄罗斯虽已掌握苏联所有的中央机构，并将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只拥有前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因此，有1.4亿多曾是苏联公民的人，从1991年开始将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四个月前已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其他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在谋求独立。

戈尔巴乔夫结束电视讲话后，负责安排这次演讲的戈的助手戴维·切克瓦伊泽也返回自己楼下的办公室，瘫进椅中。当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呆呆盯着墙壁，因不确定的未来而陷入沉思。

戴维是一个聪明、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在格鲁吉亚出生长大。因其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和地道的美式英语，在他早期任职于苏驻美大使馆时，就成为华盛顿受欢迎的人。如今，他发现自己不再了解自己是谁。作为一个自豪和爱国的格鲁吉亚人，他忠实而又卓著地服务于苏联政府，将第比利斯和莫斯科都视为故乡。他和他妻子决意让他们的儿子先学格鲁吉亚语，再学其他语言。

直到这一刻之前，这一切尚不成问题。他是格鲁吉亚人，又是苏联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么现在他是否会被迫作出选择呢？他很愿意作一个格鲁吉亚人，但也视自己为一个强大但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员。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呆在莫斯科、作一个俄罗斯人，还是回到第比利斯、指望在那里找一份工作?或试图

以“外国人”身份留在莫斯科？所有这些都不是他能自由选择的。

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戴维·切克瓦伊泽，但我也同样对所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6〕 我和我妻子丽贝卡在两处度过了1991年12月25日。在多年未与家人共度圣诞后，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去看望所有家人。因此，我们先去了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儿家，与她的一家、我们的两个儿子以及我们的兄弟聚在一起吃早餐、交换礼物，然后飞到德代尔堡与母亲团聚，我们最小的儿子也从田纳西州赶到那里。

圣诞节对我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来自南方新教徒家族。不过，那一天我的思绪却不时偏离宗教和家庭，我意识到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逼近苏联。就在一周之前，我在莫斯科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发现他似乎要同准备推翻他的军队妥协，这虽然不可避免，但难以让人完全理解。我与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也很熟，并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私人朋友。我还认识他们的对手，在他们中间亦有朋友。但我更为关切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从理发师、工人到诗人、教授、银行家和议员。我曾在他们中间生活多年，与他们的悲哀和希望如果说不上是分享，至少也有共鸣，他们似乎是我们家庭延伸的一部分。同戴维·切克瓦伊泽一样，他们将承受这天在莫斯科所发生事件的后果。

在用过晚餐、打开礼物之后，我回到楼上卧室，将计算机插孔插到电话孔中，查寻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从那里可以得到比电视更详细的情况。我正是从这里了解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包括新国旗已在克里姆林宫升起的消息。

所发生事情的巨大影响不久就减低下来。我曾预见到这一结果，但也认识到，就我对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家们的了解，就我对

一些事件的参与，我并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毕竟，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到其国民生活的每一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苏联制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领导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历史是有办法讨还血债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很好地构成答案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7〕

我知道，除苏联领导层的人之外，我对过去七年中莫斯科政治变化的了解不亚于任何其他人，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确切地回答苏联崩溃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它发生在 1991 年底，而不是几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前？促使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有无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苏联制度能否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几十年？

这些问题令人困扰，如果我不能回答，那么还有谁呢？历史学家？或许，但只有在苏联档案全部开放、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以及几代学者对这些记录加以筛选和分析之后才行。无疑，许多细节会在未来披露出来。无论是谁，只要是仓促作出结论，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

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正如我们现在仍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样，且不说我们还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这类重大变化通常会产生多种解释。

要想得出精确答案是不可能的，但问题仍很重要，哪怕能帮助我们同继承国打交道亦可。

但是，并非这种功利性考虑最令人困扰，这里还有一个我应该了解、但实际上却不了解的秘密。虽然任何秘密都具有挑战性，但这一秘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重要，因而它不仅是挑战，而且我还有义务去解决它。基于我为了解苏联所付出的一切，如果我不去了解苏联的崩溃，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8〕 如果苏联只是我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站，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与苏联打交道。

许多人对其先辈的祖国有浓厚兴趣，这是自然的，但我毕生爱好俄罗斯文化却并非基于这一理由。第一代马特洛克家族是在17世纪从英国的德比郡来到北美，他们是辉格会教徒，是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而移民。我1929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当时，家里人都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已定居多久，我的祖父母也说不清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有些亲戚仍是辉格会教徒，但祖父母已不再是该派教徒。

在我成长的30—40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1946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的《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以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

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差别，却又不至于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还以极大热忱引导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1950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在大学执教或是进入外交机构，或许是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9〕1956年进入外交部。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一份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幸运。由于我比我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们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提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2年和在德国任职1年之后，我终于在1961年9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13年。

赫鲁晓夫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与他们偶然相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有时抱歉地说再一次会面不方便，大多数时候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来苏联的

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我们的公寓做客。随着我们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就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警察局密探；一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人士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来莫斯科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和招待作家和学者们，特别是在 1962 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我们任职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在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 14 个，我们的家庭也由 3 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其中一个还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

〔10〕 以后的七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60 年代在非洲所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自然会尝试在已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内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然后是桑给巴尔岛，以后是坦桑尼亚。此时，苏联的影响开始上升。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士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进行活动，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许多人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70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国务院担任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60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的交往，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波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会面 。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1978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1981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代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呆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为止。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之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11〕被指定帮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减少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我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军事上的强硬派”。

这一形容只有一部分正确。就反对苏联帝国暴行及其强加给众多人民的虚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强硬派。我认为，除了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去阻止苏联入侵之外，别无选择。但在涉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在苏联统治下的民族时，我则不是强硬派。我认为，他们的真正兴趣与我们一致，即期望生活在和平自由之中，使他们内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而不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机器所扼杀。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我相信他们是友好的。与东—西对立双方的空想家不同，我相信苏

联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们应鼓励这一变化。里根总统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他赞成将坚定性与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并将尊重人权置于首位的政策。

在1986年的圣诞节前，总统让我去莫斯科接替阿瑟·哈特曼的大使职位，这样我便得到了机会去实施我帮助制定的政策。

当我于1987年春天第四次抵达莫斯科时，改革尚处于初期。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不满，想要变革，但证据表明，改革并未超越早期表面上的、偶尔爆发出火花然后又悄然消失的"宣传"阶段。

无论声称要采取怎样的激进政策，不付诸实施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打算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得不同莫斯科以外的事态变化保持联系。我决心在任职范围内定期四处走走。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我只有一个未曾去过，但这次我要全部走遍，且不止一次，而是尽可能地去我能去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政策规定波罗的海国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2〕 这次旅行很紧张，但也很值得。它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使我有机会去准确阐述美国的立场。苏联当局向人民解释说其扩张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但从未具体描述，以免公众反对其巨大开支），我为什么不表明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意关心别人的国家并以此来戳穿这一谎言呢？

我还知道，在苏联境内有众多民族有着令人自豪和古老的传统，他们需要我们保证不会忘记他们。许多非俄罗斯人害怕在单一苏联文化（如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列宁主义）统治下失去其民族特性，害怕被整个世界遗忘。

1963年，我同大使馆同事、后来任美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杰克·佩里一同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进行了一趟旅行，印象很深

刻。与往常一样，我们设法摆脱官方旅行机构的包围，在大街小巷、剧院餐厅四处漫游，尽量多会见普通人，同那些敢于同我们谈话的人畅谈。在这些谈话中，一个主旋律常是："请不要认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当然，我们早知这一点，但现在才了解其背后的那种渴望。铁幕阻塞了准确信息在东西方间的流通。同莫斯科所称的其他"民族共和国"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日益被外国人视为"苏联俄罗斯"的一部分。

诚然，我不能自以为是地说所有美国人都了解苏联境内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知道对人权被侵犯的民族表现同情和理解，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随着我对苏联兴趣的加深，我努力地学习其语言和文化。虽然在正式场合我是说俄语，但在非俄罗斯区域，我则尽量说当地方言。这样做是想表明，我的确知道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是独特的，我尊重它的民族特性，这种兴趣和尊重足以使我克服困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行。

"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尽力帮我准备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的演讲稿，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和车臣的演讲稿。〔13〕

每一次旅行都有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公开性的扩大，人们变得更加坦率，一些敏感问题成为谈话中心，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人现在则可以见到，当局有时甚至鼓励人们同我们谈话。

丽贝卡通常不仅和我一道旅行，而且独自行动，因为她经常被邀请去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设计制作的挂毯。

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敞开心灵的大门。人们可以感觉到我们

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对我们及美国作出感兴趣的反应。我们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亦如此回报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能感受到气氛在发生变化，新的态度在出现。

在同苏联人沟通时，我们得到了苏联媒体的重要帮助。苏联报纸、杂志、电视台及电台一度不向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美国人开放，现在它们开始采访我们，到 1990 年几乎没有一天我们不被媒体提及。

在莫斯科，我们既吃惊而又愉快地发现自己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许多来客，其中大多是苏联人，一周在我们的公寓——斯帕索别墅聚会几次，谈音乐、电影、艺术展览，共进早餐或晚餐，以后则是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当新议会成立后，在我们的斯帕索别墅里所谈论的话题通常是议会将要正式辩论的议题。

随着苏联社会的开放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同我们打交道，讨论他们的计划、希望乃至征求建议，特别是有关民主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建议。在我们大使馆富有活力的外交官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认识了莫斯科所有著名政治家，还有莫斯科以外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

1989 年，布什总统要求我延长任期，我同意了，但到 1991 年春天，我感到转向其他方面的时候已到。担任驻苏大使的四年虽令人振奋，但也颇耗精力。我亲眼目睹了冷战的结束。很显然，共产主义已告别苏联，苏联自身要么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要么面临瓦解。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任务将大大不同于过去。〔14〕

现在是让新手来莫斯科任职的时候了。对于我来说，则是离开公共事务，重操进入外交界前的写作和教书旧业的时候。4 月，我告知布什总统自己想在夏天离开莫斯科，最后，我们确定 8 月 2 日离开。

我离开莫斯科一周后，戈尔巴乔夫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小集团。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交出。当戈尔巴乔夫拒绝后，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就开始了。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些事件的，但我了解这些制造事件的人，因而容易想象这一局势。在春天，我曾同我的俄罗斯朋友站在一起去保护他们的白宫。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高呼反抗阴谋者时，我也是站在他的一边。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如果一个品行不佳的人去世，我会这样说："人无完人"，回避客观的评价。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一个人，对苏联帝国的消亡，没有理由悲哀。

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数以百万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牧民的牲畜被占有，农业的衰落引起灾荒。成功的农场主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进近乎死亡的集中营，只因他们曾经卓有成效、富于创造、并因此给集体主义社会树立了坏榜样。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专制海洋中的自治岛！

全部民族被放逐，只因怀疑他们不忠（如朝鲜人或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或有朝一日可能不忠。

苏联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强制工具，但却无有效手段去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唯一的限制是实际操作的限制以及对政治经济影响的估计。

是的，这是一个邪恶帝国，但这一帝国同1991年12月25日消亡的那个国家是一回事吗？旧的苏联帝国——即邪恶的那个——是否因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8月解体而一起完蛋了呢？ 〔15〕

以后则是各共和国在一起谈判，通过签订联合体条约来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国家结构，因此，一些人（包括许多当选为苏联

议会议员的人）说，1991 年 12 月的选择不是在苏联帝国和一组独立共和国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自愿的民主联盟与众多独立国家间进行，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仍是专制国家甚至比这更糟。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旧的、没有几个哀悼者的苏联，还是有许多哀悼者的另一类国家？

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即苏联帝国是邪恶的，不过它不是由邪恶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苏联体制会在其人民中间产生败类，但它不能阻止勇敢和高尚行为的出现。这一体制虽是苏联领导人推行不人道政策的工具，但它不能消灭正义和道德，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萨哈洛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作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他们是在心照不宣地做着无声反抗，这比起积极支持现政权者，自然显得不同寻常。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物。前面提及的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过的强有力的军事机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

在 1991 年 12 月 26 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来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

〔16〕 写到这里，我应该先表明我的观点。

当我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它们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侵略，消除引起东西方紧张的根源，而非现象。一个能对其人民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自 80 年代末以来，我常被苏联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将会发生？我常回答道："当然会。"但在看到提问者吃惊的表情后，我又加一句："我希望我的孙子会活着看到它。"

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对苏联的民主变化从理智和感情上都是支持的。这种变化当然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更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获得自由对波罗的海国家是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它们的人民所追求的，还因为苏联兼并它们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进苏联帝国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意。独立不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一个权力有限、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有效加以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一样清楚，他始终在维护自愿联盟的价值，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不过，我认为，这种联盟只有在旧的国家结构被新的、由各级民选领导人组成的国家结构所取代才能产生。如果组成苏联的各国不相信新联盟符合其利益，无论旧的"权力中心"如何努力，或国外领导人如何为其使劲，这种联盟都难以建立。〔17〕

在我看来，民主是试金石，它的定义不仅是指自由选举，而且还指政府工作体制权力有限、遵守法律规则、保护民众和少数民族权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国家——无论它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还是一个较小的民族国家——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伙伴。一个独裁或专制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个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其人民，最终影响到我们大家。

制定目标是一回事，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也怀疑别人是否会有。我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摸索。人们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过去的特征都不会完全消失。在这一变革的大漩涡中，最困难、也是最不确定的任务是，将新的特征与旧的特征进行比较并估价它的力量。对个人尚不太好评价，对整个民族、社会乃至帝国就更加困难。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如果民主取胜，那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有益于我们大家的。如果民主失败，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曾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作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我并不奢望写一本有关苏联崩溃的准确的历史书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件才发生不久，历史尚未完全定论。我也不打算具体论述改革的所有特征或记述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所有大事。我将重点论述与这几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事件：苏联帝国是如〔18〕何崩溃的？何时？关键事件是什么？谁（如果有的话）将承担主

要的责任？苏联帝国是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终结的吗？或者说其继承者是在那时出现的吗？一个民主联盟曾经可行吗？最后，未来或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得到启迪吗？

我的论述将不涉及与这些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重要。我的论述是对苏联崩溃进行解剖，而不是为它立传，而解剖旨在找出死亡的原因，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死者生活中的每一重要方面。

但即使解剖也需要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对 1991 年瓦解的帝国该说些什么呢？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受其束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民族？

〔19〕

第 二 章

帝 国

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约·维·斯大林论 1936 年苏联宪法

虚伪是罪恶赋予道德的贡品。

拉罗什富科 1961 年 11 月 2 日

当我驱车进入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斯大林纳巴德时，天气和煦温暖。该城市坐落于与中国、阿富汗交界处不远的山谷之中。我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艾伦·埃伦德一同坐在苏制“海鸥”牌黑色轿车的后座。

埃伦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环球旅行者，但这次旅行不太愉快。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坚持一天花 10—20 小时去参观工厂、农场和办公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陪同官员，我的职责是让他得到准确的翻译（有时替换一下翻译），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在每一次的旅行之后，参议员都要对他的发现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这次他的目的是要去 30 年代以来很少有人去的地区（在那之

前也很少有人去），了解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①

我们在斯大林纳巴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奇特景象。尽管太阳〔20〕已下山，温度尚在 17 度，但从远处看，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片雪白之中，同远处环绕我们的群峰融为一体。进城后，我们才发现这片白色并非白雪，而是棉花。在巨大的中心广场，除了留出不足两个车道宽的细长道路外，其他部分都晒满了一堆一堆潮湿的棉花。

东道主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在收割棉花时下了一场大雨，不得不在广场和其他空旷地带将淋湿的棉花放在冬日之下晒干。

在我们驱车入城时，俄罗斯导游讲解道，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杜尚别的小村庄，但当它成为有 30 万人口的塔吉克斯坦首府时，这一名字就显得过时。很幸运的是，约瑟夫·斯大林非常仁慈地允许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当尼古拉·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攻击斯大林的报告发表 10 天后，这城市又恢复使用杜尚别的名称。

无论何时，也无论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棉花总是这里的国王和王后，而且日益如此——这是开玩笑。棉花也是周围邻国的主要农作物，如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大部分干旱地区都种植棉花。事实上，中亚的整个农业经济都从水果、蔬菜的生产转向棉花生产，前者在苏联大部分地区都短缺。

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产棉花，需要很多的水加以灌溉。在许多地方，土壤中的盐分很大，不得不在每年春季播种前冲洗一次，以使庄稼更好地生长。为此，就要挖掘沟渠以引进更多的水。巨大的咸海流量越来越少，水位开始下降。水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由于化肥、农药、脱叶剂日益被无限制地使用，河流

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早在1961年，就有人担心环境能经受多大的破坏而不致使土地变成荒地。

〔21〕 当我们问及此事时，主人向我保证，社会主义政府与资本主义政府大为不同，用不着担心。社会主义政府永远关心人民，破坏环境的事自然是不允许的。

我们在中亚城市所会见的大多是俄罗斯人或其他欧洲人，很少见到当地人。不过，在中亚农村地区则几乎全是当地民族。[②]城市化虽发展很快，但结果不是当地人迁往城市，而是外来移民增多。

这种人口流动是否会产生裂痕？当然不会！我们的谈话对象这样向我们保证：我们都生活在完美的统一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1961年，当我同参议员艾伦德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旅行时，我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我研究苏联已有多年，对其地理、种族及历史都有兴趣，甚至还读了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然而，书面上阅读和吸收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则是另一回事。

我对那一年秋天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显然，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念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计划者"作出。这里的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上面"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政权是公开的、在当时也是非常好战的无神论者，它只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定义的"历

史”。在我看来，当我们到达这个当时称做斯大林纳巴德的城市后，迎接我的那一片湿棉花正是这一帝国某些特征的强有力标志。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尝试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22〕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在没有私有土地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者。

由于这一“体制”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用于棉花灌溉，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领地”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当局不准人们问：“谁因廉价而收益？”

在我看来，同棉花一起作为象征的还有两个特征：许多城市

的名字及其“面貌”。

认为塔吉克斯坦人自愿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认为吉尔吉斯人真心愿意用曾率红军入侵的米哈伊尔·伏龙芝将军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显然都是荒谬的。同样，认为将外来民族迅速地、而且常常是强制性地迁入可以巩固“民族友谊”，也是不可信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站在一边，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

〔23〕

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

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

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正是共产党将俄罗斯，当然还有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都殖民化了。

然而，有许多人仍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其理由是：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数都多，他们占据了共产党中央机构，通常是迁入非俄罗斯地区的主要移民。许多非俄罗斯人认为共产主义统治是俄罗斯统治的一种形式。此外，苏联帝国继承了俄罗斯帝国扩张

的历史。它将俄语作为一个统一要素。在许多人看来，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扩大俄语的影响，这同俄罗斯扩张并无多大区别。

相反，许多俄罗斯人则认为其国家一直被一项国际阴谋所支配，这一阴谋既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排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一些俄罗斯人因怀念已被碾碎的传统，开始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产生共鸣，即没有人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多地经受了共产主义统治的磨难。

这种奇特的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将承认这种依受害程度来衡量美德的努力）很难加以证实。毕竟，俄罗斯人并不像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伏尔加河畔的日耳曼人那样，被全部赶出了家园并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也未经历过斯大林在乌克兰、哈萨克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他们未被剥夺用自己的母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也未因是俄罗斯人而受苏联当局的歧视。反之，当他们移民到非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时，他们享有保护和特权，并〔24〕敦促人们学习俄语，仿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尽管俄罗斯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历经折磨，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够多的了。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同样生活在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下，所谓的富农或政治嫌疑犯并不因其是俄罗斯人而受到庇护。斯大林式的恐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为了支持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军工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无疑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俄罗斯人因其作为一个民族人口更多，因此比其他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掠夺。

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

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

俄罗斯人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并无明确态度，直到1990年时，还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如下问题：究竟是苏联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抑或俄罗斯只是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在1990年以后，这已成为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之一。

俄罗斯帝国

或许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苏联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断断续续但又是持之以恒的扩张建立起这一帝国。有时，这一扩张是和平进行的，如俄罗斯农民开荒者和哥萨克人向东迁移，定居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而言，因为一些〔25〕土著民族总是受害者，正如北美土著民族曾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迫一样)。另一些时候，扩张则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不变的是扩张本质，可变的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结果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不断地试图强迫少数民族加入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中。因而，在19世纪的几十年中，要想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或采用拉丁字母的立陶宛语出版书籍，就是违法行为。虽然一些领土是被公开兼并的，但另一些则是逐渐被蚕食的，如格鲁吉亚在18世纪早期尚处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但很快就成为

帝国的一个部分。芬兰起初还有其宪法，但很快就沦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份，因为沙皇是决不允许在他们的帝国中出现一个独立者。

总之，俄罗斯帝国当之无愧，没有必要用诸如宪法、民族权利、自治权等虚假词语来搪塞。沙皇是一个独裁者，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 1917 年 2 月被推翻时，俄罗斯帝国中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国家即开始同莫斯科保持距离。1917 年 3 月，乌克兰中央议会成立，要求乌克兰自治。8 月，白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其他非俄罗斯国家亦大多如此。此时，它们并未谋求独立，它们所想要的是一个邦联，而不是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当时正倾全力应付对德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它顺应潮流，将宪政问题交给将于战争结束后选举出来的立宪大会。

然而，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使本来只是尝试性地要求自治的运动很快就转为要求完全独立。开始，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加以鼓励。在那些最初发表的法令中，有一个是《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对“平等”、“主权”、“包括独立在内的自由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保证。许多非俄罗斯人不计后果，按自己的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政府为“中央”，阻止当地布尔〔26〕什维克占领基辅省政府机构。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说俄语，从未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有区别的群体）也拒绝遵守布尔什维克规则。12 月，白俄罗斯全国议会宣布自治。

那时，波罗的海国家为德国占领，但独立运动也迅速蔓延。高

加索和中亚也经历了发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变化，11月15日在梯弗里斯，执政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全民族党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外高加索委员会”。

大约3周后，哈萨克议会宣布自治，自治区域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穆斯林于12月在浩罕宣布自治，成立突厥斯坦，这一地区大致位于哈萨克以北和伊朗、阿富汗以南之间的地区。其他几个民族国家也相继于1917年末和1918年初成立。

帝国重新组成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共产党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如果只是解释而不是歪曲的话，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手是“帝国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政府”时，他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共产党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得权力的时候，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

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列宁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警告”时，斯大林指出：〔27〕

>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③

当各国开始脱离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帝国时，这一“逻辑”即被付诸实施。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将在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的做法是：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俄罗斯红军自由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当乌克兰议会拒绝时，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 1917 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俄罗斯红军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1918 年 1 月，红军占领了位于伏尔加河以东、曾是土耳其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民议会。2 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俄罗斯军队向南扫荡了突厥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然而，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的能力开始受到严重限制。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

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界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体制。如果当地共产党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这一手法使得布尔什维克成为民族独立的斗士，从而分化了敌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28]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要数白俄罗斯。它成立于1917年12月，但在1918年1月中旬，莫斯科共产党官员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同志们”，要他们在预定于2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国家结构”独立不致扩展到已握有政治大权的共产党体系内。1918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 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

由此可见，直到1991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1989年，这一准则曾受到挑战，

但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1918年和1919年，乌克兰曾是一场错综复杂斗争的场所。它有一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月，后被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拉达夺回。拉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另一方是安东·邓尼金将军率领的俄罗斯白军。当战斗结束时，红军成了胜利者，并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列宁迫使两个政党合并，而且，最初乌克兰的共产党还要受“全国共产主义者”支配。 〔29〕

不过，全国共产主义者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组成政府。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尽管四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曾为并入苏联而战斗。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几个国家，当这一态势明朗之后，莫斯科便正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于是，芬兰于1918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于1920年宣布独立。

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组成了独立政府，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它们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22个国家还在1921年1月承认格鲁吉亚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它们最终还是被红军所占领，其国民政府被推翻。

阿塞拜疆因盛产石油，成为苏联入侵的首要目标。1920年3月，列宁下令占领巴库。4月25日，红军跨过阿塞拜疆边界，占领了高加索以北的地区，三天后占领其首府。

巴库被占领的那天，当地共产党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并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这一手法以后经常被采用：先是莫斯科军事干涉，然后扶植当地亲莫斯科分子上台，再由他们出面请求援助。这一手法最近一次被采用，是

在1979年12月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克格勃和“阿尔法行动队”先扫荡了总统府，杀死总统哈菲祖拉·阿明，然后扶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再由他出面向苏联请求“援助”。

1920年，格鲁吉亚军队设法驱逐了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者，但独立的亚美尼亚于12月被占领。短时间内，格鲁吉亚看上去会苟延残喘，因为它与俄罗斯在1920年5月签订了一个和约，俄罗斯无条件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然而，这一神圣承诺毫无意义。来自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军队在1921年2月占领了这一独立的共和国。

〔30〕当内战于1918年和1919年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蔓延时，布尔什维克时而利用、时而镇压民族主义分子和地方运动。无论如何，一旦他们得手，就会像以往一样对这些地区实施控制，将它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兼并。⑤

到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共产党政府已设法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要的例外是，在从芬兰至摩尔多瓦的广阔西部地区，有许多国家被承认独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还有一些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等国。

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都落在共产党手中。在20年代，俄语及其文化曾有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以外地区。不过，30年代却首先经历了集体化，接着就是一场对全党和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仅在乌克兰，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集体化。⑥在哈萨克斯坦，死亡人数的比例更高。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使整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消失。约有1000多名非俄罗斯作家被处死或流放到劳改营，从而使许多国家的文化进步遭受打击，这一严重后果延续至今。

同希特勒的交易

尽管在一场消耗性的内战中获得了胜利，但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已虚弱不堪，难以在西部重组其帝国。在 20 和 30 年代，领导层一直忙于恢复战争创伤，强制推行集体化、混乱的工业化和突然的清洗。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判断，斯大林一直不甘心“失去”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势力范围。只要有机会，斯大林即向西扩张苏联的版图。

这一机会在 1939 年出现了。当时，希特勒决定首先进攻法国和英国，这就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一系列的秘密外交显示，斯大林保证给德国一个和平的“后院”，但条件是：允许苏联自由向西〔31〕扩张。当两国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举世震惊的互不侵犯条约时，他们有意隐瞒了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微型胶片直到1945年才被盟军缴获，其内容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波兰被两国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几周后，该议定书又有修改，将立陶宛划归苏联，苏联则给予德国物质援助，并将波兰划归德国。⑦

在里宾特洛甫离开莫斯科恰好一周之后，德国即从西面入侵波兰。9 月 17 日，苏军从东面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纳粹让给苏联的领土。在这年秋天，苏联还进入了波罗的海独立国家。1940 年 6 月，这 3 个绝望的国家在枪口面前“请求”加入苏联。8 月，苏军占领了罗属比萨拉比亚，随即也将它并入苏联。

1941年夏至的晚上，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迅速占领了被斯大林侵占的那些地区，并向前推进，但在希特勒被击败后，除波兰部分地区外，斯大林不仅设法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还扩大了版图。波兰边界向西移动，占领了德国的一些地区，但其东部的许多地区则被纳入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东普鲁士部分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加里宁格勒州，它曾被立陶宛分离出去。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地区——外喀尔巴阡被纳入扩大了的乌克兰版图之中。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成立，以纪念从罗马尼亚夺回比萨拉比亚。作为战败的德国盟国，罗马尼亚除了同意割让，别无选择。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大国虽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同苏联结盟，但从未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合法性。不过，对苏联〔32〕在欧洲扩张版图并将结果写入和约或其他国际协定之中，美国并未表示异议。

斯大林及其所有的继任者(包括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不承认政策都不当回事。西方的政策已落后于时代，只能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当西方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边界将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时，它将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

当斯大林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并入自己的帝国时，他或许从未想到他和希特勒瓜分领土所引起的政治震动已经使这些国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的遗产：虚假的民族国家

这些并非斯大林唯一的过失，另一过失可追溯到苏联刚成立

的时候。

作为人民委员，斯大林在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对其结构的确立发挥了直接影响。以后，他保留了这一结构，只在1936年的宪法中作了一些具体修改，此时他已大权在握，因而认为是他确定了苏联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的。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种族集团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

在此以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一些改变），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极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33〕权利，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根据在于，每一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义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上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分 而 治 之

对于那些喜欢看到一个整齐划一、民族单一国家的人来说（这也是苏联模式理论上的含义），很遗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模式如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并不与之相符。苏联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首府，无一例外都是许多民族的家乡。在农村，个人定居点则较为单一，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群体构成一个村庄，但它们通常四处分布，使人联想到由各色花布拼起的百衲被。

〔34〕 例如，当你驱车经过乌拉尔山以东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巴什基尔部分地区（自 1991 年开始称巴什科托斯坦）时，就会发现景色轮流交替，一会儿是由传统伊斯兰建筑和穆斯林墓地组成的村庄，一会儿是由俄罗斯建筑和东正教堂以及带有十字架的墓地组成的村庄。在俄罗斯人的村庄，各家房屋都有雕花窗户和彩色门框。相对混杂定居的模式很普遍，而不是仅仅存于各加盟共和国交界的地方。

这种定居模式表明，边界不可能只按意想中的民族因素来划分。从好的方面看，有时必须作出妥协，使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界两

侧；从坏的方面看，政治考虑居于主导，边界划分旨在造成地方对立。防止出现任何一种与莫斯科作对的地方合作，似乎是当局每天的任务。

这种情况在高加索、中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更为突出。一个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飞地”却处在阿塞拜疆管辖之下，而不是由亚美尼亚管辖。

政治决定边界的另一重要例子是，1956 年赫鲁晓夫命令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该半岛在 18 世纪就被俄罗斯人从鞑靼人手中夺过来，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是俄罗斯人。这样做的原因却从未得到圆满解释。

中亚是这种分而治之最典型的例证。历史上，这些地区并未被统一在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或帖木儿等独裁者手下，而是被划分为几个汗国，而且这些汗国也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当中亚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它是以突厥斯坦的名义加入的。大部分当地人说土耳其母语，使用单一的查加泰文字。在南方，许多波斯人也说土耳其语。正宗的波斯人，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城的波斯人，既说土耳其语，也说波斯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宗教而非语言，他们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

到 20 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先是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以后则是以民族为界，也就是基于语言和部落的不同将它分裂成几个新“国家”，这样，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它不是加盟共和国，只是自治共和国）就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前的确有其民族特性，并且最终〔35〕形成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毫无疑问的是，将它们分开的最初动机是要防止它们融入穆斯林土耳其集团之中。事实上，苏联当局几

十年来一直禁止当地领导人成立区域集团，禁止学者们成立土耳其研究中心，以免亲土耳其的细菌找到可以繁殖的温床。

就是在语言文字规范等非政治性领域，分而治之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独立“国家”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表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语中通用的文字语言，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30 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要明白这种语言隔离的后果，可从德语去联想，看看当德语在统一文字标准并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的共同遗产之前，如果类似手段被采用会有什么样结果。不同的德国方言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如巴伐利亚方言在汉堡或德累斯顿街上就几乎难以让人明白，柏林的方言在慕尼黑亦如此，但事实上，德国人却能互相理解，并感受到共同的特性，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文字，即路德翻译《圣经》时所用的文字。

如果 15 或 16 世纪的占领国希望德国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地区语言多样化，让每一语言有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标准，禁止教授或书写一种跨方言的全国性语言。只要有足够时间，这种手段就会造成独立的巴伐利亚、萨克森、莱茵兰、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统一，在未来将更难于实现，因为语言确定了每个人的国家感。

〔36〕 共产党在中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给统一设置障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摩尔多瓦采取

了同样策略，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合理的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亚拉巴马和马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

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摩尔多瓦语”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表面上，这的确显得不同，如果你不懂西里尔字母，你就很难将以这种语言表达的“我爱你”同英语中的同义词联系在一起。

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保持触角……与抵触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中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习惯上还是将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最原始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英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

们也能生存。

[37] 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所有矿砂都必须用船运到几千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进行加工。当我问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地说，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就可以生存。"

政治与官僚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一新工业建立，就有人要被派到那里去工作，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处女地"，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1990年2月，我在基什尼奥夫（即现在的基希讷乌）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的伊翁·纳迪尔萨等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的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问及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认为也许莫斯科并无明确的歧视政策，但它对各地的遥控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效果。

"就说邮电部决定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客人举例解释道，"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

也着手训练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但是，到他们毕业时，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定居下来，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联系被滋生着妒忌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 〔38〕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常被用来描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标语，译成日常英语就是：“只要按我们的想法去说，用任何语言说都行。”

这是描述实际情况的几条标语之一。事实上，各民族都被允许保护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的还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在农村小学，一般都是以本地语言进行教学的，政府资助的出版物、电视、电台也都是使用本地语言，但政府要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比使用俄语的出版物更为严格。

尤其是任何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主题，更是受到压制，只有在 2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时政策有所松动。任何贬损俄罗斯人影响的论述，都被视为不能接受的民族主义。[8]曾反抗过俄罗斯扩张的民族领袖被定为历史罪人，更糟的甚至还会被定为叛徒，沙皇时代的镇压行为，如 1916 年吉尔吉斯人因拒绝征兵而惨遭大屠杀，因此而相形见绌。

虽然当局允许使用非俄罗斯语言，并在一些方面给予支持，但也日益强调作为“新苏维埃人”，更应学习俄语，后者则是苏联

体制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俄语成了各个领域的人优先选择的语言。在许多共和国，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都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俄语学校，而不是那些使用自己语言教学的学校去学习，以此希望子女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一技之长。

那些移居到民族区域的俄罗斯人，除少数人外，大多未被要求去学习当地语言，哪怕只是一些基本的礼貌用语。俄语日益成为上流社会的语言，各地方言则只是它的附庸。在大多数共和国，最好的学校和最先进的学术文章，都使用俄语。即使在使用当地〔39〕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俄语也是必修课。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外，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很少有不使用俄语的。

当局为年轻人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军事服役制度(唯有一些高干子弟能够逃避)，且军队中都使用俄语，这就意谓着，实际上每一个男性公民在服役期间都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俄语知识。

这些做法刺激了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但当他们关注这一问题时，官方的反应是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异己分子。例如，60年代，乌克兰学者伊万·久巴向当局提交了几份备忘录，提出这一做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当局遂将他定为诽谤罪，并令他撤回备忘录，公开认错。同样，许多采取更为激进方式的抗议者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⑨

除了语言俄罗斯化之外，非俄罗斯文化还面临其他的、使其丧失主流地位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中，有些是20世纪的普遍问题，如都市化和工业化（当然，苏联的做法通常加剧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有些则是苏联帝国所特有的。

苏联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国家，在武力扩张时期尤其如此。宗教遭到压制，传教和信教都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向未成年人传教是犯罪行为。任何人如果公开宣布自己信教，就不能加

入共产党(这有效地防止了大部分的干部信教)，而且会在其学校或工作机关经受一定的压力。许多教堂和清真寺以及犹太教堂都被关闭，公开作礼拜的日益限于老人。

这一反宗教政策对那些文化与传统宗教融会在一起的民族影响尤甚。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与其文化渊源的联系，犹太人几乎完全世俗化和俄罗斯化。一时间，即使教授希伯来语，也被视为犯罪。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教和天主教教堂很少有存留下来的，只有立陶宛、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设法保护了在全国有强大影响的教堂。但是，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当局花费了很大精力，让克格勃渗透进去，以控制牧师。

尽管这一体制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它出于政治目的〔40〕也的确支持了一些宗教团体。例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堂就得到包括警方在内的官方支持，意在对付那些不从属于莫斯科东正教堂的教会，特别是乌克兰天主教会和乌克兰东正教自治会，这两个教会因暗中支持分离主义而被法律禁止。

当然，“社会主义”是强制性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无论传统如何，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必须建立集体化农业，成为以中央计划与管理为特色的联盟经济的一部分。的确，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但它们都隶属于莫斯科全苏计划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不能自筹资金，也无权根据情况变化去改变莫斯科制定的价格或标准。

中央官僚机构不顾各地情况坚持一刀切，这是荒谬的。1990年，改革在理论上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但在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市，该市市长仍向我抱怨莫斯科的条件不灵活。这一地区的天然气很丰富，他希望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以

为该市居民供应做饭和取暖所需的天然气，但莫斯科不愿为此划拨必要的资金，让市政府自己筹集。

该城市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票价是 7 个戈比，而莫斯科规定全苏联一律为 5 个戈比。市长打算将票价提高到 10 个戈比，以便将其中的利润以及交通补贴用来资助天然气管道工程。市议会支持这一动议，但莫斯科不予批准。从原则上讲，并无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去否定市政府对划归它们的资金拥有分配权，只要它认为是合适的即可。但在实践中，地方的动议常被否决，只因莫斯科的各部委不愿其他人侵入其权力范围。

〔41〕 事实上，莫斯科工业部门的态度不只是为了争夺官僚机构的市场份额，在他们控制的工业部门中，官员们将遍及全国的各项设施都视为该部门财产——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置。当然，在法律上，事情并非如此。财产属于国家，各部门只是对它进行组织和管理。但管理者很容易忘记这一原则，如同美国公司的官员们有时忘记了不是他们，而是股东拥有该公司一样。

在1990年斯帕索别墅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向苏维埃邮电部长提起立陶宛的独立要求，这位部长反应强烈，“这些人是极端分子，”他咆哮道，“他们认为自己是立陶宛所有财产的主人，但他们不是。为什么？我的部就在那里有三家工厂，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开办的，它们理当属于我们。”

我评论说，虽然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苏联的官员们一定是，令我不解的是，他如何将其对那些工厂的态度与财产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原则协调起来。各部门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那些财产，人民也有权将财产从他们手中收回。

“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他气愤地问道，“事实是，我

们为那些工厂付了钱，它们就属于我们！"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的态度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关系，但人们可以从其对各共和国和省份的态度上很快领会到其意义所在（这一态度在莫斯科各部委中非常普遍）。正如他们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是受莫斯科的管理，就好像是各部委的私有财产一样。

缺席的所有者对他们的计划如何影响环境并不关心，有的建筑设计并不安全，甚至是建在断层面上。钢厂、化肥厂和造纸厂没有清除排放物的配套设备。植树造林只是某个单位的事情，也只能粗略估计是否已有足够的资金。1989年，仅乌克兰就排放了八倍于美国的污染物，这一记录是不太光彩的。

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环境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由苏联的集权经济造成的，而这一集权经济又是由莫斯科的各部委所操纵。[10] 由于有关环境破坏的事实日益为人所知，促使各地的人们对苏联帝国及其活动产生不满。毕竟，是现场的人民，而不是莫斯科的高官们，亲身感受环境破坏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42〕

行政部门决定商品价格，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理由。各共和国的主要商品和产品，其价格都被定得极低，而它们购买进来的、主要来自莫斯科的工业品则价格较高（当然，仍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低）。然而，人们强烈地感到这一价格体系是用来欺骗他们的，投资政策有利于俄罗斯而非边远地区，这种情形在中亚尤为突出。

如同控制俄罗斯地区一样，共产党也控制了非俄罗斯地区。为确保地方官员不对"民族主义倾向"心慈手软，通常，党的第二把手都由俄罗斯人担任（第一把手是当地人）。实际上，大多数非俄罗斯官员都奴隶般地屈从于莫斯科的独裁者。他们明白，对

他们忠诚的任何怀疑都会使他们的官运终结。

尽管如此，它仍不能阻止非俄罗斯官员逐渐在许多共和国形成骨干力量。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的“互利”政策下，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党内发展“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服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小圈子。

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省份领导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只要他们忠于莫斯科的总书记（他们的国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

苏联这一国家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工具而已。就是在改革的最后两年里，尽管改革的口号叫得十分响亮，党的地位仍然高于政〔43〕府。当不能将两者职位合而为一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时称第一书记）就高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它只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这一模式延伸到每一级别，直至县和区。

官方文件中很少提及共产党的地位，但首脑会晤时例外。在那种场合，我们被告知，应给总书记以国家元首的所有荣誉。其实，也没有必要总是将党的地位挂在嘴边，因为社会等级观念已被灌输到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生活之中。当我和丽贝卡去苏联各地旅行时，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点，有时它令我们吃惊，有时又令我们感到有趣。

在旅行时，我们总设法会见社会各阶层的人，常常在当地旅馆举行招待会、午餐或晚宴，邀请当地党政官员（如无上级批准，他们是很少出席的）和其他各类人。

虽然我们总设法去接近普通人，但当地的习惯常常使我们的

努力受到阻碍。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但人烟稀少的州府，如果没有党的首脑出席和首肯，决不会有一个苏联客人敢跨进我们招待会的大门。即使有时客人们被千方百计请进了宴会厅，他们也只有在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同我们干杯之后才敢吃东西或喝饮料。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助餐不感兴趣，只要当地领导人答谢完我们的欢迎词并碰杯后，餐桌上的食品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然而，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服从政治权力。

“被解决的民族问题”

由于共产党对帝国的控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观察家们怀疑潜伏着的全国性紧张是否能动摇这一体制。尽管这种紧张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爆发，但强有力的专政支柱会防止帝国崩溃。

大约在 1985 年，苏联官方认为相对来说国籍问题是一个不很重要而且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们相信，一个没有民族特征的“新苏维埃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人民说的是俄〔44〕语，但国籍却是“苏维埃”，这一新的类型将稳固地取代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以及俄罗斯人。在他们眼中，未来属于这一新的“国际”类型，即使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不得不对恢复旧的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这一进程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但是，当局仍有足够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反抗历史潮流的幻想。①

戈尔巴乔夫赞成这一观点。甚至在他就任总书记两年之后，在他已将改革描述为“革命性转变”之时，他仍满怀信心地写道：“苏联在人类文明史上（在防止民族冲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例

证。这些都是列宁倡导的民族政策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当时就此作出的唯一指示论调也基本相同：“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持久的国际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可以有效地影响民族主义者的态度。”[12]这主要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当他对其国民演讲时，他发表了同样观点，但增加了一个警告。例如，1987年1月，他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说：

> 人民的民族感情值得尊重，我们不应忽视这种感情。但是它们也不能被利用。不能让那些想要利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偏见的人抱有幻想，指望能削弱我们。[13]

只要确保党对全国的控制，只要加强专政，保持团结，避免分裂，民族情绪就不会占上风。这种自信是合理的。

苏联政治进程的大多数观察家——就此而言，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的参与者——都断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共产党的控制是不可动摇的。

第 三 章

〔45〕

火炬的传递

戈尔巴乔夫开始攀登一座山峰，他甚至看不见山顶。

鲍里斯·叶利钦 1989 年①

我在 1985 年仍然相信制度是可以改进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2 年②

计划的艰难、成功的不确定及执行的危险，都不亚于试图引进新的制度……

马基雅维里 1514 年③

1985年3月10日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的去世本应成为当天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但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新闻媒介并未中断它已安排好的节目。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决定，在继任者选出前，不宣布契尔年科的死亡。

政治局当晚开会做出了选择，并于次日召开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加以确认。飞机当夜从苏联各地起飞，载着党的首脑前往

莫斯科参加秘密会议。一位资深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要一直从加利福尼亚飞回去。他是唯一有幸在部分航程中乘坐美国空军飞机的政治局委员，美国空军飞机把他从旧金山送到纽约，一架苏联飞机被派到那里接他。

事实上，组织紧急运送谢尔比茨基一事，为我们在华盛顿提供了有关契尔年科去世的最初消息。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很差，我们曾常〔46〕听到有关他去世的谣传，但最后都证明是不可靠的。当时我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有关苏联和欧洲事务，刚好在两天前，即3月8日，我给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最新的传闻看来是可靠的，总统应该就届时是否去苏联参加葬礼一事做出决定。

丽贝卡和我当时正前往马里兰东海岸瓦依种植园内的阿斯彭学院会议中心，参加一个有关美苏关系的周末讨论会。我在星期天下午回到家，电话正响着。来电话的是马克·帕尔默，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他负责苏联和东欧事务。他告诉我，我们接到请求，请我们帮助谢尔比茨基迅速返回莫斯科。我同意请求白宫授权空军把他送到纽约，在那里有一架苏联飞机接他，我们还就此事的明显含义进行了讨论。接着，我们两人都收拾行装匆忙前往莫斯科，参加又一个葬礼。

尽管有我们的帮助，但谢尔比茨基仍然到得太迟，没有参加那两次会议。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首脑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也没有及时赶到。这两位共产党保守派官员没有参加关键性会议一事，使人们后来推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当选，是以5比4的微小优势战胜了莫斯科的共产党首脑维克多·格里申的。[④]

这份有意思的报告是为苏联政策问题的专家写的，它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其他直接参加会议的人都否认这种说法。[⑤]问题并不在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坚定地支

持戈尔巴乔夫，而是在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在3月10日的会议上没有投票权。

实际上，在1984年和1985年初，格里申就通过阴谋手段，想使自己被提名为契尔年科的继承人。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勃列日涅夫时代一定还会再持续几年。但是格里申在1984年有关继承人问题的斗争中失败了，当时他没有得到有影响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乌斯季诺夫在12月去世一事，使格里申的希望死灰复燃，他企图得到契尔年科的认可，为达此目的，他利用其势力范围内的新闻媒介，进行了臭名昭著的阿谀奉承活动。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各方面都依靠其智慧战胜了格里申。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中负责人事的书记，他有计划〔47〕地安排戈尔巴乔夫的潜在支持者担任全国各地的州级共产党首脑；如果政治局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的票就是决定性的。契尔年科对情况了如指掌，因而他根本不注意格里申拍马屁的举动，也可能他曾极为严肃地加以抵制：他没有阻挠戈尔巴乔夫有效控制中央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努力，除了戈尔巴乔夫，他没有再提名其他继承人。这可能并不是很重要，但它将给戈尔巴乔夫赢得全票带来许多麻烦。有一点更为关键，戈尔巴乔夫设法使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站到他的一边。

此外，契尔年科去世时，如果不是立即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的敌人，包括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共产党首脑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就可能密谋互相吹捧。戈尔巴乔夫的迅速行动阻止了这种企图。

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头一个得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坚持应毫不拖延地做出

决定。他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离开房间，直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由他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按惯例由明确的继承人担任），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为总书记。

第二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匆忙召开会议。它只能确认政治局的推荐，因为没有任何人做好了挑战的准备。格里申及其朋友们认识到，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可能会使他们立刻很痛苦地退休，因而他们与其他人一道投了赞成票。

过去领导人的幽灵

契尔年科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糟，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是第三个这类领导人了。在他前面，勃列日涅夫庸庸碌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短暂任期内疾病缠身。从一切客观标准来看，人们早就期望着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

[48] 10 年来，苏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都是年迈而自满，他们缺乏创造力并坚决镇压任何有新思想的人。

勃列日涅夫是个沉闷的政治寡头，即使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他喜欢谄媚、奉承、奢侈品、高速轿车和年轻女人。他用权力分赃的方法笼络党的官僚，以维持其统治。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排位紧随共产党权势集团之后，每个有影响的利益集团都分享到其中的一份。斯大林的恐怖、赫鲁晓夫的轻率试验，都导致散发着臭气的腐败。统治者之间的个人联系决定了一切。

安德罗波夫是帝国的最高“执法者”，他担任克格勃首脑达 15 年，他利用所掌握的有关腐败问题的情况削弱勃列日涅夫派，竭

力争得了权力。但这时他的肾出了毛病，才一年多时间他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安德罗波夫曾推荐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其继任人，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派进行了报复，他们排挤了戈尔巴乔夫，代之以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契尔年科。

我第一次见到契尔年科是70年代初在华盛顿。

我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苏联事务，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外交官与我联系，要求对即将来访的人给予特殊接待。当时，我并不知道契尔年科其人，他们解释说，他在中央委员会负责档案，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之一，那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位。他对美国国务院如何归类和分发函件很感兴趣，因为他正在寻找改进苏联有关系统的方法。

我不知道国务院安全官员能否同意让苏联官员参观密码间，但我同意问一下。

使我惊讶的是，我们的人认为此行没有问题。实际上，他们力图尽可能好地接待他，在他参观期间不处理任何机密函件，并安排用无关紧要的和不保密的文件演示如何对文件进行分发、归档和使用可恢复程序。

契尔年科根据商定的时间准确到达，他的圆脸上堆着憨厚的微笑，就像丘比娃娃的笑。他衣服崭新，皮鞋亮得耀眼，我甚至怀疑是漆皮的。在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我和我们的通讯专家陪同他参观了国务院的设施。他对所有向他介绍的情况都仔细倾听，问一些有关分发系统和计算机工作情况的问题，并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一再表示感谢。

以后，我只在远处看到过他。在政治局参加的公开集会上（例如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总是正好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后面，有

时被叫出去拿文件夹。他总是先把它交给勃列日涅夫，然后再拿给其他几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每个人在文件上签名后还给他，他再交给下一个人。显然，他只是负责保管文件而已。因此，勃列日涅夫把他提拔到政治局令人感到很惊奇。他看上去并不是负责制定政策的那种人。但在当时，勃列日涅夫就是那样办事的。个人关系决定一切。

契尔年科被勃列日涅夫派选中，以推迟他们认为安德罗波夫及其一派想要进行的变革。他无疑是最高层中的一个消极，平庸的人。但是，与他的某些前任不同，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拒绝支持政治局中那些想取消戈尔巴乔夫继任资格的人。

3 月 11 日中午刚过，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终于向世界宣布了。几小时后，在晚间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塔斯社宣布，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一天新闻报道的中心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契尔年科，其意义第二天早晨便为苏联报纸的读者所知，他们发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消息登在报纸的第一页，而契尔年科的讣告在第四页。

3 月 13 日的葬礼看来只是走过场，或者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葬礼为由，赶往莫斯科拜会新的总书记。美国的代表是副总统乔治・布什，因他曾参加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⑥]但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都亲自前来参加葬礼。在进行了简短的礼节性拜访后，他们都同意撒切尔夫人的判断（上一年 12 月，她曾在伦敦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是一个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

新的首脑

〔50〕

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人们都不想看到苏联帝国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正像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当时所说："他步履矫健，谈笑风生，衣着合体。"因而他使世界感到惊奇和迷惑。

在华盛顿，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比对他的那些前任在就任时了解得略多。长期以来，苏联新闻媒介一直被禁止宣传政治领导人的私生活。情报机构不得不设法一点一滴地搜集这种敏感的情报，比如某位政治领导人有几个孩子，他们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等等。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美国白宫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以弄清他的夫人是否仍在世，以便发去唁电。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但不清楚他的夫人是否仍活着。

对戈尔巴乔夫的了解要多些。我们知道他毕业于苏联最著名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因而可能比他的前任受过更好的教育（列宁是个有争议的例外）。他来自农村，在共产党机关中开始其政治生涯。他设法克服了曾主管苏联农业的政治上的不利条件。比起他的前几任领导人就职时的情况，他去国外旅行得更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也享有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他的夫人赖莎很有魅力，她衣着得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上很活跃，与前几位第一夫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背景和个性在很多方面仍是个谜。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往一般避免接触外国人；因此，甚至

没有什么人见过他，更不用说了解他了。

1975年，当美国驻苏大使离开时，我曾临时负责驻莫斯科使馆事务，我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我特别请求拜访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位年轻的（我们几乎是同龄人）、以试验者和政治“新人”而〔51〕著称的官员。我希望，他不像大多数州那些墨守成规的领导人，而能破例接见一个美国外交官。但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接待我的是州政府首脑，他安排我在该地区进行了经过精心选择的旅行。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坐汽车和出席宴会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同其他州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1985年5月，即在那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过了10年，我终于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机会出现在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是一位有魅力的前牛仔，仍酷爱在竞技活动中骑马，两年后从马上摔下来，悲惨地死去。他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来自产马的农村地区，就带了美国西部马鞍作为礼物。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物，机智地避免提到他早年曾是一名拖拉机手，而不是骑手的经历。

新任总书记与我们的会见有两个多小时。我曾就近观察过他的若干前任。和他们相比，他非常能说会道。他坐在勃列日涅夫曾使用过的长条桌旁，面前放着文件夹，那或许是准备好的提要。但他从未动它们。以前，当勃列日涅夫专注地看放在他面前的稿子、试图弄明白眼前模糊不清的字母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曾发生令人尴尬的停顿，现在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也不再出现助手纠正领导人口误的现象。

戈尔巴乔夫控制着谈话；他对客人的每个问题或评论都要发表看法。然而，他看来确实在倾听，他的答案也并不总是我们在前苏联领导人那里经常听到的那种老生常谈。例如，他没有宣称

他们有最好的制度，他还动感情地谈到需要改进经济管理方法。但是，他在谈话中也进行了某些辩护。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最近所说的苏联不再能满足人民对食物的需要的话，他进行了抱怨。

我记得，他当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为什么你们总是贬低我们？英国或德国也必须进口食品才能满足其人民的需求，你们为此而谴责过它们吗？我们的确满足了人民的食品需求，像它们一样，我们进口了某些食品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付了钱，付了现金，就我所知，你们的农民并没有拒绝拿这些钱。至于所涉及的产品，我们所生产的小麦比你们更多，即使按人均计算也是如此。我们的问题是浪费得太多。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正在就此采取措施。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的农民就将失去 [52] 一个主要的市场——但那是你们的问题，或许我们将不得不忍受说我们不能满足人民食物需求的恶意嘲笑。”⑦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骄傲、严阵以待、在辩论中很机敏，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我后来对华盛顿的同事说，美苏会议开始有趣了；也许那种沉闷、令人昏昏欲睡、无休止地倾听和重复同样论点的会议，现在要被更有活力的辩论所取代。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在个性上与其前几任领导不同。他还决心改变制度，而勃列日涅夫派则要使之永远存在下去。

然而，他的辉煌的100天改革并没有对国家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首先，他的政治地位不稳定，其次，他的计划有所局限，没有涉及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1985年，他仍然相信能够用修补制度的办法来治理好国家。

1985年春，残存的勃列日涅夫派仍据高位。自从勃列日涅夫

死后，还没有举行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因此，党中央委员会为极端保守的人所把持。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得太快，他作为总书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8]

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

从外表来看，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通常显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强有力。通过狡诈的和冷酷无情的手段，斯大林实现了独裁统治。然而其继任者中，没有任何人去设法做到这一点。那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人们心头留下了创伤，从那时起，斯大林的继任者确信，共产党的寡头政治能够使独裁得到控制。这种做法绝不是什么民主政治，而更像是暴徒之间相互防范的盟约。

总书记既没有固定的任期，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威。他的权力来自他对大多数同事进行说服、哄骗或胁迫的能力。一般来说，〔53〕"多数"意味着意见一致，而不是变动的票数，它通常取决于默认，而不仅是得到51%的票。在理论上，如果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支持并建议选举其他人任总书记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可以罢免原总书记。但在实际上，只要政治局的多数派同意，就可以罢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只有罢免了他的主要对手，或至少是罢免了足够多的对手，并提拔那些准备支持他的人，他才能拥有可靠的多

数，才能够进行领导。

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一年后，他的地位已像其前几任领导人那样稳固，而仅次于当年处于权力顶峰的斯大林。如果他后来没有着手改变制度，他本来可以比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间更长。

1985 年 4 月，在就任总书记 6 星期后，戈尔巴乔夫经过策划，选举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从而得到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后来，戈尔巴乔夫同这三个人断绝了关系，但在当时他们还是支持他的。

到 7 月份，他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把最可能威胁其领导地位的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从政治局赶走，罗曼诺夫是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首脑，他以傲慢、独断和粗野而闻名。据传闻，他的姓是郑重地取自最后一个沙皇王朝的姓，他还随意取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前沙皇的收藏品。据说，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胡闹的客人曾打碎了一些特意从博物馆"借"来的珍贵的有历史价值的瓷器。

赶走了罗曼诺夫，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重要的提拔：鲍里斯·叶利钦进入党中央书记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表示将亲自负责外交政策。安德烈·葛罗米柯曾担任了 28 年外交部长，既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也负责执行，他被"明升暗降"，担任了受尊敬但却无权的挂名的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曾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对他很了解，因为格鲁吉亚邻近斯塔夫罗波尔地区。 〔54〕

到秋天，雷日科夫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最顽固的对手之一、80岁的尼古拉·吉洪诺夫，担任了总理。到1986年春天，高层领导中残留的勃列日涅夫派已经调离、退休或者安排到政治上不重要的位置。1986年2月，共产党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它导致了党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重要变化。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这是比以前历次党代表大会所发生的更为重大的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太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央委员会仍然极为保守。

改革派后来认为，党代表大会提早了一年。他们感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准备”，确保由志趣相投的官员占主导地位。看来，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对他打算进行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因而他不可能知道谁会支持他。即使他了解其改革方向，他也难以在共产党的上层发现对其改革有帮助的人。旧制度的提拔过滤系统仍在照常运转。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在就任总书记第一年所采取的加强个人权力的斗争，是极为漂亮的政治行动。即使某些尖锐批评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曾指出：“在改革计划刚刚提出的最关键时刻，他表现出惊人的手腕。”[9]

领导班子成员

1985年底，戈尔巴乔夫关于国内政策有两个最重要的助手，他们是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

雷日科夫比戈尔巴乔夫年长1岁半，55岁时被任命为总理。与高层领导中的多数同事不同，他没有在共产党机关中度过其主

要的职业生涯，而是作为工业的、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管理人员而得到提升。他曾在苏联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巨大的乌拉尔机器厂工作了 25 年，并最终担任了其领导。1975 年，在勃列日涅夫的权力鼎盛时期，他来到莫斯科，担任重型机器制造部部长，接着又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重工业和武器制造工作。 [55]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让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党务工作，1982 年任命他为负责经济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10 年后，雷日科夫对我追忆此事，他说他对调做“党务工作”感到很惊讶，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典型的党内官僚。然而，安德罗波夫坚持要他去，因为他正试图把更注重实际的人集结起来，以便改进工作效率，并同腐败做斗争。[19]

在雷日科夫调入中央书记处前，他同戈尔巴乔夫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从 1978 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农业问题。安德罗波夫把他们两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们，对专家们就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有助于改善管理的措施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他们共同负责。这项工作未经政治局讨论，而是秘密进行，直到它完成。

该项计划尚未完成，安德罗波夫就去世了，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总书记，他和雷日科夫在办公室的保险箱中已积累了约 120 份由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成为在 1985 年 4 月的全会上公之于众的有限改革计划的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雷日科夫是在斯德哥尔摩。那是 1986 年 3 月，他担任出席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葬礼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他同意在城里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身穿剪裁合体、做工考究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戴着雅致的格子领带，看上去就像是在美国任何最大公司的会议室里。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管理众多官僚。当我们处〔57〕理有倾向性的问题时，他显得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显然非常熟悉苏联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但他只是阐述它们，而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就此进行协商谈判。他的兴趣和责任是苏联的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他热切地谈到外国对发展规划进行投资的前景，并向我们保证减少军品生产，以便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民品。然而，他并未暗示他预见在制度方面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似乎认为，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投资重点的逐渐转移，能够使发展速度正在减慢的苏联经济恢复活力。

当雷日科夫出任苏联政府机构的首脑时，叶戈尔·利加乔夫实际上担任着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当时没有正式的副总书记，但是由利加乔夫主持书记处会议，这使他能够直接掌管日常工作）。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大 10 岁。像雷日科夫一样，他受过技术教育，但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共产党机构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那红色的脸膛和蓬乱的白发，显示出他在寒冷气候中奔波于户外的经历。安德罗波夫让雷日科夫就任共产党高层职务，把管理专长引入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他也让利加乔夫进入书记处，主管人事安排的工作，以便更努力地同腐败做斗争。利加乔夫名声清白，这一点打动了安德罗波夫。像安德罗波夫一样，利加乔夫也认为应该由共产党来推行改革。后来，当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进行自身的改革时，利加乔夫开始反对他。

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

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难以驾驭的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的首脑，在1985年圣诞节前夜被任命为主管莫斯科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公认的对手格里申曾任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叶利钦的任务是清除自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以来在这个关键的党组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腐败。他精力充沛，非常认真地投入这项工作，并善于引起公众的注意，不久，他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

一个有限的计划

注明改革的时间在共产党中已成惯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4月，他当选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次会议以“四月全会”而著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批准的计划并不是最终为世界所了解的那个改革计划，即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改革计划，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计划。它应更准确地称为“安德罗波夫宣言”，因为它基本上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

从一开始，某些支持者就敦促戈尔巴乔夫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在办公室里，他公开指派两个有改革思想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负责“四月计划”的最初起草工作。他们被送到郊区的别墅，不受干扰

地工作了几个星期，这是戈尔巴乔夫一再使用的办法。据波尔托拉宁说，当戈尔巴乔夫看了他们的草案后，他删去了所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段落。“那是以后的事情，”戈尔巴乔夫说，“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演习。[11]”

戈尔巴乔夫最初采用的口号是“促进”——换句话说，就是加快现已存在的趋势。只要有更严密的纪律、更严格的管理、更少的腐败、更多的节制和对传统管理方法的某些调整，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普通老百姓从两个方面感受到新的政策：努力工作的压力增加了，含酒精的饮料更难得到，更贵了。

消费品短缺是苏联的痼疾，管理人员对雇员花两三个小时出去吃“午饭”通常视而不见。很多人必须花时间排队才能买到每天的生活必需品。为了减少这种现象，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并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把视察员派到商店，以便核实顾客是否从自己的单位溜号。实行更严密纪律的运动本来能够起作用，如果同时增加消费品的话。然而，消费品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仅仅敦促更努力工作的做法激怒了公众。几个月后，这一运动停止了。〔58〕

1985年5月宣布的反酗酒运动，给公众甚至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酗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采取削减烈酒、葡萄酒甚至啤酒产量的办法，则使情况更糟糕。伏特加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中。1000多年前，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以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为国教，因为他认为，他的臣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烈性饮料。此外，缺乏更有益于健康的消遣娱乐的机会，在有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这种机会。对很多苏联人来说，除了喝酒之外无事可干。

反酗酒政策被推向自我毁灭的极端。中央命令减少含酒精饮料的生产，但在很多地方，官僚们决定走得更远，他们停止了所有饮用酒的生产。在南方，所有的葡萄园都被犁除，尽管消费葡萄酒并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而且葡萄酒在许多非俄罗斯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雷日科夫说，在一年内，官方允许的蒸馏法伏特加的产量减少了一半，葡萄酒的产量减少了近2/3，啤酒的产量减少了1/3[13]。

由于获得含酒精饮料的合法来源受到了限制，许多酒鬼干脆去买非法酿造的酒，甚至是更危险的调制酒。在两年内，糖的消费量上升了14%，正像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沮丧地指出的："我们都知道它用于生产什么。"

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从1986—1988年的3年时间，国家税收减少了67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1000亿美元。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

尽管限制饮酒的政策在1988年悄悄地撤消了，但它的影响却长期存在。伏特加的产量迅速恢复了，但是葡萄酒的产量却滞后了好几年，甚至到1992年，在俄罗斯的餐馆中也难以得到葡萄酒：唯一的选择常常不是伏特加，就是白兰地，几乎不鼓励人们喝低度酒。

从外表看，反腐败运动的效果更好些。从1985年冬季开始，〔59〕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在很多共和国和州都以犯有腐败罪为由进行了广泛的清洗。然而，在非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运动常

常搞得很混乱，如果将非俄罗斯人免职，即使他们很不正派，但也很可能被看作清洗当地民族，以利于俄罗斯人取代他们。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在1986年12月栽了个大跟头，当时他们以俄罗斯人取代一个公认为腐败的哈萨克族共产党领导人。它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民族骚乱，一些人伤亡，很多人被逮捕。当时，苏联领导人和很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开始政治改革

到1986年夏天，很显然1985年开始的有限“改革”已经无路可走。戈尔巴乔夫开始发表更为激进的讲话。6月，他攻击了有影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夏末，他开始谈到改革政治制度。到那时为止，还很少使用“改革”一词，仅仅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例如“改革经济管理制度”。

那年夏天所流行的另一个新词是“公开性”，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戈尔巴乔夫最初认为公开性是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同反对他改革计划的那些官员进行斗争。

维塔利·科罗季奇曾担任过数年《星火》杂志的编辑，他后来说，当戈尔巴乔夫宣称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部分时，他心里的感觉是“让一个老妓女洗个海绵擦身浴，再穿上干净的衣服，以为

这会使她变成处女”。[13]

尽管外界当时不知道，但包装这个老妓女的是前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很早就把他吸收为改〔60〕革伙伴，1986 年，雅科夫列夫开始负责共产党宣传部门，他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新闻媒介的领导。尽管主要任命仍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他能够主动提拔他所选中的人。

1986 年春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并遭到错误的处理，它给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机会，把某些活力注入死气沉沉的苏联新闻媒介。当放射性尘埃开始沉降、这场巨大灾难的某些情况开始为克里姆林宫所知时，如果进行改革，那么显然对过去事件过分保密的做法就不能持续下去了。苏联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由于未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正当他们最需要信誉的时候却失去了它。

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是一个突出事例，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已对这类问题掌握了很多情况：即使作为宣传工具，苏联的新闻媒介也一钱不值。报纸和电视迟钝单调，缺乏信息，根本引不起苏联公民的注意；如果他们想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收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些不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要等好几天才能得知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这些消息也是很不完全的。

科罗季奇引进《星火》周刊的方式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他的专业是医生，但他像以前的契诃夫一样，从医学转向文学。开始时，他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写诗，逐渐他转到新闻工作，到 80 年代，他在家乡基辅出版的一个青年杂志担任了编辑。

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几天，科罗季奇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话。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的出版工作是由

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负责监督，而不是莫斯科党中央委员会。打来电话的是他的一个老熟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刚刚搬到老广场的办公室。

雅科夫列夫问科罗季奇，他是否愿意到莫斯科，接管《星火》杂志的编辑工作。《星火》杂志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是最老的连续出版的俄语周刊。有一段时间，它曾经很受欢迎；在30年代，它似乎模仿美国的《生活与观察》杂志：它登载人们感兴趣的文章、短篇小说、一些诗及大量图片。然而，在许多年里，它〔61〕由整个苏联宣传界最庸俗的两个雇佣文人管理，因而其订户暴跌。雅科夫列夫知道科罗季奇具有独立思想，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力图使杂志更符合公众的兴趣。

科罗季奇并不想离开基辅，他对雅科夫列夫的询问含糊其词，但是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不能驳回的命令：指令他两天后的上午11点到利加乔夫的办公室。

利加乔夫当时负责人事安排，在把候选人的名字呈送政治局正式批准之前，他通常要同他们谈话。与科罗季奇的谈话很短，而且几乎是秘密的；利加乔夫提到，他们调查了科罗季奇的情况，查明他没有建立"个人秘密组织"。他在工作时看来完全不受外界影响干扰。当科罗季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能经得起这种压力表示怀疑时，利加乔夫向他保证，他们检查了他的医疗记录，确信他很强健。显然，利加乔夫的办公室做了彻底的背景调查。

在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后，利加乔夫带着科罗季奇去了政治局的会议室，介绍说他是选为主持《星火》杂志编辑工作的人，并问是否有人反对这项提议。人们都不反对，他告诉科罗季奇，"很好。到此为止"并指着门。

任命科罗季奇时所用的程序，表明在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下如

何进行任命工作。一个有着“全联盟”重要性的职位的候选人，要先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这一次是宣传部门），再由主管人事安排（在共产党的术语中称做“干部”）的书记进行复审，最后由全体政治局正式通过。这种任命程序不仅有关任命重要杂志的编辑，而且涉及任命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大型工业公司领导、各州“首脑”、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大使、重要大学校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共产党控制着所有涉及监督其他部门的人员任命工作。工作越重要，所需要的批准级别越高。如果一个机构被认为有着“全联盟”的重要意义，那就意味着要由政治局亲自批准。

当新闻媒介被认为需要恢复活力时，便使用了传统的方法：干脆撤换原有的负责人。但尽管程序是传统的，人员却是全新的。亚〔62〕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显然想创立一个更独立的刊物。他比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更了解有关人员。正如已经发生的情况，新的编辑们所进行的改革，比他们的共产党领导更彻底，但当后者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不能继续按老路走下去了。

科罗季奇并不是从外地引入宣传界的唯一编辑，腐朽的苏联新闻媒介曾由宣传界原来的那些人所把持。在1986年，《莫斯科新闻》周刊、《文学报》、政府的日报《消息报》及有名的月刊《新世界》和《旗帜》也被任命了新的编辑。

尽管这些任命发生时我仍在华盛顿，但我对他们很有兴趣，因为我对大部分有关人员都很了解，一些人是亲自认识，其他人则是久闻其名。我不知道他们将会做什么，但是所有的人看来都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人，是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前他们没有得到施展能力的机会。

我在1970年曾会见过科罗季奇，当时他正随苏联作家团访问

美国。这次旅行后，他回到莫斯科，有时也应邀来吃午餐或参加宴会。我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但当我们谈论政治问题时，他很谨慎（在那个年代谁不谨慎呢?），但也很坦率。

当他后来撰写有关美国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文章和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愕，但并不像我的某些同事那样震惊。为了享受去国外旅行的优惠，他必须做点什么，而且他通常能够正确地理解事实——他言过其实，断章取义，但他并不捏造事实。在我看来，他的诗更能证明他的性格（我可能是美国政府官员中唯一读过这些诗的人）。它表现出一种敏感的和极为坦诚的个性。那对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并不是必要的，但它提供了希望，如果他认为能够蒙混过关，他就会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

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在莫斯科的外交官中享有盛名，他受命主持《文学报》。他曾与赫鲁晓夫在一起工作，关系密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对他的前途是很不利的。此外，他继续做新闻记者，并经常设法在苏联的报刊上偷偷发表一些伊索寓言式的文章。〔63〕这些文章中通常有一个含义隐晦的寓言，指出当苏联同其他国家产生麻烦时，它也要承担某种责任。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对肆意使用武力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例如，在布尔拉茨基的一个讽刺剧中，他描绘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华盛顿举行的虚构会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拒绝了美国军方提出的进攻古巴的要求，相反，他接受了他的兄弟罗伯特提出的建议，与赫鲁晓夫订立了秘密条约。熟悉情况的读者知道他指的是莫斯科和苏联军队，而不是指华盛顿和五角大楼，他变换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以便他的剧本能够通过检查。万一我们美国人太迟钝，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的意思，布尔拉茨基便会在招待会上把外交官叫到一边，把真相告诉他们。

所以，即使我们不可能知道费德罗在《文学报》将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果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某个人不想看到出现更多的“大胆”文章，那么费德罗就不会被任命去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

我还会见过《新世界》和《旗帜》杂志的新任编辑，但我更熟悉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他们本人。《新世界》杂志的谢尔盖·扎利金已经73岁，是这伙人中最年长的，他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兴趣。他将报道今后的切尔诺贝利和咸海事件吗？

格里戈里·巴克兰诺夫被派到《旗帜》杂志，他也是位著名的小说作家。他擅长写战争小说，这种题材在苏联已经写滥了，但巴克兰诺夫知道如何表现真正的人民。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那类充斥于大多数苏联战争小说中的刻板模式，而是同真实的困难做斗争的可信人物。在70年代，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它的坦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克兰诺夫可能没有讲出全部，但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生活。在他的人物身上，人们能够体验到苏联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以及共产党制度所造成的道德上的进退两难。人们可以确信，除非拴住巴克兰诺夫的手，否则《旗帜》将成为论述社会精神问题的重要论坛。

我不认识《消息报》和《莫斯科新闻》的新编辑伊万·拉普季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因而不知道该对他们期待什么。《消息报》是中央政府的日报，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注意《莫斯科新闻》。它被认为是对外国人的宣传机构（它出版英语版、法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和若干其他语种的版本），俄罗斯人不怎么读它，尽管也出不多的俄语版，但它可能是为党的〔64〕宣传部门那些只懂俄语的官员出版的，以便他们能够了解为外国人写了些什么内容。

然而，这两种报纸都曾轰动一时，当你提到“雅科夫列夫”时，他或她会问：“哪一个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还是叶戈尔？”他们俩不是亲戚，但每个人都是有关公开性的重要人物。

电影导演们赶走了那些坚持电影家协会“纪律”的共产党信徒，并以最有才能的某些同事取而代之，这些人也是改革的积极分子。有时候，外国发言人也在苏联电视上发表和官方路线不同的见解，使苏联的电视观众大吃一惊。长期被禁止的作品出版了，并在舞台上演。

以前遭禁的少量作品现在出现在新闻媒介上，苦役营的大门偶尔打开，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安德烈·萨哈罗夫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仍住在伏尔加河边的高尔基城，在流放中苦度岁月，高尔基城以前和不久以后都称做下诺夫哥罗德。12 月 15 日晚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到萨哈罗夫的住所，匆忙地重新安装了电话，他们以前为了使他与世隔绝曾把电话拆掉。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亲自打来电话，通知萨哈罗夫，他可以返回他在莫斯科的住所。

1986 年底，苏联领导人仔细考虑了从 20 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实践中所没有的想法，因为意见不一致，三次推迟了党中央委员会原定的会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苏联经济能否恢复活力？能否既谈论政治改革，又不违背该制度所赞成的一切？

全体会议最终于 1987 年 1 月底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态度使人们感到吃惊。他把国家的发展阶段称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重复人们所熟悉的勃列日涅夫的公式：“发达社会主义。”他甚至赞成地谈到“真正的选举”和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仅仅在几年前，谈论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使党的官员丢掉工作，如果一再发表这种言论，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

1 月份，当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这些仍很笼统的想法时，人们感到很惊讶，但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因为仍然存在着遵从总书记的老习惯，并避免对他的见解提出直接的怀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建议是想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公众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而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付诸实践。如果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就是全部含义，那么迁就一下总书记没有任何害处。 〔65〕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并在中央委员会 6 月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现在公众开始注意了：这是否超出了过去那种周期性的运动？党的信徒开始提出了疑问：他真的很认真吗？如果的确如此，他难道没有意识到，那种想法可能损害管理国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共产党的权威吗？

改革的开始

我们外国观察家开始注意到有关的区别。1986 年，我们曾殷切希望戈尔巴乔夫将会证明是一个不同的苏联领导人，真正关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愿意用更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谈判。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最高级会议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魅力和健谈。他对军备控制的政策似乎也转变了。

然而，他的国内政策同过去偶尔的“改革”时期的政策相比，没有表现出什么差别。赫鲁晓夫的“解冻”结束了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暴行，但接着，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解冻自身也结束了。在 60 年代，所谓“李普曼改革”，即合理化管理的建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被遗忘了。70年代，广为宣传的改善食品供应

的计划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难道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完全不同吗？直到1987年1月，回答还是坚定的，不。1985年和1986年的政策同以前失败的政策相似：试图对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进行表面的纠正。这就像试图〔66〕用拔一两颗牙的方法来驯服鲨鱼。除非改变或者摧毁这个制度，否则它会完全破坏那种改变它的零散努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的计划直接指向了制度本身。他掌权头两年的经验使他确信，他从上面所发动的变革，只有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才有保证。他现在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仅靠来自上面的命令是不够的。在我所参加的1987年和1988年的会议期间，他有时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他说（根据我的回忆），“变革来自上面。它总是靠武力来推行。现在，我不能使用武力，否则我将击败目标本身。你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人民，而只能给他们行使民主的可能性。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俄罗斯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从未被允许这样做。”

尽管这些思想是激进的和雄心勃勃的，但至少可以这样说，他的计划是很不完全的。它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其中又包含着错误的前提和令人惊讶的缺陷。

最不足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可以充当改革的工具。戈尔巴乔夫就任时，他告诉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继续加强党，强化其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13]

假设后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计划很可能被看作玩世不恭的欺诈，但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想进行改革，并相信他能够使党跟着他走。他在1987年6月仍然相信这一点，当

时他宣称："只要我们坚定地和始终如一地追求民主化，我们就会取得改革的成功。"[15]到那时为止，他仍然认为党的控制和民主化是不矛盾的。

除了依赖一个不适当的工具去推动国家的民主，他对民主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和很不完善的。他赞成真正的选举，赞成代表大会拥有真正的权力，赞成不同权力的分立，赞成保护个人权利，但与此同时，他仍然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在土地和大部分工业中的私有财产。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希望回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但他又不能确定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还忽视他所统治的广大帝国中那些从属民族的利益，他认为民族的差别已经极大地消失了，它们不再需要特殊的注意。〔67〕

最后，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满，就这一点来说，人们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尽管他的计划是笼统的和很不完善的，但它的目的在于制度自身的重大变革。当他敦促进行实际改革的时候，党组织内部的抵制无疑也在增长。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他是否将按照许诺推行政治变革计划，还是屈服于开始抵抗的制度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的活动并未完全局限于国内问题。他也开始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他达到其国内目标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束军备竞赛，并消除由此所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

〔68〕

第 四 章

扩大改革空间:减轻外部压力

确保安全日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6年①

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如果不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将一无所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91年②

“如果你们真的使用部署在德国的潘兴导弹，那么导弹打来时，我恐怕连躲进厕所都来不及，更谈不上躲进防空洞。当导弹命中目标时，我们的雷达操作人员可能还在检查设备的毛病！”

1984年冬，当我同苏联共产党国际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莫斯科会晤的时候，他这样说。对于像他那样在克里姆林宫内及其周围工作的人来说，冷战突然变成了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承认他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但我指出，当苏联在70年代部署SS—20导弹的时候，我们在伦敦、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朋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威胁。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部销毁这些武器，但莫斯科当时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在它看来，那完全是幻想。

事实上，在1983年和1984年，东西方关系非常紧张。北约决定，如果苏联人拒绝撤走SS—20导弹，那么北约将在欧洲部署〔69〕美国导弹。这一决定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竭力加以阻止。苏联力图说服西方国家议会拒绝部署美国导弹，同时其宣传机器宣称战争迫在眉睫。尽管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德国和其他西欧盟国仍坚持重新部署导弹。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召回了参加军备控制谈判的所有外交代表。但是，苏联失败的宣传战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苏联当局无意中在本国制造了战争恐怖。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甚至在掌权之前就一定清楚，如果东西方关系不缓和，苏联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不同美国改善关系，要想改善同西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甚至在当总书记之前，就运用他的影响，避免与西方的联系完全中断。当他还是第二书记时，政治局就决定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于1984年9月派葛罗米柯到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会晤。接着，戈尔巴乔夫利用1984年9月应邀访问伦敦之机，表现出他有资格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调子温和的讲话，他暗示，他将比他的前任更为灵活。一个月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政治局决定恢复同美国的核武器谈判。

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接替了契尔年科之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开始放弃以往那种僵硬的断然否决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他就任总书记时起就开始了对话，对话使双方关系间断地、逐渐地

得到了改善。

里根总统1984年一直渴望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但先是由于苏联的政策，然后是由于契尔年科糟糕的健康状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局不愿让他与里根见面）妨碍了这一年的会晤。因而当新的身体健康的苏联领导人出现之后，里根没有丧失时机。他派副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祝贺，并顺便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送去了由我起草的邀请信，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同里根举行会晤。

两周之内，戈尔巴乔夫便作了答复，原则上接受举行会晤的建〔70〕议，但确定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花了好几个月。里根建议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而戈尔巴乔夫则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快到6月末的时候，双方才最后商定，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③

这使双方都有时间进行准备。在戈尔巴乔夫方面，准备意味着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任命新的外交部长，降低好战的宣传调门，降低鹰派成员的级别，以此向美国的欧洲盟友挥动橄榄枝。和从前一样，同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仍然是艰难的，但至少他们回到了谈判桌前。

新　人　物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时候，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各国外交部长中已经是“老前辈”。他担任这一职务近30年，从斯大林的奴仆变为政治局的元老，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无可争议的设计师和执行者。尽管他很少卷入有争论的国内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染指外交政策领域，触犯了他的领地，都会使他出自本能地勃然大怒。他对共产党的国际部特别反感，禁止该部与西方

国家外交官接触，而让它处理与苏联集团中的“兄弟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葛罗米柯对那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外交界的高手，知道孰轻孰重。

正是他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内最高职务，而他的支持是很关键的，使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吉洪诺夫都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地位发起任何有效的挑战。

当葛罗米柯脸部肌肉放松时，他的下嘴唇左侧歪斜，表现出冷淡甚至是轻蔑的神情。摄影师捉住的常常就是这种表情。在许多人看来，他就是“否决先生”的化身。实际上，葛罗米柯似乎更乐于对抗，而不是解决问题。在私下里，他对来访者个人所关切的问题显得通情达理和敏感，甚至闪现出幽默，但是涉及官方问题时，他总是表现得严厉而僵硬。

即使当他决定或者受命作出让步时，在让步之前，他也是先〔71〕为他以前的立场辩护，并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攻击对手。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宣布妥协(或许朝着达成公平协议前进了1/10路程)，以表示苏联政府的宽宏大量，并证明它愿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与安宁。

他一生都在努力捍卫苏联的政策——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宣传，他的那些特点无疑是由此而塑造出来的。即使他的对手掌握了事实根据，他们也可能仅仅因为他的恐吓以及他对会议的阻挠而深受影响。重复取代了说理，“事实”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以适应论战的需要。作为外交政策专家，葛罗米柯的性格形成时期，恰好是斯大林实行最无情镇压的某个时期。的确，如果有谁一夜之间就从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战士变成纳粹—苏联条约的辩护者，那么，即使华盛顿已经掌握证据，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否认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一事，并谴责对苏联细

菌武器的质询是蓄意挑衅；当苏联空军击落载有 269 名无辜外国乘客的韩国民航客机时，他却污蔑美国是“侵略者”。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时，有两件事情他肯定很清楚。第一，无论他如何感激葛罗米柯支持他作为最高领导职位的候选人，但只要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他就别想把苏联的外交政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葛罗米柯担任此职达数十年，不仅使外交部变成了他的工具，而且该部在许多方面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塑造的。他的外交风格贯彻到所有苏联外交使团中。他不得不对斯大林卑躬屈膝，遵从任性的赫鲁晓夫，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设法使外交部具有了自主权。到了 1985 年，总书记若不听从他对外交事务的领导，就必须撤消他的职务。

第二件事情也与此有关，长期以来，葛罗米柯捍卫以对抗为基础的苏联政策，这使他很不适合推行合作政策。这并不是因为葛罗米柯必然反对这种转变：他能理解需要一个更缓和的国际环境，他很可能也乐于从事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工作。

然而，他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个人信誉受到他〔72〕过去的沉重负担的影响。如果葛罗米柯继续负责外交事务，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认真对待苏联公开宣布的任何外交政策变化。一旦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在华盛顿，我们将不知道两人会晤时葛罗米柯是否仍然担任外交部长。

我们很快就听到了消息。在宣布 11 月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的前一天，1985 年 7 月 2 日，葛罗米柯“晋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替了他，这一消息使苏联国内外感到意外。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格鲁

吉亚的共产党首脑，以前在外交关系方面并不活跃，只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偶尔到邻国作短期旅行。

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事实上，他看来是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显示出独立于莫斯科迹象的人。

例如，在整个70年代，当苏联犹太人开始移居国外时，我们当中关注移民方式的人都注意到，从苏联格鲁吉亚迁出的移民占有较大比例。这意味着，在准予移民出境方面，格鲁吉亚官员比苏联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更宽容。当移民抵达以色列后，许多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都说，谢瓦尔德纳泽是可以信赖的。他被认为支持移民自由，并鼓励格鲁吉亚官员准许那些想走的人离开。

谢瓦尔德纳泽还以善于调解而著称。当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阿布哈兹人举行游行示威、希望获得更大自主权、得到更多的文化、教育设施时，他满足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而不是简单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他所反对的一项关键要求，是阿布哈兹要求划归俄罗斯而不是格鲁吉亚管辖）。两年后，当格鲁吉亚学生在第比利斯游行反对取消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反对所有的博士论文都必须用俄语撰写的要求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服莫斯科对此持宽容态度。

我们所听到的也并不都是赞扬。70年代在格鲁吉亚也发生过逮捕不同政见者的事情，就像苏联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格鲁吉亚最著名的一位小说家的儿子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是一例。在70年代，他是一位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同几位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交了朋友。他被捕究竟是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命令，还是莫斯科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谢瓦 〔73〕

尔德纳泽主持共和国工作时，那里仍然存在着政治压迫，尽管其程度或许比苏联其他许多地区要轻一些，他本人还曾担任过该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当时这就是共和国的警察首脑。这与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履历实在不相称。

1985 年 7 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美国官员来说还是有问号的人物。

美苏两国外长如果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参加国际会议，按惯例要举行会晤。恰好在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葛罗米柯之后四星期，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赫尔辛基聚会，纪念由与会者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协议 10 周年。在筹划这次会议时，我们认为葛罗米柯将出席。结果，它真的成了谢瓦尔德纳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的机会。

舒尔茨国务卿与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第一次会晤令人难忘，我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坐在谈判桌美方一侧的大多数人（习惯上，双方外长在长桌两侧正中相向而坐，代表团其他人则在自已这一侧依次序就坐）都经历过与葛罗米柯仿佛没完没了的谈判（在日内瓦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谈不间断地进行了六个小时），看来这已逐渐成为美苏会谈的正常情况。

我们走进房间时感到愉快和惊奇。一位满头白发的人也走进房间，他兴致勃勃，面带从容而迷人的微笑，他与美国人握手，然后用带有地方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助手们说："我在这里是个新手。如果我出了大错，一定要纠正我。"接着，他轻松地笑着转入了正题。

那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但是由双方代表团所提出的议事日程第一次得到全部确认。谢瓦尔德纳泽简要阐述了苏联〔74〕的立场，如果舒尔茨不同意（往往如此），他只是简单地说："好

的，考虑一下。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们或许能够提出更好的。”然后，他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当舒尔茨提出他不能接受的建议时，他往往这样说：“在这方面我们观点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请考虑我所讲的，我们也将研究你们的想法，或许下一次我们能够更加接近。”

没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长篇的说教，没有进行任何相互指责。苏联的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但是表现的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葛罗米柯发言时总好像面对成千上万听众，陶醉于他自己的雄辩之中；而现在，谢瓦尔德纳泽在讲话时口气十分和缓，人们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不漏掉他所说的话。当会议结束时，他转向他的全体同事并问道：“好了，伙计们，我干得怎么样？你们发现我出了多少大错？”没等他们回答，他大笑着说：“别忙，等出去后你们再告诉我吧。”说着，他便同周围的人握手话别，走出房间。

“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苏联外交部长！”一个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在谢瓦尔德纳泽离开后惊讶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完全新的球赛！”我们的确就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班子中还有一位新人物，他的出现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张扬，但在向谢瓦尔德纳泽提供可行的外交政策方面，他有重要影响。谢瓦尔德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使苏联外交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雅科夫列夫生于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的农村，那里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心脏，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拄着拐杖回家，使他当农民的母亲感到很惊愕，他不相信正规教育的价值，来到雅罗斯拉

夫尔城完成了教师学业。在那些年中，他的职业从教师转到新闻工作者，从共产党的机关工作转向短期的研究生学习。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1958年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研究生的众多外国留学生中，有三个人引起学校、报界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更大的注意。这〔75〕三个人就是根据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达成的美苏交流协定，第一批到美国来学习的苏联研究生。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这些人非正式的头。联邦调查局对他很注意，这使他感到，联邦调查局把他当成了克格勃官员，但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人来自克格勃，但那不是我。"④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戴维·特鲁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雅科夫列夫感兴趣的领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有一次他对我说，特鲁曼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让他自由从事他所希望的研究，并向他提供精明的建议，告诉他哪些书和文章值得注意，哪些可以忽略。遗憾的是，雅科夫列夫对他在美国的学习所做的公开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他所感到满意的方面，而是集中在令人不愉快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上。

后来，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居住了10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事。⑤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⑥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

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

对他来说，旅居加拿大是命中注定的。1983年，当主管农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加拿大作广泛旅行时，雅科夫列夫就在加拿大。几年前，他们就相识，当时雅科夫列夫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曾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若干农业管理改革计划进行过辩护，而此时他们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大使这样的外交官来说，他必须一直陪同高层来访者。

据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他被戈尔巴乔夫“坦率而清晰的见解”所打动。[7]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调回莫斯科，在享有盛名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所长，该研究所的俄语缩写 ИМЭМО 通常为人们所熟悉。〔76〕

1984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少数随员之一，陪同当时还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这是他第一次从事高层外交。如果正是由于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才赢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其上司的赞扬（“他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那么他便不虚此行。

尽管他长期居住在北美，人们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官员对雅科夫列夫的了解仍比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了解更多。而根据他们在1985年对他的了解，不能对他抱什么指望：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充分信任，是派往西方敌对环境中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在加拿大任外交官的10年期间，并没有公开表现出向传统苏联政策挑战的倾向。他所发表的言论是恶毒反对西方的。

1984年，即在雅科夫列夫久居渥太华之后，并即将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之前，他在刚出版的一本书中用如下措辞描绘

美国的外交政策：

> 美国垄断财阀们相信，他们对世界的控制是解决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们认为，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催化剂。他们认为支配世界的新机会已经出现，出于这一丧心病狂的思想，武器制造商和高级官员们结成了死亡同盟。他们准备把几十亿人民埋葬在城市的废墟中，仅仅是为了使世界跪倒在他们的脚下。

实质上，战后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表现，就像带有核武器魔爪的好斗公鸡，力图与共产主义和苏联作战，以此证明他们的“可靠”、“强健”和“胆量”。⑧

因此，虽然我们没有立即预料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做的贡献，即他改变了作为苏联外交和国内政策基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当他进入共产党书记处并一度进入政治局后，他力图限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力、保护人权，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此外，他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都成为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基本成员，他们承认需要改变苏联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

〔77〕

美 国 因 素

然而，在1985年和1986年，潜在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继续这

样生活下去了”。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

美国并不是他所面对的唯一外交政策问题。的确，某些不恭敬的苏联问题观察家曾在私下戏言，苏联应该得到特别的同情，因为它是世界上被“敌对共产党国家所包围”的唯一国家。然而，要想缓和引起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如果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张，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如果两国仍处于对峙状态，就很难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里根政府一直警惕着突发事件。美国国防预算的迅速增加（从卡特政府时已经开始），其部分原因是特意向苏联领导人显示，美国不允许因自己退出竞赛，而让苏联占有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1984年初开始，美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缩小我们的差距。我同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及其助手马克·帕尔默一起工作，我主要负责起草里根总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稿及他给苏联领导人的信函。

从1983年起，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苏联的谈判策略。总统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成功。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怀疑苏联领导人的谈判诚意，但是里根却很乐观。尽管他厌恶苏联的制度，但是他相信，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再加上他个人的谈判技巧，该制度就可以改变。舒尔茨国务卿确信谈判是有意义的，渴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难以驾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很不积极，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加以反对。[6]

1983年6月，我搬到毗邻白宫的豪华的老行政大楼的办公

室，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看来十分紧张，几乎达到直接冲突的程度。阿富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苏联军队的攻势实际上正在逐步升级。在非洲之角、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柬埔寨，苏联政府支持的反叛运动或极权政权正在进行局部战争。在中东，苏联的仆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不仅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被怀疑支持恐怖组织。在70年代，每年从苏联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五万多人，现在其数量急剧减少。在苏联，很少有人被允许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旅行，可以出国的大多数是负有官方使命的政府官员。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押在劳动营、精神病院或在国内流放，新闻媒介受到严密控制。干扰使许多城市地区听不清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和美国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代表看来举步维艰。保罗·尼采和尤里·克维特辛斯基试图独自弥合我们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的分歧，但被两国政府所否决。苏联人还威胁说，如果欧洲部署美国导弹以抗衡SS—20导弹的话，就退出所有军备控制谈判。

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双方的公开言论日趋激烈。仅仅在我到白宫工作前几周，里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讲中还称苏联是“当前世界罪恶的根源”。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直诽谤里根是战争贩子。[10]他们现在指责他并不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想以此迷惑公众。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摩擦，而且公众感到两国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和极度危险之中，但我仍以乐观的情绪开始工作。如同我所料到的，基本趋势正明白无误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和巨额军事开支，苏联经济日趋僵化，效率低下，步履蹒跚。苏联在国外负担沉重，它所支持的反叛活动在

战斗中遭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打击。苏联公众对阿富汗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忧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有形式下维持多久。

在我看来，美苏关系的低谷可能已经过去。它在今后几年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既然美苏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那么，如果美国确定了合理的目标并准备进行机敏的谈判，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稳步改善关系的时期。

确定议事日程

直到1983年夏天，白宫官员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催促，但仍很少考虑与苏联谈判方案的大致轮廓。然而，在那年春天，里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利用他通过增强防务所积累起来的谈判筹码，他同意让舒尔茨在国会作证时概要说明一项前瞻性政策。在冗长的介绍中，舒尔茨称我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1]为基础。“现实主义”是指我们应客观地根据苏联的现实来看待它。“实力”是指我们应拥有必要的经济能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通过谈判达成合理的解决办法。“对话”是指我们应保持沟通，不中断联系，就像在以前的危机期间某几届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舒尔茨的证词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想与苏联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他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姿态，而不是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出前后连贯的对苏政策。美国政府有个装着各种各样个别政策的百宝囊，其中大部分

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像关于裁军、人权、贸易制裁、不接受分〔80〕裂欧洲、苏联在其境外的军事干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等等。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即使相互关系没有通过政策体现出来，它也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参议院拒不批准吉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甚至早在1974年，国会就因苏联不允许自由移民而通过了限制对苏贸易法案。然而，美国的各种政策只是混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时，美国的政策就变得过分乐观，有时还非常欣快；而一旦遇到挫折，我们就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拒绝与之来往。当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坚实、可靠的政策时，我们的政策却忽冷忽热、大起大落、断断续续。

当我们试图在某些领域改善关系时，我们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因而难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扩大对苏贸易，却因苏联当局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其他践踏人权事件，而未能成功。卡特政府决定优先考虑军备控制问题，并反对苏联在第三国的军事冒险，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也未能成功。

当然，避免爆发战争是个紧迫的问题，但我怀疑仅靠控制军备是否能达此目的。美国人民把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如果苏联正在侵略另一个国家，美国人民就会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并本能地认为这种侵略行径比军备水平对和平的威胁更大，此外，让犯有侵略罪行的政府去执行它参与制定的协议，会冒极大的风险。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在试图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它将铸成大错。与苏联关系或者全面改善，或者根本不改善，苏联领导人有必要认清这一点。

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苏关系。如果苏联仍保持原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去应付相互敌对的状态，而不是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共产党决不会放松控制，但我认为，美国制定一个鼓励苏联内部变革的策略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不能预言苏联领导人将开始进行内部〔81〕变革，但许多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制定一项政策，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帮助他们渡过某些难关，为何不尝试一下呢？即使苏联现任领导人对此没有反应，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将来的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加以响应。

虽然我认为苏联制度需要改革，但我认识到不宜公开宣扬这一目标。苏联领导人出于骄傲和其他原因，将拒绝响应我们要求他们改变制度，以便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呼吁。这将堵塞谈判道路。我们必须另辟间接途径。

苏联领导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他们开放国家、放松控制，这就使美苏两国有可能进行间接的接触。我相信，开放边境、信息自由流动和建立民主制度等，会使苏联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但任何着手改革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该制度能够适应更为开放的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我们不应据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仍然拒绝揭开铁幕及保障一定的人权。这种改革一旦开始进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将发展出自我激励机制，难以逆转。因此，即使这不是其统治者的意愿，苏联终将发生变化。

必须制定一种政策，能够鼓励苏联的开放和民主化。我们需要明确，在支持苏联起变化的同时，必须确保我们的利益和安全。

如果最初苏联领导人不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不能丧失信心，而必须准备等待。

1983 年 9 月 1 日，当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民航客机时，我们仍在讨论谈判策略。该飞机被击落，使 269 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 1 名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许多美国人。苏联政府最初否认它与飞机失事一事有关，接着又声称美国应对此负责，因为它利用该客机作为“间谍飞机”。

飞机被击落一事虽然是很大的灾难，但如果苏联政府承认所〔82〕发生的事情，对此加以道歉，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很可能并不会造成美苏关系的的严重破裂。以前，例如近在 1977 年，也发生过击落偏离航线的民航客机事件，但是伤亡人员要少得多。事后，苏联政府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因此，它应该受到严厉谴责。[13]

然而，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使之发展成为严重的外交对抗。里根总统重写了他的撰稿人和我起草的讲话稿，并在国家电视上称这次事件为“大屠杀”。几天后，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谈，我们本来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有实际效力的谈判框架，但它变成了一场叫喊比赛，当舒尔茨要求此次会议仅限于讨论飞机被击落事件时，葛罗米柯异常愤怒，暴跳如雷。

此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如果以前人们还幻想”有可能与里根政府打交道，那么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破灭。几周后，当第一批潘兴导弹部署在西德以抗衡苏联的 SS—20 导弹时，苏联政府实践了其威胁，撤回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削减中程导弹和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美苏关系退回到苏联入

侵阿富汗之后的状态。

苏联对击落韩国民航客机这一错误的反应，表明苏联的政策已陷入困境。苏联官员撒谎，掩盖公认的事实，并反过来指责对方，当这些都未奏效，他们就进行恫吓和威胁。其结果，恰恰给里根政府提供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抨击他们的有力武器。

里根本来已决定对谈判采取主动，但当苏联领导人对空难事件拒不承担责任时，他感觉受到挫折。他和舒尔茨及其他每个政府成员一样，确实感到很愤怒。然而，美国的反应并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有计划地向苏联表达两点重要信息：第一，苏联政府对其错误的反应令人无法接受，它最终将有害于苏联自身；第二，美国仍有兴趣就两国的分歧举行谈判。正当苏联人威胁从日内瓦撤走其军备控制谈判的代表时，我们把美国的谈判代表派回到谈判桌旁。

里根提出的方案

〔83〕

尽管我们愿意保持交往渠道畅通，但美苏关系仍冻结了好几个月。1983年秋天，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而苏联的政策看来仍处于发泄愤怒状态。但是，有头脑的苏联官员认识到，他们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孤立和敌对态度，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3年10月，我在莫斯科认识的《真理报》政治评论员谢尔盖·维什涅夫斯基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要求和我见面。《真理报》常驻美国记者生病，维什涅夫斯基临时替换他。他说，他没有兴趣为《真理报》进行采访，而是想同我讨论当前局势。我猜想他

是想让我向美国政府转达一个非正式信息——过去每逢两国关系紧张时，苏联都使用这种方法。

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在老行政大楼对面的饭店共进午餐。他谈了很多问题。他说苏联领导人的年龄老化，思想僵化，他对苏联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他知道苏联领导人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进行改革，但苦于不知怎么做。他们愚蠢而莽撞地制定了一项政策，最终因处理中程核武器谈判和击落韩国客机事件而走入死胡同。他们现在认识到，里根总统不仅将使增加的国防预算得到批准，他还很有可能在1984年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他预言，苏联领导人将不得不中断谈判，以实践他们以前发出的威胁，随后是几个月的僵持局面，并伴随着刺耳的宣传。但他劝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1984年无事可干。到那一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将试图逐步恢复谈判。

维什涅夫斯基所谈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主动到华盛顿来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他个人的观点，这很可能是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个人想让我们得知的信息。实际上，我已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84〕 随着冬天的临近，我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制定谈判的议事日程了。由于苏联的好战情绪和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我们不期望他们马上作出反应，但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谈判制定一个框架。我们还需要向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重申，我们准备进行严肃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由于继续进行阿富汗战争、中止军备控制谈判、错误地处理击落韩国客机事件以及继续践踏人权等，苏联在世界舆论中的声誉每况愈下。然而，西方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担心，由于里根政府不愿意妥协，美国正在冒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有必要使美国公众和苏联领导人了解，我们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

进行谈判。

我建议总统发表演讲，阐述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我们都把罗伯特·麦克法兰称做“巴德”，他刚刚接替威廉·克拉克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他同意我的想法，并让我准备一个发言稿。因此，把从春天起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的思想整理出来，形成一份完整材料的机会到了。

我向国务院的里克·伯特和马克·帕尔默征求意见。我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均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初步提纲，他们再加以充实。白天我抽不出时间，就谢绝了宴会邀请连夜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我感到极为疲劳，同时已完成了演讲稿的80%，其中包括所有实质性建议。我把它送到国务院形势分析室，让信使在当天就将它送交国务院的帕尔默，请他审查并完成该演讲稿，然后我驱车回家，在预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前我可以睡三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

该演讲稿体现了舒尔茨国务卿所阐述的“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三原则。它还提出了一个谈判框架，主要有三个方面：(1)减少并最终停止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2)削减“大量储存的武器装备”；(3)通过尊重人权、遵守协议、扩大交往、自由交换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第三点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把人权作为单独一项议程，由此该方案变成了“四点议程”。

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问题作如此归纳，也不认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即一个问题的进展将推动其他问题的进展。尽管问题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作决定时也不必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很清楚，不解决某个问题，就会妨碍其他问题的解决；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取得全面进展，或者没有任何进展。除 〔85〕

非僵化到自我毁灭，否则，武器控制与武器使用，国外行动与“国内”问题，[13]例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等，[14]都是彼此联系的。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里根进行了谴责，说他把世界上所有罪恶都算在苏联头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里根在其演讲中说，我们并未指责苏联为地区性冲突创造条件，而是谴责它企图利用这些冲突，武装其中某一派，或者进行军事干预。里根引用了约翰·肯尼迪1962年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在紧张关系之后愿意改善美苏关系的信号。当时，肯尼迪提出了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从而缓和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紧张局势。

我并不指望苏联领导人还能记得肯尼迪的讲话，但我知道他们会收到对里根演讲所作的分析，他们的美国问题专家会指出谈话的用意。此外，里根援引了一位民主党人士的话，提醒国内的听众他正在寻求两党一致的政策。

里根还需要表明，美苏对话中逐渐升级的相互抨击不应妨碍建设性的谈判。因此，我为他作了如下解释：

> 我坦率地说明我对苏联制度和苏联政策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不隐瞒对我们的看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彼此交往……实际上，在这个核武器时代，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坐下来进行更紧迫的谈判。

我们本来希望里根在圣诞节之前发表演讲——演讲稿已经过多次校订和讨论，到12月中旬已经准备好，但白宫负责日程安排的人几次推迟演讲时间，而没有对此作明确解释。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南希·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占星家应对这些拖延负责。直

到 1984 年 1 月 16 日，该演讲才最终进行。[15]

推迟演讲一事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该演讲意味着提出一项长期政策，我们并不指望莫斯科马上作出反应。总统的顾问们最初很想让里根在 1983 年 12 月发表演讲，以便尽量不使新闻媒介把它看作竞选文件。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在 1983 年，而是在大选年的 1984 年发表演讲，很可能被认为具有政治动机。〔86〕

许多美国时事评论家实际上把它看作竞选演说，但我觉得，即使在 1983 年 12 月发表演讲，他们也会那样认为。在那段时间，南希·里根强烈敦促她丈夫同苏联进行谈判，希望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和平总统”。谁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她的占星家也许是正确的。最终，在这次演讲中简要提出的政策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

为日内瓦谈判作准备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前的一年间，但从 1984 年 1 月 16 日起，直到苏联解体，我们公开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里根政府内，对于某些特殊政策，特别是关于裁减军备及抑制苏联在第三国军事活动的政策，存在着许多争论。而在有关人权和需要敦促苏联人进一步开放社会方面，则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但是，许多人不相信苏联人会对这些压力作出反应，还有某些人不理解它们与诸如裁减军备及苏联的侵略行径有什么关系。

在 1984 年，苏联始终拒绝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能够打破僵局的其他议题。恢复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卡

特政府中止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协定似乎是最好的赌注，于是我们敦促签订一项新的协定，以便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交流，人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旅行。6月，在对美苏交流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一次会议上，里根发表演讲，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该会议是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和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起的。[16]当时美苏关系似乎正处于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里根的结束语却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87〕

> 想到可能有一天，各种职业的美国人和苏联公民能够自由来往，访问彼此的家庭，拜访朋友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各种问题，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彻夜探讨人生的意义及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梦想。
>
> ……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我认为你们也不会把它看作梦想。

当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在日内瓦会晤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更明确地提议苏联和美国不再卷入局部战争。我们已经就裁减军备、增加接触、保护人权提出了具体建议，但我们一直没有对如何减少两国在第三国的军事竞争提出明确的设想。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表明，如果苏联停止对第三世界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我们也将停止这种军事支持。

公众看来仍然关注着军备控制谈判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各种热战。在一些人看来，里根关于空间战略防御盾牌的建议——美国政府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而批评者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是鲁莽之举，而且妨碍了军备控制协议的签订。[17]可以理解，某些人对苏联支持第三世界的叛乱感到很惊恐，他们一

般仅仅考虑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法，例如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或安哥拉的若纳斯·萨文比提供武器。尽管很多人确信苏联的军事冒险难以成功，但却嘲笑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应创造条件，使苏联人能够不丢脸地从军事卷入中撤出。

尽管我们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军备控制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它只是若干同样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许多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把它看作核心问题。除了性问题和间谍活动之外，没有什么能像武器系统那样为人们所强烈关注。在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争论围绕着我们的谈判代表应该怎样对待这种或那种武器系统的问题。每个专家都有他自己所偏爱的系统，认为任何限制该特定系统的企图都等于纵容投降。这些人一方面拒绝限制我们的系统，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88〕说服苏联人消除他们的全部优势。即使苏联日趋衰弱，也决不要指望它会同意这种显然是对单方面有利的安排。

苏联领导人认为控制军备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们一再坚持应首先达成军备控制协议，才能提出其他重要问题。他们这一主张的用意很明显：他们希望缓和军备竞赛，以减轻对经济的压力，而无须被迫进行根本的改革。

由于这些态度，在1984年和1985年，美苏双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即使苏联人1985年回到谈判桌旁时也是如此。如果我把军备控制看作美苏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我就会对此丧失信心。但我并没有感到绝望。我认为，储备大量武器尽管很危险，而且代价高昂，但它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反映，而不是造成美苏两国相互敌视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敌意，武器储备就会减少，而不管是否有协议。反之，即使签订了裁减军备协议，也不会起多少作用。实际上，除非设法减少猜疑和敌意，

否则，军备控制协议只能引起新的争端，譬如相互指责对方要花招，违反协议等。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让军备控制问题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过分突出。当然，武器问题要谈，而且要认真地淡，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其他重要问题也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中。正像里根总统在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所指出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

9月初，我给巴德·麦克法兰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应准备在日内瓦就结束在第三国的冲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往，讨论具体的办法。我还指出，重要的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应私下与苏联代表讨论新的设想。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怀疑我们最初公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宣传。在公开讨论这些新的设想之前，如果给他充分时间考虑这些设想及〔89〕有关的评论，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谢瓦尔德纳泽计划那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检验一下这种方法。

我知道，如果让这些设想经过正常的公文经办程序在各个机构间旅行，那么，到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时也准备不好，官僚们一定会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向新闻界泄露此事，那就不可能在公开讨论它们之前向戈尔巴乔夫加以介绍。因此，我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四五个专家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把打算做的事情通知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们表示不反对这样做。温伯格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对军备控制问题注意力的建议，凯西虽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接受这些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加以尝试。

几天内，我们的小型工作组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它特别针对在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非洲之角及柬埔寨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了解决地区性冲突的设想，建议分三个阶段逐步停止苏美的军事卷入，并促使冲突各方的和解：

(1) 美苏两国敦促地区性冲突的各方开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

(2) 一俟谈判开始举行，美苏两国代表将决定怎样阻止武器从国外流入冲突各方。

(3) 在已实现和平的地区，美国和苏联将合作帮助经济重建工作。

美国第一次向苏联提供了一种途径，使苏联在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地区性冲突中脱身。美国没有谴责苏联制造冲突，并表明解决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地区性冲突的有关各方。它还承诺如果苏联撤出，并且支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美国将结束对这些战争的军事卷入。它还表示，如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美国支持苏联以和平方式参与该地区的建设工作（直到此时，美国的政策通常是反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任何活动）。该方案呼吁先由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试图尽量缩小对美苏两国的怀疑，以免让人以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相互勾结，把其解决方案强加给他人。其目的在于消除美苏军事竞赛，这种竞赛正在使冲突加剧。 [90]

旨在揭开铁幕的这些建议，包含着具体的设想，即增加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交流，允许接触对方的新闻媒介，逐渐增加文化、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往。

9月26日和27日，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华盛顿，里根总统和

舒尔茨国务卿向他介绍了这些设想，舒尔茨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通信和后来的会谈中，又清楚地说明了更多的细节。仅仅在这个时候，里根才把它公之于众。在1985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了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建议，[18]赴日内瓦前，他在面向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演说，谈到了他的建议中有关扩大交往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19]

当我们为日内瓦会议拟订议程时——希望也是为美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拟订议程——美国新闻媒介却更为关注美国政府对苏联行动的批评，以及被泄露出来的有关军备控制政策方面争论的报告，而对实际上正在谈判的议事日程却不怎么注意。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冷战结束感到很突然，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调整苏联的政策，但是速度很慢，而且没有像里根那样清楚地说明广泛的目标。在1985年春天和夏天，他与里根每隔几周就交换一次信件，语气都很诚恳。但双方在信中谈到关键问题时都极为坦率。仲夏时节，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暂停核试验，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宣传手法，因为他在通过官方途径通报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向公众加以宣布。这就是苏联不想达成协议时的典型做法。

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苏联的安全政策时，开始使用某些新名词。他在10月初去法国旅行期间（普遍认为这是为11月与里根会谈作准备）指出，“合理的充分”是决定苏联军队规模的适当基础，他否认意识形态分歧是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关因素。这些说法很迷惑人，但其含义太模糊，我们很难确切地理解其真正意思。〔91〕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可以就削减中程弹道导弹达成协议，

而不要求就战略武器和空间防御问题同时达成协议，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国早就感到，如果苏联坚持要么全面谈判、要么不谈判的政策，这些复杂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苏联的主张已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逐步找到共同语言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有理由对日内瓦首脑会谈感到满意。虽然他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都已认识到，除了和平，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合乎情理，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和平，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这似乎是不证自明、毫无疑义的常识。但从两国关系史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负担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直到会议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任何主张和平的声明中，都应表示赞成“和平共处”。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谁会反对“和平地共同相处”呢？实际上，这个名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陷阱，在苏联的字典中，“和平共处”的定义是“国际范围内非战争手段的阶级斗争”。换言之，和平共处意味着冷战，而不是和平。它意味着西方应被动地接受东方所发动的冷战，而不可能以同样手段予以回击。

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官员通常为“和平共处”补充这样的短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换言之，“和平共处”不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利有责任干预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的阿富汗那样。

〔92〕　在70年代初最高级会谈的鼎盛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同意把这种词写进联合文件中，而不顾像我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扔给勃列日涅夫这种蠢货的廉价骨头，如果我们对他足够好，也许这样能说服他不要给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设置障碍。不幸的是，这种词对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义，我们接受该名词一事（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相信，他们能够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的冲突，而不会受到损害。

里根比尼克松更为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决心避免使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含义的词汇。苏联宣传机器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却渴望在历史上留下支持和平的记载。但他想在坦率的非意识形态的讲话中表达他的想法，他已在若干次演讲中谈道："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我不知道苏联在日内瓦能否接受这个简单的公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准备发表任何联合声明。然而，虽然苏联代表最初坚持常用的"和平共处"一词，但在同戈尔巴乔夫磋商后，他们完全接受了里根在其坦率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这是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由于苏联可以使用常规力量进攻西欧，因此，我们美国的谈判代表坚持，任何联合声明都应宣布放弃常规战争。过去，苏联代表总是坚持两国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西欧遭到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这将阻止美国用核武器保卫西欧。令人高兴而惊讶的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放弃了以前的立场，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有必要防止"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

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29]这样，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后，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终于为双方所接受。

一般来说，我不耐烦对宣言或联合声明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常常很琐碎，只有专家能够理解，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值得为此进行谈判的努力。但是这一次，联合声明中的用语很重要，不仅表现在它所阐述的内容上（该声明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实际政策），而且表现在它进行阐述的方式上。戈尔巴乔夫已表明他准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而无须求助于不真诚的公式。 [93]

日内瓦首脑会谈还就事先磋商过的问题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大为扩展的交流计划，其中许多设想是由里根所提出的。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拒绝延长以前的交流协议。尽管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但我们认为这些交流很重要，它们能够对苏联产生长远影响。拒绝支持人民之间的接触只会加强铁幕，而我们本应该打开它，而不是加强它。我认为，使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最好办法，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具体的帮助。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弄清两种行动的区别：一种是真正承担压力的行动，一种是从长远来看导致自我毁灭的行动。

通向雷克雅未克的崎岖道路

尽管日内瓦会议后戈尔巴乔夫的调子有所转变，但1986年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仍不是平静的一年。里根建议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当我们试图安排华盛顿会议的时间表时，他又开始推

谈，要求保证在会议上签署实质性的军备控制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里根并不反对签署协议，但他不想冒被人指责的危险，说他只是为了开会而让步。因此，他拒绝作出事先的保证，或通过谈判作出为他的顾问所反对的让步。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怀疑里根是以谈判本身为目的，以此哄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盟友，而并不打算达成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开始逐渐改变苏联的谈判立场。

1986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广为宣传的建议，即到 2000 年分阶段销毁所有核武器，里根对此印象颇佳。与他的多数顾问意见不同，里根认为核武器可以而且应当销毁，而现在，一〔94〕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有关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然而，许多细节他不能接受，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的方式（他在发出建议信的同时，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是在作宣传，而不想达成协议。

在同一封信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几个月前在巴黎所作的暗示，表示他不再像葛罗米柯那样，硬把三种核武器的谈判紧紧捆在一起：他宣布，苏联不再要求首先就所有三种核武器达成协议，然后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现在，尽管仍在就战略和防御武器进行谈判，也可以先签订有关中程导弹和现场视察的协议。

2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第二个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他把阿富汗战争称做“流脓的疮伤”。他不再夸耀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仅仅是为了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此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被看作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历了更为艰苦的两年时间后，戈尔巴乔夫才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建议，三年后，苏联军队才真正撤出阿富汗，但在 1986 年已经看到了终止苏联军事卷入的曙光。

谢瓦尔德纳泽也忙于转变苏联的外交方式。1986 年 4 月，他重新任命了一批苏联高级外交官，5 月 23 日，他召开了有苏联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解释了"新思维"。人们期待苏联外交官今后能够抛弃以前那种大声喊叫和唱反调的策略，而代之以说服的艺术。

西方外交官对"新思维"很感兴趣，并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大多数人希望看到某种更具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言辞。但当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许多持强硬路线的老外交官正调到莫斯科闲散的咨询机构，而擅长外语、富有社交能力的更年轻的外交官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提升。谢瓦尔德纳泽已开始根据他自己的而不是葛罗米柯的面貌来塑造苏联的外交机构。

这些变化并未迅速弥合美国和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矛盾，1986 年的整个夏天，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就下一次首脑会议的日期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拒绝赴华盛顿参加首脑会议，除非他能够签署军备控制协议，但日内瓦的谈判进展不大。

初秋，戈尔巴乔夫在一封密信中建议，尽快在第三国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它并不是取代下一次正式的美苏首脑会议（戈尔巴乔夫同意应在华盛顿举行该会议），而是短期的工作会议，研究将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95〕

戈尔巴乔夫表示，他十分希望在两国之间的中立地点与里根会晤，他提出冰岛的雷克雅未克，该地距双方都是四五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他忽略了其前任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冰岛并不是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而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旅程将超过一半。

里根虽然想在华盛顿举行正式规格的首脑会议——他特别渴

望向戈尔巴乔夫展示美国的情况——但他还是同意举行一次更为有限的会议，1986年10月11日和12日，他们两人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与公众的印象不同，这次会议并非仓促而草率，两位领导人都对各自的主张作了精心的准备，尽管准备得很迅速，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外交联系使彼此都能相当准确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军备控制是关键问题，而对里根来说，军备控制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只是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由于冰岛会议安排为工作会议，而不是正式的首脑会议，因而没有大事渲染，没有任何社交约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进行了整整两天，只是在与各自代表团用餐时才中断一下，而两个谈判小组——一个讨论裁减军备问题，另一个讨论地区问题和双边问题——则通宵工作。

10月11日，在美国大使小巧舒适的住所共进工作早餐时，我们与总统一起回顾了关键性问题，然后举行了一次模拟会议。我扮演戈尔巴乔夫讲俄语，由译员进行翻译。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前的类似练习中，我曾准确地猜到戈尔巴乔夫的论点；这一次我不打算预测他可能提出什么特别建议，而是模仿他在讨论和争论问题时的方式。

随后，我和国务院的托马斯·西蒙斯轮流担任秘密会议的记录员，我是地区和双边问题的谈判小组成员，并参加美国小组中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内容广泛的军备控制〔96〕协议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有积极因素，但它在某些方面含混不清，令人难以接受。由保罗·尼采和谢尔盖·阿赫罗

梅耶夫元帅主持的谈判小组通宵工作，以澄清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由罗扎尼·李奇韦大使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主持的另一个小组正在处理地区冲突、人权和双边交流等问题。

到星期天早晨，苏联的态度已很明确。他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很小。[21]在当天晚些时候里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望对武器裁减条约取得共识。从一开始，谈判就很顺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所提建议，即苏联削减50%的重型陆基导弹，保留少量中程导弹，进行广泛的现场视察。到中午，有关中程导弹的协议看来即将达成，于是我们急电美国驻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大使，请他们找到各国政府首脑，授权他们就谈判条款向各国政府作简要介绍。鉴于此时已是星期天下午，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首都很难办到。

下午的会议不时中断，常常要同谈判小组磋商，起草文件。两国代表团都很兴奋，因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武器裁减条约。看起来，只有两个原则问题尚待解决。第一，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到2000年销毁所有核武器，而里根只同意销毁所有弹道导弹。第二，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一切有关战略防御武器的研究都应限于在实验室内进行，里根则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实验室以外的试验对于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使其助手们感到沮丧的是，里根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建议，但在有关战略防御计划试验的问题上他毫不让步。结果，两国领导人的会议不欢而散。到晚上，中午那种欢快情绪变成了怨恨不满。两国没有就华盛顿会议——雷克雅未克会议旨在为其做准备——作出时间安排，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新闻媒介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一个失败了。

在会议刚刚结束的几小时内，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里根和戈〔97〕尔巴乔夫已经解决了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其广度超过了已往历届美苏首脑会谈。我们的失望情绪影响了最初的新闻发布会，[22]并使我们实际获得的成果没有得到清楚的介绍。实际上，所签订的协议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为会议规定的目标，只是没有确定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国拥有同等的少量中程导弹，并提出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限额。他还同意从苏联的武器库中削减50%的重型洲际导弹，从而满足了美国的目标。在苏联几十年的抵制后，他同意了进行现场视察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来雷克雅未克时的权限是，只要协议能够阻止美国突然部署战略防御系统，就可以接受美国的立场。根据两国现阶段的研究程度，实验室工作的重要性超过了空间试验，因此，美国本来就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而不会削弱该计划。但是里根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反应就好像让他把他所珍爱的孩子扔进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雷克雅未克会议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为以后的条约扫清了道路，尽管当时并未达成任何最后协议。第二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它比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更好，因为它规定销毁所有中程导弹，而不再允许双方各保留100枚。里根同意到2000年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标，这给英国和法国出了难题，这两个国家仍决定保持独立核力量，而且他们也并未被告之里根即将作出这种让步。美国的政策在作出如此重要的改变之前，未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充分的磋商，这是不妥当的。

美国在未对议程中的其他问题作更大变动的情况下，同意了主要的裁减军备方案，很可能也会使戈尔巴乔夫推迟接受全部议

程。戈尔巴乔夫来到雷克雅未克时仍然相信，只要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就可以修补美苏关系。仅仅是在雷克雅未克会议结束后，他才认识到，只有他同意讨论议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揭开铁幕问题等，苏美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过去时，人们有可能作出这些判断，但在当时，他们〔98〕对此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几个月来，苦涩与背叛的感觉笼罩着美苏关系。两国领导人在接近达成协议时无功而返，他们都指责对方应为谈判失败负责。戈尔巴乔夫尽管作出了较大让步，但仍为空手而归感到窘迫烦恼，他只好对政治局同僚们严厉斥责里根。军事史学家及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23]在苏联解体后查阅了苏联档案，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讲话极为刻薄，并带有侮辱性，他不知道以后戈尔巴乔夫怎样再面对里根。[24]幸运的是，正像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他同里根“注定要进行合作”。

间谍、外交官和人质

尽管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处理的并不是间谍问题，但正当会谈进行之际，两国却陷入了有关间谍问题的争吵。

这场争吵开始于8月，当时，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籍雇员根纳季·扎哈罗夫，指控他违反了美国的间谍活动法。与大使馆中正式委派的外交官不同，联合国秘书处雇员的非公务活动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如果他们犯法，将要受到起诉。

尽管扎哈罗夫被捕一事有确凿证据，但克格勃决心营救他。但

它面临一个难题：在苏联，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从事间谍活动可以被合法逮捕。因此，他们决定拿一名无辜的美国人开刀，以捏造的罪名指控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遂成为牺牲品。

这一卑鄙行为，把一般的执法问题变成两国间严重的政治对抗。苏联当局企图以逮捕美国人的手段，迫使美国释放他们的某个间谍，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曾在同样情况下，逮捕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巴洪，但是当肯尼迪提出抗议后，赫鲁晓夫改变了态度，并下令释放他。

但随后，当没有什么名气的美国人被捕时，尼克松及卡特政府都错误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各自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每当没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人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在美国被捕时，在苏联的美国公民也面临着被无辜逮捕的危险。

〔99〕 里根总统决定，他不仅要使达尼洛夫获释，而且要终止这种蛮横的行为。为此，他必须确保使达尼洛夫立即获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要使克格勃为其自身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

里根直接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达尼洛夫无辜被指控，坚决要求释放他。戈尔巴乔夫拖延了三个多星期还未作答复，里根下令把在联合国工作的 25 名苏联官员驱逐出境，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都是苏联间谍。[25]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致信苏联政府，措辞强硬：如果继续关押达尼洛夫，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复行动。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国对苏联在美国的更大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允许美国大使馆遭到报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很庞大，而美国在苏联却没有类似规模的机构，即使有，驱逐无辜的美国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指控苏联间谍在美国从事间

谍活动是有充分证据的。

因此，我们通知苏联代表，如果发生任何企图报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行动，我们将坚持苏联驻美外交机构应与美国驻苏外交机构的规模相等。这意味着苏联实际将减少驻美人员。

不到两个星期，达尼洛夫就被允许离开苏联，事前，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通过谈判为此作出了安排。扎哈罗夫也在作了无罪申诉后获释离开美国，但他的获释有个条件，即著名的政治犯尤里·奥尔洛夫应释放出狱，并允许他与妻子一同赴美。[28]到 9 月底，这个事件看来已经结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雷克雅未克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人就做了我们明确警告他们不要做的事情：他们下令把五名美国外交官驱逐出境，这是对不久前我们把纽约的苏联人驱逐出境的报复。两天后，我们根据以前的警告，通知苏联撤回它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另外 55 名“外交官”（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看来是间谍），并规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不得超过 225 名，苏联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人员不得超过 26 名。

规定这种最高限额是基于以下设想：苏联当局将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撤走苏联雇员。最高限额要求苏联实质性减少驻美人员，同时，如果苏联雇员被撤走，它也允许我们派出足够的美国人接替苏联雇员的工作。果然，克格勃的行为一如往常，它确实在一夜之间，就从驻苏美国外交机构中撤走了苏联雇员，并驱逐了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100〕

结果，美国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外交官经历了一个极为严酷的冬天，但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到第二年底，当美国人被派到莫斯科从事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比有苏联雇员的时候进行得更顺利。

虽然我们的措施给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造成了暂时的痛苦，但其结果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苏联驻美外交机构中的大部分苏联职业间谍被清除了，最高限额的规定使得苏联人不可能以其他间谍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美国驻苏外交机构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减少了，因为忠诚的美国人取代了苏联雇员的工作。[22]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向克格勃表明，如果他们捏造罪名，陷害无辜的美国人，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

但这些与戈尔巴乔夫以及与苏联解体有什么关系呢？

乍一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现在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准备支持克格勃这一集团的狭隘利益，即使它危及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这一事件中，最终克格勃的损失最为惨重，但这是因为克格勃自己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认为里根政府的反应将与其前任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相同。肯尼迪对巴洪被逮捕一事提出了抗议后赫鲁晓夫曾试图制服克格勃，而戈尔巴乔夫则企图粗暴地对待里根，尽管里根以个人名义向他郑重担保达尼洛夫不是美国间谍，戈尔巴乔夫仍把他当作人质关押。

〔101〕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不适于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鉴于戈尔巴乔夫在正常情况下很擅长同外国政治家建立私人关系，我认为他在许多方面被克格勃所支配，他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假情报，或者担心与之发生争论（克格勃的支持对他担任苏联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他感到不得不保护哪怕是错

误的政策。总之——他的态度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在涉及克格勃利益的事件中，他并不是独立行事。

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生涯中离不开克格勃，而且他还是克格勃前任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门徒。但是，他轻易接受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并盲目相信克格勃首脑对他的忠诚，这使他注定要扮演使苏联解体、个人政治前途被断送的角色。

对话走向公开

正当公众和许多官员因雷克雅未克断断续续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及戏剧性的逮捕和驱逐事件而感到迷惑时，其他一些事件正在发生，它们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苏联的政治犯开始获释。同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加，苏联的新闻媒介也向外国发言人打开了一条门缝。

按照传统的做法，只有当指望外国人支持苏联立场或者在不适于争论实质性问题的正式场合时，才允许外国人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苏联公众从本国的新闻媒介上，从未清楚地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政策。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上的每条新闻，都要经过有倾向性的筛选；记者和编辑不仅要经过审查，而且要由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直接的“指导”，指示他们哪些问题可以报道，怎样进行报道。

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前几星期，苏联当局同意发表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小组采访里根总统的长篇报道。它发表在苏联的报刊上，内容很准确，尽管它附有一篇“评论”，试图驳斥里根的某

些说法。自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1961年为《消息报》采访了约翰·肯尼迪后，苏联的新闻媒介再没有采访过任何美国总统。

〔102〕 直到1986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仍然很少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当赫斯特报系富于进取心的外文编辑约翰·沃利奇邀请我参加与苏联官员的公开辩论时，我感到很有兴趣。

沃利奇的邀请代表了纽约北部的肖陶扩协会和其他可能的主办者，包括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肖陶扩协会每年夏天在具有田园风光的地方举办一系列定期的会议、演讲和对话，1985年夏天，它举办了为期一周以美苏关系为主题的活动，并邀请了许多苏联官员参加。现在，由苏联的"友好"委员会发出的邀请是对上次活动的回报，会议期间，美国发言人将应邀与苏联发言人进行辩论。苏联的主办者保证，届时将有五六千听众，并由包括电视在内的苏联新闻媒介对会议现场作全面报道。作为白宫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我应邀作主要发言，并担任美国官方代表团的领导。

苏联举办这次会议含有某种企图。苏联人希望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旅游城市尤尔马拉举行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不承认苏联吞并拉脱维亚。美国高级官员参加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会议，会不会向人们暗示美国承认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我看不会。毕竟，我曾多次参加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召开的讨论美苏关系的会议，但没有人认为那些国家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即美国或苏联的一部分。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国务院的马克·帕尔默曾就此与重要的美籍拉脱维亚人的组织进行了磋商，说服它的领导人支持这一计划，条件是美国代表团内应包括若干拉脱维亚裔美国人。

我们向苏联东道主说明了这个条件，他们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我们都很清楚，这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苏联官方特别是克格勃的批准。[29]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想检验一下他们能否控制向西方有限开放的进程。他们显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

即便如此，该建议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公开性的机会，公开性已成为苏联的正式政策。如果苏联新闻媒介忽视这次会议，而且所有与会者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共产党活动分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苏联的政策没有起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得到即使是有限的机会接触苏联的公民和苏联的新闻媒介，那么我们就会〔103〕明白，一个最终能够摆脱苏联政权控制的进程已经开始。

会议差一点就未能举行。我们刚要按照预定时间启程赴尤尔马拉，达尼洛夫被逮捕。他的妻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上直接向美国代表团呼吁，要求它在她丈夫被关押期间抵制这次会议。我很难搞清楚这次会议（苏联召开这次会议所冒的风险并非无足轻重）对戈尔巴乔夫在达尼洛夫问题上的决定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的受难漠不关心，而实际上，为了使他能够获释，我们当时正日夜工作。我们决定在达尼洛夫被关押在苏联监狱期间停止会议的准备工作。在达尼洛夫获释并交给美国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后不过几小时，我们便乘包机离开华盛顿，人民之间交流的试验又恢复了。

苏联东道主遵守了诺言，有几千人聚集在会场聆听演讲，并向讲演人提问。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地方的新闻媒介对演讲作了充分的报道，并由莫斯科的“中央”新闻媒介摘要发表。大约300名美国人，包括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被颁发了参加会议

的护照。

美国主办者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们将使苏联听众听到苏联新闻媒介一般不予发表的那种坦率的批评。美国认为没有必要派出那种回避有争议问题的发言人，这种人的礼貌放错了地方。许多人，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查尔斯·罗布，以及本·沃坦伯格、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马克·帕尔默等，都是公认的严厉批评苏联政策的人。[28]

虽然我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个发言草稿，但在我们的包机离开杜勒斯机场之前，我没有机会修改定稿。我特别关注发言开始的那几个段落——已经由美国之音译成了拉脱维亚语——因为我已没有机会对演讲进行练习了。

我们代表团中两位会讲拉脱维亚语的团员为我救了急：一位是外交官英特斯·西拉斯，他曾在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一位是奥贾斯·卡尔宁斯，拉脱维亚裔美国人协会的代表，他们和我在飞机上挤在一起，帮助我练习不熟练的发音。

〔104〕 采访会议的《新闻周刊》记者报道说，我在演讲开始的部分使用的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然后又转而使用“流利的俄语”。他对我的拉脱维亚语形容得很正确，但即使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也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我把演讲的实质性内容放在俄语的部分。在我抗议达尼洛夫被拘禁一事后，我直截了当地谈到那些危害和平的活动，特别是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兼并。我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这种非法占领，它将继续坚持只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的人民有权决定究竟是独立，还是成为更大联盟的一部分。

晚饭以后，苏联官员对美国客人说，我所谈到的美国不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一事，冒犯了我们的听众。他们争辩说，拉

脱维亚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活得这么好，他们不会背弃改善了他们生活的联盟。

但我却得到不同的印象。当我从尤尔马拉回到我在里加下榻的饭店时，前台的年轻姑娘动人地微笑着迎接我，并且问："他们说你开始演讲时用的是拉脱维亚语，这是真的吗？"当我向她保证这的确是真的时，她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以前还没有哪个外国人这样做。感谢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一些饭店雇员把我围在中间。我的演讲还没有在电视上播放，虽然它将在当晚播放，但他们已知道了我的演讲内容。"美国真的不认为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吗？"有人问。当我予以肯定时，他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另一个人也说："那么，美国人的确了解我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

六年以后，当参加过尤尔马拉会议的老朋友又在肖陶扩重聚时，拉脱维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戴尼斯·伊万斯也来了。该阵线领导了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1986 年，苏联当局认为伊万斯太不可靠，因而不让他参加尤尔马拉会议，但他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会场外面，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会见来访的美国人。

"肖陶扩协会在尤尔马拉推动了我们事业的起步，"他说，"在此之前，似乎什么希望都没有。但会议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立的。"

预言家回家

〔105〕

释放政治犯的举动使美苏关系中某些有争论的问题开始减

少。1986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告诉他可以返回莫斯科。在雷克雅未克的严重挫折及达尼洛夫被逮捕之后，这件事有助于使我们受到伤害的感情得到修补。

早在 1968 年，萨哈罗夫就撰文要求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警告苏联领导人，如果不采取措施建立民主制度，苏联的经济将迅速地滑到西方的后面。萨哈罗夫受到了外国新闻媒介的注意（他的主张通过无线电广播逐渐传回苏联）。勃列日涅夫对此很恼怒，他下令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这是一个封闭的城市，禁止外国人前去访问。

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度过了七年，在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家。回到莫斯科后，他仍被苏联官员看作贱民。只是在 1987 年夏天，苏联出版界为了检验公开性的限度，才偶尔引用他的话。

我们认为，萨哈罗夫被流放是违法行为，而更恶劣的是，他的妻子，勇敢的叶琳娜·波纳受到了克格勃的非人道待遇，她唯一的罪名就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他的丈夫，并斥责那些折磨她丈夫的人。我们一再敦促释放他，指出这种流放违反了苏联领导人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时所赞成的原则，我个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营救他，我认为，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获释一事，对苏联的改革来说是个好兆头。1987 年春天，我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在我抵达莫斯科后，我坚持尽快拜访他。

萨哈罗夫身材瘦长，动作笨拙，显然不是一个很强健的人，但他的大脑仍然聪明灵活。他说话缓慢，不时停顿一下，以选择最准确的措辞，表达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他在论证他所支持的事业时总是显示出他掌握着充分的事实。

1987年我们第一次会面期间，他表现得异常乐观。他对他所

受到的对待并没有表现出牢骚满腹，心怀怨恨，而是关注着其他 [106] 方面的问题。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松对苏联当局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使个人有权选择他们居住的地方，能够自由旅行，并且通过立法确认这些原则，以便使政策不致因官员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改变。

他也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钦佩，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研究和了解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他感到，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正确的手段改变社会，尽管他还没有公开说出他的计划。因此，他建议我们应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使他做正确的事情，而只要他前进的方向正确，就要对他给予支持。

戈尔巴乔夫的确从未直接承认他赞成萨哈罗夫的观点，但他对萨哈罗夫以个人名义所作的呼吁，大多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会他有关民族冲突的劝告，而这一问题正引起萨哈罗夫越来越多的注意。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接受萨哈罗夫为一个民主的苏联构筑框架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如果更重视萨哈罗夫的呼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控制克格勃，以选举产生的官员取代党的统治，他的个人命运显然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赞同使苏联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他认识到，若不这样做，就不能使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

1987年1月，苏联不再干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和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干扰。

1987年3月，当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莫斯科时，她的观点——严厉批评苏联违反人权和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在苏联

的新闻媒介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4月，我刚刚到达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就接受了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

舒尔茨在阿富汗问题上直言不讳(赖特没有提到阿富汗问题，他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当苏联采访者告诉舒尔茨，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的邀请前去时，舒尔茨回答说：“不，他们不希望你们留在那里。他们希望你们撤走。”

〔107〕在春夏之交，莫斯科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偶尔介绍西欧和美国的客人，例如西德议会中科尔总理所在党派的领导人沃尔克·鲁赫及其他著名的西德政治家。苏联公众现在不必设法应付那些干扰便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到西方的观点了。一个已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有极其重要的理由关注苏联的政策。

到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迫使不太情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有限的政治改革。雷克雅未克会谈和“间谍年”已经过去。莫斯科希望在秋天和冬天进行政治改革，华盛顿则希望召开首脑会议，达成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但戈尔巴乔夫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目标仍然不明确。虽然1986年12月在阿拉木图发生了民族暴动，但是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不安定的少数民族问题仍然不以为意。

实际上，首都莫斯科仍在对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不休。许多共产党官员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改革，而同时却抵制进行具体的变革尝试。由于在改革方向和改革速度等问题上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不久就分裂了。

第五章

〔108〕

致命的分歧

外国电台宣传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纯属无稽之谈，徒添聒噪而已。他们想离间我们，在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在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以及在其他人之间制造对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7年10月21日①

我们没有宗派之争，没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但有些人特别希望我们这样。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88年7月1日②

我与雅科夫列夫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应追溯到1987年秋。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91年③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对政治改革总体规划的支持。这项总体规划旨在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许多细节不

为外人所详，但“民主化”这个新口号似乎已不再只是说说而已。一些新思想，诸如通过选择候选人以及无记名投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诸如提高政治透明度等，若真能开花结果那就意味着变化。

这年7月份，我到华盛顿进行就任大使以来的第一次述职，其间我汇报说戈尔巴乔夫一直都面临着强大的抵制力量，不过他似乎每次都能渡过难关。依我当时的观察，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动摇，但我预测他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我仍认为他会在政策上取得胜利，并将着手为改革构筑立法框架，一步一步地清除资深官僚中[109]的最顽固分子。但改革能否带来经济发展，其前景并不明朗。大众是没有耐心的，我当时预测在未来的三五年内仍将困难不断。

从“右”到“左”

叶戈尔·利加乔夫，这位戈尔巴乔夫政府中的共产党二号人物，很快就被拥护激进改革的苏联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革的死敌，一些评论家指责他为新斯大林主义分子。

然而，这并不正确。利加乔夫绝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尤其不希望回到红色恐怖时代。他的家庭深受大清洗之苦。他的岳父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手下的一名将军，1937年被克格勃的前任头子草率处死。而且，他本人由于与一位“专政对象”的女儿结婚，年轻时一直为此背着黑锅。

利加乔夫不可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甚至还是一位改革家。他希望能给经济带来更高的效率，铲除党内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形成的顽疾——腐败现象，希望能有个更加有力的宣传机器来鼓动他认可的这些改革。

然而，利加乔夫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他赞成采取措施，使党更加讲究效率，更加实事求是。但对任何会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降低党的威信的举措持反对的态度。他坚持认为宣传媒介应在党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活动，"家丑"不可外扬。

他也许是1987年苏联政治局内唯一一位仍然坚信国家的内外政策应立于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基础之上的委员。

他为人坚决果敢，常在党的非公开会议上慷慨陈词，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磨擦自1987年以来与日俱增，但戈尔巴乔夫对他所争辩的观点还是予以认真考虑的。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这些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加乔夫不常与外国人接触。然而，他在1987年春担任当时仅充橡皮图章的苏联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接见了由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我当时刚赴莫斯科出任〔110〕大使不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

会见是在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一座建筑物内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这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会议大厅布置得像一间教室，每把椅子前面配有一张桌子。很显然，这样安排是为了记笔记的方便。

利加乔夫向客人们阐述了实施改革的目标。然而，在这方面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矢口否认在党的高层领导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强调改革是客观必要的，不依赖于具

体某个人。他一再认为党内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官员应予以撤职。

很明显，在利加乔夫看来，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他所提倡的那些诸如企业“自筹资金”、提高工厂管理的自主性、增加机器制造业的投资等具体改革措施听起来同以前流产的一些计划没什么不同。

他谈到了提高透明度以及民主化的必要性，但他又认为这种民主早就在苏联扎下了根。十月革命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它们是苏联民主的基础，那种认为苏联民主才刚刚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单就民族问题而言，利加乔夫认为10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这本身就说明了苏联的体制是“有史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最完美的”体制。虽然他承认时而也出现一些问题，譬如去年12月的阿拉木图骚乱，但认为这并不是由于错误的民族政策所致，而是由于社会的一些恶瘤——腐败现象、裙带风以及“投机倒把”——所引发的。

他认为可以通过党的更加严格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说三年来饮酒量减少了一半多，而且，工作缺勤现象也少了一半。另外，死亡统计数字表明，1986年的死亡人数少于1985年的35.4万人。④

利加乔夫在阐明他的观点时说，他所认定的改革应由一个廉洁而又强大的共产党来领导，可在官方意识形态不做重大变更的情况下予以实施。实质上，利加乔夫的改革观点属于“安德罗波夫计划”，即不进行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他〔111〕当时对外界也许否认这一点，但他事实上却反对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提出的政治改革步骤。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该年戈尔巴乔夫采纳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而扩大。

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阵线中的最活跃人士当属时任莫斯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他满腔热情地拥护政治改革，结交广泛，完全没有党的高级官员那种典型的令人敬而远之的高傲态度。他偶尔出门还乘坐地铁，时常微服私访，逛商店、下车间，还不时参加工人们的劳动，与他们一起装卸货物。

当时商店经理常私匿商品而不在货架上出售，此事一旦被叶利钦发现，他（或她）就大难临头了，可能当场予以免职。当时在苏联由于商店物品的定价比黑市低，国营商店工作人员私存物品以便到黑市上去牟取高价之利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有关叶利钦的评论很快风行莫斯科大街小巷。在市民们眼中，这位莫斯科市党组织的新领导看起来不像他的前任，他是"我们大家的一员"——真诚而又随和，和我们一样挤乘公共交通工具，参加我们的体力劳动，对日常不良现象了如指掌，并下定决心消灭它们。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叶利钦很快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他向人们切实证明了改革不是走过场。

但是，传播媒介却很少报道叶利钦的事迹。除非是正式场合的需要，媒介几乎对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比起以前，传媒在1986年与1987年这两年里已经变得更加活跃，为什么叶利钦颇具新闻价值的行为却被媒介所忽视呢？

当然，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发问。如果真的有人向一般市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了解他。"

"他们"不说也清楚。"他们"就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党的决策人物。"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不过，内部的人会更加直截了当地挑明，禁止媒介报道叶利钦的“古怪”行为的人来自上面，来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本人。

〔112〕叶利钦就任莫斯科党主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就告诉同事说，他已经接到戈尔巴乔夫的指令，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

不久，监督传媒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就被委以此任，致力于淡化对叶利钦的报道。莫斯科党组织自己的报纸《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是叶利钦的同盟军，他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总有人打电话给他，谴责他对叶利钦报道太多。[5]压力越来越大，1987 年 8 月波尔托拉宁的《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叶利钦的一份长篇报告，但没署名叶利钦，这是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党组织里做的一个报告。

1986 年和 1987 年时，苏联市民有充分理由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传媒报道。传播媒介抵制报道事实上也帮助树立了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形象，因为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耳相传，造就了他英雄般超常的品德。如果官方媒介一直对他进行吹捧的话，民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了。

我与叶利钦的第一次接触是在 1987 年 8 月，当时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特里·桑福德和保尔·萨班斯来访莫斯科市。此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都去度假了，叶利钦没去，他作为高级官员接待了我们。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在各种话题上打破常规的言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他谈话不用提醒，不用看笔记，他向客人列举了九条即需纠正的“消极现象”。其中政治方面占了一大半：言论自由的控制、

民主的缺乏、党群关系的脱离、政治领导层中集体习惯（也即团体合作精神）的丧失以及外交政策的僵硬。其余的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不良现象，如新技术应用缓慢，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缺少激励机制，容忍平庸，等等。

尽管国内问题是叶利钦关注的主要对象，他的言谈同时也表明他对正在进行的美苏军控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也相当熟悉。他迫切希望通过谈判促成协议的签订。他说："这样的协议对于改革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我突发奇想，若换了利加乔夫，他决不会像叶利钦那样谈论党群关系的脱离；换了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谈论集体合作精神的丧失。尽管叶利钦的谈话都是以一党专政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前提，都是以他称之为回归"真正列宁主义"的主旨为前提，但他着重强调了被其他人所忽视的或者——至少在公开场合和在外国人面前——所否认的一些因素。〔113〕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虽然也会毫无疑问地认为与美国达成军控协议对改革是必要的，但他不会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他的立场是，美苏两国都需要裁军，都会从中受益，即便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苏联也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实施改革。

同盟产生裂痕

1987年9月下旬，包括我们在内的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都接到一份请柬，邀请大使们去市党委的政教大楼与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会面。政教大楼靠近莫斯科市百老汇商业路内环，自从它对外开放以来，已逐渐解除了对外国外交官员的限制，至少对

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有机会到苏共的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去参观并再次同叶利钦交谈，对我来说这机会不可抗拒，我欣然前往。

虽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向驻地使馆的负责人员阐述莫斯科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但叶利钦却谈到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他指出目前"改革处于非常时期"，正处在从建议到具体实施的过渡阶段。社会压力很大，人民迫不及待地要享受成果。如果经理们、政治领袖们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他认为，应该予以免职。他还描述了他对莫斯科党组织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

在会后走廊的闲谈中，我发现一些外交同行们感到叶利钦用词夸大，如"非常时期"等，他们认为情况并未危急到用这种语言的地步。

〔114〕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似乎确实不那么简单。毕竟，戈尔巴乔夫当时一直告诉民众说改革已经走上正轨，最困难的时期已过，改革正在开始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对叶利钦而言，危机依然存在，因为当时改革只是刚开始由决策阶段向实施阶段过渡。我当时认为叶利钦的分析更能说明问题。

会厅里除叶利钦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就在20几天之前他给当时还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据后来他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在信中严辞斥责了利加乔夫的总体工作作风，特别是对莫斯科党组织事务的干预。他同时还未指名地提到在政治局里还有其他一些委员反对真正的改革，他预感所有这一切会导向酷似他们曾一度想竭力解决的勃列日涅夫"停滞"状态。他最后请求解除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担当的职责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务。⑧

两人不久就此展开了争论。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声称叶利钦

已经同意等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之后再与他商讨这个问题。但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却予以否认，并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是告诉他等“以后”再同他商谈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等就是1个月。10月下旬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时叶利钦主意已定，决定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就直接将这一问题带到中央委员会上去。就在戈尔巴乔夫准备结束这次全体会议时，叶利钦向与会代表重申了他对党的书记处的指责，指责它仍未按照最近做出的决定改变其工作作风，人们也因此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他再次请求免去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所有职责。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这次干预极端愤慨，他故意曲解叶利钦的批评，谴责叶利钦有狼子野心，号召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在这位领袖的授意之下，代表们纷纷起来斥责叶利钦。27人中只有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一人言词比较温和。[8]

〔115〕尽管叶利钦一再重申他支持改革，否认他自己想分裂中央委员会，尽管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当的时机谈论这个问题的行为而抱歉，但戈尔巴乔夫仍然施加压力对他进行批判，还一再歪曲他的发言。

例如，叶利钦说“一些政治局成员”对戈尔巴乔夫与改革的赞扬是虚情假意的，戈尔巴乔夫就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对整个政治局培育“个人崇拜”(斯大林主义的代称)的指责是政治上的无知。而实际上，叶利钦并没有指责整个政治局，他只是说有某些政治局成员阳奉阴违，当面赞美戈尔巴乔夫，而背后却试图破坏他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他对叶利钦滔滔不绝的责难，不让叶利钦有申辩的机会。当有人高呼叶利钦只考虑一己之利时，戈尔巴乔

夫接过这个话题说：

> 我也有同感。而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都了解你。对你来说，只有莫斯科围着你转还远远不够。你是不是想中央委员会也以你为中心？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
> 把个人的野心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凌驾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之上，这是一种多么极端的自我主义！

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宣布叶利钦对会议的干预为“政治性错误”，并责令政治局以及莫斯科市党的委员会针对全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对叶利钦的辞职行为采取行动。

这场冲突没有报道，怕破坏了十月革命的庆祝气氛。

第二天，当国务卿舒尔茨来会见戈尔巴乔夫讨论其访美计划时，戈尔巴乔夫情绪非常低落，会谈也没有达成任何峰会协议。精于看人的舒尔茨断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对我说戈尔巴乔夫总是向他提醒，说有一个打不败的拳手，他傲慢、自恃。但当时的情形不同。那时戈尔巴乔夫似乎知道该如何出击。

〔116〕 后来还是谢瓦尔德纳泽到华盛顿才解决了戈尔巴乔夫与舒尔茨会谈时未完结的问题，他们很快重新确定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事宜。与此同时，关于中央委员会内讧的谣言开始蔓延。几天之内外国报纸就登出了事情的主要内幕，接着又通过外国电台反馈到苏联。

莫斯科人惊讶万分：难道叶利钦真要被撤销职务？果真如此，这对戈尔巴乔夫所从事的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发现叶利钦虽依然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出席正式的庆典活动，但与他们已不像

往常那样小声交谈。

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为外国使团安排的招待会上，我竭力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大厅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同他们的客人各聚一处，那时想同苏联领导人随便聊聊是不太可能的。叶利钦没有与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完全站在一起，脸上浮现的笑容也不很自然，他不时倒换双脚，改变站姿，活像一个挨了老师批评的学生。当他看见我时，热情地朝我挥着手，脸上的微笑犹如孩童般天真烂漫。不过，他没有试图走过来与我攀谈几句。我完全理解。如果真像谣言所说的那样，他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私下里与美国大使好好谈谈。

两天后，风传叶利钦患了重病——有人说他犯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所提倡的公开性还未开明到足以让媒介对此做些报道的程度。11 月 13 日，《真理报》正式证实叶利钦已被莫斯科党委除名。会议记录公开发表，以便让市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指责以及叶利钦本人的几乎语无伦次且不打自招的应答。

叶利钦后来说他当时是被戈尔巴乔夫从病床上召去参加会议的。他的医生一开始不让他出院，但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之下才不得已把叶利钦运送到会场，并给他灌了一肚子止痛片。在这种状态下，叶利钦几乎意识不到他正在说些什么。[8]

据叶利钦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当时曾直接告诉他不会再允许〔117〕他重新活跃于政坛。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完全抛弃叶利钦。尽管未曾出现抗议游行，但多数民众，尤其是莫斯科的民众，认同的是叶利钦进行的改革。叶利钦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报界收到了雪片般的抗议信。这些信件虽没公布于众，但都及时送交戈尔巴乔夫过目。如果叶利钦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烈士，那么戈尔巴乔夫就很难说服民众相信他正在从事的正是他所承诺的那个改革。

因此，他为叶利钦安排了一个体面的但却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

当宣布叶利钦的新的任命时，我们正在一位名叫祖拉布·采列捷利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室里与他共进晚餐。电视上说将播出一项声明，我们大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那迫切的心情就如同美国人丢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来观看第七届世界棒球巡回赛最后一站的比赛。

当听到播音员宣读官方声明说鲍里斯·叶利钦被任命为部长级职务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时，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表情复杂，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叶利钦毕竟没被完全忽视，这多少令人欣慰；但这职位形同虚设，又多少令人失望。沉默片刻，一个客人苦笑着说，"还是个部长，我看这只能更糟。"

是的，情形更加不妙。但当时萦绕在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许多苏联人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叶利钦被人免除了高级领导职务。如果说领导人想致力于他们所声称的政治改革，叶利钦所做的又有何过错？

有关10月全会上的冲突的官方文件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公开〔118〕发表，[10]是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会议摘要。局外人很难凭此断定它的可信度。众所周知，克格勃为了证明某一特定观点很会制造"证据"。

然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如此大发雷霆仅仅是因为叶利钦偏激的讲话。毕竟，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只不过在于实施改革的速度以及苏共书记处直接管理州市的权限等问题。尽管叶利钦加快改革步伐的迫切要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理智，并在与同僚打交道时或许缺乏技巧，但他已经成了改革的卓而不群的象征，已经成了向公众保证当时所发起的改革不再只

是一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运动”的主要担保人。在失宠的叶利钦眼里，戈尔巴乔夫破坏了他自己倡导的改革计划。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为了给他们摘掉叶利钦的动机涂脂抹粉，散布谣言说叶利钦破坏了与戈尔巴乔夫早先达成的一项协议，他曾同意等到11月7日庆典过后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他的处境问题。他们还说叶利钦严重诋毁戈尔巴乔夫，以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免除他的职务，以表明掌权的究竟是谁。有些人断定戈尔巴乔夫此番举措加强而非消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此间流传的叶利钦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概要，其中有一段言论是批评赖莎·戈尔巴乔娃干预莫斯科党内事务的。若果真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暴怒则是可以理解的。他有理由认为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批评他的妻子是完全不合适的。

然而，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文件中却没有包含这段有关赖莎的言论，并且，有好几位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向我保证说，叶利钦的讲话里确实没有此番言论。事实似乎是叶利钦的讲话既不针对戈尔巴乔夫，也不针对他的妻子。这份出版物丝毫也没有解释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猛烈抨击叶利钦，之所以如此恶意曲解叶利钦的观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尽管中央委员会里的保守派——在委员会中占大多数——不喜欢叶利钦，但如果戈尔巴乔夫真心想挽救叶利钦的话，也易如反掌。戈尔巴乔夫可以这样说：“叶利钦同志所谈及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考虑。尽管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尤其是他的有关人身攻击的言论，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应落实到行动中去，在这方面我与他深有同感。我认为不经过进一步的商

讨我们还不能接受叶利钦的辞呈，我建议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对此做出决定。”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采用了这样的措辞，中央委员会无疑会默认的。叶利钦也许仍然是个麻烦，但已经可以控制他了，而且叶利钦的存在也是对冥顽不化的保守派的有力掣肘。

〔119〕 1987年10月的这场风波是戈尔巴乔夫从政期间犯下的第一桩大错。嫉妒使他头昏眼迷。他把具有领袖魅力的助手看成是潜在的对手，而不是难得的合作伙伴。这种嫉妒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而且使他在挑选助手时只选择那些无力与他相抗衡的弱者。然而，这些弱者最终还是背叛了他。

“右派”的迎头反击

搞掉了叶利钦（部分也是出于叶利钦本人的意愿），那些志在阻止政治改革的保守派们认为夺取优势的时机已经成熟。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计划出访，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雅科夫列夫访问蒙古。利加乔夫临时负责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当时书记处仍负责监督新闻界的工作。突然有一天，《苏维埃俄罗斯报》这份因与党内保守派关系密切而臭名昭著的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恶毒诅咒改革者。[1]

这篇文章形式上是一封“信”，出自列宁格勒一位名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女教师之手，它占了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通篇充斥着责骂与影射，具有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最黑暗时期的文风。她运用当年斯大林意识形态上的心腹安德烈·日丹诺夫（也是列宁格勒人氏）的文笔遗风，把批评过去的行为斥之为变节，谴责对

诸如多党体制和宗教自由之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辩论，顽固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这是维系国家政策的唯一可靠基础。她维护斯大林的功绩，称那些聚集在反斯大林口号之下的人们是被十月革命镇压了的阶级的后裔。日丹诺夫在1948年这个血雨腥风的意识形态大镇压的年代里演说时所使用的反犹太主义的精典语句，她直接借用来为她的这封“信”添枝加叶。[12]

据报道，这封来“信”原本更长，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由《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工作人员提炼重写。[13]有谣言说利加乔夫授意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不仅是因为他当时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而且他与该报的总编关系非同一般。文章见报后，他还在一次编辑招待会上对此大加赞扬。

然而，利加乔夫断然否认他与此事有染，尽管在这篇文章发〔120〕表之后，他承认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14]如要求严格控制对苏联历史阴暗面报道的观点他深表赞同。他一直强调对“揭示家丑”的出版物如《星火》和《莫斯科新闻》的控制要更加严格，这些出版物以暴露斯大林的过错为专长，公开刊登一些自然灾害的情况，公开呼吁人们注意党的不合理的特权。

此“信”甫一发表，好几个州市的党组织便要求对该信进行“研究”，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更是乐此不疲。

这些反应完全是通常的配合性行动，而且，许多人将其看作是要求对党宣誓效忠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他们愿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夏季大会之前表达保守的观点，是会受到保护的。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改革家们都认定这篇文章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公开反扑，目的是要葬送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事业。1992年，戈尔巴乔夫在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回忆说，在1988年和1989年他无法使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快，“他们处处与我

作对。1987年我竭力说服他们，他们才对我的部分改革措施正式表示支持。可我一转身，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拿尼娜·安德烈耶娃来袭击我”。[15]

不管谁在背后唆使，反正这场尼娜·安德烈耶娃闹剧无异于引火烧身。戈尔巴乔夫从南斯拉夫一回来，就要求政治局连续两天就这篇文章展开讨论。戈尔巴乔夫199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这两天会议的纪要表明，当时戈尔巴乔夫以“这篇文章应被看成是反对改革的讲坛”这样的评语开始了讨论会．他说他怀疑没有人指点，尼娜·安德烈耶娃是写不出这篇东西的。[16]他说，令他担忧的不是这篇东西的出现，而是它曾被党的官员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文章而加以推荐。

从这份纪要来看，当时只有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果敢地谴责了尼娜的这篇文章。葛罗米柯甚至试图为它辩解，说这是对媒介中出现的“种种诬蔑”的回应。不过，所有发言的人都赞成政治局首先必须步调一致，同心同德；为了党的团结，要在党报上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来驳斥尼娜的这封“信”。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利加乔夫要么未出席会议，要么未发言。

〔121〕 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实际上是雅科夫列夫写的），执行了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文中对安德烈耶娃信中的观点一一驳斥。几天后，《苏维埃俄罗斯报》被迫在头版为发表该文表示道歉。

戈尔巴乔夫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但观察家们却不敢保证他是否能够控制即将召开的苏共大会。1941年斯大林曾召开过一次这样的大会，之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斯大林死后，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尽管依照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只要需要就可随时召开

这样的大会,但当时还不清楚这样的大会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打算举行苏共大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加权威性的决议，以支持他的改革观点，因为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还不够权威；其二是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他 1987 年 1 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召开一次苏共大会，但这个建议直到 6 月全会时才得以通过。这表明即便是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有人从中作梗。

一旦改革进入政治领域，中央委员会里的争论就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戈尔巴乔夫很少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愿以偿。要使改革实现它的民主化目标，戈尔巴乔夫要么有一个惟命是从的中央委员会，要么想办法绕开党的所有机构。第十九次苏共大会首先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当规定只有党代会才有权为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成员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战斗。大会上他只能作些有限的变动，使候选人晋升为正式成员，至于从外面引进新成员则是不可能的。

不过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德烈耶娃事件之后，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悄悄地取代了利加乔夫的职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这样，才可能在他的督导下完成实质性的提议工作。1988 年 5 月这些提议出台后，成了大会讨论的“议题”。

当这些议题公开发表时，我正在赫尔辛基准备就即将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向里根总统做情况简述。这时我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大会议题的俄文文本，并返回旅馆去翻阅，相信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带出去，不受什么限制。我当时以为这里面〔122〕不会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东西，大致浏览一下，就足够简述时引用了。其内容很可能是罗列一些早已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及

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讨论过的改革方案而已。

可等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有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

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

第二天上午，我在总统下榻的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向总统一行就莫斯科当前政治局势进行了汇报，这是我的工作。会谈房间的隔音效果由安全专家进行了专门处理，以防我们的谈话被偷听。我先简报了苏共大会将要讨论的“议题”。之后，我对总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苏联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些“议题”离我们的民主标准还欠缺一些，但却蕴育着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种子。如果言论、新闻、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如果多党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得以进行，如果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合法的确立，那么我敢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将会很快寿终正寝。

当然，制定这样的目标不等于马上就能实现——也许根本实现不了，但在官方文件中声明这些目标其本身就是向民主程序的建立迈了重要的一步。共产党官僚机构或许会抵制真正的变革，但拥有投票权的明达的公众有可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进变革。

有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还想走得更远，他曾为政治多元化以及修改宪法允许建立多党制施加过压力，但政治局否决了他的要求。据当时以观察家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尔卡

基·沃尔斯基介绍，[17]会上只有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赞同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直到两年多以后共产党才同意结束一党专政。

不管怎样，即便是在政治局通过的压缩文本中，这些"议题"也清晰地表明戈尔巴乔夫肯定接受了我们的四部分议程的内容。争取为人权提供保护的斗争，争取使国家更加民主开放的斗争已经成了改革的明确组成部分。〔123〕

在红场上亲吻小孩

罗纳德·里根1988年莫斯科之行是尼克松1974年会见勃列日涅夫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出访苏联。里根的出访给苏联公众留下了远比尼克松出访更为深刻的印象。毕竟，就在五年前这位总统还宣称苏联为魔鬼帝国，而现在他却来到了这里，并带来了两国关系业已走上正轨且应继续下去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需要里根的支持和访问，以向人们证明他的外交政策富有成效。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会给他召开苏共大会带来强劲势头。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次大会能够通过比他从自己的助手那儿所能得到的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

就在里根总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中导条约"，从而使双方能够举行批准书的交换仪式。这消息令人鼓舞，表明美苏关系正朝着一个建设性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表明裁减军备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苏联安全。瓦季姆·扎格拉金也不用再为来不及逃命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担忧了。

当然，里根的支持也为他自己攫取了好处：可以更加坚定地

促使人权与民主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中优先考虑的课题。甚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里根就在斯帕索宫接见了一群受排挤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其后的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建立民主机制，有必要保护个人权利。

在作家俱乐部里，里根与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共进午餐，他专门提到了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他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版。当我们离开俱乐部时，《新世界》的主编谢尔盖·扎尼金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告诉总统，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版《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个耻辱。我们会很快付梓印刷的。我将负责办好这件事。"他说到做到，那年年底之前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就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上。

〔124〕在莫斯科大学，里根对自由大加颂扬，他的演讲使大学生如醉如狂。他对他们说，进步的钥匙"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交流自由"。为表明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同俄国的传统不相矛盾，里根还引用了俄国哲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名言："开拓现代化时代的人们，他们是创业者，面对未知世界，他们有胆有识，敢于冒险，充满自信。"这位俄国哲人与伏尔泰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同处一个年代，莫斯科大学也因他而闻名。就像1984年夏在华盛顿呼吁扩大美苏文化交流时一样，[13]里根总统在结束他的演讲时，再一次描述了他所梦萦魂牵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旅行的障碍，在这里没有思想交流的障碍。他的年轻的听众为之欢欣鼓舞，掌声经久不息。

在一次会谈间隙期间，这两位领导人漫步到红场上。广场上行人稀少，克格勃安全人员已使游人退避三舍。不过，他们在广场上还是遇到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里根向他们问好，并抱了抱小孩，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在镜头前的惯常行为，这一次它还

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除了在苏联的“中心”履行政治活动仪式，总统同时还想传递这样的信息：是人类的品德使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他不再是与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打交道，而是与这样的人类打交道，他们同我们一样，正为探索一条通向和平的和更加繁荣的生活之路而奋斗。

在里根结束这次访问回国之前，我和丽贝卡临时参加了由加州企业家阿曼德·哈默在莫斯科的分部举行的饯行晚会。晚会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应邀而来的苏联客人更是喜气洋洋。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兴高采烈地说：“里根的来访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早在1985年就通过我的介绍结识了里根总统。我当时告诉他说，总统听了你的吹捧后会很高兴的，他对我的话表示抗议，他说“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里根总统的讲话与姿态鼓舞了全苏联的改革者。俄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对他们自己国家吸收民主的能力表示怀疑，但里根对改革者们表示了信心，虽然他对苏联的现状并非闭目塞听。这就激励了苏联人民起来结束他们在传统政治中无所作为的状态，去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

安德烈过于兴奋的话语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一〔125〕个民族的自信因某一位政治家的访问而受到根本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历史进程。当然，他的话也不无道理。里根对苏联民主的鼓动适逢关键时刻，他早些时候对共产主义严肃的谴责也使他的鼓动言词具有了可信性，这是并不那么直率的人士难以做到的。

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1989年12月，这时里根已经卸任，距他的莫斯科之行也已有八个月之久，可是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仍有16.5%的苏联市民把里根看作当年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排在他之前的只有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里根不但名列当时的美国总

统乔治·布什之前，而且还位于获得当年3月选举大胜的鲍里斯·叶利钦之前。[13]

当然，里根1988年对莫斯科的访问对苏联的政治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在为关键的第十九届苏共全会做最后准备的阶段，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

苏共代表大会

当苏共大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拿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建议：在各级政府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乃至整个国家，党政高级职位由一人担任。这一思想似乎同党与行政及所选议会职能分开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它几乎不可能结束党的干部对经济管理的直接干涉。

鉴于这些原因，许多改革者反对此项建议。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自私的表现。如果通过这项建议，也就意味着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议会主席后身兼党政要职，既可保住党的总书记之职，又可担当政府元首。

我对他们的反对表示理解。如果改革真能奏效，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对这个国家的束缚。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就会不失时机地为这样的变化提供动力。但如果党政要职由同一人担任，党很〔126〕显然仍大权在握。总之，这条建议将会给真正的民主运动带来阻碍。

然而，戈尔巴乔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要与之打交道的是苏联共产党。那些地方与州里的党的官员不愿意把权力移交给选出的议会，不甘心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希望他们在这

方面给予合作是天真的。

戈尔巴乔夫的讨好性的建议促使那些固执的官僚们产生幻想，不管怎样，正反两方面他们都可能保住权势：虽然新苏维埃的行动可不受党的直接监督，但党的领导人可身兼二职，并保住他们作为所在州、市或地区“头号人物”的个人地位。

但若果真这样，改革会走向何处？除非实现真正的权力转移，不然，改革毫无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只做了间接的回答，但细心的听众已注意到了他建议中可能存在的“陷阱”。确实，这条建议允许党的主席去竞选相应地区的（苏维埃）议会主席，如果他获胜，他将身担双职。[29]但换言之，若这位党主席竞选议会主席失利，那么党组织就会不得不对他是否能够胜任党主席一职“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主席就有可能取代各级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因为那些人已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力赢得选举。

当时确有一些第一书记们担忧，一旦这种建议实施后，有可能出现上述后果，但绝大多数的党的官员对此不屑一虑，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充满信心。他们以往在各自的选区总能获得99.73%“选票”的支持，这次选举最起码也能获取51%的选票！

我当时想，戈尔巴乔夫这么做要么是要放弃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要么是要把党的官员推进有史以来的最惊心动魄的角逐之中。对此，只有选举本身才能给出答案。击败那些身居要职的党的官员所需的选举公平度，所需的选举透明度足够充分吗？党会任用凭借自己实力在竞选中获胜的人员来取代落选的党的官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将翻开真正崭新的一页。

对这项建议意见最大的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们。叶利钦对此

表示疑虑，他建议提交全国人民进行公决。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取得了最终胜利。

〔127〕 在党的大会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兼职”问题，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在会议上争执的场面。他们早在九个月以前的中央委员会上就发生过冲突，不过当时新闻媒介受令未予报道。这次他们的讲话由电视台在全国播放，虽然不是现场直播，而且有点偏向于利加乔夫，但是，他们的讲话当天晚上就转播了。[21]全文于第二天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

事先并未安排叶利钦讲话，电视播放时对此却只字未提。据叶利钦自己的记述，他事实上是冲到讲台上才被允许发表讲话的。一开始，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演讲者名单上，但在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就在午休之前，他离开楼厅上自己的座位，来到下面的主会场，并迈向中间的通道，向面前的议员们挥舞手中的代表证。戈尔巴乔夫派人劝他到讲台后面的房间里去，或者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听候决定，但叶利钦没有让步，担心受骗上当。他炫耀性地坐在最前排，直到戈尔巴乔夫同意将他列入发言者名单，他才离开。[22]

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在发言中先回应了在大会期间他所受到的批判，接着他反戈一击，批评党没有实现预期的更加民主化的基本目标。比照去年的批评，他的此番指责听起来要温和一些。

他从大会本身谈起，提醒人们说，许多地方仍然“沿袭旧框框”来选择代表。官僚“上层”并没有得到改组，这是一目了然的现象。

虽然他在发言中要求多花一点时间来考虑党职与对应的苏维埃主席职不分开的建议，但更强烈地表示赞成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直接选举，认为这种选举也应在党内进行。他建议政府官员最多连任两届，65岁就应义务退休，认为这些措施比两党制更能可靠地防止独裁。他称这是真正地回归列宁主义原则的措施。

他还提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遵从这样的原则，即一旦领导人下台，他的一班人马也不能继续留任。他据此批驳在政治局里呆了10多年的老政客，指责他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思悔改。国家现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叶利钦要他们起来解释，并呼吁大会解除他们的职务。他说："比起死后遭人批判和唾斥，这要仁慈得多。" 〔128〕

他接着把矛头直指党内腐败现象。当时党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党风问题）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正在会场，叶利钦谴责他只注意微枝末节，对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却不闻不问。他也提到了党的财政预算问题，说外人从不知道个中情形，连有权管理它的中央委员会也不清楚。他要求公开党的财政预算，并强烈谴责了党的高级官员的特权。

叶利钦发言所花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人讲话的时限。他在念完自己准备的讲稿后，还想再问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下面发出了抱怨之声，他停了停，抬头看过去，解释说："我只想就10月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我个人的政治名誉的恢复问题说几句话。"会场还是闹哄哄的。他一边收拾他的讲稿，准备要走的样子，一边小声嘀咕："如果你们觉得时间有限，那就算了。"说到这，他转身看了看戈尔巴乔夫，他正坐在讲台后面的"主席台"的正中央。

戈尔巴乔夫示意他继续下去，说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下去吧。他们想听。"想到去年秋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做

的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戈尔巴乔夫又补充道："同志们，我认为公开叶利钦事件的秘密是时候了。让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畅所欲言吧。大家谁想说，都可以说。"

叶利钦转过身，看了看笔记，面对观众又继续说下去。他说大家都已经对50年之后才给人平反昭雪的现象习以为常了，而他本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名誉得到恢复。他回忆说，去年10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称他的观点为"政治性错误"，而他认为他只错在没有选对时间，他不应在十月革命70年庆典期间来挑改革的毛病，它破坏了节庆气氛。但是，为了维护党内自由争论的传统，为了"在共产主义者面前恢复我的声誉"，他请求本次大会废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29]

叶利钦前后的讲话风格迥异。他在前面的讲话中言词激烈，挥斥方遒，而在后面这段讲话里则恳请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话完毕，大会正好午休吃饭。

原定大会下午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不料却变成了对叶利钦的发言与恳请的批驳会。这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发言者的口径如出一辙。11位发言人中只有1位或多或少地为叶利钦作了辩护。抨击叶利钦最厉害的是叶戈尔·利加乔夫。

利加乔夫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走上讲台。他的讲话大都是照本宣科，时常抬头注视一下听众，不过他很会演讲。他的语调、他的停顿、他讲话时的总体风度都极具感染力。尽管他竭力控制着他的腔调，但听众还是能从中体味出他难以自抑的感情冲动。

他的言语更是把他的情感表露无遗。他没有对叶利钦具体的观点做评述，而是直接攻击他本人，还不时沉湎于为自己作一些不言而喻的辩护。所有这一切都颇费心机，其目的就是要唤起作为他的听众的主体——官员们的注意。

他一上来就声称，让他来对此事发表看法，他感到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他有些惴惴不安。他所感到痛苦的是，正是他一手把叶利钦推上了莫斯科第一把交椅的宝座，并说这是他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接着指责叶利钦在来莫斯科之前就犯有严重渎职罪，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行配给制是他严重管理不善所致（这个指责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他在讲话中说了句后来家喻户晓的话："鲍里斯，你错了！"在这句话中他用了俄语中作为昵称的"你"来称呼叶利钦，这一称呼一般只在政治局成员私下聊天时才使用，他用在这种公开场合，似乎是为了表达一种居高临下和公然挑衅的心理。

最令利加乔夫不能容忍的是，叶利钦批评党拒绝改革，批评党坚持享有不应有的特权。他花了很长时间为自己给"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在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时对党的忠贞不渝大吹大擂。他认为叶利钦在政治局例会上一言不发，而在这里却作出这样的指责，这是"极为怪诞的"。

在他回到座位上时，大厅里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毫无疑问，代表们最后拒绝为叶利钦"翻案"。

利加乔夫发现他的讲话很明显地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当晚收看电视的观众却对他的讲话很不愉快。他们这些观众知道党的官员享有很多特权，这位想糊弄他们的利加乔夫算是老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在为谁说话？叶戈尔·库兹米奇又是在袒护谁？他们心中都很清楚。〔130〕

很快，年轻的商人们套用了利加乔夫那句名言，在生产的纽扣上用俄语印上"叶戈尔，你错了"！

迈向真正的选举

利加乔夫虽在党的大会上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他的威信却每况愈下。他对政治改革的反对使得戈尔巴乔夫解除了他事实上作为党的二号人物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通过分化对手，通过在自己的某些建议上作些让步，通过利用党向来支持领导人做出的决定的传统，赢得了苏共大会对政治改革的正式支持。一些代表虽表示反对，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大会最后的选票。这次大会之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扩大优势。9 月份，在急迫投入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选举的准备活动之前，他在党的上层结构里策划了一场大改组，并重新分配了各自的职责。

党的书记处不再作为一个机构定期开会，利加乔夫的会议主席一职也自此结束，给他安排了一个含糊的差使，去监管农业生产。切勃里科夫的克格勃主席一职也被撤消，安排他去负责党的一个委员会，监督警察和犯罪审理制度。这些新委任的工作听起来都很重要，而且拒绝有能力胜任的职位有违党的传统"伦理道德"。

这次改组有两个目的：其一，党的高级官员再也不能轻易直接干预政府的工作；其二，进一步清除了阻止改革者的组织基础。新成立的党的各级委员会除了颁布一些冠冕堂皇的命令之外，不再行使实权。它们的工作几乎无人注意，政治上其主席一职已被架空。

〔131〕 戈尔巴乔夫由于没能向党的领导层引进足够数量的改革者，只好决定削弱党的领导。当然，他不可能公开挑明这一点，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他不得不装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党的工

作更加富有效率，使党能真正起到决定政策的作用，从而把一些琐碎烦人的日常管理事务交给政府部门中不重要的角色去处理。

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已非一日，深知"决定政策"的机构若无权干涉执行政策的机构，那它只是个绣花枕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

1988年整个秋冬，苏联人都在为有史以来真正的选举作准备工作。各委员会都基于苏共大会的决议精神草拟了选举细则，并于12月上旬由只起橡皮图章作用的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以法律形式予以通过。

这些细则旨在对政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国家最权威的实体一直是最高苏维埃，正如名称中所示，理论上也应是"最高的"。其主席团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最高苏维埃与其说是个真正的组织机构，还不如说是个舞台。它的成员都身兼他职(常常是要职)，他们每年定期开两次为期三两天的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事先草拟的一些建议。这些成员都是从共产党机构事先准备好的单一候选人名单中"选举"出来的。

因此，最高苏维埃所行使的职能纯粹是走形式。真正的决策者是把书记处当作它的差役的党的政治局，它只简单地把立法权移交给最高苏维埃以便它通过已经作出的决策。因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服从党纪党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不可能独立行使其职能。

这些细则为一个全新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该机构将由2250位成员组成。1/3的成员按地理区域选出，这与美国的议会选区相似；另1/3选自各联邦共和国内

[132] 的"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形式上自治的实体；最后的 750 人则选自"公共组织"。细则中最重要的是采取多名候选人互相竞选以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选举。

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按常规一年不定期召开两次会议，为期数天。它还要从其成员中选拔出各由 271 名代表组成的小规模两院制最高苏维埃。这些代表作为专职议员不担任他职，但要"轮换"。轮换的比例是 1∶5，这样每年都有新面孔进入两院。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人数与美国参众两院的总人数非常接近，这也许不是巧合。

拥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㉓]这个新头衔的国家元首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接着，由他来任命一位总理，不过，他的任命得由代表大会通过。然后，由这位总理来提名部长候选人，他们的任命由最高苏维埃来通过。从理论上来讲，这种任命方式与美国内阁官员及其他高级职务的任命需由参议院确认很相似，区别仅在于，苏联官员的任命要由全体苏维埃而并非仅由其上院来确认。

我们在使馆一边怀着极大的兴趣跟踪大选的准备情况，一边向华盛顿发回众多有关事态发展的报道，所有这些报道令苏联问题专家感到耳目一新。我们似乎要第一回目睹一次任何人都将无法预测其结果的苏联大选。

1988 年年底，在我评估这些新结构、新规章的意义时，脑海中产生了如下几点想法。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甚至原则上都算不上完全民主的体制。1/3 的代表从共产党控制的"公共组织"中挑选，即便所有其他的选举是公正进行的（而且对这种公正，任何讲究现实的人现在还很难预料），也会出现导致人代会中共产党代表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而且，这一规定违反了"一人一票"的选举规则，因

为依照此项规定，任何一位市民都可在他或她所归属的所有组织里进行重复投票。大选后，我的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他努力投了六次票，而且都是合法的。他以市民身份投了一次票，之前他先后在艺术家协会、艺术学院、老战士协会、友谊协会以及和平委员会投了五次票。〔133〕

其次，立法机构的间接选举给人为的操纵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苏联宪法臭名昭著的第六条规定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这规定当时还是白纸黑字，行之有效。它使得党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来操纵立法人员的选举。

尽管如此，如果了解一下新规则，哪怕是其中一部分，就会知道苏联公众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即便大多数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不得不参加竞选，如果投票是不记名的，且选票的计算是公正的，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就有可能落选。

意欲反对当时“体制”的选民们被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规则要求每一位获胜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须过半数，不以票数多少为准。选民可以对所有候选人投“否决票”。这样，即使党控制了提名过程，但如果它所提名的候选人不受欢迎，人们也可以把他否决。苏联选民将拥有一项众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那就是有权“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然后还把选票捻成小棍。

当然，这次选举能否带来真正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当时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其一，这次选举是否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或者说这次选举是否还像以前那样操纵在共产党官僚手中；其二，这次选举选出的机构能否不受党的官僚们的干预。

我确信戈尔巴乔夫一定会努力带来某些真正意义上的变化。但很明显，阻碍他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

构。他若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并维持最低的工作安全系数，就需要创建一些替代性机构。

新人代会的设计似乎就有这样的考虑：迫使顽固的党的官员们接受无记名投票，以此给他们带来压力。鉴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民众中所享有的知名度，不管这种投票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他都会赢得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职。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党内一小撮敌对集团所推翻。

尽管改革者以及大部分市民对叶利钦被党代会除名抱以同〔134〕情，但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不可信赖。同时，针对苏共大会上出现的投票表决反叶利钦一事，他们更多是指责利加乔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叶利钦已开始在民众中失去光彩，因为戈尔巴乔夫现在掌握着改革运动的主动权。

1988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有55%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获“年度人物”奖当之无愧，而认为叶利钦有资格的只有4%。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最终站在了激进改革的前列，他已把如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这样的保守派搁置一边（尽管不是完全这样），开始实行他的民主化进程计划。虽然经济失调、商品短缺的现象有增无减，但人们谴责的是雷日科夫政府和党僚们，而不是怪罪戈尔巴乔夫。

在帝国的边远地区，这时不满情绪已开始抬头，有些还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这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但在1988年年底，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外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头戏。他在外交上的努力已开始结出累累果实。这一年，他在外交上的那些成就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的。

第 六 章

〔135〕

“人类的共同利益”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承认在和平共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88 年 7 月①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应成为阻止社会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88 年 8 月②

武力的使用或武力的威胁不可能、也不应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这一点勿庸置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联合国 1988 年③**12 月 7 日**

1987 年 5 月下旬一个温馨的夜晚，斯帕索别墅的主会客厅里宾客盈门，人们聚集在巨型吊灯之下谈笑风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走到我面前说：“我刚才遇到了我平生最奇怪的事情。我的一位苏

联朋友在电话中向我打听是否有一架外国飞机降落红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刚才路过红场的时候我特意停下来看了看，天哪，真有此事。你知道，一架塞斯纳正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不让靠近。从标记来看像是德国飞机，但当我问一名士兵这是什么类型的飞机时，他茫然地盯着我，只喃喃地重复了句'什么飞机？'"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事件的过程。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19岁西德青年驾机从汉堡起飞，并即兴降落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面。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莫斯科生活真是索然无味，有时简直令人沮丧。这个德国小伙子竟大胆巧妙地躲过了自负甚高的苏联防空部队之监控，此事一时成了无数鸡尾酒会上的笑资，要知〔136〕道苏联防空部队连迷失方向的客机都敢击落。不但外国人对此津津乐道，连苏联市民也取笑他们穿军装的部队的狼狈。这些军人在公众面前趾高气扬，高傲自大，人们禁不住总想挖苦他们一下，杀杀他们的威风。而且，一架塞斯纳毕竟不能算是一种军事威胁。

因此，当我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听到苏联人自己取笑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那次聚会上，我遇到了苏联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维克多·苏霍德雷夫，他以给苏联领导人担当高级英语翻译而出名，他在招呼我时问我："你听说了吗？人们已把红场给改名啦。"

"不是开玩笑吧！改成什么名字了？"

"噢，当然改成谢列梅捷沃3号啦。"谢列梅捷沃1号和2号是莫斯科附近的两个国际机场。

驯服军队

我不太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否也拿鲁斯特的恶作剧来取笑。但自己国家的防空系统如此漏洞百出，他不太可能对此幸灾乐祸。不过，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政治局势微妙的时刻。

当时在制定更加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面，军方是主要阻力之一。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没有按照惯例让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享有完全的政治局成员地位。这本身就在暗示，军队起的作用将不会再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那样重要，此外，戈尔巴乔夫当时还玩弄一些新颖的但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如“防卫充分论”。

鲁斯特的恶作剧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次对苏军领导层进行大换血的机会，并进行得非常迅速。德国飞机是5月28日降落红场的，而戈尔巴乔夫在两天后，也就是5月30日就撤换了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接着又撤换了防空部队司令员及其他一些将军。在选拔新的国防部长时，戈尔巴乔夫沿用古老的政治手腕来培植亲信。他没有看上很多老资格的军官，而是擢任了一位级别很低的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意想不到的晋升会确保这位德米特里·亚佐夫将军死心塌地对他忠心耿耿。

这位亚佐夫将军63岁，面孔黝红，棱角分明，身高6英尺多，[137]说话直来直去，不过性格随和。他后来曾告诉来访者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彻底地改变了看法。1986年以前，他认为核战争可以打，可以赢。然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相信这是不可能

的。事实上，一个国家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也会被毁灭，因为常规武器对核电站的袭击就可以将整个国家夷为寸草不生之地。

这一时期，苏联军方另一关键人物是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与亚佐夫同龄，但官职比他高。当他被封为苏联大元帅（等同于美军五星上将）时，亚佐夫还只是个三星上将。尽管他在国防部中要听从亚佐夫的调遣，但与戈尔巴乔夫更为亲近。这位军方要人是参加与美高级军控会谈的苏联高级军官，并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阿赫罗梅耶夫地地道道出身士兵，逐级晋升。他在会谈中回忆起他第一次打仗时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个海军下士，参加二战开始阶段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他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他从军的第一个冬天有一个晚上是在没有遮盖的壕沟里度过的。他很快接受了新的委任，升迁很快，在二战快结束时已是一位坦克营的营长了。

战后，他不断被委以越来越重要的指挥任务，其中包括远东军区的指挥资格，这似乎是担当总参谋长一职的必由之路。之后，他又在莫斯科担当最高领导职务达10多年之久，这中间有一短暂的间隙，那是在80年代早期，他奉命指挥驻阿富汗的苏联军队。

阿赫罗梅耶夫坚决拥护苏联政体，反对削弱中央控制。他诅咒共和国内的民族运动，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种民族运动是背叛祖国的行为。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表示满意，也接受人民控制军队的原则，同时也是军队荣誉的热情捍卫者。当新闻界对军队进行狂轰乱炸时，他以最强有力的声音为军队辩护。

〔138〕在同我们打交道时，他所关心的重点是确保任何协议都是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如果裁军对双方的影响是同等的，那么他就表现得很理智；倘若他认定苏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那么他就会

采取拒绝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因其过分庞大的武器库有时必然要比西方多销毁一些武器，可惜他有时不欣赏这样的观点。当然，如果戈尔巴乔夫需要或希望达成某项协议，阿赫罗梅耶夫也愿意帮忙，不过得克制他自己的想法。

即便是在保守的国防部时，阿赫罗梅耶夫的观点也是强硬的。不过，避开他的观点不谈，他本人倒是在打交道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西方朋友。他为人很有风度且风趣幽默，他总是设法让别人明白他的观点，对于别人的观点他也乐于倾听。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谈判之中，而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纠葛。久而久之，他与谈判桌上的我们发展了轻松愉快的个人关系。

随后的两三年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联盟（这两个人个性差别太大，说是联盟未免有点勉强）辅佐戈尔巴乔夫，非常融洽。一方面，他们的军绩无可指责，即便是手下的军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们愿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以配合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宪法赋予他的政治权威。无疑，他们会在与苏军设置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政策上进行争执，但一旦戈尔巴乔夫作出决定，哪怕是与他们的观点相异的决定，他们都会支持他，并帮助戈尔巴乔夫做好工作，不让军队中潜在的不满因素失去控制。

苏联的将军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改革。当苏联在技术进步方面已经落后西方的时候，他们不会看不到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军备竞赛尤其压得苏联透不过气来。这些将军们感到这种落后的局面今后将会更加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量根本不可能弥补质量上的问题，虽然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为谋求尽可能多的数量而施加所能施加的压力。

70 年代时，我曾问我的苏联朋友为什么他们的军官们追求如此巨额的数字优势，他们部署了两倍于北约的坦克，两倍多的大

炮以及更多的武装士兵。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139〕会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吗？这种想以绝对的军事优势来建立霸权主义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时，谨慎的苏联市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认事实："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比你们的多？你们武器布置得比我们的多！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压力，而且你们还威胁要进行核战争。"如此等等。多一点精细分析的人们虽然不会否认事实，但却找个借口让人予以谅解。

"想想看，你们应理解，我们这种神经质是历史的遗传。历史上每当我们拥有与敌人同等力量的时候，我们总是输掉战争。常常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可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库图佐夫的兵力比拿破仑多多了，然而，这个小矮子还是打到了莫斯科。日本人在1905年只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就打败了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但兵力上比德国和奥地利总和还多，而且在拥有的大炮门数上也占有优势；二战时，我们拥有两倍于韦尔马赫特的军队，装甲车和飞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结果还不是他妈的险些失败。

"事实是，我们俄国人对我们的士兵无法予以充分信任，对我们的装备能否与德国的或是美国的相抗衡尤其不抱信心，也许只能对付对付中国而已。因此，如果在军事上保持同等水平，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每当听到这样的辩解，我总是试图解释说这借口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他们装备的武器质量以及他们推行的军事路线只能说明一点，即本质上不是为了防卫。

不过，他们这种辩解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影响。勿庸置疑，在过去苏联军事力量薄弱时，其军事领导人在军事开销

上大做手脚，以扩大军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在这方面登峰造极，政府领导人了解，通过这种慷慨大度可以在苏军中建立他们的名望，树立他们的威信，因此他们对军队总是非常大方。

然而，一块发霉的馅饼，哪怕切得再大也不会勾引人的食欲。因此，只要经济改革不损害军队的利益，将军们理所当然要采取支持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则进退两难。要想恢复经济活力，他不得不牺牲军队的特权；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国内改革，他不得不改变苏联军事学说。说得直接一点，如果戈尔巴乔夫欲 [140] 使改革在国内得以进展下去，他就不得不取得美国和北约的信任；只要西方认为苏联的政策及其军事力量构成了威胁，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无法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勃列日涅夫同化了将军们——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将军们在精神上同化了勃列日涅夫以及他的幕僚——不管是哪种情形，总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想法打破这种习俗，以便他的行动能够不受将军们的干扰。

可以期望亚佐夫和阿赫罗梅耶夫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领导，但他们决不是只执行上级命令的傀儡。实践证明他们坚决维护苏联军队的利益，在谈判桌上很难让他们作出让步。不过，当政府决定裁军、决定从外国撤回军事基地时，他们还是执行了，没有公开反对——这种局面至少维持了几年时间。

1988 年，美国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相继于春天在瑞士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 8 月份访问了莫斯科和几个苏军基地。之后，美苏军官数度互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应美海军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之邀在夏天访问了美军几个设施，克罗之后作了回访。

这些接触给苏联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返回之后，有一次他在斯帕索别墅与我共进午餐，席间他对我说美国热情的招待以及美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参观美国航空母舰时，他对它的巨大威力充满了敬畏。虽然，想象中他知道存在这样威猛的航空母舰，无奈他以前无缘亲眼目睹，因为当时的苏联海军中还没有与之相匹敌的设备。不过，他说这次出访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布里斯营地的所见所闻。

他因以前当过坦克营营长，所以对当地的坦克演习兴趣盎然。演习完毕后，官兵们列队等候视察。阿赫罗梅耶夫走到一位浑身仍然满是泥土的坦克指挥官面前，停了下来。他问道："少校，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长官。"他答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阿赫罗梅耶夫接着问道。

〔141〕这位年轻的少校回答道："不知道，长官。但你能来这儿我们很欢迎。"

话语中没有敌意，也没有帝国侵略野心，有的只是作为一个职业上的同事之间的对话。

这不是阿赫罗梅耶夫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但这无疑是他终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次访问。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将军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他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的继任者科林·鲍威尔也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的联系就更加频繁了。

如果据此认定双方军事领导人（或者为了同样目的的政治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接触会自动带来和平，那是天真幼稚的。历史上许多冲突，包括我们的南北战争，都证明这种接触有时反而带来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迅速形成的彼此间的了解与尊敬，事实上已经在双方的军备削减谈判中起了一种润滑作用。对手已不再像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人物简介”里介绍的那样云山雾罩、不甚了了，而是有血有肉、同样面对着许多职业上问题的活生生的人。双方都发现——不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消除了所有疑虑——对方也认为可在不迫降或不受辱的任何情况下避免北约与华沙发生冲突这一最坏的结局。

一旦人们对此确信不疑，那么只要没有政治家的干预，其他一切都可通过谈判来解决。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的理由来寻求与西方的暂时和解。西方所担心的是，他如此迫切地要求改进对外关系是为了将来的挑战而赢得时间与力量的一种策略呢，还是为了对苏联教条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苏联军事学说的改变始自 1988 年。以前的军事思想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即以攻击行动来“抗击侵略”。举例来说，按以前的理论，当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苏联将立刻向英吉利海峡进军。苏联这种战争规划以西方“侵略”为前提。事实是这一前提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如果苏联政治当局决定发动战争，什么军事路线、军事训练、军事部署都不起作用。〔142〕

1988 年与 1989 年这两年，苏军参谋人员开始使戈尔巴乔夫早在 1986 年就使用的一个模棱两可但富有启发的术语具体化，“合理充分”渐渐变成了“防卫充分”。这一术语被进一步解释为

威慑敌人战略进攻并击退来犯之敌至边境为止所必需的军力总和。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美国返回后，在一份军方报纸《红星报》上撰文，称苏军中至今仍有很多人是“旧观念的囚徒”，他自己极力主张以武器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其数量的削减，主张改变军事训练指导思想，以适应一种纯粹的防御理论，而且，他还认为苏联军队机构的精简也应付诸实施。④

一些变化很快在苏军的训练与演习中体现出来。但除非对军队进行大幅度削减，军事部署有根本性改变，否则这些进展很快就会付诸东流。不管怎样，与假想敌保持同等水平军事力量的观念在 1988 年底已经失去了思想基础。军事学说的这种变化明确表明苏联承认在核时代试图维持军事力量优势是危险的。没有认识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太可能达成即将到来的裁军协议的。

阶级斗争与历史的“垃圾箱”

只改变军事学说还不足以使西方相信戈尔巴乔夫真心准备结束冷战，尚需其他方面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基于各自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社〔143〕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各阶级为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注定就要发生斗争，而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人数众多并处于被剥削地位

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它将建立其对社会的专政，消灭其他阶级，最终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权威代表被赋予对全社会实行专政的权力。可以想象，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苏联就是如此，只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阶段尚未来到，但曙光常在。

用这条阶级斗争理论来处理与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其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些国家可能还处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注定要被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推翻。因此任何与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联合或合作安排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其策略依据消失，就要摈弃这种联合或合作。核时代所需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束，只是表明当时有必要采取战争之外的斗争方式。

70 年代，西方与苏联之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缓和期，即使这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也向苏联公众清楚表明，1972 年反弹道导弹之类的军控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有所改变。那时经常出现的口号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什么缓和期”。虽然上层官员在亲近属于“资产阶级”的西方人，但是苏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的，政府采取措施防范西方思想的腐蚀，如严禁出国旅游，控制新闻媒介，干扰外国电台广播，等等。

不仅如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还为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斗争以及 1979 年进军阿富汗提供了决策的理论基础。尽管现实与这个理论并不相符，但上述行动却被勃列日涅夫集团看作是为了阶级的团结而采取的，因而也是合法的行动。如果上述行动能够成功，那就会增强他们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威望。他们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要他们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愿望。

由于亲身经历过苏联70、80年代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所带来的后果，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144]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仿佛是故意避开直接的辩论。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它的确切含义有待于一步一步的剖析才会清楚。但是到了1988年夏，随着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在国内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辩论终于走向了公开化。

谢瓦尔德纳泽7月就国际事务召开了一次由苏联高级外交官和学者参加的吹风会，主要是告知与会者苏联在其外交方式与实质内容上的一些变化。这次会议不让外国人参加，但《真理报》登载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场白的概要。7月26日吃早饭时，我打开《真理报》，很快浏览了该文。下面这段话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讲话中说，新的政治思维要在核时代的现实环境中考虑到和平共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

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层普遍接受这个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就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表类似的言论。

然而，事与愿违，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非但没有得到加强，反〔145〕而出现了驳斥的言论。就在外交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利加乔夫访问了高尔基，这是位于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古城，因它是该地区国防工业的中心，所以禁止外国人参观。传统上该城称做下诺夫哥罗德，不过至今还未恢复旧名。利加乔夫利用这次访问的时机发表言论，驳斥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真理报》8月6日报道了利加乔夫的讲话，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最直言不讳地维护着“阶级斗争”这个传统思想：

>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其他解释只会造成苏联人民以及国外朋友们的意识混乱。积极参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人为地用来作为停止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利加乔夫是想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方便时就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平时只要有可能就推行冷战策略。

外国大使们一般不把一场意识领域里的争辩写进自己的报告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向华盛顿详细地报道了莫斯科在意识领域里的辩论，但似乎只有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们给予了重视。对于天性讲究实际的美国政客来说，这

种争辩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穷究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而已，与真实生活没有明显的瓜葛。在他们看来，这种争辩就像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唠叨，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徒费时间而已。讲究实际的人们最好不要理睬。

在这种态度下，我们从未接到任何指示，要求我们同苏联官员一起探讨或阐明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观点，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我总觉得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决定事态发展的命运。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认为其结果将会影响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诚意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下一次遇到谢瓦尔德纳泽时一定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作为官方的探询，而是个人之间的交流。

事有凑巧，为了向谢瓦尔德纳泽传递国务卿舒尔茨的一些口信，我在8月8日就与他见了一面。会见是在晚上进行的。这时，谢瓦尔德纳泽不像白天那么忙碌（他是出了名的夜猫子，常开夜〔146〕车）。我说完正事，就把谈话引向那个话题，并解释说向华盛顿阐明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职责，因此表述时我要力求精确。我说我已把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可现在我又注意到了利加乔夫在高尔基的言论，我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代表着整个苏联领导层的看法。我请他帮忙，使我对目前的形势有个更清晰的理解。

谢瓦尔德纳泽向来不喜欢搪塞敷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点不习惯与我进行讨论，这毕竟是国家内部的争辩，他在座椅里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他向我保证说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戈尔巴乔夫已明确说过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避免核战争。阶级斗争是在国家内部出现的东西。他评论说利加乔夫的言论肯定是指这个意思。

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向他说明，利加乔夫很清楚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于是，谢瓦尔德纳泽避开我的话题，间接地肯定了这种争论，他说道：“好吧，你们的政府领导人不也常常出尔反尔吗？温伯格与舒尔茨的观点有时就不一致。”他在最后向我担保说苏联政府对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抱有坚定的信心。

我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及利加乔夫的讲话，目的并不是为难他，而是为了加强他在苏联国内这场辩论中的地位，不过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们挑明说，美国了解这种争辩的含义，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

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也没谱。然而，就在一周之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对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出了反应（没有指名）。他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不通过反复的阅读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义。

而且，支言片语的摘引也无助于理解。下面引用的这段话是他争论的中心部分，我在翻译成英语时力求做到准确：

> 防止核威胁、以和平的名义裁军、以安全的名义相互信任与合作、关心人类的生存——所有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范畴里进行思考，完成上述任务只是公正地、民主地、合理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最根本的前提。这些问题包括：减少饥饿，维护生命赖以存在的地球环境，合理利用地球上远非取之不竭的资源。

[147]

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纽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50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

这些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人类凝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利益，这意味着它们能够超越几个世纪以来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力量，即分裂、矛盾、对峙以及战争。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使对立各方走到一起，因为当哲学的、抽象的、历史的分类与纯粹实践的、世俗的、日常经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之时，这种共同利益便使个人的利益融入到了大家的利益里。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观的角度、从所有人类发展的前景出发，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诠释。它不是只考虑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阶级、民族、社会团体的利益。它把那些受剥削的社会最底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将之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划分出来，以承担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我们能说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们是以这个阶级的利益来对抗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吗？当然不能。

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⑤

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 〔148〕

一个平常的议程

当里根总统在 1984 年建议分 4 部分议程来改进与苏联的关系时，他指出，他的这个四点方案在政治上是相辅相成的，其中任何一点的顺利解决都会影响其他三点的解决。总统明白这种政治现实，即如果苏联入侵别国，美国参议院是不可能批准一项重要的军备削减条约的，就像如果苏联政府严重侵犯其国民的人权，国会不会同意取消贸易障碍一样。如果苏联社会依旧封闭自守，要核实军备条约的执行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 1985 年和 1986 年这两年里，美苏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加紧了对话。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军协定。虽然两国已经开始磋商地区冲突问题，但当时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尽管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同意放松普通市民与西方的接触，但却迟迟不予实施。像葛罗米柯一样，戈尔巴乔夫拒绝在

人权问题上进行谈判，并称美国商谈这个问题的企图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在雷克雅未克时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人员同意人权问题是个合法的话题，但他们一连几个月仍在抵制我们为政治犯和被禁止离开苏联的那些人进行的呼吁。

然而，从 1987 年晚些时候开始，美苏会谈在各个方面开始全面开花结果。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就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来说，变化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下面是会谈大事纪要：

〔149〕

1987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访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他们签署了旨在销毁由中程弹道导弹运载的各类核武器的条约。从此将结束苏联 SS—20 型导弹对欧洲和亚洲的威胁。美国作为回报，将销毁用来对付苏 SS—20 的潘兴 II 导弹以及巡航导弹。

1988 年 2 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兵，具体实施的协议于 4 月份签订。

1988 年 5 月：里根总统出访莫斯科，并多次就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向苏联公众发表措辞强有力的讲演。

1988 年 6 月：修改规章制度，大大方便了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移民和私人旅行也因此直线上升。

1988 年 7 月：谢瓦尔德纳泽召开了一次苏联外交官会议，会上颁布了一项以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政策。

苏联媒介频频采访外国官员、外交人员，以及新闻记者；春天，苏联学者批评过去政策的文章开始出现。

与西欧领导人接触频率加快，外国部长级官员屡屡来访，戈尔巴乔夫与各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也大大增加。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宣布单方面削减一半苏联军队，保证把“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

罗纳德·里根 1984 年的议程为我们之间的谈判确立了未曾言明的框架，即裁军、消除在第三国的军事对峙、确保尊重人权及终止铁幕。当戈尔巴乔夫考虑使苏联实现民主化并将其对外政策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等建议时，他能够将这些问题上的进展看成是“彼此的”目标。我们将不再玩“零和游戏”，即一方之得必是另一方之失。现在我们都能成为赢家。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就我们所拟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他并不是在屈从于美国的“要求”。他和他的幕僚们渐渐明白，这四点议程抓住了关键问题，而且，美国的建议也不会对和平的苏联造成伤害。

苏联在人权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尤富戏剧性。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苏联阵营违背国际公认原则是阻碍我们关系改善的主〔150〕要障碍。它对迁徙和移民自由的限制导致了美国 1974 年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通过，该修正案不承认苏联的正常的贸易地位，除非它取消对移民自由的限制。

尽管勃列日涅夫一次又一次地修正苏联的做法以期获取美国的实实在在的让步，但他总是断然拒绝把人权作为一个合理议题与外国讨论和商谈。

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坚持过去的立场，直到 1987 年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到 1988 年，人权问题完全列入了两国的议事日程。就在这一年 8 月，我拜访了谢尔瓦德纳泽，请求他释放在押的几名政治犯，他立即答应过问此事，并说要么顺利地释放他们，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若向葛罗米柯作此请求，得到的回答可

能是一阵怒斥，说我干涉了内政。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鲜明!)。而且，当时他还向我解释说，并非由于我的请求他才去过问此事，这与苏联的利益休戚相关。既然苏联领导人已决定要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那么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我告诉他说这是有所作为的最佳理由。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向苏联施压，要求它对其国民的人权给予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

朋友的面孔

戈尔巴乔夫出访美国也促使他愿意按照美国的议程来达成协定。这次出访中发生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1987 年 12 月 10 日，这天是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逗留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邀请副总统布什到位于第 16 大道的苏联大使馆共进早餐。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的官方活动。早餐后，按计划是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客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白宫与里根总统会晤。

〔151〕 然而，早饭后，他们要求副总统与我们其他人稍候片刻，戈尔巴乔夫要与莫斯科通个话，摸摸底。我们曾向戈尔巴乔夫提交过一份声明，涉及与苏联先前的立场不相符合的战略武器问题，我们当时推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在签字之前就此对政治局的同僚们作些澄清。

我们只好在一旁等候，等了许久，就是不见动静。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说戈尔巴乔夫还没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猜想他肯定是在等候政治局的投票表决的结果。

最后，他出来时已快正午了，我们的车队向白宫出发。我的车没有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中间相隔好几辆车。突然，前面意想不到地一阵急刹车，车队停了。为了安全起见，车队一般都行驶得飞快。事先封锁了所有的十字街口，不让通车，车队可长驱而入，直达指定的目的地。可我们现在却在离白宫还有几个街区的康涅狄格大街上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我钻出车，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六年前，里根总统就在离我们这儿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遭到了袭击。当我看到从联邦调查局开出的几辆“导航”车与克格勃保安人员的车一个U形急转弯、护住戈尔巴乔夫的轿车时，我预感大事不妙。直到看见戈尔巴乔夫从车里走出，我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戈尔巴乔夫径直向人群走去，人们正成群结队地观看他的车队驶过。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这些善意的人们作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握手致意，不过只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很快就上路向不远处的白宫驶去。在美国，领导人停下来向群众致意问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开始模仿这种姿态。我当时猜想这件事是事先策划好的，主要是想上上镜头，曝曝光（确实，第二天各大报纷纷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

然而，后来我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那天，在白宫午餐期间，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说，这次接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2〕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里根时说：“我今天上午看到的美国人民与别人告诉我的不一样。”这些美国人友好，开放，真诚地祝愿他。他深知这一切决不是事先谋划的，因他并没有事先透露他要在那儿停留。他看了看会谈桌对面的里根总统，接着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将再也不会用老眼光看待美国人了。”尽管理智告诉他我们

两国之间的某些问题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他从内心深处明白，不论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成为好朋友。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天真或不自然。但我相信这是肺腑之言。

俄国群众感情不外露，不过，一旦愤怒时，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得很激动。每当戈尔巴乔夫走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常问些尖锐的问题，即便在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失去民心的时候也是这样。

而美国人却不一样。美国人民把他看作一个英雄或电影明星，人们向他欢呼，向他微笑，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吝啬感情的人们也许会对美国人这种狂欢的习惯产生怜悯之情，但戈尔巴乔夫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热烈的情绪里藏着真诚的东西，那就是美国民众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呻吟、备受蹂躏并决心砸碎枷锁的奴隶，也不同于苏联国内那些发誓要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好斗的军国主义者。在康涅狄格大街上看到的这一张张面孔闪烁着自由、富裕和善意的光芒。

这次即兴接触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与根植在他脑海中的陈旧的观念不相吻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戈尔巴乔夫都喜欢这种盛大场面，喜欢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的围绕，渴望人群的欢呼。在国内，他对自己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开始感到恼怒，并“遏制”像叶利钦这样比他更孚民心的政治家。在华盛顿以及此后在西欧各国首都，他都得到了他在国内无法得到的东西：敬慕的人群的簇拥。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布什、撒切尔夫人、科尔、密特朗以及其他西方领导人都逐渐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强化了他从这次短暂的接触以及后来的接触中得出的重要认识。1987 年 12 月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再把我们当作一个应予抑制、避

开或安抚的敌对力量或潜在敌对力量来打交道，而是当作朋友对待。于是重心也随之转向如何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相信西方领导人的诚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克格勃提交给他的情报仍然没有忘记提醒他警惕西方的“帝国主义威胁”。

有人授权维克多·切勃里科夫和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公开场合散布这种“帝国主义威胁”论。这两个人一向以给戈尔巴乔夫提交带有偏见的报告而在圈内臭名昭著，他们〔153〕在报告中故意夸大对整个外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疑虑。克格勃有关国情的歪曲报道使戈尔巴乔夫深受其害，幸运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国外的发展情况形成了一个客观的评判尺度，并逐渐地依靠自己的观察以及西方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来处理国事。

12 月在华盛顿与美国人民的短暂接触带给戈尔巴乔夫的感受，并非得到了所有同事的认同。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天，那位曾在裁军问题上不顾个人的伤感给予戈尔巴乔夫有力支持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一次晚宴上向坐在他身边的我的妻子说，理智告诉他国家需要变化，但感情上却难以接受。在 1991 年 8 月，他的感情战胜了他的理智，支持了那场灾难性的政变。

一条新的“普遍原则”

以我们探讨过的上述国内大辩论为背景，东西方关系迅速实现了和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定，既要求也有助于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毕竟，人们不可能在支持建立法制国家的同时依然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不放，正如人们坚持阶级斗

争观念就不可能结束冷战一样。

利加乔夫尽管过去一直维护——现在仍在维护——“阶级斗争”观念，但他似乎并不反对苏联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采取的大部分具体步骤。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在于后者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行更加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利加乔夫曾一度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却正在输掉同雅科夫列夫的一场战斗。

戈尔巴乔夫 1988 年 12 月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标志着苏联这一年在国内外发展变化的顶峰。他单方面宣布削减苏联军队的举措，证明他已掌握了苏联军队。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包括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军方高级将领还在坚持一定要经过谈判协商之后才能答应裁军，而且要求这种裁军必须是双方的。可见，当[154]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

在他的这个发言里，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选择的自由是条普遍原则；它不应该有任何例外。”⑥

真的是这样吗？假如东欧人民选择脱离华沙条约会怎么样？假如德国人选择统一怎么样？假如波罗的海三国或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选择独立又会怎么样？

真是没有任何例外吗？

第 七 章

边远地区的骚乱

〔155〕

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苏联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86 年 3 月 6 日苏联共产党第 27 届代表大会①

让那些喜欢玩弄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偏见的人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期盼任何松动。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7 年 1 月 27 日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②

有人宣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已经导致了人们公开的不满，并不时升发为冲突。

1988 年 7 月 4 日苏共第 19 次大会③

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苏联国内的民族冲突不得不

暂置一边。他不得不巩固他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国家元首的位置，他不得不迫使他的同僚同意他的基本改革方案，他还不得不规划一条痛苦的经济改革路线。当然，他还不得不通过谈判赢得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并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他最后需要考虑的事情才是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反叛问题。

他本人也希望最后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毫不奇怪，他一开始并没有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努力，直到民族问题开始摧垮他的时候，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一年，民族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在乌克兰，由于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高压统治，法院仍然继续给人权活动分子治罪判刑。4 月份，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穆科拉·霍尔巴尔被判 8 年徒刑，外加 3 年流亡期；8 月份，伊奥西普·特雷尔亚因为替乌克兰天主教徒（他们的教堂曾被斯大林封〔156〕禁）的权利进行辩护而被判 7 年徒刑，外加 5 年流放。

长期以来，无数乌克兰人因为维护民族与宗教权利而遭到逮捕，这种严酷的判刑已不再令人瞠目。莫斯科所控制的机构一直在实行自 60 年代后期就开始实行的措施，只要有人胆敢怀疑其权威，它们就会把他们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

然而，在 1985 年下半年，这种局面开始有所转变。遭监禁的著名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在年底前从雅库特地区的劳改工厂被释放出来。他已三次因政治罪或被指控的刑事罪被捕入狱。到了 1986 年，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接受而共同努力期间，被释放出来的人更多了。

在苏共称之为"边缘区"的共和国，反对莫斯科的情绪迅速高涨。这不仅是因为释放了一些被定性为"捣乱分子"的人，也是因为几项重要进展使以前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提倡公开性，这是一个窗口，使得有勇气的编辑、记者和学者敢于涉足以前列为禁区的话题。一开始，只是零星的一两篇文章对党的一般性教条进行质疑，后来，当发现天并没因此塌下来时，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大胆了。

“多一点曝光”变成了这些新近获得了自由的记者们和学者们的口号，这是1987年一部有影响的电影的片名，影片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劫难。人们要求对过去的历史多一点曝光，对奥维廉“回忆”中不让进行公开讨论的黑暗角落多一点曝光，对执政党所犯的罪行和其推行的制度多一点曝光。

尽管有利加乔夫不断升级的警告，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企图控制他们的零星努力，但仍有一小部分意志坚决的编辑、导演、作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他们没有遭受什么麻烦时，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我怀着惊讶的心情开始注视这种变化，长期以来，苏联的新闻媒介一直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对此我已习以为常。

我是在70年代被派到莫斯科工作的，那时我很少读报，只是偶尔翻一些文学杂志，以增加对审查人员予以放行的作品的了解。如果报纸上出现什么重要文章暗示着苏联政策的变动，我的工作人员会及时提醒我注意。要不然阅读这种报纸简直是浪费时间。它总是登载一些人人皆知的东西，而且这些报道往往误导读者，文笔也单调乏味。

我于1987年4月返回莫斯科时，惊喜地发现情况已发生了很〔157〕大变化。当时苏联报纸在世界上虽然还谈不上最客观、最全面，但已变得生动有趣，非常耐看了。到了1988年和1989年，新闻媒介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激烈辩论以及所辩论的话题都予以了报道，令人欢欣鼓舞。

这种新出现的新闻透明度使得公开性突破了原先的限制，开始向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令他们对现行体制极度不满的信息。教科书中被删除的整个历史片断逐渐公布于众；以前没有公开的斯大林的具体罪行大白于天下；人们开始讨论政府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措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连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成了争论的话题和历史研究的对象。

就这样，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民族开始恢复他们各自历史的本来面目。

阿拉木图：被误读的预兆

态度上的变化和所讨论的具体话题，各共和国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抵制莫斯科政策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1986年12月，莫斯科派遣外地官员统治少数民族的做法第一次遇到直接对抗，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年轻的哈萨克人抗议在该地区毫无根基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代哈萨克族的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就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党主席一职。骚乱持续了两天。

当时，大多数莫斯科官员没有注意到这种警告，都认为是地方上对当时的反腐败运动的一种抵制。库纳耶夫之所以被撤换，是因为莫斯科认为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内编织了一个腐败网，当一个外地人被派遣来这里清除腐败现象时，这些贪官污吏们就煽动年轻人上街抗议。因此，这种民族问题虽然存在，但让位给了当时更为紧迫的腐败问题。

戈尔巴乔夫政府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原班人马，他们当时认为若想使得党或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清除腐败现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这种腐败现象已经侵〔158〕蚀到了党的最高层。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分歧正在消失，一个涤除了不同民族特性的“新苏维埃人”已经塑造出来。

在 1986 年 2 月份的党代会上，利加乔夫强调有必要“在各共和国内实行干部交流制”，这意味着委派俄罗斯族官员去非俄罗斯族共和国担任要职。他委婉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同已经“大权在握”的“地方裙带主义”作斗争。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因为利加乔夫是代表负责人事政策的整个领导集体发表这番讲话的。

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同僚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地方裙带主义”和“腐败现象”在地方上却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当地的民族希望用它来对付帝国中央的霸权野心。事实上，在自以为是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许多非俄罗斯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设法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来改组地方共产党组织了。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党组织靠宣誓效忠党中央，靠奢华礼金的贿赂来收买中央，使中央放手让它们按照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旨意开展活动。这在法制国家里被看成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这个苏维埃帝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作为民族领导人，他们自然对遥远的、可憎的中央企图用异族来取代他们的亲信的做法感到不满，因为异族的领导人会搜刮走本该在当地进行分配的资源。而且，当中央派遣俄罗斯人来取代他们的腐败官员时，这些当地的民族精英们只要觉得有必要，就很容易靠呼吁民族团结来煽起他们的“群众”的情绪。

这就是 1986 年 12 月在阿拉木图所发生的一切。

库纳耶夫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党领导，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有着一双曾被德国总理科尔所特别强调的浓眉，外表酷似勃列日涅夫。他们两人的友谊要追溯到50年代，那时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工作，库纳耶夫成了他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成了一国之主之后，他让库纳耶夫作为他个人的心腹统治哈萨克斯坦。

1986年的阿拉木图事件过后约6年，我在库纳耶夫宽敞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寓所里访问了他。他对自己的“政绩”感到自豪，如数家珍般地摆出一系列的数字来夸耀在他当政期间工农业产值的迅速增长。

[159] 谈话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我们坐在一起。他的这个书房里摆满了整套整套的文学名著，数目可观的作装饰用的打火机点缀其中（无疑，他的朋友们对他的爱好非常了解）。谈话中，我不时出现幻觉，怀疑我是被带到了神奇地存活到现在的勃列日涅夫面前。勃列日涅夫的藏品及他对书的品位可能与库纳耶夫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展示所受礼品以及炫耀塞满书架却没有翻阅过的书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得意如出一辙。勃列日涅夫的俄语讲演比起库纳耶夫的雄辩也显得蹩脚一些。他讲话的主旨与以前一样：戈尔巴乔夫他们从来就不欣赏我们的成就，他们把我们推到一边，把整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在哈萨克斯坦，库纳耶夫一直很受人尊敬，即使在了解1986年将出现变化的人中间，亦是如此。在他执政时期，哈萨克民族开始恢复元气。以前的集体化政策、强迫合并政策以及成千上万的非哈萨克民族在哈萨克传统的土地上定居的行为，曾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一系列的打击。

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会明白：1926年，哈萨克人占共和国总

人口的57%，但到了30年代，集体化的直接后果是每3名哈萨克人中就有1人或因饥饿，或因红军镇压反叛而死去。约有20%的人为躲避杀戮而逃离哈萨克斯坦，其中许多逃亡到了中国。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时，该共和国的非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增长了300万人左右，超出了哈萨克本民族在那里的总人口。

到了1959年，哈萨克民族的人口已降到了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30%，而俄罗斯人却占总人口的45%，比哈萨克人多120万。不过，后来哈萨克族所占的“人口份额”慢慢地有所恢复，到了198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哈萨克民族再次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里形成了多数：哈萨克人占了40%，而俄罗斯人则占38%。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哈萨克族人口的上升：哈萨克家庭的高出生率和大规模移民的减少。

库纳耶夫也许与人口变化的关系不大，但他却为哈萨克共产党的“哈萨克化”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与本地俄罗斯居民维持轻松的关系，抑制任何宣传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另一方面，他使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权悄无声息但却富有成效地转移到占共和国党员绝大多数的哈萨克人手中，并使他们担任了其中大部分的重要职务。

1961年我第一次访问阿拉木图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经济委〔160〕员会的高级官员。这个委员会是赫鲁晓夫为管理共和国的经济而建立的。当时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中没有一名是哈萨克人。但到了80年代，我们所接触的高级官员中哈萨克人有3/4或者更多。

库纳耶夫一面向莫斯科大表忠诚之心，一面却在培植哈萨克人担当政治领导，他的这种策略为精力充沛的哈萨克年轻人创造了机会。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机遇，他就是努尔

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出身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出世的那一年正是希德勒大举入侵苏联的 1941 年。他记得战争爆发以后，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看见很多人从苏联其他地方逃难来到他的村子，他第一次听到了异族的语言。上小学的时候，他与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父母由于放牧集体农场的羊群，赶着羊群去了高原牧场。

高中毕业后，他决定在阿拉木图的大学里学习化学，但由于受党的高级官员子女们的排挤，他虽然是高分，但仍被拒之门外。他只好改学冶金学，并被派送到位于乌克兰的一所技术研究所去学习炼钢技术，准备学完之后到哈萨克斯坦北部铁米尔套城一家新建的大型钢铁厂去工作。这家钢铁厂是赫鲁晓夫庞大的“发展工程”之一。[5]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家钢厂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委派专职做党的工作。紧接着，他很快又晋升为铁米尔套市党委书记，之后又被认命为该省党的第二书记。他曾陪同前来该地区视察的库纳耶夫。此次视察之后，库纳耶夫提升他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党的工业书记。

在那种“萧条”的年代里，提升的机会很少，纳扎尔巴耶夫神奇般的升迁只是个例外。尽管他本人富有才华，但他如此快速的擢升离不开库纳耶夫对哈萨克人的偏爱。到了 1986 年，他成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理，是苏联最年轻的共和国总理。[6]这时，他已经有资格竞争该共和国党的领导职位了。

可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鲁莽行事。他打着 1986 年改革精神的招牌，在莫斯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提醒人们注意哈萨克斯坦党组织的“严重缺点”。[7]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他的批评使库纳耶

夫的领导形象受到了损害，因为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毕竟工作了 20 多年。有人猜测，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这样做与利加乔夫或戈尔巴乔夫或两者的唆使是分不开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库纳耶夫起初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表现出了他这样经历丰富的〔161〕人不应有的天真，他竟然试图劝说戈尔巴乔夫解除已从忠诚门徒变为潜在对手的纳扎尔巴耶夫的职务。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请求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了个中缘由。后来，库纳耶夫和他的朋友们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准备自愿退出党的第一书记之职。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年12月，他曾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打算退休。⑧他的朋友们说他打算在 1987 年 1 月搞个退休仪式，同时也庆祝一下他的 75 岁生日。在此之前，他还在他寓所旁边的公园里竖立了一座他本人的半身像。

然而，戈尔巴乔夫决定在他辞职之前先发制人，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1986 年 12 月 11 日，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库纳耶夫是政治局的全权代表，尽管他的辞呈还没被正式接受，但他却没有列席会议。与此同时，这次会议在明显没有与哈萨克斯坦的任何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就选定了库纳耶夫的接班人。政治局会后派遣了一名代表到阿拉木图向哈萨克党组织传达了它业已作出的决定，完全是一派中央帝国的作风。这位新委任的第一书记就是根纳基·科尔宾，他是位职业共产党官员，俄罗斯人，在此之前他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决定于 12 月 16 日在阿拉木图宣布，很快，示威群众便聚集在党的新建的总部大楼前面的宽阔广场上。总部大楼矗立于阿拉木图市中心的小山上，建得雄伟壮观。当时示威群众都是年轻的哈萨克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像是学生。一开始，他们只是四

处走动。后来，示威者越聚越多，足有好几百人，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语言。

库纳耶夫回忆说，他当时被叫到总部大楼，要他与学生们进行对话，可后来科尔宾又决定不采取这项措施（据科尔宾说，当时库纳耶夫拒绝向示威人群讲话）。不管怎样，总之，事情一直拖延到下午，党的主要领导人才决定派几个年轻一点的党的书记去与学生们对话，纳扎尔巴耶夫就是其中一员。

但示威活动没有中止，第二天，示威者已壮大到了好几千人。渐渐地，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示威者开始向派遣来的警察以及总部大楼的窗户抛掷石块和其他物体。最后，政府下令驱散示威群众。在驱散过程中，许多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丢掉了性命。由〔162〕于监狱一下子装不了这么多被捕的示威群众，只好用大卡车把其中好几百人运到四五十公里外的荒芜的大草原上，哈萨克斯坦的这块地方12月份寒冷异常。最后，许多示威者被判处长期徒刑，1000多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因为当时公开性还没有在全国完全普及，在阿拉木图也没有外国记者，因此，人们除了听到一些零星的和歪曲的消息外，对这场骚乱一无所知。苏联新闻媒介只简单地报道了这场由“流氓、寄生虫以及反社会分子”所造成的“动乱”。

有关这次事件的真相一点一点以口耳相传的形式透露出来，直到年底，才在外国报纸上出现了较为翔实的报道。这些报道当然取材于道听途说，难免对伤亡数字有所夸大。[9]《消息报》后来在1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斥责外国报道的失实。不过，莫斯科新闻媒介决意要忘掉这次动乱，此后再也没有文章提及此事。在当时的总理雷日科夫访问芬兰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嗤之为小事一桩，说只有“一两百人”参加，而

且都是一些“堕落的年轻人”。[10]

莫斯科认为此次动乱库纳耶夫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它委任科尔宾以取代库纳耶夫这一决定无关。1987年，库纳耶夫由于领导不善而遭到了猛烈攻击，他本人也因此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过，莫斯科也从这次阿拉木图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再也没有任命像科尔宾这样的俄罗斯人去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担当党的第一把手。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当决定撤换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时，必然是选择一位当地民族的领导人。

科尔宾本人似乎也从中有所收益，尽管哈萨克斯坦的政客们否认这一点。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科尔宾是个全然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专横跋扈的人。

事实上，科尔宾在赴阿拉木图就任之前就已具有在非俄罗斯地区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格鲁吉亚当过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他身材很高，态度和蔼，脸上常挂着迷人的微笑。至少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他应该在60、70年代就担任过党的高级官职，而且，他没有那个时代高官们典型的武断、粗暴和颐指气使的官风。科尔宾对哈萨克民族所关心的问题并非麻木不仁；而且，出于尊敬和学习哈萨克语的目的，他在公开场合用哈萨克语向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居民发表演讲。[11]对他来说这种委任是不幸的，他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被派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尽管他在职只有两年半时间，但哈萨克人对他的任命仍然耿耿于怀。 [163]

乌兹别克斯坦及其“腐败现象”

在1986年和1987年哈萨克斯坦政局波动期间，人们对腐败的指责并不强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邻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反腐败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反腐败运动就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展开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该地区党的领导职务的沙拉夫·拉希多夫于1983年逝世。他的死，使令人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渐渐地暴露出来。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伊纳姆宗·乌斯曼霍扎耶夫为转移人们对他个人的注意，在抨击其前任的同时，表面上也配合执法官员进行调查工作。审查出的一些案件令人发指，涉及成百上千的官员，他们狼狈为奸，虚报棉花产量，从子虚乌有的商品中攫取钱财。乌斯曼霍扎耶夫想蒙骗警察的企图终究是徒劳的。1988年1月，他被革职，并因多项重大罪行受到指控。

乌斯曼霍扎耶夫的继任者拉费克·尼萨诺夫在1988年宣布说，自1983年下半年以来，在乌兹别克有100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起诉，有3000人被革职，另有1.8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有两名罪大恶极者被处以极刑。[12]

不管这些指控多么有效（似乎大部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乌兹别克的反腐败运动最终并未击中要害。乌兹别克人认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腐化现象是整个体制的错误，而单把这些官员拉出来作为替罪羊，令他们深为不满。毕竟，除了一些针对勃列日涅夫亲戚的指控外，许多被指控收取贿赂的人住在莫斯科，而不是

在塔什干，但当局并没有做出努力，对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莫斯科派来的最成功的调查人员（指取供与定罪）中，有两名后来被指控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榨取供词，并转稼到无辜者身上。他们就是来自莫斯科的亚美尼亚人特尔曼·格德连和来自列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伊万诺夫。直到他俩在指控莫斯科的高级官员时故伎重演，莫斯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外来者（主要是俄罗斯人）被委派到乌兹别克斯坦担当因乌兹别克族领导人被捕而空缺的行政职位时，乌兹别克人所受到的伤害与侮辱也接踵而来。外来的领导对这个地区及其习俗知之甚少，更别说是对其语言的了解了。在许多乌兹别克人看来，整个“反腐败”运动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诡计，目的是使这个地区处在莫斯科更加严格的控制之下。 [164]

我在1988年2月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氛围与70年代没什么两样。外国来访者仍然无法接近党的高级领导人。我们美国人虽受到了肴馔和优美舞蹈的热情款待，可当我在一个由美国情报局发起的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户外演讲时，看到只来了一些专门由当地政府机构特准的客人，并且，50码开外的一辆卡车的噪音吞没了我们的喇叭声。政治领导层的气氛那时依然很紧张，不过，对此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针对“乌兹别克事件”而开展的检举活动仍然方兴未艾。

不过，我还是尽力作了两次值得回顾的访问，一次是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总部，一次是拜访它所管辖的那所大学。

那里的清真寺和它的综合图书馆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看起来毫无生气，甚至有点死气沉沉。这所图书馆藏有3000多卷手

稿，近三万册图书。当主人领着我参观这两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有种荒凉的感觉。那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才刚刚开始有点松动。虽然穆斯林团体于二三年后在处于萧条的清真寺里组建了几所新的宗教培育学校，但在 1988 年这个时候，人们对未来还把握不定，与外来者进行讨论时也是顾虑重重。

那所大学显得很拥挤。就其建筑风格，特别是就其教员的种族构成而言，与其说它具有中亚风格，还不如说它更具有欧洲特色。甚至从学生的构成来看，似乎非亚洲学生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来自当地的学生。

那年有两名美国研究生被录取到乌兹别克国立大学的塔什干分校学习。他俩的专业都是突厥语言文化，他们主要与乌兹别克学生以及其他说突厥语的学生来往。他们要求大学的行政部门开设一门乌兹别克口语课程，并请求我给予支持。正常的课程表中没有安排这门课。我当然乐于帮助他们，只是惊异于学校的管理〔165〕人员为何在宣传民族文化上如此迟钝。宣传民族文化本是大学这样的机构所应尽的职责。毕竟，如果一个人想进一步深造当代乌兹别克语，不在乌兹别克国立大学学习，又能到哪里去呢？

塔什干的政治当局仍然抵制组建一个突厥学中心的建议。斯大林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仍然大行其道。莫斯科拒绝支持任何这种研究，因为担心它有可能引起说突厥语的各民族意识到他们之间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害怕这种研究会给地方的联合提供讲台，从而损害帝国中央的利益。

共产党官员的担心还在于，不只是哈萨克人和大多数中亚人，甚至连俄罗斯联邦中也有不少民族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雅库特人也都属突厥语系，对这种同源同根的注意可能使他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亲近。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说突厥语的独立国家。而土

耳其不仅是北约的成员，其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南边的主要对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一些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就曾在泛突厥口号下展开过斗争。然而，由于这几个相邻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如此的明显，官方对突厥学的压制非但没有淡化他们之间的民族情结，反而激怒了突厥知识分子。

高加索的暴乱

1986 年阿拉木图的骚乱过后，虽然地方上对莫斯科推行的过时政策表现出了强硬态度，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中亚相对风平浪静。可是，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情况却大不一样。1988 年，这里的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发生冲突，开始了一连串持续好几年的暴力活动。

在横跨高加索山脉的几个共和国归入苏联版土时，曾重新划分了各共和国的边界，亚美尼亚人一直对边界的划分不满。他们认为划归阿塞拜疆管辖的土地中有两个地区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一块是纳希切万飞地，除一边与土耳其接壤外，其余均由亚美尼亚环抱；另一地区俄语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完全位于阿塞拜疆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希切万地区的人口中阿塞拜疆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占了多数。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亚美尼亚人一次又一次地为此抱怨〔166〕呼吁，但莫斯科却对此置之不理，好像在说，这些形式上的边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过，随着公开性开始深入民心，人们对大胆讲话的恐惧心理也有所减轻，这时住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及亚美尼亚

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的骚动情绪开始升温。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带头揭起了运动的大旗，在1987—1988年的冬天，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团体三次选派代表到莫斯科，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多少得出点印象，即戈尔巴乔夫有可能同意他们归入亚美尼亚的愿望。在1988年2月，亚美尼亚人主导的纳希切万议会投票赞成把司法权移交给亚美尼亚共和国。

然而在莫斯科，政治局却否决了这一要求，并指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使局势"正常化"。自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对所有亚美尼亚人的要求都变得愤怒异常；虽然在亚美尼亚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比在阿塞拜疆问题上更加苛刻，但有一段时间亚美尼亚人仍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最终能接受他们的立场。

由于莫斯科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和这种局面，局势很快失去了控制。在亚美尼亚，示威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声势浩大，不久，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壮大到好几千人。当在阿塞拜疆大街小巷出现了如下传说（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称有两名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杀之时，苏姆盖特城（位于工业城巴库之北）的狂热分子暴跳如雷，肆意报复。虽然这些动乱的消息受到封锁，但在亚美尼亚有谣言说，好几百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集体屠杀，苏联塔斯社最后还是发表一篇报道，称有31名不同民族的人在这场动乱中死亡。[13]几个星期以后，《消息报》刊登文章说有26名亚美尼亚人以及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于骚乱。这次屠杀给亚美尼亚人带来的震颤是难以抑制的，他们至今还没从一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东土耳其的骚乱中惨遭血腥屠杀的悲哀中舒缓过来。[14]这一次，亚美尼亚人似乎又要面临大屠杀了。

1987年，有50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阿塞拜疆，除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农村外，其余的主要居住在大城市里。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里生活的阿塞拜疆人超过18万，主要是居住在农村地区。苏姆盖特事件后，大批大批的亚美尼亚人逃离阿塞拜疆，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政府也作出反应，迫使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政府常常派卡车把整村整村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家什一同运出亚美尼亚共和国。

而莫斯科对此却含糊其词。有时它竭力封锁消息；有时它又〔167〕发表一两则报道，以降低一些不切实际的谣言的影响；有时批评亚美尼亚“极端主义分子”，然后又许诺“公正”处理事端，改正过去的错误。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局势，提出相应的建议。

5月份，两个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均被撤换。新上任的两位第一书记都与现行党的系统没有紧密关系。在选任党的新领导过程中，莫斯科吸取了1986年哈萨克斯坦的教训，选派了一名阿塞拜疆人去巴库，一名亚美尼亚人去埃里温。

到巴库赴任的阿布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曾任住巴基斯坦大使，他与统治了阿塞拜疆长达20年的海达尔·阿利耶夫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维吉罗夫虽然50多岁了，但仍精力充沛，与他墨守成规的前任相比，他宁愿以劝阻代替镇压，对民间组织及其和平游行活动的态度也比较温和。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戈尔巴乔夫的风范：态度鲜明、比较直率、善于与人搞好关系。

到亚美尼亚上任的苏连·哈鲁丘年（俄语名叫阿鲁丘年）比维吉罗夫年轻九岁，也是与亚美尼亚政府机构无关的局外人。他长期生活在莫斯科，在莫斯科长大，并在那儿读完了高中。

有一次，我访问埃里温，哈鲁丘年向我提起了他当时还在埃

里温大学读书的儿子，说他在服兵役之前亚美尼亚语说得不好，不过，参军后他学得很快。我对此很是不解，因为苏联军队里完全使用俄语。哈鲁丘年向我解释说，在军队里，亚美尼亚士兵常在一起活动，相互之间用亚美尼亚语交流，这就使得他的儿子得以提高其母语水平。他们全家一搬到亚美尼亚，他的儿子就成了卡拉巴赫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并参加了1988年春以来几乎连续不断的游行和静坐。

那一年，安德烈·萨哈罗夫积极活动，试图解决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他给戈尔巴乔夫寄过不少备忘录，并写过不少信，他个人还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过商谈。12月，在雅科夫列夫的建议之下，他与妻子叶琳娜·波纳先后访问了埃里温、巴库以及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与双方进行商谈，以期达成和解。

〔168〕 尽管他们努力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与理应比未受教育者更理智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双方之间的分歧仍是根本无法弥合。最后，他们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迈出了自认为是原则性的一步。他感到既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占了大多数，就应给他们以所希望的政治地位。如果这样做使阿塞拜疆人不安，那么政府当局就有责任使用武力来制止暴乱。

尽管我对他的正直深感钦佩，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正式允许领土转让，不管原则上理由多么充分（当然，这原则本身就值得商榷），这种转让必然要导致大量流血冲突。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苏联返回到警察国家的年代，这恐怕是萨哈罗夫最不希望出现的情景。

鉴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拒绝变动宪法所规定的状

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他对亚美尼亚人的偏见甚至与日俱增。如果想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仍受阿塞拜疆政府的司法管制，如果想避免以后不再发生领土转让的争端，就应明确警示巴库，要求它必须保护居住在这块飞地上的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合理的监督机构，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两个共和国各自驱除对方民族的居民。

如果放手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莫斯科给予必要的支持，像维吉罗夫和哈鲁丘年这样的官员是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处在持消极态度的莫斯科和满怀高昂政治热情的共和国之间，他们进退两难。两个民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旧恨又添新仇。

1988 年，这两个共和国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而是分别忙于寻求莫斯科对其各自领土要求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谁也没有对自己在苏联的地位或对“社会主义”所承担的义务表示过怀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负责处理该问题的莫斯科官员认为问题虽尖锐，但并不具普遍性，也不能看成是苏联总体民族政策失败的征兆。

波罗的海寻根

〔169〕

在苏联的西北边陲，一种来得更直接且不同于其他共和国的挑战在波罗的海 3 国正在加剧。20、30 年代它们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几十年的统治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人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话时颠倒黑白，彼此却又心照不宣。据说，当时选举出来的议会自愿请求获得并入苏联的特权。二战后，如果发现谁曾

在战时被捕过，就会毫无例外地被定性为与纳粹勾结和犯下了战争罪行的“阶级敌人”。

为掌握自身未来命运的主动权，波罗的海三国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们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那份玩世不恭的交易迫使它们并入苏联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声称这是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1987年8月23日，即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协议签定的纪念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没有进行过分干预。一年后，示威游行的队伍就扩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对莫斯科的抵制变得更有组织。爱沙尼亚首当其冲，最为活跃。1月份，他们为一个民族独立小组制定了一项计划，此计划提出了今后三年支配其政治辩论舞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以及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保证国际普遍认同的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作为国庆日，等等。

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尽管计划的起草人愿意“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15]

〔170〕 在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

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这种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沙尼亚人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声称已达到4万名成员。7月份，立陶宛成立类似组织，此后以“萨尤季斯”而闻名遐迩。萨尤季斯的立陶宛语意思就是“运动”。拉脱维亚也不甘落后，于当年夏秋之交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计划草案。到10月份，这3个共和国都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系列方案，其性质类似于1月份爱沙尼亚知识分子起草的那份计划。[16]

这三个共和国的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进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

随着上述组织的建立，公开的示威游行已不再是偶尔为之，而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2月25日，大约4000名群众在塔林参加游行活动，庆祝爱沙尼亚独立70周年。在3月和6月，3个共和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纪念那些曾在放逐与清洗中受到摧残的人们以及追悼因此而惨死的亡灵。在8月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每个共和国的首府都出现了几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

在日益强大的公众压力之下，首先是爱沙尼亚，接着是立陶宛，相继恢复了独立时的国旗与国徽。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当地共产党本身的支持，那些共产主义强加的禁忌在这些地区接二连三地被打破。

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民族主义”的要求，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人的，还是来自波罗的海各国的，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都会给利加乔夫们以及领导层中的其他保守分子以镇压的口实，从而使改革半途而废。按戈尔巴乔夫的理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改〔171〕革的完结，1989 年经选举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目标将落空，建立法制国家的目标将变成笑柄。

但他又不得不考虑国外因素。毕竟，他正处在结束冷战的道路上，且在 5 月份要会见罗纳德·里根，下半年会见密特朗、撒切尔夫人以及科尔，年底将到纽约在联大上发表一个试图震惊世界的讲话，同时还要确保新当选的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合作政策。对独立运动的镇压，尤其是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镇压，势必使他苦心经营的关系趋于紧张，重新回到与西方对峙的年代。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对分裂主义分子表示同情。他尚未准备使苏联政府结构的上层去主动结束这一政治结构。而且，他也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中重建资本主义的第一人。

所以他采取的是推诿的态度，试图发现一种使问题自然消亡的办法。

首先，他试着使当地各共产党组织都有一个全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出现。在 6 月到 10 月之间，他撤换了 3 名思想保守的党的第一书记，换上了更能与崛起的民主力量合作的人选。在这三个共和国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为同化这种改革运动做了不懈的努力。

其次，他于 8 月份派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访问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试图平息那儿的局势。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雅科夫列夫对利加乔夫坚持阶级斗争的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尽管雅科

夫列夫明白无误地拒绝了波罗的海要在海外设立大使馆以及另外发行货币的要求，但对其渴望自治的迫切心情则作出了理解和温和的反应。他的访问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看来等于是戈尔巴乔夫对其愿望的支持，从而使那里的民主力量也深受鼓舞。

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同情。当雅科夫列夫访问归来向戈尔巴乔夫私下建议不妨在一种邦联的框架内给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自治权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政治局其他成员，都不支持他的建议。[17]

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让步，还试图从宪法上限制它们退出苏联的权利，以对之进行钳制。10月份，苏联公布与新选举准备事项有关的宪法修正草案。令波罗的海沿岸三〔172〕国感到惊恐的是，这一宪法修正案规定，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不但有权废除被认为与联盟法律相冲突的共和国法律，而且有权同意或否决联盟共和国的退出行为。

三个共和国的反应证明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渗透到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内部。各民族阵线都对这一草案口诛笔伐，几天之内，好几百万人在抗议信上签了名（在立陶宛，签名的人占了整个选举人口的2/3）。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三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也对否决退出权的企图进行了谴责。要知道，这些最高苏维埃都是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且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走得更远。11月16日，它通过了一份主权宣言，宣称只要苏联的法律与爱沙尼亚宪法相冲突，它就有权推翻苏联法律。

直到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开始表明自己正式的，官方的立场。他召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要求否决爱沙尼亚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还痛斥爱沙尼亚议会欲控制爱沙尼亚财产以

及重新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

> 众所周知，私有财产是人剥削人的基础，我们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这种私有财产，所有的财产归于人民。这种恢复私有财产的企图是倒退行为，因而，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3]

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依职责宣布爱沙尼亚的行动无效，戈尔巴乔夫赢得了这一轮与爱沙尼亚议会斗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欲限制退出权的努力不得不暂置一边。从戈尔巴乔夫对私有财产偏激的评论来看，他还远未接受这一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概念。

然而，他对民族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抨击既没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没在高加索地区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民族主义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那里获得了力量。他们将很快在戈尔巴乔夫筹划的那场大选中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173〕

西部边陲共和国

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这三个西部共和国，虽然没有发生震撼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那样的动乱，也没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那种来势凶猛的全共和国范围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也已开始从依靠不断的压制来营造和维持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过来。这三个并入苏联最晚的共和国自然倾向于带头要求变革。

摩尔达维亚，连同西乌克兰及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只是在二

战后才被完全并入苏联的。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这些地区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就被划归苏联管辖，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变成苏联领土之前并不是独立的国家。

在这三个共和国里，首先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要求，是给予民族语言一个更加显著的地位。在白俄罗斯，随着大批斯大林命令之下的死难者的坟墓被发现，要求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模式组建人民阵线的运动进一步扩展。

在摩尔达维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加入了“支持改革民主运动”的组织，该组织在1988年夏于基什尼奥夫组织了一次有5000人参加的集会。这一运动赞同把摩尔达维亚语宣布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用传统的罗马尼亚三色旗来替代共和国的共产党党旗。

在乌克兰，尽管强硬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竭尽全力制止共和国内可能对共产党政策产生疑问的政治运动，但莫斯科的新立场使他不可能阻止仅仅限于在当地开展活动的某种“非正式小组”的形成，这种小组当时主要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活动。

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于1985年被释放出狱，返回他的家乡利沃夫，被安排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当司炉工。虽然1987年他才直接恢复政治活动，但在此之前，他就组织了一个称做“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的小组（主要是与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合作），且恢复出版了《乌克兰导报》，该报在乔尔诺维尔被捕前还是地下刊物。

1988年，他和同事开始组建一个机构庞大的组织，以协调几个规模不大的在野团体的行动。7月份，他们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原则性宣言。宣言把现行政策称为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彻底清洗”的政策，要求恢复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并用 〔174〕

独立国家邦联的形式来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

作为回应，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谢尔比茨基对他们进行了（用乔尔诺维尔的话说）“围攻”。[20]当局在利沃夫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来驱散示威人群。直到第二年，这些团体才得以组成一个全乌克兰范围的组织。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化组织中，包括乌克兰作家协会在内，要求给乌克兰语言的使用与发展以更多重视的情绪仍在高涨。

同样，在白俄罗斯，当明斯克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政府当局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然而，共和国的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学者仍组建了一个称做“再生者”的协会。正如其名称所示，它的主要目的是复兴白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一个名为“白俄罗斯殉教者”的协会里，该协会旨在调查斯大林对白俄罗斯人所犯的罪行。在明斯克附近一个名叫库罗帕基森林的地方发现了大批的坟墓，二战结束前夕，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曾在此地处决了很多人。虽然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次暴行，可市民们还是成立了一个市民调查小组。

这些民间小组还为 10 月 30 日筹备了一次盛大游行。尽管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政府还是召集了防暴警察，粗暴地驱散了示威群众，不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这一天，按常规允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游行活动，所以当警察干预这次游行时，组织者大骂政府当局卑鄙无耻。在莫斯科知名度很高的白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比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谴责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肆意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文章发表后不久，比科夫就参加了一个由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纽约和联大。他的参加是否得益于他对白俄罗斯当局的批评不得而知。他的知名度以及他与人民阵

线运动组织的关系使他没有遭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人身攻击，但白俄罗斯当局对公共聚会的骚扰仍未停止，也不承认人民阵线运动是个合法组织。

在1988年底，虽然这三个西部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运动都没有形成有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规模与声势，但却为今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切勃里科夫的排外情结

1987年和1988年，莫斯科一直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日益增强的自信感到无所适从。有些事情得到允许，有些虽反对但姑且忍之，有些则遭到了禁止和镇压，但始终没有连贯一致的对策。

然而，克格勃自有其明确答案。在1987年，当许多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示威浪潮（以前这种现象都是个别的，且为数不多）时，克格勃首脑切勃里科夫认为有必要公开表态。当年9月份，他在一次讲话中即指责是西方情报机构在煽动少数民族的情绪。[21]每当形势出现紧张时，这样的指责就会出现，虽然它毫无根据，但却是克格勃一贯的拿手好戏。

无论如何，切勃里科夫毫无根据的指责还是给他的组织带来了某种实际好处。通过把罪责扣到外国人的头上，就可使苏联情报机关首脑避免了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产党的尴尬。同时，他这样做也是警示那些批评政府的人，若他们“执迷不悟”，就有可能背上间谍的嫌疑。切勃里科夫1988年不断重复着这种指责，在苏联崩溃前夕他的继任者再次如法炮制。

不管民族骚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1988年夏，苏联领导

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两年前在第27届党代会上做出的如意判断证明并不明智。“民族问题”事实上并未得到解决。人们怨声载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正成为家常便饭。

〔176〕莫斯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利用提倡公开性这一契机提出变革要求并不感到奇怪。他们的不满对我而言也并不陌生。当时的事态确实有所进展，但我一时还无法预料其走向。

首先，莫斯科的改革者们开始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要求，并将之看成是推动苏联民主化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社会学家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鼓励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组织起来，争取它们自己的权利。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的法学家鲍里斯·库拉什维利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建议，在各共和国里建立一些组织来支持改革运动。他们认为苏联要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就意味着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以选择的自由，对此我完全赞同。他们不仅知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获得自由并不会损害俄罗斯的自由事业，而且，他们还自愿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设想，对此我深感鼓舞。

其次，自治运动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这显然使戈尔巴乔夫处于困境。如果他允许地方共产党支持自治乃至最终导致独立的要求，不就等于让它们脱离党在莫斯科的权威机构而自行其是吗？如果他坚持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服从莫斯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那他的改革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只能在以后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1988年，戈尔巴乔夫似乎想兼收并蓄，两条腿走路。在联大会议上，他谈论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选择自由；但在国内，他则倾向于给选择自由附加一些条件。

第 八 章 [177]

华盛顿摸索前进

我认为冷战还没有结束。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1989 年 1 月 22 日[①]

1989 年 1 月，乔治·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时的苏联明显已不再具有在境外维持一个泱泱帝国的能力。一旦东欧决定抛弃苏联的枷锁，戈尔巴乔夫除了接受事实之外，别无选择。任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企图都会使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生涯完结。刚刚从那场备受痛苦、不受欢迎的阿富汗战场上解脱出来的苏联人民，不会再容忍克里姆林宫再次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国外战场，去面临死亡的威胁。

我在 1989 年年初作形势回顾时，曾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年可为美国对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体制施加影响提供绝佳机会。我们的政策已经成功地使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成为苏联议事日程的内容；现在是我们施加经济影响的时候了。我们要摈弃以前在冷战时期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惩罚措施，代之以支持行动，把苏联带进 [178] 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合作伙伴。

里根时期所设计的四部分议程有意识地忽略了经济关系问题。那时，在我们看来，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必须等到苏联结束对阿富汗的干涉，结束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预，欧洲结束分裂，一句话，必须等到冷战的结束才予以考虑。同时，我们也想看看苏联大规模裁军的诚意，确信苏联领导层愿意尊重人权，愿意让市民对他们的政府行为有所制约。

到 1989 年 1 月，苏联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当时我认为，在经济领域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会加速苏联朝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经济合作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继续贯彻他业已开始的改革的意愿，但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和必要时直接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所带来的经济回报，也将有助于戈尔巴乔夫做出他所面对的困难决定。

我不是说要把美国纳税人的钱大量投入到苏联经济中去。这种办法不但政治上行不通，本身也是不明智的。靠外部资金的涌入无法治愈苏联经济。一套马歇尔计划对于苏联来说没有实用价值。1946 年战后的欧洲虽然一无所有，但经济复兴所需的基础设施还在，所以马歇尔计划能够拯救欧洲，这就如同有了一个水泵，才可以往里面注水一样，而苏联现在没有这样的水泵，实行马歇尔计划就如同往沙地里倒水。

不过，我相信美国政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鼓励苏联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以能源问题为例。70 年代欧佩克石油组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震撼了工业发达国家。到 1989 年，虽然石油价格得以稳定下来，但整个世界尚未摆脱依赖中东石油的危险局面。实际上，已知的世界最大石油储量是在苏联，只是苏联管理不善和技术陈旧，它的石油产量已开始滑坡。

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在能源生产领域改善外国投资环境，那么它就能吸引国外大量资本，不是作为外援，而是作为投资的资本。这对各方都有好处：苏联会赢来高效的能源生产和不断增加的外汇收入，西方投资者可获得丰厚利润，世界会保持更加稳定的能源价格，使所有消费者受益。 [179]

然而，只要苏联政府继续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实行中央控制，上述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应该劝说苏联政府使其石油工业从生产、加工到分配由富于竞争力的企业来管理。一开始，它们的性质可能还是国营的，但如果将其改组为合资股份公司，将来就会很容易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再拿农业来举例说明。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要向苏联出售 800 万至 2000 多万吨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的谷物。我们的农民已越来越依赖这项贸易。卡特总统上台后，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项贸易受到了限制。[②]然而，卡特政府的行为却引起了农业州的政治抗议。这项谷物贸易当时由短期信用贷款提供资金，政府“商品信贷公司”提供担保。虽然苏联一直是准时偿付所欠债款，但如果他们违约，这个损失就得由美国纳税人来弥补。

这种贸易充满了危机。首先，所有的这类贸易都要通过苏联中央机构进行，如果改革成功，这些机构就一定要被解散。其次，苏联政府外债高垒，除非短期内它的出口创汇出现转机，否则将很快无力支付外债。而当时苏联出口创汇形势前景暗淡。因此，如果美苏继续维持这种已经实行了将近 20 年的谷物贸易方式，那么两国都将蒙受重创。苏联将最终无力支付它的债务，美国纳税人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农民也将失却一个重要市场。如苏联因此出现粮食短缺，不仅会使更多人陷入苦难，而且也会给政治

领导人带来严峻问题。

当然，机会与危险并存。只要苏联改变它的斯大林集体化时[180]期的掠夺性政策，使生产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重新造就一个私有农场主阶级，它就能解决食品问题。只要苏联政府用一个私有的、开放的、富有竞争力的零售贸易体制来取代中央集权的、腐败的、官僚性的零售体制，它就能有效地分配粮食。在“社会主义”的官僚贸易机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往往已经损耗掉了40—50%。因此，一个现代的、私人经营的批发与零售贸易体制，即便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大大提高粮食供应。

有些人疑惑不解，为什么苏联解决粮食问题会符合美国利益？他们也许会发问，让苏联依赖美国的粮食出口，让美国农民从中获利，不是比鼓励苏联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更好吗？如果苏联改革真的成功了，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市场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鼠目寸光。首先，如果苏联改革失败，它的经济就会迅速恶化，也就无法长期支付同我们的谷物交易。这意味着目前这种局面也不会一直维系下去。其次，即便苏联农业产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因为消费者饮食结构的需要，它还得大量进口谷物饲料。苏联的气候不足以让它充分生产它所需要的粮食饲料，而美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农业生产国。这就意味着，当苏联生产面包的粮食满足了需求时，我们小麦的出口将因此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饲养鸡和牲畜的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将为之增加。

在我看来，问题不是美国帮助苏联改革农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我们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在农业、食品加工业、市场销售业方面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着重重的阻力。这些部门一贯奉

行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是其理论基础；它们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的利税高得惊人；它们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需的银行系统，没有投资资本来源，缺乏市场管理机制。一夜之间是不可能清除这些障碍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于是否要取消其中的某些“障碍”还举棋不定。但是，若有人向他解释市场的运营规则，我想他的态度是会有所转变的。

我认为有种方法似乎值得考虑。我们目前是通过提供信贷担保资助粮食出口，为什么不可以作这样一个调整，即美国直接在苏联以卢布出售农业产品，然后把卢布直接存放到由美国监督经营的投资银行里，再向从事食品加工业的农民和企业家提供资金 〔181〕 呢？虽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坚定地承诺在食品加工和分配领域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促使这方面业已开始出现的新思想取得进展。

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困难是，当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时，美国联邦财政必须对农民有所补偿。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利大于弊。因为，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贷款担保——在没有替代计划之前还得继续维持下去——从长期甚至中期来看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久而久之，我们的纳税人就会中止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我们就会丧失这个市场，美国在苏联也将不会得到公平机会，最终也就得不到当初投资的回报。

再以空间技术为例。苏联有兴趣参加世界太空运载市场的竞争。他们尤其想获取发射通信卫星的订单，也有意出租航空站。出于安全和商业的考虑，传统上我们总是试图把苏联从通信卫星市场（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卫星体系）上排挤出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贯政策进行一下反思。如果苏联

同意大幅度削减他们的弹道导弹，与我们一道加入国际社会，共同控制导弹技术的扩散，开放他们自己的火箭工业让外国人参观甚至合作，那么，允许他们参与民用市场开发不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吗？他们在卫星发射领域参与竞争可降低通信公司的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益，而且，共同利用他们业已建立的空间站，就不必重复同样的技术，为此也可节约广大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上述仅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支持苏联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实际利益的少数几个例子。除非美国拿出我上面所叙述的[182]那类建议，否则，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或者其他改革者能否成功地领导苏联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他们需要从西方得到前后一致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使转轨的痛苦可以承受，他们需要西方对具体的合作承诺给予支持。但为使这种承诺富有成效，并经受得起时间考验，它必须是一种合作关系，一种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而不单单只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我都不是专家，我深知这些领域错综复杂，需要比我更有知识的人经过仔细研究才能提出可靠的建议。我无意强求实行一些一旦失败只能招致不满的不成熟、不切实际的计划。但令我担忧的是，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国迄今还没有开始考虑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以使我们大家都得益于一个非军事化的民主的苏联。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官僚机构至今仍然陷在冷战时特别重要但现已无足轻重（实际上有时还起反效果）的问题上而不能自拔。

不久，新一届政府将在华盛顿上台执政，我希望新政府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加速那些在我看来业已非常明确且又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

乔治·布什接任

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在处理美苏经济关系问题上布什政府将会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富有创造性的面目出现。乔治·布什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两人都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有一大批商业界的朋友。他们都很讲究实际，不甘心成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俘虏，因为他们两人都了解由此带来的危害。但是，又不可能若无其事地忽视这种官僚机构，政策的执行还必须依靠它来进行。政府的官僚机构有一种惰性，总是喜欢墨守成规，因此，在执行新政策时，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我希望新总统将注意力集中在富于创新的政策上，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布什尽管在里根政府里已是位副总统，并直接参与了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制定，但他会希望在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打 [183] 上他自己的烙印。他不可能简单地沿袭里根的政策而没有一点变化；他将不得不采取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重大举措。

但是，在涉及苏联问题时，布什有一个里根没有遇到的不利条件：许多右翼共和党人对他不信任。里根不会受到来自右翼的阻挠，[3]但布什就可能遇到麻烦，在某些条约需要参议院投票表决时尤为如此，他必须获得2/3的票数才能使他所签订的条约得以通过。他与右翼脆弱的关系，使他不得不扮演硬汉形象，以取悦他的潜在批评者。

在互相接触的过程中，苏联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与里根打交道，做交易，而且1988年他们与里根发展了令人愉快的个人关系，他们甚至还希望里根再连任一届美国总统。当然，这是不

可能的。不过，他们很高兴，布什赢得了1988年大选的胜利。他们希望布什的胜利意味着美国政策的延续，而这一点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12月在纽约总督岛会见里根和布什时所强调的。

甚至在布什上台以前，我就意识到美国的政策势头可能有所收敛。尽管布什曾是里根政府美苏关系政策小组的成员之一，但他上台后仍将致力于寻找他自己的对策，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得小心翼翼，避免潜在的右翼批评家说他被苏联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有人说所谓的苏联改革只不过是个天大的骗局，旨在削减美国和西方的军备，从而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虽然事实上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因为改革是在削弱、而不是在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但这种争论的背后所暗藏的政治因素必须认真对待。

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华盛顿新政府在一开始的几个月会表现出强硬态度，同时拿出调整对苏政策的姿态，以向苏联获得更高的要价。如果这些努力能为新总统赢得今后从容处理对苏关系的自由，这种暂时的耽搁也是值得的。

尽管我没有接到与苏联人讨论这类问题（不会得到期望的结果）的指令，但我认为有益的做法是告诉苏联人，他们应做好准备，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可能会放慢，新总统上台伊始的一些强硬声明是为了消除某些人对他的批评，并不预示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我认为，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的最佳方法，是取得〔184〕一位对美国政策多少有些了解的苏联高级官员的帮助，让他来把我们的做法解释清楚。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部的重要帮手、曾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会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知道如何向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

乔夫解释，且有足够资格接近他们。

就这样，大选过后不久，我在斯帕索别墅邀请别斯梅尔特内赫共进午餐。当话题转到布什政府时，我告诉他说，我有些心里话要跟他讲。我说我确信布什总统上台后会在我们之间寻求扩大合作。但是为了淡化“布什软弱”之类的批评言论，他有可能会不时地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如果真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不应认为布什总统对建设性的会谈失去了兴趣，而应理解为这是他为了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而做的准备活动。同时，我也希望苏联领导人避免采取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同美国公众相对抗的措施，因为，这样做会使布什很难推行即将出笼的政策。

别斯梅尔特内赫向我保证苏联领导人无意搞什么对抗。相反，他们把关系的改善看得至关重要。他似乎明白我刚才所提的“可能的强硬声明”的含义，便提醒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面临着政治问题，从我们美国这边发出的任何不谨慎的措辞也会增添他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困难。

不过，在 1989 年的整个春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对布什总统的政策走向深感担忧。④虽然布什为了消除戈尔巴乔夫的疑虑，不时地向他做些笼统保证，并在执政几天后就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但美国的政策则倾向于裹足不前，并在某些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时值新总统评估形势、确定政策路线之际，苏联领导人对开始几个星期出现政策空隙能够理解，但对撤换里根对外政策班子的整套人马，并在 1989 年花好几个月时间搞“政策评估”深感不安。尽管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其他“美国通”努力使其上司相信，布什一定会恢复里根的和解政策，但是，那些对改进对美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如克格勃头目克留奇科夫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则抓住这种在莫斯科广为人知的“暂停”现

象不放，以此证明布什无意同苏联进行公平交易。

[85] 1989年1月，政府的动向已清楚表明布什将近乎彻底地更换里根对外政策小组的成员。就人员构成来看，这种更换更像是反对党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非前总统所属政党候选人获胜后的惯常做法。这并不令我惊讶。我在白宫毕竟工作过三年，了解“里根的人”与“布什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与党派政治毫无牵扯，我与他们两派的关系都不错。

不过，尽管我对布什撤换绝大部分的内阁成员和总统顾问团的成员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对他的这种组阁方式感到意外，这看起来像是充满敌意的夺权，而不是合作性质的过渡。在这转变时期我两度去华盛顿，只是陪同安德烈·萨哈罗夫拜访了还未上任的新总统布什外，却没能按计划与布什新任命的外交政策班子的领导人安排会谈。新的外交决策人员尽管经验丰富，对总的局势通悉明达，但对苏联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影响苏联局势走向的日益增长的潜力估计不足。我对自己没有机会与这些将来的政策制定者进行思想沟通深感沮丧。

我回到莫斯科后，着手让使馆工作人员对最近苏联事态的发展作一个全面评价，并设计一套方案，以便美国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当布什总统宣布要全面评价涉及对苏关系的美国政策时，我们已经给华盛顿呈送了好几份报告。

因为我无法当面向新的工作小组成员汇报情况，我决定尽快地、连续不断地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以便它们能在新政府的政策评估中及时发挥作用。尽管我身边拥有一批任何一位大使都会羡慕的最优秀的使馆工作人员，但作为领导，我还应作出我自己的判断。我也知道，如果不在实质内容上、风格上以及措辞的差别

上对所获信息进行我个人的处理，它就不能真正算作我的东西。

早在二战之前，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在一个名叫塔拉索夫卡的村子里拥有一块四公顷的土地，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度假之用，它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开车只需一个小时。我和丽贝卡都喜欢那里幽静的环境，在莫斯科工作的早期，我们常带孩子去那里欢度周末和庆祝特殊的节日。1981 年我负责使馆工作时，到那儿度周〔186〕末的次数就更勤了。大多数的周六夜晚以及周日都是在那里欢度的。

然而，自 1987 年我们重返莫斯科之后，就很少有时间光顾这座乡村别墅了。在莫斯科的公务或到各地的公务旅行，实际上占去了我的全部周末，就是节假日也无法休息。不过我明白，要想使我的建议在决策中产生实际影响，必须尽快将之呈交给新政府。于是，我停下 1 月份最后一个周末的所有其他活动，以便能去那座乡村别墅，在白雪覆盖、林木掩映的清静之地集中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星期五晚上，我与丽贝卡驱车向塔拉索夫卡驶去，带足了两天的食品以及一叠黄色的专用纸和一支自来水笔。我没带任何文件和读物。如果到那时脑海里对自己所要做出的分析与建议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话，再来填补已为时晚矣。

星期五晚饭过后，我在纸上写下准备建议的提纲，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每干两三个小时，就休息半小时左右，或在雪径上散散步，或用独轮车推点柴禾，或者干脆凝视着经过改造的壁炉里的火焰。这个壁炉是一位俄罗斯工匠按典型的俄罗斯式样改造的，已有几十年历史了。我的大部分建议就是在这样的休息中得以形成。

到星期日下午，我已准备好所要拍发的三份电报的详实提纲，

并草拟了前面两份电报。当天晚上，我拿着一卷散步时揣在风衣里、睡觉时掖在枕头下、早已变得皱巴巴的黄纸回到了莫斯科。尽管我不相信苏联人能从阅读我的分析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我还是决定不公开它。

第二天，我的秘书奇迹般地辨出了我的草书，并把它誊写出来。接着，我把两份草拟的电报和我的建议大纲送给主要的人员过目。我需要他们提出修正和建议，并补充一些意见。我们先在使馆的密室里进行了探讨；接着每个处室的负责人给我提交一份手写的备忘录。一直忙到那个周末，送往华盛顿的两份咨文才准备好。又花了10天的时间总算完成了第三份电报咨文。所有这3份东西，不论是从风格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我自己的，但没有我的同事的众多帮助，我也独木难支。

〔187〕 这三份咨文分别是关于三个方面的内容：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正在演变的苏联对外政策；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我认为苏联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然要考虑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苏联国内发生的一切，然后才能分析它的对外行为。

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革命。1988年苏共代表大会确立了很多目标，如建立一个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按步骤创设一个拥有真正立法权的、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大家对新观念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大众传媒对新思想进行公开报道，正式抛弃与西方为敌的意识形态基础，等等。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正在付诸行动，而这些行动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的体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苏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力量在滋长，他未来的政治命运也取决于改革路线的连续性，

但我感到当时他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局势。

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治生命。

即便戈尔巴乔夫被某些强硬势力——我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所推翻，他们也不可能在东欧使用武力，因为，这样会在苏联境内引起广泛的、甚至难以控制的动乱。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教条已经死亡，因为不管莫斯科的统治者意愿如何，它已不再实用。

我知道，华盛顿有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建议新政府不要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与精力。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已经显示出他有能力战胜批评他的人，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显示他的实力。我们不应后退，而是应鼓励他朝着符合美国利益以及苏联人民利益的方向进行改革，毕竟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与我们的利益并不冲突。即使华盛顿的那些人是对的，我们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帮助他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对我们也是有益无损。

还有一种观点令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个诱惑西〔188〕方的圈套，苏联企图借此恢复经济，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我们。[5]当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方式是在削弱共产党和军工企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只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其政府由人民控制的开明社会，改革才会取得成功。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机会把其 1/4 或者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充作军费的。

尽管我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并不赞成给他个人以政治上的支持。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可以挑选苏联领导人，那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只有苏联本身的政治运作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某些个人表示好感，这实际上反而会给他们在国内带来麻烦。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支持要针对具体的目标和政策。如果某一位苏联领导人出于本人爱好，支持我们也赞同的事物，与我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并且还从中为自己获取了一定的好处，这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的支持应是针对政策，而不是个人。

我建议我们应继续就里根时期行之有效的四部分议程进行谈判，另外再加上两项内容。原有四点包括削减军备、一起解决第三地的冲突、保护人权以及通过允许东西方之间人员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来消除铁幕。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实质进展，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再加上两项内容，即经济合作和在处理恐怖主义、毒品交易及环境恶化等跨国界问题上建立一种更密切的伙伴关系，我认为就可使上述进展进一步得到深化。

我知道经济问题尤其复杂。我们的政策所依赖的基础是，为防止苏联军事机器得到加强而限制对它的贸易和投资，因苏联限制其公民的移民权利而否定它的正常贸易地位。虽然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与苏联的变化保持一致，但除了自由移民的要求之外，我们从未明确过取消贸易和投资限制所需的先决条件。

我在建议中说，我们应该对促使苏联融入世界经济所应采取的步骤进行紧急全面的研究，紧接着就要考虑我们有可能采取什〔189〕么措施去鼓励苏联形成一种消费者取向型经济。我希望我们能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加强同欧亚盟国的协商，以便使我们在处理这个日益国际化的重要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互相协调。如果我们能

及时完成国内的准备工作，秋季我们就可让苏联领导人同我们商谈双方可能采取的合作举措。如果他们愿意减少对美国及我们盟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并以现实的态度加入世界大家庭，那么我们就可在关键时候给他们提供支持，使其预定进程得以顺利进展。

我的另外一项建议是双方每年召开一次峰会。这会使我们的领导人保持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给谈判进程注入活力。然而，这种峰会却一再推迟，其原因是政治领导人担心每次会谈若达不成某项重要协议，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

我理解双方面临的那种潜在政治难题，但我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在于每年定期会面。如果出现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会谈，也可另行安排，但一年一次峰会决不过分。届时，公众就不会期待每次峰会都必须出现一次签字仪式，而会将之看成是处理外交关系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我的第三条建议源于苏联境内许多地区出现的严重分裂主义倾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以及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馆一直在密切注意这个多达 100 多个民族、横跨 9 个时区、民族与地区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的动向。就我们一个规模中等的使馆以及一个小得可怜的领事馆而言，要想给予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以必要的注意，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我建议在苏联各共和国首府开设几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安排 4 至 5 名工作人员。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踪事态发展，展示美国存在，并不需要什么秘密材料、保密会议室及密码咨文。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递送什么绝密报告，他可以到莫斯科来，从使馆寄发出去。

美国国务院负责苏联问题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咨文很受重视，很有实用价值；对新一届政府在对苏关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上都 (190) 进行了一流的分析。然而，事实上，除了那条要求把一些跨境问

题纳入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外，我的所有其他建议似乎对随后几个月逐渐出台的政策影响很小。特别是，拒绝利用经济压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加快裁军和市场改革的建议遇到了强大阻力。

东　　欧

正当我忙着给新政府起草建议时，我从国务院的同事那儿获悉，国务卿贝克正在认真考虑与莫斯科就东欧的未来进行商谈的可能性。这种考虑源于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想法。曾有人告诉我说，基辛格认为东欧很快就要爆发反叛事件。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达成谅解，那么这场反叛就会直接导致混乱，或许还会导致苏联的干涉。

基辛格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并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尽管基辛格没有与我谈论他的想法，但我推测，他一定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得到鼓励。因为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把美国拉到一起来商谈东欧未来问题，不管美国的立场如何，这种会谈都会让东欧的“民族主义者”感到灰心沮丧。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基辛格并不想承认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是合法的，但一旦发生了这种会谈，也就恰恰从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点。这种会谈，往最好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在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往坏处说，会被认为是超级大国企图重新瓜分东欧。

我完全了解那些赞成与莫斯科商讨东欧问题的争论。华沙条约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这几个“北部边层”国家，表面上仍然处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形势却是

一触即发。一旦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并导致苏联的干涉，就会重现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事件；或者会出现由苏联支持的民族共产党政府当局宣布戒严的局面，就像1981年波兰出现的情形一样。这样，改〔191〕革的整个进程以及已经缓和了的东西方关系就会中断，就会出现大量的流血伤亡，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危险的升级。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出现。

不过，我反对同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协商，理由有两个。其一，我认为不可能再出现我们过去所见所闻的由苏联指使的那种镇压活动，这一点勿庸置疑。尽管苏联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莫斯科已无意在东欧地区恢复使用武力。入侵阿富汗已经证明这样做会在社会舆论方面付出惨重代价，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国家从这场失败的冒险中解脱出来。要继续贯彻他的全面改革计划并巩固其目前的政治地位，他就不可能再贸然于欧洲中心地带引起军事对抗。

其二，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将鼓励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沿着他试图在苏联推行的改革路线着手东欧国家的改革。如果他真地将之付诸实施，东欧各种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有可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但等到苏联领导人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实。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只会有损他们在国内的统治。

在这种态势下，由美国提出就东欧未来地位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只会导致人们认为美国阴谋限制东欧人民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东欧人一旦获得了对自己国家的控制，他们就不会再容忍任何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无权这么做，而且——回顾一下

我们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这么做等于在出卖东欧的民主力量。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与苏联会谈时应完全回避东欧问题。我们需要表明的是，我们对该地区没有任何企图，我们也无意于在华沙条约国寻求独立后，向东扩大北约组织，我们同时也应让戈尔巴乔夫明白，如果他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的民主进程，那么一夜之间，业已改善的东西方关系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东欧的未来进行专门的商讨，这些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的接触中谈论。

〔192〕 鉴于这些理由，我加入了国务院东欧室与苏联室的大辩论，我竭力反对被标榜为“基辛格首创”的这个建议。我是4月下旬回到莫斯科的，当我听说国务卿贝克已经决定放弃与苏联就东欧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

苏联对外政策的再生

正当布什还在全面回顾政府政策之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修正与他国关系的运动，目的是以真诚合作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取代传统的武力和威胁政策，运动最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他首先履行自己的诺言，于2月15日从阿富汗撤走了最后一批苏军。紧接着，频频向西欧抛出绣球。他发起了一场营建“共同欧洲大厦”运动，4月份出访伦敦，6月份波恩，7月份巴黎和斯特拉斯堡，10月份来到赫尔辛基，11月份又到罗马进行访问。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为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武器积极

活动，加快北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谈判。事实是，他在谈判中对西方的要求尽量爽快地予以满足，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在我们盟国内部引起了相互协调的矛盾。因为有些西方国家原以为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他们的建议与要求，一旦苏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有些盟国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要价是否太低了。

正当东欧以及东西方关系之类的话题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时，戈尔巴乔夫还抽空出访了其他一些与之有问题的国家和地区。5 月份他访问了中国，从而清除了 20 多年来因苏中之战而遗留下来的战争阴影。他还在这一年出访了古巴和东德。在国内，他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外国来宾。

与西欧和美国关系的显著改善得益于苏联早期政策的变化。然而，只要那道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还存在，谈论"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戈尔巴乔夫 1988 年在联大会议上承认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并且宣布，这种自由不附加任何条件。1989 年，东欧使他的承诺受到了真正考验。

在自由门槛前的东欧

〔193〕

1989 年春，在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曾明确表示，期望他们在国内效仿苏联正在推行的改革。当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清楚这种表态所蕴含的意义。

我当时的推测是（现在仍然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在东欧的脆弱地位很不满意。当然，他知道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同莫斯科的体制一样，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他感到遗憾的是，苏联 1968 年

入侵捷克，镇压了他们想建立“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同时也使苏联意义重大的改革延缓了20年。但他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可以得到改正，苏联镇压行为导致的后果证明了当时捷共总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发表的看法。对杜布切克的看法，他不仅表示认可，而且希望给予充分肯定。

令戈尔巴乔夫无法理解的是，在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已失去了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希望，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政体，而且还因为它们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事实上，在从匈牙利到波罗的海的“北部边层”，他们之所以能掌握政权，只是因为他们有苏联坦克的支撑，一旦失去这种支撑，或使之失去作战能力，他们也将必然垮台。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之所以不理解他们在东欧的脆弱性，不仅因为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东欧人民普遍仇视共产党这一客观现实，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东欧实际情况的了解受到了可悲的误导。

苏联情报组织为其分析专家收集的有关华沙条约国的情报堪称无双。每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克格勃样版组织，它们接受苏联官员的训练，对其莫斯科同行附首听命。每个国家都有付钱的与不付钱的线人网络。可是，这种体制却既不能向其本国的政治领导人，也不能向其莫斯科主子提供准确的信息。

〔194〕 为什么？因为其领导人所提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还因为谁提供真实的情报谁就会大难临头。作为领导，他们认为谁怀疑他们的政策，谁就是不忠——怀疑者在这点上通常是正确的。同时，他们还自以为是，认为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至于这种看法，他们是大错特错。

对于这些傀儡领导人的好大喜功，苏联在东欧的代表们很少予以纠正，因为他们自己也置身于这种体制之中。苏联派驻华沙条约国的大使常常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党的官员，这与美国外交界出于政治原因而任命的官员类似。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业绩赢取了这份工作，而是凭着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治局发现他们呆在国内影响不好时，往往就会将其派到国外，过舒适的流放生活。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一技之长，但对于其他领域却难以胜任。可他们与上层有稔熟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是位才华横溢、工作勤勉的职业外交家，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之后他担任了苏联外交部长。

有一次，他对我说，1989 年东欧巨变震惊了莫斯科，因为驻东欧的苏联外交人员没有向莫斯科提供有关东欧形势的准确情报。当外交部得到有关民众不满的消息并问及此事时，这位职业外交家解释说，苏联大使回来总是这样说："我昨天还刚刚见过昂纳克（或胡萨克或雅鲁泽尔斯基）呢，他说一切都好，我们不要受西方宣传的蛊惑。"

苏联在 1956 年、1968 年对东欧的干涉及 1981 年胁迫波兰宣布戒严，都给东欧人民留下了创伤。经过 1989 年最初几个月的时间，东欧人终于认识到，现在他们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了。当戈尔巴乔夫 1989 年春天访问东欧期间敦促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改革时，东欧人民看到了机会。

在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是于 1989 年 8 月在波兰成立的。苏联新闻媒介对它的反应非常客观，引人注目。有些评论员实际上是在欢呼这种变革。谢瓦尔德纳泽很快就出访了华沙，而且邀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这位新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并

向他表明，克里姆林宫已不再坚持苏联阵营里只能接受共产党政府这个教条了。那种坚持认为在其他国家维护“社会主义”乃苏联之义务的勃列日涅夫教条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历史。[195]

首脑会议的推迟

一二月份草拟建议时，我还认为，新政府会毫无疑问地采纳举行年度首脑会谈的想法。对于安排这种首脑会谈曾遇到的困难，布什总统是清楚的，他在里根政府时期就曾主张这样的首脑会谈要经常举行。我认为应把会谈安排在暮春或初夏，这既可使布什总统有充分时间完成政策评估，也可向戈尔巴乔夫表明，布什真心希望保持1987年与1988年由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

3月份，在回华盛顿述职期间，我拜访了布什总统，并在向他简要汇报了苏联选举情况之后提醒他说，确定一个首脑会谈日期，达成一年一度举行会谈的协议，对美国有利无害。然而，他的反应令我吃惊，好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事。他问道，难道苏联就不会利用这种首脑会谈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在军控谈判中作出让步吗？我当时安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当初他们就有这样的企图，但我们顶住了压力，现在我们仍然有能力顶住这种压力。

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民众的期望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会议没有达成一项重要协议，那么媒介就会给它扣上失败的帽子。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向人们解释清楚，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达成某种

协议。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定期召开首脑会议，民众就会把这种会议当成正常的外交活动，而不再期望每次都能达成某种重大协议。我还说，如果我们拖得太久，人们的期望值就会上升，而且，我们还会因此丧失在苏联处在剧变期影响其政策的绝好机会。

总统在结束这次会谈时说："好吧，我们研究一下。"但他的口气表明他并没有理解尽早举行这种首脑会议的迫切性。

我6月份再次来到华盛顿。苏联室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察觉出任何迹象表明白宫考虑要尽早举行首脑会谈。因此，我找到国务卿贝克，再次重申了我3月份的请求。我对他说，我已经觉察到了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困惑，他们对我们花这〔196〕么长时间来制定政府政策感到意外，对将要出现什么结局感到迷茫。尽管国务卿和总统不时作出一些泛泛保证，说我们也希望改革获得成功，并将继续努力改进两国的关系，但莫斯科一直都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建议。在我看来，目前存在着这样的机会，既可实现美国的许多目标，同时也可推进苏联的变化，从此结束冷战，发展更加广阔的伙伴关系。但这需要总统亲自来筹划，需要总统亲自与戈尔巴乔夫打交道。首脑会议拖得越晚，我们丧失的机会也就越多。

贝克明显对我的陈述发生了兴趣。可当我们离开国务院赶往白宫准备向总统本人作一个简报时，他却让我把话题限制在只谈论苏联的局势上，不过快到白宫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在进入西侧大厅门时，他说，"等等，杰克，何不把刚才对我说的有关首脑会谈的话也对总统讲一讲呢？"

我真的这样说了，这次，我的话看起来是确实引起了总统的兴趣。布什总统让工作人员好好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向他汇报结果。

然而，白宫和国务院对我的扩大经济关系建议的反应却并不怎么积极。贝克似乎怀疑戈尔巴乔夫主要感兴趣的是如何努力巧妙地进入关贸总协定这样一些国际组织，一旦进入这些组织，他可能会扮演一个掠夺者的角色。他还担心，任何扩大贸易的主张都可能导致右翼反对派的攻击，批评布什政府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白宫有些人甚至担心，这样的主张将会削弱国会对政府国防预算的支持。

国务院苏联室的专家们明白，现在是我们能给形势正在发生演变的苏联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如果放弃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就会丧失扩大美国利益的一次机会。但是，这些专家们的辩论无济于事，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每个政策制定者似乎都有一个堂皇的借口来坚持冷战时期限制对苏贸易、投资及技术出让的传统。他们中没有人愿意冒险，哪怕是研究一下〔197〕我们如何支持苏联的经济转轨，帮助它从一个国家经营的、军事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向一个以市场原则为指导的、以生产民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悄无声息，对苏联国内问题又麻木迟钝，令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愈发感到不安。在1988年12月的联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宣布准备削减军备，采取军事防御战略，但美国新政府非但没有在中途安排与他会晤，实际上反而在悉数接纳他每一个让步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要价。华盛顿的态度令人费解。一方面，布什和贝克常常说，他们愿意改进与苏联的关系，希望其改革获得成功；而另一方面，包括斯考克罗夫特、他的助手罗伯特·盖茨和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在内的其他人却强调美国要保持警惕，并不时在公开场合暗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这些言论免不了要在苏联的传媒中出现，从而给戈尔巴乔夫大规模撤军的努力制造了巨大障碍，当布什宣布他要出访匈牙利和波兰并将着手讨论是否有必要从东欧撤走苏联军队时，戈尔巴乔夫愈发焦虑。这么做当然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面临国内各种压力之时，公开宣布这件事只能适得其反，弊大于利。最后，在7月上旬，戈尔巴乔夫利用一次社交机会，让我给布什总统捎个口信。

1989年的7月4日是星期二，由于我们计划邀请苏联和外交界的客人前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单独抽出7月2日星期日的时间，先为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在莫斯科的其他美国人提前举办了一次传统的国庆会餐。另外，我们还在那个星期日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由范·克莱本公开举办一次个人音乐会，这是他近20年来第一次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音乐会。自从他在1958年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中获得大奖之后，他在苏联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他突然宣布准备返回莫斯科，并举办一次公开音乐会，这令莫斯科人和美国人都很兴奋。

除了一些应到的客人如国家部门或党的领导人之外，戈尔巴乔夫也来参加这次音乐会。他们这些人一般晚上是不参加公共集会的。听众把他们的出席看成是对一位卓越的美国钢琴家的尊重，〔198〕同时也是一种支持苏美两国建立更加密切文化关系的表示。在音乐会间休期间，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助手前来邀请我和丽贝卡在音乐会之后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人聊聊天。

当演出结束的掌声还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们就被领到总统包厢后面的一间私人招待室，戈尔巴乔夫在那里接见了范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乐队的其他成员。他们用香槟、鱼子酱及其他一

些小吃招待我们，我们为两国的友好关系举杯相庆。范问戈尔巴乔夫他能不能在莫斯科买幢寓所，戈尔巴乔夫说他要以个人名义同莫斯科市政府好好交涉一下此事。

大约这样轻松地谈了半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和赖莎先走了，因为在音乐会之前，他获悉安德烈·葛罗米柯去世了。他们想在回家之前慰问一下葛罗米柯的家属。当客人陆续离开时，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房间的一角。

他对我说："杰克，我有话想让你带给总统。"我一口应承下来。他接着说，他们目前正处在"一段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时期"。他决心推动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反对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他认为他的改革将为改进苏美关系扫清道路，他相信布什总统明白并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然而，华盛顿最近发表的声明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你告诉总统，请他体谅一下我的苦衷。他说的话在这儿有影响。"

他在讲话中用了一个俄文词 внимательный，除了有"体谅的"意思之外，还有"注意的"和"深思熟虑的"的意思，在这里，根据前后语意，我觉得"体谅的"一意更贴切一些。我一时确定不了他具体指什么，就试图探问出他的意图，我说："我肯定会把话带到，不过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也好让我给他举出例子？"

"这没必要，你只对他说，有些讲话把这里的事情搅乱了。如果他真想帮忙的话，他应该努力体谅体谅他人。"

我向总统传话时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行动或是什么讲话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但我猜想可能是随着总统出访匈牙利和波兰的日期迫近，总统以前有关苏联从该地区撤军问题的讲话惹怒了

〔199〕戈尔巴乔夫。不管布什主观上多么希望如此，但这种公开催促，不

但不会使戈尔巴乔夫轻易同意，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也许，戈尔巴乔夫担心总统在访问期间可能会就这个问题与东欧领导人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

当布什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立刻保证说，今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时，他一定要多加注意。他授权我去更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样做的话。可是，当我向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这个意思时，他通过外交部传话说没有这个必要。是别斯梅尔特内赫给我传的话，他说戈尔巴乔夫可能在每天必读的简讯上看到了什么东西激怒了他，这几天他一有机会就对我大发雷霆，三天来一直是这样，目前看来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想进行这种交流。

不管怎样，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确实起到了他意料之中的作用。布什在东欧访问期间有关苏联在东欧作用的评论，是专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的，为此谢瓦尔德纳泽还让人传话给布什，对他在访问期间的“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满意。

在布什出访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我们终于说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一次首脑会谈。布什还私下里托人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他的建议，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正好在华盛顿拜访他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作为信使，因为他担心通过国务院来传递这个信息会泄露出去。连谢瓦尔德纳泽一开始也不知道，当他后来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恼火。

尽管这种失策没有造成什么长久的不利影响，因为布什总统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失误，但这件事暴露了布什一个令人遗憾的嗜好，他总喜欢给新闻界撒点“惊讶”的胡椒粉，玩些小孩子的恶作剧。有时他甚至连一些芝麻粒的小事也对他的工作人员保密，这常常弄得他们张皇失措，无法进行充分的准备。有关布

什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晚些时候将要会谈的消息，其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连美国对其最绝密的武器所做的保密工作都自愧弗如。尽管我尊重总统对这次会晤进行保密的愿望，我知道总统希望直到正式宣布时才公开会谈消息，而且，我本人也尽力保守了这个秘密，但对保密的理由我还是很费解，早点让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谈计划对美国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损害？我不得而知。直到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一天，华盛顿才公布有关消息。

〔200〕 到了那年夏末，华盛顿似乎一改它早已习以为常的拖拉作风，着手为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工作，同时，美国还提出了一条新的重要建议，希望大幅度削减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力量，这表明靠总统的领导才能够产生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果。[6]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他的领导权威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战略武器谈判问题早在里根执政的八年时间里就一直有人在研究，而且，布什任命的一些官员对这个问题也相当稔熟，但是，战略武器的谈判由于布什政府还不清楚它到底能从这项协议中得到什么而陷入僵局。当时，也没有一位高级官员认真思索过要活跃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直到谢瓦尔德纳泽 9 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催促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以及 12 月份的马耳他首脑会谈之后，经济问题才被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

当华盛顿正在忙于理顺它的政策时，苏联的局势已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第 九 章

〔201〕

算数的一票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改革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我们的国家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 5 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党在选举中失败了。

尼古拉·雷日科夫　1989 年对政治局的讲话②

1989 年 5 月 25 日注定成为莫斯科的历史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这种选举还不完全公正，还不是完全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将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厅里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俄罗斯自 1918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代表议会。

外国大使们也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我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事务挤得满满当当，不过，幸运的是我总能按时赴约，当然提前是不

太可能的。但是，这次我让秘书取消了9点以后的所有其他活动安排，我想早点到克里姆林宫去，这不仅是为了能在外交人员座席中占个好位置，而且还为了能有几分钟时间会会已到的代表，与他们聊聊天，体会一下那种氛围。

临行前，我很周到地在我的卡迪拉克车的右前侧插上一面星条旗。我的车顺利通过布罗维茨基大门，然后，驶过修饰一新的雄伟的克里姆林宫和环绕在皇宫广场四周的宏伟的15世纪的教〔202〕堂，向左拐，又经过政府大楼，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的办公室就在里面，接着来到了20世纪的国会宫面前，四周的墙面都是用清一色的大理石和玻璃砌成的。

这座国会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思想产物，其建筑风格与紧挨着的克里姆林宫很不协调。我和丽贝卡在1961年第一次游览莫斯科时还参加过它的奠基典礼。对这座建筑的出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至今还在扼腕痛惜：在俄罗斯，怎能容忍最古老的历史古迹受如此武断的现代建筑的玷污?!密斯·范德罗厄和埃罗·萨里宁拙劣的模仿品怎能在俄罗斯历史灵魂的圣地有其容身之地?!

这种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不是一座一气呵成的建筑。国会宫容纳了五个世纪的风格，其各部分的结合还算和协，但无论如何，这个粗糙的长方形盒状建筑还是与其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俄罗斯在20世纪把它的首都从彼得大帝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迁回到莫斯科，批评者说，尽管20世纪的建筑可在这座历史圣地赢得一席之地，但它也应体现出对过去的足够尊重。

俄罗斯的爱国者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建筑美学的批评上，他们说，如果20世纪的建筑非要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旁边拥

有一席之地，它也不应是一座为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悲剧即布尔什维克革命歌功颂德的纪念堂。毕竟，这座国会宫是为召开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而建造的。

然而，今天，这里召开的大会却不是共产党的大会，实际是要召开一次制宪大会，是一个负责为苏联创建一套全新体制的新机构。

我原以为应邀而来的外交人员将被安排在楼厅上就座，就像以往邀请外国客人来参加庆典活动一样，然而，令我惊喜的是我被带到了礼堂观众席左侧位置较高的地方就座。这里角度极佳，我既可看清正式讲台，也可看清与会的代表，他们在大厅里的就座位置相当于美国剧院的"乐队席"。

在我坐候10点钟的会议议程开始的时候，我出生前11年所发生的一件事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立宪会议在1918年被粗暴解散。当时的那个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历史上由普选形成的第一个机构，其目的是为后沙皇时代制定一部新宪法。颇令人深思的是，〔203〕1917年11月选举之前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们在那次选举中的得票率还不到1/4。经过了一天的考虑之后，军队解散了议会，因为在这一天，大多数议员不准备支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迹象已很明显。解散议会期间，有两名议员被打死。

列宁带着对他遭到失利的选举的蔑视，终止了所有民主程序的伪装。他的态度明确显示，不管他是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都要牢牢握住统治权不放。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合法性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而非基于人民主权之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个靠武力来维持的警察国家。

有时我想，如果列宁是个讲求民主的人，那么俄罗斯乃至整

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他愿意承认他的党派属于少数，只有说服大多数民众在投票中予以支持，他的党才有资格统治国家，那么，列宁就可能在建立国家宪法秩序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从而就可能避免那场内战，避免来自西方的敌意，避免依靠恐怖来治理国家，以及避免那种把斯大林变成暴君的独裁政体。

每当我的思绪这样信马由缰时，我的儿子戴维14岁时所说的话就回响在我的耳边。那时，他对军事历史着了魔，尤其是二战史。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希特勒入侵苏联一事，我当时说，如果纳粹在所“解放”的苏联地区没有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当成劣等民族，如果纳粹没有对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那么他们就可能牢牢地占据苏联，并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

我儿子看着我，很是迷惑不解，他问道：“换句话说，爸爸，如果纳粹不是纳粹的话，那么事情不就不一样了吗？”

真是太精辟了。如果纳粹不称为纳粹，如果布尔什维克不称为布尔什维克……20世纪史无前例的悲剧的发生，其原因也正在于纳粹就是纳粹，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皆本性使然。

一个代议制政府

我现在就坐在这幢由布尔什维克人为这个党的执政机构建造〔204〕的建筑里，但今天我将目睹一个全然不同的议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选举出来的；它握有正式的权限以建立一套全新的宪法体制；它是在党的领导人授意之下产生，并由这个党组织起来的。

我能否目睹戈尔巴乔夫为列宁反民主的原罪赎罪的情形呢？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吗？

我脑海里一边翻腾着这些思绪，一边看着代表们川流不息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着熟悉的面孔，一旦四目对视，就会忙不迭地相互致以问候。大厅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在分享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正在参与一个历史将为之改观的盛会。

大会于10点整正式宣布开始，先由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宣读选举的结果。这份宣读结果的报告长得超出了必要，有些代表已面露不悦之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大会主题。选举结果念完之后，大会第一项是投票通过主席团成员名单，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拉脱维亚的代表走上讲台，他建议在此之前先默哀几分钟，以纪念第比利斯4月9日和平示威游行中死去的人们，他们是在军队驱散的过程中丧失生命的。他继而要求正式向代表大会公布究竟是谁命令军队使用有毒武器来驱散人群，这些有毒物质又是什么。

这是大会所始料不及的。难道这次大会的代表们能充分左右这次聚会？这看起来有点不太可能。戈尔巴乔夫无疑自有打算，尽管他允许大会有些许的偏差，但一部分人可能期望他把整个大会纳入早已设定好的轨道。

主席团成员内定名单按时获得通过。但在大会对具体议程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我看到驼背高个子安德烈·萨哈罗夫健步走上讲台。这也出乎大会组织者意料之外。我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萨哈罗夫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但现在大会正式辩论还没开始，我对他此时究竟想说些什么更是感

到好奇。但对我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作为一名大会代表，他是否真正有权积极参与大会的每项议程。哪怕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只是确立了萨哈罗夫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05〕 萨哈罗夫从高加索回来之后，我只拜访过一次，时间也已相隔近两年了。尽管苏联媒介对他很少报道，但他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首都以外出现麻烦的地区，仍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⑨

戈尔巴乔夫对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他看成是难以捉摸的远房亲戚，但又不能把他从整个家族中完全排除出去。因为他喜欢招惹是非，所以戈尔巴乔夫对他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不鼓励他来参加大会，当他来参加时也不对他过分亲热。早在1989年，乐观的萨哈罗夫就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失去往日的光彩，这比戈尔巴乔夫下台早了两年。虽然如此，他当时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他自己的建议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选择正确的道路，同时尽他所能给戈尔巴乔夫以支持。

现在，这位萨哈罗夫就站在讲台上，作为这次神圣的大会的一名全权代表，他要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演。尽管戈尔巴乔夫面露愠色，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发作。

萨哈罗夫说他要代表“一部分莫斯科代表”讲几句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条莫斯科代表们认为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条，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不应把它看成是低一级的最高苏维埃，它应享有全权的立法权威；第二条，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国家新元首的选举不应像事先安排的那样在会议之前进行，而应在会议结束时，也就是在完成所有议题讨论并考虑了所有潜在候选人之后进行。在提出这条建议时，他表明立场说他本人支持戈

尔巴乔夫当选主席，但他认为在讨论之前进行选举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

萨哈罗夫讲话时，大厅里一片嘈杂，以致最后无法听清他的讲话内容。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发言，说每位代表只有五分钟讲话时间，萨哈罗夫应该结束他的发言了。紧接着在进行投票表决时，他的建议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内心很复杂。一方面，允许萨哈罗夫甚至在议程安排的辩论之前发言，这是令人鼓舞的；可是另一方面，大厅里的对立情绪却是一个不祥征兆：代表们的精神状态表明他们的思想并不开放。

同时，我觉得萨哈罗夫和他的同伴并未对其发言选定的主题作出准确判断。不管戈尔巴乔夫已经变得多么自由开放，萨哈罗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还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我怀疑他讲的两个问〔206〕题是否真正就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就不能等一等，而利用他所得到的有限时间讨论一下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问题，我对此迷惑不解。

我明白为什么萨哈罗夫会提出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立法这条建议，他正是考虑到了这次大会是真正选举出来的大会这个事实。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至少从理论上讲更易驾驭，其成员的责任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选举人团体。

然而，我却深深怀疑这样一个拥有2250名成员的立法机构的办事效率，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其他的专门工作，因此很难聚在一起开会。另外有一点我不清楚的是，难道规模小一点的机构就比大一点的容易驾驭？我认为，机构不管大小，都应该由一批专职的立法成员组成。如果说他们只有放弃其他工作，才

会充满热情地来维护这个立法机构的独立与特权，那么这样他们的热情程度难道不是比偶尔参加一次会议要高得多吗？

当时在我看来，这种由人民代表大会和经其选出的最高苏维埃组成的双层结构所带来的缺陷，可以由大会期间即将草拟并通过的新宪法得到最好的纠正。这也是一个最好在当场予以充分辩论的关键问题。

至于萨哈罗夫的第二条建议，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言。戈尔巴乔夫将当选这个有争议的职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的辩论也无济于事。连萨哈罗夫本人不是也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吗？然而，这么做也确实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我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可以轻松地接受这条建议而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害。

这场短暂的交锋使我进一步看清了两人的某些重要区别。尽管萨哈罗夫对政治手腕这门艺术有很强的领悟力——这往往能使一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如愿以偿，但他对重要原则的辨识力却不及他对政治艺术的领悟力，他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观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即戈尔巴乔夫，则是个执拗之人。一旦认定某条路，他就会坚持到底，而完全排斥其他可能性，并利用所掌握的全部操纵性技巧来获取某种东西，而对这种东西他本人并不见得有着浓厚的兴趣。戈尔巴乔夫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棋手，因为他不会为了几步之后能吃掉对方一个马而现在牺牲一个卒。

〔207〕 5月份的这天上午，我确实浮想联翩。在进一步对这个新产生的国会进行探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剖析一下新国会的成员，以及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这种资格的。他们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与过去苏联国会那些掌握着枯燥无味的橡皮图章的人是不是一脉相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必须回顾一下

这次大会之前的那场选举战。

1989年的选举运动

我确信，当1988年12月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新的选举章程、上一届最高苏维埃又将之制定为法律条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坚信不会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不错，他们在选举之前确实要通过一个提名过程，并受到强烈鼓励（尽管并非绝对要求），要他们为每一个职位指定一名以上候选人。但这些选举上的技术性处理当时在他们看来决不会失去控制。由于各地党组织将掌管各选举委员会，他们能够主导整个提名过程的走向，并选出一个即便是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也绝对不会失利的候选人名单。

在许多司法管区，尤其是在农村管区，一切都按其所料顺利发展。但在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主要的大城市，官员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大惊失色。

共产党命运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就发生在首都本身，在这里，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为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他不得不与党的机器以及戈尔巴乔夫进行较量。戈尔巴乔夫就置身党的机器之后，只是偶尔露露面，表明他在操纵这台机器。

叶利钦自从被赶出政治局之后，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他已经感觉到这次选举是他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因为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选举，它有可能通过无记名投票为否定共产党的统治打开通道。

如果提名是根据人民的支持程度而定，叶利钦可以在这个国

家任何一个选区获取提名。然而，提名的过程远非这样的简单，确认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由当地党组织控制，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他们所喜爱的候选人不会遇到任何大的麻烦。

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叶利钦首先在家乡乌拉尔一农村地区〔208〕借偶然出席当地一次关键会议之机获取提名。而这一切都是在当地党的官员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所寻求的目标比这要重要得多。他把目标集中到了全国政治上最能有所作为的地区，即国家领土第一区，它包括整个莫斯科市600万之众的选民。在那儿开展选举运动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倘若叶利钦取得了胜利，仅就人们偏爱宠儿这一规律而言，这种胜利就不可能被篡改。更进一步说，在莫斯科获胜，还将使他尝到战胜该市党组织的快意，毕竟，是他曾领导过的这个组织将他清除并使他受到侮辱的。

最终确认候选人的公开会议就安排在圆柱大厅里召开，该厅在位于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外边的一座历史建筑物内。早先，这幢建筑是莫斯科贵族的俱乐部，后来被改为官方贸易联盟组织的办公地点，并由此得名为联盟大厦，但常常被派作政府组织的活动场所之用。30年代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曾在这里怒斥斯大林的的政治反对派，并最后以明显错误的指控判处这些反对派死刑；在这里也曾停放过许多领导人火化前的尸体，如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88年也正是在这里表演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曲》，那是自1917年革命以来这首浑宏的合唱乐曲首次公演：由于它有很深的宗教含义，直到提倡公开性时才被允许公演。

最后的提名大会于2月22日召开。莫斯科党的官员谨小慎微地仔细安排了此次会议，以期使这次会议既能体现民主气氛，又

能实现预定的结果。虽然登台演讲者包括叶利钦在内共有10名候选人，但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经过了精心挑选，目的是确保吉尔汽车厂经理尤里·勃拉科夫和著名宇航员格奥尔基·格列奇科这两位候选人获得最高选票。如果一切顺利，莫斯科党组织就可使这两位候选人得到确认，同时，也将因为赢得了一场充满竞争的选举而感到自豪，并避免出现叶利钦获胜所带来的尴尬。这些党的组织者们对结果充满信心，并让莫斯科地方电视台转播大会实况。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羞辱一番叶利钦。

对当晚收看电视的莫斯科人来说，党的官员们将会如愿以偿，〔209〕叶利钦面对的是黑压压的对他怀有敌意的代表们。那天，叶利钦首先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选择了一些最尖刻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上讲台，要求演讲者首先予以回答。许多演讲者痛斥叶利钦这种行为，并要求他收回提问，但他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之中岿然不动。他之所以毫不妥协退让，是因为他掌握了在座的代表们以及收看电视的观众们都不了解的情况而心中有数：格列奇科曾事先告诉他，说他将在投票之前放弃参加竞选。叶利钦当时请他等到最后一刻再宣布自己的决定，这样党的组织者就没有时间来重新确立一名候选人。

会议马拉松般召开了12个小时，连凌晨的电视转播也已停止(或许是因为转播人员已精疲力尽，或许是因为大会组织者发现会议有点失控)，直到这个时候，代表们才开始投票。勃拉科夫如预期的那样获得了最多选票，但随着格列奇科的突然退出，叶利钦进入了第二名，这使他成了当然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再把叶利钦清除出去，那真是对整个选举的莫大嘲讽，戈尔巴乔夫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虽然共产党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大多数媒介来阻止叶利钦进行

竞选宣传，但他的支持者总有办法来加强叶利钦的宣传攻势。宣传材料开始以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物的复印件，版面上赫然印着“推动者”，这个单词俄语与英语的拼法与意思都一样。这份宣传品共有四页，载明了叶利钦的竞选纲领。后来人们发现是闻名遐迩的莫斯科航天研究院的院长尤里·里若夫指使研究院的学生报纸《推动者》刊载这篇宣传品的（这个研究院不但是苏联高级航天工程师的母校，也是许多政治人物如叶戈尔·利加乔夫以及长期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的摇篮）。印刷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将这一期比平常多印刷了好几万份。

依其产生的效果，叶利钦也许根本不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竞选。随着共产党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公开化，他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如日东升。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共产党官员掀起的反叶利钦运动不仅无效，还成了叶利钦最强大的政治资产。

〔210〕 不过，他获胜的程度还是令人震惊。1989 年 3 月 26 日第一轮投票选举之后，统计结果令当局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 89.4%的选票，而勃拉科夫只得到了 6.9%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当宣布选举结果时，我问戈尔巴乔夫的几名亲信他们是否感到惊讶，他们的回答众口一词：“我们知道他会获得胜利，但他以如此的优势获胜出乎我们的意想。”

对我来说，叶利钦大获全胜并没有令我无比惊讶，我感到更为吃惊的是选票的公正统计。尽管可以指责戈尔巴乔夫玩弄阴谋诡计，企图阻止叶利钦东山再起，但通过最后的分析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说明他不会牺牲自己改革苏联政治结构的目标，来换取个人报复心理的满足。这样，通向俄罗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就竖立起来了。

3月26日那天，叶利钦并不是唯一一位取得选举辉煌胜利的候选人，勃拉科夫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许多选区，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知名学者以成功的竞选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一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学者就是其中一例。他是在莫斯科一郊区参加三人竞选的。曾有一段时间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之一、当地党组织的一名负责人不但调动党组织为自己服务，而且还通过各种龌龊的伎俩，想方设法来丑化他。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博戈莫洛夫获得60%的选票，他感慨道："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

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也在莫斯科郊区一选区获胜，他在一个负责培训档案保管员的机构中工作。他看起来比他55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生就一张粗犷而迷人的脸，又有一副足球后卫的硬朗骨架——也许退出绿茵场已有多年。尽管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以激进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而著称，呼吁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政治体系，对过去滥用职权的现象予以充分曝光，建立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结束警察的镇压活动。他的演讲才能与他强硬的体格相得益彰，在规模盛大的游行队伍面前进行的公开演讲尤其富有感染力。

法学教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一个主要由工人阶级居住的选区获得了胜利。尽管他面临当地党的机构对他有组织的挑战，包括编织一些诸如生活作风败坏、酗酒、毒打妻子的恶毒谣言对他进行中伤，但他还是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因为公众很 〔211〕

快就识破了事情的真相，对这种谣言不屑一顾。像阿法纳西耶夫一样，索布恰克也是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 52 岁要年轻的学者。他是位以法治国的热情拥护者，要求对腐败现象严加惩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最为活跃的一名成员。

获得大选胜利的候选人并非都声名显赫；一些人很年轻，在选举获胜之前默默无闻。比如，赢得莫斯科工人阶级居住区切廖莫什金选区胜利的美国史专家斯坦凯维奇只有 35 岁；两年前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在莫斯科市参议会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在这次选举中很轻松地在自己家乡取得胜利的物理学家阿尔卡基·穆拉谢夫仅 32 岁；还有当时未满 30 岁的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参加了莫斯科十月选区——为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命名的地区——的竞选，从未加入共产党，且自孩提时就身有残疾，不能长久站立，没有拐杖也无法行走。

斯坦凯维奇、穆拉谢夫、扎斯拉夫斯基这些人相继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了民主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既为他们的资深长者公开摇旗呐喊，也以自己的热情与组织才能筹划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宣传运动。斯坦凯维奇是众多反对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穆拉谢夫是示威游行和公众活动的组织者，而扎斯拉夫斯基则是自由经济和支持残疾人公共事业的最执著的辩护者。扎斯拉夫斯基对苏联现行体制的感受告诉他：一个宣称关心所有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只是为一小部分掌权者谋福利；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能够提高生产力，也将创造一个能更好地关怀那些真正需要关怀者的社会。

苏联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男人们的天下，只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现过一位女政治局委员，名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但即便

在那时，她也没有成为领导核心中的真正一员。在中层政治机构以及中层管理机构中虽然有一些妇女官员，但与她们的总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上一届最高苏维埃里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委员，但吸收她们进去只是要补充为“挤奶女工和纺织女工”非正式保留的代表配额，而且，她们既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力，也没有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212〕

虽然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的妇女成员比上届少一些，但她们大都是选举的获胜者，有些还是打败了一些非常难以对付的竞选对手而进入代表大会的。比如，研究人种学的女学者叶夫多季娅·盖叶尔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选举中击败了远东军区司令员维克多·诺瓦兹洛夫将军，与莫斯科的叶利钦可说相互辉映。盖叶尔约55岁时成了寡妇，穿上鞋也不到5英尺高，来自纳纳伊这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她的胜利犹如一名阿留申部落或特林克特部落的妇女在阿拉斯加赢得了当地角逐美国参议员席位的胜利。所不同的是，她获得了好几百万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像在阿拉斯加那样只10万多张选票。随后，当共产党的一些坚定支持者向安德烈·萨哈罗夫发难时，只有盖叶尔夫人一人站到那个与她差不多高的讲台前，痛斥攻击萨哈罗夫的人无耻。

虽然没有要求候选人非得居住在本人参加竞选的地区，但是，大多数候选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喜欢在他们的家乡或在家乡附近的地区进行竞选。加利娜·斯坦罗伏伊托娃这位在莫斯科工作、专攻民族问题的俄罗斯族历史学家却是个例外。她在亚美尼亚开展了一次成功的选举运动，在其首府埃里温的一个选区赢得了一个席位。她后来成为大会改革派中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

有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

织的大老板尤里·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一位苦命人。在总共24万张选票中，他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竞选中失败。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

根据新的选举章程，当一个选区出现三名或更多的候选人并且没有一位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多数的时候，就要在获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重新投票表决。当单一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或者在第二次投票选举中两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多数票时，就得重新进行提名，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而失败的候选人没有资格再竞选。

〔213〕很多原来的候选人都被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淘汰，这为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的候选人提供了新的竞争机会。《星火》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就是这样一名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被一次营私舞弊的提名会议强制性地从莫斯科一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当共产党的所有候选人在哈尔科夫选区失败后，他被提名参加该地区的第二次选举，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也是这样，在第二轮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55岁的科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一选区的第二轮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共产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的选举中均遭淘汰，当时身为白俄罗斯州立大学副校长的舒什克维奇在朋友劝说下参加了新一轮竞选。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他经历了一段耀眼而短暂的政治生涯，两年半后，成为新独立的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达到了巅峰。

新人民代表大会2250个席位中只有1500个席位是在选区选举出来的。总席位中有1/3被分配给了一些"公共组织"里的代表们，如共产党组织及其各下属机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使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不必参加竞选，也不必冒失败的风险，就可进入新的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讲，戈尔巴乔夫有权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提名750名代表，因为法律规定共产党是所有有权"选举"代表的组织的"领导核心"。

然而，这些组织有些已经摆脱了党的严格控制，其他还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也在选举运动的刺激下努力摆脱其束缚。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试图沿用陈旧的方式选出代表，结果遭到了抗议，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科学院本身。

科学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所引起的争议，并非针对已列入名单者，而是针对未列入名单者，即科学院中最富盛名的两名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空间科学家罗阿尔德·萨格捷耶夫。两人以拥护激进改革而闻名，且都是当权的共产党信徒所憎恨的对象。当主席团公布候选人名单时，立即引起了学院内外的抗议。〔214〕

选举章程规定主席团的提名必须获得成员总体上的支持，这在过去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次已行不通了。院里开始出现了示威活动，要求撤销这个官方提名，强迫主席团出示一份更能被广大成员接受的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至少要将萨哈罗夫和萨格捷耶夫包括进去。

几个选区的居民也催促萨哈罗夫出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他被允许列入这些选区的候选人名单，只要他不反对叶利钦这位受人欢迎的人物，就能毫不困难地赢得选举。几经犹豫之后，萨哈罗夫最后拒绝了在院外参加竞选，因为他整个成年期的生活都与这里密不可分，而且他还声明说，如果他最终成了议员，那也

将是同事们成全的结果。

结局正是如此，科学院的成员抛弃了大多数原先提名的候选人，迫使院内进行了第二次选举。结果，萨哈罗夫，萨格捷耶夫以及其他不少改革者都获得了多数票。

科学院并不是唯一按自己的方式推选国会代表的组织。例如，电影导演联盟就递交了一份代表名单，全部由激进的改革者组成，这些人在其他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团体里也是引人注目的明星。

经济领域的主要学术出版物《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加夫里尔·波波夫是由科学和工程协会联盟选进人民代表大会的。波波夫中等身材，头发修剪得很短，几乎是个平头，留一撮小胡子。他平生对打领结很反感，常常在公开场合穿一件运动衣和敞领的T恤衫，甚至在正式场合也是如此打扮。以前他着重于理性思维，曾写过不少有关管理问题的文章，但现在正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与政治领域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上。

同样，隶属科学院的几个科学协会和社团将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选进代表大会的情况基本类似。她是苏联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民意测验专家。她的许多调查结果都要保密，以免公众了解到人们对党不恭的事实真相。但是，随着公〔215〕开性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测验结果得以公开发表。改革派力量也更多地利用这些调查结果来加强他们加速改革进程的要求。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新国会得到了100个席位，是单一组织分配到的最多席位数额。可以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在代表的挑选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某种平衡处理：它既包括几名高层领导人，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也包括一些来自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如经理、军官、作家、农委主席等。

总的来说，其人员构成中没有几位改革家，更多的倒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官僚。

当选举结果陆续公布之后，戈尔巴乔夫吹嘘说，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因为选出的代表中80%是共产党员。雷日科夫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曾反驳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提醒他说共产党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有30名重要的地区领导在选举中失利，而且，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共产党，而是相反。[④]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有此交锋，但我的判断与雷日科夫不谋而合。

虽然并非每个选区的选举都是公正进行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这样；虽然大选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宪政国家为职志的议会，其中的许多代表也还是保守的共产党，他们决不愿失去任何权力，但总体来说，整个大选的结果仍鼓舞了那些希望苏联实现民主的人士。

之所以说选举的结果令人振奋，是因为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经过选举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其中的许多代表面对顽固政治势力依然赢得了竞选的绝对胜利。同样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这次选举并非最后一次，它传达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运动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突然间，人民都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

〔216〕 当我收看1989年3月26日这一选举的晚间新闻时，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当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要等到第二天才会知晓，但电视记者采访了正要离开投票点的选民，询问他们赞成的是什么或反对的是什么。虽然电视中只编辑了几个片段，但这些被采访的选民无一例外地说他们是为了变化而投票。一位年轻的妇女干脆这样说："我投票反对我们目前的一切，我投票赞成我们将来拥有的一切。"一位被采访的老人一开始对他们能否在电视上播出他的讲话内容表示怀疑，当得到保证后，他说："嗯，我投票就是为了反对他们，他们所有的人。"

对于苏联人来说，希望清除恶棍并不稀奇，熟悉苏联舆论的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人们开始公开地抒发自己的意见，甚至敢于在电视镜头前这样做，而媒介还播放这些言论。

一种新型的国会

尽管一开始出现了一些与会议计划有点偏差的情况，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总的来说还是按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预定的程序进行着。辩论非常热烈，且常常涉及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决定性的投票之前往往要经过一番幕后的交易，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明显占据了优势。

这次大会有几次险些使它自己名誉扫地。针对萨哈罗夫的一场有组织的诽谤失去了控制。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指责萨哈罗夫侮辱苏联军队，其用词大有斯大林痛骂对手的遗风。戈尔巴乔夫也许并没有指使他们这样做，但他也无意去制止这场诽谤。

第二次与叶利钦有关。大会的责任之一是从各级代表中选出最高苏维埃，以作为常设议会机构。其成员构成约占代表大会成员的 1/4，也就是从 2250 人中选出 556 人。叶利钦宣布他有资格成为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而且，以他在莫斯科获得的辉煌胜利，如果代表们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议会，叶利钦受到忽略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不可想象的局面几乎成真。

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共和国的代表团都决定按分配给的自己的名额向大会提交一份数量相同的候选人名单。人们期望大会批准各共和国选择的代表。俄罗斯代表则决定，来自俄罗斯的提名数应超过大会分配的席位数，以便给大会留有选择的余地，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217〕

叶利钦是俄罗斯候选人之一，但当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时，他因得票太少而无法进入最高苏维埃。俄罗斯在最高苏维埃中拥有 11 个席位，投票结果是叶利钦得票第 12 位。这次投票进一步证实了已明显存在的倾向：大会中的多数代表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现有体系，而不愿支持有可能削弱这一体系的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叶利钦的抛弃就威胁到了戈尔巴乔夫孜孜以求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的信誉。

阿列克谢·卡扎尼克这位一直不引人注目的 47 岁法学教授挽救了这一局面。他来自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城，其刚硬的胡须、黝黑的面颊以及洁白的下巴使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从很远就能辨认出他。在俄罗斯争取最高苏维埃职位的候选人中排名第 12 位的他之所以被列入俄罗斯的候选人名单，只是因为叶利钦和其他人坚持要给代表们留有选择余地。卡扎尼克宣布，如果他对叶利钦没有选进最高苏维埃负有责任的话，将无法面对他家乡的选民，因此他要让出他的席位。

代表大会选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依过去惯例，他同时也成为国家元首。为追求这一结果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失去了为民主程序确立先例树立榜样的机会。第一次是他怂恿大会拒绝萨哈罗夫的建议，即先进行议题辩论，而后举行投票选举。第二次是他允许进行对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即非差额的选举。

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位哲学教授、后在叶利钦政府中成为知名人物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曾提名叶利钦为竞争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的候选人，但为后者所拒绝。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位来自摩尔曼斯克附近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45 岁工程师亚历山大·奥波林斯基，以毛遂自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渴望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心情。

对此戈尔巴乔夫未明确表态，后由全体代表投票表决，结果以 2 比 1 的比例反对增列奥波林斯基为候选人。假如戈尔巴乔夫当时要求进行一次竞争性选举的话，这次投票就会带来另一种发展方向。

〔218〕 戈尔巴乔夫鼓励党内其他官员参加竞争性投票选举，而他们中有许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也应允许第二名候选人与他同台竞选。但戈尔巴乔夫显然无法容忍一些代表可能在无记名投票中拥护其他人的想法。这次投票结果是 2123 票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87 票反对。即便奥波林斯基参加竞选，他的得票数也不太可能超过 87 票。可以想见，如果戈尔巴乔夫允许有人与他同台竞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票数只会少于 87 票，因为有些代表之所以投“反对”票，很可能只是对戈尔巴乔夫无对手竞选的抗议。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也并非完全像过去那样，不会遭到任何非议。在投票之前对此就曾有过广泛而相对开放的辩论。

例如，来自爱沙尼亚的马留·劳利斯庭就在辩论中向戈尔巴乔夫提了三个问题：有关保证各共和国主权的规定到底有何章何款已被纳入新宪法？在一个民主国度里使用军队来对付市民的游行到底能不能容忍下去？4 月份在第比利斯发生血腥镇压示威群众之前政治局里到底有谁事先就知道？另有一位代表诘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正在挪用政府的金钱来在克里米亚营建自己的度假别墅。还有些人提醒戈尔巴乔夫，他的威信正在下滑，因为改革的进展过于缓慢。好几位代表要求，若戈尔巴乔夫当选了这个立法机关的主席，就应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戈尔巴乔夫在投票之前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给予了回答，但对劳利斯庭的问题则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公众日益喜爱（有些人甚至迷恋）收看政治辩论节目，并为此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欣喜。因此，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电台对最高苏维埃会议也进行了全面实况转播，不过都是在晚上，这样人们就不至于为了收看实况转播而影响工作。

新的最高苏维埃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它的独立性。总理雷日科夫公布的各部长提名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否决。到第 11 位时，我没有再继续数下去（总共约有 60 个部长职位）。晚餐时，代表们开玩笑说，他们坚持的标准比美国参议院高，在美国，参议院很少拒绝已经确定了的内阁提名。

第一次会议的辩论相当激烈。因为我们几乎每晚都很忙，我〔219〕就设置好录像机，让它自动录下白天的会议实况，以便晚上回来再看。因此，我常常熬到深夜，但我觉得这么辛苦价有所值。许多议员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新宪法秩序的关键问题，其中的能言

善辩之士也决不在少数。对他们在原有体制限制下能保持如此高的素质和迅速适应国会激烈辩论的能力，我只能感到惊奇。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白天总是花大量时间来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并因此加强了这个新生立法机构的权威性。后来，由于其他事务缠身，他把会议主持工作交给了副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曾同时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据此很多人认为他俩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成为密友。无疑，那时他们都彼此相识，并一起在共产党青年组织（共青团）里共过事。但卢基扬诺夫比戈尔巴乔夫大两岁，他们的关系也并不亲密。但不管他们学生时代是否关系密切，卢基扬诺夫现在是戈尔巴乔夫的接班人，他们一度似乎相处融洽，合作愉快。

卢基扬诺夫在中央委员会里工作的时间非常短，鲜为外界注目。只是担任了最高苏维埃的现任职位后，才开始在新闻媒介频频曝光。电视观众很快就熟悉了他那不苟言笑的表情和维持会议秩序时的粗哑嗓音。他严格地行使着他的职权。也许是因为改革者比保守者讲得多，也许是出于自己的偏见，总之，在限制发言时间方面，人们更常见到他中止激进改革者们的发言。

尽管卢基扬诺夫很少露出笑脸，但他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惊世骇俗之语。有一次我参加由他主持的交流会，交流的对象是来自新泽西和马里兰州的美国高中生代表团，这是双方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源于我为日内瓦美苏首脑会谈起草的一份计划。我非常高兴地应邀参加了他们与卢基扬诺夫的会谈。

当我发现这群年轻的美国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时，更是感到高兴。这项交流计划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非常成功。学生们说话言简意赅，而且，他们对苏联的

了解甚至超过了一般美国国会议员。

卢基扬诺夫一一回答了他们关于新国会及目前政治形势的问题，这时有位美国学生突然对他的回答进行了反驳。这位美国学生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结识的苏联朋友却不能得到护照，访问我们的国家呢？" 〔220〕

卢基扬诺夫一时语塞，直视着这群美国学生，然后说："这说明人类的愚蠢行为能够达到何等程度。我们将研究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护照去国外旅游了。"

接着，又有人问："那么，他们能用卢布兑换美元吗？"

"这我无法向你们作出保证，"卢基扬诺夫回答道，"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天，卢基扬诺夫的回答至少是诚实而又直率的。然而，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发现他的改革主张更接近于利加乔夫而非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萌芽期的反对党

尽管改革派没有能够主导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最高苏维埃，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少数。他们中有人曾横扫莫斯科市的选举，有人来自许多其他大城市如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其代表性非常有分量。他们在波罗的海的代表中形成了多数，还有分散在其他地区如高加索、乌克兰及远东的代表。而且，许多由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占主导的组织也都站到了民主活动家的一边。

由于这些代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再加上电视的转播，他

们虽人数不多，却往往能在公开场合制造出轰动效应。然而，他们的数量毕竟有限，除非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帮助他们拉选票，不然他们还是很难施加有效的影响。

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大多仍是共产党员，而党章又规定禁止搞宗派主义。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称他们的组织为“小组”，而不是“宗派”或绝对禁止的对象“政党”。

莫斯科来的代表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萨哈罗夫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上台讲话的。他们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开展活动，网罗那些与他们看法相一致的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

〔221〕 莫斯科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加夫里尔·波波夫都加入了一些年轻代表的行列，这些年轻代表里有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阿尔卡基·穆拉谢夫、加利娜·斯塔罗伏伊托娃、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他们还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代表中找到了知音，如来自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盖叶尔，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叶利钦建立了牢固的联盟。

许多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改革承诺并不抱什么信心，即使在他获取了莫斯科选举的辉煌胜利之后，这种疑虑还是没有消除。他本人是个地道的非知识分子，给许多人的印象倒像个典型的党老板，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而非为了实现他政治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1987年对他的指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子对叶利钦的态度，而叶利钦本人则更愿与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不过，改革派与叶利钦还是互有需求。尽管改革派知识分子

在选举中的表现也不俗，但他们还是需要与这位善于在选举中拉拢选票的叶利钦建立同盟关系。至于叶利钦，自从1987年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就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孤军奋战。这段时间，他合作的对象是列夫·苏哈诺夫领导的小部分报纸编辑人员，列夫·苏哈诺夫是他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里认识的，再加上少数几个同盟军，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学教师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莫斯科新闻记者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等，这位记者总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出谋划策。当时，叶利钦自己的纲领依然不系统，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加速推动改革。叶利钦要想对立法施加影响，既需要有系统的政策，也需要有组织方面的支持。

莫斯科的改革派一度曾在党的政教大楼里聚会，但当最高苏维埃临时搬到离红场不远的莫斯科饭店办公时，其起草宣言与规划立场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改在了为叶利钦配备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当时任最高苏维埃建设与住房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以外的代表也住在同一个饭店里，它为建立同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对于那些以使国家回归真正列宁主义原则为已任的人来说，这里的景致也可提供某种灵感，因为从办公室窗户往外看就能直接看到马路对面用红砖砌就的宏伟的列宁博物馆。

到那年夏天，已有300多名代表表示对他们这个活动小组感兴趣。7月19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旨在组织一个“跨地区代表团”的协调机构已经建立，计划月末召开成立大会。[222]地区间小组的目标是要“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将为实现这个加速采取更加果断一致的步骤。叶利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对”这个词，但他却明确了这个在最高苏维埃里属于少数派的小组将要发挥的作用：将作为一个反对派为立法机构起草供选择的建议。

就这样，在苏联首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并获得了不止

一个共和国的支持。它使自己合法化的方法是将自身定性为一个支持改革的组织，这也是此后各共和国民族阵线所使用的方法。

这一组织的创建者还采取了在竞选期间，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大选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在国会中有高票当选的优势，仅在莫斯科一市他们就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群众集会，随后，他们开始定期举行这样的集会，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尤为如此。由于“保守派”反对激进改革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不会支持这种改革，所以这些有能力聚集比其对手规模更大的群众集会的改革派，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和春天，越发重视发挥这个潜在武器的威力。

激进改革的支持者认为自己与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派格格不入，而戈尔巴乔夫当时却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反对派。事实上，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戈尔巴乔夫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公众对改革的支持，以使戈尔巴乔夫最终摆脱共产党顽固分子的束缚。有些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拒绝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改革者，现在也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以便能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支持。索布恰克和斯坦凯维奇就是这样的两位代表，他们分别于 1987 年和 1988 年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甚至叶利钦在口头上也坚持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戈尔巴乔夫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不是向他发出挑战或是反对他。3 月份大选获胜后还不到几个星期，我问叶利钦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如何，他回答说，他们曾私下里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叶利钦希望他们俩能定期接触。“我认为他开始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了，”叶利钦补充说，“不过，戈尔巴乔夫仍然与利加乔夫和保守派过从甚密。大选也许会给他一些启发。”

为使戈尔巴乔夫对形势的领悟不致过于迟钝，叶利钦安排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提名他出来与戈尔巴乔夫角逐最高苏维埃主席〔223〕一职，尽管他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叶利钦知道他会输掉国会里的这场投票选举，但他想借此提醒戈尔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从自已的阵营中排挤叶利钦，他将会面临来自叶利钦的直接挑战。⑤

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还没几天，叶利钦和他可爱的妻子奈娜·约瑟福芙娜一起来到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我问他对这第一次会议有何评价。

他回答说："不太糟。完成了一半的预定目标。"接着，他回顾了一些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修正自己刚才的话说："也许还不到一半，但至少完成了1/4。"当我问道对这次大会抱有更高的期望是否不现实时，他说，不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失望。

他当时态度很乐观，因为他已感觉到社会舆论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在大会第二周注意到了代表大会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他和他在"莫斯科小组"的同盟军，他将这归功于选民向其代表寄出的表达支持改革派心情的潮水般的电报。当时，大多数代表仍然关注自己家乡的第一书记怎样投票并紧紧跟随（叶利钦还比画了一个动作：向旁边扫视一下，然后抬起手臂），对此，他认为这种情况今后将会越来越少。由于电视的转播，会议辩论走进了全国各地，千家万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他们的代表跟着共产党亦步亦趋。

那一晚的谈话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叶利钦自认正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竞争。他仍然在与那些阻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势力进行抗争，其公开目标是要使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能够也应该加快改

革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应将叶利钦看作是他的主要助手。也许从长远看，雄心勃勃的叶利钦并不会就此满足，但他当时的态度看起来是诚恳的。至于说随后两年他们变成怨家对头，则是戈尔巴乔夫不断压制他的必然结果。

那天晚上的谈话丝毫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诋毁。然而，这种克制态度在戈尔巴乔夫阵营里却找不到第二个。当谈到他访美的可能性时，我劝他成行时带上奈娜。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决不！我不会让她成为第二个赖莎·马克西莫芙娜！"

他的话对这两位女士都有失公允。尽管他或许永远也不会改〔224〕变对赖莎的看法，但他会很快明白，他比他想象的更需要奈娜。

改革会取得成功吗？

已是6月下旬了。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最高苏维埃也已展开工作。我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盛顿去作述职汇报。在飞机上吃完晚饭后，我没有看电视，而是掏出电脑笔记本，记下一些事情。我怀疑克格勃在飞机上安了窃听器，但我知道我可以把这软盘存放在华盛顿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现在把在华盛顿期间有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先梳理一遍，也许很有帮助。我这样写道：

1. 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个转折点。他说得对吗？

也许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我们目前还确实不能这样说。不管怎样，即使在某些方面有倒退迹象，我还是推测他的说法确实是正确的。目前的确出现了向代表制政府过渡的趋势，这将是难

以逆转的；如果这种趋势被暂时否定了，难道它以后就不会重新积聚力量，卷土重来？

那么什么是“新现象”呢？以前曾出现过试图建立代表制机构的努力，如1918年的杜马，即立宪会议，只不过流产了。也曾出现过一些普选的因素（比如第一届杜马中出现的共同代表现象）。但在过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来自下面，最高政治机构或多或少都成功地抵制了这种现象。而现在是最高政治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在推动宪制进程，并利用群众的激情和参与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活力。这就大不一样了。

2. 消极趋势（如商店里空空如也的柜台、财政赤字、少数民族和民族骚乱等）能构成怎样的威胁？现在有些人甚至说，在随后的二三年里，有可能会出现内战；而另有一些人则预言说将出现饥荒现象。

上述消极现象的确正在形成威胁，而且，如果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开始与民族仇恨合流，那么形势紧张就会一触即发。在费尔干纳和新乌津实际上已出现了这种苗头。如果只是对付民族仇视现象，通过动用充分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加以控制的。这里的“充分”是指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各派往往导致以武力冲突的争执。〔225〕但这些骚动的情绪确有合流趋势，随时都有失控的可能。

最可怕的情景将是：价格持续上涨，商品匮乏更加严重。各自分散的抗议逐渐汇合，随之爆发暴力事件，他们最直接的发泄对象将是当地少数民族、党或者警察总部——或者，只是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对此政府必将试图进行镇压。然而，镇压几乎将是徒劳的，反抗运动会有增无减，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接着会出现什么呢？会再出现一个天安门事件吗？也许这样。政府会镇压吗？也许，镇压至少有短期的效果，但却会为此使改革

进程付出沉重代价。而且，没有什么人相信这种方式能真正奏效。镇压只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措施。但镇压极有可能发生，对我来说，这样想一想都令我不快，我将竭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努力说服我自己不去想这些。

但目前这只是一种最坏情况的分析，不一定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又是什么样呢？一种可能是行动犹豫不决，另一种可能是在骚乱发生时，将之各个击破，但尽量不动用武力。总之，将采取灵活迂回的措施，以免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暴乱本身也会产生一种厌烦心理，大多数人对暴乱所带来的暴力与动乱的恐惧远甚他们对目前形势的恐惧）。因此，这个国家有出现大量动乱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可能，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团体将确保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不要受到武力方法的威胁。难道这是白日做梦吗？也许。但我认为这种前景是具有实际可能性的。

3. 戈尔巴乔夫真能坐稳这随后五年的江山吗？如果不能，是什么力量会使他翻船？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本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权履行完毕之前被赶下台的可能情形，我一时还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发生。但在现实之中，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克格勃忠诚不渝的话）？我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选，也许只有叶利钦最后有可能这样做，但他至少五年之内不会这样。对于整个党的官员来说，叶利钦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意味着他唯一的挑战方式要经由直接或间接的选举过程来体现。就是说从现在到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还有五年的时间。那时将有可能出现政治转折，其程度即使是按今天许多经过修改的标准看也将是惊心动魄的。

但请再想一想最坏的情形：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动乱；而政

治局在处理意见上又各执一词，这时要么出现一位一呼百应的领〔226〕导人（目前在政治局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其他领导人有此政治魅力），要么出现一位阴谋家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积聚力量，构成挑战。其结果是重新恢复传统的体制：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而其他政治机构则被迫赞同并通过这一决定。这种可能性之大也是不能忽视的。

4. 戈尔巴乔夫若被赶下台会发生什么？

我以前的判断是这会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而美国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现在仍然这么想，因为任何继任者都会忙于镇压国内的异己分子和阻止国家走向分裂，而无力在军事上与我们或我们的盟国形成对峙。我认为没有理由重新修正这一基本判断（有必要注意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动向：他们将来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吗？我有点担心）。

5. 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改革的现象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说是肯定的，是考虑到一些保守的或是反动的团体正在形成。最近在列宁格勒形成的以尼娜·安德烈耶娃哲学作为行动指导原则的（反犹太人的）阿米亚特和其他一些组织值得注意。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答案又是否定的。不会出现足够强大的能形成实际挑战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组织的反改革力量目前是不大可能形成的，但我毫不怀疑这种力量会最终出现，尤其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因此，现在不存在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

6. 共产党机器会默认它们的衰落吗？

不愿意，但它们无可选择。

在华盛顿下飞机时，我已预感到苏联帝国的强权很快就要瓦解了。

〔227〕

第 十 章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行动

选举纲要的基石是从苏联的一个完全加盟共和国一步步转向一个不依附于苏联，即不依附一个同盟的国家；下一目标是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独立国家。

爱沙尼亚《国家先锋报》“选举论坛” 1989年10月①

如果民族主义者试图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对他们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波罗的海国家自身的生存也将打上问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告 1989年8月27日②

新的最高苏维埃还在开会的时候，我应邀去会见一个立陶宛代表团，他们代表着萨尤季斯这个威震3月份大选的政治运动。作为驻苏大使，我总是拒绝会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官员，因为这种会见有可能被理解为美国接受了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强行吞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会见作为个人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事实上，我们渴望与他们接触，以表明我们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并跟上那里的事态发展步伐。与私人公民会见并不违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因为他们并未在苏联认可的加盟共和国政府里任职，与这些人见面也就不具官方性质。

萨尤季斯明确要求举行官方会谈，我在同意之前考虑了它的影响。虽然该组织成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以此种身份举行会谈。他们以萨尤季斯代表的身份而来，而且我〔228〕知道该组织在立陶宛的确深孚众望。更重要的是，即将来访的代表已经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因此做出见与不见的决定并不困难。与他们举行正式会谈，将显示出我们对其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对他们作为被占领国家的合法代表的尊重。

我邀请他们到我的寓所，斯巴索别墅，而不到我的办公室，是因为我要保证苏联当局看到我们的会谈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活动——一旦局势有变，这可能对我的客人不利。

萨尤季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共产党以外的党仍遭禁止），而是一个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支持改革的运动。它组建不到1年，在3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竞选36个席位，获得了其中的33席，而且大都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当时，我也渴望会见一些新当选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

六位代表结伴而来，鱼贯进入我取名为音乐室的斯巴索客厅。他们作自我介绍时，一个个表情庄重，甚至有点严肃。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捷斯教授，以其密集整洁的白胡须而独具特色，他是一位森林生态学专家，还是立陶宛“绿色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卡兹米拉斯·安塔纳维丘斯，50刚出头，但显得更年轻，经济学博士，是维尔纽斯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布罗尼斯拉夫斯·根泽

利斯教授，虽然不到60，已经谢顶，只剩下一绺灰色的头发，在立陶宛国立大学教哲学。该小组中唯一的律师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是立陶宛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在维尔纽斯开展业务。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参选时为维尔纽斯出版社的编辑，是萨尤季斯的副主席，他那满头黑发和杂草一般的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萨尤季斯的总书记维尔吉利尤斯·休帕提斯没有到场。

奥佐拉斯首先讲话，解释说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要求举行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向美国政府通报他们的计划。但他有事外出，故让小组代表他及整个运动转达这层意思。

[229] 经过一番介绍，成员们轮流阐述该组织现行战略的方方面面，看得出，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取得经济自治，使立陶宛文化免遭俄罗斯化的灭绝，而是到1990年中期取得彻底独立。

这些计划将分阶段付诸实施，同步处理有关法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将宣布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的秘密协定无效，并推翻1940年以武力强迫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进入法案”，从而消除并入苏联的法律依据；自1990年1月1日起把立陶宛的企业置于维尔纽斯或地方当局的控制之下。如果可能的话，在1989年底之前，但无论如何不迟于1990年初，选出新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如果萨尤季斯赢得多数——这似乎不成问题——最高苏维埃将按照立陶宛独立的模式建议起草新的宪法，并不迟于1990年6月交由全民公决通过，此后将选出一个全新的被称为塞马斯的议会，其名称系沿用20、30年代旧称。在独立国家里，苏联操纵的选举全部无效。

听着这一大胆的计划，首先想到的就是事态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立陶宛会在一年内取得独立。甚至两三

年也算是一个奇迹。

但是，关键不在于客人们的时间表是否现实，而是他们都严谨而有经验，不受传统说教的束缚，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场就有效地组织了政治竞选。在苏联统治下所受的苦楚和经历使他们对现行制度失去了幻想。这时，他们明确期望获得成功。

让我感到变化之大的并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求独立。那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之处在于他们在谈论这一目标时毫不畏惧。仅在三四年前，公开号召分离的人都会受到要么投入拘禁营，要么送入精神病院的处罚。40 年前，则要被处决。

如今，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领袖，不仅敢于谈论和〔230〕撰文呐喊独立，而且更以其事业和生命作赌注专注于这一目标。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与一名美国大使恳谈，把心里话告诉外国势力，而不怕被指责为叛徒。

这些行动来自心理自由的人们。自 1989 年的那一天起，我再也不怀疑他们终将胜利，这一天不会等到下一世纪遥遥无期的年代，本世纪结束之前就会实现。

他们必胜，但代价多大？会不会激起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克格勃和军界的武力镇压？几周前，中国已经表明血腥镇压至少暂时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企图弹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就可能触发内战，并在国际上导致冷战的恢复。这将增加对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你们认为苏联将作何反应？”我问。

“噢，他们会尽力阻止我们。但我们相信，只要不屈服于挑衅，我们就会成功。他们要阻止我们，就得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而如

果他们那样做，改革就会终结，戈尔巴乔夫也会下台。我们认为他们清楚这样的后果。”

“你所说的屈从挑衅是什么意思?”

“以武力对武力。他们试图挑起我们动武，然后以我们的反应为借口动用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人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明白，只有采取和平方式，我们才能打赢。忍受愚弄、侮辱、甚至暴力，比持枪对准眼前的士兵射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你们真的以为这样行吗?”

“是的。每走一步，戈巴乔夫就将面临如下的选择，是允许我们逼近我们的目标，还是破坏他的整个政策，抑或葬送他的统治地位。一旦我们开创了事业，就不想失去它。”

客人们接着问我，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将作何反应，如果苏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能否得到美国的援助。

我解释说，对他们的问题，我不可能给予官方答复，我估计〔231〕华盛顿也只会给一个抽象的回答。政府不喜欢假设的问题。我只能作出个人的评估。

关于第一点，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政府，事实上所有美国人都会予以同情。不过，不可能立即承认，因为这牵扯到该政府是否实际上控制了宣布拥有的领土。如果立陶宛仍然在苏联有效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多么地同情，美国政府很可能不会承认新政府的独立。

我还告诉他们，美国的立即承认可能会鼓励苏联强硬派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直接挑战，而且莫斯科知道，无论出于什么感情，美国都不会为立陶宛提供军事保护而冒核战争的危险。过早的承认，苏联温和派就不可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因为政敌会攻击他们屈从于冷战的“敌人”。

关于经济援助，我只能说，一旦苏联封锁，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德国、瑞典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苏联控制着他们自称是苏联领土的边界，如果他们禁止物资进入，外国强行投放无异于发动战争。一旦立陶宛的行动激起莫斯科的军事或经济制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幸，指望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提供直接帮助。

有一位客人（我忘了名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孤军奋战。你们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但我们只能靠自己。"

话中带刺。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你们完全不是孤立的，"我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并不承认你们在法律上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今后也决不会，除非立陶宛人民出于自愿做出那样的选择。只要有任何对你们动武或经济抵制的企图，我们将作出强烈的、尽管是非暴力的反应。

"我不敢对今后怎样事先打保票，因为那将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样的行动将打断刚刚开始的美苏合作。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对改革至关重要。如果在立陶宛——或波罗的海其他地方出现镇压行动，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此我并不是说我们会无动于衷，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的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分量就会加重。因为莫斯科知道，如果动用武力，必将面临西方的真正报复性反应。 〔232〕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办糟了，并且苏联动用了武力，我们也无法提供保护。你们将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一样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又的确是在孤军奋战。我希望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光拣好的说，就不是讲真话。"

沉默。10 秒钟。也许 20 秒。似乎更长。接着有人开口了："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也未曾指望他人为我们做好一切。"

接着，我们转向了轻松的话题。我们需要相互了解，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在今后几个月还要与今天来到这里以及没有来这里的萨尤季斯领导人经常打交道。

民族主义者走向前台

早在 1987 年，爱沙尼亚就试图争取主权，虽然让戈尔巴乔夫压制了下去，但是仍坚持不懈，而且近邻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行动了起来。

到 1988 年 2 月，这 3 国都将自己的语言定为"国语"。以前俄语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但是俄罗斯居民很少学当地的语言，因此他们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交往时只用俄语。而今，经过一段过渡时期，所有人和公共机构都必须根据要求使用当地语言。

紧接着，一环扣一环，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经济自治，并开始限制移民。5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了一个主权宣言，几乎与莫斯科 6 个月前断然否定的爱沙尼亚宣言相同。7 月，拉脱维亚如法炮制。

对纳粹—苏联秘密协定的怒火继续燃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苏联高级官员不再矢口否认有这个秘密协定，但声称原件找不到，因此无法证明〔233〕确有其事。8 月份协定周年纪念日之前该委员会没有拿出报告，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自行宣布秘密协定为非法，因此从即日起无效。

到 1989 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新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与人民阵线合作。2 月份,爱沙尼亚举行独立周年庆典,独立的爱沙尼亚国旗在塔林古老的塔尔赫尔曼塔顶上高高升起,新党魁瓦伊诺·瓦利亚斯参加了庆典仪式。

在立陶宛，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更为激进。1988 年末，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向天主教会做了很大让步，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但他却不能阻止立陶宛党委的强硬派翌年 2 月份对萨尤季斯加强反攻的企图。不过，这些强硬派人物在 3 月的大选中节节败退。6 月份党的另一次全会上将忠于莫斯科的亲信从立陶宛中央委员会里驱逐了出去。到 7 月份，立陶宛共产党讨论了一个新计划，旨在从法律上减少对权力的垄断，将立法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大会，创造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法治的立陶宛国家。计划已经拟就，单等年底交党代会通过。这些议案即使按修正后的改革标准看也是异端邪说。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更是走到了党的前面。6 月，立陶宛共青团正式与全苏共青团脱钩。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共青团组织控制的报纸成为传播人民阵线观点的喉舌。

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掌管的议会和部长会议从未来的新选举着眼，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公共思潮。1985 年以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从没有进行过选举。直到 1989 年，这些机构都是按部就班地充当着傀儡，每年聚集两三天，一致通过共产党起草的立法议案。

觉悟的选民对面临真正选举的政客正产生极大的影响。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观察家们一定会为这种变化而吃惊。首先，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反对，立法者支持自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干脆转向直接要求独立。到1989年秋，3个从前的傀儡议会都已背弃〔234〕

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兄弟。

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带头为爱沙尼亚的事业奔忙。在拉脱维亚,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也是如此。

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获提名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职务。特别是在3月大选显示出民族情绪在广大公众中的强大力量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开始拥护民族事业。例如，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是萨尤季斯委员会的成员，曾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席位,7月被任命为立陶宛副总理。民众要求分离的呼声在1988年还微乎其微，而今已不绝于耳。

帝 国 反 击

赢得大多数波罗的海民族支持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引起了莫斯科当局的警觉，而且震动了初来乍到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莫斯科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是苏联军人及其家属。

波罗的海，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其他地方高，而且工业企业很容易招到俄罗斯人。驻扎在波罗的海的军人经常就地转业而不是回到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共和国。

这样的移民,加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口出生率较低(二战时波罗的海人口损失惨重,使外来移民大批涌入,后又历经政治清洗),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例如,拉脱维亚人曾经占这个独立国家人口的77%,到1989年只占52%的微弱多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将成为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情况虽不那么严重,但势头也十分

凶猛：38%的人口为非爱沙尼亚人，而在30年代还不到20%。另外，在爱沙尼亚东部，俄罗斯已成为主要居民。立陶宛人在他们共和国里仍占多数，达80%，但是他们也为外来户日益增多而不安。〔235〕

在该地区的许多（但绝非全部）非波罗的海人为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如果波罗的海人掌管他们的国家，限制移民，他们还会允许俄罗斯人呆下去吗？即使允许，他们会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会不会被迫学习迄今为止可以忽略的当地语言？

莫斯科的要员们利用了这些担忧。经济部的官僚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的工业基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在克格勃、共产党保守派和军官们的积极支持下大力煽动反波罗的海情绪，并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组建受他们操纵的反对组织，以期阻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

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创立组织——其构成大都为俄罗斯族，一般称为“国际阵线”或者“国阵”，组织罢工、游行来抗议民族组织的行动。这些活动由中央新闻媒介予以报道，以便使波罗的海以外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相信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不能得到整个人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宗派活动仅仅使当地人口两极化，加剧了波罗的海人和外裔社区间的紧张。

1989年夏，莫斯科知识分子互开玩笑说：“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两种语言即母语和俄语的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呢？“咳，只说俄语的呗。”

分而治之在俄罗斯帝国传统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任何未得到莫斯科赞成的区域合作都被认为是可疑之举。随着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从莫斯科争得更多的自治，它们之间也开始开辟更好的合作途径。这些共和国在根本利益上生死与共，而且对于

大多数爱国者来说，如果单枪匹马的行动，谁也不可能实现独立。

5月，立陶宛萨尤季斯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代表〔236〕组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理事会，并因三方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中的人民阵线代表的大力参与而得到进一步推进。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走出人代会，抵制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个委员会由于权限不明，可能推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立法，限制分离的宪法权力。为了避免公开分裂，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问题上做了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8月。值此纳粹—苏联协定签署周年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1989年8月29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

200万多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500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⑨

这天，暖风拂面、阳光灿烂(这在波罗的海沿岸夏季并不多见)，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游行者拿着鲜花、一路高歌，走到指定地点。我没有机会直接看到这壮观景象，因为作为驻苏大使，组织纪律不允许访问被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打了折扣。不过参加者和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气氛祥和、良好。

一对当时正好在立陶宛度假的俄罗斯夫妇向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当时的激情所感染，并与立陶宛朋友结伴而行参加了游行。他们感到没有任何敌意；立陶宛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甚至在他们身上撒遍了鲜花。回到莫斯科后，他们已深信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事业是正义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独立，民主就不会光临俄罗斯。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当局来说，夏天的事态，尤其是"人链"显得目中无人。共产党总部对"波罗的海之路"做出迅速反应。8月26日，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强硬警告。④

我看到新闻报道的声明时，正远在萨哈林岛旅行。官方的感〔237〕情用事、前后不一让我吃惊。声明中提到"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利用"民主和开放"蛊惑群众。指责人民阵线建立类似"法西斯占领时期"的组织，利用它们进行"恐吓、欺骗和造谣"。还说"民族主义领导人""滥用国际关系自由，与外国组织和中心接触"（如美国大使馆？），"把他们奉为高参和导师"。

"8·23"运动组织者的罪名是煽动"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军队的口号。声明接着老调重弹："如果民族主义分子达到目的，波罗的海人民的命运将处在危险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本身的生存就可能打上问号。"⑤

换言之，如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

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力。在法制社会——这也正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不得犯罪。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与外国组织接触就受到怀疑的话，还有什么"国际关系自由"（这也在宪法保护之列）可言。

苏共中央所述的"事实"与其逻辑一样难以令人信服：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人民阵线在使用威吓、欺骗、或者造谣等手段——事实上，这是"莫斯科中央"、克格勃和军方惯用的手段，这也不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运动的特点。他们的策略不是欺骗，而是直截了当。

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威吓和造谣，即使抛开声明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慌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

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

令人费解的是，声明的发表未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批准。即使该声明交到新闻界时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发生这种情况也难以想象。

[238]

格鲁吉亚创伤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挑战是和平的，但1989年在苏联帝国南部边疆却爆发了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对抗持续了整整一年，但是杀伤性的冲突只是时断时续，而且规模很小。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有大批人死于非命，在其他方面，这三个共和国鲜有共同之处。

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首当其冲。4月9日，军方野蛮地镇压了一次和平示威，打死或伤残至少19人。正值全苏联的改革派争取和平示威权的时候，却有人做出了弹压的决定。因此即使官方避免伤亡，任何以武力驱散和平示威者的行为也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镇压第比利斯游行算是提交人代会的第一桩公案。它是由拉脱维亚代表而非格鲁吉亚代表提出来的。

1988年入夏以来，第比利斯的游行从未间断过，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女学生在秋季宣布绝食。他们要求采取更迅速的步骤迈向格鲁吉亚自治，同时也抵制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获得更多自由的要求。一连几个月，地方当局虽敌视他们，但并没有认真干预。4月8日，星期六，天气温暖，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上助威。

午夜过后，军队挥舞着挖战壕的铁锹和气枪袭击集会群众。目

击者描述了他们的野蛮行径。倒在地上的人被打死，毒气直接喷向手无寸铁趴在地上的人们脸上。几十人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中毒。

令人不解的是，负责这项行动的军方当局拒绝承认曾用毒气来对付示威群众。他们或否认用过毒气，或者说只是用了催泪瓦斯。但是受害人的症状表明用了大量的有毒气体。格鲁吉亚医生〔239〕无法鉴别所用的化学物质，故不能对症下药。

事件发生后，安·萨哈罗夫立即飞抵第比利斯，察看情况，并提供帮助。当他和其他人在当地查不出用的是什么气体时，打电话向我求助，问美国医生是否能帮忙。我立即与国务院的苏联处联系，他们又向美国的毒气专家请教，然后分析出哪种毒气会造成所表现的症候，并答应派专家到第比利斯现场咨询。

华盛顿对萨哈罗夫的请求做出迅速和有益的答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军方以恢复秩序为幌子采取的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而莫斯科当局对此事的处理着实令我吃惊。他们首先作出的反应不是去追查罪犯，而是隐瞒真相；此举未成，就栽赃于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朱姆贝尔·帕提亚舍维利身上。屠杀过后不几天，他就被解职了。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当局作出解释。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要动用军队。帕提亚舍维利承认是他请求调军队来驱赶示威群众，但是一口咬定地方军队总指挥伊戈尔·罗基昂诺夫将军向他保证会和平解决，不会伤害任何人。伊戈尔声称伤亡的起因是游行者自己先动武，然而目击者和当时的电视录相都反驳了这种说法。

现行“体制”决心保护那些本应对发布动武命令负责的人，这

最终成为关键的问题。全苏联的改革分子加大了行动力度，为集会自由谋取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在格鲁吉亚，此事件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谁也不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指示，地方官员会采取行动。他们谁都知道，当时的总司令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

从 1989 年 4 月起，格鲁吉亚的政治气氛从期望在苏联内部加强共和国的自治地位转向全面的独立运动。过去在格鲁吉亚人和〔240〕俄罗斯人之间总有一些紧张，但是相对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还算比较和睦。但现在它们的关系迅速恶化。到秋天，格鲁吉亚似乎与波罗的海在朝同一方向迈进。不过，格鲁吉亚的反对派不是团结在一个人民阵线的周围，是分散于几十个互相竞争的政治团体之间。

中亚的暴力冲突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力冲突更为血腥，但渊源不同。6 月，乌兹别克人与一个名为麦斯凯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发生暴力冲突，100 多人死于乌兹别克的福加纳山谷。几天后，在里海北岸发生了同样的骚乱。哈萨克斯坦人车臣和住在诺维乌赞这个仓促修建的油城里的其他北高加索人发起进攻。

麦斯凯特土耳其人是斯大林民族迁徙政策的牺牲品。直到二战前，他们还生活在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里。他们说土耳其语，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远离山下的格鲁吉亚基督徒。战争时期，斯大林把他们迁到乌兹别克，因为他们有不忠的嫌疑。起初，乌兹别克人对他们很友善，在战时艰难岁月里甚至同吃同住。但是土耳其人与他们的民族近邻始终不冷不热，忘不了自己是寄人篱

下——当然他们本来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允许部分背井离乡的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但麦斯凯特土耳其人仍不得不留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人早已占据了他们曾生活的地方，并拒绝让他们返回。

当局把仍与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一起的麦斯凯特土耳其人疏散到军事营地，然后又疏散到俄罗斯农庄，此时骚乱才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土耳其人对此并不满足，坚决要回到世代相传的家园。1990 年和 1991 年，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无数次游行，但都无济于事。

官方对骚乱缘何而起，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从未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谣言也从未予以澄清。地方党政官员和克格勃煽风点〔241〕火，借此显示民主化的风险，以迫使莫斯科武力镇压。不管这些谣言是否属实，很明显的是，在导致出现流血事件之前，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冲突。

第比利斯和福加纳事件的对比说明：首先，当局不顾血的代价镇压和平示威；其次，他们未能或拒绝阻止疯狂的暴徒滥杀无辜。

诺维乌赞的骚乱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显示出苏联对民族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工业设施仓促上马，不顾它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正常生活的侵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生率很高，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谋生。到城市后，他们只有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很难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许多不同的民族争夺有限的资源，小事也会突然引发大骚乱。

人民阵线集聚力量

西南部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时

也开始效仿一年前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

5 月，谢尔比茨基的强硬派乌克兰政权攻击“鲁克”和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为“反苏集团”。然而，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利沃夫，示威愈演愈烈。联合教会各派咄咄逼人，并得到梵蒂冈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如果不废除对乌克兰天主教的官方禁令，与教皇保罗二世的会谈就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鲁克”在概念上，相当于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两个词都是运动的意思，都打着改革的旗号，联合一些非正式团体）。该组织于 9 月初在基辅召开首届大会，推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负责人伊万·德拉奇为主席。德拉奇 50 多岁，身材矮胖，不仅以诗闻名，而且是乌克兰语的积极鼓吹者。有一次我在基辅发表演说之[242]后，他曾写道，令人费解的是，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官员没有尝试说乌克兰语，而仅仅是来此访问的美国大使却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鲁克”在基辅有了根据地，但其主要支持力量仍在乌克兰西部，特别是利沃夫城和附近地区。在那里，从前的两位政治犯维亚切拉夫·乔尔诺维夫和米哈伊·霍尼正领导着方兴未艾的乌克兰自治运动。

9 月底，谢尔比茨基被迫辞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来自卡吉夫的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卡吉夫，乌克兰的民族情绪比西部弱。伊瓦什科的观点似乎接近于戈尔巴乔夫，虽在政策上比谢尔比茨基更能兼收并蓄，但他决心使基辅的政策与莫斯科保持一致。

不过，民族情绪正在滋长。年底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决定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乌克兰语成为国语，新议会选举定于 1990 年春。鲁克及其同盟运动蓬勃发展。11 月底，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前，解除了对乌克兰天主教的禁令。联合教大会开始接管1946

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的各教堂。

乌克兰共产党受到两面夹击。切尔诺贝利事件三年后，媒体最后揭露出事故引发的辐射量比公布的要大得多，更多的地区居民不得不疏散。显然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对核事故未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紧接着，在主要产煤区多耐盆地，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甩掉当地党政领导和党支持的工联，组织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比官方当局更有效地管理着这一地区，从而打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神话。戈尔巴乔夫许诺不久将进行地方选举和经济协调。

但西部的民族主义与东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盟。西部要求政治改革和乌克兰化；东部要求改善工作条〔243〕件，提高生活水平，对该地区逐渐俄罗斯化并不太在意。

虽然白俄罗斯活动家在1989年的大部分时间受到了更大的压制，但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揭露在那里产生了甚至更强烈的影响。其原因是它地处核电站的迎风带，受辐射面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也比乌克兰严重得多。

明斯克的知识分子继续揭发斯大林的暴行，复兴白俄罗斯语言文化，抵制破坏环境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当局不断阻挠他们，禁止党员参加相当于萨尤季斯和鲁克的白俄罗斯组织，即阿德拉真尼运动，拒不审批阿德拉真尼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大会被迫在邻近的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对之表示同情的报纸编辑们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报道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就会丢掉饭碗。

在3月的苏联人代会选举中，持不同政见者击败了几个党棍，其中有明斯克党组织领导人。某些阿德拉真尼的领导人，如瓦西里·

比科夫，与莫斯科改革派党政官员交情甚好，在明斯克对强硬路线颇有微词，指责现行政策与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努力促使《真理报》7 月发表社论，批评白俄罗斯领导层“不着边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隐瞒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愤慨日益增强，一份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受辐射污染地区正在扩大，但没有采取疏散行动，也没有向许多当地居民发出警讯。共和国 20％的耕地受到影响。9 月，灾区居民聚集在明斯克举行群众示威，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一个移民计划，将 10 万人迁出灾区。计划耗资几乎是整个白俄罗斯政府正常年预算的两倍。除非莫斯科一反常态，慷慨解囊，否则根本不清楚钱从何来。

[244] 官方的敌视使阿德拉真尼受惠。到 1989 年末，该组织已发展到 10 万会员，其中 60％是在该组织被迫在立陶宛召开大会之后加入的。

摩尔多瓦的运气不错，在恢复文化遗产方面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得到了共产党的更多支持，但他们也有难念的经：少数民族越来越反对他们的行动。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前后的一年中，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夏末，人阵召集了 30 万人的大游行，支持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恢复在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在这种压力下，最高苏维埃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罗斯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了同声翻译耳机。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声势激起俄罗斯族也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的反对组织，类似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国际阵线”。加告兹（基督教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等更小的民族也组成了以民

族为基础的组织。

有好几个月，当局不给这些组织办理正式登记手续，但它们最终还是于 11 月正式注册。同月，彼得卢·卢钦斯基被推举为共和国党组第一书记，接替保守派塞米扬·格罗素。后者神出鬼没地出国了，到苏联驻墨西哥使馆填补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农业代办的外交空缺。

卢钦斯基虽有斯拉夫的名字，却是摩尔多瓦人，曾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书记。他还不到 50 岁，比格罗素年轻，更支持改革。像他的乌克兰同行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一样，他的大政方针与戈尔巴乔夫接近，这就意味着最终他除了能讨得戈氏的欢心外，不会取悦任何人。比起前任，他给人阵一派以更多的自由，此举令主张统一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大失所望。但他反对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试图安抚分离主义的要求，调停摩尔多瓦民族主〔245〕义和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他的努力最终却葬送于统一毫无妥协余地的争吵。后者连安慰摩尔多瓦多数派的象征性妥协都不愿意做出。

1990 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反对派运动日趋强盛。戈尔巴乔夫将卢钦斯基和伊瓦什科召至莫斯科，把他们拉进改组后的苏共政治局。

民主还是独立

羽翼未丰的苏联反对派组织刚刚开始联合时，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各组织要求更民主、更开放，结束一党制，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强调的

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

这种差异从 1989 年夏天起日益明显。当时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跨区域集团的创始人，试图把有民族头脑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代表拉入他们的组织里，有些人如爱沙尼亚的维克多·帕尔姆教授从一开始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但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犹豫不决。他们支持跨地区代表团的目标，也愿在最高苏维埃里投赞成票，但他们感到他们的议程已走在整个苏联民主进程的前面，因此想尽快与苏联脱钩。他们虽然站在反对派中间，但又提防着不过多地卷入其中。

大多数俄罗斯改革派原则上赞成民族自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上一般投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领导人。但是他们感到唯有苏联的民主进程才能开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大门。将民族主义置于民主之上最终只能在分崩离析的各共和国里产生苏联体制的翻版。另外，作为议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少数派，“民主派”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另起炉灶的倾向却日益明显。

其他共和国的民阵虽处在发展初期，却也正显示出同样的倾向。4 月以后，格鲁吉亚代表绞尽脑汁在其共和国与莫斯科之间保[246]持距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已习惯于将焦点集中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摩尔多瓦人也强调自我发展，但在试图寻找回他们的罗马尼亚文化之根时，遇到了来自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强大阻力。

戈尔巴乔夫进退两难。尽管党内、军方和警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在增长，他仍然打算使现行体制实现自由化。但是，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权欲熏心的民族主义者”——他是这样来形容他们的——使他很难如期进行改革。

正是这种态度扩散到了 8 月份的中央委员会上，使其向波罗

的海沿岸三国发出了不祥的警告。

还有一个个人因素促使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跨区域集团推行的路线，并排除了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达成妥协可能性，那就是叶利钦打下向他挑战基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989 年夏，叶利钦和改革力量的联盟已经形成。他虽然没有成为跨区域集团的唯一领袖（一些像萨哈罗夫那样的显赫人物仍怀疑他是打入内部的密探），却是该组织主席团成员和最孚众望的人物。如果说 1986 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地位如日中天、而叶利钦还是一个忠实小伙伴的时候，就已对叶利钦博得的民心大发醋意的话，那么，当他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而叶氏在选民中一呼百应之时，其反应不是会更加强烈吗？

不过，1989 年夏，谁也不能绝对肯定戈尔巴乔夫会做何反应。他已显示出非凡的处变能力，他或许能继续把握自己。既然现在很难压服叶利钦，他可能会认识到再次联袂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他在伙伴关系中仍能略胜一筹。

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

与戈尔巴乔夫最终和解是跨区域集团组织者的初衷。他们自认为正在给他的目标提供关键的政治支持。大多数人明白，为了免遭赫鲁晓夫的厄运，他几乎不敢公开支持这一组织。但他们希望他能提供间接的保护，以便集聚力量，一旦跟保守派摊牌，也好助他一臂之力。〔247〕

就叶利钦个人来说，这些希望不久就破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保持不冷不热。到秋季，种种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对他新一

轮的不信任又开始了。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在叶利钦访美之行后接踵而至。

6月间，叶利钦曾向我提到他想去美国考察。我已经就如何为他安排一次美国之行提出了一些想法。他很少出国，更没去过美国。我相信，如果他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不过，既然他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席，外交礼节就要求首先应邀请他的上司。我们在住房方面有官方的合作协议，包括人员互访。我想，等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访美之后，就可立即邀请叶利钦。

他后来被选入最高苏维埃就改变了形势。这时，他是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的主席，因而就扫除了程序上的障碍。我请求国务院促成一个国会拨款委员会来邀请他，但夏季里没有付诸行动。劳动节后，我从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旅行归来，获悉他已在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基金会的詹姆斯·加里森的协助下安排好了出访，将于9月9日启程赴美作巡回演说。

此时，我对叶利钦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情况令我担忧。他无疑希望引起官方的极大关注，但我没有把握访问的组织者是否有资格安排一些他想要的会谈。向国务院快速查询后，我得知并没有安排什么约见。我立即去见他，看一看进展如何。

我们的会面是在莫斯科宾馆的接待厅，那里是供最高苏维埃代表接见来访者的专用地点。他预定第二天飞往纽约，并给我看了美方资助人事先准备好的计划。按此计划，他每天要做两场、三场——有时甚至四场演说，常常不在同一城市。其中有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中午要在迈阿密做一个演讲，而接下来在晚餐之后还要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248〕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着把稿子还给他，“你精力过

人，但这样的日程非累死你不可。我看谁也坚持不下来。你必须告诉赞助方把日程安排得轻松一些。”

他说他自己也有点纳闷，更让他生气的是新闻报道说，他此次访美是想从演讲中赚些钱。他强调说这绝非是他的目的。“演讲所得的款项将转交我们的组织用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他说，“我计划为我们的医院购买一次性消毒针（苏联医院仍照常使用旧注射针头。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医院最近发生几名儿童感染上致命疾病的事故）。不过，这也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去拜访你们的领导人，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国家。”

我向他保证将尽我所能在华盛顿安排一些会面，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有些政要可能正好不在。他接着问，到达纽约时谁会到肯尼迪机场迎接。我说还不清楚，想必赞助方会安排好的。“不过，国务卿贝克会来，是吧？”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接着我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解释说，高级官员到机场会见观光客，即使是最重要的客人，也不符合我们的惯例，况且贝克正在华盛顿而不是在纽约。

“噢，要是那样，卡奥莫州长肯定会在那里吧。”他继续说。我不得不打消他的这种奢望，指出州府在奥尔巴尼，而且纽约有那么多显贵的外宾。州长哪怕只到机场迎接其中一小部分，也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哎，从奥尔巴尼坐直升机不过一小时嘛。”他嘟囔着。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压轴戏的前奏：至少，他期望在华盛顿时要与布什总统见上一面。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与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结论是叶利钦不可能与总统会面，但是国务卿贝克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倒有可能接见他。〔249〕

我尽量安抚他，表示他无疑会在白宫和国务院受到高规格的

接待，但别期望非见总统不可。他坚持说，如果在最近的竞选之前他已经去过美国的话，就不会想要见总统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总统不是接见过来自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了吗？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会见偶尔会有，但不是惯例或者必须如此。我不好直说跨区域集团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反对派组织，苏联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也不是反对派组织中的唯一主席，而只是几个主席之一。他无疑已考虑过这些没有必然联系的技术问题，其逻辑有点像"如果你们想要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为何不先把我们视为民主国家来帮助"？

会谈后，我的心情反而比以前更为沉重了。叶利钦的期望如此之高，不让他失望实在很难。而且，如果他试图按照我看到的这个计划行事的话，到最后肯定会累垮，后果难以预料。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打电话与国内的人员联系，看形势能否有所改观。叶利钦曾提到，奥伯林学院院长、美国最敏锐的苏联问题观察家弗雷德里克·斯达尔参与了此行的赞助，他期望斯达尔至少陪同他部分行程。如果叶利钦没有搞错，我也就稍微放心一些。我跟斯达尔很熟，知道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比他更在行的找不到第二人。

弗雷德里克当时不在奥伯林。我的秘书从新奥尔良寻到了他的踪迹，总算与他接上了话。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令我沮丧的是，几个月前虽然赞助单位找过他，当时他也同意为叶利钦此行提供帮助，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起此事了，因此目前的计划他并没有参与。

我们下一步是敦促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争取一些高规格〔250〕的会晤。我请他们重提与总统见面之事，这倒并非为了取悦叶利钦本人（我们能够应付他的任何失望），而是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看

到总统与他打交道，这将是对苏联民主进程的支持。

与叶利钦的会谈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希望利用此次出访提高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样，外界就会看到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袖正在加紧活动。

当然，我了解，白宫的扭扭捏捏事出有因：谁都不愿意做任何冒犯戈尔巴乔夫的事。然而，我认为，白宫的态度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建议。苏联要想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允许反对党发展。其领导人必须明白，外国政府与反对派领袖接触是完全正当的。我认为决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支持原则，而非人情。

当然，如果叶利钦支持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避免采取助纣为虐的行动也是明智之举。但事实并非如此，叶利钦赞成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削减军备预算，加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自治进程。他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更接近于我们的期望。我认为，引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民主同盟合作有益无害。从长远看，这也符合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利益。

在叶利钦抵达华盛顿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不安排与布什总统的正式会谈，但是总统和副总统丹·奎尔在叶利钦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顺便去看看他。这种方式似乎合情合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接到通知让我通过外交部向戈尔巴乔夫作出解释。我依命而行，但感到多此一举，而且有悖常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玛·撒切尔首相解释总统为何会见了工党领袖内尔·金诺克；为什么没有注意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他希望创立一个民主政府体制？如果对我们的行动有何疑问，他可以提出来，至于是否做出解释要看有无时间。

叶利钦的美国之行进展顺利，我心中总算石头落地。新闻报

道似乎持肯定态度。《今日美国》头版标题《鲍里斯·叶利钦：新星升起》，其中这样写道："独立的苏维埃立法者'就叫我鲍里斯'叶利钦风靡美国——与乞丐、政治家和管道工握手，拍肩，交谈。"[6]

〔251〕

不幸的是，叶利钦抵达华府之时，他已开始显得疲惫，在白宫留下的印象很不好。白宫负责欧洲事务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事后告诉我说，叶利钦进入西厅准备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突然停下来，挥挥手，宣布如果不是去见总统，他就不再向前跨出一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总统只是在会谈期间过来一下，不过他的举止也的确不讨人喜欢。据报道，会谈本身进展顺利，但在场人员感到他并没有讲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他口若悬河，斯考克罗夫特几乎睡了过去。列席会议的人谁也瞧不起他，把他视作夸夸其谈、无足轻重的政客，认为他在政坛上只会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新闻界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活动一开始显得漫不经心。《真理报》发表了塔斯社有关他与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与总统会谈的简短报道，并根据白宫的声明称，布什总统在会谈中提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对改革的支持。同期还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不透露姓名的"官方圈内人士"的话说，叶利钦的计划非常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真理报》对叶利钦出访的兴趣猛增是在意大利报纸《共和国》上刊登了一篇讽刺叶利钦的长文之后。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维多利来亚·朱可尼把叶利钦描写成一个醉醺醺的小丑，闹出一个又一个恶作剧，不断让主人感到难堪。他的描述与我所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据我了解，叶利钦有时，特别是在累了或者生气的时候，很可能在社交场合显得失态。但我也注意到朱可尼所讲的并非

一律准确。例如，他把"杰克·丹尼尔酒的属性"说成是"肯塔基威士忌"，这足以在田纳西对立的各派美食家之间挑起争端。

苏联报纸尤其是《真理报》转载外国报刊的整块文章是非常罕见的。具体来说，此次例外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叶利钦的声望。通过引用非共产党的报刊，《真理报》的编辑(252)们希望增加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窘态的真实性。

朱可尼讲述的故事出现在《真理报》上也可能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协助，是通过驻罗马的塔斯社分社电传过来的。不过，随后的事件显然是出自克格勃之手。叶利钦访美几周后，最高苏维埃委员们收到了美方组织人詹姆斯·加里森给其董事会写的绝密信的复印件。它以平朴的笔调描述了叶利钦万般丑态的花边新闻，与朱可尼描写的没有两样。

苏联政治家跟我提到，信的俄语译文神秘地出现在他们的信箱里。乌拉尔的一位代表送给我一份，让我鉴定其真伪。我感到复制得很内行，可能是激光照排，俄语翻译干净利落，从瑞士苏黎士邮出，却没有实际地址。

我给送复印件的代表回信说，无法确定一封私信译件的真伪，不过他可自己想一想，谁能够而且有意去截获私人信件、译出、复制并从国外寄回。

自 1989 年秋，发生了一系列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他开始收到恐吓信，有时是匿名的，有时好像是代表克格勃。他对此采取藐视态度，因为他不相信克格勃甚至会愚蠢到让他以身殉职的地步。他们的目标无非是想削弱他在公众中的威信，并吓唬吓唬他本人。

1992 年，叶利钦能够接触到克格勃档案以后对我说，他自 1987 年离开政治局后，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本应免受这种对待，但就连他的厨房（苏联家庭常

在此拉家常）也遭窃听。按他所说，如果把窃听材料的副本摞起来，准会堆起二三十英尺高！[7]

难以置信的是，戈尔巴乔夫竟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253〕

经济上的灾难

正当一个针对戈尔巴乔夫共产党机器的反对派形成之际，经济方面的消息也完全令人沮丧。物资日益短缺，生产开始滑坡，犯罪率上升。改革的初衷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糟。谁也不再完全相信当局所说的变化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在大谈新政策、新思维的背后，官僚们仍然无视再也无法掩盖的缺点，仍在抵制一切有益的改革。由于了解到了更多有关国外生活的准确信息，大众已敢于直言不讳，而且传媒揭露出来的缺点越多，人民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

1987 年通过的“国营企业法”许诺给工厂经理松绑，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终过渡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的指标大大简化，工厂经理有权在中央指令体制以外出售一部分产品，从而形成一种“国家订购”（政府机关完成认购合同）与开放市场自由买卖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与此同时，共产党官员停止瞎指挥，并减少主管经济的党政官员人数，如果相应裁减政府计划和中央部委人员，经营者会有更大的独立性。但这点并没有落实；相反，行政当局由于逃避党的已经很少的监督，变得更加专断了。

莫斯科围绕经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如果只听他们的发言，简直会断定正在发生一场工业管理革命。不过到各州去走走，跟经理们聊一聊，却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

在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我向几位行政官员询问了国家订购任务与市场自由买卖的比重。结果无一例外，国家订购占产量的 90%以上。

萨哈林一个大渔场的主任说，如果让他自行处理，所有产品干脆由国家订购一包到底。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他虽然在名义上有权在市场上出售 10%的产品，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接到国家订单，才能得到打渔船队所需的燃料供给。因此，他不得不将捕捞量削减了 10%。 [254]

乌兰乌德羊毛场的经理骄傲地跟我说，她的厂子百分之百地靠政府订购。她坚持认为必须这样，因为没有政府计划调拨，她就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显然，在提法上将计划产量改为国家订购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企业经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党政官员事无巨细的监管，但仍像以前一样依赖政府计划和有关部委。但现行体制已处在问题成堆、修修补补、穷于应付的状态，比以前更难有效地运转了。

1988 年通过的《合营法》为合营的小企业敞开了大门，其进展要好于《国有企业法》。许多从事贸易和服务性行业的合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这种通往市场经济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因地方官员的敌视、沉重的税收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量犯罪诱因而受到了扼制。不过，到 1989 年底仍有 100 多万人受雇于合营企业，其收入一般也远高于国营企业职工。

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领导层仍然敌视私有制概念。戈

氏继续坚持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措辞语气与他谴责 1988 年爱沙尼亚议会尝试私有化时如出一辙。

自 1987 年起，戈尔巴乔夫将改革与革命等同起来。在政治领域里，他促成的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他发出的经济信号却混乱不清。他一方面不断地呼吁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从未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实质性内容。

总理雷日科夫是渐进主义的坚定信徒，对实施经济改革负主要责任。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尤其是从军品向民品生产转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只能循序渐进，并在上级指导下进行。他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就打破旧体系感到担心，他没有认识到，只要旧制度未受触动，并仍有强大的抵制力，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255〕

整个 1989 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双方都努力避免将其公开化。虽然雷日科夫不赞同利加乔夫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在经济问题上却越来越与他走到一起，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在敦促加速变革。然而，正如跨区域代表团中的改革者不断指出的那样，双方谁也拿不出促使经济复苏的锦囊妙计。

第十一章

[256]

关键的一年

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实是从1989年开始的。自此，实际上开始了既转变我们的经济体制，又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 1990年1月[1]

联邦主义的观念在苏共体制下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公报 1989年9月20日[2]

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一年一度的休假，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这时他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这仅仅是令人沮丧的画面中的一个亮点而已。经济继续滑坡，商店里商品短缺日益严重，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消费者日益不满；新议会里，势力颇大的反对派与党和政府背道而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政治家开始大谈分家散伙，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在集聚力量，东欧也摆出改革架势。莫斯

科还不清楚华约能否经得起冲击。面对诸如此类的压力，共产党明显地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派别活动虽然仍为党章所禁止，但已明显存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开始怀疑总书记制定的路线。

〔257〕 最急需认真对待的还是风雨欲来的民族分离情绪。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度假时花了很大精力思考这些问题。

什么样的联合？

几年来，不断传闻苏共中央将召开全会处理“民族问题”。问题正积弱成疾。1988年，几十年来党的文件首次开始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问题的解决似乎遥遥无期，莫衷一是。全会推迟，推迟，再推迟。

到1989年秋季，事态发展已明显超前于苏共决策。如果共产党还想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的话，就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选择。期盼已久的“民族全会”最后于9月19日召开，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结果，谁也不满意。

全会通过的冗长文件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革新的联邦”，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

有一个德国谚语，大致可译为“既已说A，必将说B”。看到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民族政策草案，不由得想起这句话。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似乎是要设法说出“A”，但却排斥“B”。文件中含糊地表示，可能有某种“A’”之类的方案取代“B”，来完成字母顺序的排列。

不管怎样，该文件毕竟承认斯大林开创的“行政命令体制”“忽视了民族发展的要求”，“把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压缩”到了极点，使宪法赋予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形式”。文件进一步指出，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压制”现象，整个民族被迫重新迁徙，知识分子被错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迫害”。文件承认，许多经济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这严重损害了民族的价值观和传统。文件还谴责了那些认为民族间〔258〕分歧日益缩小、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观点。

走到这一步，已算不错。这与1986年党代会发表的溢美之词大相径庭，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写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的判断也大不相同。然而，它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彻底，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文件还（事实上不止一次）断言，现存联盟是“完全自愿的”。[③]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因为文件辩解道，事情弄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也只有恢复真正的列宁政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故而不可能承认列宁下令武力合并这些共和国是错误的。

如果救治处方合理，这种不诚实也可算作必要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得到宽恕。然而，尽管文件大谈“新联邦”将是如何截然不同，但却排除了任何可能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公开宣布，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绝不可能存有联邦主义的想法。

苏联宪法依然保留着众所周知的第六条款，该条款确立共产党为国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并享有全社会“领导角色”的地位。如果唯一的合法政党不能建立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联邦”宪法都将是一种耻辱。

此外，文件还特别否定了各共和国提出的如下更重要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其法律的制定无需同苏联颁布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可限制其他共和国的移民，居

民享有投票权。文件还强调继续执行征兵制，没有任何拒服兵役的规定。各共和国的财产属于共和国也属于苏联，但谁能得到主要份额，谁有权力处置财产，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全会一结束，谢瓦尔德纳泽就赴美国华盛顿和怀俄明开会，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似乎对苏联最终面对这一问题谨慎乐观，感到现在不得不考虑有关分离的宪法权利。他预言说，苏联当局将制定程序，以使分离有序地进行，但他又怀疑，如果当局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问题，事情能否发展到这种地步。他[259]向大家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都不会动武。他还特别提到，无论在哪里动武，都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且极有可能导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

民族全会结束后，委员会开始认真地为苏联界定一个新的宪法结构。几篇学术文章发表，有的暗示正在考虑一种灵活的联盟，其中包括加盟共和国可以不同的方式确定跟中央的关系。有的作者援引沙俄的占领地区为例，说当时芬兰便享有与各地不同的宪法地位，他们还注意到波多黎各、密克罗尼西亚同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州就不一样。

对我来说，这种方案作为联盟的基础似乎是不切实际的。19世纪的芬兰和20世纪的波多黎各的方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们例外于国家大部分地区一致遵循的宪法原则。换言之，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仅有几个地区享有特殊地位的苏维埃联邦，但却难以想象在一个联邦中各加盟共和国都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可按各自的意愿对其加以改变。最终，灵活（或按俄语直译为“多变”）联邦的想法由于行不通而被抛弃。

除有关新苏维埃联邦性质的争论之外，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

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工作进展缓慢，总是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许多观察家后来惋惜道，如果1989年能为各共和国提供一个具体、宽松的联邦方案，它们将会心存感激地予以接受，并很可能阻止那种刚露头的分离主义——不过，谁能说得准呢？

"卫星帝国"的崩溃

正值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压力逐步加大之时，苏联在欧洲的"联盟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崩溃。

该地区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于8月份在波兰成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紧步波兰后尘，虽然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灵活些，但也未能扭转乾坤。 〔260〕

苏联公众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巨变，明显持消极态度。一些知识分子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波兰的局势以及西方的反应，大多数居民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居民并不关心外围帝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

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在此种情况下，苏联在欧洲边界的退让将会造成战争恐慌。但是，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在西方看来是富于

侵略性的政策。

早在四五年前，苏联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导弹，因此它可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但到 1989 年，气氛就大不相同了。

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想到华约会这么快解散。不过，他的国内政治改革进程使他完全可以放手处理此事。他明智地决定找出必要的理由，以理解的心情，体面的方式，接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做出的选择。

不过，德国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的事态漠不关心，但对德国却是个例外。对苏联民众——尤其是对军方来说，德国的分裂是谁打赢了二战的最好明证，也是德国再也不会威胁苏联或俄罗斯的最可靠保证。

〔261〕戈尔巴乔夫易于接受在东柏林出现一个“改革的共产党”，甚至——虽然困难——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但其前提必须是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受触动。1989 年秋，出于对维持这种局面 10 年或 10 年以上的幻想，莫斯科坦然接受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就戈尔巴乔夫而言，德国统一肯定是未来的问题，也许要由以后的领导人来加以解决。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在苏联外交学会作演讲时语惊四座。当时他评论说，一个分裂的德国能立于一个分裂的欧洲之中，但却不能存于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如果苏联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不久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统一问题。在座的对外政策专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好像他们从未做过如此设想。即使有过这种想法，他们也必定会将其毫不留情地抑制下去，而不会公开讲出来。

等到苏联领导人领会到布热津斯基讲话的真实含义时，已到了年终。12 月初，刚从马耳他首脑会议归来，我就与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了东欧的局势。他重申，无论发生什么，决不会使用武力，他似乎对北部地带的局势表示满意。他还预言保加利亚不久也会改革，但对罗马尼亚表示悲观，因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走向压制而非改革。具体到东德而言，他说他对新领导人就其“国家的地位”作出的承诺印象很深。换言之，德国统一还需等待时日。

但是，不出几周，苏联决策者就开始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他们正面临德国统一不可抗拒的压力。11 月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边界开放。面对泛滥的移民潮，没有人再相信边界开放之后，一个分立的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在新年前夕，我见到了当时苏共国际部的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首席”专家瓦连金·法林。他评论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④

这确是事实，而且这也成了 1990 年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继德国之后，在祸不单行的苏联阵营中，对苏共和克格勃挫伤最大的是年底在罗马尼亚发生的血腥革命。对于针对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和受到憎恨的保安部秘密警察的暴力事件，苏联新闻〔262〕界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电视也唯恐观众错过任何一个暴力镜头。但当反齐奥塞斯库的武装请苏联介入给他们以支持时，莫斯科拒绝了，它要以此显示，军事干涉东欧事务——哪怕是在西方可以容忍的情况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震动。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派认为它说明了现存体制抗拒变革将会造成的后果。但是，克格勃和苏共保守派明白，在反共革命中，秘

密警察和党魁们的下场将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公开化受到责难

群众要求改革的压力与新闻自由的扩大越来越呈相互推动之势。《莫斯科新闻》，一份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在雅各·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下，一跃而成为全国性反对派力量的喉舌。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机关报》描述了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披露了浪费巨大的国防开支。费得罗·布尔勃拉茨基的《文学公报》刊登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章，揭露了过去对外政策因无知而造成的恶果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谢尔盖·扎利金在《明天》上刊载了描述生灵惨遭涂炭的系列文章，并且自70年代索尔仁尼琴遭流放以来首次发表了他的作品。伊万·拉普托夫也使《消息报》成了一份很受欢迎、报道客观的报纸，让读者了解全国局势的发展，积极推动农庄的私有化和自由企业制度。

但是，这些编辑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其中一些较大胆的编辑同苏共的意识形态部门进行了较量。如果他们的越轨言行被认为特别严重，就会被瓦季姆·梅德维捷夫召来训话，后者取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管了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长职位，有时戈尔巴乔夫还会亲自训斥他们，多数人受到训斥后在一两个问题上会收敛一些，但此后又回到他们所喜爱的题目上。他们在党的压力下如履薄冰，但谁也没有掉下去。

科罗季奇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不时地训斥他们，是为了向利加乔夫、亚佐夫和鲁茨科伊显示，他已让他们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正期望他们改变做法。这一推测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中

也间接地得到了证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不能理解科罗季奇 [263]
如何能够不断地保证“改过自新”，然后又不断地从事他发誓不再做的揭内幕活动。不过，其他人则发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有一种情况令戈巴乔夫感到无法忍受，那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对他的声望表示质疑的文章。1989 年 10 月，《论据与事实》刊登一篇短文，说在其读者中间，萨哈罗夫比戈尔巴乔夫更孚众望。就是这篇报道使苏共最后下决心要把印刷媒体重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事件的主谋并不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 1986 年、1987 年间提拔的编辑，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斗士。是他把一份默默无闻的简报办成了一份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论据与事实》几十年来一直是内部发行的大事综述，供知识协会主办巡回演讲时参考。该协会是苏共控制的民间组织，致力于成人教育和宣传。直到 1988 年，这一刊物才向普通公民开放征订。然而该报的老编辑弗拉基斯米拉夫·斯塔尔克夫决定放弃宣传，转而提供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客观事实。在 1981 年，他就曾设法瞒过审查，披露出波兰独立贸易联合会即团结工会颁布的整套计划，但是这一周刊发行量太小，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论据与事实》向大众一公开，发行量猛增。1989 年就超过 2000 万份，1990 年将近 3400 万份。表面上看，该刊给人的印象并不深。8 页的小报，单面印刷，对折之后也不切边，且只能按照页码顺序阅读。它备受青睐的秘诀是什么呢？首先，名副其实，提供给读者的是“论据与事实”，前者已充斥于苏联社会，但后者却显得贫乏，而斯塔尔克夫强调的正是后者。与大多数苏联报纸杂志相比，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而其他报纸杂志最多只

是偶尔摆一下观点。其次该周刊便宜，报亭售价 2 戈比，年订价仅 1 卢布 4 戈比，按当时贬值的官方汇率还不到 2 美元。

1988 年，我接受该刊采访时，斯塔尔克夫的不同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联刊物刚刚开始敢于采访美国大使（《机关报》是〔264〕第一个），但往往要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斯塔尔克夫却单刀直入，触及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我们真的窃听了你们的使馆吗？"他问，"如果是真的，你有证据吗？"[5]

"是的，你们的确那样做了。"我回答说，"而且我已掌握证据。"他的提问和我的答复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公众喜爱他的刊物，因为它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而且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

斯塔尔克夫尽管很勇敢，但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可能采访利加乔夫，也可能采访萨哈罗夫。民意测验的数据过去总是不予公开，随着民意测验的普及，《论据与事实》开辟专栏予以报道。

10 月份的一篇文章显示，《论据与事实》的读者认为萨哈罗夫是国内最孚众望的政治人物。这一下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为实现更开放的政治体制，正在同党内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对其领导权威和威望提出挑战的行为，都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立即于 10 月 13 日召见主要编辑、记者和作家到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们诋毁改革。[6]

第二天，梅德维捷夫传唤斯塔尔克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他辞去《论据与事实》编辑职务，接受一份别的工作。他可选择去编辑一份苏共资助的在布拉格发行的日报，或去卢基扬诺夫主管的《最高苏维埃公报》。

照过去的惯例，专门负责新闻事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

必须服从。但斯塔尔克夫拒绝默默地离去，而将此事提交给了他自己的编委会投票裁决，结果是以 47 比 2 的票数支持他。形式上，他不是党的雇员，而是属于其董事会成员很少碰头的知识协会。

一连几周，他和那些与新闻自由利害攸关的改革派焦急地等待着迫使他离职的进一步行动。可是一直也未见动静。戈尔巴乔夫显然决定不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不过，这一事件促使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免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立法运动，以保证新闻采编独立于共产党控制。

戈尔巴乔夫虽未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但却相当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斯塔尔克夫曾经是改革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且〔265〕始终不渝，但他绝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企图炒他的鱿鱼。1992 年，斯塔尔克夫警告我说："如果谁把开放的成果归功于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者的侮辱。1991 年 8 月之前，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不是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了公开化，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

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开除他呢，还是仅仅想吓唬他一下。他肯定说，戈尔巴乔夫是真的要迫使他辞职。"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我问，"如果他坚持到底，肯定能做到。"

"不，他办不到。"斯塔尔克夫回答，"世道已变，今非昔比。"我没有问他是谁最初开创了那种变化的契机，因为很显然，戈尔巴乔夫 1989 年的所作所为已使斯塔尔克夫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抢先一步

由结果判断，9 月份共产党全会公布的"民族问题"决议和 8

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强硬声明，是刺激而非阻碍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三国的独立运动在秋季和冬季获得了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到 1989 年底，当三国以不同的策略向同一目标前进的时候，立陶宛人从爱沙尼亚人手中接过了领导大旗。

8 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的威胁。表面上，他们力图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但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传统上最保守的领导职位）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声明。人民阵线甚至更加无所顾忌：例如拉脱维亚人阵称声明是“不适当的和专横的”，并将其与 50 年前莫斯科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时的态度相提并论。⑦

立陶宛并不限于批评“8 月声明”。他们的领导人还向莫斯科提出进一步挑战，呼吁召开 12 月党代会，讨论如果苏共拒绝允许立陶宛共产党自治，该党将考虑退出苏共。

〔266〕利用放松旅行限制之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加强了同外国人的接触，包括同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波罗的海社区的联系。爱沙尼亚人开始把到芬兰探亲当作很平常的事。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裔美国人也开始到此访问，有的还留下来提供帮助和咨询。

10月份，我接到了一份会见请求，发出请求的是将要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正式会议的爱沙尼亚代表。3 人中有 2 人我认识。伊戈尔·格拉金，一位 37 岁的法学教授，高前额，留小胡子，笑容可掬，是斯巴索别墅社交性集会的座上宾。虽然他家住塔图大学城，但却是由帕鲁农区选出的代表。其父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他说俄语带爱沙尼亚口音，喜欢用爱沙尼亚语拼写他的名字而不愿用俄语名字格利亚琴。马

留·劳利斯庭是塔图大学的哲学教授，头发金黄，态度严肃，生于爱沙尼亚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曾是爱沙尼亚独立时的一名共产党员，主持过"请求"加入苏联的议会。然而，她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代表之一。格拉金和劳利斯庭得到了哈尔多·阿斯梅的响应。阿斯梅作为塔林贸易联合会的地理学家后来当选为该市市长。

与7月份的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没有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大战略，但强调他们有决心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爱沙尼亚。虽然他们觉得爱沙尼亚是一个权利受到剥夺的被占领的国家，但他们更明白，仅仅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获得独立。他们将不得不去谈判，并采取灵活的策略。毕竟他们必须避免诉诸武力。正如夏天的立陶宛客人一样，他们很清楚，暴力将使争取自由的努力付诸东流，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解释。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不承认政策，但想弄清其内涵。特别是，他们不清楚，与苏联当局谈判的行动和参加苏联的某些政治机构是否会削弱他们认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是非法行为的立场。他们很可能已从拜访过我的立陶宛客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态度，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想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答案。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正如7月份曾向立陶宛人所做〔267〕的一样。我强调，"不承认"政策不可能改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努力获得自由时是被迫加入到苏联机构中去的。只要他们没有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赞成加入苏联，他们加入该"体制"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苏联接管是合法的。与此同时，我解释说，宣布独立并不足以保证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认可：在可望得到正式承认之前，独立必须已是既成事实。

来访的爱沙尼亚人平均比萨尤季斯代表团成员年轻，这大概纯属巧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阵线运动汇集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也许是由于格拉金、劳利斯庭和阿斯梅会说英语，故被选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是二战后不久出生的——在1949年与1952年之间。他们并不是已过中年、仍怀念着已逝去的田园诗般童年的那种人。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苏维埃爱沙尼亚”的产物。另外，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人不久后退党，另一位也没有落后太久。

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这就是苏联公众的心态。虽然新闻界日益开放，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们认定当局故意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混淆是非。

到1989年秋，东欧已开始摆脱了苏联。夏天，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匈牙利共产党严重分裂，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式（即外柔内刚）的革命已遍布全国。东德的昂纳克下台，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解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途未卜，年底前就将死于非命。

〔268〕 事件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时，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方发言人都宣布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计划于12月初举行马耳他会晤。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关于会晤的建议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在过去，当对结果没有把握时，他就会推迟会晤，而近一年来却迫不及待地要与布什总统举行正式会谈，以确保美国政策能继续里根

确立的进展势头。进一步讲，他开始更热中于到国外旅行，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处理日益混乱的国内事务。马耳他之行很容易配合盼望已久的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对教皇保罗二世孜孜以求的拜访。

从美苏双方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举行马耳他首脑会晤。但是计划一公开，就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联其他地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时谣言四起。盛传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或将要做一笔交易，用东欧的解放换取默认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苏联民族问题。1989 年初，有关基辛格建议与苏联领导人就东欧前途举行谈判的报道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谣言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治新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见我。这次三国都有代表，10 月份见过我的那三位爱沙尼亚人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两名 7 月份见过我的立陶宛人（安塔纳伊捷斯和莫季叶卡）。新面孔中包括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他时年 34 岁，是维尔纽斯检察院的律师。满头黑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留着小胡子，喜欢穿黑色衬衫。他不久被提名为立陶宛常驻莫斯科代表（相当于大使），从而成为我的重要同行。另外，该代表团中最能言善辩的是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他最近被提名为立陶宛副总理，不久将成为总理。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拉脱维亚人，比舍尔斯·伊尔马斯和马夫里克斯·乌尔夫松斯。比舍尔斯是立陶宛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也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年近 60），体魄高大健壮，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角质架的眼镜。我们早些时候见过面。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率一行要员访问过美国。他的俄语无可挑剔，但当我见到他妻子时，才意识到其家眷在家里都说拉脱维亚语。她的俄语口〔269〕音很重，有时抱怨自己难以用俄语表达。乌尔夫松斯年近古稀，头

发全白，在里加艺术学院教政治学，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是犹太人，由此使人想起要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并非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民族。

由于天已不早了，我们就在斯帕索别墅大餐厅的桌前坐定，这样记录方便，同时旁边还有甜点饮料。

客人们准时到达。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做了交易？虽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但这次我欢迎这种提问，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你们要担心的事很多，但这不在其中，"我说，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交易。从来不曾有过交易，而且今后也不会有"。

他们不相信，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一位客人询问："但马耳他会晤中会谈些什么呢？"

我并不确切了解，尽管我期望双方就军控、东欧以及未来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我可以确定不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我们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要求以东欧自由为代价换取这种变化呢？"

"布什总统不会同意。我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与我们经常打交道，知道这样做行不通。此外，他怎么能使干涉东欧的威胁切实可信呢？他已无法在那里动武，几乎谁都明白这一点。"

话题接着转到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上，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我指出，即使苏联政府允许（而这一点也是难以捉摸的），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将使它难以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我向他们建议说，他们应假设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援助也是有限的，他们应该调动国内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政

策，这样他们就将站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

会谈结束时，我还不能确定已使他们相信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印证了我对他们讲的话。

官方观点

[270]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浪潮成为许多场合的热门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布热津斯基来访时与雅科夫列夫的谈话。我们问了许多有关东欧的问题。雅科夫列夫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那些国家结束共产主义统治，苏联也不会使用武力。这也是我们从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听到的信息。

布热津斯基接着问，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宣布独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亚科夫列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将是改革的结束。"他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先尝试实行五六年"真正的联邦"，看是否可行。他补充说，它们可拥有"政治经济主权"。他没有确切具体地说明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会结束改革，但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执意独立，强硬派将上台。

几周后，我见到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他的观点大不相同。作为中东问题专家，他已辞去了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是取代雅科夫列夫就任此职的），当上了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其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他相信，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会了解到，没有联盟其他组成部分的支持，它们不可能有所作为。这一现实会使它

们翻然醒悟，脱离的呼声也就自然会平息下去。

大多数苏联公民感到很难理解的是，即使因独立而导致经济恶化（并不一定会这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民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他们也难以理解民族独立不一定意味着打破现存的贸易纽带，中断人民的正常往来。这种困惑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苏联生活在铁幕之后，这一铁幕隔断了人民与外界的交往，也使〔271〕所有的贸易离不开官方的对外贸易部的指导。许多本应懂得更多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把独立想象成了孤立的同意词。

部分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事业，甚至更不同情中亚诸国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错误地相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证明它们享有的资源和投资超过了应得的份额。

然而，1989年俄罗斯开始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尝试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起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采取民主联邦或邦联的形式也不愿看到苏联解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抓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放，违背它们的意愿，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

马耳他会晤

到12月1日，当布什总统抵达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开始酝酿已久的会晤时，他终于确信他能够而且也应该支持改革。美国媒体批评他缺乏创新和领导才能，受此触动，他决心改变在公众中的形象，先后宣布了一系列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就是经济方面的。

布什班底仍然感到担忧的是，戈尔巴乔夫会利用这次首脑会晤之机，提出一些轰动性的建议，来取得宣传上的优势。但我认为无需有此担忧。我们已不断地警告苏联要避免雷克雅未克式的意外之举。他们也对此做出了保证。我相信他们，因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与我方配合，而不是一味的哗众取宠。他在西方人眼里表现得还算不错，并没有玩弄宣传游戏。

布什希望赶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提出一揽子重要建议，但总统班底一般都要从华盛顿官僚机构互动的过程中取最大的保险系数。事实上，华盛顿已产生了一个拆除某些冷战贸易壁垒的进程表，其中的大多数措施本可以也应该是在 6 或 8 个月之前就提出来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终于还是前进了一步，允许建立一种更为积极的经济关系。

〔272〕戈尔巴乔夫来到马耳他是准备抱怨布什政府在发展伙伴关系方面过于消极。然而，布什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拆除经济壁垒的计划，从而消除了他的疑虑，戈尔巴乔夫显然很高兴。不过，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会谈中，布什和贝克都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例如，他辩解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非常模糊，有时也不准确。但是，布什忽略了他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是集体的这句话的意旨。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因此，这也标志着他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不过，这种误会在此次峰会上只是个例外。仅次于里根—戈

尔巴乔夫雷克雅未克会晤，此次会晤比任何其他美苏首脑会晤的结果更富有实质性意义，尽管并没有签署什么重要协议。马耳他会晤最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拆除贸易壁垒以外，当数在有关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达成的非正式谅解。这些并非是背着第三者达成的“交易”——对此我们的盟国和东欧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反对——而是基于对形势的斟酌，相互做出的保证。

戈尔巴乔夫向总统保证不会在东欧动武，也意识到了苏联军队将不得不从那里撤走，并将允许东欧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仍然希望保住华沙条约组织，但不会为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布什则告诉戈尔巴乔夫，只要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试图利用东欧的变化，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戈尔巴乔夫在目前形势下所面临的困难。

戈尔巴乔夫在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的保证不像在东欧问题上的保证那样明确。他说，他决心尽可能避免进行镇压，因为使用武力就意味着改革的终止。〔273〕

他真正在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寻找一切可能的联合形式，但不可能允许单方面的脱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

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美国从未承认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兼并，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但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不使用武力对付独立运动，美国就不会采取任何使局势恶化的行动。不过，他接着说，只要莫斯科诉诸武力，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并阻碍我们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在一次私下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我得到简报时，觉得总统定下的基调是正确的。他说得很明确，苏联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都将中断美苏

合作的进程，但他又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利用迅速变化的局势。同时，他一直回避有关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未来地位问题的谈判，坚持戈尔巴乔夫也认可的自由选择原则。

并非所有的会谈都如此和谐。布什强烈谴责苏联向拉美出售武器并支持古巴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这些行动只要不停止，就将成为双方间的重要刺激因素。

戈尔巴乔夫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不满：反对布什认为"西方价值观"已经胜利的观点。一开始，布什不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反对他的这一看法，指出西方价值观体现的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同一原则，比如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各领域刺激增长的措施及自由市场。雅科夫列夫解释说，这个词暗指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或北方或南方价值不同，因此对许多苏联人来说 将意味着是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根据贝克的建议，大家都同意接受用"民主价值观"作为共同宣言的基础。[8]

如果里根还在位的话，有关军控的谈判或许会比实际达成的成果多。布什政府依然没有确定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立场，因此不能乘机利用谢瓦尔德纳泽9月份提出的倡议，倡议要求将削减战略武器与防御和空间系统脱钩。〔274〕

华盛顿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国会能否批准新武器系统而不是寻找减少两国过剩的危险武库的途径。

不过，军控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苏联关注的中心。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特别是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对戈尔巴乔夫确实非常重要，但在马耳他，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议题。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地位迅速崩溃，他需要美国保证不要表现出正在利用他的弱点使他难堪。他需要显示他是以一个平等的而非懦弱的对手在与布什打交道。在他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时，他需要美国经济支持的前景。

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都得到了，但当他飞回到莫斯科时，这些成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等着他。

改革的议事日程

各共和国的选举日益临近，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跨地区代表集团的领袖们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制定了一个综合性政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修正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确立了共产党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性地位。那些共产党员——实际上除萨哈罗夫外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也都要求改变党的集中领导，允许党派发展。至于经济方面，该集团反对雷日科夫政府继续维持中央控制的做法，主张除了事关整个国家的少数几个部门外，管理职权下放给企业、地方和各共和国。此外，他们还迫切要求修正宪法，制定法律以使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企业得到经营自主权。许多人觉得苏联将不得不变成一个联邦，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将只行使共和国自愿让予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这些倡议，一则因为他无法让政治局赞成这些倡议（根据第六条）；二则因为他确实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取〔275〕（如土地私有化）。在12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进入了高潮。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全面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许多改革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总书记位置，而不是完成他开创的改革事业。

最富有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12月12日，即人代会的第二天。

萨哈罗夫建议修改议程，以便就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企业及第六条——即宪法中那些正阻碍着改革的条款——进行辩论。他主张，人代会必须废除宪法上的禁令，以便为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法律铺平道路。

作为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恼火，没等萨哈罗夫对其建议进行解释，就将其逼下了讲台。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下令就是否将这些问题加入议程的动议进行投票，并使之遭到否决，但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建议，它将很容易获得通过，但他显示出的固执比第一次会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萨哈罗夫因试图提出一个极为合理的建议而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此情此景，当晚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出来。知识分子改革家大为愤慨：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就像是个地方党的老板（当然这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半生的职业），而不像一个人们期待的、致力于改变国家的国家领导人。

两天以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安然死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对他的野蛮态度导致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人代会拒绝把萨哈罗夫的建议纳入议事日程，并未能阻止对问题的辩论。关于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坚持此问题应该在起草新宪法时解决，并指出，一党制并非是经宪法的认可才确立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删除宪法条文就将其予以废除。

其他问题与政府要求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的建议密切相关，该建议由总理雷日科夫于 12 月 13 日提交大会。它呼吁分两个阶段、各用三年时间实现渐进转变，一切都必须由莫斯科周密计划。雷日科夫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嘲讽了有关取消中央经 [276]

济指导的要求：

> 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年，我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⑩]

仍然是全国头号经济杂志编辑和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主席之一的加夫里尔·波波夫，斥责了雷日科夫的中央指挥的渐进主义：

> 过去5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他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⑪]

波波夫当时指出，市场体系不能一鳞半爪地引进，因为各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汽化器就不能起动汽车，同理，基本的市场机制也不得不同时引进。根据他的分析，有五方面的法律必不可少：所有制、土地、企业、各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及地方自我管理（这些基本都是萨哈罗夫提到过的），他指责人代会在那次会议上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强调更多的是有必要赋予人民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力：

> 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年前9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182个蛋，1989年同期平均产183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⑪

然而，议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的计划，否决了为各〔277〕共和国争取更多经济独立的要求。这次会议使许多代表的幻想破灭。乌克兰基辅理工学院院长佩特罗·帕兰丘克在当地电台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

> 共和国拼命工作，中央却把一切都搜刮殆尽，然后又逼迫你向中央作揖乞讨这乞讨那，这还算是什么鬼联盟？……我无法相信政府想要做的事能靠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社会灾难的旧的部委得到贯彻……我们需要立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我们共和国辛苦劳作，然而95%的收获都缴给了中央，只有5%能留下来，这种做法必须废止。⑫

一位改革殉道夫

当我们惊悉萨哈罗夫逝世时，丽贝卡和我正在布鲁塞尔出席美国驻欧洲大使会议。国务院问我是否认为布什总统应派一名特使参加葬礼。我说，法定程序并不要求非派使节不可，但是派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政治上也是需要的。“戈尔巴乔夫会不

会因此恼怒?”有人问我。我回答说他可能更喜欢不派任何高级代表，但我感到这对决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不仅已成为苏联人权和民主的代言人，而且是民主变革的重要象征。

我希望布什总统派一位高级官员或私人助手代表他来参加葬礼。我认为萨哈罗夫应该因他代表的事业而不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受到礼遇。如果尊崇萨哈罗夫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舒服，那将是令人遗憾但却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他还希望得到世界的尊敬，就不能不考虑到他从事的正是萨哈罗夫支持的事业。给萨哈罗夫的葬礼以特别关注正好能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戈尔巴乔夫。

几小时后，我得知美国已经决定不派使节，而是指定我为总[278]统的代表参加葬礼。这当然是我极为欢迎的荣誉，但我不禁怀疑做出此决定是否由于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想法的过分关心。难道华盛顿有一种过分倚重某一个人的危险倾向？但愿不是这样，但又不能排除这种担心。

12 月 17 日，星期日，我们飞回莫斯科，从机场直奔萨哈罗夫遗体安放的青年宫。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但已排成了长长的人流，有的并排而立，沿共青团大街延伸了几个街区。大多数人不得不站几个小时才能看一眼里面的棺材。作为外国的官方代表，我们被让到了队伍的前排。等待我们的是催人泪下的一幕。

萨哈罗夫的灵柩放在平常供展览用的、可升降的平台上。四周摆满了鲜花，每一位凭吊者都在向已经拥挤而有序的花丛锦上添花。我们从敞开着的棺材前走过，驻足默默地祈祷，并向其遗孀叶琳娜·波纳及其他家属表示问候。随后，我退后静观场面。

来人自然各种年龄的都有，但是年轻人的人数确实引人注目。

不管萨哈罗夫的活动在警察、将军和共产党的党棍中间激起多大的仇视，但他显然已经抓住了那些将主导国家未来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心（而且我希望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啜泣伴随沉闷的脚步声缓缓通过灵柩。许多人向花丛抛撒手写的挽联，有的大如标语牌。挽联几乎都不出三个主题："原谅我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决不会重演"，"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之花"。

第二天，萨哈罗夫的遗体安放在科学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党政要员出场并在吊唁册上签名。我和其他外宾也都如此照做。公共葬礼原订于下午进行。叶琳娜·波纳坚持仪式安排在一个有意者均可参加的场所，但没有一个场馆能容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群，因此，尽管气温低于冰点，葬礼还是改在莫斯科邻近的鲁日尼基体育馆的一个露天场地里举行。

根据讣告，葬礼仪式安排在从下午 1 点到 2 点举行，3 点钟到莫斯科郊区沃斯特亚科夫斯克叶公墓安葬。叶琳娜·波纳要求只准家属和亲友去公墓，因为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279〕

丽贝卡和我由使馆一位办事能力最强的政治官员塔季亚娜·沃尔科夫－格福勒陪同，中午一过就动身前往参加葬礼。我们知道人一定很多，很想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可是，鲁日尼基人山人海，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开始，我以为仪式将在体育馆举行——讣告也没有说清楚，但我们被引到了一个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空地里。我们从人群中钻来钻去挤到前面，因为我知道让其家属知道我的到来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认出我之后，纷纷让道，把我引到了一个约有 1/4 公顷大小的方地里，那里已经圈起来，中间架好放棺材的平台（一个更大、更高一些的讲台），还有几排椅子。当我们走近隔离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穿着制服，庄重地站立在人群中间。我们目光相

遇，频频点头示意，但他没有要走近我们的意思。

今天，他亲临鲁日尼基参加葬礼，令我困惑不解。他曾是萨哈罗夫最尖刻的批评者。如果他感到有必要表示一下尊敬，那天早晨在科学院就理应在吊唁册上签名。而今，他迎着寒风，站在萨哈罗夫最狂热的支持者中间。这是何意？我后来问叶琳娜·波纳（她并不知道他的到来），她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来凑一下热闹。不过，我怀疑并不这么简单。他的好奇心完全可以从新闻报道或从下属的报告中得到满足。我揣摸他的敬意实际上是献给作为苏联氢弹之父、而不是后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萨哈罗夫。或者，他是出于对一个捍卫自己信仰的人的敬意，而不管他是谁。我后悔阿赫罗梅耶夫还在世的时候，没有去问一下他当时为何而来。那时我只顾感慨于人际关系是何等微妙，常常要碰到出人意料之事。

到了"内圈"之后，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灵柩和送葬队伍——事实上超过了一小时。我们紧裹着厚厚的外套、皮帽和手套，但是冷风开始穿透我们的衣服。站在冰冻的雪地里，首先感觉到冷的是脚。很遗憾，俄罗斯农夫们穿的靴子硬邦邦的，实际上既不防潮，也不御寒，万万不可当作外交服饰。但是，我们周围的人群却在一个劲地增加。多少？10万？不止。20万？只多不少。50万？可能不到。但人数之多足以为我们挡风御寒。〔280〕

最后，殡仪官抬棺而来，家属和致悼者相聚在台上。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致悼词时，我们这些在圈内的人得轮流举起点燃的蜡烛，伫立于棺木四角。但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悼词并不仅仅是对亡者的溢美之词；大多数还是政治演讲。跨地区集团的领导人都来了——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以及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萨哈罗夫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对他

逝世的哀悼将各个民族团体团结了起来，这是政治问题所办不到的。

由于演说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呼吁采取政治行动，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把葬礼变成政治示威。但接着我认识到在这种场合谈论这样的内容是合适的。这正是萨哈罗夫的遗愿：以死为动力，促发一场运动来实现他确定的目标。

我们起身送葬之前，短促的冬日已近黄昏。叶琳娜·波纳把我们挑出来劝我们陪同家属参加仪式的时候，她已友好地排除了有关丽贝卡和我是否被视为“亲朋好友”之疑。在烛光下，她亲吻死者，殡仪官合上棺木，将其降至最后的安息地。我们每个人轮流铲土填坟。这位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忧国忧民之心的伟人已经永远告别人世。

当我们通过公墓小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车里时，已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与下午的演讲不同，葬礼仪式富有人情味，冲淡了政治色彩。萨哈罗夫留给他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政治计划，尽管这方面也令人仰慕，而且还在于一种态度、一种道义力量。我想起前天人们拿到青年宫和那天下午带到葬礼〔281〕上的传单，脑海里力图完整解释那些挽联悼词。“原谅我们，当他们折磨您时，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再也不会没有勇气面对独裁”，“您为我们指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不，最后那一句不十分正确。我怎么能把俄语词语所表达的情感完全翻译出来呢？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本身也是从拉丁语（intelligntsia 和 intelligent）借用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词不行。在英语里，知识分子用来指人时含有一种冷漠尖酸的意思。在俄语里，интеллигент（智者）发音时带一个辅音“г”——有不同的意思，因为它带有不容推卸的道义意味。智者（интеллигент）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而且是一个既博学多闻、

又致力于社会公益的人。他不是一位“行善者”，而是一位握有道义指南的人。

正是萨哈罗夫准确的道义指南给他的同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其承诺郑重鲜明。但我不禁想问，果真经受考验时，他们会作何实际反应。答案直到1991年8月才揭晓。

立陶宛共产党的分离行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各种压力在整个秋季继续增加，而1990年初地方选举的前景更是推波助澜。其趋势日益明显，如果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不能更好地顺应民意，就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扭转颓势的唯一举措将是保证实现独立。

立陶宛的分离热情最高（在三个共和国中，这里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支持独立的）。越来越多的党员要求，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沿着联邦路线重组，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由行动的权力，立陶宛共产党应该与其一刀两断。如果继续依附于莫斯科，党在大选浪潮中必将被淘汰无疑。

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立陶宛领导人召至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举行前所未有的联席会议，但他威逼这些立陶宛人的企图并未成功。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向戈尔巴乔夫解释道，在立陶宛，党组织如果不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它就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驳斥了这一观点，同时也打消了任何按照联邦路线重建政党的幻想。在莫斯科控制下的一元化领导将继续下去。

[282]

顺从戈尔巴乔夫等于政治自杀，逆风而上则可望在大选中立

于不败之地。面对两种选择，立陶宛义无反顾地沿着分裂的道路走下去。布拉藻斯卡斯从与苏共政治局的对抗赛回到了维尔纽斯之后，立即宣布立陶宛共产党开始筹备一次代表大会。分离现在已在所难免。民意测验显示，立陶宛只有16%的党员反对分裂。由于非立陶宛人占该加盟共和国16%以上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一些俄罗斯和波兰裔人也加入到了立陶宛人的独立队伍之中。

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在维尔纽斯召开，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不同意、退席或宣誓继续效忠莫斯科的代表还不足1/5。

戈尔巴乔夫立即召开中央紧急全会，处理立陶宛引发的危机。虽然立陶宛党代会得到立陶宛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仍坚持反对他们的行动，无条件地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没有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人敦促他的那样按照联邦原则重建政党。他的话引人注目：

> 如果我们越过这条界线（以联邦结构取代共产党一元结构），你们就可能会说我们故意纵容肢解苏联的行为，对所有苏联人民来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死胡同。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13]

第二天，当我在报刊上读到这一内容时，甚感惊讶。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在党内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公开支持联邦主义，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以这种绝对化的措辞来谴责它呢。毕竟，如果他打算创建一个真正的联邦，就应该为建立党的联邦结构的可能性敞开大门。进一步说，由〔283〕

于坚持立陶宛的地位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等同，他也就排除了那种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与其他 12 个共和国区别对待的可能性。而恰恰就在这一讲话的前一天，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宣布纳粹—苏维埃协定为非法。我当时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明智的做法就该是坚定地支持这样的主张，即由于已发生的历史不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该与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但是，他的讲话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冗长的讲话还有一个方面让我不安。他在斥责萨尤季斯和闹分离的立陶宛共产党时，谴责他们“叩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华盛顿白宫的“大门”，把问题“国际化”。早些时候，他在声明中曾指责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征求外国意见，但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我们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接触。这些接触显然使他感到不安。在我决心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把握。他的讲话增加了我对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在报告中是否做了篡改，以“证明”立陶宛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正按我们的挑唆行事。

事实上，鉴于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即使我们真的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供咨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咨询，因为如果莫斯科进行镇压，我们无法保护他们。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克格勃有关外部煽动的论证，将会减少他理解时局的能力，而且会增加他决定动武的机会。

尽管戈尔巴乔夫措辞强硬，但全会并未立即否定建立一个自治政党的要求，而是将最终决定推迟到了 1 月份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之后。不过，戈氏的讲话和全会的决议使他的回旋余地很少。他对立陶宛的访问很难成功，除非他设法说服立陶宛放弃其既定路线。

公开化取得成功

编辑，尤其是电视制作人仍然感到政治当局在“指导”他们的工作。新闻媒介仍不自由，党组织中的保守派正在加紧把大众信息置[284]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到年底，改革派已稍感宽松。斯塔尔克夫已挫败把他清除出《论据与事实》的企图，改革派仍在主编《莫斯科新闻》、《机关报》、《消息报》和《文学公报》。就连《真理报》现在也换了领导。其保守派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已经由戈尔巴乔夫的私交伊凡·弗洛罗夫取而代之。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和学者不断努力，成功地揭露了过去的许多暴行和丑闻，所有这些情况以前都要沉淀到奥威尔式的“记忆孔”里。

一年多来，苏联军方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受到批评。像《机关报》和《莫斯科新闻》这样的刊物都在抨击其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管理的混乱。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在70、80年代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在美国极负盛名。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苏联防务预算膨胀，军队人浮于事，军事装备远远超出了国防需要。

自从二战以来备受青睐和称赞的苏联高级将领对此极为愤怒。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与阿尔巴托夫的指责针锋相对，公众也因此能像美国人那样一饱眼福：看到就国防开支广泛地进行辩论。苏联人民从不知道在“国防”的名义下耗费了多少资源。随着真相大白，公众越来越认定他们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愚弄。

过去肮脏的秘密被曝光了。官方一开始半抵赖，接着不置可否，最后正式予以承认。内务委员会（克格勃化名之一）在斯摩棱斯克附

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一案就是这种情况。几十年来，苏联政府坚持说德国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后，盖世太保杀害了这批波兰人，追究内务委员会的责任纯粹是纳粹杜撰的反苏宣传。

1989年，《莫斯科新闻》发表的文章证据确凿，明白无误地指出斯大林应受到谴责。事实上，在苏军与纳粹瓜分波兰后，被苏军俘获的全部波兰军官团都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了，目的是防止〔285〕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律师、医生、商人。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工人国家"。在斯大林扭曲的心灵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

《莫斯科新闻》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要敦促当局承认已经酿成的悲剧。毕竟，波兰共产党已经行动起来。如果苏联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继续持否认态度，就很难与波兰政府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关系。

但是，苏联政府仍在犹豫。然而，到10月下旬，已有迹象显示，对所发生的不幸给予官方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达莫斯科之前，曾要求允许参观卡廷谋杀现场。苏联外交部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事实上，还为参观作出了安排。布热津斯基请我作陪，借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很感兴趣。我自然欣然同意。

当我们到达一个已竖起纪念碑的墓地时，目睹了一个动人场面。几辆载满波兰人的汽车已经到达，许多人是死难军官的亲属，在万灵节这天来悼念亡灵。苏联竖起的这块纪念碑称它是1941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有人用手写体"内务委员会"和"1940年"等字样覆盖在"盖世太保"和"1941年"上面。苏联

看守并没有将其擦掉。

一位天主教牧师领着波兰参观者祈祷。我们立正颔首，心里为此地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悲愤交加。

我们正要离开墓地时，一位俄罗斯电视记者向我们走来，请布热津斯基接受采访。他同意了，并发表了一个富于雄辩的声明，呼吁苏联政府承认这一暴行。他指出，苏联和波兰都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承认事实将为苏波和解奠定基础。当我被要求发表评论时，只能重申布热津斯基的话，并补充说了一句，只有反省过去，苏联人民才能确保这样的悲剧不致重演。

那天晚上，电视一频道晚间新闻联播向全苏联播放了波兰赴〔286〕卡廷悼亡团的场景、纪念碑上的修正字样的特写镜头以及对布热津斯基和我的采访。几周后，苏联政府发表公告，承认斯大林和内务委员会应对当时的暴行负责。

我一直不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承认斯大林的罪行符合他们的利益。很显然，其体制中的权力机关仍在企图掩盖真相。1992 年，我找到了答案。为写这本书，我重访莫斯科去采访一些官员，并同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约见晤谈。约定的时间已到，一位助手来到前厅通知我会见晚些时候开始。主要由受害者亲属组成的一个波兰代表团当时正在与鲁茨科伊会谈，而且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

15 分钟后，波兰人走了出来，我们一行人被引到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鲁茨科伊是职业军人，他似乎还没有从刚才会见的震动中恢复过来。“那些家属们希望得到一些既简单又合情合理的东西。”他不问自答，“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问他，他本人究竟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波兰亲属希望把

遗骨挖出来，可能的话做一下辨认，然后再适当地重新安葬，而此事正在办理。但是，他们还要求从克格勃档案中了解有关暴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他正是怀疑是否能做得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

他解释道："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时效的法令。参加那场屠杀的人依然在世。叶利钦总统和我都一再做出努力，想获得全部文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在努力。但正是'机关'不愿透露消息。他们想保护他们自己，其他则不会考虑。我们将继续努力，但我怀疑全部资料是否还会重见天日。"[14]

克格勃，国中之国。尽管其前任领导已经蒙受耻辱，解甲归田，组织也已改组成俄罗斯安全部，但它依然如此。1989 年，官方之所以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想必一定是迫于来自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卡廷森林大屠杀只是官方对过去罪行所作证实的一系列事件〔287〕之一。圣诞前夜，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就在法律上无效。在此之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证实西方联盟在德国发现的协议文件是真本，不过俄文原件尚未找到。[15]

并不是所有公开的罪行都发生于斯大林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还调查了 4 月份在第比利斯对示威者的大屠杀，并在 12 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力，下令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许多人认为其调查报告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报告似乎显示出苏联军方隐瞒了究竟是谁对动用武力的决定负责的信息。因此，这一立法调查在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的同时，也表明其调查委员会尚缺乏从一个不愿配合的官僚机构那里取证的适当权力。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1989年显示放射级别的精确地图首次发行。从中可看出，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甚至也没有得到警示。事实上，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

对许多人来说，1989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我曾问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统是何时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认定乌克兰必须独立的。他回答说："是在1989年。"他接着解释道，尽管过去他对存在的弊病和暴行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在1989年以前一直未见到真凭实据。1989年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唯有独立，未来他的国家才能免遭此类劫难。[16]

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288〕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的战略

从1988年春天起，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在认真追求苏联的政治改革，而这就需要其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协调与西方的关

系。从那时起，事态的发展也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我也完全清楚，他在共产党内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可以肯定，虽然这一反对势力多数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但现在正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唱反调。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股更加紧密的反改革势力的前景有可能成为真实的现实。按我的理解，如果不能打破党机器的控制，改革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认识到，如不打破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束缚，其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仍在夸夸其谈，似乎他能把党变成改革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赢得时间而做表面文章呢还是出于真心。如果他真的相信共产党能够创造民主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

不过，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以智挫败其对手方面的纪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根据需要灵活应变的能力也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纪录，我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以及向莫斯科的美国新闻记者作背景介绍时指出，利用戈尔巴乔夫目前面临的困境拆他的台是一种冒险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夹击，却仍不失为全苏联最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如果他能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注入更多的民主程序，这种声望就将是一笔不可取代的财富。

我当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戈尔巴乔夫会努力保持住在苏联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成功则缺乏信心。事实上，这一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在〔289〕我看来，主要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能否及时采取一项更激进的、更根本的变革计划。他似乎注意到了各方面的平衡，但对隐藏在种族和民族主义骚动背后的真正力量却视而不见。我怀疑他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不像他说服党的干部参加真正的选举时那样得心应

手。对于竞选，他似乎知道需要什么，甚至知道何时该走迂回路线。至于民族问题——包括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族问题，他要么不知道需要什么，要么就企求一些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自愿同意的帝国控制。

越来越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正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所指责的那样，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对于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则不明确或者说不理解。就在离开莫斯科对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并准备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篇回应这种批评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1989年11月26日即周日的《真理报》头三版上。文章的署名为“米·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

一开始，他承认自1985年执政以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声称：“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事物。”接着，他解释道：

> 起初我们以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个纠正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个人歪风、完善已经发展了的制度的问题，而今我们要说，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

筑……（包括）改革产权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同时改变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风气。[17]

接着，他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290]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

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考虑到强硬派会反驳说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经济的）民主，他指出，虽然他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民主，但经验表明形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

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话，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得不同“经过时间考验”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相结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独立的司法明确分立。

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他坚持认为在“目前社会变革的复杂阶段”，维持一党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说，党本身必须发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竞争，并扩大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

夫称赞叶利钦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表达的那种思想，但却沮丧地写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正迈向民主，而党始终落在后面。

抚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气，少了几分气馁。我生性乐观，通常更多关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还有多大空间没有灌满。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给改革目标的瓶子注入了20％、还是40％、抑或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291〕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

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观念却相当混乱。充斥于他1987年“周年”讲话中的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公式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没有指出走向市场关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当然，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苏联领导人在1989年会撰文为资本主义辩护。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苏联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不会维持多久了。他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态在当时也许只能走到那一步。不过，我当时有一种感觉，他为一种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辩护远非一种策略；他似乎真的相信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优越。这些想法若不是为随后的经历所动摇，就会在未来一直在他的思想中游荡。

比较而言，他对党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但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它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戈尔巴

乔夫虽然呼吁党应是社会的先锋，但又指出社会比党变革得快。换言之，社会是先锋，党在拖后腿。如果党继续抗拒改革，阻碍国家，后果将是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但我想我知道。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

可以推测，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是既要推动政治变革，又要保住权力宝座。但我没有把握说，我理解了他在危机四伏的经济和〔292〕民族问题上的战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苏联的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控制在莫斯科的中央部委及其官僚们手中。这不仅导致了效率低下，而且浪费严重。经理和工人都对这种无形的控制不满。在俄罗斯各州和各省，这种控制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其他共和国，这种控制被视为一种凌辱，一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整个改革时期，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把管理职权下放到企业，但这从未付诸实施。只要中央部委不革新，它就不会实现。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理解这一点，但他好像不愿也没有能力推动一项具体变革。

财产所有制问题对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国家占有全部生产手段，各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切实可行之时，谋求脱离中央。宣布独立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还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和财产。即使现行体制允许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存在，或者允许当地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存在，独立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要远远超过它们。戈尔巴乔夫不时地攻击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恢复私有制的企图，但他似乎忽视

了中央所有制对联盟造成的威胁。

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抵制财产私有化、并拒绝给各共和国真正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政策带来了诸多难题。他也许不能转过来支持直接的私有化，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观念予以严厉的斥责呢。如果不能启动全国的私有化进程，他至少应该允许经济改革的决策权转到民选的各共和国领导人那里。否则，如果经济继续恶化，经济压力就会激起民族情绪，只要莫斯科一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国家将顷刻分裂。

就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而言，我当时感到独立已是势在必行。如果尽快地给予允准，并为其他共和国提供真正的联邦体制，戈尔巴乔夫也许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其他共和国之〔293〕间建立一条“隔离带”。官方已承认纳粹—苏联条约从来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主权但同时又对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提供了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许不能立即同意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独立和再生，但他本可以为减轻这一进程的阻力做更多的事情。然而，他在整个1989年的做法似乎没有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甚至还在毁掉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信誉。

在1989年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在未来的几年里仍然能够保住权力，如果苏联本身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许能呆到1994年他任期届满之时。不过，我怀疑他能否实现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我期望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正像共产党一样日益落后于整个民意。除非他能在1990年拿出绝招，扭转乾坤，否则1991年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致 命 缺 陷?

得益于事后的情况分析，我可以说，1989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控制机制已经受到破坏。

这很严重但也许还未到极至。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分裂共产党，使其失去有效控制，并努力调动各共和国和各州民选的领导人以及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去完成改革；他也可背弃改革，尽可能恢复旧制。事实上，后者正是利加乔夫鼓动的道路，只要是在改革辞藻的烟幕后进行，雷日科夫也必定会同意。这样也无需宣布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莫斯科只要后退几小步，就能重新控制局面。

〔294〕 第一种战略的问题是，如果戈尔巴乔夫采用它，就有重蹈赫鲁晓夫命运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战略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即使成功地重新控制局面，但国家却会比改革前还要糟，到头来发动另一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但到那时，就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能左右的了，他将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而永载史册。

〔295〕

第十二章

骚动不安的冬季

现在，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戈尔巴乔夫　1989年12月31日的新年祝辞①

奴隶不是被戴上镣铐的人，而是虔诚地亲吻自己的镣铐的人。我们要解除自身的束缚和镣铐。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在戈尔巴乔夫到达维尔纽斯当天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讲②

假如（戈尔巴乔夫）打算依靠右翼的力量，他将失败；相反，如果他与进步的力量合作，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全力支持他。

叶利钦　1990年1月③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叶戈尔·利加乔夫 1990年2月2日[4]

每年12月31日午夜，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最高领导人向全国人民致辞已成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通常，这些致辞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所取得成就的庆贺和对来年取得更好成绩的期盼。

但是，在1989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中，传统的祝辞已不合适。这一年中积压的问题太多，试图掩饰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激起公愤。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点，并且换以清醒而镇定的口气对其国民致新年贺辞。他承认1989年是"改革最困难的一年"，也承认经济改革"处境艰难"，但是他声称1989年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痛苦，但却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冷战的结束使90年代有可能成为"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最需要的是"理智、友好、耐心和容忍"。

[296] 我和丽贝卡以及堪萨斯州来访的朋友在斯帕索住所的楼上书房通过电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我试图给朋友作同声翻译，因此我得更加注意新年致辞。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们拔掉香槟酒瓶的瓶塞以示庆贺，但我总感到祝辞中缺少一点什么似的。

当我们为新年而干杯时，我忽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祝辞中没有提到列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些东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这种场合的发言通常是必须提及的话题。会不会是这一切被忽略的第一年呢？

家里的客人安睡后，我查遍自己所有的录像带，找出了一年前我录制的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重新放了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1988年12月31日，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复兴"以及"列宁主义政党的职责"。

那天晚上，宗教取代了列宁而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转播围桌而坐的牧师们讨论信仰的社会和人文价值，并由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布道。过去大众媒介提及宗教只是为了攻击它，而现在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过去在复活节时安排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已成惯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使年轻人到教堂去，而把他们吸引在电视机前。

除夕之夜的电视节目是未来事情的预兆。一个星期后，根据公历，俄罗斯东正教在列宁格勒举行圣诞仪式，一座教堂整整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以及牧师对仪式的解释全部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一年后，那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开始在节假日参加礼拜。

进入1990年，节日的气氛变淡并很快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从1989年的烦恼事中缓过气来。在党内，他面临着一场因立陶宛人退出苏联共产党并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而引发的危机；日益衰退的经济；日益增长的反改革势力；东欧剧变以及德国重新统一引起的动荡不安；对外政策第一次遭到批评而不是称赞。以前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季节的大型抗议性示威游行已成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冬季活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地区的暴力冲突仍继续不断，并且开始蔓延到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 〔297〕

戈尔巴乔夫最迫切的政治使命是出访立陶宛。中央委员会12月25日的全体会议谴责了立陶宛共产党要求独立的企图，但是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访这个共和国时推迟了采取最后行动。显然，他希望说服立陶宛共产党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并希望立陶宛人在坚持分裂之前给予“真正的联邦”一个尝试的机会。

立陶宛之行必定是他艰难的政治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戈尔巴乔夫喜欢出访，也喜欢与友好的人们融为一体。但是这次

出访所受的礼遇，尽管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三天出访期间所进行的对话大多数是聋子式的对话。

萨尤季斯在戈尔巴乔夫1月11日到达维尔纽斯这一天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组织者还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市内一家更为友好的工厂作为他露面的主要场合。同时，教堂广场上人山人海，甚至街道两边也挤满了人，他们积极参与这一要求独立的集会。苏联中央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因而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大型的集会，但是我们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的代表当时在场，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局通过立陶宛电台的广播把集会的演讲都翻译了过来。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去年夏天会见我的立陶宛人之一，于下午2点宣布集会开始，并宣布"不独立，毋宁死"。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走到主席台上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劝告立陶宛人民不要仓促和慌忙"。这些人应该到苏联来并在苏联生活，以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他们的忠告意味着什么。在兰茨贝吉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同时，台下集会的人们反复地高呼着"自由、自由"。兰茨贝吉斯在演讲中指出，莫斯科假装没有听到发自立陶宛人民的清晰呼声：180万人联名要求在立陶宛只能实行立陶宛法律的请愿书；150万人签名要求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请愿书；六个月前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要求谈判独立问题的一封信。"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因此莫斯科不能假装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298〕

兰茨贝吉斯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而深感遗憾，但是他又说他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善意。"他是我们东面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的领袖，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新政策的象征。我

们希望与这个国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友好和经济互利的关系。”

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愿意如此这般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梅德维捷夫说："我非常愿意相信戈尔巴乔夫，但是我知道他的后台是谁……我记得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是如何被唾弃的，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愿承认在布尔什维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由于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神圣的俄罗斯仍然存在着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流毒。”⑤

戈尔巴乔夫那天下午在一个电气设备厂发表讲话，强调他在整个访问期间再三重复的一个话题，苏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出现分裂，整个国家将受到破坏；分裂企图会导致种族冲突和流血；立陶宛人民在一个新型的民主联邦中可以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应该保持中央集权体制，为新的联邦提供一种凝聚力；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的主张犹如要求拆去支撑一座大桥的支柱。

显然，甚至从有关这次访问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立陶宛人并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他们认为独立不是割断经济和人员联系，经济联系和开放边界仍要保持。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不存在种族冲突的基础。而且，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尤其是如果他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建立联邦体制的话。他反对立陶宛80％的共产党员要求自治的要求表明将来任何形式的联邦都是一种虚假的托词。

1月13日，在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准备回到莫斯科时，他对这次失败的出访强装欢颜。他说，“我们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希望已与莫斯科断绝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重新考虑他

〔299〕们的所作所为，并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会。布拉藻斯卡斯在送别仪式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作了强硬但又不失礼节的答复，他重申，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已不可挽回。[⑥]双方的对话不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条件进行。

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两天后，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在加盟共和国享有戈尔巴乔夫给予他们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进行这次注定失败的出访。任何一个了解立陶宛人态度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话在立陶宛民众中缺乏号召力。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去那里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他可以出访立陶宛，在那里尽量争取好的结果，然后在返回莫斯科时他可以说，立陶宛给他的教训是将来只有实行联邦的政党体制党组织才能生存下去。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在他离开立陶宛之前，他已拒绝考虑作出这个唯一可证明他此次出访有必要的让步。

他心里可能有许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他有可能打算利用这次访问证明立陶宛人是如何的“不可救药”，并用这一点来作为其后镇压的借口。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符合事实。在整个访问期间，虽然他碰到一连串带侮辱性的强硬言论和问题，但他从未发出过一次威胁。他没有像去年 8 月那样大喊大叫。而且，对立陶宛的镇压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他显然是要推进改革，而不是要放弃改革。

那么，他为什么要访问立陶宛，并且甘冒民众反对其请求从而使他的个人权威受到损害的风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克格勃关于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只是一小撮的报告使他蒙

骗上当，因此，他完全相信他可以利用当地的力量来对付“分裂主义者”；其二，他进行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党内的保守势力证明他决不纵容那些分裂党的人。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改革党和政府体制的主要提案。这些提案要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会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他在民族主义势力面前过于软弱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也许会落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下场。

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在克格勃内和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试图制造暴力事端，并期望迫使他进行干涉——〔300〕一年后他们正是这样干的，甚至强迫他下台。因此这次立陶宛之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赢得时间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把反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看作是对国家忠诚的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们看到了东欧剧变和德国正迅速走向统一时苏联所面临的处境，决心以抵制分裂加强苏联自己的边防。实际上，所有了解苏联政治内幕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让立陶宛、更不用说所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继续留在台上。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当时对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后来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了。

阿塞拜疆流产的革命

正当戈尔巴乔夫还在立陶宛进行毫无意义的访问并告诫人们分裂主义将导致流血斗争时，阿塞拜疆发生了骚乱和屠杀，数十人死于非命。然而，这一事件不是分裂主义的结果，而是种族仇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郁积的结果。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在1989年间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定期地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少出现导致人员伤亡的冲突。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不是由阿塞拜疆当局来管理，而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派遣的专员——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官员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来管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不满意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安排，但是亚美尼亚人比阿塞拜疆人更能接受这一现实。亚美尼亚人希望这是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第一步，而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是对其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

1989年11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加关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要求把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掌权者们的深切关注。但这一地区领土的变动显然会引起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亚美尼亚共产党新的第一书〔301〕记苏连·哈鲁丘年私下告诉我，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处在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担心不仅阿塞拜疆不能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

巴库共产党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亚美尼亚人可以永远居住在阿塞拜疆并且永远受欢迎。苏姆盖特的骚乱是地痞流氓聚众闹事引起的，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他觉得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家园是不幸的，并决定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居所，希望他们能尽早返回家园。那些从亚美尼亚地区驱逐出去的阿塞拜疆人也应该被鼓励重返家园。他建议，亚美尼亚人放弃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要求。

他认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激怒了阿塞拜疆的民众，结果在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导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双方公众舆论的要求（不幸的是，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在给这些要求火上浇油，他们以扭曲的和夸张的历史观煽动人们的情绪）很难有妥协的余地，事态正朝着一触即发的方向发展。

11 月 28 日，我回到莫斯科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结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特别管理的决议，决定把它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莫斯科当时这样做是为了迫使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事实证明莫斯科这样做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亚美尼亚人立即聚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抗议将他们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谴责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并于 12 月 1 日批准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则利用从莫斯科运往亚美尼亚的所有燃料和大多数商品都要经过其领土这一有利条件，作出了反击，对亚美尼亚进行物资封锁。

两个加盟共和国民众的骚动情绪不断发展，在阿塞拜疆尤为厉害。早在几个月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书记维吉罗夫就同意给予其合法地位的阿塞拜疆国民阵线利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争端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强迫共产党官员让权。1990 年 1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维尔纽斯的这一〔302〕天，示威游行者封锁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连科兰的政府办公大楼，[7]在巴库的市中心也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两天后，阿塞拜疆的首府发生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骚乱。暴徒们攻击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大楼，屠杀居住在

大楼里的亚美尼亚人。妇女和儿童被暴徒们从楼上的窗户中抛下来，惨死在公寓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领导人维吉罗夫逃亡到莫斯科，"人民阵线"控制了首府的所有要害部门。1月15日，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但是直到1月19日军队才大规模进入巴库。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保持冷静与和平，并指责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政府官员未能团结合作。维吉罗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这说明他对这次骚乱负有责任。

1月21日，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库，但是这座城市并不平静。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占领该城市，那么阿塞拜疆将就退出苏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些令人震惊消息时都深感恐慌。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做了许多可信的报道，尽管播音员只描述了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而没有把它们在电视屏幕上曝光。1月21日，我看完了电视新闻后，匆匆记下以下一段文字：

> 昨天采取了军事行动后，巴库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全体居民的情绪仍很激昂。一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局势"紧张到了极限"。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到100人，但是人人都觉得远不止如此。整个事件在今晚的"七天"——星期天晚间的"一周评论"——这一新闻栏目中有详细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纳戈尔诺地区已宣告从苏联分裂出去。我注意到苏联的媒体没有说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明天进行总罢工，并举行纪念大会。显然，宵禁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似乎已别无选择，只有动用军队，并下令遇到抵抗时可以开火。但是，如果这次行动不迅速，或〔303〕者这次行动拖延太久，或者死亡人数过多，都将增加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该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溃了。在某种程度上，该地区有序还是无序都取决于“人民阵线”和苏联军方。它们二者起着同样的“领导作用”。

当我看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在1月26日《消息报》上的声明后，我意识到我最初的关于武装干涉是必要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亚佐夫宣称军方逮捕了“大约80名”“人民阵线”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并对逮捕行动作了以下说明：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扣留所有这些非法分子，而是要摧毁他们在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设立的政权组织机构。

我并不是信口雌黄，我的意思确实是指政权。他们正准备夺权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自己宣布1月18日晚11点，也就是军队进入巴库的前一天，全城处于紧急状态，当时，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在该市的许多地区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号召在1月20日举行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并打算届时宣告由“人民阵线”掌权执政。

因此，军事干涉的最初意图不是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而是为了夺取“人民阵线”的权力。的确，从中可以推断出，既然“人民阵线”在苏联军队干涉之前就已宣告处于紧急状态，那么它可能已制止了骚乱。

几天以后，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任书记安德烈·吉连科请教了这些问题。当他还是克里米亚的党书记时，我就已经认识他。最近，他调到了莫斯科的共产党书记处工作。阿塞拜疆发生骚乱后，他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一起被派到了巴库，他说他们于1月14日，即骚乱发生的第二天抵达巴库，并试图“寻求政治解决”。但是，他们发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进步成分已经丧失”，并转化为“恐怖主义”。1月18日，“人民阵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早晨，“人民阵线”占领了政府和共产党所有的办公大楼。1月19日，莫斯科发布戒严令并动用军队。

〔304〕像亚佐夫一样，吉连科指出，在苏联军队干涉以前阿塞拜疆的秩序已经恢复，军队干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苏联穆斯林所得出的结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强调说，1月13日所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是由那些被亚美尼亚驱逐而无家可归的阿塞拜疆人挑起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回避给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永久性的重新安置，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共同安置这些返回的难民。“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同时强调，在暴乱开始时，政府当局处于瘫痪状态，“人民阵线”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并且稳定了局势。

我认为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阵线”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为1月13日的骚乱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怎样，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占领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人员的伤亡，而且做出这一决定时，政治因素的考虑多于人道主义因素。

由军方取代“人民阵线”的决定引起了该加盟共和国国民的不满，并且只能增强将来要求分裂的呼声。它也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好几个城市举行了示

威游行，抗议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巴库（不是因为对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同情，而是因为那些军人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冒生命危险）。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也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目标。迄今为止，大屠杀只是发生在诸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身上。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巴库后，为确保他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家属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撤离。

军事干涉作为将来恢复加盟共和国秩序的方式，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俄罗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为维持苏联帝国的生存而付出代价。

帝国主义者的讲坛

不管怎样，苏联帝国还有一批卫道士，当他们看到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崩溃、非俄罗斯民族要求独立以及中央集权削弱时，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最初是对这些变化表示关注，然后又感到恐惧。〔305〕1990年1月初，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份保守的文学周刊成了那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苏联帝国的人们的讲坛。[8]普罗汉诺夫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即社会主义信念，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他预言如果苏联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紧随着外来入侵的就是混乱和内战。

虽然普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是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的，但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为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的政治联盟进行了辩护，这些人大多数在感情上都依恋着沙皇的统治制度，因而本质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党的政治

机器、军队和警察机关的。但统一这一话题与帝国密不可分，只有共产党能够把帝国团结在一起，那么帝国主义者也将支持共产党。这是俄罗斯爱国集团所遵循的信条，该集团到 1989 年年底时已有 12 个俄罗斯"爱国运动"组织，并力图在即将进行的加盟共和国选举中支持它们心目中的候选人。⑨

我读了普罗汉诺夫的文章和俄罗斯爱国集团的宣言，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进一步坚定了我多年来的信念，即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性质相同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以武力的独裁集团统治。传统上，西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学者，总是受到下述观点的迷惑：法西斯主义是"极右"运动，而共产主义是"极左"运动，因而它们是对立的。本世纪 30 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没有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对希特勒有利，因此即使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协定，也没有动摇许多人心目中的这种信念。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法国学者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仍占主流，到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些人还持这种观点。与此同时，"保守派"学者却经常为右翼的专制政权辩护，因为他们觉得右翼专制政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实际上，独裁者通常觉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更容易一些。所谓"左—右"二分法完全弄混了现实问题，掩盖了妄自尊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权力。[306]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大多数是排外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如此公开宣称。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

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尽管他们痛恨俄罗斯东正教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无神论斗士的打击，传统乡村生活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破坏以及环境因无知的工业化而受到蹂躏，但他们愿意与这些维持俄罗斯帝国完整却糟踏过这个国家的凶手合作。

最初，普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避免指名道姓批评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的攻击是直接冲着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而来的。1989—1990 年冬春之交，他们还希望能影响戈尔巴乔夫，尤其希望能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主义作出妥协。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克格勃以及苏联军队中的保守力量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内改革派的组建

改革派把他们的计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帝国缔造者们"更为迅速。来自 78 个城市的 400—500 名共产党员于 1 月 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末会议，会上建立了"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地区间集团"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民主集中制"；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鲍里斯·叶利钦，认为新建立的"民主讲坛"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而另外一些组织者，如经济学〔307〕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如果即将进行的共产党选举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应促使共产

党内部发生分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公认是一位无声的支持者，他的得意门生、在中央党校部门任职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斯塔科夫斯基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还起草了改革计划的许多文件。

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党实行"民主化"显然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事实上，大部分"讲坛"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们感到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显示一下改革者的力量十分必要，戈尔巴乔夫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赢得大选时才会果断地对党内保守派采取措施。因此，改革派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继续进行国内改革给予充分的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们清楚普通的共产党员憎恨专职的共产党干部享有的权威和特权。始于基层的民主选举的确能把只是因为讨好巴结其上司而成为共产党官员的那些人赶下台。大量裁减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也会削弱共产党官员控制或主导选举机构的能力。最后，还有共产党的大量财产问题，尤其是它对许多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改革派完全脱离共产党，这笔财产会落入保守派之手。无论如何，显示一下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在将来的派系分裂中得到共产党财产的一份。

然而，改革派组织起来的根本意图在于争取或强迫戈尔巴乔夫给予保护。尽管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改革计划如果不采取"民主讲坛"所开列的措施的话，就不会取得成功。

妥协与折中

整个1月份，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都在忙着起草将于月底召

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要政策文件。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全体会议推迟一周，到2月5日才召开。〔308〕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改革派的态度与“民主讲坛”的那些人的态度一致，敦促他与保守派决裂。其中的一份文件被法国记者贝纳德·格特带到法国，稍作删改后发表在1月31日的《世界报》上。[10]该文件指出，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现在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与社会上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不能够继续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寻求折中来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党内保守派决裂。这正是叶利钦近三年来采取的步骤。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在苏联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但对党内保守派而言，戈尔巴乔夫正在考虑与他们决裂已不是秘密。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的分裂活动。

在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利加乔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访，他对意大利记者说，他担心苏联正在失去其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整个国家正变得难以控制，事事都会引起争论和分歧。“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

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在 80 年代早期讲的一句话。但戈尔巴乔夫是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萧条”时讲这句话的，而利加乔夫却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讲这句话的。利加乔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新恢复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逆转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 1 月以来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进程。[①]

〔309〕对谙熟苏联政治的观察家而言，利加乔夫的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公众场合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的。毕竟，他在 1988—1989 年间攻击叶利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指责叶利钦利用外国的传媒评论苏联的局势。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的传媒中曝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是走向政治开放和政治成熟的一步。这种状况确实与传统的苏联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秘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公众辩论来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实际上，他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他的计划。相反，他玩弄诡计和手腕，以确保控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尽管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露出对他的政策不满。另外，他事先还采取了好几个步骤以防止叛乱的发生。

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更换了好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这就提醒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快会带来痛苦的后果。

其次，他于 2 月 2 日接见了一群好斗的矿工，允许他们发表强烈批评党组织的言论，他自己就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那天早上刊登在《真理报》上。

第三，他对 2 月 4 日星期天莫斯科支持改革的大型示威游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涉，这刚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召开的前一天。在外地代表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至少20多万示威游行者，要求更加迅速地进行改革。

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老练地布置好了舞台。有关他的反对派的政治流言四处传播，他还在反对派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除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个步骤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体会议所有过程全部出版发行。我在日记中作了以下的评论：

那么，那些气势汹汹地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抨击当前政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书记能干些什么呢？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的更换"提高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星期天骚动人群〔310〕的场面是布加勒斯特市的翻版。戈尔巴乔夫对矿工们的讲话是对中层党组织开战的宣言，接着他（突然地？）意识到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明天见报。对改革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矿工们各自回家注意事态的发展。或者也许是……一种更谨慎的策略吗？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战略，我相信也正变得更加明显。昨天发表演讲时，他提到了研究总统制好处的必要性，反映出他确实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个有充分权力和权威的职位，从而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出他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无论怎样，如果共产党正迅速走向衰退，为什么他还想控制这个党直至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垮台的谣言

自1988年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对公开化以来，莫斯科的流言家们定期地放出一些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流

言。我认为这些周期性出现的流言是共产党内部明争暗斗的歪曲反映，一般情况下不予理睬，因为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控制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运转。然而，当美国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于 1990 年 1 月 30 日报道了这种流言后，引起了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是参加了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举办的庆祝晚宴后回到斯帕索住所时才知道有线电视网的报道的。那是非常尽兴的一天，让我想起了伍蒂·爱伦所说的生活中的 90％只是炫耀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大使，在适当的时候出头露面是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有时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令人厌倦，它被一连串生硬无趣的演讲搞得拖拖拉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

那天，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举办一个很有特色的海外镶珠法贝尔彩蛋展览。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主办展览，展览开幕后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增强新信任的象征。

〔311〕接下来是为马尔科姆·福布斯和圣地亚哥的市长莫里恩·奥康纳（他帮助组织了这次展览）举行的欢迎会和午宴。苏联新任文化部长、演员兼戏剧导演尼古拉·古本科做东款待，使我有机会和他谈妥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一事。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他在本世纪 70 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当时他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交情很深。当他离开苏联时，他和他的妻子、歌唱家加丽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还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荣誉。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并把该乐团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自他被驱逐出境以来，现

在是第一次打算让他重返莫斯科。我对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这件事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来访的是美国的乐团，而且还因为即将来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是我本人的座上客。当我还在白宫任职时，他曾跟我说过，只有当我做驻苏大使并允许带他的乐团的情况下，他才会重返莫斯科，因为我"会保护他"。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重返莫斯科也水到渠成。

我向古本科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民权问题。虽然没有把恢复公民权作为他重返莫斯科的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现政府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做的惩罚做一些小小的改动非常重要。

古本科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恢复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公民权，并恢复他们的所有名誉。

午宴以后，我们匆匆忙忙地参加了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开业仪式。看到店里俄罗斯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动作麻利，让人感到很高兴。苏联餐馆的服务一般都是慢腾腾的，男女服务员认为顾客令人讨厌，因为顾客的来到打搅了他们的闲暇。美国人经营管理的麦当劳快餐店培养服务人员把顾客当作受欢迎的宾客看待，这方面的成功使我真正确信：俄罗斯人给予适当的刺激和培训，也能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干得出色。如"巨无霸"面包，除了番茄酱外完全用当地的原料制作，其口味就像在美国制作的一样。

后来，我和丽贝卡回到斯帕索住所为主办克里姆林宫展览的美国同胞举行一个欢迎会。福布斯一家被允许乘坐其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家庭喷气式飞机来莫斯科，还允许马尔科姆·福布斯把他的热气球停放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13]而在一年前，苏联官员一想到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宣传"进入莫斯科市中心，就会吓得脸色惨白。〔312〕

欢迎会后，我们直接去重新装修一新的萨沃伊宾馆参加庆祝宴会，这次宴会由马尔科姆·福布斯做东款待。我的座席紧靠着奥康纳市长，他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圣地亚哥在一年前举办美苏艺术节的情况。当时最大的问题出在格鲁吉亚代表身上。

4月份游行示威者遭屠杀以后，格鲁吉亚人拒绝参加苏联的任何节日，尽管他们早先签订了参加协议。我参与了调解，让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说服格鲁吉亚人派一支舞蹈队参加艺术节，他们最后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按照早先的承诺参加博物馆展览。在圣地亚哥，格鲁吉亚舞蹈队拒绝上台表演节目，直到所有的苏联国旗从演出大厅拿走。奥康纳市长认为，圣地亚哥市难以让格鲁吉亚人履行协议表明，第比利斯大屠杀后反苏情绪极其强烈，同时一些苏联机构开始脱离莫斯科而单独行动。

无论如何，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天充满了真正的和鼓舞人心的变化迹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开放；正扩大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与流亡国外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讲和。自由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格鲁吉亚人对所受暴行的反应增强了要求在将来形成一种机制以反对滥用权力的压力。

我们回到斯帕索住所的大门口时大约是10点30分，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话筒，听出对方是詹姆斯·多比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电话里讲，有线电视网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我们弄清楚这一报道的准确性。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在莫斯科还收不到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辞职的打算，但我会就此进行调查。

当时华盛顿还是下午的早些时候，显然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

早晨再提供详细的材料。我打电话给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请他让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找一找有关有线电视网报道的情况，因为我可能很快要向总统或国务卿回话。五分钟内，我们的政治顾〔313〕问打电话告诉我，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站的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别墅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开会考虑他是否应该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作为共产党全面重新改组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没来得及宽慰地舒口气（我们大使馆在消息方面毕竟不会很迟钝，我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这次是国务卿贝克打来的，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有关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报道显然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将来某个时候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足为奇。但是，我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还可以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辞职的。我确信他不会自愿地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他的对手在当时也无力把他赶下台。

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他最后的花招。[19]

共产党独裁的终结

1989年12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314〕 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1989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在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他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

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足社会的需要"。[1]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学报》编辑，这是一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1989年秋还反〔315〕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2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

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间之前，也就是在1991年的2月或3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15]他没有强调党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315〕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过。

这一策略成功了。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

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

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消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说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使其通过了这一将导致他们自己走向毁灭的提案呢？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

其次，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地莫斯科的舆论强烈地转向支持激进改革。2 月 4 日，大型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布加勒斯特 12 月的回忆"在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干部的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第三，戈尔巴乔夫谨慎地与党内"保守派"妥协，并在他们反应最强烈的一些问题上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的强硬路线，继续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体制。他不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合法化。他继续为"社会主义"辩护——虽然要求重新予以界定——反对土地私有化。

这些妥协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力度，但在 1990 年 1 月时，戈尔巴乔夫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为总统职位的设立和在宪法中增加承认多党政治体制的条款是先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在 〔317〕

他摆脱党内上层人物把他赶下台的危险之前，他不能在所有的方面推进。

实际上，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争论是激烈而广泛的。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指出国家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有一种潜在倾向；国家需要更强硬的领导来恢复纪律，尽管这些言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但同时也使得反对他设立总统职位的提案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含蓄地说："好吧，你们想要一个更强硬的领导，这正是一个机会。"

利加乔夫无疑说出了许多与会者想说的话。他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失职和错误"。他反对把共产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并抨击了私有财产合法化的企图。他还用警告的口吻谈到德国正走向统一，并把"二战后边界的修订"比作 1938 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条件问题上还没有与西德总理科尔达成协议，利加乔夫在公众场合提醒他注意：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将在国内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16]但利加乔夫并不反对对宪法第六条的修订，也不反对设立总统职位，显然政治局事先在这些方面已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叶利钦却不受政治局纪律的约束，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改革共产党的 10 点计划——基本上是"民主讲坛"观点的概括。他要求删除宪法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已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对所有共产党官员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专职的共产党官员；废除任命制；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由基层控制党组织经费；在共产党内部采用自愿的联邦体制。[17]

他的大多数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单独投票反对改革草案。

立陶宛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2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推迟对脱离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做出决定，以等待戈尔巴乔夫 1 月访问这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次又是 12 月全体会议的重演。双方都坚持他们以前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中央集权的共产党体制，而分裂主义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拒绝改变去年 12 月在维尔纽斯党代会上投票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决定。 [318]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唇枪舌剑，但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却显得比较温和。它在谴责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同时，表扬了一小部分仍然忠于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员。因此，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在立陶宛的财产置于这一小部分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中央委员会请求立陶宛共产党重新回到苏联共产党的怀抱，并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

“民主主义者”叛变

我无法估计反对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听说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我惊叹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保证正式通过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使他摆脱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如果他最终的打算与我想象的一样，我是不愿意在事后对他的手法加以评说的。然而，国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如此厚道和仁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感到惊诧，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代表时，党内的保守派将占上风。尽管他们原则上愿意支持总统制，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讨论便企图强行通过它持保留态度。

刚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200 名主张改革的“莫斯科共产党俱乐部”成员（基本上是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讲坛”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并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政纲草案“混乱、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和要求”。声明中还说，〔319〕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到了但没有解决多党制的问题，批评会议没有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实行总统制“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

后面的责难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这类言论足以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敌意，同时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将失败。这些改革的“理论家们”（如他所称）所进行的繁琐的细节争论，使党内保守派有时间组织起来阻挡任何真正的改革。

敌视改革的那些人比改革派更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性，强调了群众集会上“民主人士”发表的批评言论，或把非批评性言论歪曲成攻击政府的言论。[18]例如，2 月 4 日大型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戈尔巴乔夫促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但是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一次反政府的举动，因为他所收到的克格勃报告中强调了少数几个示威游行者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把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1990 年和平的 2 月革命万岁”的口号错误地解释成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实际上，这次示威游行主要是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但是克留奇科夫歪曲的报告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当同一批组织者要求2月5日星期天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甚至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时，戈尔巴乔夫感到惊恐万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期的问题：2月25日（旧历）是1917年沙皇被推翻的日子，俄罗斯人喜欢历史性的纪念日；也许是由于上一次示威游行的假情报；也许是由于克留奇科夫孜孜不倦地散布的谣言，他谎称示威游行者计划冲击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的计划受到质疑所引起的愤怒。

不管是什么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这次示威游行，也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支持改革的证据，相反，他试图阻挠示威游行。谣言家们散布着计划发动暴乱的谣言，并警告人们不要卷进去。最〔320〕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声明强调，只允许在被认可的地点进行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总理雷日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老百姓呆在家里不要离开。最后，允许示威游行者在高尔基公园举行集会，并沿着莫斯科宽阔的花园环形道到外交部前面的广场一线进行游行，但是，军队被调入莫斯科城以加强警戒，防止示威游行者进入市中心冲向克里姆林宫。

一般情况下，我都远离政治示威游行，因为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公开支持某个政治派别是不合适的，并且我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样做不可能不被人发觉。但是，这次事先安排好的示威游行刚好要从离我们住所仅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过，我和丽贝卡步行过去，站在街道边上观看示威游行，只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我们觉得官方的恐慌和预防措施完全没有必要。一切都很平和，气氛更像是节日庆典。10万名左右的示威游行者聚集在高尔基公园，然后平和宁静地沿着花园环形道向斯摩棱斯克广场移动，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搭起了一个演讲台。没有人试图冲进市中心，更没有人想冲击克里姆林宫。演讲的内容也没有特别革命性的：他们的要

求完全与"地区间集团"和"民主讲坛"的改革者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一样。一个巨幅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72年走投无路"，这与戈尔巴乔夫后来所暗示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但官方对这次有计划的示威游行的反应激怒了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理解如此肤浅以致他要用武力来阻挠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吗？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以防止一场从来就不存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至少表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谁会喜欢一个强硬的表现出如此荒谬猜疑的总统呢？反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提案的人增多了。

示威游行两天后，当政府实行总统制的提案最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时，"地区间集团"的许多成员批评总统制有缺陷。大多数人同意总统制最终是应该实行的，但同时认为对授予合法权力这一问题考虑得太匆忙，而且授予总统的权力过大。

〔321〕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首先对该提案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立法授权总统不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就可作出影响各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因此该提案带有"帝国总统职位"的特点。因此，他建议采纳该提案之前应该对提案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19]斯坦凯维奇对提案的发难引起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共鸣，同时还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被暂时授予特殊权力，然后修改总统职位法，明确和限制总统权。[20]

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我注意到当与会者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草案的不足之处时，他显得很不高兴。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投票表决之前，他站起来为他自己的提案辩护。他的脸色显得很疲惫，他的讲话更多的是出于防卫和感情冲动，而非出于必要。但是，他已知道他有足够的选票，他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他只需要说，在召开人民代表大

会以修改宪法之前,将给上述建议以充分的考虑。

在他那缺乏条理的讲话中,有许多讽刺影射和偏激的词句,我觉得更像爆发了一场情人之间的争吵而不是一场政治争论。他谴责批评家们"虚伪而蛊惑人心"并试图以拖延"葬送"他的提案。所有人的发言都暗示他正在寻求更大的权力,他因此而受到伤害。"这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合逻辑地反问,好像没人知道谁会"当选"为总统。[21]

这种行为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与表决的结果无关。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决定在3月12日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了将创设政府总统制的立法草案作为修订宪法的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于他那些民主运动的许多同仁,他投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提案。他想讨好戈尔巴乔夫吗?或者他仅仅是希望他自己最终能担任这个得到设立的职位?确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但当时他私下里仍说他没有非分之念,只想加入到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

立陶宛毁了党

〔322〕

正如我的萨尤季斯朋友7月份所希望的那样,1989年底以前立陶宛没有组织选举,但他们在1990年2月25日举行了选举,这比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早一些。正如所预料得那样,萨尤季斯赢得了绝对多数。最后选举在3月4日和8日举行,立陶宛新的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宁愿不用西方语言中的"苏维埃"这个词)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3月10日举行。

事态似乎正朝着立陶宛人曾向我谈论过的方向发展。新议会2/3以上的成员是以独立的政纲选举产生的。人们认定他们将首先通过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何时宣布还不清楚。

立陶宛选举不久以后，萨尤季斯领导人要求与我们在3月7日见面，这一天他们打算来莫斯科。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讲一讲选举后立陶宛的局势。我邀请他们上午11点来斯帕索住所。

那天，我醒来以后感到头皮发紧并有些发烧，显然是莫斯科一年中这一时期很普遍的“24小时流感”在我身上发作了。这种流感来势凶猛但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以治好流感。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医生的意见，我的办公室便通知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有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在上午10点钟私下见我一面。外交部离我所住的斯帕索住所只有三个很小的街区，我经常步行过去参加约会，但是这一次我穿得严严实实，并驱车前往外交部。

一般情况下，我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时，房间里至少有两个别的人，即我们双方各有一名记录员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作记录。由于他经常邀请他的副手或一些专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经常有更多的人在场。然而，这一次却只有我们两人。

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但表情非常严肃，并为在顷刻间召见我而表示歉意。他让我坐在我平常所坐的地方、靠近他手扶椅的沙发上。一个助手走了进来，给他一杯奶茶，给我一杯清咖啡后，又[323]出去了。我的来访相当频繁，因此助手也知道我偏爱的饮料。谢瓦尔德纳泽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我注意到纸条的字是用他的母语格鲁吉亚文而不是用俄文写的，显然这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并对我说他希望向我传递一个非常重

要的信息。他想要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即3月10—12日，对苏联的前途将是“决定性的”。戈尔巴乔夫计划实行总统制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联邦，但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虽然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但比较容易处理，相反，民族问题解决起来相当困难。

他以前曾私下里跟我们谈到过民族问题的棘手性，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仍比引起公众注意的经济问题更严重毫不足怪。我当然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也知道存在强烈的反对。我感到奇怪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然觉得本周末事态就会向危机方面转化。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进一步向我解释。

他说国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特别是苏联军方。若一步走错完全会引发一场内战，导致军事独裁专政。他接着讲，立陶宛的局势尤其棘手。如果它的新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提案之前就试图宣布独立的话，一场内战将不可避免。他没有准确详细地说明内战将如何开始，但他指出立陶宛有很多防御工事，并驻扎了许多军队，其言下之意是苏联军方可能在没有取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情况下夺取立陶宛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对于在莫斯科实行总统制之后立陶宛宣布独立，他不感到担忧。他认为，如果立陶宛人等到那个时候再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应付这种局势没有太大的风险。

然后，他把话题转向召见我的特殊原因。他说他已经知道我将与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会谈，他认为，决定与谁会谈当然是我的权利，但是他觉得较慎重的做法是：把这次会谈推迟到下星期举行，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立陶宛人像他们威胁得那样在本周末宣告独立，人们会认为立陶宛人是在按美国的“指令”行动。　〔324〕

我瞥了一下手表，时间将近10点30分，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时间是11点整。我觉得推迟这次会谈并不是很好，而且，即使想推迟也来不及了。在萨尤季斯领导人来我住所之前，我没法通知他们会谈的时间已经改变，而且不与他们见面也没法解释清楚。他们肯定会告诉新闻界，许多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不得不如期举行，但我并非没有考虑谢瓦尔德纳泽的提醒，局势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微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会毫无证据地猜测立陶宛人和美国大使间的任何接触都意味着美国正操纵着苏联的解体。对这些人而言，这将是支持用武力镇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强有力的证据。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欣赏他的坦率，我相信我国政府理解他对局势的阐述。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不承认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强行并入苏联，但我们不会怂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采取轻率的行动。实际上，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报渠道可以确信（我知道克格勃在我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一直在告诉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它们完全独立之前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承认，我还对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不允许的话，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不提供任何建议也不给予任何援助时，我们的政策相当于一个慎重的忠告。

我接着说，至于我会见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事，按事先计划将在几分钟后进行。我认为不应推迟。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我的住所，如果我不与他们见面，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我向谢瓦尔德纳泽保证，我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怂恿他们采取轻率急躁的行动。

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解释我不会推迟这次会谈时，他的脸拉得很长，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他仅仅问了一下会谈能否尽可能短一些。我告诉他说，我已感到很虚弱，会谈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相信我不会沉溺于冗长的讨论之中。

我开车回到斯帕索住所时，立陶宛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也正好〔325〕到达。领队者是萨尤季斯的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他很可能在宣布独立后当选为立陶宛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诸如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

我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他们说明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因此只能与他们进行短时间的会谈，在我提前离开后欢迎他们继续与在座的大使馆其他官员会谈。按照谢瓦尔德纳泽的请求，我可能需要装病，但事实上我不用假装：脑袋正在嗡嗡作响，我感到面颊发烫，嗓子也开始发哑。

在提醒他们我很快就不得不提前离开之后，我强调我们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克格勃的窃听装置像来访的人一样多），以免这次会谈以及别的类似的会谈被人误解。我们美国人不会对他们一些具体的决定和行动出主意，我们本身不会给他们任何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两国很重要。我强调说，苏联的政治发展很快，这意味着所有的改革参与者应在采取行动时极度小心。然后，我问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兰茨贝吉斯解释说，他们是来告诉我们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很可能宣布独立。他们这次来主要带着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立陶宛宣布独立将做出何种反应；第二，美苏之间在民族问题上是否达成过一些共识。

我回答说，正如我在去年夏天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过的那样，

宣布独立不会引起美国的自动承认。通常只有当该政府能有效控制它的领土时，美国才会承认。仅仅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控制领土，因此他们不应该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

至于他们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向他们保证说，美苏在民族问题上绝对没有达成过“共识”。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时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在我们相互阐明各自的政策时才这样做。我们始〔326〕终一致地向苏联当局重申，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兰茨贝吉斯说，立陶宛绝大部分石油都是从苏联输入的，所以，如果石油供应被停止的话，立陶宛将会不堪一击。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停止石油供应，美国会援助立陶宛吗？我回答说，由于莫斯科控制了立陶宛的港口和机场，我不知道美国怎样才能提供援助。

其中一位来访的客人又一次提出承认问题：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承认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它一直认为法律上是独立国家的政府呢？我再次解释说，承认某一政府包括确认该政府已控制了它声称拥有的领土。另外，我补充说，美国立即承认立陶宛对立陶宛人是危险的。我们的承认不是为强硬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提供了借口吗？仅在几个星期前，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就被苏联军队用武力赶下台。虽然阿塞拜疆的形势与立陶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表示它有能力用武力恢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果它决心这样做的话。如果立陶宛出现了武装干涉，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实际上，美国推迟承认立陶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苏联军队会认为美国承认立陶宛是一种挑衅，从而唆使他们

采取行动。兰茨贝吉斯没有反驳他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们为什么急于在本周末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兰茨贝吉斯回答说，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权力之前就宣布独立。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为了扼杀他们的独立运动正在谋求这些特别权力。

我说我不能对戈尔巴乔夫说三道四，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苏联官员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官员跟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使用武力，但是在代表大会确立总统的职位之前，宣布独立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从而导致武力冲突。我强调说，我们不能为这种解释作担保，但是我们没有驳斥它的任何证据。

"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力之后肯定会镇压我们。" [327]

"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15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

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328〕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7点15分（华盛顿时间晚上11点15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3月8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6点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

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329〕意向布什总统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考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感谢我提供了与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情况，并会去核实一下。他要我们不要再进行任何活动直到他允许我们“继续干”。我向他保证本周末，我会一直呆在家里，他可随时与我电话联系。

我感到他没有一天前那样担心了，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眼睛看着我，显得很激动，并对我说：“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出现了独裁专政，我打算辞职。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的政府中的一分子。”

我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因从一个政治局委员口中得知恢复独裁迫在眉睫这种荒唐的现实而失去平衡。当他在12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兑现。

整个周末，谢瓦尔德纳泽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维尔纽斯的事态发展正如兰茨贝吉斯告知我的那样如期进行。3月11日，星期〔330〕天，凌晨，正好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之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124票赞成、6票弃权、0票反对宣布恢复立陶宛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地位。议会确定国家的名称为“立陶宛国”，取代以前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音乐学教授

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当选为主席和国家首脑。

主席的选举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兰茨贝吉斯获得 92 票，从莫斯科分裂出来的立陶宛共产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获 31 票。投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表明了布拉藻斯卡斯的冒险是成功的，他和他的政党作为立陶宛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保存下来，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多数党。如果他听从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或屈从于他的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在立陶宛正在进行的这场政治选举过程中失败。几天以后，卡拉兹米拉·普隆斯基涅当选为立陶宛总理，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第一副总理。

〔331〕

第十三章

非民选总统

总统制的施行应该是新的民主宪法中的一个完整、统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唯其如此，它才应该施行。超出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宪法背景，总统的权力将是危险而无法预测的。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90年3月12日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①

我将在民主的基础上运用总统权力，使它在全面改革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0年3月15日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②

自从得到中央委员会原则上的同意，事情就已清楚，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对试图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先发制人，他便能够确保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设立总统职位。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赞成总统制表明他控制了这一组织——在中央

委员会正式支持他的态度时至少如此。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召开一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他实施行动计划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根本性胜利，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

1990 年 3 月 12 日，大约在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两周后，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于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尽管会议的结果人们都已预料到，但它仍将成为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因此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实上，我所亲身感受到的火药味比我估计得更为浓烈。

改 革 派 发 难

〔332〕

作为“地区间集团”的代表，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草率地”推行总统制是“一个明显而且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要求政府考虑把总统制推迟到缔结新的联盟条约、选举出新的立法机构和建立多党制之后。另外，他强调指出，新的苏联总统应该通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并且不允许在担任总统的同时还担任党的高级职务。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观点如下，即国家出现了许多问题是行政权威削弱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反复无常和危险的”领导削弱了群众的信赖。他进一步要求摈弃“陈旧过时的共产主义观念”，并列举了斯大林的罪过以及勃涅日列夫的腐化堕落，其言下之意是总统制会使这种现象重现。这时，他被告知发言时间已到。他请求延长发言时间，但作为主持人的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被迫离开了讲坛。

我预料到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地区间集团”的成员会强烈要求在建立总统制之前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也

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他们已公开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对戈尔巴乔夫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确实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改革派怀有偏见的批评以及他对2月25日示威游行的公开敌视已经在他们之间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敌对情绪。几个星期前，“地区间集团”的领导人（也许叶利钦除外）仍然愿意对戈尔巴乔夫的良好愿望做出让步，但是现在他们显然像兰茨贝吉斯一样与戈尔巴乔夫疏远了，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谋求更大的权力只是为了收拾他们。

我为他们之间的分裂感到痛惜。我觉得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民主主义者”的同仁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策略带有指导性错误。如果苏联最终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们的五个条件将会得以满足，但是首先应允许戈尔巴乔夫确立他的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在此之前就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是自我拆台。要想〔333〕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必须冲破共产党对政治进程的束缚。除了设立总统职位或名义不同但实质相同的职位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修订宪法第六条，即删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提法以及允许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在我看来，这是实行总统制的基本前提条件。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地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民主改革派似乎对戈尔把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毫无颂扬之意，这些成就仅在几个星期前还是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

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五点建议，那么他想在共产党之外建立政治领导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取消了共产党的控制而共产党仍旧能阻挠政治变革时尤其如此。在他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前，他必须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套统治体制。总统

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庇护，我认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整共产党，以使共产党将来不再能通过控制正式的政府部门而直接统治国家。

当我私下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太轻信、太天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至少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这样——他知道如何应答以投合来访的外国人。我们之间正保持着日益信赖的私人关系，这一点肯定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我回想起我的前任之一、最知名的前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他因受到与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的影响，忽略了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削弱并可能被他的同事们赶下台的种种迹象。

1963 年，我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年轻官员向汤普森报告说，很可能是由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正准备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事实上，我当时就感到汤普森对此极为不快。作为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的高级顾问，汤普森给莫斯科的美国官员发了一份电文，指出我们不应沉溺于对“克里姆林宫的推测”，这可能会破坏华盛顿对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信任。1964 年 10 月，我们描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由列昂尼德·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从赫鲁晓夫手中夺过了权力。

60 年代早期的经历告诉我，因个人的爱憎而影响决断是危险〔334〕的。我经常向我手下的人详细讲述我早期的经历，并请求他们如果发现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倾向，要坦率地向我指出。

在分析局势时，我清楚地知道，同苏联本国的人——他们消息更加灵通，其判断力也为我所尊重——相比，我对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有更多的信任。我将此视为一个警告，我应重新思考得出结论的理由。我这样去做了，但是，无论我多少次反复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

列事情，我只能理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职位是为了做他声明要做的事情——加快改革进程，以及做一些他不能够说的事情——排斥共产党以使他能最终废除共产党。

我得出这一结论主要不是根据他公开或私下的言论。我知道这一结论即使正合他的心意，他也会表示异议。我是根据他的行动以及分析他面临的选择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有时反复无常——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均说明，他对改革是认真的。

无疑，他喜欢权力。确实，他一想到失去权力就毛骨悚然。的确，他脸皮太薄，对批评过于敏感，把善意的批评看作是对他的背叛。不过，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动就缺乏逻辑性。如果他的目的是要镇压立陶宛人和把矛头对准改革派，他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总统职位呢？如果这些是他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他利用现有的政党、警察和军事机构将更容易、更有保证地达到他的目的。如果权力是他唯一或主要目标的话，他不用改变他所继承的现有体制就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权力。为了试图改革这个国家，他正在冒很大的风险，我找到的唯一能解释他冒此风险的理由是：他确立了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且，我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暂且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改革派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虽然总统制的基本立法没有包括各种制约机制，也没有为完全实行民主提供必要的平衡机制，但它的确对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这与对权力毫无限制可言的现有体制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绝大多数改革派应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夫有解除共产党权力的任何希望的话，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总统制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任何其他方式也没有成功的希望。〔335〕

总之，我认为对于改革派来说，眼下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权宜之计，支持尽快推行总统制，同时宣布新宪法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这一制度从长远来看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最好是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之后再做出判断。如果他没有利用这次党代会来削弱保守的共产党组织，他理应受到更直接的反对，但是时机不成熟的反对只能削弱他的力量，使他无力对付那些真正想阻挠变革的人。

避免直接选举

因为这些原因，当我看到“民主主义者”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日益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深感苦恼和悲哀。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双方都会受到损害。然而，阿法纳西耶夫提出的五个条件中有一条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即总统应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显然，如果新总统由人民直接授权，会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威。事情很清楚，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取得他所谋求的改革成就，他将需要他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权威。不过，提交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草案规定，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总统任期为五年，以后总统通过普选产生。

戈尔巴乔夫的名望仍然相当高，尤其是与其他的政治家相比。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如果立即进行总统普选的话，他可能会赢得绝大多数选票。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是逃避选举这一关，从而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里，我与许多苏联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讨论了这个问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认为，他避免直

接选举只是因为他怕落选。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则指出，选举会浪费和分散时间，如果戈尔巴乔夫想继续改革进程的话，时间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336〕 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当立法草案最后出版发行时，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逃避竞选运动。根据立法草案的规定，总统选举由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多数票决定。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避免俄罗斯控制总统选举。如果只管票数而不管是否得到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那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多数支持，俄罗斯也可以选举出一个总统来。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不会接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宪法。

对戈尔巴乔夫及他的政治顾问来说，要得到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支持显然是有困难的。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7个（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三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以及摩尔多瓦）已经严重与苏联疏远，戈尔巴乔夫想赢得其中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都极端困难。这意味着他必须得到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支持，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则会趁机在自治的要求上加码，以此作为支持的价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方式，提议总统最初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月份在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建立总统制的鲍里斯·叶利钦此时宣布，他只支持民选的总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想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人们来选举总统，我不赞成并将反对这种选举方式。"然后，他又补充说："这将改变通过普选制选举总统的日期，可能是四年，或许甚至是一年。如果戈尔巴乔夫

不改变选举方式的话，便有必要取而代之。”[3]

关于总统制的争论在3月12日仍在进行，第二天早上接着辩论。但两个小时之后被强行停止，并开始举行投票。建立总统制的提案以1817票赞成、133票反对、61票弃权得以通过。

接下来的议程是选举第一位总统。除戈尔巴乔夫外，总理雷日科夫和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由于他们两人都退出竞选，戈尔巴乔夫成为唯一的候选人。[4]

设立总统制的法律是以记名投票的办法通过的，总统选举却〔337〕不同，它是无记名投票。由于代表们是进行无记名投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让人感到吃惊。他以1320票对495票赢得大选，但还有313名代表要么弃权，要么投了无效票，这意味着他赢得的选票低于60%。

天空中已布满了乌云，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其中的一块。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但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论改变政体结构的可能性以来，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帝国的政体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虽然这种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要贯彻落实仍将是未来的事情。

立陶宛人的挑战

立陶宛人宣告独立并没有引起谢瓦尔德纳泽所担心的政变，但是它肯定给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带来一些紧张气氛。戈尔巴乔夫显然曾希望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能够成为他的总统就

职仪式。

从第二天早上起，代表们开始要求讨论立陶宛的局势。来自维尔纽斯的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代表立陶宛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发言。他指出，在此次代表大会上立陶宛代表只是观察员而不是与会者，他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已投票通过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呼吁代表大会促成立陶宛与苏联当局间的谈判。

虽然爱沙尼亚人还没有正式宣告独立，但其代表已向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就爱沙尼亚独立问题举行谈判的请求，并宣称他们将不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这将会影响爱沙尼亚的地位。

针对要求谈判的呼声，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与立陶宛、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举行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结束之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恢复独立的行为无效，并要求苏联总统、最高法院和部长理事会保障立陶宛所有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和那里的苏联财产。[5]

〔338〕

兰茨贝吉斯毫不妥协，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像以往一样，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僵，他公开表示："我们不指望苏联明天就会接受立陶宛的立场，他们也不应指望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最后他忿忿不平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告了侵略者有统治其受害者的权利。"[6]

那个周末，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城市举行了相互对立的集会。在立陶宛人庆祝他们独立的时候，俄罗斯居民被动员起来示威游行，反对立陶宛独立。所有示威游行井然有序，但苏联民众从苏联中央电视台得到的印象却不是这样。

那个周末，我正在中亚地区旅游，并认真看了莫斯科的电视新闻。以前，关于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报道尽管对波罗的海地区

的民族主义者抱有偏见，但有时也对他们的活动和要求进行一些客观的报道。留心的电视观众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报道，去掉歪曲的部分，比较准确地看到事情的全貌。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显然莫斯科发布了命令，只报道莫斯科对事件的看法。

对立陶宛当选领导人所作的歪曲和诽谤的报道，使我感到震惊。他们仅对反对独立的示威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电视镜头还夸大了示威游行的规模。最近从立陶宛搬迁出来的俄罗斯族人在电视上用激烈的言词谴责立陶宛当局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尽管他们没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随后我们得知许多示威游行者并非来自立陶宛！）。然后，电视演播室里请来的评论家们一本正经地告诉电视观众，宣布独立的"极端主义分子"仅仅是一小撮立陶宛人，他们实际上是曾与希特勒狼狈为奸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徒子徒孙。这种苏联老一套诽谤方式的重现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公开化的成果很快在电子媒体中被取消了，它仍处在比报纸更有力的中央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发布了法令，要〔339〕求立陶宛人上交所有的武器，执法机关"保障立陶宛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边防士兵"加强保卫"立陶宛的边境，安全机关"制止外国人的违法行为"。[⑦]如果从字面意义来看，有些法令似乎不可思议：既没发生立陶宛人引起的骚乱，也没有武器广泛流散的证据（与外高加索的情况截然不同）；没有证据表明立陶宛边境已不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也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人没有签证便进入了立陶宛。这些法令明显带有挑衅性，为执法部门搜查民宅、没收财产和驱逐外国人提供了借口。立陶宛政府立即宣布这些法令无效。双方法律上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若其中一方竭力坚持自己的要求，法律的冲突就可能逐步升级成流血冲突。

实际上，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已开始显示其力量，他们增加了战斗机的数量和地面军事演习的次数。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于3月21日给雷日科夫发了一份电文，抗议这种行为方式，并指出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定下来。

到了3月22日，莫斯科对维尔纽斯的恐吓变得更加严重，立陶宛议会发表了"告世界各国书"，指出"另一个国家正在准备用武力侵略立陶宛共和国，这一点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明显"，议员们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用抗议来阻止对立陶宛可能的侵略"。[8]

3月23日，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通知，要求在立陶宛的所有外交官必须在12小时内撤离。虽然我们在立陶宛没有固定的办事处，但近几周我们临时安排了至少两名外交人员呆在维尔纽斯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苏联外交部还"告知"新闻记者"暂时"不会批准去立陶宛采访（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旅行一直是受到控制的，尽管去波罗的海诸国首府的旅行通常会得到批准）。驱逐外交官的命令太突然了，以至于发通知的那些人没有去核查一下交通条件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驻立陶宛的代表是从列宁格勒总领事馆调去的，他们既订不到飞机票，也购不到火车票，为了在最后期限撤离，只得租用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车离开那里。

〔340〕 把所有的外国人（外交官、新闻记者、普通公民）赶出立陶宛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是莫斯科迄今为止采取的最可怕的一个举动。它表明莫斯科方面认为暴乱可能迫在眉睫，它准备采取的行动不是使用武力，就是挑起一场冲突。莫斯科之所以把外国人从立陶宛驱逐出去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既可消除"外来的煽风点火者"，又可以排除这场镇压的目击者。

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驱逐命令立即表示抗议。不过，外交官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结果表明莫斯科也无力驱逐所有的外国

记者和平民，其中一些人在立陶宛当局的保护下仍滞留在立陶宛。

我于3月24日星期六结束了中亚之旅回到了莫斯科，并立即召集大使馆的高级官员讨论最近事态的发展。我指出，戈尔巴乔夫正试图恐吓立陶宛人，但可能仍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但是问题在于，立陶宛人受到的挑战愈直接，他们可能愈加好斗。虽然立陶宛人尽力想避免武装冲突，因为他们知道用武力的方式他们不会获胜，但是苏联官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不住为挽回面子而采取武力行动的诱惑。军方高级官员已被要求为了防止立陶宛分裂，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到特别不安。虽然两个星期前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担心毫无根据。

华盛顿方面担心的是，立陶宛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冲突将会中止美苏关系的总体改善，破坏我们之间裁减军备的谈判，并使中、东欧遗留问题的解决复杂化。虽然一些愤世嫉俗者会怀疑美国可能“牺牲”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保证这些“更重要的”目标，但没有一个美国政府会与一个使用武力控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苏联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苏联出现了镇压之后，国会将限制试图与它照常往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虽然我猜测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对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是极力反对的，但我不能肯定他们领会到了我们反应的强烈程度。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好几个苏联高级官员向我抱怨，他们没有得〔341〕到美国反应的预先警告。1981年，有人对我说：“当阿富汗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时，你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我们做我们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时，你们大发脾气，破坏了10年来在我们之间建立的所有关系。”

1979年，苏联领导人可能不会被警告所威慑，但到了1990

年，他们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改善对它已更加利害攸关。重要的是，要让戈尔巴乔夫不抱这种幻想：即使在立陶宛实行了武力镇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仍将会保持下去。我认为给戈尔巴乔夫一个清醒的警告正是时候。

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考虑与我不谋而合。我刚起草好一封建议白宫高层领导人发出警告的信，就得到华盛顿方面的通知，国务卿贝克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正在传递途中时。贝克的信星期天的早上到达，我们马上予以转达，因为事态发展太快，我不想等到第二天再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同一天抵达莫斯科。他很少出访，但每次总是很有成效。他把他与政府所有可能的政治分歧都抛在一边，不断地将他的活动详情通知给我们，并努力确保他的所作所为是在支持两党共同的对苏外交目标。在敦促解决人权问题时，他尤其有影响力。

当我到机场去接他时，看到他正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他要我向他简单介绍一下立陶宛的局势。我告诉他那里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事件，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然后，他走到记者面前，强调和平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发生了暴力事件或镇压，将会危及美苏关系。

这些讲话是重要而有益的。我们已在私下里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有鉴于此，由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士传递与我们相同的信息是益的，尤其是他可以在公开场合传递这一信息而不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那个周末，我开始看出一些迹象：莫斯科新闻媒体缓和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坚持的反立陶宛立场。星期五晚间的电视新闻

对维尔纽斯事件进行了反面的报道，但是，紧接其后播放了布什总统认为有必要对话的声明，并电视采访了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美国著名专家盖尔·拉皮德斯教授。拉皮德斯教授对电视机前的〔342〕苏联观众说，他们的民族问题只能通过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解决，特别是立陶宛，它在获得自由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这些非常明智的话语并不是出自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之口。苏联中央电视台显然有人正试图对波罗的海事件进行比我们近来所看到的更客观的报道。

第二天，《消息报》刊登了一篇从立陶宛发回的报道。这是一篇比我们的期望还要全面一些的报道。该报道准确地引用了最近兰茨贝吉斯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短信，在信中，兰茨贝吉斯否认立陶宛正在组建军队。他把目前的局势称为一场“神经战”。然后该报又引用一位立陶宛议员的话说，现在是寻求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时候了。这是自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我在莫斯科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份以公道的措词描绘立陶宛局势的报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官方立场松动的信号还是主编伊万·拉普季夫自由化态度的反映。我注意到《真理报》没有刊载同样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发自于官方的新闻机构塔斯社。

实际上，苏联对立陶宛的压力并没有放松，接下来的一周我从苏联官员那儿听到的消息令人难以释然。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于3月26日设午宴款待肯尼迪参议员，立陶宛自然是我们关注的中心话题。我和肯尼迪向普里马科夫强调了与立陶宛开始谈判的必要性，他说立陶宛领导人使用的策略使得双方不可能谈判。如果立陶宛改变策略，讨论还是可以的，但谈判决不可能。我问他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是不是不可混淆的：为什么“讨论”和“谈判”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差别？普里马科夫问我美国总统是

否会与国内的其他政治集团谈判，我回答说总统当然可以这样做：他与国会、州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谈判是家常便饭。

“但是，他不会与要求独立的州长谈判。”他指出。

“可能不会，”我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赋予各州脱离联邦的权利。”

〔343〕“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但它们必须依法行事。”普里马科夫回答说。

在我正要问他使用“权利”前为什么还需要得到其他人同意这个问题时，有人转换了话题。正如他所知，当时最高苏维埃正在辩论的“脱离法”草案规定，做出脱离苏联的决定必须得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

虽然普里马科夫坚决拒绝考虑与立陶宛“谈判”，但他确实向我们保证他们不打算使用武力。不过，其他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很令人乐观。当时美国刚离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上将正在莫斯科访问，在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问及立陶宛局势时，他回答说，苏联边境的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反对外来威胁，“必要时”也可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显然，他的话证明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当然，苏联军队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那儿有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防御基地，但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我专门倾听了专家的意见——认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独立后，只要它们没有落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苏联的防卫力量将不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如果莫斯科方面 1990 年愿意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它或许可保留其在波罗的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苏联军队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依恋可能有军事需要的问题，但更多是情感上的问题。苏联对军队的教导是：为保卫苏联所有的领土而献身，在军队看来，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办法

布什总统的公开声明，以及随后贝克国务卿传递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息，都是很及时的，但是双方似乎仍没有就缓和紧张气氛进行对话的意思。戈尔巴乔夫正面临要他“采取某种行动”的强大压力，迄今为止他一直避免直接使用武力，他在向立陶宛施加心理压力，但他这样做显然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一个小冲突会〔344〕逐步升级，使局势难以控制。

我开始问自己，然后又问其他人，美国或别的国家是否能做些事情帮助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并开始对话。通常，我们波罗的海的朋友仅仅考虑面临的威胁，苏联官员则只是一味地建议立陶宛人放弃宣布独立，并加入到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来。后者肯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已竭尽所能地坚决反对镇压，但仍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克服所有阻碍有效对话的“原则立场”。

“脱离法”草案虽然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却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包括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条款，但它的确承认分裂在某种情况下是合法的，它规定通过加盟共和国的全民公决，2/3 有效票就可以着手进行脱离联盟进程。在我看来，就全民公决本身而言，这一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立陶宛能够被说服同意举行全民公决，与莫斯科就谈判达成谅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同意独立的 2/3 多数。这将为莫斯科

提供了一种挽回面子的解决办法。

当我和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最初是犹豫不决的。第一，他们不同意他们是在脱离苏联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他们从来就不是苏联的合法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第二，如果要他们遵守苏联的法律，即使是部分法律，这不是等于让他们承认苏联的管辖权吗？第三，虽然立陶宛人相信他们能够获得2/3以上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他们开了同意举行全民公决的先例，这不等于背叛了另外两个波罗的海邻邦吗？特别是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不到拉脱维亚共和国人口的 2/3。

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并非法律的细节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他们持有无懈可击的法律依据却仍没有获得独立。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正式宣布其全民公决是按照莫斯科的法律要求来进行的。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莫斯科所宣称的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不想独立的说法是错误的。

[345] 他们认为默认苏联的司法权会削弱其合法地位，这种担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他们是一个被强占的国家，他们为获得独立而被迫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应被理解成自愿接受苏联的管辖。

最后，我指出，通过一些明智的政治宣传，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应该能赢得赞成独立的 2/3 多数。我认为投票不会完全按照种族界线划分，许多非波罗的海民族的人也会赞成独立。例如，在拉脱维亚，倡导独立者如果能获得 80%的拉脱维亚人和 40%的非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他们就会赢得 2/3 的多数，如果进行计划周密的游说，目标应该能够达到。

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多次会谈使我相信，虽然立陶宛人最初犹豫不决，但他们确有可能同意举行全民公决，只要戈尔巴乔夫真的同意在 2/3 多数赞成独立的情况下开始谈判。

我们已对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可怕后果做了预先警告，我觉得以这种建议作为对警告的补充是有用的。因为它为当时双方摆脱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我计划周末回美国参加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的会谈，并参加我两个儿子的婚礼。我打算尽力使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华盛顿方面的想法与我们在莫斯科的想法仍然不谋而合，并且在时间上也相同。我于 3 月 29 日晚上飞抵德国的法兰克福，打算第二天飞回美国。但是，午夜以后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华盛顿方面打电话通知我天亮以后重返莫斯科，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到莫斯科机场接我，他不仅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大使馆繁重的业务，而且我不在的时候还独当一面。飞机到达机场时，我们只剩下不多的时间驱车前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去参加事先约好的会谈。迈克在车上谈了一下基本情况。布什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当天早上已由迈克转达给谢瓦尔德纳泽。布什总统在信中坦率地说，他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在立陶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并指出，如果双方事先都同意将尊重投票结果的话，全民公决为双方打破目前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天下午，苏联联盟委员会召开会议，布什总统想把信在会前交给戈尔巴乔夫，因为会上有可能就立陶宛问题做出决定。我的任务是与雅科夫列夫讨论这封信，并就总统建议的背景提供更多的细节。〔346

我的使命可用两句话来表达："向雅科夫列夫指出镇压立陶宛人的危险性，得到他对总统提出的通过全民公决解决目前僵局这

一办法的反应。向他说明如果因任何原因而发生镇压，那么苏美两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将不会保持下去。"任何一个外交官，不管能力多差，也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的谈话者表明这些观点。

但可笑的是，我发现给我的指示写了满满两页纸：好主意完全被冗长的陈词滥调遮掩了。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官僚们试图向其同事和上司证明他们是多么地了解情况的。尽管有些内容一看就明白，但每一点都是罗罗嗦嗦地作了详细的说明。文件的起草者似乎担心收信人水平不高，理解不了，但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体制"太熟悉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起草文件的人。所有的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会受到不想留下任何余地的"跨部门委员"的同样对待。

这份长信有一个好处：我可以用俄语念给雅科夫列夫听，然后给他留下英文的原稿。这可表明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官方的，并不是我个人杜撰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对立陶宛抱有同情态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希望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丝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然而，他对立陶宛人最近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双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除非立陶宛停止宣布独立以及其他行为。如果立陶宛人想进行对话，他们可以在当天举行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出席。他们"大胆而挑衅"的立场使得任何对话的尝试都无济于事。

[347] 雅科夫列夫承认，全民公决可以成为脱离联盟的一个开始，如果立陶宛人这样做的话。他说，倘若现在要举行全民公决的话，立陶宛人应首先恢复他们宣布独立之前的局势。他指责立陶宛人不顾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歪曲历

史。虽然“纳粹—苏联”的秘密条约是不合法的，但是1940年立陶宛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是有效的，现在的立陶宛领导人不能简单地以独立把这一切抹掉。

他饱含激情地强调，立陶宛的行为是“送给保守力量的一份厚礼”，将使改革进程受到干扰。他指出，苏联要求使用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呼声日高，同时要求立陶宛人用硬通货支付苏联的所有援助物资。不过，他向我保证，贸易还用卢布结算，因为如果使用一种可兑换货币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几个月前曾跟我说过，立陶宛宣布独立将是“改革的终结”。我也意识到党内的保守派因立陶宛人的背叛而责怪他：他们指责他于1988年夏天访问立陶宛时提出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引发了波罗的海各国分裂进程。虽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他无疑怕别人抓住他的政治辫子，并力图确保与我会谈时紧密地与当时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我告诉他说，由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争论立陶宛的合法地位问题毫无用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缓和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紧张气氛符合苏联和立陶宛双方的利益。显然，在对话没有进行时就要求一方投降，这样的对话将很难开始。但苏联领导人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不管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明智与否，他们显然不会仅仅为了进行对话而改变这一决定。

雅科夫列夫不停地重复他的观点，只有立陶宛人恢复原来的局势并且“停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全民公决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以现存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反对独立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向他指出，独立并不意味着必须断绝现有的联系。他应该考虑一下他曾呆过的加拿大：以前它曾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

系和人员往来。

[348] 他对我的提问未作回答，但是抱怨说，试图“恐吓另一方”是不合适的。苏联指责美国近来在巴拿马和菲律宾的行为时，从来没有暗示美苏关系会受影响。美国在立陶宛问题上的“恐吓”将会“起相反的作用”。

我回答说，当我们表示镇压立陶宛将使两国关系不会继续发展时，我们并不是在恐吓。我们只是在阐明一个政治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立场被误解，我们就玩忽职守了。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很明显雅科夫列夫得到的指示是决不“妥协”。会谈结束时我指出，莫斯科目前的策略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可能会发现，全民公决将为他谈判独立的条件提供一个政治依据。

立陶宛问题犹如幽灵一直纠缠着谢瓦尔德纳泽此后一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会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确实达到了目的：确定了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将于 5 月底 6 月初来美国参加首脑会议。我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我确信每年的首脑会议都很有意义，此次首脑会议还将促使戈尔巴乔夫尽一切努力避免当年春天在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动武。他无疑知道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流血将会取消他计划好的与布什总统的会晤。

1990 年 4 月 9 日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我们接待了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率领的由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访苏代表团。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试探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问题上态度的机会。

会谈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对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所面临

的困难作了很长的介绍。他没有直接涉及立陶宛问题，但是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时，他指出，他对“美国国会对这里某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感到吃惊”。显然，他是指国会通过的支持立陶宛的提案。

米切尔参议员向他询问了有关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处理立陶宛问题的前景。戈尔巴乔夫简单地回答了执行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情况，指出国务卿贝克不久将访问苏联，希望能够解决遗留问题，虽然美国似乎仍在谋求某些单方面的优势。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立陶宛问题上，尽管他表示最近就立陶宛问题已讲了许多，不知道该补充些什么，但是他还是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他的观点。〔349〕

他认为，由当前的政治领导人统治立陶宛人是不幸的。他们拒绝参加对苏联体制进行的彻底改革。他眼睛看着我说，他不知道谁在给立陶宛人出主意，但他们的政策也许是出于无知和政治无能。他们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苏联建立总统制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后来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是有耐心的。如果立陶宛人独立了，我们将与他们断绝关系，并把他们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他们的日子恐怕肯定不好过。但问题的症结在兰茨贝吉斯本人，而不在立陶宛人民，我们不想让立陶宛人民遭受痛苦。

像雅科夫列夫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立陶宛“恢复到它3月10日的局势”，也就是说，恢复到它宣布独立前的局势，才可以就立陶宛独立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他分析道，即使达到这一点，谈判也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有80多万非立陶宛人生活在那里，很多人将离开。然后，他强调说，如果人们明白这些谈判将会出现的结果，他们是不会支持“分裂主义者”的。

就他本人而言，他正承受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压力。人们

正在指责他缺乏主见和过于软弱，但是他深信目前的局势要求克制和忍耐。不过，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他不会拒绝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和行使总统权力。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显然与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其他人所讲的仍然决定不使用武力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给别人提问和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对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尤其敏感，因此，他不会放过劝告这个由知名的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的机会。

〔350〕他说，美国国会不应该出面干涉这些问题，或充当教训者的角色，这样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认为除苏联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都担心立陶宛脱离苏联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巴西、印度、加拿大、南斯拉夫等联邦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戈尔巴乔夫似乎越来越脱离现实，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话题转回来。他显然已准备结束会谈，但忍不住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说，"并非事事都取决于我们，"又一次暗示立陶宛人应该做出调整，"我在访问立陶宛时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独立只是举手或投票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情远比这一切要严重得多。但是，许多人已在想方设法改变目前的领导人，因此可能还有希望。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宣布独立之前曾访问过马特洛克大使，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他们显然想从大使那里得到一些建议，但是我不知道大使跟他们讲了些什么。"

讲到这一点时，我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打断了他。我用俄语对他说："他们不是来征求我的建议，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建议。"

戈尔巴乔夫微微一笑，表示他的话并无敌意，他接着说："对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如同煎烙饼一样已通过了不少法律。"

他重申，如果立陶宛人希望就脱离联盟开始谈判，他们必须恢复到3月10日的局势。

他终于停了下来。米切尔参议员试图使他承诺不采取武力政策，米切尔机敏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希望他能对他所作出的以非武力方式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承诺发表一点看法。戈尔巴乔夫立即对他的话予以纠正："我只说过非暴力方式是最理想的。"

米切尔不打算做长篇大论的讲话，但他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传统的不承认政策。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苏联管辖范围的内部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对话将把事件引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政府最近的一些行为发了一阵牢骚后，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其间戈尔巴乔夫几乎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话。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我停下来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说的关于我给立陶宛人出主意的话是没有根据的。立陶宛代表不时地向我们阐明他们的政策，我告诫他们既不要指望美国的自动承认，也不要指望经济援助。所以，虽然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怂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了解情况，有人向我汇报过。" [351]

我回答说："我相信有人向你汇报过，我只想确保他们告诉你的是准确的。"

加紧钳制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的"独唱"没有使我

得到安慰，反而增添了不少忧虑。虽然他没有讲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但是他的言论表明，他1月份从立陶宛回来后对那里的局势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他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愿意作出明确的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证。这次会谈清楚地表明，他不愿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把“如果有必要拯救生命”作为使用武力的理由。但是，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可以以此为理由进行公开辩护。1月份对阿塞拜疆的镇压便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似乎仍被兰茨贝吉斯并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幻想所蒙蔽。虽然这两人彼此间的厌憎一段时间以来很明显，但在最近的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兰茨贝吉斯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事实应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话来讲——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相反，戈尔巴乔夫似乎相信兰茨贝吉斯自己的人民正试图抛弃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很可能是克格勃的假情报导致的，克格勃编造这些假情报的目的在于劝阻他与当选的立陶宛领导进行认真的谈判。

其他国家会受到立陶宛所开“先例”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是挖空心思杜撰出来的。我不时听到苏联外交部官员说“其他国家担心我们开创一个先例”之类的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表现出这种担心的证据。可能南斯拉夫除外。其他联邦国家的大使们向我保〔352〕证说，他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可能影响他们的国内问题而表示或暗示要加以反对。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属于苏联，声称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为瓦解他们自愿组成的联邦开了先例是不合逻辑的。立陶宛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与魁北克或旁遮普的地位都毫不相关。

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巩固其地位作最后的挣扎——作为一个狂热鼓吹者——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

信这种观点。在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文件中写着“许多联邦制国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到戈尔巴乔夫嘴里就变成了“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相信“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话，他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将会遇到许多的麻烦。

他显然确信所有居住在立陶宛的非立陶宛族人都反对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反映了他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在最近的选举中，大约有一半的非立陶宛人投了萨尤季斯的票，立陶宛东正教也积极活动，要求独立。戈尔巴乔夫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一现实。

虽然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遵守宪法程序的重要性，但是他忽略了宪法赋予的“权利”与自称贯彻执行这些权利但实际上限制并可能取消这些权利的法律之间固有的矛盾。从逻辑上讲，宪法赋予的权利居优先地位。他也忽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观点，即它们不存在从苏联分离出去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被非法强迫加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是个律师，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现在扮演的角色不是律师而是一个政治家，当法律细节与政治目标不相容时，他会忽略法律细节。

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以及“很少有机动余地”的言论道出了他为何坚持一面之词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得到了错误的情报；另一方面，是他故意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最主要的是，这是他对强硬派所提出的以一切必要手段结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作出的反应。

一个多月以来，莫斯科对立陶宛宣布独立所作的反应只是施加心理压力而没有采取具体的强制措施。但是，4 月 15 日这一天，〔353〕戈尔巴乔夫决定加大对立陶宛的压力。

我花了一整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和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那天晚上吃完晚餐后，米切尔、比尔·布雷德利以及其他几位贵宾被邀请到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私人别墅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这既是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迹象，也是苏联高层政治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公开的迹象。传统上，外国人只在饭店或专门招待外国人的特殊“宾馆”受到招待。他们从来不会被邀请到苏联领导人的家里做客。

普里马科夫的别墅是一幢中等大小的带凉台的平房，离市中心几英里远，掩映在树丛中，别墅舒适而不奢华。普里马科夫向我们介绍说，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任所长时，就用他自己的钱建造了这幢别墅，总花费为三万卢布。大多数苏联高层官员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别墅里，这是国家的一项补贴，而普里马科夫住在他自己的别墅显然过得更加舒适，他非常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别墅。

普里马科夫长期以来一直是外交事务方面的学术专家，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专家，他现在又要调动工作了。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联邦院主席，但是刚刚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新的总统委员会成员。从70年代起，我就认识他了。在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议上，他是苏联方面有关地区问题的主要谈判者，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充当了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很显然，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许多人认为他正在窥视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部长职位。

那天晚上，整个别墅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用苏联的话讲，是两党合作，因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在被邀请的人数不多的贵宾之列。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改革者，索布恰克经常批评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主义的改革措施，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尽管

当时还不存在正式意义上的反对派，而且他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普里马科夫的女儿成了我们的女招待，当我们看到他的家庭照片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时，想起了曾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在他妻子去世后不久，他才十几岁的独生子也夭折。普里马科夫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今他仍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心理〔354〕创伤。他给我们看了他妻子生前的照片，并对我们说，虽然他妻子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他毫无再婚的兴趣。他现在显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尽管谈到了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但是那天晚上气氛轻松愉快，并谈了许多有关美国国会和最高苏维埃可能互换信息和携手合作的事。不过，那天早些时候，普里马科夫使戈尔巴乔夫和平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的全面承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当有人要求他发表一个直截了当的决不使用武力的声明时，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没有人"希望发生动乱，因而也不打算使用武力，但最终每个国家必须"保护其重要利益"而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在他心目中，留住立陶宛显然是一种"重要利益"。不过，他并没有暗示将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迫立陶宛就范。

米切尔和布雷德利两位参议员与我一起驱车回到城里。当我们的车停靠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门口时，我注意到许多电视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我怀疑出了什么事。两位参议员下车的时候，照相机的灯光忽然打亮，记者们一起拥上来，其中一个大声问道："你们如何评价对立陶宛采取的经济制裁？"

布雷德利参议员使用了他在篮球场上曾多次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方法，急忙低头，从左侧溜进了宾馆。闪光灯一直照着米切尔和我。米切尔向我投来一个探询的眼光，我耸了耸肩，因为我对"制裁"的了解不比他多。然后，他老练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他不能对他还没听说过的声明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他真诚地希望尽快开始对话。重要的是不能用压力和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裁声明是参议员们与他们的贵宾共进晚餐时由莫斯科电台播发的。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已向兰茨贝吉斯发出威胁的信号，如果立陶宛议会不取消最近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限制公民行为、中止苏联军队在立陶宛征兵、以及企图占有莫斯科在立陶宛的财产，就会向立陶宛“停止供应”通常是卖给国外换取外汇的物资。立陶宛人被限定必须在48小时内按声明的要求去做。[8]

[355] 目前尚不非常清楚哪些“物资”被看作是“卖给国外以换取外汇的”，但是石油显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实际上，立陶宛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而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苏联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正如立陶宛领导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最大的经济弱点是他们对莫斯科石油的依赖，因此戈尔巴乔夫现在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毫不足怪。

不过，我对声明在时间挑选上的愚蠢和残忍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是在受难节向一个传统上而且目前仍基本上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而最后期限又是在复活节！人们几乎很难想象比这更愚蠢的时间了。兰茨贝吉斯毫不犹豫地要求注意这一事实，并答复说立陶宛人会照常过复活节，过完节之后才会考虑如何答复。

星期六早上，我与参议员们一同驱车到机场时，我们讨论了美国该作出何种反应。我告诉他们我难以预测政府的反应：显然总统会尽其全力阻止向立陶宛施加如此压力，但同时他也会希望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增强苏联强硬派的力量。不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只要苏联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就应中止与苏联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戈尔巴乔夫5月份去华盛顿时，显然希望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我觉得如果他仍然对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的话，我们应该拒绝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在我们试图与苏联扩大贸易的时候，它却把贸易作为攻击立陶宛的武器，对我们来说，这是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一直赞成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美苏经济联系，但是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如果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实行石油禁运，那么现在是使用贸易武器的时候了。参议员们同意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反应。不管怎样，他们认为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制裁的话，参议院会拒绝批准任何贸易协定。[10]

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莫斯科对立陶宛的惩罚性经济手段作出反应，但是我还认为避免过分的反应也很重要。那里可能会发生更糟的事情，诸如大规模逮捕或暴力镇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防止更严重的镇压行为的能力。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开始讨论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最后通牒的答复。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天，最后于星期三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11]一方面，决定对莫斯科提出的取消他们以前通过的法律的要求不予理睬，另一方面，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准备与莫斯科谈判，并宣布假如谈判能够开始的话，在5月1日前将不通过新的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法律。 〔356〕

莫斯科不顾立陶宛方面的建议，于第二天即4月19日开始限制向立陶宛提供石油和天然气。那天早上，通过输油管供给立陶宛炼油厂的原油停止了供应，天然气的供应减少了85%。虽然这些措施引起了恐慌，使许多立陶宛人抢先到汽油站购买汽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提醒了莫斯科，如果它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惩罚

立陶宛的话，同样也会给莫斯科带来困难。立陶宛炼油厂提炼的原油同时也供应其他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供应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前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以后从德国手中获得）的所有石油都要经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些地区、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自身也要靠立陶宛核电站来提供电源。如果立陶宛失去了能源供应，那么势必殃及其他地区。

然而，局部的经济制裁持续数周之后给立陶宛带来了许多困难，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苏联军队趁机加紧军事活动，增加“军事演习”的次数，并频频地在各个城市间调遣部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立陶宛议会终止了武装征兵法，但莫斯科认为这是非法的，国防部明确表示，它计划在全国加强春季征兵。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许多立陶宛士兵离开他们的部队回到了家乡，国防部对此反应激烈，表示对这些“逃兵”要严加捉拿。

莫斯科也发布了强占办公大楼的命令，这是最终会导致流血的一种做法。就在发出经济封锁的威胁之前，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强占了立陶宛共产党档案馆大楼，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分裂出去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

〔357〕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选择独立

恐吓立陶宛的种种尝试也是为了防止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闹独立，但这些努力起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所有了解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所预测得那样。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不急于马上宣布独立，但他们正以坚定的信念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兑现了爱沙尼亚人民代表向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发出的警告，3 月 30 日，它宣布苏联在爱沙尼亚的统治从其强加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并且宣告爱沙尼亚进入“重新恢复”二战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过渡期”。[12]4 月 12 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又以爱沙尼亚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为由，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终止爱沙尼亚人在苏联军队服役。

像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 3 月份的选举中赢得了该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新议会虽然有可能采取较少冲突的策略，但它跟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

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排除与任何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判”的可能性，并且拒绝与立陶宛派在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进行对话。但是，到了 4 月 19 日，即减少对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一天，他分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不是与他们谈判而是劝他们不要重蹈立陶宛的覆辙。他敦促爱沙尼亚人撤消他们的“3 月 30 日声明”，并告诉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们的加盟共和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必须遵守苏联新出台的有关脱离联盟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就自愿联邦事宜进行谈判，并愿意留在重组的联盟中，他们可以取得完全自治的特殊地位。[13]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爱沙尼亚拒绝做出让步，不到两周，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无效的，并且恢复了拉脱维亚的战前宪法。

莫斯科的施压促使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就在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以前，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海大市场的经济合作协议，并将在里加设立“波罗的海合作理事会”，协调地区投资银行、商业协会以及其他机 〔353〕

构的工作。[24]但是,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经济控制权后才有可能。1989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曾通过一项法律,同意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经济自治”,但是到 1990 年春季,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莫斯科的部长们仍然认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业设备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反对由地方政府控制这些工业设备的所有尝试。这一教训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许诺。

4 月 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脱离联盟”法,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全民公决要求有 2/3 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25]

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

到了 5 月份,莫斯科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戈尔巴乔夫继续拒绝进行任何不符合“脱离”法的谈判。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也拒绝撤消他们已经宣布的独立声明。莫斯科继续加紧对立陶宛施加压力,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施加的压力稍微轻一些,施压以不引起全面暴力冲突为标准。

〔359〕 甚至经济制裁也远非全局性的。尽管经济制裁引起了一些困

难和许多的烦恼，但是经济制裁不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虽然军队和警察的耀武扬威显示出不祥，但还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显然把加紧施压作为安抚强硬派的一种方式，强硬派坚决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某些行动迫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不过，他本人也想"给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上一堂课"，让它们知道它们的经济完全依赖苏联。不论第一个动机起了什么作用（强硬的讲话和强有力的法令有可能确实制止了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企图），第二个动机却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上的施压不足以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屈服，但其引起的痛苦却足以增强它们要求独立的决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施压会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这一假设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组织总统机构

戈尔巴乔夫在竭力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同时，着手组织总统机构。他敦促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两个顾问组织：一是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一是委任的总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和责任并不清楚。显然，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可以随意地采纳或者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不过，这两个机构提供了一种集体决策的外表。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设立联邦委员会的意图是，让各加盟共和国议会感到它们在中央政府中有发言权。该机构能否产生这一效果将取决于它能否对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决定产生影响。至于设立总统委员会，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试图用它来取代政治局。如果他把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讨论从共产党机构转移到由他本人直接控

制的总统办公室，他就可以远离共产党机构并最终忽视它的存在。

设立总统职位两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他任命的总统委〔360〕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几个主要政府部门的官员，诸如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政部长巴卡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尤里·马斯柳科夫。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两名他的亲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助理瓦列里·波尔金。总统委员会中还包括三个温和的改革派：物理学家尤里·奥西潘、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作家欣吉兹·艾特马托夫，为了保持平衡，委员会中还有三名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即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庭、乌拉尔地区的一名工人维尼亚明·亚林——保守派们认为他是潜在的"右翼莱克·瓦文萨"，以及拉脱维亚农场企业的负责人阿尔伯特·卡乌尔斯。

戈尔巴乔夫在挑选总统委员会成员时，显然对性格以及政策的协调考虑不多，更多的倒是考虑政治平衡。只有激进的改革派似乎完全没有被考虑，虽然沙塔林院士后来成为一名激进的改革者，但当时仍被看成是一名温和的改革者。我可以理解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一重要集团在总统委员会中都有其"代言人"的政治用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机构将如何协调行动。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过协调一致。

不过，戈尔巴乔夫尽力给总统委员会树立威信。总统委员会成员任命后的第二天，他与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确保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还让委员会成员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办公室，这是为苏联最高级官员保留的。到秋天的时候，根据协议草案，总统委员会取代党的政治局成为高层领导机构。在11月份正式的国庆招待会上，总统委员会的成员们接见了各国的高官显贵，

他们所站立的地方在前几年只有政治局成员才可以站在那里。

设立了总统机构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联的政体不像美国总统内阁制，而有些像法国——部长理事会与总统职位分开，而且总理通常是另一政党的人。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想把部长会议置于他更直接的控制之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羞辱总理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曾支持设立总统职位，并且拒绝成为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希望戈尔巴乔夫缩小部长会议的规模，一旦 [361] 政治上有可能时，立即把大多数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但是，最初总统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给部长会议的机构和人员带来重大的变化。

4 月份发生的许多事情显然与我所做的猜测完全相反，我曾猜想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削弱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共产党内部的激进改革者为党代会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当时党的纪律的“民主主义政纲”。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赞成这个政纲，因为它遭到了大多数共产党官员的反对，但我确实希望戈尔巴乔夫会鼓励政纲的发起人继续留在党内。没有这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党代会的辩论中改革就会缺乏有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参谋班子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在 1 月份就建议他与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达成共识。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态度，并批评了在总统职位上讨价还价的改革者，但是我认为他知道他需要他们——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为限制他的保守派同事。而且，改革派们正在进一步表明他们会在重要的地方赢得选举。3 月份“民主俄罗斯”联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均获得了胜利。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胜利——像早些时候叶利钦的胜利一样——似乎冒犯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使他进一步确信民主运动对他有益。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允许“民主主义者们”在党代会的代表选举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反而试图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共产党。1990年4月11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开始选举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是要求“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试图“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然后，它又反问是否可以让“这种人留在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之中”，虽然它不承认这样做是在搞清洗，但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号召共产党所有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组织宗派集团的人”。[16]

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点名批评过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告诉[362]我，那封信发表以后，他觉得他没必要再留在党内了。4月18日，他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17]不过，其他大多数改革者则决心继续呆在共产党内，至少到党代会召开，以便使保守派不会因改革派缺席而获胜。

但是，官方对“民主政纲”的倡议者们施压并没有促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出现了一轮公开的争吵，其本质往往是个人之间的斗嘴。尼古拉·什梅列夫在《消息报》上撰文谴责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的定量供应原则。改革派经济学家拉里萨·波亚谢娃指责说，她被“民主俄罗斯”开除代表候选人资格，是因为她批评了伊利亚·扎基拉夫斯基的某些观点。[18]总之，“民主主义者”的政纲一发表，有关它的争吵就接踵而至。

最初，“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们在联合起来支持候选人方面也是不成功的。当戈尔巴乔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而成为

总统时，人民代表大会要选举一名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支持过去是副主席的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改革派们认为卢基扬诺夫感兴趣的是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促进改革。然而，他们没能就推举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的选票也因而分散在好几个候选人身上，包括法律教授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来自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他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位置让给叶利钦，以及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经济学家根纳季·费尔申。尽管反对派四分五裂，卢基扬诺夫也只得了56.3%的微弱多数，这意味着他的对手们倘若能够团结起来，胜利也许是属于他们的。[19]

这一教训促使改革派在几个星期后俄罗斯新议会开会时团结在叶利钦的周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支持像留本琴科这样的温和派而不是卢基扬诺夫，我不知道改革派是否还会这样做。由于支持了一个以反对快速推进政治、经济变革而闻名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无意中帮助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联盟，并且增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两个机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卢基扬诺夫因其长长的马脸和粗哑的嗓音，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极糟，他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但要是遇到一个像康斯坦丁·留本琴科那样英俊、充满活力且能言善辩的人，情况就很难说了。

[363]

经济改革的标准

戈尔巴乔夫不愿或无力重组部长会议这一中央政府机关，既是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当时对春季形势所分析的那样，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前景只会非常暗淡。

真正的经济调整一拖再拖，成为一种长期的顽疾。我觉得除非能找到一种办法取消莫斯科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否则公众的士气以及对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的信任将一落千丈。

在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游期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决策权正从莫斯科向地方转移。尽管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和好处，但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步伐迈得极小，而且没有成效。这与政治体制急剧而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脱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束缚。

虽然最高苏维埃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仍旧严重不足。例如：

- 财产法没有承认真正的私有财产。
- 土地法没有结束国家和集体农庄对土地的垄断。
- 租赁法没有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提供真正的奖励。
- 有关银行、竞争和取消垄断的基本立法甚至还没有制定，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新法律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
- 新税法征收的税率太高。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资

和其他奖励，抑制增长、怂恿腐败。

• 缺少适当的法律机制来使新制度走上正轨——我发觉人们也不太清楚怎样去创建这种机制。

同时，整个国家苦于缺乏真正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人才。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对莫斯科经济控制的憎恶情绪不断上升，进而加深了种族之间的不和。戈尔巴乔夫似乎仍旧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来规划和实施他的经济改革，这等于引狼入室。 [364]

我担心正在推行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恶化了局势，因为这些零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伴随着体制上的变革而出现的，只有体制上的变革才能使这些改革措施产生效果。

例如，农产品的"征购价"刚刚上涨，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体制还没有改变，这一措施很难改善粮食供应，相反有可能增大预算赤字和导致通货膨胀。农民们会把这仅看作是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开始，因而宁愿把他们的农产品囤集起来而不卖给国家。而且，在农村地区消费品奇缺，没有必要用农产品去换取毫无价值的卢布。

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明显，对于美国使馆来说，要描述这些问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虽然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能否给他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将苏联经济成功地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是苏联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每个经济学家显然都有他或她喜欢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往往忽视了政治上能否行得通这一关键因素。1989 年，我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准"进行综合研究，但据我所知，这一研究还没有进行。在我们分析苏联经济改革成功前景时应注意些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不论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1990年，我已意识到使馆不能指望华盛顿告诉我们如何报告苏联的经济形势。要使我们报告的情况具有一致性，并使我们判断基于可靠的标准，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摸索。我要求使馆的经济和政治部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工作由对苏联非常了解的两位很能干的外交官约翰·布兰尼和雷蒙德·史密斯负责。我们定期见面进行讨论，这些会议很像在大学里举行的研究生讨论会，只有一点不同，"教授"实际上是学生。

〔365〕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以及通过我自己对日益恶化的苏联经济的观察，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可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取消中央经济部门，强迫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大多数职能移交给企业管理部门，某些服务性质的工作可由加盟共和国来完成。这些措施将在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取消垄断生产者、最终创造一个私有化框架的方向上迈出第一步。[20]在短时期里，这一激进措施将是痛苦的，并易引起混乱，但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一种竞争经济。在我看来，迅速摧毁中央集权控制——剪断中央部门与企业部门联系的脐带——会产生几个不可避免的影响：

· 企业经营者必须创造生存的市场。

· 如果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权，那么戈尔巴乔夫可以避免对将来的错误负责。

· 宣布独立的经济诱因以及种族冲突的根由将减少。

· 一旦给予了机会，一些加盟共和国会迅速地使私有财产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合法化，这些均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这样将会创造一种竞争压力而迫使其他加盟共和国起而效之。

· 权力下放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市拥有可靠的税收基础，因为如果莫斯科不试图对遍布全国的效益不佳的企业

进行补贴的话，中央政府只需要很少的财政收入。而且，阻挠改革的官僚们必须去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中找工作，这也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这些激进措施给社会带来过多的混乱，那么它们肯定会失败。目前没有人能肯定它们的具体衡量尺度，因此必须同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它们对普通公民的冲击。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是伴随经济决策权全面下放而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

1. 把加强卢布地位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方法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减少预算赤字——大部分预算赤字是由不必要的军备生产、〔366〕对效益差的企业给予补贴和为大量的官僚机构支付薪水而导致的（减少"卢布过剩"的一种办法是把国有资产出卖给私人企业家）。

2. 取消垄断并采取严格的反垄断立法。

3. 鼓励主要国家机构之外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机构的发展，例如商业和投资银行、实施商业法规的机构以及发展所需新技能的培训中心。

4. 主要的社会服务事业从国有企业向地方政府和市政府转移——这是私有化成功的前提条件。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可通过财产税和中央预算基金的再分配来解决。

5.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救济；最低固定收入指数化，例如对生活费用的补贴；通过食品印花税计划等给最穷的人以补贴。对固定的集团提供援助比目前体制下给每个人食品和住房补贴的预算开销要小得多。

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些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除非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来达到这些目标，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官僚机构不会进

行变革,除非它们被迫进行变革,官僚们不会变成企业家,如果他们仍可以四平八稳地当官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选择余地,许多人会很快适应一个不同的环境。如果一个人体质上适合游泳而拒绝学游泳,教他学游泳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丢进深水中去。

我知道,对局外人来说,不论对情况多么了解,也不论动机多好,都没法为苏联人民做这些事情。苏联人民必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愿意在苏联人民面前装腔作势,或试图"兜售"我关于改革的好主意。但是到1990年春季时,我心里终于有了一套标准来衡量各种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将在以后几个月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设立总统职位之时,他显然感到政治环境无法承受我认为必要的这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当他巩固他的总统地位并在夏季的党代会上改组共产党时,他会准备采取这些措施吗?我至少必须等到秋天才会有答案。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取消中央集权制度对经济的控制。

〔367〕

第十四章

俄罗斯做出抉择

同志们，如果你们对他（叶利钦）的话作认真的分析，你们就会发现，他在恢复俄罗斯主权的幌子下要求瓦解联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90年5月23日[1]

我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以前的提法：一切为了强大的中央。只有各加盟共和国强大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联盟才会强大，如果各加盟共和国更加强大和更加独立自主，中央和联盟才会更加强大。

鲍里斯·叶利钦　1990年5月31日[2]

1990年6月2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参加其第二次美苏首脑会议的第三天。正式的会谈在前一天已经结束，两位总统在马里兰州布什总统的戴维营休养地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

晚上，双方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两位总统所设的晚宴。

仅仅在四天以前，刚好是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来美国之前，我在戈尔巴乔夫到来之前赶往华盛顿、简要汇报情况后的第二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我没有机会试探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当选有何看法，这一定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尤其是他曾公开阻止出现这一情况。我希望晚宴搞得比较随便些，使我有机会把他拉到一边聊聊天。

晚宴正像我所希望的。宾客们混杂在中心楼随便选取白葡萄酒和桔子汁（没有烈性酒，令一些苏联官员感到失望），闲聊着戈〔368〕尔巴乔夫如何第一次玩掷蹄铁套柱游戏，以及开高尔夫机动车时他几乎撞在了树上，这时戈尔巴乔夫走了进来。

我是那晚唯一不用翻译可与戈尔巴乔夫交谈的美国人，这使我们不用担心别人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内容。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将来是否能与叶利钦共事。

“你告诉我吧，”戈尔巴乔夫耸耸肩说，“近来，你与他见面的次数比我还多。”

他的话，一半是真话，一半是恭维，这是戈尔巴乔夫惯用的一种谈话技巧，当他不想多说什么时，便用这种办法来转移话题。他的话暗示了我是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其中既有恭维，又有警告，对一个大使来说，置身于所在国的国内政治是危险的。撇开影射嘲讽不谈，我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与叶利钦见面的次数确实比他多。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不是因为我过于主动热情，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判断失误。他应该去面对叶利钦，不管他本人是多么讨厌叶利钦。不过，我决定从表面上来理解他的话而不让他回避我的问题。

"好吧，他跟我说他想与你合作，"我回答他，"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但我的看法不算数。你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完全取决于叶利钦是否愿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有些爱玩政治游戏。但是，如果他能脚踏实地，办事认真负责，我们是能在一起共事的。"戈尔巴乔夫补充说，叶利钦近来的言论给了他一些他们将来能够共事的希望。但他喜欢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声明"，结果助长了"平均主义"，为建立一系列改革需要的经济激励机制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争辩，但是我认为他最后一句话是不公平的。叶利钦对共产党特权的攻击是针对不正当的特权，而不是一概而论。戈尔巴乔夫用"平均主义"这个字眼来描述叶利钦言论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讽刺。叶利钦在 1987 年与我第一次会谈，当他谈到改革要想成功就有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时，用的正是这个词。事实上，他并不反对经济激励机制，但显然，有人让戈尔巴乔夫确信他反对经济激励机制。叶利钦之所以越来越喜欢在讲话中宣传平民主义，据我看，是因为他必须为自己赢得选票以重返〔369〕政治舞台，而不是他对改革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尽更大的努力把叶利钦保留在他的领导班子里，并且推行更激进的改革进程，叶利钦就失去了他正利用的某些问题而大做文章的机会。

俄罗斯选举

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劲并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3 月份，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使得该机构发生了严

重分裂，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其中成为少数派。

不过，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民主改革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赢得了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些当选者许多人已经脱离共产党而打着别的旗号，也有一些压根儿就不是共产党员。70年代，一些非常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曾作为政治犯长期在监狱呆过，也在这次选举中当选。生物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朋友，他因编辑地下刊物《当前大事记》而于1974年逮捕，该刊物多年来是了解勃列日涅夫政权滥用人权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当选为莫斯科一个区的代表。格列勃·亚库宁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名传教士，他曾因为宗教自由辩护而受到监禁，当选为莫斯科一个郊区的代表。德米特里·沃尔科高诺夫上将，曾写过批评斯大林的传记，因为他支持民主改革而被迫从苏联军队退出现役，他当选为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乌拉尔山以东一个叫奥伦堡州的代表。《论据与事实》的编辑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当选为莫斯科我所居住的那个区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当初曾试图撤换他。

在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选举情况大不相同。“民主派”与“民主俄罗斯”运动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没有一个范围广泛的全国性组织，甚至在许多选区没有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在那些地区，当地共产党组织因为其他组织缺席而在选举中占优势，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被选进了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垄断权，但是它在国家的许多地区仍旧掌握着权力杠杆。

直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5月份召开之前，我像其他的观[370]察家一样，无法推断各种政治倾向间的力量对比。政党、集团和

联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一个星期前的联盟在下一个星期就土崩瓦解了。许多新当选的代表在政治上是难以预测的人物，我们无法预测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足以使我们感觉到，改革派当选的前景将比去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要好一些。“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虽是一个少数派，但却是一个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少数派。共产党对大会的控制要达到其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程度显然是有困难的。

恰好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那一天，我邀请两名新当选的代表共进午餐：一位是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沃尔科夫，他是莫斯科地区的代表，曾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另一位叫瓦列里·基塞瓦尼，他是来自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前采煤工人。两人都是“民主俄罗斯”联盟的成员，但是他们关于经济改革的观点有分歧：沃尔科夫认为改革会带来痛苦的调整和改组，而基塞瓦尼坚决反对可能会增加失业和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任何改革措施。不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趋向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相信“民主俄罗斯”最多能获得40%的选票。要想使“民主俄罗斯”占上风，它还必须从共产党的自由派别中吸引相当多的代表过来。

我问他们，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回答说，叶利钦当选是有可能的，但远未肯定。不过，共产党候选人亚历山大·弗拉索夫比叶利钦当选的可能性还小，因为人们觉得他过于被动而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毫无生气的演讲增强了他给人们留下的过于软弱的印象。虽然民主派从他们早些时候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将给叶利钦以坚定的支持，但是这两位代表认为，只有当叶利钦能够获得共产党代表10—20%的选票时，他才会获

胜。否则，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可能被候选人中的黑马获得，诸如苏联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举行，它证实了这些预测的第一点。尽管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强有力支持，但弗拉索夫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能当选。第一轮竞选共有七人。叶利钦得到的选票超过了弗拉索夫，但也不足半数。弗拉索夫和其〔371〕他三名候选人的名字在第二轮选举中被抹掉。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强硬派共产党头头伊万·波洛兹科夫，他已经公开宣称反对改革。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又得票最多，但仍缺少28票。与此同时，强硬派通过支持波洛兹科夫而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所得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一样多。

当我离开莫斯科去华盛顿参加美苏首脑会议时，我觉得叶利钦所得的选票可能已经达到最高记录了，这也许给新的候选人诸如巴卡金留下了空缺。但是，波洛兹科夫退出第三轮竞选后，弗拉索夫又想杀回来。对波洛兹科夫强硬路线的忧虑和确信弗拉索夫不能胜任这一职务，使大量的中间派选票转向叶利钦。叶利钦得以侥幸获胜：在1000多张选票中，他仅以4票的优势而当选。

这是一次非凡的但又是微弱的胜利。那些投他票的代表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集团，叶利钦立即宣称他与任何政党或派别都没有关系，而是代表整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他拒绝作任何努力来控制正在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拒绝组建他自己的政党。当时这一决定显然在策略上是非常精明的，但这一点最终损害了叶利钦有效地处理他与他的立法机构关系的能力。

他需要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2/3的选票同意他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和进行直接总统选举，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十分令人怀

疑。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开始谈论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叶利钦可能在直接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多数，从而使戈尔巴乔夫难堪，因为在苏联设立总统职位时，戈尔巴乔夫曾避免这样做。但是在1990年夏秋之交，叶利钦想推行总统制却得不到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不过，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他已直接同戈尔巴乔夫对抗并且获得了胜利。当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开始下降时，他的威望正在上升。

具有独立主权的俄罗斯

〔372〕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大约两星期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票表决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当然并不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早已率先这样做了——但是俄罗斯宣布主权独立在政治上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俄罗斯的行动引起其他加盟共和国争先恐后地仿效，到年底以前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通过了“主权独立”声明。

早些时候，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议会通过的声明显然是朝着脱离苏联的目标迈出了一步。但就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其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主权声明是多余之举，苏联宪法中已经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主权”，宪法这样写道：“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具有独立主权

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3]

随着苏联统治的逐步发展，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就像脱离权一样变得有名无实，通过主权声明或主权的恢复，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确认它们有权根据它们自己的条件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条件来重新谈判“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答应建立一个以自愿为基础的“真正联邦”，但到1990年夏，事情已十分清楚，他所设想的谈判是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谈判，而中央政府对权力分配有最后的决定权。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觉得戈尔巴乔夫出尔反尔：他们开始支持叶利钦的观点，即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应该自己决定它们所希望的联盟形式，然后再把它们的意愿强加给中央政府。

对于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戈尔巴乔夫无法反对。他在1990年5月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他对他们提出的主权问题表示赞赏，并宣称他全力支持“你们要求增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努力”。[4]然后，他提出了他认为应采取的增强主权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增加经选举产生的各个层次的议会（苏维埃）的权力；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经济资源使用权；提高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水平。戈尔巴乔夫的这〔373〕些建议中没有一条能够增强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会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是他认为他的主权概念与叶利钦的主权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他觉得叶利钦是要让各加盟共和国放弃社会主义，甚至摆脱苏联的领导，并指出叶利钦已提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简化为“俄罗斯共和国”，把“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两个词省略。[5]他断言，这种对主权的解释只能导致

联盟的瓦解。

这些言论作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言词，无疑是针对叶利钦的建议的，但它似乎并不是很有预见性。放弃“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政府形式并不会自动导致苏联的瓦解。就在这一年之内，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建议把苏联改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放弃了仅在一年前他还为之辩护的两个基本目标。同时，他维护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成为他建立一个自愿联盟的障碍，而他一直宣称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愿基础上的联盟。

不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在两方面对随后的局势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这两方面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方面，也是较为深刻的方面，即暗示了俄罗斯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加以界定；第二方面与当时的政治更直接相关，即对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地位产生影响。

纵观苏联的历史，俄罗斯在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尤其作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式的联邦，但它本身的机构非常软弱无力。在大多数方面，它直接由苏联各部部长管理。像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共产党”没有正式分离出来。苏联科学院掌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学研究，而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苏联文化部控制着俄罗斯主要的影院、歌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并不控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这类设施。在理论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实际上其大多数机构与苏联的机构合并在一起。

这使公众对“俄罗斯”的自身特性产生了混乱的概念。尽管〔374〕名字不同，但它实质上能等同于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吗？或是它的范围更小一些，仅限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

义共和国的边界以内？苏联在法理上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实践中常常指的是另一回事。对那些赞许第一种解释的人来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观念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俄罗斯的一部分脱离俄罗斯怎么仍旧还是俄罗斯呢？不过，对那些赞成第二种解释的人来说，如果俄罗斯有必要摆脱共产党中央集权的控制，或有必要解除支持苏联其他欠发达加盟共和国的义务的话，脱离将是一个理智的办法。

当俄罗斯发表它的"主权宣言"时，它含蓄地承认了俄罗斯国家与整个苏联相比只是一个更有限的实体。[8]从逻辑上讲，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主权声明，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也要求同样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不是俄罗斯固有的组成部分。从政治上讲，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想以同等的地位谈判新联盟条约的话，俄罗斯人的行动便要求它们也声明自己的主权。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以及他赞成通过主权声明，使他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相对不重要的立法委员会主席，不再仅仅是仍很弱小且未形成组织的反对派假定领袖，而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以前，他的目标旨在迫使戈尔巴乔夫让他重返苏联的领导班子并对他的建议给予注意。现在，他拥有独立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基础。如果他能控制已与他发生分裂的立法机关并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达成共识，他可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让出许多权力，如果不能成功地控制立法机关，他可以对联盟本身表示非议。他们之间的政治游戏与从前相比更带有"零和"特征——尽管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以来似乎就持这样的看法。

在 1990 年，通过破坏联盟来攻击戈尔巴乔夫的可能性仍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叶利钦再三——我认为他是认真地——指

出，俄罗斯不应强迫联盟解体。支持叶利钦的大多数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叶利钦竞选的胜利和俄罗斯的主权声明可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压力，迫使他下放经济决策权，并与叶利钦携手进行经济改革。

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以及刚当选〔375〕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民主俄罗斯”成员中的改革者们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促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似乎已转向反对党内的改革派，他对那些批评他设立总统职位的人发起了怀有偏见性的个人攻击，并支持中央委员会发布要求他们脱离共产党的通知，这使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有必要进行政治和解。

事实上，莫斯科的社会话题像华盛顿长期以来一样，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4 月份，我参加了维多克与奥克萨娜婚礼的庆祝晚宴。维多克是跨地区代表小组成员，当选为莫斯科我们大使馆所在地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我们的国会议员”。叶利钦是那天婚礼上最得意的人，并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他邀请所有在场的女士们跳舞，并频频向新婚夫妇祝酒。

不过，在频频的祝酒中间，话题一律是非常严肃的。奥克萨娜的客人是来自她所在单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馆员，而维多克的客人们则都是政治家。尽管事实上“民主俄罗斯”在 3 月份的选举中成为仅次于共产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但是潜在基调是不祥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斗如果不能制止就会导致混乱和内战。参加婚礼的客人们一个又一个跟我谈到有必要找到一种办法促使他们两人合作。

晚宴的主持人根里赫·伊吉济扬是一名苏联人代会代表，负责埃里温现代艺术博物馆，他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在嘈杂的音乐声中，他对着我的耳边大声喊道，“我们必须拯救戈尔巴乔夫和拯救立陶宛”，“那些强迫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一有机会就会把戈尔巴乔夫撵下台的。只有与叶利钦联合才能拯救他和立陶宛”。正如伊吉济扬和晚宴上的其他政治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的悲剧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76〕

俄罗斯共产党

当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倾向正在加强时，俄罗斯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要求也在增强。1922 年苏联建立，共产党的名称从“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成了“苏联共产党”，从那以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一直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好像是要故意混淆两种“俄罗斯”含义间的区别，共产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类似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

早在几年前，我常常问俄罗斯的官员们，他们是否认为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员中的普通成员常常说，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的现有体制实际上是歧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高级官员站在现时的立场上，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例如，1989 年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向俄罗斯总理亚历山大·弗拉索夫提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在谈到他自己的观点时，他比其前任们更加坦率，但是这一

次他赞成官方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是不受欢迎的。他解释说，目前的情况是：一有问题他可以直接把它提交给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但是，如果建立了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他必须先通过它，然后再提交给政治局。他说，仅仅是增加了一个决策过程的官僚层，却减弱了俄罗斯政府的影响力。

1990年春季时，戈尔巴乔夫也反对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机构向中央提出挑战和非共产党政党开始在俄罗斯内纷纷建立时，共产党内部赞成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的人急剧增加。当时任苏联共产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该机构是苏联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民意调查的机构)的伊万·安东诺维奇后来告诉我，到1990年春季，俄罗斯65%以上的共产党员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7]5月下旬，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终于同意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6月份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党官员们开始疯狂地做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准备。〔377〕

要么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要么是因为专注于其他事情（在此期间他花了近一个星期访问美国），要么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诸如他在5月份向中央委员会致函严厉指责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发展进程失去了控制。6月份，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集会，这次会议成为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当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明显占少数。[8]实际上，似乎是最顽固保守的地方党组织领袖之一、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该地区邻近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伊万·波洛兹科夫将可能出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任书记。他是众所周知的对改革抨击最厉害的人。

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可为时已晚。伊万·安东诺维奇详细讲述了这一过程，那天午夜过后他在家里接到一

个电话，电话里说戈尔巴乔夫想立即见他，来接他的车正行驶在路上。他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大约是凌晨2点，戈尔巴乔夫非常憔悴，显然几天没有睡觉了。安东诺维奇回忆说："他的脸色非常阴沉。""戈尔巴乔夫非常疲惫时，他的脸上就黯然失色。"

戈尔巴乔夫告诉安东诺维奇，他作为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一名成员，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波洛兹科夫当选。安东诺维奇同意尽力阻止波洛兹科夫当选，但是他发现支持波洛兹科夫的势头非常之大，此时离投票只有几个小时，已不可能阻止了。[9]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任书记。这样一来，尽管安东诺维奇当选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但是新的共产党组织——迄今为止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单位——仍处于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的控制之下。

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阻挠波洛兹科夫当选所进行的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但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是，新的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不会支持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改革，而且很可能会阻挠改革。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所不欢迎的，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剥夺共产党官员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的话，他的候选人的失败则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权力基础的欲望现在更加强烈了。

〔378〕但是，改革派被激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仿效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纷纷宣布脱离共产党。

鲍里斯·叶利钦却并不在乎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在他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几个星期后，他和奈娜接受了邀请参加我们在斯帕索住所举办的晚宴，我问他俄罗斯共产党反改革的领

导人是否对他是个问题。"根本不会是个问题，"他天真地咧着嘴笑着回答，"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打算掌管俄罗斯政府。"

我问他是否打算留在共产党内。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他打算参加只有几天就要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共产党改革其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

奈娜然后讲了一句："当你毕生和一个组织密切相联时，马上就脱离它并不那么容易。"

几个星期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情冲动地大踏步离开了共产党代表大会，他脱离共产党这一组织看起来很容易。

波罗的海地区的僵局

在对立陶宛施加了不公正的经济制裁后，戈尔巴乔夫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经济和军事压力不仅没有动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立决心，反而增强了它们的反抗意识。苏联军队、克格勃与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正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果断的行动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他不能冒使用武力的风险。他决定在5月底出访美国，并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苏联经济比以前更加脆弱，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正在谈论国家的危机。他迫切需要西方的大量援助来减缓经济的衰退。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将会使得到西方大量援助的希望成为泡影。

5月份，当国务卿贝克为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做准备而访问莫斯科时，立陶宛是会谈的主要话题。贝克继续施压，要求苏联

与立陶宛两党之间进行真正的谈判，并决定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将与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会谈。

当初，在私下讨论时，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我们要戈尔巴乔夫同意就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独立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希望。〔379〕实际上，他一反常态，教训了贝克一通。当贝克指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法律地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要区别对待时，谢瓦尔德纳泽反对说，高加索地区的人民完全像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一样强烈感到他们是被迫并入苏联的，中亚的许多加盟共和国也这样认为。他还指出他虽不喜欢以此作为“内政”问题而回避讨论，但美国应该理解苏联是个大国，有它的尊严。他和戈尔巴乔夫愿意尽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苏联的统一对他们更为重要。如果他们允许任何共和国脱离联盟，内战将随之而发。

他进一步指出，戈尔巴乔夫因这一问题而受到了强烈批评，有些人还提到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是比他更为有效的领导。如果这种情绪占了上风，过去五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付诸东流。

他讲的许多话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公开地告诫我们，如果被迫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和维护苏联领土完整之间选择，戈尔巴乔夫将会选择后者。谢瓦尔德纳泽的讲话和普里马科夫 4 月份所作的讲话如出一辙。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装出愿意和解的样子。他刚和立陶宛总理会谈过。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在去美国进行他的第二次华盛顿美苏首脑会晤之前，他将准备结束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他没有答应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他说，如果立陶宛人“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他立即成立一个对话委员会并结束他所施加的经济制裁。贝克知道立陶宛人可能觉得不去实行他们的独立声明要比取消他们的独立声明本身更容易接受些，因此就问戈

尔巴乔夫，如果满足了这一要求，他该怎么办，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直接回答。

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贝克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普隆斯基涅女士会谈。陪同她一起来的还有兰茨贝吉斯的两位副手：勃罗纽斯·库兹米卡斯和谢斯洛瓦斯·斯坦凯维休斯，以及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艾吉迪尤斯·比斯卡多斯卡斯。直到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普隆斯基涅和兰茨贝吉斯之间关系紧张，但是她所带领的代表团的构成表明，兰茨贝吉斯是派他的两名副手来监视她。她应该带她自己的副手或助手更合乎常规。几个月后，当她被迫辞职时，我已有所准备，因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380〕

与兰茨贝吉斯相比，普隆斯基涅也同样献身于立陶宛的独立事业，但她更是一个谈判的高手。她避免只是重复口号和装腔作势——这是兰茨贝吉斯的习惯——她知道如何去聆听其他人的建议和看法，并知道如何机智地对这些建议和看法做出答复。那天，她主要担心的是取消立陶宛独立声明的行动是否表明立陶宛自愿承认接受苏联的管辖。贝克向她保证说，在这一点上不论立陶宛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将坚决坚持其不承认政策。尽管他没有给立陶宛人提任何建议，但是他话中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立陶宛取消其独立声明，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

普隆斯基涅与贝克进行会谈之后，我送她到大门口，我问她何时返回维尔纽斯。她回答说将乘立陶宛政府的飞机立即返回。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莫斯科一方面拒绝接受立陶宛的独立声明并对立陶宛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同时又允许立陶宛在许多方面从事独立活动。立陶宛"政府的飞机"无疑是指苏联在立陶宛发表独立声明之前就已分配给它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立陶

宛领导人现在可以用它自由地往返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这再一次证明，戈尔巴乔夫尽管口头上敌视立陶宛，但并没有打算完全击败这些选举产生的立陶宛领导人，以保留某种谈判的可能性。

美苏首脑会议期间，对立陶宛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新的解决办法，但是戈尔巴乔夫希望签署一个贸易协定，为美国反对使用武力提供了某种制衡力量。我早些时候就已建议当莫斯科 4 月份实行经济制裁时，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应该停止，但是现在谈判继续进行，条件是直到停止对立陶宛的制裁，贸易协定方可生效。

〔381〕但是，这不是唯一与贸易协定有关的问题。我们曾再三地告诫苏联领导人，直到苏联政府通过一项法律保证移民自由，美国总统才会签署一项贸易协定。立法草案几个月之前就已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但戈尔巴乔夫出访华盛顿时还没有通过。

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布什与他的顾问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他显然倾向于直到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可接受的移民法以及戈尔巴乔夫取消对立陶宛的制裁，他才同意签署贸易协定。第二天，当美苏首脑会谈开始时，国务卿贝克告诉谢瓦尔德纳泽，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布什总统可能不会签署贸易协定。谢瓦尔德纳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恼火，并指出协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如果布什拒绝在上面签字，双方的冲突情绪会重新出现。他强调与立陶宛人的对话已经开始，移民实际上已不受任何限制。

此后有关问题的谈判由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私下里进行，当双方高级官员 6 月 1 日聚集在白宫东厅参加签署首脑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定时，谈判仍未结束。裁减化学武器协定已准备就绪，等待签字了，但对于贸易协定，布什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

戈尔巴乔夫最后说服布什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是他不得不接受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已经公开宣布，即最高苏维埃通过移民法案后布什才把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第二个条件仍然是秘密不公开的，即贸易协定得到国会批准之前戈尔巴乔夫必须解除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

戈尔巴乔夫参加美苏首脑会议后回到莫斯科不久，对立陶宛的施压开始停止。6月12日，兰茨贝吉斯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第二天与雷日科夫进行会谈，并得到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许诺。兰茨贝吉斯回到维尔纽斯以后，普隆斯基涅向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建议，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独立声明处于"暂停"阶段。然而，这一建议虽然得到了总理和议会主席的支持，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却引起了比〔382〕预想严重得多的争论，直到6月30日才得以通过。

这一决定带来了制裁的正式终结，并改善了维尔纽斯与莫斯科之间对话的气氛。但僵局仍未打破。莫斯科方面继续坚持谈判要么根据脱离法进行，要么在新的联盟条约的背景下进行，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则坚持独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唯一可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独立。

德国——欧洲——统一

到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抛弃了德国的统一是将来的事情的幻想。两人都曾希望等到他们的继任者来处理这一问题，可现在他们被迫应付这一现实问题。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已难以阻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倒向西方这一政治浪潮时，他们便希望能为这一进程规划出一个结果。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内的共产

党保守派与苏联军方领导人一起，企图阻止德国统一，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东德。长期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诸如前苏联大使瓦连金·法林，现在是共产党国际部主任，意识到要阻止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应该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并发誓保持中立。

苏联领导人对如何实现统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同意东西德政府通过渐进的谈判过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话，在几年之内仍可保持分裂和各自的主权。这就允许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东德较长的时间，也许这一不确定时期将为苏联在外交上影响德国统一的条件提供机会。如果两德基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讲话、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实现统一的话，苏联就会失去这些优势。按照这种方式，东德单独遵循联邦德国的宪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完全消失了，它的宪法成分吸收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中，而后者的宪法结构没任何的改变。

〔383〕苏联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汉斯·莫德罗于3月5—6日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对新闻记者说，统一后的德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北约都是“绝对不允许的”。[10]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闻发言人宣称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德国统一不能根据西德宪法第23条来实现，柏林的一家报纸引用谢瓦尔德纳泽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1]但是，一些苏联官员很快做出暗示，苏联的态度不可能像官方声明所说的那样强硬。他们都知道苏联很想与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他们期望不要被看作是德国民族意愿的敌人。

4月份，接替普里马科夫担任享有盛誉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弗拉德伦·马季诺夫在我的斯帕索住处共进晚餐时对我说，“某些西方国家”（指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统一前景问题

上的态度比苏联更加暧昧，但是在它们看来，苏联是强烈阻挠德国迅速统一的国家。马季诺夫说："它们不得不感到惊奇，我们不打算承担阻挠德国要求统一的自然愿望的责任。"

1990 年初，驻莫斯科的大多数西方外交官，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戈尔巴乔夫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立即消亡、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以足够的权威使改革继续下去以保证他政治上的存在不抱太多的希望。未来的北约将统一后的德国包括在内不会损害苏联的利益。实际上，从苏联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鼓励德国留在北约。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反对将来某些德国政府决定拥有核武器——对苏联领导人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噩梦——提供了保证。戈尔巴乔夫知道，美国在欧洲、特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存在，也是苏联的利益之所在，北约是这一点上唯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12]他希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少一些，但并不想让他们全部撤离欧洲。

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明白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对苏联安全不会有威胁，而在于他难以向自己的人民解释这一点。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北约扩大到包括所有的德国，苏联军队放弃了这一地区，苏联其他的"盟国"或保持中立，或成为潜在的敌人，公众仿佛觉得苏联打了一场败仗。〔384〕

国务卿贝克认识到 1990 年初各方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主动带头创造一个谈判的框架，在减少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同时，允许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实现它们的目标。

贝克在 1 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了一个谈判方案，他把该方案称为"2＋4"方案。也就是说，两个德国谈判统一的内部安排，然后加上二战后对德国具有占领权的四个大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谈判有关统一的"外部方面"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面带微笑首先问道："来一个'4＋2'怎么样？"贝

克回答说，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的顺序在数学上可能无关紧要，但在政治上就不一样了。外部大国不可留下是它们在安排德国统一的印象。东西德首先必须相互之间协调，只有那时其他四个国家才参与谈判。经过进一步的讨论，戈尔巴乔夫点头后，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了这一方案。

3月份，西德总理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所获选票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的两倍以上，这时，已经很迅速的德国统一步伐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东德基民盟领袖罗塔尔·德梅齐埃担任东德的总理后，与科尔总理密切配合，按照科尔的建议推进德国的统一进程。在3月初莫德罗访问莫斯科的两个星期之内，形势已逐渐明朗，德国统一将通过东德并入西德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两个主权国家的逐渐联合来实现。莫斯科操纵软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苏联的利益与波恩进行谈判的企图证明是一种幻想。这也加剧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面临的政治问题。消除东德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举刚好发生在立陶宛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即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几天之后。

在科尔总理的积极合作以及征得其他北约盟国同意的情况下，〔385〕贝克提出了改革北约机构和原则的一揽子计划，并就此于5月份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磋商。他解释说，将会出现一个新北约和一个新德国。戈尔巴乔夫竭力寻找一种方法使国内政治免受因德国问题而引起的爆炸性争议的影响，他尽力使北约看起来对苏联公众的威胁小一些。谢瓦尔德纳泽对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并对北约于欧洲安全的贡献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他还邀请北约秘书长曼夫里德·韦尔纳访问莫斯科。

但是，事态的发展是如此迅速，甚至外交上的急速调整都很难

跟上形势的发展。5 月 18 日与贝克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因为它意味着力量平衡的“根本改变”，并且看起来像是苏联的失败。当贝克列举了美国、德国以及它们的盟国试图考虑苏联利益的种种办法时，戈尔巴乔夫坚持说，围绕德国中立，欧洲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安全结构。虽然他没有确切详细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但他显然是认为西方也应采取与华沙条约组织解体相应的行动。当贝克指出北约绝对不会通过解散其自身来维持某种力量平衡时，戈尔巴乔夫说，他本人可能被迫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虽然他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的贝克保证他完全是认真的，他却没有对苏联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最后，戈尔巴乔夫承认贝克提出了一些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并表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从而结束了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我们强调的是政治因素，而他们对德国人谈论的是金钱。当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霍斯特·泰尔奇克于 5 月份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秘密会晤时，雷日科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详细地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强调需要大量的贷款。愤世嫉俗的人会蔑视这种敲诈勒索行为，但现实主义者不应感到惊奇，要使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就必须让他得到某些看得见的利益来平衡他付出的政治代价。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就迅速采取行动，全身心处理德国问题。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北约秘书长韦尔纳于 7 月份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我和各国大使们 〔386〕在用来迎接国家元首站台上等候着向他致意，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一排排北约的旗帜迎风飘扬。近五年前，苏联猛烈的宣传运动还把北约诬蔑成一个罪恶的、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侵略性联盟。而现在北约秘书长正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该联盟还

被描绘成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终，德国做出了让步，满足了戈尔巴乔夫对签署协议提出的条件。当作为整体的美国和北约协力合作重新确定北约的使命时——这些决定在7月5—6日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正式成文——只有德国人能够提出限制他们的军队数量和提供各种类型的财政援助，以减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困境。6月15日，科尔总理去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最初会谈在靠近戈尔巴乔夫家乡的基斯洛沃茨克举行，然后又转移到莫斯科，最终达成了协议。德国军队限制在37万人以内；德国支付120亿马克（约80亿美元）以加快苏联军队撤离德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提供其他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这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东德选举中获得胜利之后的四个月内，德国统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几周之内进行了最后文件的谈判和签署：8月31日签署"德国统一条约"；9月12日签署"2+4"条约；9月13日签署"苏德友好条约"；10月1日达成了结束四大国对德国和柏林占领权的协议。

迟至1989年夏，德国统一似乎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在1990年中欧的树叶枯黄落地之前却已成为现实。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许多西方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奇和不相信之后，开始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无疑，人为造成的东德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命中注定会走上逐渐崩溃的道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合法性：它显然是外部大国强加的一种组织结构。不过，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和结束欧洲大陆人为分裂的时机、做法和形式并不是必然的。我相信历史〔387〕会把1990年3—6月间进行的谈判作为一种外交模式，也会把谈

判结果看作是政治家们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因地位太软弱而无力反对呢?”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他的国家正在四分五裂，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此脆弱，这使他几乎无法与西方的要求对抗。西方国家必须做的唯一事情是决定他们想要做什么，其余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在国外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谈判中仍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从而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不能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在东德重新强加一个傀儡政权，但他也无需为统一唱赞歌。他在东德有 37 万军队，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都不能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统一后的德国要想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同意这种统一的安排，同意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在德国和北约盟国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取消其对德国领土的所有特权要求，并承认德国有权自由选择其盟友。戈尔巴乔夫本来完全可以拒绝参与这种统一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或是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或是统一，但不会同时得到二者——至少当时不会。总有一天，要求接受中立的舆论压力将会增长。

在西方领导人中，对德国统一谈判的成功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科尔看准了时机，并知道当具备了有利于达成协议的条件时就应该抓住。贝克发起了外交努力，他认识到应该允许德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统一的内部安排，并抵制脱离北约的压力，同时他也认识到要使戈尔巴乔夫在条约上签字，还必须给他一些好处作政治“掩护”。

戈尔巴乔夫当时受到了指责，自苏联解体以来也一直受到攻击，说他在德国统一问题谈判期间没有充分地维护苏联（和俄罗斯）〔388〕的利益。这种指责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许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又震撼了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时。但是，这些指责是错误的。德国统一的解决办法显然考虑到了当时苏联——即今天的俄罗斯——的利益。一个统一的德国几乎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条约只允许它保留不多的军队，其中的大部分处在北约的指挥之下。一个友好、繁荣的德国是苏联或俄罗斯有益的贸易伙伴和潜在的投资者。要明白这些好处，就要求用"新思维"来取代二战时的态度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并承认当一国不再试图用武力征服邻邦时，邻邦将会更友好和更有用。

当戈尔巴乔夫签署协议时，他是绝对忠于他的国家利益的。他抛弃了过去的成见，认识到国家真正利益之所在，抵制了国内要求走一条不同道路的政治压力，他的这些功绩应该载入史册。他面对的这些压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 7 月初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十分明显。直到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才与科尔签署协议并不是偶然的。

被排斥的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没有确立对新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权的控制，因而增加了几天以后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风险。虽然这次党代会打上了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烙印，但是党代会在选举高层官员时还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不过，选举的结果表明，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被改革派控制。

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由中间派组成。政治局以前的“左派”和“右派”的忠实成员大多已退出或被迫辞职：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都退出了政治局，一些不大被公众所熟知的人物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保住了他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有近1/4 的代表投票反对他），[13]他提名弗拉米基尔·伊瓦什科担任新设立的副总书记的职务，结果也获得通过。伊瓦什科在此之前曾接替弗拉米基尔·谢尔比基茨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书记。

利加乔夫并不是悄悄地离开他的领导岗位的。他不仅强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而且反对由伊瓦什科担任共产党副总书记的职务。虽然他的这些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也得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代表的支持。〔389〕

党代会上的许多言论清楚地表明，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不再是纯粹的政治资本。事实上，外交政策已成为公众争议越来越大的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丢失了东欧，指责他们允许德国重新统一而丧失了二战的胜利果实。但许多人仍旧避开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而把他们的矛头集中指向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以他外交生涯中最动人、最感人的演讲来答复他的批评者。关于丢失东欧的问题，他说：

> 同志们……当我们1956 年用武力入侵匈牙利时，当我们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当我们入侵阿富汗时，当我们在改革年代前与中国发生纠纷时，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波兰的危机不是伴随改革而开始的，而是在改革开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谈到德国，他否认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给波恩的任何“交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将自己来决定其命运，这就是事实的全部。”他解释说。[13]

戈尔巴乔夫为其外交政策辩护时不是很积极，但这只是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谨慎，并不说明他将会改变其外交政策。

当我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结果后，我的感情非常复杂。党代会上的争论已经表明，在共产党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但这并没有阻止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达到他的目的。选举领导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这是一种创新，是自斯大林掌权以来第一次实行真正选举的党代会。

然而，新政治局中没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样重要的改革派人物。与前一届政治局相比，唯一的好处是它缺乏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在需要时可以更轻易地对它置之不理。这确实是他秘而不宣的目标。在党代会上，他的反对者对他指责最多的一点，就是他在做出决策前不同政治局商量。不[390]过，尽管党代会上许多人强烈批评他的对德政策，但是党代会结束后刚过几天，他就与科尔总理达成协议。新的政治局并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

总之，党代会的结局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猜测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赢得对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的响亮赞同，但是他得以保住共产党领导的职务，并实际上降低了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权力。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适合与改革派结成联盟，将来如果共产党机器反对他，他便可以将其抛弃。

在1990年7月的时候，至少在我看来情况是这样。

独 立 热 潮

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6月份宣布拥有主权的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达维亚；[15]7月份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8月份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到10月底，所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要么宣布拥有主权，要么宣布完全独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仍试图与戈尔巴乔夫联合组成一个联邦，它们是最后宣布主权独立的两个加盟共和国。

1990年的春夏，我到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以及俄罗斯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如乌德穆尔特和布里雅特作了一趟旅行。与一年前相比，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基什尼奥夫以前是个静谧的省城，而我们5月初到达那里时却热闹异常。摩尔达维亚议会几个月前通过了一项语言法，规定其语言恢复使用拉丁字母。这种语言已正式被称做摩尔达维亚语，但与罗马尼亚语非常接近，就像美国所用的语言与英语一样接近。该法律还要求社会公共部门（诸如邮局、储蓄所、医院等）服务人员在五年之内学会使用摩尔达维亚语。与此同时，传统的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取代了苏联的红旗。

摩尔达维亚人因胜利而喜气洋洋，并且已计划好周末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普鲁特河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活动。那天，摩尔达维亚人与跨过边界的罗马尼亚人欢聚在一起，互送鲜花。甚至连当地的共产党也同意举行示威游 〔391〕

行——去年夏天反对“波罗的海之路”的举措徒劳无益，他们可能从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共产党第一书记卢钦斯基告诉我说，他打算以个人身分参加这次示威游行。

但是，该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深切感受到当地民族主义浪潮的威胁。一天晚上，我和丽贝卡在当地一家餐馆的包间用晚餐时，我们亲眼目睹了双方之间激烈的争论。人民阵线的两位领导人伊翁·纳迪尔萨和伊翁·温古雷安努也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来了以后就提出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席，因为他们要接受一个电视采访。德涅斯特河东岸的两个城市捷尔诺波尔和宾杰里的地方委员会拒绝悬挂新的摩尔达维亚国旗。这两个城市的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这一行动是为了抗议摩尔达维亚人日益增长的武断行为。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当天进行了投票表决，宣布这两个城市地方委员会的行动违宪。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两位客人当天晚上被邀请对电视观众解释这一立场。进餐时，我问，他们觉得德涅斯特河东岸的挑战的严重程度如何，他们回答说，由于这两个城市企图从共和国分裂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后，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摩尔达维亚遭受俄罗斯移民歧视的情况，并辩解说，新的语言法基本上是公正的。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俄罗斯人将被给予时间学习摩尔达维亚语，并达到在公共事业部门用摩尔达维亚语从事工作的程度，如果他们不学摩尔达维亚语，将被解雇。在议会用摩尔达维亚语或用俄语均可，所有的议会演讲都将进行同声传译。

与基什尼奥夫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两人也向我提出了同一问题：我是否认为摩尔达维亚是苏联合法的一部分。他们知道，我们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并入苏联。既然摩尔达维亚也是纳粹—苏联秘密条约的牺牲品，摩尔达维亚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和

罗的海沿岸诸国同样合法的对待。

波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我不得不解释，他们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现今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大部分领土属于罗马尼亚，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样是独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将这些领〔392〕土正式割让给苏联。尽管这样做是被迫的——罗马尼亚是战败的德国的盟国，而且该地区处于苏联的实际占领之下——但领土割让已经写进了对罗马尼亚的和约之中，而且美国也是签约的当事一方。所以，我们没有根据对摩尔达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这种地位提出挑战。

"太糟了。"纳迪尔萨说。过了一会儿，他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争取独立。然后，我们才能考虑是回归罗马尼亚、保持独立还是与苏联谈判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摩尔达维亚高级官员提出把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目标。当时，纳迪尔萨不仅是摩尔达维亚人民阵线的领袖，而且是摩尔达维亚议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温古雷安努曾担任过舞台设计和电影制片人，当时是摩尔达维亚的文化部长。

当我们与邀请的摩尔达维亚族客人讨论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抱负时，我们邀请的俄罗斯族客人柳德米拉·洛勃佐娃则默默地观注着这一场面，但满脸的不高兴。柳德米拉·洛勃佐娃曾是一名英语教师，现在是当地的普希金博物馆馆长（普希金是俄罗斯人，19 世纪 20 年代政治流放到基什尼奥夫长达两年之久），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前些日子的旅行令人着迷。在我们的谈话停顿的时候，她忽然提出用俄语背诵一首摩尔达维亚诗人米哈伊尔·埃米利斯库写的诗，并翻译成英语。其他的客人洗耳恭听，然后继续前面的谈话，柳德米拉又表现出满脸的不高兴。

当纳迪尔萨和温古雷安努离席去电视台而其他的摩尔达维

亚客人在一边交谈时，柳德米拉突然向我流露出她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沮丧和担心。她觉得摩尔达维亚的“极端主义者”把俄罗斯人看成是“侵略者”，并打算将俄罗斯人驱逐出摩尔达维亚。她在基什尼奥夫居住多年却没有学摩尔达维亚语，对此她辩护说，她把时间都花在学英语上了，“英语对每个人都有用”。她工作勤奋，用13年的积蓄买了一套公寓房，与苏联其他地区没有任何联系。

她抱怨说，“民族主义者”正企图把普希金的雕像从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园中央搬迁到公园的一隅。就算是雕像原先就在那里，但是公园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雕像应该放在更显眼的地方。她还〔393〕反对俄罗斯因1812年兼并比萨纳比亚（今天的摩尔达维亚）而被看作是侵略者的观点。她强调说：“我们保护了信奉东正教的摩尔达维亚人免遭土耳其人的压迫。”

讲了这些话以后，她又详细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女儿，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生活在靠近太平洋海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父亲又转调到摩尔达维亚黑海海岸的一个港口伊斯梅尔。她在基什尼奥夫上了大学，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现在，人到中年之时，她在这个日益充满敌意的城市中感到很孤单，害怕失去她的工作和唯一的房子。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我们邀请的摩尔达维亚客人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保证说，她完全可以在五年中学会摩尔达维亚语，足以接待来参观博物馆的摩尔达维亚人。这个要求既非不合情理，也非难以做到，它将保证她在摩尔达维亚社会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柳德米拉本能地感到即使她愿意做出努力，她的问题也不会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她觉得冒犯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一种政策，即摩尔达维亚仅仅属于摩尔达维亚人，或许最终还将导致

布加勒斯特的统治。真正的交流在大多数摩尔达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已不复存在。

虽然我在摩尔达维亚看到的这种人心骚动的状况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处于压抑状态，但是，当地共产党当局也在采取行动以便从莫斯科争取更多的独立，并且企图吸引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

在撒马尔罕，当地的共产党书记帕拉特·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改变棉花单一经营，更多地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计划。他对加工当地产品的工业未能得到发展而感到恼火，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在那里尤其具有发展前景。不过，这一地区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央经济部门的严格控制。他抱怨说，现在仍然不允许乌兹别克人以计划外的产品进行自由贸易或者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硬通货。几个月前，法律条文便允许这种交易了，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做出调整来适应新的法律条文。

〔394〕中亚地区的大多数大城市正在兴建新的清真寺，尽管穆斯林组织仍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当局拒绝给穆斯林的政党以合法的地位。沙特阿拉伯准备向中亚地区各国提供了100万套《古兰经》，但还未能得到落实，因为莫斯科方面没有发进口允许证。[10]但是，中亚各共和国当局已改变了长期以来禁止庆祝传统穆斯林节日的政策。1990年，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几十年来第一次欢庆纳夫鲁茨节，该节日是庆祝农业年的开始。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给我的印象与大多数已发生巨大转变的其他地区相比，旧式的苏联色彩更浓一些。我想找一些人谈谈，尤其是与学生、年轻人以及非官方人士，但都未能实现。与高层官员的会谈与前几年类似的会谈没

有太大的不同。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伊斯兰·卡里莫夫在党的塔什干总部大厦的一间豪华的会议室里同我见了面（现在，豪华的办公大厦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狂妄举动，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共产党为谋求较低的姿态，已开始将新的办公楼转交给政府和其他组织，例如，基什尼奥夫的共产党大厦已改为一所儿童医院）。他以一副老派共产党领袖的命令口吻回答我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按照新的苏联法律给主要的反对党联盟“伯利克”“登记注册”时，他简单地回答说，之所以没有给它登记注册是因为它接受了不可靠的人员，这些人组织了有可能导致混乱的示威游行。在我结束访问几个星期之后，卡里莫夫使自己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是，中亚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急急忙忙地给自己戴上更堂皇的头衔。这种特别时尚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中亚地区。

卡里莫夫当时确实容忍了一个很小的反对集团的存在，该集团由一些从“伯利克”组织中退出的乌兹别克杰出的知识分子所领导。我和丽贝卡邀请他们之中的三个与我们共进晚餐。

艾尔金·瓦西多夫是一位 50 岁刚出头的杰出的乌兹别克诗人，他向我解释了他所领导的“艾尔克”运动。“艾尔克”是乌兹别克语“意愿”的意思，其宗旨是建立政治、经济自治的乌兹别克斯坦。该集团的成员准备以“议会道路”作为其唯一的斗争方式，而避免采用可能会引起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方式。〔395〕那天晚上与他一起来赴晚宴的另外两个人也都是作家：罗拉利·卡布尔写小说和政治短评——最近一篇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前途的短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还经营一家出版社；阿曼·马奇安编辑一本面向年轻人的刊物，尽管他本人还很年轻，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已经出版了 20 多本小诗集。

他们对环境恶化的关注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中亚地区，对于那些兴衰系于选票的政治运动来说，忽视环境问题无异于自杀行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但是，他们的建议已超出了人们通常涉及的范围，即结束棉花的单一经营状况；增加对咸海的排水量；采用浪费较小的灌溉技术；建立以当地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他们——不同于莫斯科的许多知识分子——还认识到，除非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否则便不能解决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问题。

他们希望说服乌兹别克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部新宪法。当我问他们在起草宪法时参考什么书籍时，他们抱怨说塔什干的图书馆没有太多的材料来源帮助他们理解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宪法。不过，他们有安德烈·萨哈罗夫起草的宪法草案副本和一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这部俄文版的美国宪法是他们集团中的一位成员在我的斯帕索住所与我见面时得到的。我们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发现其中有人实际上正在利用我们出版物时确实是令人欢欣鼓舞的。[17]

“艾尔克”的大多数目标似乎是要确保在苏联内部实现自治，因此，当我们邀请的一位客人直言他的抱负是做独立的乌兹别克驻美国大使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现在还不是真的，我需要五年时间。”他大笑着回答。然而，他不是开玩笑。

我在6月份再次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它与其南部相邻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取代科尔宾成为党的书记，他非常坦率地谈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愿望。他说哈萨克斯坦想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全力

支持他这样做，但是联盟必须重新定义，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完全〔396〕的主权。他准备与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合作，使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当时他正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合作起草一个联盟条约草案，以取代由莫斯科提出的草案。

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哈萨克所处的殖民地地位，并且决心改变哈萨克的这种地位。他反对莫斯科盛行的一种观点，即哈萨克接受的投资基金多于它产出的资金。他指出，如果用市场价格来取代由莫斯科指定的低价格的话，哈萨克共和国可利用它自身的丰富的资源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贸易。他相信中亚需要更好的地区合作机制，他在一个星期前主持了一次中亚地区领导人会议，尽管莫斯科对此持敌视态度。

尽管不像莫斯科那样自由和随心所欲，但是哈萨克的政治与塔什干相比似乎更少一些控制，更多一些自发性。几年以前，一位名叫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的杰出诗人组织了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协会，开展反对核试验的运动（苏联的绝大多数核试验在阿拉木图东北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进行）。该组织成功地推迟了一些事先计划好的核试验，并正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政治运动。苏莱曼诺夫本人是在任的苏联议会成员。虽然他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似乎正在为他自己的运动开辟一个独立的前景。

打破帝国中央控制的决心正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得到加强。一些加盟共和国，诸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摩尔达维亚，其主权独立的动力来自通常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运动。其他加盟共和国，诸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动力来自共产党官员。他们迫切希望维持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如果改革在他们的共

和国深入人心，就会危及政治体制。甚至像纳扎尔巴耶夫那样既想改革又想保持联盟的领导人，也要求结束帝国的控制。

在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分裂主义情绪现在也正渗入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本身。俄罗斯好几个“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开始提出主权要求。8月份，与芬兰接壤的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布拥有主权。几个星期之内，九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从乌拉尔山的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鞑靼自治共和国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又名萨哈自治共和国）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都投票赞成主权独立。许多自治共和国还改换了它们的正式名称，去掉了“自治”这个词，就像加盟共和国那样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改换名称就要求与那些加盟共和国一样有同等的权利：对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控制权，独立的征税权，以及脱离权。〔397〕

对中央集权的憎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追求主权独立的热潮开始扩展到越来越小的单位，包括一些人口很少的“自治”州和地区。

这些自治实体绝大多数集中在俄罗斯，但有两个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宣布了它的主权并在8月25日声明具有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因而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但是格鲁吉亚立即宣布其主权独立无效。9月份，南奥塞梯自治州苏维埃也宣布它是一个共和国，但也同样遭到第比利斯的拒绝。这两个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绝大多数自治地区的主权声明相比，反映了更深的分歧：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强烈要求格鲁吉亚把它们划归给俄罗斯——或者说成为苏联的一个有主权地位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地区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一

触即发——实际上，南奥塞梯已经开始卷入战争。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大多数自治实体的主权声明都公开宣称，主权共和国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它们要求对其政治制度、资源和经济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希望削弱中央控制以及纠正过去的不公正而作出的自然反应。但是，有时候地方领导人仅仅是利用削弱中央权力之便来为他们谋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一些地方领导人——特别是格鲁吉亚内的那些地方领导人——从莫斯科保守的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在叶利钦的反对派中，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通过给俄罗斯制造困难，他们可以削弱叶利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协力反对中央官僚的努力。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苏联的强硬派人士，尤其是军方和克格勃中的强硬派，决心惩罚格鲁吉亚，因为它选举了前持不同政见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为总统，而且它还急于走向独立。一些观察家确信戈尔巴乔夫本人赞成这些冒险之举和破坏性策略。

叶利钦和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这些压力反应不同。加姆萨胡尔季阿拒绝谈判，他作出的反应是进行逮捕并以武力相威胁——在[398]南奥塞梯就是这样。而叶利钦却相反，他决心继续支持权力分散。当选为俄罗斯立法机构的主席不久以后，他访问了好几个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鞑靼共和国是这些"自治体"（自治共和国的通俗叫法）中要求独立最坚决的一个，叶利钦在其首都喀山对听众们说："你们将得到你们能够承受的所有主权。"

这些话后来就像鬼魂一样缠住了他，但在当时它显然是明智的政治策略。在1990年夏天，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可能还包括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很少有人认为苏联的任何一部分在认真地考虑脱离出去，更不用说俄罗斯自身的领土了。在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战中，叶利钦将竭尽全力保卫他的后方和侧翼。

第 十 五 章

[399]

窃取资产的灾难

把国有资产转移给新的所有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工作。

加夫里尔·波波夫[①]

在改革中，我们唯一应该禁止的是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字眼。玩文字游戏将把我们带入到死胡同。

拉里莎·皮亚谢娃　1990年8月[②]

你怎么能改革莫须有的事物呢？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③]

就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时间而展开的辩论在1990年愈演愈烈。雷日科夫政府、官方的或自行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以及苏联国内外的经济学者们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计划。虽然最高苏维埃同意了政府建议中的某些原则，但是它还是再三拒绝政府的建议，并把

包括实质性内容的建议细节退回给政府继续修改。

早在冬季，我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仍需要克服过去的习惯和老一套做法，但是切实的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经济的官僚体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根据“国家委托管理”的理论，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都被没收充公，并将其交给官僚们进行管理。任何从指令经〔400〕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企图都会被经济部门视为对资产的窃取，是对它们过去的“正当”特权的侵犯。

立法机关赋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实际上在莫斯科各中央部委的阻碍下失去了效力，从而加强了这些国家要求独立的力量。现在，它们又阻止以任何形式下放经济决定权，这种做法犹如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意识形态”官僚们——即职业共产党官员——正处于混乱和退却之中，然而“经济”官僚们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经济。④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的国有化确实给苏联政权带来了灾难。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放弃当年开国元勋者们所攫取的大量资产，否则苏联势必四分五裂。由于绝大多数资产原来的主人都已过世，因此不再有可能把资产返还给个人；况且除了国家这个整体以外，别无其他合法的申请者能够要求获得苏联时期所创造的固定资产。如果苏联想要生存下去，它就需要找到一种途径，赋予国民直接拥有和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力。从理论上说，国家官僚体系是人民赖以托付的对象，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贪污腐败，不可信赖。

因为使用卑鄙手段窃取财宝而受到诅咒，许多背景不同文化都有这类传说。无论是偷窃的珠宝还是理查·瓦格纳巡回歌剧中盛传不衰的莱茵黄金或是其他类似的故事，一个始终不变的特

点是，非法所有者们的贪婪往往使他们看不到占有这些财产的危险。

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我看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一再受挫，常常不禁想起这些传说。除非国家能够找到方法舍弃对收益最大的资产的控制，否则改革就不会站稳脚跟，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换。除非戈尔巴乔夫能找到一种途径来结束中央政府对苏联境内的绝大部分资产的控制，不然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在新近强大起来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崩溃。它们再也不愿意由莫斯科的官僚们来决定它们国家的经济命运了。然而，正如无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了解眼前的灾难。但他无法忍受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给他人的想法。他紧紧地抓住对资产的支配权不放，从而注定了他的权力宝座和所领导的国家将走向灭亡。

政府做事一团糟

〔401〕

雷日科夫和他的部长们从来不知道需要去做些什么以建立市场经济。尽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持教条态度或是个性贪得无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屏弃一些过时的教条，而对剩下的重新给予诠释。一方面，有些政府成员毫无疑问非常贪婪；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后的经济无疑会比行将崩溃的经济更能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市场体系。

即使是他们所运用的术语也令人十分迷惑。当刚刚开始允许

以赞同的口吻谈论市场体制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但他们从未解释过社会主义的市场同其他市场有何不同。到了 1990 年，政府的目标成了“受管制的市场”，这个提法也没有人去下任何定义。它难道意味着要用类似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法来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还是像西方对待公共事业（例如，美国的糖业政策）那样来进行管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范畴，因为不管西方国家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市场控制作用如何，它们只有被当作为一种特例而不是规则的时候才能发挥出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它们施行的范围。除了行政控制以外，不存在任何“管制”整个市场的方法，但是行政控制已经在苏联被证明为无效，而且它正是改革发誓要消灭的东西。

雷日科夫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未能掌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也不了解没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就很难、甚至于无法产生市场关系。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会以真正造就市场的方式彼此进行竞争。然而，政治领导层中对私有资产（尤其是土地）的敌对情绪随处可见，甚至连那些承认在当地服务业中应该鼓励私人企业主的领导人也仍然认为，“集体所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唯一能够适用于各种规模企业的所有制形式。

〔402〕 由于对促使市场运转的因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也就无法设计出市场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市场导向的会计制度、既能够征收到必要的岁入又不会压制个人积极性的税收制度——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使市场体制正常运转的基本规章制度，而这些都是苏联所缺乏的。这些规章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都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所有改革计划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少一种战略来建立这些规章制度或者是促进其发展。

尼古拉·雷日科夫在1990年年底以前一直担任总理，他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最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比戈尔巴乔夫更敏感，而且没有他那么不可一世；他在个人关系上也更加灵活，总之，雷日科夫没有什么恶意。他知道整个制度需要改革，但是他认为可以一步步地来。假如国家计划委员会下令军工企业每年把若干比例的产品转为民用产品，那么在若干年后所有的商店就会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人都会高兴。但是，在苏联官僚体制的现实世界中，这不可能发生。这个制度天生就是为了扼杀个人的创造性。把市场的规章制度零零碎碎地移植到现有的经济体制中来显然会遭到拒绝，如同一个病人拒绝移植一只黑猩猩的肺一样。

这个事实导致了雷日科夫理解上的另一个失败。无论是当政时期还是卸职以后，他最喜欢说的是他希望"创造，而不是摧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如果旧事物原封不动，新事物就会因受到压制而无法成长。

在苏联政府内——其各个机构只维护本部门的狭隘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概念混乱和官僚程序是一种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政府的计划往往使本来就十分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最令人吃惊的错误就是宣布在未来几个月中许多消费品将要提价。议会反对这个计划，但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商店的货架立刻被抢购一空。人人都希望在价格上涨之前做好储备。工厂和农场也开始停止外运产品，希望它们的货物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许多苏联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些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明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产生了"货币倒挂"，不可避免地[403]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向市场体制迈出的任何实际步骤都不得不伴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为市场创造条件时势必引起价格（和工

资)的上涨,以适应市场的内在动力;这与简单地宣布涨价并提前很长时间通知公众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每次这样做都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仍然一再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雷日科夫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方法的特点。事实上,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以改革的辞藻为掩护,维持经济官僚对经济的控制。

俄罗斯分离主义的蔓延

尽管叶利钦希望加快废止中央各经济部委,但他所采用的措辞不能帮助公众了解其前景。政治上的本能使他演讲时一味迎合公众的希望而不加节制。他争辩说,必须进行激进的改革,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决不能让公众受苦。他提出只要把经济决定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繁荣将近在咫尺。1987年和1988年,他曾经正确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因为后者暗示用不着作出牺牲就能够实施改革。现在,他取得了权威,但看上去却正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又有哪个政治家会打着"提高价格"、"减少福利"、"增加失业"的牌子去竞选呢?

一名以私有资产政纲参加竞选的政治人物在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为叶利钦的副手后,开始崭露头角,这就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是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学院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祖国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部)。过去,他还在格罗兹尼(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首府)的时候,就已经被选入了俄罗斯人民代表会议。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所以他当选之后不久我便请求进行一次礼节性拜访。

哈斯布拉托夫40多岁,相貌英俊,他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法吉尔·伊斯康德尔,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来自离格罗兹尼不远

的阿布哈兹，但是那里属于格鲁吉亚共和国而不是俄罗斯。然而，他说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对他的相貌更深刻：他的思想比当时的叶利钦还要激进。在俄罗斯高级官员中，他第一个告诉我俄罗斯将很快成为苏联的继承者。他预测苏联将会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不需要统一的宪法，因为它将不带有国家的属性。它将由一个简短的联〔404〕盟条约来定义，这个条约将在联盟各共和国之间商定，可能会包括10到12项原则性条款。只有各共和国有权征税，它们将决定向联盟预算作出多大的贡献，这非常类似于联合国成员国的做法。

他表示他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也愿意看到他走好运。但他觉得雷日科夫政府是“套在（戈尔巴乔夫）脖子上的沉重负担”。他认为，经济决策权应交给各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我们可以帮助他，办一些他在中央无力办的事。”他说，俄罗斯迫切希望实现经济私有化，但现有官僚体制阻碍了任何真正的进展，只有将权力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才能够绕过各官僚机构，实现私有化。

他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戈尔巴乔夫掌握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但是俄罗斯将坚持在苏联驻外大使馆中派驻自己的代表，因为它希望独立地处理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后，它将逐步采取与苏联有所区别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它主张采取比戈尔巴乔夫更为强硬的立场——最终，海外的苏联大使馆将变成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俄罗斯将是继承国。

事实上，哈斯布拉托夫认为不管建立何种联盟，它都将只具有极少的几项职能：对核武器的控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对常规军事力量的控制将转给各个共和国。它将取消目前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而由创始国选出的10名代表组成参议院进行治理。哈斯布拉托夫估计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将承担苏联债务的75%。

我离开哈斯布拉托夫的办公室时感到十分震惊，正如我在 3 月份听到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的消息时那样。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改革者们都预测苏联将会继续存在。如果他们的预言正确的话，苏联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将会变得很小，但是将会保留外交政策的决定〔405〕权，提供共同防卫，保持一种货币制度，以及实行对电讯、长途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控制。他们推测几个位于外围的小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可能坚持更大程度的独立，但是会把避免损害苏联占据的“经济空间”当成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它们就会在寻求加强共和国力量的同时又不使苏联解体。有些人认为美国式的联邦是最理想的；其余的人则希望建立某种更加松散的形式，以适应民族差异和满足国家的自尊，但是这种松散的形式仍然会拥有联邦权力，具有国家属性。

叶利钦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赞成建立起一个联邦或邦联的目标。他不但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指责，即他的言行将导致苏联的解体，并且还争辩说，一个强大的联盟需要强大的加盟共和国。⑤但是，现在他的主要副手却在直言不讳地谈论俄罗斯将成为继承国的问题，在这个联合国的地区性翻版中，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将非常松散。

在我会见哈斯布拉托夫两个月之前，我曾经给华盛顿发出消息，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苏联解体。我并不赞成美国采取行动去促成这种解体（但是在坚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拥有恢复其独立地位的权力这一问题上除外），而是认为我们有必要做好应付这种后果的准备。尽管我看到可能导致苏联分崩离析的力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我仍然预测如果苏联真的解体，其原因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坚持要求独立，迫使俄罗斯

解散苏联。我从未想到除了几个梦想家以外，俄罗斯的政治家们竟然也会认为俄罗斯会欢迎并将促成苏联的解体。

哈斯布拉托夫并非一个古怪的梦想家，而是在俄罗斯议会中赢得第二把交椅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戈尔巴乔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改革目标上表现出无能，一些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的人开始谈论起同样的观点。米哈伊·波察罗夫就是其中之一。

波察罗夫是从一个经理转变成政治家的，他同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近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议会高级经济委员会的主席。6 月份时，他曾作为候选人竞选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但是没有获得过半数的选票。

自从 1989 年年初以来，我就定期与波察罗夫会晤，所以比较熟悉他的观点。他坚信，要建立起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激进和迅速的行动来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解散国有企业并从而形成竞争。然而直到 1990 年夏，他仍然是从苏联的整体来考虑问题的。 [406]

但是在8月份当我们闲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所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变了。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最终做好真正的经济改革的准备满怀希望，但是他感到如果有必要的话，俄罗斯也完全有办法独自进行改革。因此，假如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在进行根本性改革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他预计俄罗斯将会牵头，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这将导致产生新的结构来取代顽固的中央管理体制。他认为向市场关系的转变将会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发生了就应该迅速进行。他预测其结果是，苏联将类似于 1993 年马约生效之后的欧洲共同体：一些主权国家拥有共同的“经济空间”和统一的货币，并且拥有行使管理功能或者建议功能的机构，例如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和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6] 因此，哈斯布拉托夫绝不是唯一认为俄罗斯将成为苏联的继承国的人。像波察罗夫这样的人之所以

得出以上的结论，并不是因为他们抽象地拥护俄罗斯分离主义，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无力对经济改革作出全面承诺，令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人数将不断增加，除非戈尔巴乔夫朝着解除中央经济控制迈出切实的步伐。

从未到来的 500 天

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份的这段时间证明了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的直觉是正确的。在剥夺了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谈到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同意与叶利钦合作出台新的速成计划，并和叶利钦一起指派了起草该计划的委员会。苏共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他就迅速离开，同德国总理科尔签订了历史性的〔407〕协定，显示出他与苏共强硬派大相径庭；而且他似乎也准备在国家经济转变方面作出同样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挑选了一些专家，他们将起草一份改革计划，以取代雷日科夫政府杜撰出来的那些流产了的计划。他们选择了总统委员会的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院士来担任这个专家小组的主席，同时从两人各自的阵营中挑选了大约 12 名经济学家：例如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他同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一样也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鲍里斯·费奥德罗夫却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府。虽然由叶利钦提名的人选比来自戈尔巴乔夫阵营的人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但是出于共同的需要——即迅速采取措施解除中央对经济的控制，正是这种控制压抑了经济活动并且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分离情绪——这个群体似乎团结得很好。

他们从 8 月 6 日起集中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内工作，为的是避免办公室及家庭的打扰。他们把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研究数月的计划作为草案的基础。这个草案在经济圈和政治圈中被称为“500 天计划”，因为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 500 天内建立起一个市场体制。

虽然时间表似乎过于乐观——在短短的 18 个月里就建立起市场体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所阐述的步骤看来正是以内在的力量走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开创民主政治体制所必需的，因为民主政治体制最终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分散经济力量。它认识到国家有必要放弃对经济决策权的垄断，并且为此拟定了紧迫的时间表。

沙塔林的委员会受命在 30 天内提出一份报告，但是它在 8 月 21 日，即只花了 15 天就完成了计划草案。这与苏联官僚很少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沙塔林草案保持了“500 天计划”的轮廓，尽管名称上有所不同。该委员会在 9 月份的《消息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建议的概要，强调需要把资产还给人民；对此文章是这样解释的：

> 私有化……是一种机制，它将把财产分配给所有希望为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承担责任的人…… 〔408〕
>
> 资产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是对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是防止社会动乱和民族动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⑦

这个小组还提出个人有经济活动的自由，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无论私营企业、集体合作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管理上的自由；中央经济部委将被取消，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将被停止，厂长经理们

将被要求在各自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水平联系”，而不再是简单地听从来自莫斯科部委的命令。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才能获得这种“管理自由”，但是它必会有所回报：厂长经理们可以租赁和出售资产（在此之前这是禁止的），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自己进行投资和贷款的交易而不用再等上面的拨款。

建立经济规则这一基本责任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和当地政府，而苏联政府将只保留对联盟资产和各共和国所委托行使的职能的权力。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沙塔林计划的缺陷：许多细节仍没有制订出来，一些时间表并不实际，作者提出的许多建议不过是为了迎合公众流行的说法而已——这种失误在此后几年里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改革者。例如，作者们声称“迈向市场的行动牺牲的是国家，而不会使普通个人付出代价”，[8]甚至于认为公民的“权利”之一就是“立刻过上更好的日子，而用不着等到遥远的将来”。[9]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缺陷，这个计划仍然是当时最好的、最有可能施行的方法。它要改变的正是一旦全面展开改革就必须加以改变的那些基本原则。

即使是那些不实际的时间表也有一点长处：它将剥夺经济官僚们最有效的武器——耽搁。在苏联乃至于其他任何地方，当一个官僚面对自己不同意的命令时，通常的做法是“在原则上”赞成，但是以时间不完全成熟为由拖延命令的实施。当然，时机将永远也不会成熟，但是上司却可能早就更换了，或者失去了兴趣，或者失掉了热情。因此，如果在要求上不坚定、在规模上不激进、在执行方面不迅速的话，任何旨在摆脱经济官僚控制的计划都不会有效。[409]

此外，在某些问题上缺少细节实际上非但不是缺点，反而还是优点。我们不可能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方方面面都作出计划。绝

大部分规章的建立都要在国家结构之外、通过赋予个人自由来完成。政府不能建立一个市场体制；它只能使市场体制成为一种可能，它要做的是不作拦路虎，允许个人根据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行事，最终建立起市场。雷日科夫从来不懂这一点，但是沙塔林却十分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建议为“方案”而不说是“计划”的原因。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别人称之为“沙塔林计划”。

整个夏天，戈尔巴乔夫对沙塔林的计划多次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似乎他就要接受这个计划了。我觉得冬季的情景看上去就像是一出戏剧的剧本，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的上演。他获得了总统的职位，废除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重组了苏共以缩小其影响，现在他似乎准备好好利用新形势下的行动自由。他在发表了大量言论之后现在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推动经济体制中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冷战的墓碑刻写墓志铭。

与西方的共同利益

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8月1日在伊尔库茨克会谈之后，双方就德国统一和在整个东欧地区清除铁幕的最后遗迹达成了一致，尽管并非所有问题都已经盖棺定论。谢瓦尔德纳泽与贝克建立了融洽关系，正如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之间的关系一样，贝克去年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霍尔安排会议时曾给予谢瓦尔德纳泽热情款待，谢瓦尔德纳泽希望对此作出回报。

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景色没有大蒂顿那样宏伟，但是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它不远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9]其自然景色未遭破坏，湖光秀色无与伦比。选择这个地点来举行两个

外长之间的一次极其和睦的会谈无疑是明智的。

〔410〕 他们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双方在战略武器谈判和阿富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是分歧只是例外而不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分歧本身也不像过去美苏之间的问题那样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长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严重分歧，以至于他们有空暇乘水翼船沿安加拉河到贝加尔湖进行了为时半天的短途旅游，并且在一所具有乡村风味的小渔屋内享用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在8月1日上午的最后会谈中，我们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有报道说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起初还不清楚这只是小规模的擅入还是全面的入侵，于是会议只好停止以便有时间仔细讨论这个报告。贝克接着前往蒙古进行计划之中的访问，丽贝卡和我以及贝克一行中的一些人同谢瓦尔德纳泽一道返回莫斯科。

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得到了伊拉克占领并宣布吞并了科威特的消息。贝克最亲密的助手中有两位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他们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贝克的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罗斯和一直处理德国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国务院顾问罗伯特·佐利克。显然，贝克必须立即返回华盛顿，不能再继续他计划之中的蒙古内陆的旅行了。然而，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借道莫斯科，以期望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问题与谢瓦尔德纳泽达成一致，还是绕道北京或东京（从蒙古到华盛顿，以上两条路线距离相等）。如果有希望争取苏联同意在安理会进行联合行动，那么就值得在莫斯科停留。

伊拉克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的盟国，接受了苏联供应的大量的军事装备。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居住在那里。虽然我们知道并不是苏联在背后支持入侵科威特，但是要使苏联同我们一致行动以结束这场侵略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将意味着苏联改变它的整个中东政策，可能还会使相当数量的苏联公民处于危险的境地。

然而利益攸关，值得一试。于是我们决定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说服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加入到我们反对伊拉克侵略的行列中来。如果"新思维"和"人类共同利益"还有些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意味着苏联谴责入侵行径，同我们一道向伊拉克施加撤军的压力。

苏联的第一个反应令人鼓舞：外交部于8月2日发表声明，呼吁〔411〕"伊拉克军队迅速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这是对包含同样要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苏联还召见了伊拉克驻莫斯科大使，正式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受欢迎的转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莫斯科愿意同美国一起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

罗斯同苏联外交部的对等人物谢尔盖·塔拉申科谈论了回国路线问题。塔拉申科说，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尚未下定决心，而且他的中东问题专家们一直怂恿他拒绝同美国联合行动，但是如果贝克亲自去跟他谈的话，也许能够说服他。这并非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绝对的保证，但是贝克决定就这么做，于是告诉他的飞行员出了乌兰巴托之后朝西飞，而不是朝东飞。

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从来不用于商业飞行，只是用于外国首脑和苏联领导人专机的起降。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中转站会晤了几个小时。塔拉申科的建议被证明是准确的：双方同意发表联合声明，这也是后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一致投票的先兆。最后，美国似乎有可能根据最初的计划行事了。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谈话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唇枪舌战。

对于许多外交家来说，1990年8月不像往年那样是个休假的季节。当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不断加强、有关暴行的报告不断增加的时候，布什总统开始组织多边力量来施加军事压力。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布什如果想以安理会决议为基础成功地组建联合阵线，他就必须确定戈尔巴

乔夫将继续给予支持。为了确保这种支持，他提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谈，对此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接受。

两人在9月9日(星期日)几乎谈了一天，讨论的话题主要是海湾危机。戈尔巴乔夫希望得到两个方面的保证：使用军事压力旨在使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放弃科威特；当科威特被解放了之后，美国军队应该撤出该地区。布什允诺将尽一切努力不依靠战争手段来〔412〕解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控制，但是如果萨达姆·侯赛因继续不作妥协，布什拒绝保证仍然不使用武力。至于美国军队，他保证科威特解放之后就把它们削减到正常水平。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海湾地区维持一定数量的海军，戈尔巴乔夫并未要求把它们全部撤走，只是要求撤走调入该地区专门对付伊拉克入侵的部队。

他们广泛讨论了苏联经济和需要外援的问题。布什保证继续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作出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的承诺。相反，他只是给予口头上的支持，并保证尽力废除冷战给贸易带来的壁垒，提供某些人道主义援助和技术援助，鼓励私人投资者。

两人谁也没有说出这两个问题有任何联系，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美国愿意支持苏联的改革，就可能会打消苏联反对西方的海湾政策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戈尔巴乔夫决心在海湾地区避免一场由美国领导的战争，然而，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如果他无法迫使伊拉克不经战争而退却，他肯定无法阻止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他所需要的是至少得到几个月的时间来尝试寻找政治解决的方法。布什总统很乐意答应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成功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准备将要花费些时间。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谈达成了以上谅解，尽管有时气氛紧张，偶尔还出现彼此间的误解。德国统一后，美苏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政治合作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两个昔日的对手正在形成一种

非凡的新型伙伴关系。此外，在达成谅解之前的几个月中，两位政治家间频繁的接触——既有直接的（通过电话）又有间接的（通过信件和各自的代表）——使他们建立了极其密切的个人纽带。

布什派出了一个代表团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就未来的经济改革路线作出决定之前，布什总统已提出要在 9 月中旬派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率领一些[413]高级公司经理前往莫斯科，探讨投资和贸易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当然感到高兴，因为他那摇摇欲坠的经济需要从西方引进资本和管理专家，这一点日趋明显。

我也认为在合适的时间很好地组织这样一个代表团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建议选择的时间十分不利，除非其本意就是迫使戈尔巴乔夫接受沙塔林的计划，其实，由总统本人私下里接受这一计划可能会更有效。如果沙塔林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而且实施的机制也已经建立了起来，那么代表团将会有东西可谈。但很清楚的是，在代表团计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像布什对改革的支持一样，总统商务代表团的建议也没有同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投票联系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使戈尔巴乔夫注意到，如果苏联同美国合作，它将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好处。

起初似乎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不言而喻的贿赂，但是当我考虑到代表团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开始感到不安。首先，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需要额外的恩惠才会在海湾问题上同我们合作。苏联在中东的地位成为萨达姆·侯赛因之流手中的人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

益。"新思维"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摆脱传统的苏联外交政策所导致的孤立。只有反对伊拉克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才能使自己成为在该地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的倡导者之一。因此，认为美国需要做点什么以换取苏联的支持看来是对苏联利益的错误理解。

其次，同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一样，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至少具有同样长远的重要性。我们有能力把戈尔巴乔夫推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这种影响力。总统将于9月派出的商务代表团一事，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浪费潜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即不管苏联是否采取有效的改革计划，只要它在外交政策上与我们一致，美国就会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可能最终带来痛苦。

8月下旬，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不再支持沙塔林计划的迹象，于〔414〕是我更加不安了。政府成员、总理雷日科夫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正在积极游说反对这个计划，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他们争辩说这项计划将带来罢工、动乱甚至于内战。最后，在8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沙塔林小组的建议应该同政府的计划结合起来。

这个建议听上去就像是要把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对于两个计划各自的作者而言，这两个计划是完全无法共存的，也根本不能结合。叶利钦、雷日科夫和沙塔林在第二天都纷纷表示反对这个意见。

这时候，我感到总统的商务代表团可能会遇到潜在的灾难。美国的大公司经理们可能不希望对正在考虑之中的各种改革建议表示明确的立场，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同政府官员一道出现并进行讨论，势必给人留下他们愿意向没有改革的苏联经济进

行大规模投资的印象，从而给两派均造成严重的误解。除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继续合作——假如戈尔巴乔夫拒绝沙塔林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否则美国工商业就可能陷入两大权力中心的角逐之中。

我知道白宫几乎不太可能推迟这次访问，因为毫无疑问，这次访问被视为确保戈尔巴乔夫在海湾问题上支持我们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政治竞选的主要赞助者，他们可能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己才被选入这个代表团。由于国家的原因而要求他们调整日程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忿忿不平。

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华盛顿提出反对建议，尽管这种意见并不受欢迎。于是，我向国务卿贝克送去了个人的意见，指出计划中的总统代表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我意识到突然提出推迟这次访问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但是我仍然建议应该问一下戈尔巴乔夫：把代表团的访问安排在苏联政府确定了行动方针之后是否对他会更有利。他几乎肯定会说，“按计划来吧”，但是他也会事先得到警告，即我们了解当前的混乱，对现政府的“改革”计划缺乏信心。

我的建议没人理会，代表团还是按计划来了，而且中途还在赫尔辛基与9月9日刚刚结束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布什总统进行〔415〕了简短的会谈。我曾经希望，既然这个代表团是一个“总统代表团”，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使他们了解鼓励加快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得到了厚厚的简报表，上面写满了有关具体问题的数据，但是却没有涉及明确的政策指导方针。

事实上，总统的代表团应验了我最坏的担忧。戈尔巴乔夫先是抱怨他经常从外国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经济政策的相互矛盾的建

议，然后就把这个代表团交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尤里·马斯柳科夫。尤里·马斯柳科夫向来访者们保证，他们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欢迎外来投资的企业的名单，他还与莫斯巴赫达成一致意见，在两周内任命一个联络小组来协调谈判。他指责沙塔林的计划充满幻想，具有破坏性。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当代表团第二天同雷日科夫会晤时，有几个人竟称赞他没有听从“那些激进分子”是对的。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工商业巨子都能理解外国政治中的微妙之处，但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令人尊敬的显赫的美国商人竟然赞同保留由国家进行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

代表团没有安排同叶利钦举行会谈，尽管事实上俄罗斯议会已经正式认可了沙塔林的方案，而且叶利钦也表示他的政府将控制俄罗斯境内的贸易和投资。

目送代表团离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制度的辩论正在进行；苏联此时邀请美国派出专家提建议，其意义虽然含蓄但却准确无误，而我们竟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事实上，苏联领导人非常可能得到了一个与我们希望给予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甚至连马斯柳科夫向莫斯巴赫许下的有限的诺言也没有得到兑现。尽管我们的使馆一再催促，马斯柳科夫始终没有送来待出售的企业的名单，也没有提名什么联络小组。每当我们询问时，答复总是一成不变：“过几天就会准备好。”

〔416〕

幽灵般的双重权力

由于历史和教育上的原因，俄罗斯人非常憎恨政府高层的权

力斗争。过去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导致内战或者外来侵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意建立沙塔林委员会、表现出明显的停战迹象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对此表示欢迎。如果他们都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并且确保在各自的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很好的搭档，携手实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

该委员会在8月底提交了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这个报告需要同政府计划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公众大吃一惊。叶利钦当即明确表示，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政府将立即着手实施沙塔林计划。在9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告诉我和一群美国参议员：这两个计划的合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接受"协调"的结果。他认为苏联部长会议长期以来无所作为，它应该被规模较小的总统委员会所代替。他补充说，自己并不寻求同苏联政府对抗，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将坚持承担它们目前的许多职责，因为它们希望在经济改革方面向前迈进得更快，而不愿被顽固的中央官僚制度拖延。但是，他非常愿意把国防、通讯、能源分配、铁路和航空运输等职能留给中央政府。

他对我们说的话同他在公开场合上讲的一样——也许同他私下里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也一样。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没有听取叶利钦的意见也没有听取争论双方经济学家的意见。除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以外，我找不到其他人会相信这两个计划能够结合或者协调。尽管如此，雷日科夫还是在9月7日宣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令把他的政府计划同沙塔林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并且挑选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负责这项工作。

阿甘别吉扬又高又胖，生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父母都是 [417]

亚美尼亚人。他先是在莫斯科学习经济；当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之后，他于 1961 年迁移到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分院的经济研究室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研究，这种事情在莫斯科的总院是不可能的。1983 年，阿甘别吉扬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批评的文章，此后这被称做新西伯利亚研究。这是最初推动改革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因此戈尔巴乔夫掌权后，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被双双调入莫斯科就不是什么巧合了。1990 年，阿甘别吉扬开始执掌坐落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学院，人们希望它成为苏联的哈佛商学院。虽然他依然被认为是一名经济改革家，但是他的立场不如沙塔林集团所支持的人那么激进，而且在这个集团中还有他的一些对手。

雷日科夫在宣布阿甘别吉扬将糅合两个计划的同时，辩解说政府的计划是“现实的”，并且暗中批评沙塔林计划中关于下放权力的建议，声称应该保留“强大的国家”，防止经济分离主义。

雷日科夫没有提到叶利钦威胁必要时将在俄罗斯独自实行改革以及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水平安排”的问题，只是补充说道，他的政府将会促使戈尔巴乔夫下达总统令，要求现存的经济联系在 1991 年全年必须保持原样，否则将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还建议苏联政府同各加盟共和国协调行动，处理包括下一年的经济合同等问题。

叶利钦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回答。9 月 11 日，俄罗斯议会以 213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他的建议，即原则上同意沙塔林的计划，并且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这个计划。它还命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一个月内提出实施计划的详细建议。鉴于俄罗斯议会原来每次投票时

都会出现巨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不理会俄罗斯议会的感情，这也将是一个不祥之兆。

雷日科夫政府的公众支持率直线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俄罗[418]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两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但是叶利钦解释说这一提案“不成熟”，因而没能被通过。而且，即使通过不信任议案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只有苏联议会可以撤换总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雷日科夫的沉重的政治打击。

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已命令阿甘别吉扬合并两个计划之后，许多观察家仍希望这不过是一种表明文章，其结果仍将是以沙塔林的“500天”方案为基础。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赞成向市场体制转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是市场体制），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已对雷日科夫政府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激进的改革，现在他实施这种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陷入同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持久斗争的危险，有鉴于此，许多人都相信他肯定只是把沙塔林计划稍作些修改。

当10月中旬妥协文件最终公布的时候，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该文件包含了沙塔林计划的主要内容——迅速私有化和权力下放——但也保持了已经被事实证明行不通的政府方案的主要特点，例如通过颁布命令来提高价格。

发布这一文件的次日，我邀请阿甘别吉扬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国防部长切尼共进午餐。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为雷日科夫政府工作，包括奥列格·波戈莫洛夫和帕维尔·布尼奇。他们均表示不理解阿甘别吉扬怎么会同意把这样一个七拼八凑的方案署上自己的名字。阿甘别吉扬承认是他起草了草案，但是坚持说整个方案都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写成的，包

含了许多他并不赞同的内容。他还说戈尔巴乔夫曾经一字一句地反复看了多次，实际上，他花了40几个小时仔细阅读了这个计划。

这个结果证明了许多人的推测：戈尔巴乔夫总的来说对经济不太了解，特别是不了解市场经济。甚至有人猜测是否他已经失去了政治敏感，因为他通过的这个计划毫无疑问将增加苏联内部的紧张。

〔419〕 叶利钦在一次车祸后已经三个星期未在新闻媒介上出现了，这时候他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他批评这个计划并且指出它迫使俄罗斯只能作出三种选择：完全拒绝；根据自己的方案走自己的路；等待观望六个月，直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到来而被迫采取另一种办法。

苏联议会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动摇，戈尔巴乔夫成功地确保议会通过了他自己的计划。随即，他的经济队伍开始分裂。11月3日，主张改革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份由沙塔林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署名的措词尖锐的声明，这些人中有两人还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声明指出妥协方案所作出的让步太少、出台得太迟、并且也行不通；戈尔巴乔夫背弃了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除了爱沙尼亚外，所有共和国都已经在8月份通过了沙塔林方案）；声明还预言已经开始的通货膨胀将会不断上升直至失去控制。“向市场关系的转变现在不能靠稳定卢布来进行，而是应通过通货膨胀以及遏制通货膨胀的传统措施来进行。”他们忧心忡忡地、然而也是预言般地得出了这一结论。[11]

与此同时，叶利钦政府正在加紧同其他加盟共和国签订经济协议，宣称拥有种种的权力，包括在俄罗斯境内征税的权力和决定向中央政府上交多大份额税收的权力。双重权力的阴影正在开始成形。

到了10月份，我意识到自己在春季和夏季对戈尔巴乔夫策略的估计没有得到证实。虽然戈尔巴乔夫已成功地把共产党削弱到不再能够自动地阻碍改革，但是他没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乘胜追击。沙塔林计划是有缺陷，实施起来也不会像它的作者预计得那样顺利，但是它能使经济体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拒绝这个计划是戈尔巴乔夫最致命的错误之一。

当他确实有机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时为什么又退缩了呢？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政府官僚、保守的共产党的官员以及克格勃都加入了反对改革的力量，他们说，迅速地向资产私有化转变和取消中央对经济的指导将会导致公众的混乱，罢工和游行将无法控制。戈尔巴乔夫对本来可能成功的改革计划的热情现在已经被恐惧所取代，而在恐惧下产生的支离破碎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加强了分裂帝国的各种离心力量，与此同时，帝国自身的统治机器也在分崩离析。〔420〕

[421]

第十六章

戈尔巴乔夫向右转

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990年11月20日①

就在他（戈尔巴乔夫）为右翼辩护时，全国都还在朝左行进。

安德烈·萨哈罗夫　1989年11月②

虽然经济正在恶化，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升温，而且暴力犯罪也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但在1990年夏末，许多苏联知识分子还是充满了少有的乐观情绪。戈尔巴乔夫似乎已经抵挡住了党内强硬派的进攻，并且奠定了与包括叶利钦的俄罗斯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础。

然而，人们的乐观期待很快即告破灭。戈尔巴乔夫命令将沙塔林和雷日科夫的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着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10月，戈尔巴乔夫—阿甘别吉扬的新版计划公布，原来有少

数观察家曾希望，戈氏对上述两计划的“调和”只是为保留沙塔林方案要点作些表面文章，现在他们也大失所望。当时无人相信这种“调和”行动能行得通，戈尔巴乔夫的声望、权威和实际力量也因此而加速下滑。

与此同时(也许并非巧合)，有关戈尔巴乔夫即将被政变推翻的谣传也多了起来。这些谣传从未特别指明究竟是谁在策划推翻〔422〕总统，只是认为由保守的共产党官员、军官和警官组成的阴谋集团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政治上的混乱和戈尔巴乔夫日益不得人心的局面。某些愤世嫉俗者怀疑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鼓励这种谣传，以便为扩大总统权力寻找正当理由。

戈尔巴乔夫受到围攻

最初，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最高苏维埃获得特别授权，颁布有关经济问题的法令，建立旨在“促进全联盟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借以支撑其权威地位。他的建议在最高苏维埃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③某些改革家，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该建议的理由是，为迫使阻力较大的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威。但恰恰在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权力增加之时，他似乎越来越无力采取决定性行动。

整个秋季似乎都无所作为。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红场阅兵式，传统上是炫耀苏联军事力量的机会，但也被企图暗杀站在检阅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事件所搅乱。正当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男子将手枪瞄向总统时，卫兵们将其摔到了地上。两发

射向戈尔巴乔夫的子弹偏离方向，射向天空。尽管无人受伤，阅兵式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地继续进行，但该事件却使整个城市都非常紧张。这似乎应验了公众对暴力失控的印象，而且它可能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他随后宣布的一系列行动。

红场事件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有1000多名经选举担任公职的军官参加的会议。④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此次会议竟是一场灾难。这些官员毫不隐瞒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愤怒，认定他应对国家的不幸负责，并公开说他们对他的领导已不抱任何幻想。⑤这次会议无疑加深了戈尔巴乔夫的如下担忧，即军队将会支持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423〕 仅仅三天之后，依然对此次对抗心存余悸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冗长报告，却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和敌视。⑥这使得他的失望达到了顶点，最后使其下决心支持强硬路线。他返回办公室后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主要来自党内的其他顾问。由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行一些已有的应急的计划，用来加强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并使政府直接服从其领导。⑦

次日，戈尔巴乔夫再次来到议会大厅，提出要彻底重组他的总统权力班子。此计划制定的甚是匆忙，许多高级官员都未曾过目。雷日科夫也是在戈尔巴乔夫去最高苏维埃途中从车上给他打电话时才第一次听说此事。⑧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其计划，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总统委员会将被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得优势地位；还将设立副总统一职；而内阁也要取代部长会议，其规模尽管未予特别规定，预计会小于美国总统的内阁；联邦委员会将成为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顾问机构。⑨

代表们对这个计划比对前一天的“联盟共和国”国情咨文更

有兴趣。虽然其变化主要集中在机构重组而不是激进的新政策上，但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需要有所行动了。立法者们兴致勃勃，但当他们就该计划进行辩论时，却发现其中的模糊表述将使戈尔巴乔夫无需同他们协商即可使这些新的设置具体化。

即使如此，大多数改革者还是准备支持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前提是总统要用这些权力来推行他们所赞成的改革。一批杰出的“民主派”还签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戈尔巴乔夫要么作出一些果敢决定，要么就干脆辞职。他们要求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以真正的主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军队和地方政府摆脱共产党的直接控制，成立具有改革思想的新内阁，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建立工作伙伴关系。[67]

戈尔巴乔夫非但不赞成这些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明智的建议，反而把这些要求当成是一种反叛行为，甚至在思想上还更坚定地站在了他曾扶植过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对立面。[68]实际上，他很难使最高苏维埃赞同这样的政策，但那些政治家们急切地希望人们看到他们并非无所作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坚定努力也许能够说服他们。〔424〕

如往常一样，最高苏维埃起初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认为它过于模糊，只是在戈尔巴乔夫同意逐点进行讨论后，他们的态度才缓和下来。有了这些保证，最高苏维埃投票“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提供更详细的内容。总理雷日科夫虽未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但他让大家都知道，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将部长会议转变成总统内阁的打算也颇感沮丧。

12月，设立副总统职位和戈尔巴乔夫建议成立的其他机构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最终获得了他想从立法机关得

到的绝大部分东西。

然而，立法上的动作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令多数公民忧心忡忡的是商店中食品与商品的短缺，他们花在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即莫斯科的官员们现在讲起话来都比较强硬。法律和秩序成了新的口号，而且11月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颁布一个新的严厉政令，发表一次威胁性讲话，或由某一持强硬路线的政治家取代了某一要职。

11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下令由宣传喉舌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接替米哈伊·涅纳谢夫的职务，后者曾经为电台和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计划建立四个独立的频道。这一步骤显然旨在加强对电子媒体的控制。

对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也在增加。当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政府继续维护它们的主权、通过立法、并扩充其行政管理机构时，戈尔巴乔夫间接加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发布“保护公共和集体组织财产”这一法令之后，他授权增派军队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11月27日，国防部长亚佐夫在电视上露面，警告说将使用武力来防止对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的骚扰。第二天，政治局又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敦促戈尔巴乔夫同立陶宛境内“侵犯苏联公民人权的行为进行斗争”。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政令，宣布各加盟共和国颁布的国防立法全部无效。此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防卫机构，但依据这一政令，苏联可用武力去阻止它们的这种努力。同一天，令公众吃惊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任命强硬派人物鲍里斯·普戈接替了瓦季姆·巴卡金的内务部部长职务。

〔425〕

自1988年受命担任内务部长以来，巴卡金的声望日增，被认为是苏联（也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法制含义有所理解的警察首脑。他十分英俊，经常身着做工考究的西服，也许好莱坞会挑选他出演詹姆斯·邦德，但他在现实中则是一个勤于思索而非因循守旧的人。当我邀他讨论执法问题时，他非常坦率地描述了苏联“民兵组织”的缺陷：缺乏训练、低收入、腐败----所有这类问题都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明白，要想使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为此民兵组织重新定向。正如其回忆录所言，他曾试图建立起一支服务于“法律和国家，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苏共”[12]的警察队伍。在他担任部长之前，警察的行动只受共产党支配，他上任后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而且他还坚持完全恪守法律准则，因而多次触怒了党内的强硬派。

1989和1990年期间，他还常常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公众游行示威的政策上发生冲突：巴卡金认为只要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应该允准，而克留奇科夫则坚持主张多数游行应予禁止。巴卡金也反对在民族主义活动比较积极的加盟共和国实行总统直接统治的主张。尽管克留奇科夫反对，他还是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允许当地政府对警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由于在一次正式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沙塔林计划问题指责总理雷日科夫，他也激怒了他的这位顶头上司，到秋季，人数众多的“保守派”联盟要求戈尔巴乔夫撤换巴卡金，这些人中有：总理、克格勃主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势的共产党组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支持以一切手段维持联盟的激进派。[13]

尽管巴卡金将保住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位置，随后并被提名进入了新的安全委员会，但他离开内务部这一事情本身却终止了在〔426〕

执法机构中间建立法制的全部实际努力。他是掌管三大“强制机构”(其他两个是克格勃和军队)之一的唯一一位全心全意支持发展文明社会、尊重法制的高级官员。他被一个以因循传统方式处事而闻名的人所取代，可谓不祥之兆。

鲍里斯·普戈的行为很快即验证了公众对他的猜疑。12月5日，他在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他已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确保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翌日，戈尔巴乔夫就在一次工业部门经理会议的讲话中预告说，“严厉的、不受欢迎的措施”不可避免。12月11日，克留奇科夫也发表讲话，警告说国家正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并指责“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破坏”苏联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计划在12月17日召开，审议正式加强戈尔巴乔夫权力得那项宪法修正案。但有迹象显示，戈尔巴乔夫已不可能用这种新的授权去实施其在11月18日的公开信中所强调的那种改革了。一切都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化。

重新定义联盟的概念

在前一年的冬季，戈尔巴乔夫曾敦促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的分离主义者在脱离苏联之前去尝试组建一个“真正的联邦”。他还暗示说，几个月内就能订出新的条约，此条约将为联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自愿组合的框架。有关谈判在1990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联盟条约草案的公布已是1990年11月24日。虽然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共和国准备接受这个条约，但我还是仔细阅读了草案，以确定戈尔巴乔夫愿意容忍变革的程度。

事实上，草案内容在"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体现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它规定"除了联盟施政所必需的部分以外"，加盟共和国将控制各自的土地和资源，并确定了划分联盟与共和国权限的总原则。不过，其中许多方面含糊其辞。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到使用黄金、钻石储备到规划社会政策等许多职能，都被称做是"共同控制的领域"。对于怎样划分这些重要职能的权限，将由谁裁决，一旦联盟和共和国权限相抵触时怎么办等相关的问题，该草案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自治"实体的作用和权利未作明确规定，更没有体现保障人权的条款。各加盟共和国有可能脱离联盟的程序也不清楚。 〔427〕

接近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官员当时预估，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多数会很快达成五项协议。例如，苏共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草案公布的前一天告诉我说，他认为极可能有多达12个左右的加盟共和国赞成这个条约。[19]但当我看到草案全文时，我意识到这种预测是不现实的。

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参加很难形成任何形式的联盟，但两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对草案的某些部分表示了保留意见；而且他们同时还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着另一个协议的谈判，这个协议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戈尔巴乔夫介入的联盟条约的基础。

在条约草案发布之前，我曾到基辅访问了几天。在那里，乌克兰议会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告诉我，虽然他将参加起草联盟条约的会议，但除非乌克兰订定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否则它不会认可任何新的条约。当我问道新宪法何时能够通过时，他回答说："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同一天，叶利钦为签订一份俄乌双边协议也来到了基辅。

访问基辅期间，我不仅先后拜会了克拉夫丘克、最高苏维埃主

席斯坦尼斯拉·古连科[13]及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坚持邀请了几位来自“鲁克”的领导人共进晚餐。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已开始对“鲁克”领导人的行动施加压力，而我认为使他们得到官方重视十分重要。他们对拟议之中的联盟条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根据克拉夫丘克提出的条件衡量尤其如此，但他们预料，任何联盟条约都只是在走向完全独立的过渡阶段发生效力。

〔428〕 我问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一种切实的选择，来自基辅一个工业区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里莎·斯科里克回答说：“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在几年之内实现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计划用 3—5 年的时间实现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乌克兰议会中不占多数，但我并未视这种看法仅为一种梦想。如果莫斯科试图继续推行其帝国统治，难道不会有很多共产党人转向他们一边吗？

至于俄罗斯，叶利钦和俄罗斯民主派从草案一出台即对之开始发难。业已成为反对派联盟的“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于 12 月 8 日和 9 日集会，宣布该草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侵犯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在采纳新的俄罗斯宪法之后，由各加盟共和国直接谈判制定条约。其立场同克拉夫丘克 11 月向我描述的乌克兰方案不谋而合。

当总结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条约草案的反应时，我的结论是只有中亚各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与已公布草案类似的条约，而它们甚至也会要求作些修改，从而使其在对外政策、对外经济联系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的支配权。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支持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但俄乌两国只有在采纳了新宪法之后才会同意加入。我于夏季从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处听来的那类想法似乎正在迅速传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在

寻求完全独立，独立之后它们才会考虑建立某种松散的联邦关系，而摩尔多瓦虽不得不对付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但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甚至对谈判一项新联盟条约也毫无兴趣。

对于许多加盟共和国而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争具有关键意义。在这场争论解决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玩时间游戏，并避免作出任何最终承诺。戈叶两人的冲突扩大到了谈判的实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代表向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大部分自治共和国许诺，将在新的联盟中给予它们“成员”的地位，由此它们在许多方面将享有同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的权利，借此向叶利钦施加压力。然而，各加盟共和国都认为，这一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运用这一策略的结果也证明是短视之举。戈尔 [429] 巴乔夫正在失去以自愿为基础构筑联邦制联盟的有利时机。由于试图对俄罗斯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他失去了无法挽回的时机。

谢瓦尔德纳泽敲响警钟

1990年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原计划在这一天向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然而，当谢瓦尔德纳泽站上讲台时，他却庄严地宣布，这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简短和最困难的讲话”。他先是简要提到了一些有关苏联对伊拉克政策和被指称向海湾派遣苏联军队的“计划”所引发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侮辱性和煽动性的。他抱怨在高层缺少对他的支持，他特别暗示说，议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试图整垮他。讲完这些之后，他投下了他的重磅“炸弹”：

民主主义者们，我将直言不讳。民主主义者同志们……你们在临阵退缩。改革家已躲在幕后。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谁都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种独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独裁者，或出现什么样的王朝。

我想接下来声明：我准备辞职……如果你们愿意，就让这成为我的贡献，成为我对独裁统治进击的抗议吧。[15]

那天上午，我正在距离莫斯科两个小时路程的杜夫纳“科学城”，当我为赶午餐招待会返回斯帕索别墅时，我的新任副手詹姆斯·柯林斯在门口告诉了我上面的消息。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3月份时曾经作出了暗示，但是我仍然十分吃惊。“他是说已经辞职了还是准备辞职呢？”我问道。

“听上去是最后的决定。他的原话是‘Я хоху в отставку’（我准备辞职）。”（原文俄文有误，未改。——译者）

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之一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来参加了午餐招待会，我们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声称在听到演说之前，他对辞职一事毫不知晓。我问他是否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有可能被说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回答说：“按我对他的了解，这〔430〕是不可能的。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表演。这是关系其名誉的大事。”

的确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并不那么了解他。那天下午，代表大会复会，我现场聆听了几位德高望重者的发言，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和编辑谢尔盖·扎利金。他们建议不接受他

的辞职，并要求他继续担任外长职务。而其他人则对他大加攻击。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是对谢瓦尔德纳泽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几天前他就说过，他们的目标先是巴卡金，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又语无伦次、不着边际地发泄了一通。罗伊·梅德维捷夫60—70年代曾被认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保守派阵营。他自以为是地评论说，一个过于敏感的格鲁吉亚人已没有能力去承受批评。不过，听众都在等着戈尔巴乔夫讲话。上午的会议上，他显得既惊讶，又似乎有些愤怒。此时已过了几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并拿出自己的意见。

走上讲台时，他看上去就像腹部受到重击刚有所恢复的样子。戈尔巴乔夫首先讲道，最使他寒心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未事先告知他打算辞职的想法。尽管他在谢瓦尔德纳泽发表辞职讲话后与其通了两次电话，依然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其提出辞职，但他得出的印象是，谢瓦尔德纳泽自认为是在同各种“利用所出现的困难并对改革政策发难”的企图进行着抗争。既然如此，他就更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了解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故而，戈尔巴乔夫只能谴责谢瓦尔德纳泽的行为和其采取逃避的方法。

接着，戈尔巴乔夫继续嘲笑独裁统治可能即将来临的想法。他本人并不期待获得独断的权力，仅希望取得领导整个社会完成转变所必需的那种权威。至于其他人，他说：

> 作为总统，我拥有广泛的信息，但迄今尚没有任何消息证实某人在某地准备把一个军人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加在我们头上……不，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17]

[431] 当代表们步出会场时，议会宫走廊上一派沉闷气氛，少数极端爱国者炫耀性的欢呼声使这种沉闷气氛愈显浓厚。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皱着眉头快步走向衣帽间的时候，我跟了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未来。

他答曰："这种政治迫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还记得你们国家的麦卡锡主义吗？它带来的只有破坏。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同样。"

就在那天晚上，电视全文转播了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时我看得全神贯注。要捕捉两位政治家讲话时反映出的那种情感抑制力，非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能力不可。五年半以前，他们共同开创了一项艰难的事业。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在使对外政策目标适应改革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战线上却正明显退却。我自信非常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知道他并非是一个逃兵。他对批评意见显然比较敏感，但只要有赢的希望，他就一定会进行反击。他一定是察觉到，戈尔巴乔夫准备牺牲他去迎合那些正为采取强硬行动而聚集力量的强硬派。

奇妙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声明所作出的反应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打算提名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副总统。但这一新职位并无明确职责。若议会批准这一提名，也实属明升暗降，更何况要使议会批准还必需经过一番令人不快的争斗。[13]

一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谢瓦尔德纳泽可能会更换工作。认为他会是理想的总理人选，果真如此，以其对非俄罗斯民族态度的关注，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不过，一旦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右翼政府，就不可能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出来领导它了。

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很显然，谢瓦尔德纳泽希望他要

求“民主派”及时站出来再次发挥作用的呼吁能使他们团结起来。难道他得到了有关政变计划的消息？或戈尔巴乔夫本人僭取独断权力的计划？我不得而知。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同意在继任者获任命前再在对外事务部呆上“几天”，但他不可能马上得到一项新的任命。为得到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行为的进一步解释，我拜访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谢尔盖·塔拉申科。塔拉申科告诉我，关于辞职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严肃地考虑了一年左右。加快他作出决定的原因，在于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感到苏联政府中放宽使用武力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他不愿与之同流。让他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当军方违背某些由他谈判达成并经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批准的军控协议时，后者很少给他以支持。[19]卢基扬诺夫甚至扣压外交部递交的待批条约，每每到最后一刻才将其交到代表之手，他还虚伪地指责外交部未能及时递交，以此在最高苏维埃破坏谢瓦尔德纳泽的形象。他还计划在谢瓦尔德纳泽出国因而无法回答所提问题之际举行听证会。塔拉申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坚定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卢基扬诺夫就不会这样做。 〔432〕

塔拉申科证实，除妻子、子女、塔拉申科本人及另一位助手特伊姆加兹·斯捷潘诺夫之外，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应该辞职。

我问塔拉申科，谢瓦尔德纳泽有没有得到即将发生政变的具体消息。他回答说，谢瓦尔德纳泽并不知道任何具体的阴谋，但感到存在着决定以武力掌握国家命运的团体，而戈尔巴乔夫目前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虽然戈氏也许认为自己正赢得时间，但最后他还是要被他所依赖的人抛弃。考虑到这些因素，谢瓦尔德纳泽不可能继续留在政府里。他觉得从外部聚集民主力量能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

所有各派都向我们保证，苏联的对美政策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再次保证不会改变谢瓦尔德纳泽所推行的政策。[20]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告诉我们，如果对美苏关系的建设性进程已不可逆转这一点没有把握，他就不会提出辞职了。三星期后，当戈尔巴乔夫提名谢瓦尔德纳泽的继任人时，他挑选了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433〕据说，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能力，也是希望消除美国的疑虑。

我们非常了解别斯梅尔特内赫，对之甚为尊敬。他曾长期在华盛顿供职，后在莫斯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外交部长后，很快就将别斯梅尔特内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1990年初又派其担任驻华盛顿的大使。

其才智、坦诚、及建设性的态度与熟知美国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了苏联利益的真正有效代表和广受欢迎的同行。70年代初以来，我就一直在同他打交道，当时我是国务院苏联事务部主任，他是苏联驻美使馆的政务参赞。很明显，“萨沙”——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冷战时期就已是一名很突出的苏联外交官了。虽然他从未对苏联政策表现出不忠，但他能理智平和地讨论问题。我们的感觉是，甚至在不可能同意我们观点的时候，他也能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并会准确地向上汇报。

葛罗米柯有一次给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捎来了一个个人口信，要求他禁止在美国上演一部由欧洲拍摄但莫斯科认为失礼的有关列宁的影片，对此我非常生气。在参加那天晚上苏联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我把别斯梅尔特内赫叫到一边，责怪他未向莫斯科说明

此举是何等的不智。他不去为此口信辩解，而是评论说，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接着，他推测道，对列宁作出公正的评价也许要等10年或10年以上的时间。

就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而言，在勃列日涅夫政权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自由思想进行抨击时作此评述自是非同寻常。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并在其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诚实的人。

我是在1月中旬得知戈尔巴乔夫挑选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替谢瓦尔德纳泽这一消息的。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到别斯梅尔特内赫获得任命的几个星期里，虽然美苏关系出现了紧张，但其诱因与苏联的这两位外长皆无干系。

新的副总统

〔434〕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震荡之后草草收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大多数宪法修正案，也勉强批准了根纳季·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的提名。[①]

亚纳耶夫50刚过就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领导职务，后又担任官方工会的领导。我在70年代就见过他几次，那时由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组织的各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同苏联的青年“政治家”举行过几次会议，而且1986年在拉脱维亚的杰马拉召开的肖陶夸会议上，他还是组织会议的苏联官员之一。近来，我没有看到过他，原因是我们与受控制的苏联工会没有保持联系。尽管他早先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但在他担任副总统后不久我就提出了拜访的要求。

他在共产党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待了我。虽然他最终要搬

到克里姆林宫去办公，但此时副总统的办公室尚未准备就绪。我们进行了愉快、轻松的讨论，他向我保证，戈尔巴乔夫决心继续推动改革进程，也了解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不过，亚纳耶夫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坚定的领导。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还感到他稍微有点紧张不安。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停地抽烟，抬起的手有时也微微颤抖。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苏联的副总统对会见一名外国大使会感到紧张，唯一的结论是他不善于同陌生人轻松相处，即使是对于一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最不寻常的特征。

起初，我难于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后来才想到他之所以同叶利钦分手即是其嫉妒叶利钦的声望使然。很明显，他不可能容忍在公众影响方面有可能成为对手的高级官员。而根纳季·亚纳耶夫在这方面显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能加强总统职务威信的人，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如果副总统一定得是位无足轻重之人，他为什么要费力去修改宪法呢。

〔435〕

经济危机加深

1990年岁末，经济似乎在加速下滑。在这个困难的年头，尽管谈论的都是改革计划和“反危机”方案，但形势仍在继续恶化。

就在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之际，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独自实施这一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大部分经济企业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中央各部委的手中。于是，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法律之争便接踵而至，由此引

起了进一步的混乱。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宣布当俄罗斯的法律同联盟的法律出现冲突时，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只有经俄罗斯议会的批准，联盟的新法律才能生效。为与之抗衡，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政令，宣布在专门解决权力分配的联盟条约生效之前，苏联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关税收与分配的争论尤其耗时费力。俄罗斯宣称保有在其境内征集全部税收的权力，而且仅向联盟财政转交不足通常数目1/5的税收。在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2月27日，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告知大会，联盟与俄罗斯之间关于预算的谈判已告破裂。

戈尔巴乔夫随后加入了辩论，指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只批准为1991年苏联预算提供234亿卢布，比1990年的上缴额竟少了1190亿卢布！他警告说，除非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正常的岁入分配，否则苏联就会解体。[22]大多数人认为，叶利钦是要证实戈尔巴乔夫已别无选择，只能同他妥协，并在联盟财政崩溃前屈服，但对此谁也不能肯定。叶利钦非但没有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留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反而飞到了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

在1990年即将结束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其新获得的权力发布大范围的政令，使局势恢复某种秩序。其中有一政令指示所有企业和部委在1991年继续执行1990年的契约。其目的在于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和各企业改变中央计划部门所作安排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该政令的作用可谓与市场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它保留了中央计划体制的绝大部分特征。 〔436〕

其他政令规定了重要的新税种：5%的销售税；向企业征收设立“稳定基金”的种种新税。销售税在1月1日开征，不习惯附

加销售税收的公众很快就将之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年礼物”。其实，苏联传统上的税收一直很高，只不过其税收体制使公众不了解自己交纳的数目罢了。戈尔巴乔夫的销售税违反了传统的隐蔽征收形式，因而加深了公众对其领导的不满。

直到1月份的第二周，苏联才和俄罗斯达成一项预算协议，1990年12月出现的资金危机遂得以缓解。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其两名助手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夫在1月2日刊于《消息报》的文章中，归纳了大多数观察家都已感觉到的种种挫折和失望，严厉指责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他们嘲笑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关于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破坏力量”的观点，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体制本身和其受到不当管理的症结。文章预言政府靠提高税收和冻结种种经济关系来治愈经济的尝试定会失败，还会导致生产进一步滑坡，通货膨胀加剧，预算赤字增大，以及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

接下来，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敦促政府采取类似于他们先前在“500天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着手进行工业和农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建立商品交易、股票交易机构和真正的控股公司；打破生产垄断；控制预算赤字；逐步放开价格，发展职业介绍所和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分配”经济上的权力。

〔437〕

毕恭毕敬

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就有拒绝接受经济援助的传统，其

思路是这些援助会成为外国施加影响的潜在因素。甚至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也拒绝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但当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发生地震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多年来首次感激地接受了外部提供的许多援助，并在向亚美尼亚运送装备、生活用品及专家过程中给予了通力合作。

当国家经济条件恶化时，官方的立场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到1990年秋季，戈尔巴乔夫不仅开始直接呼吁外国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而且还呼吁赠送食品和药品。

我们在使馆工作的经济学家并不像苏联政府那样沮丧。他们认为，尽管有些地方在饮食方面可能会受到些限制，但苏联有足够的粮食避免发生饥荒。总的说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食品多么匮乏，而在于分配体制中固有的浪费和不稳定。只要在粮食加工和分配领域实行私有化就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可惜，在这方面根本未作任何尝试。

药品短缺现象相对要严重些。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向来资金不足，它的制药业不仅非常原始，而且是该国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还有一点，在苏联集团的经济合作组织经互会中，东德是专门从事医药生产的，苏联使用的大部分药品都需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随着德国的统一，此类进口开始要求支付现金，因此受到急剧削减。与此同时，为限制环境污染，苏联的许多化学工厂被关闭了。结果，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出现危机：在许多地方甚至连阿斯匹林都非常匮乏，至于现代药品也就只有那些权贵和有海外亲朋的人可以享用了。

在以使馆名义向华盛顿提交的建议报告中，尽管我们指出向某些确实存在短缺现象的地区和孤寡老人等弱势团体提供食品援

〔438〕助是有益的和可取的，但并没有预测饥荒情况。无论如何，要使援助发挥效用，就要将其直接运送到受援者手中，而非纳入苏联的集中分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既无效率可言，又非常腐败，大部分援助物品往往是要么被运往黑市出售，要么就成为掠夺物。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药品援助，除这里讲的情况外，量比较大的援助可通过飞机运送。鉴于欧共体已着手一项主要提供食品援助的计划，并可能通过火车来运送，我们建议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药品援助上。

最终，华盛顿拿出了一项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总统倡议。尽管名称动人，但所得政府资金非常有限：最初只有500万美元用于支付私人公司捐赠的运输费用。“希望工程”这一非盈利组织承担起了募捐和向最亟需援助的关键城市组织空运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心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苏联医院的病人也因而受益。然而，价值仅仅数百万美元的药品在一个如此紧缺的国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由于担心即将来临的冬季会发生异常情况，苏联官员在支持外国的援助努力方面采取了少有的合作态度。戈尔巴乔夫指定第一副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负责协调外国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迅速就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规则达成了共识，苏联政府同意捐赠者有权直接向受援者，甚至向当时仍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区运送援助物资，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也许是最容易的一次谈判了。官方的合作不仅是对形势日益恶化的绝望之举，而且也是观念出现深刻变化的一个标志。以前，苏联官员(及其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官僚)常常宁愿让老百姓受苦，也不愿让外国人接近他们。

看到西方这么多的政府和私人组织开始向苏联亟需援助的地

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感到很受鼓舞。这证明铁幕两边相互为敌 [438] 的现象已经淡化——实际上确已消失。这也使苏联公民感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未忘记或嫌弃他们。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极为重要的，并且是鼓舞人心的事情。

不过，我承认，即使是一项计划周密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也难免包含着危险。首先，它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其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要求进行内部改革。其次，现实很少能与宣传相符。以苏联这个面积巨大、情况各异、滥用权力的国度的需要衡量，大部分可行的援助计划必定都会嫌小。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人根本见不到大吹大擂的援助，从而生出某种受蒙骗的感觉。第三，这类计划还常常给捐助国留下错误的印象。许多人的印象是援助的数量远大于实际的需要，于是，当这些援助不能改变受援国的状况时，对各类援助的支持就会下降。

我当时认为，这些危险不能成为反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据，而是对期望过高的告诫。政府和公众都需要了解，对于一个亟需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的国家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并不能替代组织良好、计划周密、协同一致的努力。一方面，苏联面临的问题并非外部世界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外部世界带来的；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确有浓厚兴趣。如果苏联和其各构成部分不能建立起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作为全面的参与者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就会再次对其邻国和美国构成安全问题。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事。但是，华盛顿从未对苏联在过渡时期的种种可行选择进行过认真研究，而且，总统一心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一个统一战线，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我们的西欧盟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且国内问题也使其无暇它顾。日

本政府将其对苏政策同归还北方四岛挂钩，因而也受到了束缚，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虽属公正，但靠直接压力不可能见到成效。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向其西方伙伴征求建议时，他们既未使其理解也不肯向其清楚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他只有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并开始引进市场机制，才会得到西方的帮助。相反，西方的领导人往往只满足于发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声明，给戈尔巴乔夫个人以一般性的支持。例如，据切尔尼亚耶夫讲，科尔总理11月9日在波恩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向后者作了如下保证：〔440〕

> 我十分郑重地告诉阁下，无论是作为德意志联邦总理还是普通公民，我，赫尔穆特·科尔，都对您，戈尔巴乔夫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您，而不是您周围的其他任何人……因此，在您努力实现您的最终目标之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同您一道工作。您可以放心，在这段坎坷的道路上我将一直站在您一边。[23]

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10天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会议上会面时，布什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道："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你。"[24]

在这两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均被问到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问题。他虽自称在努力寻求合作，但声称，面对叶利钦的"高调、煽动、对抗"政策，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25]无论是科尔还是布什，似乎都未想到得体的做法是要向戈尔巴乔夫暗示，避不履行沙塔林改革计划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改革承诺提出疑问，他们也未意识到有必要向其提出警告：如果高压导致国家分裂，外部援助将于事无补。

当然，他们有种种理由感谢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并觉得在其国内问题引起讨论之际，他们不应对之采取责备和教训的口吻。但实际情况是，叶利钦的国内计划要优于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而且后者如无前者的合作肯定要失败。当戈尔巴乔夫加快同这样一个政治对手决裂之时，向他个人许诺他将会获得无条件的支持不仅是轻率的，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其后果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以为，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这也使他无法认识到，一旦他自己的政策带来错误的行为，任何外来的支持都不可能挽救他。

如果西方领导人在对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其国内政策趋势表示关切之意，就会体现出一种更实在的友好姿态。援助的承诺不应是针对他本人而作（尽管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希望如此），而是应该面向将推动苏联走向民主和市场的各种政策。其内含的信息应该是，“我们很想提供帮助，但如果你继续沿〔441〕着目前的道路前行，我们就无法再提供帮助了”。如果西方的领导人确实打算这样讲，定会在脑海中形成实质性的救助腹案。

难道是他们对苏联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理解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的含义？不，这根本不可能。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都在详细报告我已列举过的那些事件，而且，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外交人员对这些事件的含义都有普遍的共识。不存在任何“情报失误”。事实上，无需求助秘密特工和通信窃听就完全可以了解局势。由众多外交官和记者提供的现成信息即可满足进行政治判断的全部需求。

如果说有理解上的失误，也是存在于西方领导人脑海里和感情之中的事。由于精力主要放在了其他事情上，且迷恋于苏联领导人这位新朋友，他们并不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愈发岌岌

可危的消息，而且本能地否定了他本人至少应对其困境负部分责任的想法。就像一个秘密俱乐部中的青少年一样，他的敌人也成了他们的敌人，个人相互间的承诺成了衡量忠诚与否的标准。

当戈尔巴乔夫亟需连贯性建议和有助于实施一项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的国际结构时，西方想的却是要去享受果实。而到1990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突然向危险的方向倾斜，所凭借的即是他的外国朋友作出的天真承诺：他们将会全力帮助他。

“外部鼓动者”的逃避

当一个社会在力争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时，蛊惑民心的政客往往会指责说，所谓的问题并不真正存在，而是由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捏造出来的，借此来回避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模式，切勃里科夫不时地公开抱怨说，美国正采取隐蔽行动来破坏苏联的稳定。在他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取代之后，此类公开指责才变得少起来。毕竟，戈尔巴乔夫的利益所在，是使全国相信其对外政策在消除同美国关系的紧张因素方面正取得成功。

〔442〕1990年，人民代表大会中某些喜欢吵闹的沙文主义者，特别是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和尼古拉·彼得卢申科，开始指责中央情报局为颠覆东欧并使其脱离苏联阵营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阿尔克斯尼斯还声称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在阴谋分裂苏联。尽管一伙斯大林主义者和极端沙文主义者不断重复这些指责，甚至指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中央情报局的佣金，但并没有多少人对之给予特别重视，他们知道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

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克格勃再次公开指责西方秘密机构正试图瓦解苏联。12 月，克留奇科夫的两次讲话都谈及美国的颠覆行为。这些指责极不恰当：不仅荒谬，且有悖苏联的对外政策。这类言辞只能削弱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能力实践其本人所签协议的信心。

到 12 月底，我要求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会面讨论这件事。对能否让克留奇科夫保证停止制造谎言，我不抱幻想，但我清楚，如不对谎言立即予以驳斥，苏联官员就会以为这种甚至最无耻的指控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我知道至少切尔尼亚耶夫了解这类言论会对美苏关系造成何种伤害，希望他能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命令克留奇科夫停止此类活动。

我和克留奇科夫约定元旦一过即举行会谈。1 月 3 日下午，我来到新的克格勃大楼，这栋大楼位于铁匠桥附近，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鲁比扬卡。在克留奇科夫宽敞的办公室中，我和他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相对而坐。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我告诉他之所以要求同他会谈，原因是我们对他的一些指责感到困扰。接着，我拿出了他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一篇讲话，并在作出评论之前先引用了其中的几段话。

对于他有关美国情报机构正隐蔽地破坏苏联稳定的指责，我谈到，如果是其下属作出的这类指控，他就应该解雇他们，因为不会有真实的证据证明这种指责能够成立。我们的现行政策是尽力支持苏联有序地向民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转轨，苏联不稳定不符合这一政策。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收集经济信息是一种危险的间谍行为。我〔443〕向他解释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有关硬通货储备的数据和

原材料、燃料及食品的目录清单都是向公众公开的，而且政府与众多私人机构也要定期发表。这种信息对于正常的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如果苏联希望作为一个完全的伙伴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必须学会发布这类信息，而不是把收集这类信息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因为他拿“自由电台”作为中央情报局活动的例证，所以我指出，该台已有10多年中断了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其活动也无秘密可言，完全由国会公开资助。其政策也是禁播煽动性的评论。如果在广播中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人提醒要其注意有违上述原则的行为。自由电台的管理机构愿意采取更正行动。

有关苏联正在成为无耻外国商人的牺牲品的指责，我指出，它不仅不准确，而且会增加苏联实施其公布的吸引外国投资政策的难度。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定比例不成功的商业交易，商业行为也不会总是尽善尽美，但有商业机制会去进行调节。把偶然出现的不幸合同看作是对付苏联的国际阴谋的证据，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外国企业可能也会发现，苏联的部分企业存在着至少相同数量的未履行合同事件，但谁也没有荒谬地指责这都是精心策划的旨在破坏西方政府的阴谋。

对其关于美国同一些工人组织保持隐蔽联系的指责，我指出，我们同这些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公开和正当的。我们既没有保持秘密的关系，也不想利用这些运动；我们的政府官员只希望去了解它们，以使我们的工会去同它们进行合作。

在对其讲话结束评论之前，我指出，那种把苏联的问题归咎于各种外来影响的企图不仅未切中要害（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本土），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克留奇科夫对我的讲话听得很专注。当我结束讲话时，他顿

了一会儿，然后直视着我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仔细 〔444〕起草的，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调子。对于所有的论断他都有证据。不过，他清楚，破坏苏联的稳定并不是美国的政策。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说到情报组织的活动，不可能每次计划都要通知大使们。他说："有些责任我们并不交给我们自己的大使，我肯定中央情报局亦是如此。"

我也清楚，苏联的大使们常常声称自己并不完全掌握克格勃在其派驻国的活动，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克留奇科夫竟然如此草率地证实这一情况，仿佛这应该是一种常识似的。这甚至更清楚地表明，他以为中央情报局将系统地从事有悖于美国政策的行动：这种说法更适合克格勃而不是中央情报局。虽然他应该了解美国的运作程序，但就大使消息是否灵通这一点，我决定对他的论断予以驳斥。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序如何，"我说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在贵国的所有活动都会通知我。事实上，没有任何旨在破坏苏联稳定的活动。"

他终止了这个话题，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说，当时苏联"极易受到伤害"，(其含义是)有些过度敏感。他说，他个人欢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准备与美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直接合作：例如，同贩毒现象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不过，他也意识到间谍活动会继续存在。

我告诉他，我同他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情报搜集问题，而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或暗示出的所谓隐蔽的政治行动的问题。

在我离去之前，克留奇科夫问我如何看待他们面临的形势。我告诉他，老实讲，我认为情况很严峻。许多人都在抱怨经济状况及其不妙的前景，可我认为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则是那些与种族关

系有关联的问题。由各种因素导致诉诸武力的倾向特别令人担〔445〕心，因为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最终会出现一次吞噬掉每一个人的大爆炸。因此，我们美国人希望这些问题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得到解决。从长远来看，我坚信，只有向其主要民族证明继续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与它们利害攸关，苏联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生存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它们相信这一点。但如果对其采取强制手段，它们就会失却信心。另一方面，如果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力，允许它们在不受中央压力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安排，它们就会确信继续留在苏联内部在经济上和安全上都有好处，从而就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体。

他向我表示了感谢，对我的这些看法也未予置评。于是，我直接问到，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一些加盟共和国进行总统直接治理。他回答说，他个人的意见是有这个必要，但又补充说，总统直接治理并不意味着逮捕或军事高压。

第二天，我拜访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我曾经请求把约会安排在此前的那个星期，但被告知他当时很忙（毫无疑问，的确如此）。然而，我怀疑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谈论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切尔尼亚耶夫总是一副平静和胸有成竹的样子，即使是在讨论易于引起争论的问题时亦是如此，鉴于过去两个星期刚经历过紧张和刺激，此时他显示出的轻松尤其予人以深刻印象。我猜想他在假期一定是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我首先问他戈尔巴乔夫准备怎样对待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切尔尼亚耶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谢瓦尔德纳泽离去，

且一直竭力劝其留任或承担其他工作，但他也意识到谢瓦尔德纳泽已下决心不再继续在政府供职——事实上，考虑到自身的荣誉感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戈尔巴乔夫已决定顺应谢瓦尔德纳泽离职的心愿。当谢瓦尔德纳泽出乎意料地宣布辞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事先未同自己商量非常沮丧。此后，他才开始明白，谢瓦尔德纳泽避不同自己商谈是因其离职的决心已定，担心他予以劝阻。

切尔尼亚耶夫强调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即苏联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其核心仍是同美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当我问到关于苏联的总体形势这一问题时，切尔尼亚耶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的感觉是比两个星期前改善了很多。局势看上去在趋向稳定，预算危机似乎也已解决（事实上，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才同俄罗斯达成协议）。 〔446〕

对于刚发生的内务部队占领里加国家印刷厂事件，切尔尼亚耶夫称之为"令人恼怒"之事，并说他肯定戈尔巴乔夫不会被卷入其中。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对于是谁下令采取的行动怎么会有疑问：内务部部长普戈掌管着这支部队，作为一名拉脱维亚人和该地区前共产党书记和克科勃首脑，他同拉脱维亚的局势演化一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想起克留奇科夫在前一天还评论说，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我就问切尔尼亚耶夫是否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只有在某一地方出现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形势，才会依据特定的权限采取这类行动。即使真采取这一步骤，也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警察或军队来镇压，采取如1988年将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流放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那种做法的可能性会更大。尽管最后会采取何种行动暂时还不能肯定，但不会出现逮捕、军事管制或解散立法

机关这类现象。

这种解释不足以使我宽慰。任何“中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议会的企图毫无疑问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如果人们坚持这样做，逮捕、军管及流血冲突几乎可以肯定会接踵而至。虽然克留奇科夫对自己的态度毫不隐瞒，但他认为有必要在“某些地区”实行总统直接管制这一肯定说法也足以令人担忧了。听到切尔尼亚耶夫竟承认可能需要这样做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一定也在对此做着非常认真的考虑。

在离开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之前，我告诉他，我希望戈尔巴乔夫总统不要相信阿尔克斯尼斯之流有关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实际上，我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直接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又觉得直接问这个问题有些不礼貌）。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有些右翼分子是理智的，但阿尔克斯尼斯根本就不理智，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布什总统对他是支持的，而且不希望他垮台。切尔尼亚耶夫还提醒我，不要认为阿尔克斯尼斯是军队或者上校一级军官的典型代表。他声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阿尔克斯尼斯那样的想法。

〔447〕 我当然也知道阿尔克斯尼斯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主义者，但我怀疑在苏联军官队伍中，拥有同他一样想法的人会远远超过我们或者戈尔巴乔夫所相信的数字。

我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向我作出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的保证和他对国内形势正趋于稳定的感受让我感到宽慰。尽管如此，但从11月中旬开始，苏联国内政策的调子确实发生了变化。难道戈尔巴乔夫真的没有改变大政方针吗？

切尔尼亚耶夫强烈否认已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那些大肆谈论"民主派"被"击垮"的人完全错了。他相信他们没有被击垮，只是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变得更加实际罢了。例如，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就在进行比从前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

当切尔尼亚耶夫讨人喜欢的助手塔玛拉·亚历山大洛娃把我送出中央委员会大楼时，我的感觉是，切尔尼亚耶夫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是准确的，但说国内形势正在改善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已转向强硬路线，而且，他对"民主派"作用的观察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时，我不知道他正在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任命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担任总理，这一点我是阅读了他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之后才清楚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愿意任命索布恰克任总理，并予以大力支持，就可能使改革派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上年度风云人物

从当选总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就直线下降。尤里·列瓦达的"全联盟公共舆论中心"的民意调查册就清楚地记载了这种持续下降的记录。1989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到1990年1月，这个数字降到了44%，5月份是29%，7月份是28%，而10月份只有21%了。[27]1990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46%，支持叶利钦的只有6%。[28]

〔448〕　关于叶利钦，当时有人认为到年底时他的威望已开始下滑。因为他既不能掌握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尚未准备修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设立总统职位，也不能有效抵制戈尔巴乔夫的计划。

至少有部分公众已开始注意到，他趋向于开空头支票；在压力面前容易改变想法；不能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几个星期都不露面。

即使如此，但他已显示出，他只要愿意就能阻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任何有限倡议。他支持改革派所倡导而强硬派共产党人非常痛恨的那些根本性变革。现在，他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许还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因为他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当选的领导人都保持着一种虽不够深入但却良好的工作关系。

戈尔巴乔夫要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要想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唯一的希望似乎有赖于他同叶利钦和民主派从事共同事业的愿望和能力。可是，回想一下 1991 年初的形势就可明显看到，戈尔巴乔夫当时非但没能认清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形势，而且其实际的所作所为恰与我的预测背道而驰。

他和我到底是谁看走了眼？是我错误地估计了他，还是他有了变化——或是他将再次及时调整战术，放弃共产党机器，组建反共的改革联盟？由于群情激昂，局势比 1990 年 8 月更为困难了。

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这对于一个四个月前还自信了解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件痛苦的事。

第十七章

〔449〕

预　演

此时此刻怎样才能取悦总统呢？……教别人撒谎，你就能当上中央电视台的头儿。搞垮整个经济，他就会让你当上总理。

尤里·切尔尼琴科　1991年1月20日①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尼古拉·彼得拉科夫辞去戈尔巴乔夫顾问一职时所作的解释　1991年1月②

罗纳德·里根是对的。这的确是个罪恶的帝国。

瓦连金·奥斯科茨基在莫斯科举行的声援立陶宛的示威游行中的讲话　1991年1月20日③

在1991年1月7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戈尔巴乔夫再次加紧了对立陶宛的控制，这次的行动比去年春天的行动更具有威胁性。国防部宣布正在向立陶宛派遣一支伞兵先遣部队，表面上说是去对付那些拒绝服兵役的立陶宛人。由莫斯科支持的联合阵线在维尔纽斯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立陶宛政府提高零售价格。当议会主席兰茨贝吉斯宣布推迟物价上涨的时候，总理普隆斯基涅提交了她的辞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随即接受了她的辞职。这时，戈尔巴乔夫利用维尔纽斯出现的政治混乱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戈尔巴乔夫于1月10日颁布总统令，把局势日趋紧张完全归罪于立陶宛人，指控他们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并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总统令责令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即完全恢复苏联和立陶宛〔450〕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废除此前通过的所有违宪法令"。④

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日益强硬，但是这个总统令还是令我感到震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 这个总统令除了加剧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外，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他正在为一场悲剧作准备——这场悲剧将会同时吞噬掉他本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受制于谢瓦尔德纳泽所描述的那些力量了呢？

立陶宛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苛刻的、毫无余地的要求；这个总统令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使用武力提供借口。事实上，不等立陶宛作出回答，在颁布总统令的次日即1月11日，苏联军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占领维尔纽斯的一些建筑物。这

些建筑物过去属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准军事“公共”组织，现在由立陶宛安全官员使用，另外还有一个新闻中心。

早在这些建筑物被占领之前，兰茨贝吉斯就向西方政府发出了痛苦的呼吁，要求它们采取“断然行动”，防止苏军入侵立陶宛。兰茨贝吉斯特别要求对立陶宛作出正式的外交上的承认，并且发表了苏联宪法不适用于立陶宛的声明。他尤其担心的是，国际社会由于过分关注伊拉克问题而忽视了苏联对立陶宛的镇压。

然而，华盛顿的目光并不仅仅是注视着海湾危机。甚至在美国官员看到兰茨贝吉斯的呼吁之前，白宫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已经谴责以伞兵相威胁是一种“挑衅，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他敦促苏联政府“停止恫吓的企图，回到谈判中来”。代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戈伯格召见了苏联大使，我也获得了指示，向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官员传递更加坦率和明确的信息。布什总统星期五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亲自提醒他我们的关注。

维尔纽斯流血事件

〔451〕

当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我接到了叶利钦办公室的消息，叶利钦本人希望1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同我见面。我非常想知道俄罗斯政府准备怎样阻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如果他不叫我去，我自己也可能会去约他。我当时不知道华盛顿的白宫官员曾经考虑过责令我拜见叶利钦，但是由于顾及此举可能会激怒戈尔巴乔夫，所以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忘了通知我他们后来的决定。

叶利钦出席约会通常都很准时，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却让

我等了10分钟。当他在会客室接见我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同主席团一道制定出了俄罗斯关于立陶宛问题的公开声明。他称之为“强硬的声明”，因为它谴责在立陶宛使用军队，要求不要在该地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动用从俄罗斯招募的军人。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自信知道答案。他望着我，仿佛我在问他为什么莫斯科冬天会变冷一样，然而还是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他们可以对立陶宛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动用武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对俄罗斯的议会动武。事实上，如果他们在对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我们就将成为名单上的下一个。”

叶利钦计划当天下午出席联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说他相信其他几个共和国的首脑也会和他采取相同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已经破坏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达成新联盟条约的努力。他认为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完成这件事情。

当我从叶利钦的办公室返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接到了贝克国务卿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一封信。当时还没有任命继任人，所以谢瓦尔德纳泽还在担任外交部长。但是，我们被告知那天见不到谢瓦尔德纳泽，所以我只好把信交给了负责对美关系的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奥布霍夫。国务卿的信件强烈呼吁缓解立陶宛的局势，明确地表示一旦使用武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452〕严重的损害。我让奥布霍夫尽快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谢瓦尔德纳泽（因为它是用英语写成的，所以还需要一个译本），而且我还让他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如果有什么消息要传达给贝克国务卿，我整个周末都等着为他服务。奥布霍夫向我保证说，谢瓦尔德纳泽会很快收到这封信，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还在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尽管尚未任命继任的新外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局势是如此严峻，如果他继续待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到周末，就很可能成为

“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中的一名成员。

事实上，尽管直到下一周的星期二才任命接替他的人选，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早在那个周末就已经停止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了。

在我拜见期间，奥布霍夫询问为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打前站的小组何时到达，这次访问原计划2月份进行。通常在举行首脑会谈之前的5—6个星期，一个小组就会先期到来，为会议日程和其他事情做准备。但是，这一次白宫对此出奇地平静。我告诉奥布霍夫我可以催问一下，但是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我怀疑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如此严峻的气氛中还会不会进行这次访问。

奥布霍夫扬起头，显得十分不悦，然后便故作惊讶，说我们竟然让“一桩内部事务”影响到首脑会议这样的重大事情。我告诉他说，他很清楚我们并不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情况视为“内部事务”，而且如果莫斯科的行动导致那里发生流血，很难想象首脑会谈会在那样的气氛下举行。我提醒他注意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并且要他力求使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充分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情的力量。

当晚，我非常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因为我希望听听在叶利钦对我评论过的那个声明中，俄罗斯立法机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新闻对俄罗斯的声明只字未提。国家电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显然已下了命令，对这个声明不予理睬。苏联电视忽视重大新闻事件的例行做法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种倒退行为证明戈尔巴乔夫以克拉夫琴科取代涅那谢夫的做法正在产生效果。

新闻广播对最近这些事件的态度是一个不祥之兆。以稳重的语调播送的新闻暗示，立陶宛秩序大乱是由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

〔453〕 虽然这一天白天很长，但是这一天夜晚显得更长。我被邀请去参加为纪念《莫斯科新闻》周刊发行 60 周年而在“旧历新年”——十月革命前使用的历法中的新年——举行的庆祝活动。邀请参加的时间是晚上 11 点，整个庆祝活动将持续到午夜以后。

我不喜欢深夜，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知道这种周年庆祝活动将更像是一次守灵而不像是一次晚会，但是我必须参加。民主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将会出席，而且此次庆祝活动将为我提供一个听取最新的政治小道消息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我的出席将象征着美国对改革的支持，表示我们同那些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人士站在一起。

叶利钦在一个保镖的陪同下姗姗来迟——他喜欢夹道欢迎的入场方式——身后跟着许多摄影师，并被引到了礼堂中我坐的那一排。他一个劲地朝我打招呼，坚持要我挪过去坐在他旁边以便交谈。他的保镖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为我调整了椅子。当我们进行简短谈话的时候，好几个电视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

他正利用我来传达一种政治信息，而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也像他一样在利用对方传达信息，否则我可能早就生气了。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正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商讨；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赞成他当天下午所作出的呼吁，即不要干涉立陶宛。

当天晚上，我听说反复无常的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将被任命接替雷日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个任命非常奇怪；帕夫洛夫既无政绩又无能力，不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率的政府首脑，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我问叶利钦此事是否咨询过他。他回答说他早就听说帕夫洛夫是候选人之一，但是两天前他还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帕夫洛夫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听说戈尔巴乔夫已

决意任命帕夫洛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不会反对这个任命。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此外，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下达明确的指示，任何一位苏联总理都不能实施需要进行的改革。

我又问他是否注意到了电视新闻对他关于立陶宛的声明不予理睬。他咧嘴一笑，大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对此应该怎样报道。"③ 〔454〕

正如我预料得那样，当晚的节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以后。幽默短剧一个接着一个，对白常常非常可笑，但是表演者们却没有喜剧情趣。虽然也经常传出笑声，但那是冷漠的勉强发出来的笑声。人人都表现得忧心忡忡。

当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宣布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才得以解脱。我回到斯帕索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突击队正在发起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战斗。就是这支部队在1979年12月24日突袭了喀布尔的总统府，并且暗杀了拒绝请求苏联提供"友善的援助"的哈菲祖拉·阿明总统。

谁下的命令？

当我被电话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桃红。半梦半醒的我把话筒从话机上取了下来。打电话来的是我的副手詹姆斯·柯林斯，他告诉我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建筑群在夜里已经被攻占了，人员伤亡惨重。虽然报告只是片断不完整的，但是显然有许多平民被打死了，数百人受了伤。而且有迹象显示，对议会大楼的进攻可能已迫在眉睫。绝大部分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坚持留

在大楼里面，数千平民聚集在外面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如果大楼遭到攻击，其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

整个上午不断传来各种报告。除了外国记者的报道之外，通过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从1990年3月起在该地区实行的外交人员禁令几个星期前已经取消了)，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目击报告。

中午时分，我为自己匆匆写下了以下的问题：

>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联邦委员会获得对这种做法的牢靠的支持。不等调查委员会到达[8]就开始这类军事行动，粉碎了两个一本正经的谎言，即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下达命令（这能让人相信吗）以及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难道说这一切大部分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些计划了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事情发生时他仍然担任外长一职呢？事实上，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维尔纽斯的最高委员会大楼有没有受到攻击。当我了解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俄罗斯各派力量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反应，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一事件了。我不能想象所有力量都会袖手旁观，但是我也怀疑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行动。

〔455〕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请柬，邀请我去同第一副外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会谈。我的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其他几国的大使同行们也被邀请参加。集体召见我们，又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这暗示着问题既重要又紧急。

我们集中在一个中等大小的会议室里，过去谢瓦尔德纳泽常

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议员代表团。科瓦廖夫是葛罗米柯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又高又瘦、态度和善，被公认为是一个西欧专家和严肃的诗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是代理外交部长了，因为他没有提到是奉谢瓦尔德纳泽之命。我怀疑是否谢瓦尔德纳泽本人拒绝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得不为戈尔巴乔夫做些辩解。

科瓦廖夫告诉我们他刚从总统办公室来，希望把总统的信息带给我们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当他翻阅笔记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而且他嗓音也在异常地发颤。他接着说道，总统希望让他的外国同行们知道，他对攻击电视台的行为不负责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全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国内纷争进一步扩大。他希望他的外国朋友们放心，他仍然决心继续进行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决心要避免流血冲突。

我有些吃惊，不是因为否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

此前，除了接到过一个电话提醒我布什总统将会强烈谴责维尔纽斯的暴行之外（此时在华盛顿还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没有收〔456〕到其他指示。但是，我认为对科瓦廖夫的声明不作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公众都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总统不久可能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从我个人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授权采取暴力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既然事情是这样，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总统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指出那些有罪的人将会受到相应法律的惩处。

科瓦廖夫向我们保证说，一定把我的意见带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另一个大使问道，不知道他理解得是否正确，即总统不知道使用暴力的罪犯是谁。科瓦廖夫看着他的笔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念过的声明。

当我们离开大楼的时候，我的一个同行问我是否相信戈尔巴乔夫未曾参与此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最难使人相信的就是他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个信息是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呢？对此我也难以理解。他不太可能希望加深人们的怀疑，即认为他已不再能控制他自己的政府了。

“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糟呢？”我的这位同行问道，“是戈尔巴乔夫策划了这次行动还是他失去了对武装部队的控制？”

“我不清楚，”我告诉他，“两种可能性我都不喜欢。”

当天，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苏联高级官员都没有对这场悲剧发表声明。然而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国防部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格内基·卡舒宾少将进行采访时，后者把所有罪责都推给了立陶宛人。据他说，民族拯救委员会反复要求立陶宛当局停止在他们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当这些请求无人理睬的时候，该组织就作出了志愿军事人员应该去控制电台、电视台的决定。然而，当这些人员接近这些建筑的时候，立陶宛非正规军朝他们开了火，于是他们就向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求援。〔457〕接着，他发表了针对立陶宛民选政府的长篇攻击性演说，指出该政府的做法违犯了宪法，特别是践踏了军人的权利。

这是自1983年否认苏联空军击落了一架韩国民航飞机以来，又一个愚蠢的妄图掩人耳目的故事。每一个目击者都同意是攻击

部队——他们不是来自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而是来自克格勃——首先向人群和广播大楼控制室及制作室中的人开枪的。但是，谁首先开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谁企图通过装备精良的军队夺取属于立陶宛政府的设施。

当戈尔巴乔夫保持沉默的时候，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他立即飞往爱沙尼亚的塔林，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缔约一方将“承认其他几个国家的国家主权”，禁止各自的公民参与“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武装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宣布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是作为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组成部分——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后一点，他们宣布这份声明将呈送给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的议会和政府。

叶利钦走得甚至还要远些。他向俄罗斯的军事人员发出直接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听从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平民开火的命令。他还向军队中的俄罗斯族人发出呼吁，要他们“记住你们自己的家园，你们自己的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你们自己的人民。对合法机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犯下的暴行会给俄罗斯自身带来危机，并且伤害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7]这比一天前他对我讲的话更加雄辩有力，他的话在整个国家上空回荡。

叶利钦已经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戈尔巴乔夫发起了挑战；现在他又对戈尔巴乔夫在违背加盟共和国政府意愿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控制军队发出了挑战。军事指挥官们都痛恨叶利钦，因为叶利钦曾对他们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提出过削减军事预算的计划，他们当然不会理睬他的呼吁。但是，在1月12日和13日发表的声明中，叶利钦开始提出来自俄罗斯的军人应该把最高忠诚献给

〔458〕他——俄罗斯的领袖，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双重权力的成分正在增长。

与此同时，更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由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保卫其民选领导人的人盾行列，维尔纽斯议会大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公然违抗保卫该地区的坦克车手的命令，后者使用麦克风命令人们下午5点以前离开，否则就会面临攻击。在立陶宛其他大部分城市里，甚至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举行了群众集会。里加的局势几乎和维尔纽斯一样严峻，示威者们开始在那里的议会周围修筑栅栏。声援立陶宛的示威游行席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帝国的其他许多城市。

戈尔巴乔夫于次日即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对维尔纽斯悲剧公开发表评论。令我沮丧的是，他的评论似乎是在为攻击者们开脱。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也就立陶宛最近的事件向最高苏维埃做了报告。他们发现的唯一问题是，顽固的立陶宛领导层对无法无天的行为听之任之。他们声称军队由于激怒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受到指责。

我看着他们在电视上的讲话，心里一阵阵恶心。于是，我写下了下面的笔记：

> 普戈、亚佐夫、甚至戈尔巴乔夫对昨天事件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命令似乎是一个下级指挥官根据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救援请求而下达的。戈尔巴乔夫说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凌晨3点被叫醒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可以相信的。但究竟是谁创造了条件使

这一切成为可能呢?谁向当地军事指挥官签发了空头支票呢?而且为什么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呢?

况且，民族拯救委员会没有任何合法地位。它的成员状况还没有被公布，而且戈尔巴乔夫昨天也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由哪些人组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军事指挥官根据一个不为人知的非法机构的“请求”而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的行为又怎么能被容忍呢?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被容忍了；根据今天几个发言人的话来判断，这次行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当的。〔459〕

让我们把这次事件同阿塞拜疆发生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控制权的事件相比较。军队镇压了那次事件，其根据是那是一种非法的夺权行为。然而这一次，一个诡秘的集团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的企图似乎获得了联盟政府最高权威人士辩护！唯一的问题是谁向谁下了命令……

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能逃避对当前形势的责任。他或者策划了这起事件，或者不负责任地创造了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或者被迫参与了整个行动。不管哪种可能性更准确，对于我们的政策的影响都是一样的：继续阐明进一步的冲突将会给苏联利益带来的严重后果。

许多人担心电视中心被占领后将会对立陶宛议会发动进攻，但是这种情形在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晚上都没有发生。似乎有人下令维持现状，不要激发进一步的暴力——至少暂时要这样。然而，电视中心并没有归还给立陶宛政府，拉脱维亚的政治紧张也不断加剧。刚刚成立的拉脱维亚民族拯救委员会（其领导者是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的一名发言人要求解

散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把权力转移给该组织。[8]

其他人则要求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实行总统直接管辖。我想起了10天前克留奇科夫对我发表的评论。整个事件似乎都是以民选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为由，为“中止”民选政府做好准备。我所不清楚的是，究竟戈尔巴乔夫是计划的后台老板呢，抑或这是一个迫使他采取行动的阴谋。

星期二，戈尔巴乔夫就立陶宛的形势又一次发表了演说，但是对在维尔纽斯施暴的军队未做任何批评。与此相反，他继续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立陶宛人身上。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和军事机构继续呼吁他在该地区采取直接管辖。

对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谴责星期天早上发生在维尔纽斯的暴行一事，我并不是唯一感到沮丧的人。六个星期前刚被解除内务部部长职务的瓦季姆·巴卡金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中第一个对[460]这一事件公开表态的人。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首先，我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总统为什么不把他与维尔纽斯事件的关系做一明确的、毫无掩饰的澄清。他作为总统的所作所为，他要求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以及尊重人权，所有这一切与夜晚采取夺取权力的企图毫无关系……

其次，我不能理解的是，议会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地抱怨缺乏信息……他们知道谁掌握着信息，应该去问谁。事实上，在作最后分析的时候，竟然缺少资料来证明是谁首先开的火……重要的是这一使许多人丧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

> 违宪的。很明显，任何将领听从街头人群或者自封的委员会的命令都是违宪的，不管这些群体的呼声有多大。[9]

这是我在公开刊物上看到的唯一一份由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员发表的准确的法律判断。巴卡金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要在法制的基础上立国，但是又不情愿或者无法去承认明显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开始作出更为广泛的结论。1 月 15 日星期二，维塔利·波特尼科夫在刚刚创建的《独立报》上撰文写道，究竟是谁下令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的问题总是纠缠不清，它表明"苏联权力的瘫痪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瘫痪的权力"。他还把苏维埃制度比作垂死的章鱼，虽然还在蹦跳折腾，但是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触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煮熟。[10]

波特尼科夫描绘的情景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能肯定有多少个触手已经被煮熟了。有一些也许只是麻木了，还可能会再次向外出击。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正在迅速地下降。他往往摆出一副恫吓和威胁的架势，然而还没有实施威胁就停止了行动。通常，他不去实施他的威胁是明智的，但是既然如此，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出威胁。

他对南奥塞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区）日趋严重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些奥塞梯政治领导人开始谈论正式脱离格鲁吉亚、同他们的北奥塞梯（属于俄罗斯联邦）兄弟结成联盟的时候，新当选的格鲁吉亚领袖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逮捕了他们，未经审判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一开始双方的非正 [461]

规武装人员在南奥塞梯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当奥塞梯人开始把格鲁吉亚人驱逐出本地区的时候，加姆萨胡尔季阿便派出了格鲁吉亚正规军。他们在隆冬封锁了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造成了该市市民的极度困苦。在格鲁吉亚的眼中，奥塞梯的政治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后者正试图以肢解相威胁迫使格鲁吉亚继续留在苏联。

戈尔巴乔夫没有尝试向双方施加压力，使其达成妥协以解除危机的办法，他的选择是发布自己不可能去实行的总统令。1月7日，他命令格鲁吉亚政府从南奥塞梯撤出军队，但是格鲁吉亚议会以压倒多数票拒绝了这个要求，加姆萨胡尔季阿宣布任何实施这一总统令的企图都将使格鲁吉亚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

我并不同情格鲁吉亚对待奥塞梯的粗暴的做法。格鲁吉亚一方面反对苏联将其当作一个殖民地，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中间的少数民族要么接受附属地位，要么就走开。然而，戈尔巴乔夫武力干涉的威胁只会把事态搞得更糟：如果他不能实施命令，他的信用就会受损；但是如果他试图实施命令，他就可能给格鲁吉亚带来流血冲突甚至内战。

从11月中旬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断发布徒劳的、自拆台脚的命令。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前两天，我记录下了对戈尔巴乔夫威胁向南奥塞梯派兵的评论：

>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落入抵挡苏联军队的陷阱，而格鲁吉亚人则不同，他们很可能会与威胁针锋相对。虽然我理解莫斯科对离心趋势的失望，而且也不认为格鲁吉亚人在对待奥塞梯人方面做得恰当，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这样行事……目前的方案是一个

> 愚蠢的方案——戈尔巴乔夫仿佛愚蠢至极，竟然看不到那些怂恿他以这种方式"施展权威"的人实际上希望取代他！既然他肯定不傻，那他本人一定欣赏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可能会奏效的幻想。可悲，可悲，可悲，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

当我把这些输入到我在斯帕索别墅里的个人电脑的时候，我〔462〕真希望克格勃的侦查装置能够窃取到我正在输入的东西，那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得到我的评论的副本了。然而，我根本不敢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所记录的信息正是克格勃主席不希望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东西。

在1月15日的那个星期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紧张局势就像发高烧一样，爱沙尼亚的局势稍轻一点。苏联最高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团来往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首都之间"调查事实"，但是证据表明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真正的谈判。在维尔纽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仍然预计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军事进攻。当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理查德·迈尔斯星期三访问议会大楼的时候，他发现代表们都倔强地执意要留在大楼里，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牺牲在那里。

兰茨贝吉斯就是下定决心的代表中的一员，但是他也出席了为星期天的死难者而举行的葬礼。想要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以至于必须在足球场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演讲，他说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感到羞耻，因为俄罗斯人进行了杀戮；他还说中央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歪曲的报道；最后，他用"立陶宛一定会独立！"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并不是所有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都同民族拯救委员会唱一个调子。

1月20日，星期天晚上，在里加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起初，它似乎反映出已决定要在那里使用武力。特种防暴部队的小分队（从他们佩带的缩写标志可以看出）袭击了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在整个过程中杀害了五个或者六个人。占领大楼之后，他们在午夜后两小时又撤走了。当战斗打响的时候，拉脱维亚总理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立即打电话给苏联内务部部长鲍里斯·普戈（他掌管着“黑色贝雷帽”部队），普戈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要派他的副手去里加进行调查。

后来证明这次攻击实际上是“黑色贝雷帽”部队军官的一次越轨行为，并没有得到高层当局的批准。然而尽管这样，这次行动还是加深了大家的紧张感。

[463]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命令不再进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大楼，但是他直到九天之后才间接地把袭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贴上非法的标签。然而，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继续批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坚持要它们废除“违宪的法律”，只不过又补充说，任何集团都只能通过宪法允许的途径而不是靠武力来获得权力，任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武力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11]

鉴于违宪事件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谴责罢了，但总算是有所表示了。

又一个愚蠢的任命

当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辩论达到高潮的时候，雷日科夫总理心脏病突发，于12月25日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年里，他一直遭

到人们的攻击，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我非常难过。虽然我喜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敬仰他的勇气和正直，但是我也知道他不理解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因而成了亟待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障碍。如果苏联除总统外还将保留总理职位的话，那么这一人选必须懂得主要工作应该是把中央的经济权力重新分配给企业、地方和加盟共和国。

雷日科夫的疾病解放了戈尔巴乔夫的双手。尽管两人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迫使雷日科夫辞职，不愿意同他最初阵营里的又一个成员完全破裂。现在，他可以自己选择任命一个总理了。许多人预测他将利用这次机会改组部长会议，把它转变成类似美国总统内阁的机构，只有 20 来个成员，而不是现在的 60 多个。把经济部门的职能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将会满足加盟共和国领导们的基本要求，从而有助于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花了三个星期来挑选雷日科夫的接班人，然后他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的第二天即 1 月 14 日宣布自己选择了瓦连金·帕夫洛夫。由于刚刚发生的暴力事件所带来的混乱，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一任命。事实上，帕夫洛夫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理 [464] 人选。戈尔巴乔夫任命他的想法早在几天前就传了出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助手都很难解释帕夫洛夫有什么资格担任总理。

帕夫洛夫身材微胖，长着一张圆圆的猪脸。自从198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部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货币供应增长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商品的增长。虽然价格仍然得到了控制，但是“卢布倒挂”加剧了商店里的货物短缺，并且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以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财政部长至少应该对这

个局面负部分责任，因而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挑选他晋升，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混乱日益严重的时刻。

我在一年前曾经见过他，当时我是为了安排他对美国的访问而去拜访他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古怪、不太严肃。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中还有一些傲慢自大的成分。我们正在试图为他选定访美的时间，与他同行的还有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我曾经同格拉什琴科讨论过时间问题，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建议的所有时间对他都不合适。当我把这事告诉帕夫洛夫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找到了格拉什琴科，当着我的面命令他改变他的日程，必须在他曾经尽量避免的日子里出访。帕夫洛夫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向我显示他对国家银行行长拥有权威。

有时候，他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古怪，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随后的发展往往证明他是认真的。例如，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前3天，即1月11日，他应邀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我们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他嘲笑"卢布倒挂"的提法，估计市面上只有250亿卢布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发行的卢布数量有1000亿甚至更多。鉴于印钞机过度使用的问题出现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采取辩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企图引用明显虚假的数字来否认问题的做法，是不能说服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的。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他看上去很傻。

当有人提到卢布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时，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这可能会让你吃惊，是我定下那个价格的。"他的话果然让我吃[465]了一惊，以至于我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听对了，于是我让他重复了一遍。使我感到吃惊的并不是听说财政部长涉足于黑市——事实上，我对此早有耳闻——而是我没有料到部长本人竟然拿自

己牵扯进这类活动来吹嘘。他高兴地向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解释说，在黑市上抛售美元是一种从投机商手中吸收卢布的好办法，因为他能够出到 40 卢布兑换 1 美元的比价。而当时官方汇率是 5.6。

尽管人们对帕夫洛夫能否有效地对付日益增长的危机普遍存在怀疑，但是他的任命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确认了对他的提名。

几个星期后，新的“总统内阁”宣告成立了，这时大多数观察家——也包括我自己——又吃了一惊。我们曾经预计戈尔巴乔夫为了削减中央官僚机构会减少目前行使权力的经济部委的数量；他也没必要顾及雷日科夫的感情。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把大部分经济决策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的有利时机。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当公布内阁各部和各“国家委员会”（事实上也是部，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的名单时，看上去部委的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这只会激怒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为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而大声疾呼，而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做过许诺。

直到 3 月份，戈尔巴乔夫才最终任命一个安全委员会来取代消亡的总统委员会。实际上，由于职务的原因，有些人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除了这些当然的人选以外，戈尔巴乔夫往整个名单里额外增加了三个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瓦季姆·巴卡金、以及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

当对名单进行投票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其他人选，但是不同意普里马科夫和波尔金。戈尔巴乔夫坚持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于是这一次普里马科夫勉强获得了通过。而波尔金是在第三轮投

票中才得到多数通过的。我问最高苏维埃的几名代表，为什么立法机关两次拒绝同意普遍认为非常接近戈尔巴乔夫的波尔金。他们都说不信任他的原因是他因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歪曲的信息而臭名昭著。其中一个代表指出："他是个惹麻烦的人，经常给戈尔巴乔夫灌输些垃圾，增加他的疑心。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让他接近自己。"

[466]

反对派的批评尖锐化

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的信心越来越小，而改革者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日益增强。到了八九月，当戈尔巴乔夫同压制改革的力量结盟的时候，那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利用新的权力实施经济改革的想法便消失了。许多人似乎感到谢瓦尔德纳泽所说的"独裁统治"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施行的这种统治。

1 月份，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流血事件的那个周末，民主俄罗斯代表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席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这是 11 月会议的第二阶段，它表明人们正逐渐丢掉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迅速发展。

该组织声称拥有 30—40 万积极成员。据说，它的基层组织在 40 个城市里出版了大约 500 种报纸，总发行量达 50 万份（如果这些数字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许多这类报纸的发行量将非常小，因为平均数只有 1000 左右）。而且它的非官方全国性报纸《民主俄罗斯》据称发行量达 150 万份。

在这次会议上，波波夫宣称同戈尔巴乔夫组成“中间派—左派联盟”[42]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此民主人士需要反对现政府，发展规模巨大的政党组织。早在10月份时，波波夫还很乐观地认为有可能形成他所说的“中间派一左派”联合——这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形成联盟。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呼吁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控制的中央政府移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实行迅速激进的改革，包括把土地转交给私人所有者，把国家资产分配给公民，制定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其中应该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大会还通过了正在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条约，呼吁建立起同其他加盟共和国民主团体进行政治合作的框架。

此外，会议还谴责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警告说由最反动、最保守的力量实行独裁统治的危险正在逼近，它认为这部分力量包括共产党特工、军队、克格勃的精英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他们都听命于一位“像独裁者那样行事的改革的倡导者”。 〔467〕

会议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全面的谴责，而仅仅六个月前这个组织还把戈尔巴乔夫当成盟友。

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戈尔巴乔夫前总统委员会中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开宣布同他决裂。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戈尔巴乔夫的阵营。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则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其中的一些段落是这样的：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

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在立陶宛发生的事件可以清楚地归类为犯罪行为……（而戈尔巴乔夫）却为它辩护，也许正是他同意了整个行动……

在反抗独裁统治和专制主义进攻的同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上。[13]

通过这份宣言，绝大多数签署人表明了他们脱离戈尔巴乔夫、投奔叶利钦的决心。

1月1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公开声明刊登在星期三《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巴卡金的消息上面，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以前最亲密的助手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高潮。他能够开始用心接受这些批评吗？或者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视为个人对他不忠诚的证据（当然这更有可能），然后顽固地坚持他现在似乎已经选定的道路呢？如果事实证明出现了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我就必须赶快修正先前对他继续执政的估计了。

第二天，1月20日，莫斯科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民主俄罗斯组织这次游行以抗议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生的暴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反动保守分子的联合，共有3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虽然在先前的游行中也曾出现过反戈尔巴乔夫的〔468〕标语，但是在莫斯科出现大规模的纯粹反戈尔巴乔夫的游行，这还是第一次。在向人群宣读一项决议时引起阵阵欢呼，决议

呼吁：

- 戈尔巴乔夫、亚佐夫辞职
- 苏联军队撤出立陶宛
- 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
- 审判对在立陶宛动武负有责任的人
- 只对加盟共和国，而不是联盟中央政府提供外来援助

虽然叶利钦并没有参加，但是许多人都把他当成那一天的英雄，有人称他是"俄罗斯最后的伟大希望"。每当提到他的时候，人群都要一再高喊他的名字。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宣读了叶利钦的一封信，信中称谢瓦尔德纳泽和其他人所警告的独裁已经到来了。戈尔巴乔夫正在阻碍民主改革，有人以自封的国家拯救委员会的名义对合法的民选代表机构使用武力，而他竟为此辩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叶利钦认为反对必须是以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他指出："我们不能给中央政府任何借口来对我们使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曲折前进"

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继续处于骚乱状态、而戈尔巴乔夫与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不断加剧的时候，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的军事行动也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对伊拉克目标的空中打击。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在该地区避免战争，但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固执使得苏联作出的和平努力化为泡影。尽管由于中东政策的180度转变而在国内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战争打

响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同美国在安理会进行勉强的合作。同美国保持和睦关系已经成为了他国内权力的关键。

许多观察家仍然怀疑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一个协议——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即只要戈尔巴乔夫支持布什在海湾的政策，布什就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自由行事，特别是在立陶宛。这些〔469〕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即使是在海湾危机的高潮时刻，布什依旧密切关注着立陶宛事态。例如，他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夺取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在1月13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或是他们的新闻代表几乎每天都就此发布消息、警告或者公开声明。

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引起暴力的军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布什总统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如果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他将被迫采取某些措施。信的全文是在1月23日午夜通过电传传到使馆来的。我次日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以递交这封信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10点左右电话通知我说戈尔巴乔夫可以在1点钟见我。

当我12点45分上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发现一大群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使馆前面抗议美国解放科威特。通向使馆的大门被关闭了，但是我命令海军陆战队哨兵把大门稍微打开一点，以便我的车子能够通过。开车通过一大群敌对的示威者可能是有些鲁莽，但是大使是不可以耽误总统的指示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唯有这一次才发现国务院提供的卡迪拉克防弹车是那么的舒适。

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是很平静，面带微笑。他在过去的部长会议办公楼、现在的总统办公楼接见了我。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信的内容很敏感，我觉得没有同事作记录谈起话来

可能会更加坦率。我们在一个会议桌的两头面对面地坐下来，切尔尼亚耶夫坐在他的左边。

在我们互致问候以后，我解释说上面命令我转交一封布什总统的信件。我递给他一封英文信，然后一行一行地把内容翻译成俄语。布什指出，在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发生混乱之后，他的行动一直十分克制，但是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有所行动。他曾经接受了戈尔巴乔夫1990年作出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所以在此基础上授权开展了支持苏联经济改革的项目。然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面临恫吓、压力和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继续这些项目的。除非那里的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暂停他开创的援助步骤。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惩罚，而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改革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制止日益增长的暴力浪潮，回到先前的和解政策上去。 [470]

当我念完那封信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问我："他是说已经采取了那些步骤还是即将采取那些步骤呢？"

我回答说："他说如果……那么他将那样做。"

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没有对那封信发表意见，而是对我说道："告诉我，杰克，你怎样看待目前这里的形势？"

他的提问使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原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途径来表达我对他最近一些决定的疑问，但是没想到他会主动问我。我现在还没有就如何表达做好准备，而且除了信本身以外我没有接到其他指示，但是我经常考虑一些他似乎做错了的事情。能够直接听他的解释实在太诱人了，决不能错过机会。

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作记录，但是会谈结束之后我马上匆匆忙忙地写下了谈话要点。当我写会谈记录时这些要点足以唤起我的记忆。首先，我说很难解释他近几个月政策的根据。长期以来，

我始终坚信他真心寻求在苏联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我也一直是这样向政府报告的。然而后来，我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虽然我知道他仍然坚持说改革在向前发展，我也知道这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但是我看见发生的一切并不符合我的假设。事实似乎表明他的政策已经变了，然而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也就不愿得出他确实发生了变化的结论。但是，我又觉得他对民主人士及叶利钦一再进行口头攻击与他自称的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符的。

至于立陶宛和它的邻国，我指出，军事压力使局势尖锐对立，破坏了谈判，产生了暴力的潜在危险。那里的事态使布什总统蒙受了巨大的压力——来自国会、报界和整个公众舆论的压力。虽然我不相信他曾下令军队向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开火，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做的许多事情或者他同意其他人去做的许多事情：派驻军〔471〕队、夺取建筑、发出毫不妥协的最后通牒，等等。如果他的目的是和平，那么这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我还补充说道，我非常了解他所受到的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但是我似乎看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改革派，所以我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屈服于这些压力，尤其解释不了的是他所采取的步骤会被那些坚持使用暴力的人所利用。

我还指出，他常常强调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人会反对这一抽象的概念，但是他应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即如果他们是被迫加入联盟的，那么联盟宪法对他们就没有约束力。即便如此，双方也还是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但是前提是立法机关必须做出关于退出联盟的条件的修正案。现行的法律否认有退出的权利，更谈不上实施退出行动了。

我最后指出，在像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是威胁使用暴力的人。他们似乎懂得只有通过非暴力手段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显示出了极大的克制。我们看到的暴力是由莫斯科控制下的苏联军队犯下的——这些军队最终是由他本人控制的。虽然我并不怀疑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法向我的政府解释他最近的行为怎么能与他的这个目标相一致。

我谈了大约 15 分钟，然后便停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独白，感谢我不带嘲讽的坦诚。

关于我难以理解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请我从问题的"整体严重性"考虑。"请帮助你们的总统理解，"他接着说，"我们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作为总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战争。"所以有时候他将不得不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段"曲折前进"的时期。

他评论说，我们正处在高度紧张和情绪极度波动的状态下。许多问题都是爆炸性的，武装力量很难控制。我们为政治文化落后所困扰；过去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的传统。但是，他必须坚持在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他本人不会受制于任何人。

他声称他愿意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过去〔472〕同拉脱维亚的对话就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曾经同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戈尔布诺夫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并且得到了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卢比克斯的同意。然而，立陶宛的事情有些不同。如果兰茨贝吉斯继续当权，他怀疑是否还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普隆斯基涅比较理智，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取得一些进展，然而立陶宛政府提高价格的计划给兰茨贝吉斯提供了一个搞垮普隆斯基涅的机会。至于叶利钦，他很难与之打交道。因为叶利钦往往先与

别人达成协议，然后违约，而且他经常作出些不能履行的许诺。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还是要试一试。

在他结束谈话以前，他要我转告“我的朋友乔治”，不管在海湾战争、德国问题、批准常规武器协议等方面面临多大的压力，他都将继续按照他的承诺行事。他在国内的主要愿望是确保根本性变革不要伴随着暴力事件，而且他决不会放弃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4]

我后来回想这次谈话的时候，深深感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态度和私下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许多私下里容易动怒的领导人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公共形象：平静、周到、富有同情心。而戈尔巴乔夫似乎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在公共场合里，他变得极其容易发怒，他的讲话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但是私下里，我却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于明断是非。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人都是那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对布什总统的信件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策略的。

他没有抗议说我们是在以停止经济合作的威胁来干涉和破坏改革，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给我们表达的机会，使得双方都有机会提出观点。他保证遵守自己在海湾、德国、常规武器协议方面所作出的承诺，这样做既提醒了布什去注意同他合作的重要性，又避免了对美国发出威胁，即一旦美国由于立陶宛所受到的镇压而不再进行合作，他就可能改变这些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他是在提供一种保证，即无论如何都将继续这些政策。如果布什在这种保证面前还要进行制裁，那么他的做法看上去就过于粗暴，甚至有些卑鄙了。其次，他辩解说自己最近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而采取的策略，不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

[473] 我并不相信他的第二种说法，尽管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头脑里为自己“向右转”的做法寻找理由。我得出

的结论是，这只是因为他看不到鼓励强硬派并与其合作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公开地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总统治理”，因为这样将使他们作为执法者而占有优势。一旦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或者继续加以拒绝，他们就会把他撇到一旁。

然而，我觉得没有理由用制裁来打击他，除非事实表明他确实在蓄意利用军队压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华盛顿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军队，所以布什威胁要进行的制裁从来没有实施过。

在我转交总统信件的时候，根据情况判断，在 2 月份安排莫斯科首脑会谈显然已不可能。除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形势得到明确，否则布什访问莫斯科在政治上将是困难的。而且海湾战争刚刚开始，对他来说，在战争进行期间离开美国也是不合适的。当我们讨论布什的信件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计划中的首脑会谈推迟的话，他希望布什和他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很明显，他不希望这次延期加剧立陶宛的局势。

最后，当我们正式宣布延期的时候，我们的理由是总统必须留在华盛顿，全力关注海湾战争。

帕夫洛夫的烟雾

瓦连金·帕夫洛夫担任总理后不久，就宣布了自 1985 年禁酒运动以来最不得人心、极其失策的行动：政府宣布面值 50 卢布和 100 卢布的两种钞票作废——这两种面值的钞票在当时发行量是最大的。公众只能在几天内兑换所有这两种钞票，而且个人能够兑换的数量也有限制。这似乎是减少“卢布倒挂”的策略——虽

然帕夫洛夫曾经告诉我他不担心“卢布倒挂”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政府的解释。帕夫洛夫解释说，这次兑换针对的是那些从非法生意中获得了大量肮脏收入的“投机商和诈骗犯”。事实上，普[474]通人民受害最深，特别是那些把积蓄藏在床垫下面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官方储蓄银行的利息只有2.5%，而且常常很难提取大宗款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人们在仅有的几家银行分支机构花几个小时排长队的时候，他们的愤怒被激发起来了。没人相信官方的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投机商和诈骗犯”能轻而易举找到兑换手中钞票的方法。管理兑换的政府雇员很容易被贿赂。

帕夫洛夫显然已感到公众舆论开始对他不利，于是就做出了一个更加不合理的解释。他显然希望苏联公众——习惯于相信关于阴谋的传言，但不信任外国人——能够更容易地接受这个新的解释。他在《劳动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说，兑换行动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它们掌握了80亿卢布，并计划把这些钱突然投入苏联，以此搞垮苏联政府。[15]

苏联国内外的公众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愚蠢的指责上，但我却发现他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意见同样令人不安。他拒绝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声称只有犯罪分子和黑市交易者才会提出这类问题。他暗示俄罗斯的立法将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只允许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和在土地上建筑房屋者；只能把土地卖还给当地政府，而不能卖给第三方。他呼吁从大量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只能通过保留指令性经济才能实现。同时，他把苏联经济描绘为正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事实上，他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某些措施，那么六个月后经济就会遭到类似于1918—1920年内战期间那样的破坏。

当我看到这一则采访消息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 这种大杂烩式的评论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其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在于其对外国银行的荒唐指控上，而且在其他段落之中也有。第二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他以歪曲的事实来支持自己论点的习惯。例如，有关俄罗斯土地法的指控就完全是一种错误引导。他最后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犯罪分子、贪婪的外国人和武断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经济在几个月内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政府还会允许这些力量削弱本来可能健康发展的经济 [475] 呢？换句话说，如果问题只是在执法方面，为什么还要在经济方面首先进行改革呢？而且这些互相矛盾的陈述明显没有提到苏联有必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事实上，按照帕夫洛夫的逻辑，人们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世界经济，因为那些鬼鬼祟祟的外国人正在那里伺机强奸俄罗斯母亲。
>
> 结论：要么就是他对市场体制如何运转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他过于见风使舵，以至于根本没有信心迈向市场体制。无知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吓走认真的投资者，而只给他留下他声称极其蔑视的小偷和囚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戈尔巴乔夫不马上另找一个总理的话，不仅销售合同不会迅速稳步增长，反而会出现商业兴趣锐减的状况。

帕夫洛夫对西方银行密谋搞垮戈尔巴乔夫的指控只不过引来了苏联国内外报界的嘲笑，美国国务院也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指出作为财政部长，帕夫洛夫印发的钱远比西方银行里的钱多得多。[18]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维塔利·伊格纳坚科来修复这种损害，后者指出："我们的货币无法改变一种政治制度。"克留奇科夫的主要副手维克多·克留申科也宣布克格勃对类似的阴谋一无所知。《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反映了典型的国外反应：

> 帕夫洛夫总理的政策是明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错误的。在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市场上他已经止步不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排外主义攻击的混乱之中。这使得外来援助的一个来源被破坏了。
>
> 最终，苏联将被迫去敲响西方的大门，乞求投资、专家和援助。如果那时没人答应的话，苏联应该回忆一下这个星期，回忆一下帕夫洛夫释放的烟雾。[37]

这决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总理最后一次使他感到难堪。

〔476〕

自作自受的全民公决

12月，戈尔巴乔夫劝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保持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似乎自认为打了一张好牌。他原本期望利用共产党来推动这次投票，赢得公民对联盟的广泛支持。这样就会给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顽抗的领导人们带来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他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他11月17日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公决，但是这个建议却令人奇怪地也被交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手中，其中包括那些与他的分歧日益加深的领导人。虽然哈萨

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最强烈拥护保留联盟的人之一，但是在审议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之后，他提议除非确有共和国希望退出联盟或者共和国的议会拒绝遵守联盟条约，否则用不着进行全民公决。他警告说，要求在所有共和国里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只会造成与加盟共和国的进一步冲突。[19]

然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他向大会抱怨说，自己的建议被忽视了，坚持要求进行单独的投票表决。如同过去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戈尔巴乔夫以这种方法得到了他想要的全民公决，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

全民公决的建议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它进行的修饰，它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问题。它最终出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在这个新的联盟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虽然促成全民公决的人把它描述为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投票，表明是否赞成保留一个自愿的联盟，但是回答“是”既可以被认为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又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国家的现行名称，也可被认为是赞成重新谈判组建的联盟和个人的权利。然而“新的联盟”还没有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也没有设计出来。这就使得全民公决无法同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因为对“新的联盟”的含义以及各种规划是否真正尊重了各共和国的“主权”仍然存在着争议。 〔477〕

此外，虽然全民公决应该在苏联全境举行，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拒绝进行这一活动，而且还有些政府对建议的措辞做了修改或者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认为能够表现团结的这次公决在举行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不团结的例子。

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拒绝进行全联盟全民公决，经过辩论后，它们决定在3月17日之前先举行自己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全民公决，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计划稍晚将通过投票要求独立。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戈尔巴乔夫1月提出全民公决的时候就反对这个建议，他坚持在哈萨克斯坦对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征求意见。这个问题是：

>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加以保留吗？

这里没有谈论“新的联盟”和个人权利，而是用“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代替了“主权共和国”。纳扎尔巴耶夫的措辞暗示联盟是由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戈尔巴乔夫暗示的是对现存的苏联进行重组。

乌克兰也提出了一个补充问题，即乌克兰是否应该根据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投票者们甚至有机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乌克兰独立。

而叶利钦则把这次全民公决转变成为自己的巨大政治优势。12月时，他坚决反对在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但后来他又同意了，条件是俄罗斯同时进行自己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投票者将被问及，他们是否赞成设立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职位。[19]

直到那时，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一直拒绝修改宪法、设立总统。[478]而赞成总统职位的多数票将会有利于叶利钦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俄罗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预计在总统职位问题上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赞成票。

戈尔巴乔夫施展出浑身解术，争取他的全民公决能够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他发动共产党的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赞成票。对他的这一策略进行分析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就算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他的建议，我也想象不出他能从中得到什么。这种投票的意义过于含糊，以至于不能把它看作是明显的授权。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的职位问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次全民公决导致修改俄罗斯宪法和赞成投票产生总统的话，叶利钦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总统一职。相比之下，叶利钦的权力将显著上升，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将显著下降，他现在只是一部残破的国家机器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此外，如果乌克兰也投票反对联盟——哪怕只是表现出对联盟的冷漠，戈尔巴乔夫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同克拉夫丘克及乌克兰中央议会打交道时将更加困难。

由于错误地建议举行全民公决，戈尔巴乔夫愚蠢地为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2月7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在进行全联盟投票的同时进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叶利钦开始收网了。

叶利钦的直接挑战

立陶宛暴行发生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已经出现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但是叶利钦本人在一

个月之后才提出了这个要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将俄罗斯总统职位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上，他已经确保能得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的批准。他还组建了新的顾问委员会，招纳了许多一年前还在戈尔巴乔夫麾下的改革者。[28]

叶利钦赢得了在立法和公共关系两方面的胜利，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由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出现的暴力听之任之，未能挑选强有力的副手，未能采取可行的改革计划，对迅速衰退的经济束手无策，正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 2 月 19 日晚出现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在回答了半个小时的问题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开始宣读起来。

〔479〕 叶利钦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执行一种维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与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可以从他“操纵”货币和价格改革中看出。他的政策已经导致了民族间的流血事件和经济崩溃，改革已经变成了加强过去的指令性行政体制的努力。叶利钦还指出，中央不允许加盟共和国朝自治方向迈进。

叶利钦宣称，他曾真诚地努力以便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合作，但是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正在把国家引向独裁。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应该辞去总统职务，把权力交还给联邦委员会。叶利钦的结论是：“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不反悔。”

以前叶利钦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要么继续改革，要么就辞职，让其他人当总统。但是，现在他已经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了。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反对派偶尔提出要求政府首脑下台，这在政治进程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苏联不是民主制度，

更谈不上成熟的民主制度了，总统被认为拥有固定任期，不受立法机构信任投票的制约。在这种状况下，叶利钦的要求被理解为——毫无疑问，他本意也是如此——宣布了一场政治战争。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一场没有约束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双方随即摊牌。在叶利钦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要求之后，俄罗斯议会中的共产党立即展开了一场闹哄哄企图谈劾并罢免叶利钦的运动。在一次有计划的、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指挥的演习中，俄罗斯立法机关里的共产党忠实信徒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要求叶利钦辞职。这次运用的战术与1987年把叶利钦从政治局驱赶出去时所采用的战术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发言者来谴责他的行为，提出驱逐他的要求。

斯维特拉娜·戈里亚乔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地区的代表，也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之一。她宣读了一份由她自己和其他五位副主席联名签署的声明，发动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声明指责叶利钦没有采取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直接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谈判从而破坏了联盟条约；未经授权即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订协议；仅仅依靠亲密圈子里的私人顾问而无视立法机关；盗用最高苏维埃的名义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2]

〔480〕

然而，俄罗斯议会并非1987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再说，撤换叶利钦的运动完全是在电视镜头下进行的，他的反对者们如同邪恶的共产党特工那样出现在屏幕上，恢复了过去那些令人鄙视的习惯。大部分公民非但没有背弃叶利钦，反而批评戈尔巴乔夫违背民意、再次企图撤换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叶利钦的反对者们建议在3月4日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

（该机构有权罢免叶利钦）——这个时间早于3月17日全民公决的时间。叶利钦的支持者们进行了反击，第二天经过吵吵嚷嚷的辩论后，立法机关决定在全民公决投票之后的3月28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辩论之后，我作了如下记录：

> 双方的做法都不那么精明，但是如果我不得不赌博的话，我将把注下在叶利钦这一边。戈尔巴乔夫最有效的战术是"以仁慈将其置于死地"，一直敞开谈判的大门，并且确保共产党不会跟着叶利钦走。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施加报复的企图只会给叶利钦的殉道者形象增添光彩。如果叶利钦能够使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将全盘扭转劣势。

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的时候，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海湾问题表决时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边（有时候也是在经过大量劝说后才这样做的），但是他始终试图避免地面进攻，直到攻击开始之前仍在拼命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在谴责伊拉克的问题上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劝说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撤。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打败一个主要由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打击苏联的威信和自尊。在1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美国的批评显著增多了。

[481]

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证明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向他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侯赛因和卡扎菲这样不负责任的领导

人影响苏联政策是一个错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协助下，他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战争对阵双方——一个是以前的敌人，一个是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苏联盟友的国家，称赞以前的敌人发动的进攻在政治是困难的。

甚至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苏联官员就已经开始质问，难道空中打击还不够过分吗。例如，在2月12日，我拜访了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敦促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投票中提供支持。而他则抱怨美国的空中打击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我向他保证，我们的军事指挥员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他却提出不应超越解放科威特和摧毁伊拉克之间的界限，如果出现这种超越行为，苏联将不得不在安理会提出异议。

这种意见必须予以驳斥，不然它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频繁，还可能导致安理会对战术上的军事决策进行辩论。因此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告诉他我不理解他的评论。虽然美国担负起了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主要责任，但是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在这次行动之中，我们承受了牺牲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危险，从中我们别无所获，只是为了使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尊重而已。我们的公众决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对我们的挑剔，这种挑剔暗示我们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我感到美苏对伊拉克侵略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他刚才提出的威胁是不可原谅的。

别洛诺哥夫赶快做出了让步，他请我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他也没有指责美国方面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他所作的澄清，通过他的解释，我认为今后苏联官员担心我们可能超出安理会授权的言论将会少 〔482〕

一些。

总的说来，苏联外交部确实没有在联合国破坏我们的外交立场。但是，军方发言人和一些记者继续对我们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在该地区的永久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解放科威特。因此，当我接到邀请要我去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一次电视圆桌座谈会时，我意识到这是向广大公众介绍我们立场的有效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座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善的，一位苏联与会者突然提出，美国可能在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使用了过分的武力。这正是我期待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向苏联观众发泄了我的不满。"我不能理解这种对侵略者的好心，"我回答说，"当你们的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你们对德国的毁灭并不担心。事实上，你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到法西斯野兽的巢穴中去消灭他们！'我们还没有达到'消灭侵略者'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的土地上。你们是不是准备争论说二战期间我们不应该轰炸德国呢？盟军是不是应该打到德国边境时就停下来呢？"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抗议声，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当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瓦连金·佐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会有人胆敢再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一个人不理解你的观点。"他说。

实际上，苏联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中东事件的深刻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受到了比较反动的苏联军官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即使不是一个敌手，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投入了大量金钱的盟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但是苏联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贴近他们的国内问题：商店里的货物短缺，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混乱

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

地面战斗一打响，几个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的大部分影响力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在联合国仍然需要苏联的 [483] 支持，但是一旦海湾战火停息，苏联的支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戈尔巴乔夫与那些在改革初期曾经成为他的宠儿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关系在 1991 年 1 月终于完全破裂了。一年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最大希望，叶利钦不过是取悦大众的政治家，不足以领导正确的道路。他们早先同叶利钦形成的联盟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但是到了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压制举动使他们感到失望，再加上受到谢瓦尔德纳泽脱离这一阵营的鼓舞，他们便开始成批地离开戈尔巴乔夫，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

戈尔巴乔夫似乎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虽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明显不过了。相反，戈尔巴乔夫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和一阵阵的恼怒。我 2 月 11 日拜会了切尔尼亚耶夫，向他递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协定时出现的问题。这一次，我间接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愤恨。

我指出苏联在削减某些武器上的立场不符合条约文本，切尔尼亚耶夫却笑着说："不是苏联的立场，而是苏联某些将军的立场。"他向我保证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处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任命了一个有文职顾问参加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其中也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本人。

然而，当我转到谈论国内形势的时候，他那可爱的幽默便消失了。他说戈尔巴乔夫被国外的某些批评深深地激怒了（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来，但估计是对立陶宛的镇压和"向右转"的批评）。他接着

指出，戈尔巴乔夫曾经认为自己与西方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似乎突然就不见了。既然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西方对他的敌意就是没有道理的。

“他似乎容忍了那些违反了他所签署的正式协议的苏联将军，而且当他的谈判伙伴们指出这种情况时他还为他们辩解。”我心想，但是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去罗嗦那些明显的事实，而是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夸大其辞了。美苏之间在包括海湾问题的许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相互理解与合作。但是，我们也确实存有焦虑，[484]尤其是对于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的行动。我们曾经得到了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是苏联军队在维尔纽斯打死了人，而莫斯科对此进行的谴责既不及时也不是无条件的。非法夺取电视台的流血事件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为此被逮捕，建筑物也还没有归还到立陶宛人手中。戈尔巴乔夫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会给外界留下什么印象吗？我明知故问道。

我接着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偏离其曾经捍卫过的改革政策，对立陶宛的态度只不过是这一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他现在似乎有了一个不同的工作班子。

“你说不同是什么意思？除了谢瓦尔德纳泽还有谁？绝大部分人，包括切尔尼亚耶夫仍然同他在一起。”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第三者来举例，反驳我的说法。

我一方面承认他后来所举的例子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指出，除了谢瓦尔德纳泽以外，脱离这一阵营的还包括瓦季姆·巴卡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实际上，在 1987 年和 1988 年陪同戈尔巴乔夫访美的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的人还在同他一起工作。

他回答说，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并没有离开戈尔巴乔夫的阵营——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定期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得到有影响的职位。至于我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他们的离去算不上什么损失。事实证明了彼得拉科夫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叛徒，沙塔林精神失衡，阿尔巴托夫（我并没有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就投奔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怎么能把政府建立在这些背叛他的人之上呢？"他问道，接着他又补充说，戈尔巴乔夫不理解为什么布什总统下定决心要惩罚他。

切尔尼亚耶夫平常很少发表这样激烈的长篇大论，这暗示出他现在更多地是表达戈尔巴乔夫的感受，而不是表达他本人的感受。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受到国外的批评——当然也受到了国内改革者的批评。同他辩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布什总统的态度。

于是我告诉他，他错误理解了美国总统的政策。布什总统无意惩罚苏联。但是，他也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执政，因而他知道如果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继续出现暴力或者苏联国内出现一种压制而不是改革的趋势的话，他是不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在指出这些限制〔485〕条件的同时，他正尽力对戈尔巴乔夫坦诚相待，他钦佩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朋友和伙伴。

至于我们的看法，我指出，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自从上个秋天以来，我们正在目睹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越来越相信压制的手段，对那些掌握着镇压工具的人所作的让步也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苏联在军控谈判问题上已经开始倒退，甚至在军控条约正式签署时也是这样。我们还看到对国内批评采取了日渐严厉的措施，政府任命的模式也暗示出一种强硬路线。在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一些承诺过的改革并未实现。例

如，我们曾经得到许诺说，保障移民自由的立法将在1989年通过，但是目前这个立法仍然受到最高苏维埃的阻挠，而且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在乎。去年6月，布什总统曾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在移民法生效之前，他们签订的贸易协定不会得到实施。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去更加积极地说服最高苏维埃通过这个法律。

切尔尼亚耶夫避开了我谈话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单单挑出了我最后谈到的那个问题。他很不耐烦地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至今仍未使移民法生效的原因：美国显然连目前允许离境的人都应付不过来。

确实，我们使馆当时有一份多达30余万人的申请移民名单，而我们一年只有能力颁发不到五万份证明文件。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此，苏联公民应该有权离开苏联，如果他愿意的话。

在我离开之前，我要求切尔尼亚耶夫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总统，他为建立信任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不应该认为他所听到的批评抹杀了他的成就。他应该把这种批评视为友善的警告。事实是，我们西方人士对他的政策似乎要走的方向感到担忧，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他从前所确立的路线上来。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些曾经触怒他的批评一定会平息下去。

不到三个星期前，我曾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相比，切尔尼亚耶夫的反应要激动得多。然而，我感到切尔尼亚耶夫理解而且可能赞同我们的观点。出于忠诚，他不得不为自己明知是错误的立场进行辩解，由此而〔486〕产生的失望情绪犹如利刃搅动着他的感情。他在此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间接地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在攻打电视塔之后，他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提出辞职，而且曾向戈尔巴乔夫写过一封信，其中包含的指责比起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我所作出的指责要严厉

得多。但是，他最终决定不交这封信，继续留在“阵营”里。[22]当他内心有一种辞职的诱惑时，我对阵营的变化所作的评论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推迟已久的白俄罗斯之行。虽然从莫斯科到明斯克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但是自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戈尔巴乔夫从未访问过这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早就察觉到了他明显的冷漠——他访问外国时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从来没有遇到麻烦——但是他们相信，他最终一定会为清理工作说点什么，并且会呼吁为这一工作提供财政援助。虽然那个核电站坐落在乌克兰，但是那次事故给白俄罗斯人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共和国更大。掌管核电站的联盟中央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负有为消除危害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

然而，戈尔巴乔夫满脑子装的都是与叶利钦之间的争斗以及同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疏远，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他只不过草草提了一下切尔诺贝利，然后便集中火力攻击改革派知识分子，严厉地指责他们不但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而且还充当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急先锋。他重复了克留奇科夫在11月所作的无根据的指责，说改革者正在利用虚假的口号来“掩盖影响深远的阴谋，这些阴谋都是从外国思想库和外国人的头脑里诞生的”。[23]接着，他又攻击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把苏联分裂成40或50个小国家（事实上，波波夫只是认为在当时民族主义狂热席卷苏联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进行描述）。

但是，戈尔巴乔夫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讲得越来越起劲，他的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粗鲁。“民主人士”被指控利用“新布尔什

维克”策略——即利用游行示威和罢工——来破坏政府机构的稳定，为暴力夺权作准备（使共产党人最紧张的就是想到其他人也可能运用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反对他们）。[487]

戈尔巴乔夫没有点名指控民主人士正在密谋进行一场政变，但是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

> 所以我要问：谁正在准备一场政变？谁在呼吁违宪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暴力再次夺权权力的企图，这种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内战。我明确宣布这一点，而且我希望你们懂得我们正在谈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有这方面的教训，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4]

这种描述很适合用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行为，也适合用于其他地方的特工和军警官员暗中策划的阴谋，但是戈尔巴乔夫谴责的却不是这些集团。他似乎不能分辨合法的政治斗争形式和非法的政治斗争形式。他的唯一标准似乎是一个集团是否公开批评他。他的语言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正在准备抛弃其反对用武力对付政治反对派的一贯立场。

自12月以来，我发现人们——主要是改革者，也有一些独立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掌握实际情况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在私下谈话中小声说出来的。当我读到明斯克演讲的内容时，我不禁想道也许他们是对的。他对事情的错误解释看来要么出自于顽固的刚愎自用，要么来自可悲的错误信息。

他的演讲并不仅仅是损害了他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关系。白俄罗斯人关注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的健康和环

境问题，戈尔巴乔夫却利用他们的讲坛来进行个人的政治斗争，白俄罗斯人将此视为天大的侮辱。他对明斯克的访问使苏联最忠诚的共和国迅速地背离了他。这种背离在12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所狩猎小屋举行了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

国务卿贝克3月中旬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尽力为他寻找一种既不冒犯戈尔巴乔夫又能与叶利钦见面的方式，并使他认识到加盟共和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同叶利钦的接触十分敏感，华盛顿的白宫官员（可能包括布什总统自己）觉得贝克不应该在叶利钦的办公室会见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提供一个见面的机会，我们决定邀请所有12个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来斯帕索的住所吃晚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另一个会谈）。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几个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几个接近戈尔巴乔夫的官员，例如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伊万·拉普季夫、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我们知道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可能不能来莫斯科吃这顿晚餐，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能够出席。而且我们也知道叶利钦可能会婉言拒绝前来，除非他得到保证能够同贝克国务卿举行私人会谈。贝克也愿意饭后同他私下见面，我们希望这样能够让他满意。 〔488〕

起初，我们从叶利钦的人那里得到了接受邀请的回答，但是接着难题出现了。叶利钦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通知我们，要求贝克晚餐前先去叶利钦的办公室拜访他。科济列夫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在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之前曾经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级官员。我们解释说，贝克的日程不允许他这样做。然后，他又询问贝克能否在位于列宁山的俄罗斯外交部“宾馆”简短地会

见叶利钦。贝克的日程决定了这样做也不可能。于是，叶利钦拒绝前来参加晚餐，而委派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代替他出席。

我对这些花招感到有些生气，因为我认为会见贝克对叶利钦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他施展这些手段是期望得到与国家元首等同的待遇，这无疑是自毁前程，而且显得他很没有气量。然而，他的花招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戈尔巴乔夫1987年使他遭到政治流放，他在拯救自己所进行的斗争中，已经习惯利用他手中的各级权力来争取自己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为了同样的目的避免同我们的接触。

然而，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有小孩子气的政治家。当这群人最终到齐参加晚餐的时候，我们发现出席的代表只是来自其中几个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当天正在阿拉木图接待一个外国来访者，所以安排晚餐后再与贝克见面。改革派〔489〕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沙塔林、《文学报》的主编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加夫里尔·波波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来了，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基里尔。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阵营里的人一个也没来。有些表示了歉意，其他人干脆就没有露面。很明显，他们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指令，抵制这个聚会。

尽管这么多人缺席，但是这次晚餐还是非常成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先是通知说很抱歉来不了，但是最终还是同他的总理一道出席了晚宴。他明确表示格鲁吉亚将会离开联盟，甚至不会参加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亚美尼亚总理瓦兹根·马纽基昂也讲述了亚美尼亚脱离联盟的计划，该计划将从9月份的全民公决开始。沙塔林嘲笑了联盟条约草案，讽刺地评论说，联

邦委员会甚至在国家的名称上都无法取得一致，他预计帕夫洛夫政府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灾难。其他客人对于能否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联盟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对苏联当前领导层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贝克都在为戈尔巴乔夫说话：他提醒客人们注意，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开创了改革，这次晚餐就不可能举行了。

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认为禁止他的助手同叶利钦同时出席社交聚会能使他收益。他常常私下抱怨苏联“缺乏政治文化”，但是他自己的行动却显示出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而且盛行于政府的高层。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没有在 1991 年 3 月中旬的这个对各自都有利的场合里露面。

当贝克在他的莫斯科之行中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发现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敏感的一个原因。在一次私人会谈之后，贝克告诉我，戈尔巴乔夫说他从叶利钦的一个助手那里得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叶利钦曾经询问我如果他通过非宪法手段获取权力，美国将作何反应。贝克提出立即让我加入他们的会谈，对此作出评论，但是戈尔巴乔夫说没这个必要——他完全相信我的诚实与正直，不希望暗示我的行为不当。

我告诉贝克这份所谓的报告完全是谎言。叶利钦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他可能会考虑以违宪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取权力。如〔490〕果他这样说过，我一定会立刻断绝与他的所有接触。此外，整个想法是荒谬的：在军队、克格勃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都反对叶利钦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呢？贝克建议我想个办法来说服戈尔巴乔夫。

首先，我拜见了切尔尼亚耶夫，并向他解释了整个事情。切尔尼亚耶夫向我证实，戈尔巴乔夫确实得到了他向贝克提及的那

份报告。我解释说那完全是捏造的，切尔尼亚耶夫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他保证会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那个报告是假的，但是他又建议我下次有机会直接向他本人提出来。

我十分幸运，两天之后我接到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美苏在如何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误解，布什针对这种情况在信里提出了解决这些误解的建议。通常，我是通过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转交这种信件，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力争解决提交的问题，信件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如果附上了他的意见，会更有帮助。然而，这一次更重要的似乎是抓住机会同戈尔巴乔夫直接交谈，以驳斥关于叶利钦的报告的谎言。

切尔尼亚耶夫迅速安排了约见，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在此接见一个以政党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身份来访的日本客人。我将布什总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又叙述了一遍，戈尔巴乔夫允诺他将尽快答复。然后，我提到了他同贝克谈论的那份报告，告诉他那都是假的：叶利钦甚至从来没有暗示过有可能通过违宪手段夺取权力。我还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炮制这样一份报告，但我知道没有那回事。因此，他的情报来源要么是信息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

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我的话提出疑问，而是闲谈了大约15分钟。他说丽贝卡和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形象，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很好，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带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方面有必要谨慎行事。

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这种旁敲侧击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同叶利钦身边的人太亲近了，而应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身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出判断就困 [491] 难了，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亲密顾问在第二天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在处理各种社交邀请以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会见时，我一直十分谨慎，力求在负责的政治派别间做到平衡；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们更多接见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强硬派，而且很少同极端反动分子打交道，但我还是觉得暗示我们在打交道时有所偏向是不公正的。站在改革一边的知识分子当然更加容易受到我们的邀请，他们也比那些特工更容易接近。许多共产党官员似乎仍然不愿意保持频繁的社交接触。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意识到了表面看上去有所偏爱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同各种职业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干涉或者搞阴谋活动，而是为了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不能拒绝或者减少同某些重要集团的接触，尽管这势必发出一些我们不希望发出的政治信号。

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称赞丽贝卡和我所取得的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切尔尼亚耶夫同我一起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我们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次会谈十分重要，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当天下午，塔斯社的一则短讯体现了他的评价：

> 3月25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美国大使转交了乔治·布什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在信中本着一贯的友好精神，继续讨论了苏美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紧急事宜。随后，他们进行了简短、重要的会谈。[23]

我猜测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和塔斯社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我传达的信息被接受了，但是对于这次交谈，我越想越觉得有些方面很奇怪。首先，戈尔巴乔夫根据一份捏造的谈话报告就得出叶利钦正在密谋政变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叶利钦如果得不到憎恨他的那些集团的支持，决不可能夺取权力。而且，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阴谋，克格勃应该发现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仅仅只有同我谈话的报告。不仅如此，看来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份报告。如果他确实相信叶利钦正在试图通过武力推翻他的话（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 2 月份在明斯克发表那样尖刻的讲话了。〔492〕

第二个奇怪的方面在于，已经相信先前报告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驳斥。既然如此，为什么切尔尼亚耶夫要称这次会谈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呢？而且为什么塔斯社——毫无疑问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要加上“简短、重要的会谈”这一句呢？

最后，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不无理由的推断：克格勃正在极力散布关于叶利钦、也许还有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假情报。[28]如果确实存在克格勃有计划地制造假情报的活动，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没有掌握真实情况的原因。如果他仍然相信兰茨贝吉斯只代表着立陶宛少数人的意见，那么他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情。

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1990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显然在竭力争取时间，以便尽

早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联盟条约。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中央——从理论上讲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这种做法导致了持续的拖延。1990年11月发表的条约草案已经被证明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国的领导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它使人想到如果非要有一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应该强加给戈尔巴乔夫，而无需同他谈判。

随着3月17日保留联盟问题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要求制订一个更加容易被接受的草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大家对一个"新的联盟"进行投票，却不告诉大家这个新联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在全民公决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合逻辑的成分，在任何社会里可以允许的混乱都是有限的。

11月草案遇到的反对意见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他不可能简单地把一个条约强加给加盟共和国。因此，他邀请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以便推敲出一个一致赞同的文本。多数——但是仅仅是勉强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作出了反应。三个波罗的海〔493〕沿岸国家、摩尔多瓦（摩尔达维亚现在希望人家这样称呼它）、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拒绝参加，而阿塞拜疆派出了一名只具有观察员身份的代表。虽然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正在讨论一个没有中央政府参加的条约，但是他们都委派了代表。因此，这次会议包括了后来被称为"核心"共和国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所有的中亚共和国。

在计划中的全民公决举行之前的一周，中央报纸刊登了修改后的文本。[27]正如人们所预测的，与先前的草案相比，它赋予了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力。虽然在联邦司法管辖范围内联邦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新草案实实在在地削减了中央拥有的权力。例如，加盟共

和国将可以制定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它们将拥有更广泛的财产权和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及其他联系的权利。

如同前一个草案那样，这个草案规定许多职能将由联盟权力机构和加盟共和国共同决定，但是还是没有写清楚这种联合权力如何运作。它同样没能解决一个基本争议，即自治共和国如何行使代表权。其中一个变通办法是，在上院中只赋予加盟共和国平等的代表权。另一个变通办法是，把从前的自治共和国（它们现在都将自己称为“共和国”）视为构成联盟的平等成员，从而在联盟共和国委员会——相当于美国参议院的机构——中赋予它们同样的代表权。

戈尔巴乔夫决定邀请前自治共和国直接参加联盟条约的起草，第二种变通办法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削减叶利钦权威的一种策略，因为大部分自治共和国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样做将加强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是除了它们以外，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除了俄罗斯以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坚持反对给予“自治地区”平等的代表权，因为这样一来将会削弱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在投票时拥有多数。而俄罗斯政府则疑虑重重，因为这势必分裂俄罗斯。

联邦委员会在3月6日讨论了这个文本，据戈尔巴乔夫讲，除了前自治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以外，已解决了所有其他争议。[28]然〔494〕而，其他参加者没有他那么乐观，由于新草案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叶利钦当即表示拒绝。

戈尔巴乔夫把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

加，而且更加不祥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联盟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州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

又一次徒劳的武力炫耀

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1990 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瓦季姆·巴卡金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结果在 1990 年 11 月被解除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然而，苏维埃法律赋予了地方和市当局同意举行示威游行的权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许多西部共和国里，这些权力机关掌握在受到广泛欢迎的民选官员手中，他们不仅原则上支持民主进程，而且也是大部分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当戈尔巴乔夫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同压制力量的联盟越来越深的时候，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此发生的冲突也开始了。

新年前不久，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联合发表的一个声明令改革者们感到震惊，联合声明指出，为了确保大城市的秩序，将从 1991 年 2 月 1 日起组织军队和民兵的联合巡逻队。因为加盟共和国当局和市当局都没有要求在执法方面提供这种帮助，所以这个命令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在内 〔495〕的好几个加盟共和国都一致反对这个命令。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无视他的文人参谋所提出的撤销这个命令的建议，在 1991 年

1 月 29 日颁布了一个总统令，使这个命令合法化。[29]实际上，这个总统令的效果很小；由于各个地方的当局都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只进行了为数很少的联合巡逻。随后，宪法监督委员会批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不健全。[30]

虽然这个特殊的总统令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是它表现出了长期以来在权力划分方面存在着争端。中央当局能够无视市当局和加盟共和国当局而禁止和平示威游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将其同修正后的宪法所保证的集会自由统一起来呢？戈尔巴乔夫签署的 1 月 29 日总统令清楚地表明，他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地维护法制了——不过，对此他口头上还是支持的。[31]

3 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到了摊牌的时刻，这一次莫斯科走到了流血冲突的边缘。共产党企图撤销叶利钦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号召 3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看起来，克格勃又一次捏造了示威者准备“突袭克里姆林宫”的报告。

俄罗斯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都强烈反对这个命令：他们争辩说，并不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况且，派兵进入城市不仅将创下一个与改革发誓要加以保卫的民主进程不相符合的先例，而且会产生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气氛。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固执己见。

随着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华盛顿的关注也不断增长。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8 日早晨，我在使馆接到

了紧急通知，要求我找到所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向他提出警告：任何流血事件都会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虽然我认〔496〕为这个信息是不必要的——除了考虑美苏两国的关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去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我仍然很负责地同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联系，要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保证说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发生伤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叶利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被戈尔巴乔夫篡夺该共和国的权力的企图激怒了，它以压倒性的投票宣布暂停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并且要求撤走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坚持军队至少要呆到第二天的时候，俄罗斯议会便宣布休会，要等到军队撤走才恢复工作。

共有10万多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

军队于3月29日撤走了，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违反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企图去阻止人民以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的对手下台，而不是维护秩序，但是他的行为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为困难。在全民公决（大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投叶利钦的票）以压倒多数票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后，俄罗斯议会投票反对叶利钦的机会本已十分渺茫，现在议会又不得不在不请自到的苏联军队的包围下开会，于是连这种微乎其微的机会也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放弃和解的希望。

军队进驻莫斯科面对示威者的当天，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的

知识分子创始人之一亚当·米奇尼科在莫斯科采访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于戈尔巴乔夫似乎正朝着与民主相反的方向前进，谢瓦尔德纳泽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预言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带来灾难。他接着又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必要在目前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既然他能够同罗纳德·里根达成协议，为什么就不可能同叶利钦打交道呢？

> 我们的社会正在被严重的矛盾所撕裂，这些矛盾还使得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更加复杂。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对话消失了。没有了对话，就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
>
> ……这种冲突形势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一个独裁者。
>
> ……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重开对话还不算太晚。我们与美国实现了相互理解。我们与里根开始了对话……为什么来自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不能达成某种形式的理解呢？[34]

感到茫然的并非谢瓦尔德纳泽一个人。

第十八章

[498]

戈尔巴乔夫寻求妥协

我们的国家和联邦处境危险……经济滑坡，权力机构瘫痪……我们必须捐弃前嫌，防止国家滑入灾难。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联邦委员会

1991年4月9日①

我看真正的出路只能在于：总统赋予共和国更多的自由，而我们则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回报。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991年4月②

冬天里政治形势比气候还要严酷，即使春天来临也没有出现缓解。1991年4月2日，粮食和许多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猛烈上涨，这并非是市场力量的调节所致，而是由于总统的法令。面包、牛奶和蛋类价格涨了一倍，肉类涨了三倍或更多。服装价格是原来的两倍。政府发放了收入补贴，但根本无法与价格的涨幅

相比，有时看起来更像是在玩戏法。例如，人们的储蓄账目上被记上 40%的余额，但在两年中，他们提取的余额不得超过 200 卢布（在新旅游汇率中相当于 7.25 美元）。

如果商场里商品充足，公众可能还会接受价格上涨，许多城市居民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短缺却和以往一样严重，购物的长队蜿蜒好几个街区。

〔499〕 如果戈尔巴乔夫一年前同意实施沙塔林计划，他还可以把价格上涨归咎于共和国领导人，他们应当承担大多数经济政策的责任。但他坚持通过法令来治理（最高苏维埃多次拒绝价格上涨），使自己成为公众眼中的罪犯。

经济：能糟到何等地步？

3月，罢工浪潮开始了，今年像以往一样，也是由煤矿工人发起的。顿涅茨克煤田的矿工从 3 月 1 日开始，随后，库兹涅茨克煤田、北冰洋的沃尔库塔煤田和哈萨克斯坦的矿工们相继罢工。与一年前以经济要求为主的罢工不同，现在矿工们要求政治改革：他们拥护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坚持举行新的全国性大选。罢工持续了一个月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法令，命令矿工回去工作，并对罢工领导人进行刑事处罚。罢工者对此不予理睬。

为了保持信誉，戈尔巴乔夫拒绝逮捕罢工领导人或派军队押送他们回矿山。相反，他选择了谈判。4 月 3 日，他和总理帕夫洛夫会见了矿工代表，并且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广泛的让步，但在政治条件上寸步不让。他们保证在今后的 12 个月里分阶段加倍增长工资，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谈判在独立工会领导人与由共产

党支持的“官方”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由矿工组成的工会作为集体谈判代表，得到了实际上的承认。

4月份价格抬升，明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也开始罢工。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官方工会组织和企业管理者明显失去了对工人的控制。与矿工的谈判由于附带政治要求而难以达成协议。数周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只有叶利钦可以结束矿工们的罢工，因为他是唯一得到工人信任的政治领导人。

整个冬天，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成为局外人士。去年夏天，他离开了党的政治局，而他在总统委员会的职位也随着1月份该机构的取消而终止。不过，正如切尔尼亚耶夫在1月份预测得那样，他最终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当我听说他的办公室已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搬进克里姆林宫、靠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我请求和他会面。 [500]

他把会面日期安排在4月2日，正是实行价格上涨的那一天。我注意到他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有过去副总理使用的那么大——而在苏联的官僚世界中，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我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可能考虑重组老队伍，或者只是试图保护一位老朋友不再受到沙文主义者的频频攻击，这些沙文主义者肃清“新思想”的决心和麦卡锡在美国社会清除“左派观点者”一样坚定。无论如何，由于雅科夫列夫除了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外，不再有政治基础，他的影响力无法达到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程度。

他的谈话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我发现他比在最近的谈话中更加乐观。这并非因为他淡化了国家面临的困难，他说，改革遇到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说在土地上出现了“我们的新庄园主”，即国营和集体农场的经理。工业方面，反对派聚集在军工企

业中的“超级爱国者”的周围。

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军队的情绪极为低落。主权“欣快症”支配着许多共和国，不仅在俄罗斯之外，其内部也一样。如果这还不够，那么雷日科夫政府的财政错误，尤其是过度发行钞票，已将他们置于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他认为，国家正面临三个主要的考验：争取国民接受价格上涨，采取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最后，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实现每一条都有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实际上，他认为九个共和国可能很快会同意签订联盟协议。

雅科夫列夫提到的所有考验都是事实，而且4月中旬公布的当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字证明有些人所说的经济危机并非夸张。〔501〕数据表明这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8%，对外贸易下跌33.8%，进口下跌45.1%，出口下跌18.4%。而决定大多数外汇收入的石油产值减少9%，煤产量下降11%。

尽管预计全年预算赤字为167亿卢布，估计第一季度就达到了311亿卢布。这无疑对当时已由小跑转向飞奔的通货膨胀是火上浇油，到3月份为止，12个月中通货膨胀率已达22%，当然，这还是在4月2日价格提升之前。③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反应是继续采用威胁手段，这从上一年秋天开始就已经成为他的政策的标志。4月9日在小范围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④他要求共和国多采取财政惩罚措施，并对那些不按要求履行对中央义务的或是拒绝签订联盟协议的共和国以赔偿相威胁。他还呼吁停止罢工，并在工作时间禁止举行政治示威活动。关于改革，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敦促在下一年的农耕季节开始之前实施“土地改革”，并建议实施某些服务业和零售贸易的私有化

方案。[5]

中央电视台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全文报道。戈尔巴乔夫保证部长会议在一个星期内将为最高苏维埃处理这次危机提出方案。帕夫洛夫总理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做好准备，4 月 20 日，他就草案，与政府外的杰出经济学家进行讨论。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得到支持，那么这次会议是个失败。例如，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指出帕夫洛夫的方案没有提到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工潮以及预算、收支平衡赤字。

4 月 22 日，星期一，帕夫洛夫勇敢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他的“反危机方案”。在对当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做出可能下滑 25% 的最坏预测后，他严厉指责正在罢工的矿工们，并重申他的禁止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在许诺将迅速推进小型商业私有化时，他的方案实际上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将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官僚机构来监督农产品运送和分配，使其与中央计划相符合。在提到这些改革措施时，使用的措辞很模糊，还有一些是对未来的设想。立即采取的行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行政控制。〔502〕

代表们对他的发言没有任何反应，即使是敷衍的掌声也没有。但经过短暂讨论后，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它。几乎没人喜欢它，但别无他计，况且很明显，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唯一参加会议的共和国领导人，他声明，在新政府第一次提出其正式方案时，他将表示支持而不使其难堪；之后，他敦促要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减少中央化条款内容。他断言，有些条款将“把我们拉回中央的强制之下”，从而违反联盟协议草案已达成的规定。然后，他提出了一条尖锐的警告：

我坚信，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反危机方案的实施以及向市场过渡应建立在两项基础之上：实现全国经济环境的统一和承认共和国的国家主权。无论这一观念在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中遭到多少攻击，都不该违背它。[6]

换言之，只有将大多数经济决策权授予各共和国——即使对核心共和国也如此——才可以保证一个统一的经济环境。这是被政府发言人认为根本不现实的沙塔林计划的基本条款之一。其实，党内“保守派”已对改革完全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必须恢复中央计划调控。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还是最高苏维埃成员，他提出应“大力加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因素”，表现得比多数敢讲话的人还要强硬，而实际上，许多人赞同这一观点。

但是，对多数国民而言，急剧下滑的经济已使过去的机构和口号名声扫地。4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被提问的人中只有20%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主义”，而将近两倍的人（38%）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了”。1990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当时大多数人仍然赞同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7]

〔503〕

3月31日，在苏联15个主要城市进行的另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政府的威信已降到新的低点，对帕夫洛夫的部长会议表示信任的人数不到8%，而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占25%，15.7%的人希望看到联合政府，11.8%的人希望由民主俄罗斯组成政府。同一调查表明叶利钦的支持率达到61%，而共产党只得到15%。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支持总统权力的努力没有奏效，在过去六个月中形势明

显地在进一步恶化，只有井蛙之见的乐天派才相信帕夫洛夫的不足称道的政府能激起足够的忠诚或是畏惧来扭转正在瓦解苏联的离心力。

戈尔巴乔夫"摆向右派"的努力也没能使反对派走向中立。戈尔巴乔夫对于在立陶宛使用军队的反应含糊，他还以恶毒的措辞攻击"民主主义者"，这些都大大激怒了改革派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与此同时，保守派力量也开始要求他下台。

1990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内部的保守分子已开始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联盟，反对在他们看来具有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势力。他们坚持 3 月份的全民公决，其中更加直言不讳的成员则把矛头直指巴卡金、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美国使馆，我们看到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极端分子把他们对维护联盟的支持和狂热的反美情绪结合在一起，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但是，"联盟"组织的成员并非都公开敌视西方。该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有军工企业的代表，有来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也有一些非俄罗斯人，但他们或者已经被俄罗斯化了，从他们本来的民族中脱离出来，或者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担心权力从莫斯科转移到各共和国首府会带来歧视性政策。

我们和这一组织的成员保持着联系，包括一些社交性的邀请，但我个人还没有机会与其领导人进行一次认真的交流。由于他们 〔504〕 已成为苏联政治的一支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我认为进行一次会面是有益的，这将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团体可能会用何种方式维护联盟，同时也将提供一个机会，反驳极端分子所谓的美国正在阴谋瓦解苏联的指责。因此，我邀请这一组织的主席尤里·布洛欣和由他自己选择的其他几名领导人一起来共进工作午餐。他同意了，我们约好的日期是 4 月 11 日。

在我们约定午餐的前一天，整个新闻界都充斥着联盟组织正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要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总统管辖权，要么辞职的报道。布洛欣和其他人在4月8日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据报道他们对这次会面并不满意。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新闻界，他们反对目前的联盟协议草案，因为它赋予各共和国太多的自治权；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南奥塞梯建立秩序（格鲁吉亚军队还封锁着它的首府），以及正在考虑把南千岛群岛交给日本；攻击谢瓦尔德纳泽，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是向“他们自己妥协”；并正在讨论是否要求召开一次非常人代会来弹劾总统。[8]看来，我们计划的午餐将是非常有趣的。

布洛欣带着两名同事如约而来，他们是联盟组织的温和派：[9]格奥尔基·吉洪诺夫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获有经济学学位，在部长会议里任职，负责处理燃料和能源问题；阿纳托利·切霍耶夫是南奥塞梯人，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机关任职。布洛欣本人是来自摩尔多瓦的俄罗斯族经济学家。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否认他们曾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更愿意戈尔巴乔夫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秩序，通过恢复“垂直统一”——当然也就是指莫斯科的控制——来稳定经济，他们还否认他们认为美国企图使苏联解体，但希望我们能对维护联盟给予更多的积极支持。[10]

布洛欣在整个交谈中强调，他的组织维护联盟的努力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有权对不安定地区行使总统职权，而这正是他们主要要求。

来进午餐的联盟组织领导人无疑想装出一副最温和，最民主的面孔来掩盖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这个组织中不乏主张用武力维护联盟的人。到夏天的时候，它已成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克制

〔505〕

政策和愿意在联盟协议谈判中向共和国领导人妥协的最强烈的批评者。

上升中的叶利钦

到3月28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党试图剥夺叶利钦议会主席一职的热情已消失殆尽。全民公决结果清楚地表明，叶利钦的受欢迎程度保持不变，而戈尔巴乔夫由于调动军队进入莫斯科去对付群众的示威活动，使得许多代表大为反感，他们原本并非叶利钦的支持者。

然而，叶利钦要想登上总统宝座，仍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刚开始，议会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的压力开始影响议会的投票。4月4日，三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使事情出现了转机，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伊万·波洛兹科夫宣布"现在苏联领导层不应有变动"，这是停止迫使叶利钦退职努力的信号；一名迄今并不引人注目的阿富汗战争中的退役飞行员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者"团体，这为叶利钦阵营拉进一个重要的投票集团；以及在一个绝妙的时机，叶利钦要求授予他处理各种紧急问题的全权，类似以前苏联授予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正如我在数周之前在日记中所预料的，叶利钦成功地扭转了局面。他把他的攻击者们发起的推翻他的会议转变成一个政治发射器。他的敌人中有一部分仍在继续战斗。在对叶利钦的要求进行表决之前，在2月份最高苏维埃带头向叶利钦发动攻击的斯维特拉娜·戈里亚乔娃登上演讲台进行发难：

〔506〕

>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很明显，总统之职是您的主要目标。为了它，您已陷入欺骗和颠倒黑白之中，并准备竭尽全力，为了权力，即使使国家陷入危机也在所不惜。您会做出任何事来。
>
> ……一想到您占据总统之位，我便感到恐惧和战栗。您要求额外的权力，而您对手中已拥有的权力都还不会正确使用。[11]

有一阵子，她的声音几乎被口哨声和讥笑声淹没，但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利钦仍一丝不动地控制着会场秩序，让她把话讲完。

尽管戈里亚乔娃进行了激昂的控诉，代表们还是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叶利钦的提案，并在第二天通过一项动议案，[12]不仅通过法令赋予他临时权力，还赋予他几个月来一直寻求的东西：进行总统选举的确切日期。尽管俄罗斯宪法尚未进行允许设置总统职位的修改，但决议仍宣布将在6月12日选举俄罗斯总统和副总统。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下一次开会时间定在5月21日，届时将通过必要的宪法修正案。然而，代表大会并未给予叶利钦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大会否决了他提出的组建苏联联合政府，与中央政府就新的经济计划进行圆桌谈判的要求。[13]

在东正教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票。星期六晚上，他出现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大教堂，参加了由阿列克谢二世主教主持的复活节庆祝仪式。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进场、手持蜡烛、恭敬伫立并随着仪式变换姿势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对信徒而言，这有力地象征着俄罗斯领导人已经与传统的俄罗斯国家教堂达成和解，在过去它曾一

直受到好斗的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贬损和共产党政权的压制，数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叶利钦再一次抢了重角戏。戈尔巴乔夫虽然放松了对宗教团体的官方控制，并吸收教士进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不时地向他们进行咨询，但他不愿打扮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在公众眼中，他在成人以后从未到教堂做过礼拜。[14]叶利钦仍没有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的姿态已表明他将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中真正的、有价值的一部分来对待。[15]

一周后，叶利钦开始了法国之行。当时，外国新闻界将它视为一场公关的灾难，但俄国人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当他访问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时，欧洲社会主义立法小组主席吉恩·皮埃尔·科特当众攻击他为"煽动者"，以及与"我们认为更可靠的"戈尔巴乔夫对立是"不负责的"。[16] 〔507〕

这一事件，以及在法国之行期间受到的官方的冷遇，被苏联报纸作了详细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晚些时候也作了报道[17]——多数俄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他们对外国人竟然放肆地侮辱他们新当选的领导人感到憎恨。并且，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有意纵容这种侮辱；一则新闻报道说，苏联驻法国大使尤里·杜比宁曾正式要求不要给予叶利钦特别待遇。

叶利钦表示无意取代戈尔巴乔夫，相反，更希望通过"圆桌会议"产生一个联合政府，并保证支持联盟条约。[18]当他从斯特拉斯堡回到巴黎后，他和密特朗总统及其他高级法国官员的会晤也被拖延。

叶利钦的法国之行意想不到地对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明显表示了不快的情况下，密特朗还是决定接待叶利钦，这表明不论西方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个人

的迷恋程度有多深，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朋友高兴而无限期地无视颇受欢迎的叶利钦。同时，叶利钦公开表示希望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签订联盟条约以及使改革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实际上，这是他对2月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作了让步。正如叶利钦对法国记者所说：

> 戈尔巴乔夫没有辞职；他是国家总统……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必须为俄罗斯和整个国家不再受苦难而努力工作。尽管戈尔巴乔夫和我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也必须这样做。[13]

在2月和3月里，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任何和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现在突然出现了新的开端。两个人都已意识到，右翼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并决心把他们全部赶下台来。

〔508〕 当叶利钦还在法国的时候，我回到了华盛顿，希望在我们和叶利钦的关系方面能得到更多的令人满意的指示。自从他1989年被选进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就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从我的上司那儿却没得到任何鼓励。华盛顿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见他，我在国务院的同事们都认为有必要和他保持联系，但白宫官员对他的政治持久力表示怀疑，总统则担心会冒犯戈尔巴乔夫。我怀疑他们没让我疏远叶利钦只是因为他们担心新闻界会走漏消息，在国内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重要性正在急步上升，他的政策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寻求大力削减苏联军费预算，取消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不负责任的政权的援助，保障波罗的

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在国内，他支持真正的经济改革，包括承认私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无论怎样怀疑他的行政能力，或者民主原则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时他遵循这些原则的决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同他保持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完全理解使苏联发生如此剧烈震动的变革。此外，由于叶利钦的力量和权威正在上升，他将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通过民主进程掌握政权，因而，定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这并不是一个以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或是努力削弱苏联的问题，尽管有些人在为白宫的态度辩护时，其谈话方式似乎是承认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当然不应把叶利钦当作苏联总统来对待，或者去损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像对待反对派领袖那样对待叶利钦并没有违背外交准则。

实际上，苏联宪法明确赋予每个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的权利，并且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外交部，因此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在理论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比美国州长拥有更大的权力。我们的州长们在环游世界、与外国领导人会〔509〕面以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方面从不犹豫，而这些也正是叶利钦与我们交谈时也最感兴趣的话题。

有了这些理由，我不理解为什么白宫官员还认为我们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同他们二人都打交道，同时放弃这是在玩弄权术的想法。到4月中旬，我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可能很快会作出另一番努力去与叶利钦合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与他们二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这一努力。正如我在4月5日的日记中所写的：

最近七八天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改革者有利。如果叶利钦

下不了台，并继续巩固他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可能会被迫抛开个人恩怨，再次与他打交道。煤矿工人罢工可能将变成试金石，现在看来，似乎只有叶利钦有力量制止它。他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清楚表明，如果他寻求提高权力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为结束罢工做出努力。

至于戈尔巴乔夫，正如叶利钦一样，他也不可能没看到那些要求他下台的“右派”人士讲话的场面。遇到了像这样的朋友，他可能也会理解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将做一笔什么样的交易。

第二天，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路过斯帕索别墅，进来小谈，我们刚退休的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也正进行一次私人拜访，我们三人回顾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科济列夫主动地说，形势正迫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寻求和解。3月28日，戈尔巴乔夫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阻止群众示威，使得双方都感到害怕。突然出现的可能引发内战的危机成为一个威慑物。“它就像美--苏关系中的核武器，”科济列夫说，“一旦我们认识到危险，就该想到我们必须合作，防止使用它们。”他继续说，叶利钦可能当选，这将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让步，不论他个人喜不喜欢。他笑着不愿透露他讲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你只有具有实力才可以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

〔510〕 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是，如果叶利钦访问华盛顿，我能否向他保证布什总统将接见他。他已接到国会以及好几个民间组织的邀请，但他更希望接到来自行政部门的邀请。我向他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似乎也接受了。但如果他得不到会见布什总统的保证，他根本就不想作美国之行。直到1991年4月我回到华盛顿

之前，我一直被明确告知不要向叶利钦作任何这方面的承诺。

4月18日下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布什总统，用大部分时间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我认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相关联的，不管他们如何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我指出，从去年秋天以来，戈尔巴乔夫已偏离了改革的轨道，同时也违背了他对叶利钦所作的承诺。从那时起，他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迎合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因为如果共和国控制了财政，他们将大量削减提供给军事部门的物资。我还提到科济列夫的观察，即双方都受内战威胁的制约，他们的顾问都敦促妥协。到底双方能否取得和解还有待观望，但在我看来，除非授权叶利钦赋予煤矿管理自治权，否则结束声势越来越大的罢工的希望很小。这将要求摆脱中央部委——在工人看来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管理。

针对目前的这种形势，我建议应和苏联国内各个派别进行交流，但不要被卷入到它们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去（为促使我们抵制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正在利用我们的国内政治斗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敷衍中央共和国，与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地方，即城市和地区打交道。我还认为，援助应当直接给予私营部门，而不应该如戈尔巴乔夫所敦促的那样经过中央政府分发下去。

总统问及戈尔巴乔夫刚提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的15亿美元额外信贷保证要求，我告诉他我认为这纯属国内问题。国会已通过方案支持美国农产品出口。假如总统认为这对我们有利，而我们又相信苏联能偿还这笔贷款，那他应该批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苏〔511〕联经济改革的援助，他不应同意这一请求，因为这笔贷款起不到那样的作用。实际上，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粮食短缺，而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却正在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认为任何大笔数额的贷款都应用来支持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我和布什总统谈话的第二天，已作为主要苏联事务专家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爱德华·哈沃特同我进行了联系，他说，我返回莫斯科后可以照会叶利钦，如果他来华盛顿，总统可以与他会晤。但在此之前，我应拜访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解释布什总统将保证叶利钦不利用这次访问来破坏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关系。

9＋1

4 月 23 日，在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在郊区的一幢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在长达九个半钟头的马拉松会议上，接见了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晨，《真理报》刊登了由与会 10 人联名签发的一项声明，呼吁制定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采取措施稳定正在崩溃的经济。[20]这个宣言对正在加速瓦解的局势起到了刹车的作用。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准备向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让步了。

在制定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每况愈下。事实表明，所有的共和国都不接受先前的草案，独立热正在扩散。经过几次拖延之后，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正式谈判于 4 月初拉开了帷幕。[21]4 月 9 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经过表决，一致通过重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退出谈判。

随着离心趋势的加强，4 月 18 日，5 个“核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基辅会晤——〔512〕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日本访问——协调它们在联盟条约中的立场。与会者赞同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提出的要求，即条约创立的是主权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或者说很像是 8 月份哈斯布拉托夫向我描述的那种松散的邦联。此外，他们反对给以前的“自治共和国”与新联盟共和国相同地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出自戈尔巴乔夫，他试图通过迎合俄罗斯“自治区”来削弱叶利钦。[22]

4月23日的协定标志着对于共和国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尽管许多细节还需协商，协定似乎为戈尔巴乔夫和大多数共和国，包括几个最大的共和国进行一笔巨大交易提供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称协定是联盟的一个重要胜利，并首次称之为“1＋9”协定。但是与德国统一谈判中的情况一样，数字的排列顺序意义重大，几天之内，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坚持下，公式被改为“9＋1”。

1991 年 4 月 24 日，联合声明在中央的新闻报刊上发表，为了响应前一周“核心共和国”在基辅的决议，它明确提出，新联盟条约针对的是“主权国家”，将需要一部新宪法，在条约签订后六个月内提交议会。然后，根据新宪法进行新的选举。

声明似乎巧妙地解决了脱离联盟的问题，它宣布凡签订了联盟条约的共和国将享受最惠国待遇。声明虽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共和国的地位，但暗示了它们将被排除在新联盟之外，并将以主权政治实体的身分与联盟谈判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我问戈尔巴乔夫的一些顾问这是否属实时，有人承认这将为脱离联盟提供一条轻易而且自动的途径，而其他人说，不紧跟新联盟会使各共和国作为苏

联的一部分，继续保持现在的地位。但他们无法解释如果新联盟取代了苏联会怎样；苏联的机构将会消失，将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来维持中央与共和国的现存关系。

〔513〕 戈尔巴乔夫不仅被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新联盟的概念，还被迫缓和他先前颁布的增加税收和价格的命令。例如，他同意从1月1日起减征5%的销售税，增加给学生的奖学金，并降低飞机和火车票价格。

戈尔巴乔夫似乎第一次走到了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建立松散联盟这一要求的边缘。强硬派显然被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激怒了，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抵挡住强硬派的反攻，他也许还能在"核心共和国"维持住某种联盟结构，并在其他共和国有秩序的脱离时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推翻他在11月和12月组织的政治联盟，同时，能确保决心维护老帝国的人们无法推翻他。

保守派攻击戈尔巴乔夫

对戈尔巴乔夫的下一个考验来自"9+1"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几周来，盛传着这样的流言：党内强硬派将利用这次会议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些地区的第一书记还公开鼓吹，作为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将被迫辞去党内职务。[23]然而，最高苏维埃对帕夫洛夫"反危机方案"的批准，尤其是"9+1"声明的签署，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声明正好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当天早晨发表，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走向团结的一个政治突破。它的深远影响是逐渐显示出来的。

此外，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宣布亚美尼亚政府把共产党的财

产国有化是非法行为，以此作为平息党内保守派的另一步骤。[24]当时，我怀疑他如何才能实施这一命令，但这不是关键：他想挺身而出阻止共产党的进一步瓦解，并以此使人们不去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传言。

有谣传说，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将认真考虑撤销戈尔巴乔夫的党内职务问题，这一谣言流传已非一日。而从苏联最高官员们的行动来看，他们似乎也相信这一点。有一次国务卿贝克访问中东期间，我们准备安排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他在高加索山脉附近的一个疗养地会晤，但别斯梅尔特内赫请我向贝克解释他无法在贝克所希望的时间赴约，他说："告诉吉姆，4 月 24 日我无论如何得呆在莫斯科。我不能缺席这次全体会议，因为戈尔巴乔夫需要他所能得到的每一张票。" [514]

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似乎又以智谋战胜他的批评者。他在开幕词中发出警告说，如果他被迫辞职，就会产生一个权力真空，导致独裁。他对"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都进行了抨击，以表明自己是坚定的中间派。然后进行了投票，结果要求讨论他的辞职问题和要求他递交一份述职报告的两项动议都失败了。另一项动议要求讨论将党的总书记和总统职务分开的问题，最后也失败了。

尽管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仍在继续，并且大部分相当恶毒。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通常有现场直播，或者只延迟几个小时转播，而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则不同，中央全会是在封闭中进行的。只有一些零碎的报道，会场外的人很难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 4 月 24 日会议后，大多数报道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击败了对他的地位提出的挑战。

4月25日，全体会议继续进行，但是中午过后，关于戈尔巴乔夫

辞职的谣言传遍莫斯科。那天下午，我在一个大型公共集会上发言并回答问题，会散后我立即赶往芬兰大使哈基·塔维蒂的宽敞宅邸参加一场音乐会。音乐令人愉快，但不能拴住我的思绪，因为我还没听说全体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场间休息时，编辑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告诉我，他已听说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消息，并差点在那天下午截稿之前把这则消息列为《论据与事实》的头条新闻。然而，他决定还是先不去冒险，等有了正式通告再说。

音乐会结束后，我渐渐地打听到会议的情况。在接受了一上〔515〕午的严厉批评后，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宣称，总书记只有在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工作，因此，“如果这就是你们支持我的方式，那我宁可辞职”![29]

他的声明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会场，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立即宣布会议暂停。休息期间，中央委员会的72名成员联名请愿，如果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也辞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事情突然变得很简单，如果同意戈尔巴乔夫辞职，将意味着共产党本身的结束。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将跟随他一道辞职，而且以他的地位，他可以利用国家官僚的权力来瓦解共产党的机构。叶利钦已经显示了一个脱党者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戈尔巴乔夫加入到他那边，来毁灭共产党，那么会场里多数成员也就前途渺茫。

会议继续进行后，伊瓦什科宣布政治局决定将最后一条建议从记录中删去。这一建议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在日记上简短地记下了以下评论：

其实，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辞职，可能对他也没坏处。例如，斯塔尔科夫就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机会去反对共产党机

构，因而将增加他的声誉。这是一种可能，但他也可能给人以一个受到致命伤害的领导人的印象，而反对派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把他从总统的位置上赶下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看来他已赢得了一些时间，也许还是相当充裕的时间，这要取决于他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的交易是否坚定。

后来，我想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否真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不稳。所有的选票绝对地支持他，这可能表明大家的情绪不像想象得那样消极。然而，我意识到投票结果本身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毕竟，几乎不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希望被人发现是在往失势的一方投票（尽管实际上处罚已大大减少了）。因此，许多反对他的人可能会投他一票，直到确信他的对手占据优势。那时，选票可能会大部分倒向对方。

事实上，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但4月份的全体会议上的确 〔516〕有一个“倒戈”阴谋，是由后来参加8月政变的一些人组织的。随着政变领导人的被捕，调查者发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厂厂长、国营企业协会领导人亚历山大·济兹亚科夫在4月全体会议前组织过对中央委员会的一场电报战役，要求整顿经济秩序。他的目标是说服全体会议同意免去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类似于8月份组织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计划包括在会议上控制讲坛，以使“倒戈”更加有力，并把独立的新闻媒介排斥在会场之外。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将着手“恢复苏联共产党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权威”。[29]

戈尔巴乔夫在4月25日的谋略为他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反对派并没有承认失败。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4月26日，星期六，我总结了几天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本周非常重要。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意义重大的行动，叶利钦和其他几个主要角色也是如此。如我前面所说，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真的有失去党内职务的危险（虽然我怀疑他有），而且也不能肯定失去党内职务将会使他失去总统一职。无论如何，如果他要辞职，还是不要被迫辞职的好，时机最好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

目前，我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但是，他可能只是赢得了一些时间，问题是他是否能好好地利用它。在我看来，他已向极右势力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使用合法的手段，他们也无法撤去他的职务，同时他还迫使改革派看到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他离开。因此，现在是再次摆向"左翼"的理想时间。他似乎已为此搭好了舞台，但我不能肯定他会上台表演。

叶利钦在新奥加廖沃声明上的签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很难相信他真的支持宣言中的某些方面。但是，他一定已经认识到（甚至在去法国之前）：在自己的地位还不足以取代戈尔巴乔夫之前，迫使后者辞职对自己并无益处。因此，他至少也得表现出一个合作者的姿态。决定性的问题看来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在共和国权力上作出更多让步，以及叶利钦是否能解决罢工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推动力变得越来越大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会接受圆桌会议，甚至一个联合政府。而事实可能已经如此。

〔517〕

试金石：主管经济的部委将向何处去？只要戈尔巴乔夫继续依靠它们，他就会陷入麻烦。因为尽管这一体制将继续瓦解，但各共和国的观念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我们将拭目以待。"

并非所有的改革派都对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其党内职务感到高兴。当下一周我拜访谢瓦尔德纳泽与他商讨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时，他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在挫败了逼他辞职的企图之后，应自愿辞去他的党内职务。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自愿脱离共产党，他将使自己从党组织中解脱出来，带着改革派离开共产党，并再次在公众中获得声望。这虽然会分裂共产党，但它将加强他们正努力发展的多党制，因而是有益的。他说："应该让（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和'民主派'成立它们自己的政党，其他派别也一样。"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继续成为强硬路线分子的俘虏，被迫采取可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施的政策。在他看来，最近帕夫洛夫总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就是指的这个方向。[21]

但其他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经充分准备就试图分裂共产党将是鲁莽的。就在我会见谢瓦尔德纳泽的当天，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我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位，许多人将把它解释成是一次政治失败，它还可能导致他的总统职位也迅速垮台。

叶利钦，当选总统

〔518〕

1991年4月24日，即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击退反对者的同一天，叶利钦越过了他成为总统的另一个障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法案。任何能征集到至少10万俄

罗斯公民签名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6月12日的选举。投票以无记名方式进行，当选者须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这改变了议会选举中要求参选者所获票数须超过登记投票人数一半的规定。法案进一步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在任期间须终止在政治党派和公共社团中的成员资格。同时规定：如果总统违犯了宪法、法律或就职誓言，经宪法法庭——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裁定、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2/3的票数通过，总统将被免职。[29]这一条款在两年后引发了一场冲突。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虽然通过了设立总统法案，但它还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俄罗斯宪法的适当修改，人代会召开的时间定在5月21日。叶利钦和他的对手都希望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修正法案，叶利钦的敌人也不再反对修改宪法，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选举活动。

我不能不对苏联政治的反复无常感到惊讶：几个月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拒绝建立总统制，而且就在六周前，叶利钦还面临着被撤除议会主席职务的严峻考验。而现在民意已毫无疑问地转到他这一边来，甚至对他的领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迫于民意而支持他。

9＋1协定和俄罗斯议会通过总统制法令后没几天，叶利钦结束了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矿工罢工，从而显示了他的政治实力。叶利钦向矿工们许诺，接受他们的条件，把他们从联盟中央煤炭工业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结束罢工，叶利钦为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缓解了一些直接的压力，但也显示出他们已不能离开他的合作，此外，如果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迅速取消的话，这种缓解也只能是暂时的。帕夫洛夫似乎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戈尔巴乔夫似乎有一度已认识到了这一点。

[519]

叶利钦挑选的竞选伙伴着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他排除了曾给他不断支持的民主俄罗斯中的许多优秀领导人，而选择了阿富汗战争中的老兵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他曾在3月份叶利钦受到弹劾威胁时，率领民主派共产党员支持他。

当时，这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一招。多数军官本来是反对叶利钦的，但有了鲁茨科伊这一票，叶利钦可以希望吸引一些军人，甚至是仍在共产党内的温和的改革派。由于俄罗斯副总统和美国副总统一样，其职责规定非常含糊，看来谁当选副总统都不会有重要影响。因此，像许多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叶利钦的选择建立在短期政治需求的基础之上。

当俄罗斯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角逐结束时，除叶利钦外，产生了五名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现在已从心脏病和在他看来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成为最难对付的对手。[23]他似乎得到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但也表现出失败者的形象。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力图阻止叶利钦获取多数票的瓦季姆·巴卡金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在多数人看来，他似乎最有实力把选票从叶利钦身上拉走，因为他受到温和的改革派的支持，并且比叶利钦显得更具有民主作风，因为叶利钦不断地在民粹党的花言巧语和地方共产党书记的独裁作风中摇摆不定。

如果俄罗斯政治还有主流的话，其他的候选人似乎已经脱离了这个主流。阿尔伯特·马卡晓夫，一位大胡子的三星级上将，其〔520〕竞选纲领充满了法西斯主义。阿曼格尔基·图列耶夫是一位来自克麦罗沃的哈萨克族人，克麦罗沃处在俄罗斯与哈萨克的边界上，他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地方主

义者。[49]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这些名气较小的候选人中最捉摸不定的一个，无论在组织工作或是资金方面，他似乎都有备而来，但这两者的来源似乎都很隐讳，而且，至少在竞选运动开始前，他的政治纲领也很含糊。

日里诺夫斯基首次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亮相是在1990年6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前几周。他的自民党是那次选举前第一个正式注册的，甚至在共产党之前，并且在电视黄金时间他还有几分钟的镜头宣布其政党参加竞选。他声称，他的党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自由民主。

我对此感到怀疑。1989年12月，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葬礼中，一个名片上印着沃罗尼的人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萨哈罗夫的亲密朋友，并帮助我们在人群中开路。他似乎是在帮助葬礼的组织者，当叶琳娜·波纳邀请我们去墓地时，他主动向我的司机指路。我们在车上攀谈时，我断定他没有明确的职业：他50刚出头，说是因残疾而退休，但究竟是什么残疾，他既没有谈，也看不出来。他自称是一个将“遵循萨哈罗夫的理想”的政党的组织者。但后来，当我问到叶琳娜·波纳是否认识他时，她断然声称他从来不是萨哈罗夫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个“骗子”。我不再和他联系，但数周后，在匈牙利使馆的招待会上，沃罗尼和我搭话，并向我引见他的一些“政治伙伴”。他们说，他们正遵循萨哈罗夫的理想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共产主义政党。他们每人给了我一张名片，其中一张印有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名字。

回到使馆后，我叫我们的人调查这个组织。我们已经和莫斯科奉行民主政策的多数政治家们建立了联系，我很奇怪怎么会漏掉了这一个——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一方面，他们的态度令人生疑，但同时我认识到我们并没有认识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人，而

[521]

新的领导力量可能来自社会的隐蔽之处。

几天后，我得到了答案：当我们的人打听这个组织时，得到的回答是，多数负责任的俄罗斯政治家怀疑它是由克格勃、或是由其中的某些人资助的，用来分散真正民主力量的选票。我指示我们的外交人员避免进一步与这个组织接触。我们的联系已受到在政治上相当活跃的苏联公民的紧密注视，没有理由再用我们的注意力为日里诺夫斯基的组织增添合法性了。

1990年春天，苏联新闻界对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党的重视程度似乎证实了我早些时候得到的报告。很明显，该“政党”在苏联官僚阶层中有实权在握的朋友，因为其他政党的注册困难重重，并总是被拖延，即使有机会上电视新闻，时间也少得可怜。

叶利钦在俄罗斯建立民选总统职位的成功，对其他民主运动政治家们通过选举在低级别的组织任职是一个鼓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委员会的主席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所在城市的市议会四分五裂，他们要想得到市议会的持续支持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建议修改城市宪章，经普选而不是由委员会选举产生市长。两个城市都采纳了这个建议，选民在选举总统的同时，也投票选举市长。正如叶利钦正在准备用直选挫败他在俄罗斯议会里的对手那样，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在他们管辖的城市里采取了同样的手段。

竞选运动充满了活力，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自由和更有效率。民主党派、团体和联盟除了在支持叶利钦问题上能够团结一致外，自身仍在继续分裂。例如，由尼古拉·特拉夫金领导的俄罗斯民主党4月25—27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会议，尽管他呼吁建立广泛的联合来支持叶利钦的候选人资格，还是遇到了来自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和群众示威活动最有能力的组织者、物

理学家阿尔卡·穆拉谢夫的分裂活动，他们放弃与特拉夫金联合而组成了自己的政党。

[522] 在此次竞选中，戈尔巴乔夫没有像1990年5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议会主席时那样，公开反对叶利钦。然而，几乎无人怀疑瓦季姆·巴卡金是他的代理人。尽管多数观察家认为叶利钦将获胜，有些人认为如果巴卡金获得10%或更多本该投向叶利钦的选票，叶利钦可能将被迫与雷日科夫决一死战。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中以超过57%的得票轻松取胜。如预料得一样，雷日科夫排在第二位，但得票比预测的20—25%要少，他只获得了17%的投票。而真正的意外来自第三名，他并非预测的瓦季姆·巴卡金，而是神秘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获得了600万张选票，将近所有选票的8%。其他人获得6%或以下的选票。巴卡金出人意料地落在了最后，仅获得3%多一点的票数，选民的不满不是冲着他而来的，而是冲着戈尔巴乔夫的。

尽管这是一个严酷的政治打击，戈尔巴乔夫还是极有风度地接受了叶利钦的当选。1991年7月4日，他出席了叶利钦在议会大厦的就职仪式。叶利钦对俄罗斯宪法和苏联国家主权宣言宣誓。在就职演说中，他明确指出，民选总统的产生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与苏联可能出现的局势大不相同：

> 俄罗斯公民选举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名总统……他们选举的是我们的祖国要走的路。
>
> 大俄罗斯正在崛起……历经重重磨难，带着明确的目标，我们可以绝对相信：俄罗斯将再次振兴![31]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大主教阿历克谢二世向这位俄罗斯新总统祝福。

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位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他也是自189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第一位在教堂中寻求赐福的俄罗斯领袖。

〔523〕

第十九章

盲人的讹诈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的边缘……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1991年6月17日[1]

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不存在危机……有人就是喜欢在总统和总理之间拨弄事非。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
1991年6月21日[2]

我们（民主主义者）已瓦解了这个国家，但还未能将它重新组织起来。

加夫里尔·波波尔　1991年7月[3]

1991年春夏，苏美关系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海湾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与苏联遗留的主要问题上来。两国外交部长每月会晤数次，两位总统几乎每周都在电话上进行谈

话。我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会见一位或几位苏联高级官员——如果不是总统、总理或是外交部长，那么至少也是他们的高级助理。

尽管戈尔巴乔夫竭力阻止由美国一家领导的海湾战争，但他还是恪守他在赫尔辛基对布什的许诺：与美国合作，结束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虽然戈尔巴乔夫好几次都快要下令或允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但当我们声明这将会使我们的合作面临危险时，他都改变了主意。对此华盛顿一方面心怀感激，同时对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地位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但是，还有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苏联军方还在对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协定推诿义务。谈判人员对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争论不休；尽管一年来已经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最近的一个争论是关于减少弹头装载问题——是否同意及在什么条件下减少多弹头导弹负荷数量，使其低于过去试验的最高数目。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没有通过保证自由移民权利的法律（尽管实际上希望移居国外的公民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1990年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的贸易协定尚未递交国会审议。 [524]

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原来订在1991年2月，但由于海湾战争而推迟，新的时间安排尚未确定。总统希望访问莫斯科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协定，但他知道，即使战略武器问题得以解决，在苏联还没有完全履行一年前签订的常规武器协定的情况下，这么做将是不明智的。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变得焦躁起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布什推迟访问苏联感到不舒服。他没有预料到他在4月份提出的请求用于购买小麦的15亿美元信贷保证迟迟得不到批准；而对于他是否会被邀请参加7月份的七国首脑会议也没有把握。在国内，

他也因“天真地支持西方利益，而不为苏联谋求同等的利益”而遭到政敌们的指责。

乔治不再爱我了！

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署的被专家们称为CFE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是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几个事件之一。它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欧洲的军队和武器，而且在许多地区对军队人数作了最高限制。为了实现最终达到均等的原则，苏联同意接受不按比例的裁军。

〔525〕 然而，条约签署后不久，就有苏联最高指挥部试图违反其中某些规定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些（包括乌拉尔东部军队的突然移动）违反了协议的精神，其他的（不包括海军步兵部队——苏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称呼）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违背了协议。戈尔巴乔夫无力保证苏联军事力量完全遵守协议是导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原因之一。

由于苏联的违约行为，美国及其盟国拒绝批准这一条约。有关纠正苏联行动的谈判从冬天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春天，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苏联逐渐开始让步，但也只是一次让一小点儿。这是葛罗米柯战术的又一次重演。

但到了5月，只剩几个问题尚未解决。我受命去见戈尔巴乔夫，敦促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时间定在1991年5月7日，星期二。

戈尔巴乔夫会见我时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在场。他仔细地听取了白宫要我转达的几个问题。鉴于苏联外交部无力保证苏联军队遵守协议，我们建议戈尔巴乔夫派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塞耶

夫将军去华盛顿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深知尽快解决有关欧洲裁军的一些遗留问题并使条约能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他已经就解决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但他还是同意了派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

然后，他把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搁到一边，从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开始用伤心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并不时地沉浸于这种悲痛之中，这种做法常常能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这时候去看手表是不礼貌的，但我肯定他持续了至少15分钟，更有可能是20分钟。

他说，令他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什总统在“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在一系列问题上用的是批评的语气。此外，他已得知他请求购买小麦的信贷遭到否决，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障碍的报告。例如，尽管里根和布什都向他保证过没有出口限制，而一年前他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时，也亲自〔526〕签署了有关的合同，然而美国还是拒绝出口能提高苏联核电站安全性能的计算机设备。他对我们为什么不把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能看成是共同的利益感到不理解。此外，他还获知一项开辟商业航线的协议合作工程在办理许可证时出了问题。

他在喋喋不休的谈话中，提到了我刚刚宣布的离任计划。“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呢？”他带些夸张的口气问，并补充说，我们已“卓有成效”地合作了好几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决定结束我的大使生涯。“也许是你认为这条船快沉了？”他盯住我，随即又用一个突然的微笑化解了紧张气氛。

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解释道，布什总统并没有放弃对改革的支持，如果偶尔在华盛顿听到了批评的声音，那只是对诸如苏联违反了欧洲裁军协议一类的具体行为而言。至于经济关系，据

我所知，关于购买小麦贷款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请他理解布什总统在做出任何积极的决定之前必须面对许多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尤其是我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供贷款的可靠性，而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我提到“信贷可靠性”再次激发了他的情绪，他抱怨说，布什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应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而他的批评者们正利用他的这个讲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讲话来反对他。

我指出他是在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我将离任纯属个人原因，在致力于研究苏联事务八年后，我感到我应该做些别的事情了，来一位新大使对我们大使馆也有好处。我认为布什总统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苏联的改革和他本人，而他则应该认识到，只要他坚持维护他的集权式的行政体制，我们要支持他就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我们希望看到取消中央部门的垄断体制，而实际上，它们在新“内阁”中得到了维护。我说：“如何组织你的政府当然是你的事情，但我们无法帮助你让你的现行体制运作起来。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况且，我们对操作你们这样的体制也毫无经验。”

〔527〕 关于小麦贷款问题，我说我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同时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改进苏联国内食品的分配结构。我用我们在1985年初次见面时，他对浪费问题的看法来提醒他，并指出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我对用不断举债的办法来填补犹如无底洞的腐败的国家部门是否明智提出了个人的疑问。这笔贷款必须在三年内偿清，而苏联正需要资金来进行经济改革，这无疑将是新增添的负担。

顺着话题，我提出了移民法案的通过问题（我听支持法案的人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说，在最高苏维埃，除非戈尔巴乔夫本

人对它给予有力支持，否则它将无法通过）。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经常是冗长的，但他通常也是一个好听众，若有他手下的人在场则例外。我可能讲了和他一样长的时间，但他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完，不时地做点笔记。然后，就我的观点再谈他的看法。

关于中央经济部门，他说当然得取消它们，但还不能马上行动，否则会引起混乱。因此，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试探，以便合理地向市场体制过渡。他说，新化学工业部部长已经制订出取消该部门的方案。

关于移民法案，他说对其花费和实施方式有些担心，但他对法案将被通过表示乐观。我指出现在法案的条文为行政当局推行它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我希望这不要被用来作为再一次拖延的借口。

我们一致同意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他的观点，我还向他保证布什总统仍保持着与他的工作伙伴关系。

然而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接见报业大王鲁伯特·穆德赫时，他仍处于狂怒状态。实际上，他在公共场合里比在前一天会见我时更沉迷于尖刻的评论。在记者们面前，他也无所顾忌，居然暗示说布什政府正在冒险挑起一场新的冷战。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起了布什总统的注意，正如两年前在得到类似的模糊信息后所表现的一样，他迅速作出反应，保证将继续维持两国目前的关系。正巧布什总统计划在5月8日接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领导——立陶宛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总统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和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我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报告在头一天送到，戈尔巴乔夫接见穆德赫时的公开讲话在8日早上也送到了，它们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 〔528〕

至使他似乎忘记了他的来访者的身份，他利用这次接见极力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简直是既不合情理，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在他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之前，布什就告诉记者他要把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紧密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关系”公之于众，戈尔巴乔夫的成就是“巨大的”。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来寻求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在会晤中，布什的话几乎成了一种侮辱。他们误解为布什很可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害怕的那种交易，即倘若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走自己的路，美国对它们的困境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 月份，华盛顿发出的严正声明消除了他们大多数的疑虑，但此刻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疑虑被再次唤起。

并不是说布什总统应该利用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会见的机会来批评戈尔巴乔夫，这既不合适，又毫无用处。即使私下告诉他们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阻止强硬派对他们使用暴力也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妥，但在他们的访问中，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他们的自由的承诺上。

应该找一个不同的、不相关的场合来向戈尔巴乔夫证明他的顾虑毫无根据、甚至是自找的。

戈尔巴乔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来自华盛顿的批评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例如，他允许对国内动乱进行镇压、无力应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其他地区的暴力活动，对他的将军们违反庄严的条约被动无措，以及对高级官员们对西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容忍……布什总统也可以列出一个单子，它将比戈尔巴乔夫的单子给〔529〕人更深刻的印象。布什没有必要强调什么“保证”，或好像自己是缺理的一方似的。然而，他明显同情他这位苦闷的同事，他的反应方式

向戈尔巴乔夫暗示出：无论何时戈尔巴乔夫需要布什的帮助，他只需要抱怨说乔治的热情已经冷却，这就足够了。

然而，布什并没有把他的反应只局限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访期间的公开讲话中，他还更加得体地立即致函戈尔巴乔夫，安抚他表现出来的忧虑。5 月 11 日，星期六，他拨通了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向他保证他并没有拒绝贷款请求，但还有一些法律技术环节需要打通。同时，他还将派遣农业部副部长理查德·克劳德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考察用何种办法美国能够帮助改进粮食的分配方式。话虽不多，但足以表达良好的意愿，戈尔巴乔夫同意在代表团抵达后接见他们。

周末，当我把总统的信函交给切尔尼亚耶夫时，我也试图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一些抱怨作了解释。我们的商务参赞吉姆·梅并未发现近期对电脑设备出口许可证有过拒绝，但他确实知道在支付款项未达成协议之前，向核电站出口他们订购的电脑设备的确被延误了。我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封信说明这个情况，并告诉他："有人让你们的总统相信是我们在阻挠这些电脑设备的装运，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你们的官僚没有按时支付清单，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切尔尼亚耶夫轻笑着咕哝着类似"全世界都一样"的话，向我保证他会向戈尔巴乔夫讲明这个情况，并还保证在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之前把话带到，以便在他出发前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

与欧洲裁军条约有关的问题本身虽然相对较小，但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苏联军队已经在摩尔曼斯克和克里米亚半岛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装备，并想突破协议规定的最高限制。他们还坚持认为护卫战略导弹基地的军队的装备不应包括在内。然而，协议并没有规定这些例外。

〔530〕 5 月 20 日，莫伊塞耶夫带着一些新建议来到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直接磋商。在讨论过程中，他说这些部队的使命与其说是保卫外部安全，不如说是确保国内安全；它们将被用于平息内乱，而不是对抗西方的冲突。美国人对防御导弹基地表示同情，但认为应该严格将谈判达成的限制性条件应用于海军陆战队，因为这毕竟在条约中有明文规定。

莫伊塞耶夫的访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苏关系，但美国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不过，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实际上，协议是在 6 月 1 日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在里斯本会晤时达成的。6 月 14 日，所有参加了欧洲裁军谈判的大使们汇聚维也纳，对条约有争议的解释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布什总统可以带着欧洲裁军协议到参议院请求通过了。

数周后，布什总统才对信贷保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同时，克劳德代表团如约来访莫斯科，和苏联农业官员商讨了几项实验计划。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团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热情地对计划表示赞同，但当克劳德说需要有关对苏贷款可靠性的更加详尽的材料时，他又被激怒了。

“我们总是按时付清贷款，”他愤怒地说，“我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再多问简直就是侮辱！”克劳德解释说，我们的法律要求在决定贷款可靠性时有数据加以证明，这绝不是侮辱，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听这种解释。

无论何时，只要戈尔巴乔夫因受挫而发火时，脱口而出的都是当时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也不管是否与本题有关。当时，他说布什被身边的“反苏顾问们”所包围，他们尽向他灌输错误的信息。他甚至点了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盖茨的名，他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并被布什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

说到这时，我也被激怒了。如果说有人因得到错误信息而应该抱怨的话，那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他指出，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向他汇报的显然都是假情况。就我〔531〕所知，美国情报机构和盖茨本人从未向总统说过谎。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可能不同，但他们只是诚实地向总统呈报他们的看法，而不是虚假的事实。我决不能让戈尔巴乔夫为所欲为地释放他的主观臆断。

在他的指责被译成英语转达给我们的代表之前，我用俄语插话说："你所说的既不正确，也不公正。盖茨的反苏情绪与克留奇科夫的反美情绪相比要弱得多！"

戈尔巴乔夫咕哝着说他对盖茨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我们对克留奇科夫有我们的看法一样。然后，他把话题重新转移到请求贷款上来。"我本人已向布什总统申请了贷款，"他说，"如果他批准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批准，那是他的事。"

6 月 11 日，我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关于购买小麦的 15 亿美元贷款请求得到批准。

寻 求 支 持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所承诺的他们间的友好关系的持久性感到忧虑，部分原因在于克格勃的报告扭曲了事实，无论如何，即使不怀疑美国总统本人的忠诚，他也还是有理由担忧的。到 1991 年春天，苏联经济明显走向崩溃，所有的解救办法都含有一剂可能致命的政治毒药。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有一位"解围之神"到

来，要是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朋友们汇集起来，动员一场巨大的国际援救行动该多好！他们毕竟曾为挽救弹丸之地科威特而倾注了几十亿的援助，并拿生命作出代价。可以肯定，为了让一个致命的威胁转变成一个合作伙伴，提供这笔甚至更多的援助是值得的。此外，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至少在私下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保证过对自己的永久支持。在一年里，区区200—300亿美元的援助只不过是他们削减国防预算所节省开支的一小部分，而这就能保住他的职位，况且，这笔节省的款项还是由于他的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参加定于7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532〕济强国的首脑们的下一次七国会议。他确实期待着接到邀请，成为那个特别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④]4月和5月份，戈尔巴乔夫经常通过私人电话来试探七国成员是否有邀请他去伦敦的可能性。

当我在5月初通过私人途径了解到这些时，我不禁焦虑起来。我并非怀疑他能接到邀请——七国中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愿意得罪他，或是由于公开拒绝而增加他的国内问题，而是现实根本不会有可能让他满载着承诺或是七国集团的完整的成员资格而归。

七国集团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和政治困难，使得对苏联的援助成为艰难的事情。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近期实行了一项有争议的增税政策，而总统正面临着来年的竞选，在这个时候，任何额外的对外援助都无异于自杀行为；德国此时正开始动用庞大的资源财富，让东部国土赶上西方的水平；日本仍然坚持在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之前归还南千岛群岛，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显然还不足以可以割让土地，尤其是在“失去”东欧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其余的各个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只提供很少的帮助。

此外，苏联还没有采取改革步骤，以便有效地使用外国援助。

戈尔巴乔夫想要的诸如大笔贷款、对稳定货币的支持、对债务的重新安排只能是苟延残喘。这些措施有的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多困难。为了使外国援助有意义，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套有成功可能的可行性方案。

我还担心戈尔巴乔夫介入七国集团可能在苏联公众中产生负面效应，除非是以极周到的措辞向公众作出解释。必须在公众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会议是因为他接到了邀请，而不是由于他自己邀请了自己；他参加会议是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而不是去争取对苏联的援助。否则，他将因为乞求援助，或者因为所得款项太少以至被否决而遭到指责。但问题是，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时，表现出极端地不老练。

5 月份，我和苏联外交部讨论了这些问题，建议他们等待邀请 [533] 来到而不是四处张扬，同时起草一份比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更有说服力的方案。我还鼓励他们突出强调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的原因在于苏联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以期其他主要大国能听到苏联的观点。实际上，如果有新的合作措施出现，这将成为好的新闻，但应避免使公众将这次访问的最初目的理解为寻求外援。

我的建议被置若罔闻。到5月中旬，新闻中开始出现有关戈尔巴乔夫正在坐等邀请的报道。[5]然后，在 5 月 22 日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雷奥蒂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本人告诉记者："对苏联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七国会议上表明苏联的观点。"并明确指出他希望得到巨大的对苏联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我又有理由乐观。我得到的第一个暗示来自 5 月 7 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向我抱怨布什的热情在冷却的同一天，我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拜访。有消息

说实施现实改革方案可能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我提出的这次会面是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委员会新成员的礼节性拜访，并希望同他讨论突出的军备控制问题。

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相当宽敞，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样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至少是有意要给安全委员会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如同在白宫西翼得到了一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当我提到一些当前的安全问题时，普里马科夫说他主管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世界经济问题。然后，他说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种战略，将苏联引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世界经济机构。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对美国政策也是牢骚满腹，我用同样的话作了回答。

〔534〕 我告诉他，我必须找到一位认为“反危机方案”有可行性的外国经济学家，我还要问戈尔巴乔夫在去伦敦之前——假定邀请很快就要发出，这种可能性很大——是否对修改这一方案再作考虑。普里马科夫回答说，他的确正在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说他本人已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起为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了一篇文章，深入的工作将由此展开。

4天后，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交谈中告诉布什，他已令亚夫林斯基制订一套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将派他和普里马科夫一起去华盛顿向布什及其他人作简要的报告。布什立刻同意了。

机 会 之 窗？

亚夫林斯基重新参加改革计划是个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否决了“500 天计划”以及亚夫林斯基得知也不允许俄罗斯独自推行改

革计划后，在1990年底，他辞去了俄罗斯副总理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在莫斯科负责一家经济机构。就我的印象而言，在众多的计划和方案中，他的主意对于苏联经济发展市场条件是最有实际价值的。

第二周刚开始，我就去拜访亚夫林斯基。他说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亚夫林斯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告诉参会的每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然后，他还补充一点：“甚至连美国大使都对我说这个方案不妥，而他对这个国家是相当了解的。”（我心里想，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我更惊讶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高级官员，即使是他们活该，他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忠诚呢？）

总之，亚夫林斯基可以肯定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了帕夫洛夫计划的缺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亲自对他保证过他的支持；他本人则声明，如果他的想法不能最终被采纳，他将不愿再做努力。

亚夫林斯基同时认为“500天计划”的某些部分不再有效。此外，他承认以前的计划政治现实性不够。他打算下周到哈佛大学与〔535〕格雷厄姆·阿里森教授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将如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电话中安排的那样，在华盛顿与普里马科夫一道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

我向他解释，我担心有这样的可能，即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七国领导人会晤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其初衷是为了请求援助。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但觉得伦敦会晤的前景是戈尔巴乔夫考虑新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希望借此作为刺激。

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制订一个可使西方确信苏联正在削减军工企业规模、认真地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又可缓和与各共和国紧张关系的方案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一个现实的方案来吸引西方的支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对信贷表示怀疑，除非它们与具体的改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信贷并非首要问题，对此，我百分之百地赞同。“钱当然能起作用，”他说，“但将其放在第 3 位、第 15 位或是第 25 位还有待观察。”其意思是说，任何物质帮助都只能是苏联本身的有序而协调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阿里森是亚夫林斯基在哈佛时的伙伴，那星期也在莫斯科，我趁此机会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当我参加哈佛的一次美—苏关系讨论会时，我们曾见过面，此后只是偶尔联系。他对苏联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客观预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森说，亚夫林斯基在他们合作的报告中将准备经济方面的〔536〕问题，而他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们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个方案在考虑政治因素方面比“500 天计划”更全面一些。阿里森尤其感到，伴随着发展民主机构和提高经济财政管理的开放性的努力，需要向共和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和我一致，但我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寻求某种机制来解决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收缩而招致的社会问题。当前向民用工业转变的计划无法实施，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关闭国防工厂，而把上百万的工人抛向街头，这是一种冒险。我建议他们考虑类似美国军人法案的办法来解决国防工业的问题：用失业救济和再培训方案作为过渡。虽然这需要昂贵的开支，但比维持无用的

国防工厂所耗费用还是要少一些。

5 月 19 日，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到马萨诸塞州汇合，研究被亚夫林斯基称为“机会之窗”[7]和阿里森称为“大交易”的方案。我明白并赞同“大交易”后面的逻辑（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与合作的方向，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标题。“机会之窗”向各个派别暗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对我而言，这是比协调冲突利益更好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交易”一词暗示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含义。无论如何，实质性的东西总比标题更重要，而所有政党似乎都明白如果它们要得到西方帮助，就得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他们深信，戈尔巴乔夫将支持这个方案。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显然希望他的西方朋友们能帮他摆脱困境，但同时他的公开讲话也开始闪现出现实主义的火花。在我会见亚夫林斯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当天在内阁讲话的电视新闻摘要。在列举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经济数据后，他说，外国人不会为他们挽救这种形势，苏联必须“自救”。“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即使投入 1000 亿美元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补充说。然而，他在私下里〔537〕对其外国朋友们不断使用 1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他也加强了对外国庞大援助方案的游说活动。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他说服的主要对象之一。

5月底，撒切尔夫人以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客人身份来到莫斯科。尽管几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私下会见里根时，我曾为他们作过记录，但我没有指望她在莫斯科期间还会记得我或者想见我。因此，当我的英国同事罗德里克·布莱斯威特爵士打电话告诉我说，撒切尔夫人希望与我商讨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时，我着实感

到意外。由于她将和戈尔巴乔夫夫妇共进晚餐，布莱斯威特建议我与他的家人共同进餐，以便撒切尔夫人赴过戈尔巴乔夫的晚宴回来后能立刻见到我。我为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除了因为有机会听到这位前首相的看法外，还因为我知道布莱斯威特夫妇也是苏联问题最热心的观察家，与他们共度这个晚上将是非常值得的。

撒切尔夫人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穿过莫斯科河回到这家英国人的府邸，当时刚过 10 点，她在罗德里克的书房里加入了我们的讨论。通过书房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和里面的建筑，它们在探照灯的强光下显得壮丽辉煌。然而，这种宁静只是表面的景象，一场政治漩涡正在得到精心保护的古老城墙里面发生。

手中端着餐后饮料坐定后，她直接进入正题。“请为我的老朋友乔治带个口信，”她说，“我们需要帮助米哈伊尔。当然，你们美国人不能也不应该独揽此事，但乔治将在其中起到领导人的作用，如同他在解放科威特时所做的一样。”

她顿了顿，然后开始解释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几年前，我和里根就已经告诉世界这里在发生什么事，”她继续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帮助我们结束了冷战，如果我们不能携手帮助他，“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晚上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交谈使她相信，尽管他可能认为现在就公布还为时尚早，但他已就恢复私有制做好了准备。不过，她也同样感到，目前他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她敦促应当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并且不要让他空手而归。她认为所有的盟国都应尽力而为，而不是在美国强迫大家“尽义务”的压力下才行动。她知道德国已经许诺提供巨额援助，但她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得更多一些，因

[538]

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日本，应当劝说他们先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等苏联更加稳定一些之后再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现在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可能会被赶下台，无论是日本还是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都不愿冒这个风险。

我向她保证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她的意见，并对她关于苏联改革重要性的看法表示赞同。我相信布什总统会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制订一套有效改革方案的实际困难。不幸的事实是，戈尔巴乔夫还未采纳与外援相配套的政策：预算赤字失控；目前尚无可行计划将社会服务业从国营企业中分离出来；私营企业得不到保护；大部分经济还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另外还缺乏建立市场体制所必需机构的战略。在这个时候向这个国家倾注资金援助，不但不会带来好处，可能还会带来许多坏处。

“你讲话像个外交官！”她对我怒目而视，“只是为无所事事而找理由。你为什么不能像政治家一样考虑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决定来帮助这个转变过程，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然后，她语调稍事缓和地说，戈尔巴乔夫的话是对的，他指出帮助苏联转轨需要布什在保卫科威特时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只有美国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她最后说，“请一定把我的话带给我的朋友乔治。”

我回到斯帕索别墅后，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电报，把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作了汇报。然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

> 我想撒切尔夫人是对的。一个人可以为无所事事找到许多借口和实实在在的理由，但毫无疑问，苏联朝开放和民主

〔539〕 的进一步演变与西方利益攸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无力应付这个挑战，他们将丧失智慧或勇气，或者两者兼失。当然援助应当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且应当与具体的项目或目标挂钩。但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庞大的方案来支持和引导这里的改革努力。

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在我已向撒切尔夫人谈到过的那些问题上盲目地扔钱，但从根本上来说，她是对的，这些都是借口，是为援助本可成功但却没有去尝试这种行为开脱的。为了这种努力，我们必须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结构来促进有效步骤，转变苏联经济，使这种结构帮助戈尔巴乔夫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使他的公众接受这些决定。亚夫林斯基是对的，尽管有时需要钱，但钱并非是最重要的。

机会清楚地摆在眼前，但我对它能否被抓住并不乐观。虽然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困难表示同情，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但他似乎并不愿意组织一个国际机构来帮助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如何能构筑将来缺乏想象，因此，他选择了反应性的立场：等待戈尔巴乔夫自己找到改革之路，而他则不时地加以鼓励或者是给予责备，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亚夫林斯基—阿里森研究方案可能会给一个新的具有想象力的政策提供一针催化剂；也许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老朋友的游说可能会对布什起到推动作用。

1991 年 5 月和 6 月，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证据，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某种事件，它将使我的政府相信我们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为他面临的问题寻找建设性的

答案，这与我们利害攸关。

对聋子的警告

正当戈尔巴乔夫集中精力于如何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法花招。6月17日，瓦连金·帕夫洛夫总理，这位宪法规定的总统内阁首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了总统。[8]在被〔540〕问及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

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但大会进入执行会议来进行讨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概要很快被泄漏给新闻界[9]，使得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惊失色：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感到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毕竟，这就如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连同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预先通知总统，就到美国国会要求允许他们来支配总统。

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些苏联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然而，我发现他的无动于衷令人费解。我同苏联政治家、记者和外交方面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像样的解释。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我邀

请了几位政治领导人，包括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他和叶利钦一样，刚刚当选），于6月20日共进午餐。

那个星期，叶利钦在华盛顿。他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尽管他尚未就职，但已和布什总统约定于6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星期四上午，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波波夫不能够来参加午宴，但希望在此之前来见我，向我告别，因为我计划于8月初离开莫斯科，在此之前他恐怕没有别的机会来跟我告别了。我回话说我可以在中午会见他，午宴被安排在下午1点。

波波夫很快就到了。我们在斯帕索别墅图书馆里见了面。男〔541〕管家端进来一些酒，但我们都要咖啡。我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也询问了我离开莫斯科的计划。然后，当男管家关上门出去后，他取出一张纸，边说话，边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上面的俄语草草写着：

>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政变，我们必须告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我尽力保持着自然，小心地让谈话继续进行。在同一张纸上，我用俄语写道：

> 我会转达的，但幕后指挥是谁？[10]

波波夫瞥了一眼我的问题，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推给我。我看到了这几个名字：

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波波夫随即把纸片抽回去，撕碎了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没有必要突然结束会面而引起怀疑，我们的谈话又进行了10到15分钟。我们谈到了竞选，波波夫进一步发展莫斯科的计划，以及他对私有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尽管我们都心不在焉，但可能已经足以应付克格勃的窃听器了。

12点半左右，波波夫离开了。我立即写下这个消息，装在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通过一位美国使馆官员交给我的助理吉姆·科林斯，指示他用最快、最安全的途径送到华盛顿。它将被交给国务卿贝克（他当时在柏林），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总统本人，除非他们下令，不得再经他人之手。由于时差的关系，在布什总统会见叶利钦之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来自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凯米特的安全电话，他告诉我，布什总统会把消息转达给叶利钦，但我应当去见戈尔巴乔夫，向他发出警告。我同意了，但告诉他，虽然布什总统可能理所当然地会告诉叶利钦消息来自波波夫，但请一定不要把我的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我想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都是不妥的。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克留奇科夫或其他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戈尔巴乔夫。因此，我计划只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得到一份无法证实的、但他应该知道的报告，有一股力量正在试图推翻他。凯米特同意这是合理的，并向我保证，除非是对叶利钦，所有的人都明白不提及波波夫的名字的重要性。 〔542〕

即使我们的消息再准确一些，我对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这些阴谋家的名字还是犹豫不决。由一位美国大使告诉前不久还是敌人的

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说他的总理、情报头子、国防部长及议会发言人正在阴谋推翻他，这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这岂不是自找麻烦，让人怀疑是一种播种猜疑和争端的企图？不，如果真是这样，精明的戈尔巴乔夫会看出破绽来的。想到最高苏维埃都在发生些什么，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提示。

我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要求立即安排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几分钟后，他回话说，我可以立即过去。此时莫斯科夜幕刚刚降临，但天还亮，因为这天正是夏至的前一天。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我没有带记录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陪同下走进去。他的情绪平和，似乎并不急于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称我为"大使同志"，并请我不要生气，他并非暗指我是在为本国以外的其他集团的利益服务，但他们逐渐把我看作是协调美苏政策联合小组中的一员。他继续说，我已经成为对他们的社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且是苏联内部改革的坚强的支持者。就像他在上次会面时所说的一样，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去，两国都需要我的帮助，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希望下个月他从伦敦七国首脑会议返回后，我们能有机会会面，做一次从容的告别。

戈尔巴乔夫的赞美之辞让我浑身不自在，至少切尔尼亚耶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反映在他对这次谈话的报告中。[12]我心里想的〔543〕只是我受命传达的口信，在恭维话一句接一句地从戈尔巴乔夫的嘴中说出时。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将如何把他的话写进我的报告中呢？"一般情况下，我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都依照记忆和简要的笔记逐字记下来，但如果我还用这个办法把这些恭维一一记下，即使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也将显得是在自我拔高，而有些官员们甚至可能怀疑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对同事表露出的任何傲慢态度

都是极其敏感的。我决定在报告中把这部分的整段对话省略，只简短记录他对我不久后就要离去的夸张询问。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的长形桌边坐下，当时我对它已相当熟悉了，我面对窗户而坐，戈尔巴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坐在对面。戈尔巴乔夫问布什总统派我来有什么事。我用精心准备的措辞回答："总统先生，布什总统让我来通知您，我们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属实。它的来源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完全是谣传。它说的是有一股力量正试图赶您下台，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就在本周内。"

戈尔巴乔夫摇着头轻笑起来，然后变得严肃了："请转告布什总统，我对此很感激。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的关心，他做了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但请他不必担心，我完全掌握着局势，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我说，我很高兴地得知这个报告是毫无根据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无法证实它，尽管它的严重性看起来足以引起重视，而布什总统也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然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所喜欢的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他承认到处都有关于推翻政府的传言，政局确实不稳定。帕夫洛夫虽然是一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但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还正在学习之中。他已经承认了他在星期一犯的错误。但最近政治和解的趋向比较明显。就连叶利钦也开始养成合作的习惯。联盟条约很快就要签署了，他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伦敦之行将表明向世界经济又跨出了一步。公众支持经济改革，这在投票倾向叶利钦中已表现出来，但他们也希望结束政治对峙局面。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然而，也有势力试图阻碍改革。他们中有些〔544〕

人甚至就在议会中，这是联盟议员团中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不排除有些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告的根据。[13]

我对他说，听到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就放心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看到他与叶利钦的合作也在发展，如果这种关系停止了，就难以对未来抱乐观情绪了。

送我出来时，他重申明天我会看到事态还控制在他的手中。事实上，第二天他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特别权力的要求。但在同时，他突然对那些试图在他和总理中间"插入楔子"的人进行了攻击。我为不去提波波夫和其他名字的决定而高兴，因为这可能增加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报告的怀疑。很快，我就得知，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我们的报告来自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等那类人的牢骚，而不是正试图劝说最高苏维埃控制他的权力的那些人的阴谋。

难道说波波夫的报告是一个错误的警报（在6月22—23日那个周末，看来似乎如此），或者它是有关计划的一份准确报告，只是计划被推迟到更为合适的时机，直到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但仍受控于克格勃之时呢？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真相，但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解释。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两位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处理这份报告的方式都暴露了他们行动中的不成熟之处。6月20日，我还不知道，但后来得知，甚至在波波夫的消息被转达给叶利钦之前，国务卿贝克就坚持紧急约见正在柏林的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转达了报告的内容（虽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对苏联的政治运作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无论别斯梅尔特内赫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都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来使戈尔巴乔夫警〔545〕觉起来。苏联所有的官方联系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而报告中说一个主要的阴谋分子就是克格勃的负责人。值得称赞的是，别斯梅尔特内赫告诉贝克，鉴于所说的介入者的情况，他无法私下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希望他有所警觉，还是由我来做这件事为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别斯梅尔特内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时候通知他这样一个敏感的消息，真是愚蠢至极。即使他有办法保证通信安全，他也可能会为传递这样一份报告而犹豫不决，消息来自外国人，内容涉及他的内阁同僚，准确与否尚不确定。

贝克的反应是不假思考，而总统也是鲁莽行事。在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证实叶利钦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不忠诚的行为时，也告诉了他波波夫是消息的来源，而且就在一条克格勃监听的电话线上！谈话过后，我被告知，尽管我们先前有君子协定，但总统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中走漏了消息的来源。我没想到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会干出这种事来，他一向以他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对泄露任何无关紧要的信息都能迅速作出谴责，但这也能衡量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迷恋有多深。

波波夫后来告诉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再次见到他时居然是在 7 月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国宴上，他用手指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对美国人编故事呢?”仅仅不到三周后，波波夫所披露的这个集团便试图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而波波夫的名字被列在逮捕名单的前列。如果这次政变成功，乔治·布什的草率行事可能造成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将是损失最大的一个，他像一个梦游者，

四处徘徊，对周围环境不以为然。他对谢瓦尔德纳泽12月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且满怀憎恨；他牺牲了像巴卡金这样忠诚的助手，忽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他最初帮助他实施改革的人们的建议，反而继续信任口是心非的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这样的轻率小丑。

据切尔尼亚耶夫说，尽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美国轻信的谣言，但我在6月20日带来的消息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他当时想起〔546〕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前一天告诫过他，不要过于信任克格勃和他的私人保镖。戈尔巴乔夫倾向于把普里马科夫的怀疑当作官僚们忌妒心的反映，但切尔尼亚耶夫建议他还是小心为好。他本人在莫斯科也听说过令人生疑的有关军事调遣的消息。

但是，尽管在6月21日的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了严厉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阻止他的安全负责人参与一场政变的企图。

6月21日，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到莫斯科，并在第二天陪同戈尔巴乔夫一起献了花圈。私下里他提到了在柏林与贝克的谈话，并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得到了我报告的消息。戈尔巴乔夫说得到了，并补充说，他已经给"那些官员"作了很好的回答。然后，他问贝克是否说过政变可能发生的时间，别斯梅尔特内赫回答说没有，但贝克说过"现在它随时可能发生"之类的话。[15]别斯梅尔特内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推断出消息中的几个人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当时实际想到的似乎只有他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批评过的联盟议员团的领导人。

1992年3月，当我请求波波夫同意我在书中写进这件事时，他立刻同意了。然后，他评论说，最初当他得知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

他是消息的来源时，他非常愤怒。毕竟，他的消息并不是提供给我们的，而是为了给叶利钦报信，并为我们的可靠性下了极大的赌注。不过，当他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感到这个漏洞可能还是有利的。

他推测说："当阴谋家们得知我得到过他们的计划后，不得不把计划限制在小范围内，因而无法把政变策划得十分周密。这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算是如此吧，但那是将来的事。

官僚主义者再赢一轮

〔547〕

甚至在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在剑桥研究他们的"机会之窗"（或者说是"大交易"）时，莫斯科的官僚们就已开始发起了攻势来抵消他们的努力。尽管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都得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他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5月中旬，在他们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简要汇报时也得到了有力的鼓励，几天后，我们得知，苏联已经发出正式请求，要求在月底由帕夫洛夫的总助理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会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戈尔巴乔夫曾通过电话告诉布什，他将派亚夫林斯基和普里马科夫去讨论新思维。而现在看来，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到华盛顿来是为了维护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亚夫林斯基将被搁在一边。

我立刻去拜访普里马科夫商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总统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即由他和亚夫林斯基去华盛顿协商后者正在哈佛研究的课题。布什认为亚夫林斯基的主张将是讨论的焦点，而普里马科夫的来访将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态度。然而，尽管戈

尔巴乔夫有权派出他希望的人代表他去华盛顿，但他应该认识到，由总理的代表率领的代表团并非布什总统所期待的。

普里马科夫说，亚夫林斯基将是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两人正在一起工作——但由谢尔巴科夫率领代表团应该没有错。于是我问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什么(通过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对布什所提的建议，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来讨论亚夫林斯基的建议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来让谢尔巴科夫来率领代表团)。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是来帮助戈尔巴乔夫准备他所期待的伦敦七国集团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希望提前征求布什的意见，并了解他的态度。

〔548〕“很好，”我回答，(根据我的笔记)“我相信总统会为咨询感到高兴。但您和您的总统必须清楚一件事——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只能直言不讳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主要感兴趣的是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想法。如果谢尔巴科夫的来访是为了给予这些想法以官方色彩，您将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抢亚夫林斯基的戏而耍的花招，是为了使我们接受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那你们将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普里马科夫反驳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同意他的政府无法吸收的任何方案。如果要进行经济改革，那么实施它就要与帕夫洛夫政府合作，而不是反对它。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个问题看来已经牵涉到官僚政治问题了，这也是可以预测到的，但普里马科夫对帕夫洛夫方案的明显支持令人失望。可以设想，他已经得到了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新安全委员会寻求新途径的经济文件。即使抛开亚夫林斯基的评论不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反危机方案”不满意，

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但是，他的关键人物普里马科夫似乎要把赌注押在官僚派一边。

无疑，我在回答时语气是严厉的，我说，当然任何改革计划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但是如果普里马科夫建议他的总统带着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去伦敦，他是在为灾难铺路。戈尔巴乔夫最好还是不去伦敦，除非他能带去更好的东西。我强烈建议普里马科夫能保证亚夫林斯基有机会在华盛顿向布什总统和其他官员介绍他的想法，并能仔细听取他们对此的反应。这样，他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以便将最有成果的方案带到伦敦时，将处于更好的地位。

为了避免一次毫无意义的会晤，布什总统再次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并强调说他正在期待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意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普里马科夫减少亚夫林斯基参加华盛顿会晤机会的不断努力。华盛顿本来残存着一线希望，即戈尔巴乔夫最终可能愿意采纳有成功前景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结果他们粉碎了这一希望。[17]

5 月 31 日的会晤给布什总统的影响正如我对普里马科夫预言〔549〕的那样：这使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一套方案来证明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是值得的，他开始怀疑让戈尔巴乔夫去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晤是否对戈尔巴乔夫有利。[18]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戈尔巴乔夫转达这一意见（这本来可能成为有力的警钟），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布什总统的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好处。[19]最后，曾向戈尔巴乔夫许诺过支持邀请他的科尔和密特朗说服了布什，如果戈尔巴乔夫遭到七国集团的拒绝，将对他的地位不利。到 6 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接到英国首相梅杰的正式邀请，他将作为一名客人，而不是集团的一名成员参加正式会议之后的讨论。

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继续共同工作着，尽管有人企图阻止他参加5月底在华盛顿的会见。实际上，他对普里马科夫的私下评论所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但他们因布什和贝克在会见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而受到鼓舞。[20]到6月中旬，他们完成了草案，给华盛顿的布什和贝克寄去一份，给戈尔巴乔夫带去一份。亚夫林斯基后来就此评论说：

> 6月中旬，方案呈交给了布什，他的助手们告诉我，他们肯定他将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还说，我应该留心贝克6月底在柏林的讲话……如果其中有一个特定的提法，这就说明这个方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
> 我回到莫斯科，难题就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与波普林斯的会面最为艰难，[21]我告诉刚刚当选总统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我与美国人达成的默契：我正在等待贝克的讲话，看他是否会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提法。他们瞪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但是，贝克的确说了那句话，就在这时叶利钦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在那里当被人问起新方案时，他说他还没有读过它。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的反应就更有趣了。他把方案交给瓦季姆·梅德维捷夫，用来为他的伦敦之行做准备……他向我保证他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将会使用我的方案中所有好的部分。当他完成这项工作时，我总算弄明白了所谓“所有好的部分”是什么含义了。

〔550〕

6月6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之前的星期六，我收到了布什总统致戈尔巴乔夫的紧急信件。当我要求呈交它时，被告

知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所别墅里办公，但他愿意在下午接见我。苏联礼宾司负责人乘一辆公车来为我的司机引路，来到城西沃林斯科伊的一套别墅里。戈尔巴乔夫正在一幢斯大林时代的房屋里办公。据我的陪同说，斯大林过去经常用这幢房子。

我们的汽车驶向主楼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在周围走动，有的敞开了衬衫（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有的放松了领带，夹克衫搭在肩上。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专门接待我。

礼宾司主管陪同我上了楼，戈尔巴乔夫把我让进一间令人愉快的房间，这间房子有点像被屏风隔断的阳台。他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衫，没有系领带。他感谢我为他带来信件，并说他正在会见他的顾问们，为伦敦之行做准备。我告诉他，亚夫林斯基的方案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知道，并说他们也正在“好好利用”这个方案中的思想。然后，我们讨论到总统的来信，是关于结束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遗留问题的，并为布什的莫斯科之行确定日期——在离开之前，我问戈尔巴乔夫，他对即将成行的伦敦之行有何感想。

他回答说，感觉很好，他将带去的方案写得很好，他期待着看到“非常重要的讨论和重要的决定”。这种期望给他带来的快乐看来是真的，他终于能在世界级的大集团里发挥作用了，甚至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他的艰难经历，看来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信心十足。

离开之前，我与等待会议继续开始的官员们握手告别。他们中有总理帕夫洛夫（我向他打招呼时，他脸上堆着笑）；他的副手谢尔巴科夫，普里马科夫；总统顾问斯捷潘·西塔里扬，雷日科夫的经济〔551〕改革助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亚夫林斯基

以及与他有关的人都不在场。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波格莫洛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弗拉德伦·马季诺夫，或者说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在场。

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对迅速解决被延误了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问题并在月底安排一次首脑会议感到乐观。但我也知道，只要把经济引向混乱的官僚们还在，戈尔巴乔夫肯定无法利用伦敦会晤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

患难之时的精神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虽未使他公开丢脸，但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七国"同意苏联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并让这些机构制订出有关方案以便协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23]

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其赴伦敦前几天已经致函戈尔巴乔夫，他们将以如下方式资助苏联：采取小规模试验计划将某一地区的食品批发业私有化，派一些人调查军转民的可能性，另外一些人负责能源部分。在信中，布什警告说，如果苏联执意维持在"反危机计划"中所描述的指令性行政控制，那么它将很难得到帮助。同时，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将食品供给制度私有化，并明确能源所有权以吸引外资，而且布什也不鼓励重新组织安排苏联外债的支付计划，尽管美国并不是主要债主。

布什所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也没有就全面的政策提出建议，而这是使各部门的改革切实可行所必须的。而且，反对重新安排苏联债务支付计划实际上堵塞了西方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我

们如果是采用以下的说法，很可能更将有裨益：如果有必要重新安〔552〕排债务，那么苏联对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态度将有助于商定其条件。最后的结果是，债务最终还是进行了重新安排，但却没有换回任何改革措施。

即使戈尔巴乔夫不去伦敦，七国集团也照样会作出以上决定。但这些决定为苏联经济过渡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七国没有认识到仅仅依赖目前的体制，他们是无力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帮助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货币市场，但对目前苏联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它几乎一无所知。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苏联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混乱的国家。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发挥有利的协助作用，但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苏联经济过渡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最后成果甚微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如果他不去伦敦可能会更好些，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争取西方的援助，但却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计划，由此也损害了本人的信誉。尤其是他说服布什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出他多么没有说服力。

他们是在 7 月 17 日的工作餐上会晤的。最后谈到的一点是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随后几分钟，戈尔巴乔夫的保安部队全副武装，直奔温菲尔德宫——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现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在两位总统手里，他们都知道，不到两星期他们还会见面，不过是在莫斯科，他们将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当时亲切友好的气氛对倾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天赐良机，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任何计划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553〕 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竟采取了发牢骚的办法。他最忠实的助手也不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他的会晤记录，它表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合适。午餐的谈话刚变得严肃起来，他就开始了散漫的独白，就像5月份对我讲话时一样。切尔尼亚耶夫将它归纳如下：

> 我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对自己所做决定的政治含义审慎周密，而且他从来不随心所欲。关于安全政策，得益于他的决定，我们的收获颇丰。但同时，我感觉我的朋友美国总统布什先生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未给予答案：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只有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问题才能明了。然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切尔尼亚耶夫注意到当时布什很不高兴，脸色微红，但是他不动声色，继续就餐。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 于是我问：乔治·布什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如果我"七国"的朋友们在我们后来的会晤中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他们愿意支持我，但开始时你必须"自作自受"一阵子，那么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集中几百亿美元去解决一个地区性冲突，这不奇怪吗？支持其他计划的钱会有的。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实施一项工程：改变苏联，赋予它新的性质，使它融入世界经济，它将不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不再是威胁的根源。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伟大而重要的使命！

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布什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漠。他回答说显然他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还不够，他认为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想看到一个民主的苏联，拥有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成功地联合。他指出并非每个美国人都会支持他对苏联的态度，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制造出一些现实的难题。但是，没有人希望见到苏联经济崩溃，而且他认为苏联解体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切尔尼亚耶夫察觉到紧张局面缓和了一点，但却未能完全消除〔554〕戈尔巴乔夫的长篇大论给布什及在场的其他美国人留下的阴影。这是一个绝望的人的哀叹，他正在失去他对他的国家的控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并不理解他所竭力追求的是什么。[24]

据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特伯·泰伯特说，布什一回到美国就说："真是可笑。他一直善于推销自己，但这次却不是。我想，他真让人难以理解。"[25]

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推测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的自我挫败行为的原因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克留奇科夫在许多报告中都要指斥所谓的美国的欺诈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十分怀疑，但它们仍留下了阴影；其次，布什总统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为使双方成为伙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太合作，这一态度使戈尔巴乔夫受到伤害。[26]

我相信，这两种因素均影响了他的情绪，再加上第三点：由于他没有在伦敦会议上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而产生的受挫感。即使只是在下意识里，他一定已认识到，他缺少勇气利用亚夫林斯基提供的机会。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另一种结果是否有可能发生。从某种程度看来，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自从

马耳他会晤以来，他们一直以一种直接的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交流，而不像两个疏远的大国的领袖。他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非常之深，虽然还不是无条件的。尽管如此，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似乎失之交臂。

戈尔巴乔夫不能直陈他心中所想，至少从 1989 年以来，他没有道出他深深的、也许只是半意识的渴望。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便为自己判了政治死刑。但如果这样做可行的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没有人确切知道，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凭我多年的就近观察，我猜想，译成地道的美语，大概如下（其中有 95％是我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所听到他的讲话，另外的 5％则基于我的直觉）：

〔555〕

我的国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从未体验过民主的滋味，一直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这是它的悲剧，也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根源。看一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鼓励他们的创造性，同时又收获其成果。我希望我的国家也这样，因为如果它不改变，它将落后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制度，不仅仅美国、西欧和日本会遥遥领先，我们会甚至连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赶不上。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

这听起来也许很简单，但是相信我，它并不简单。俄国整个历史都是逆流而行，所以我必须扭转乾坤。彼得大帝可以残暴统治，但你不能期望这样会产生民主。我要达到民主的目标更难。我们的人民从未被允许自己做主，所以他们也没学会如何去做。你们曾用了 200 多年的时间完善民主制度，而我们从未拥有过民主制度，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建立它。尽管这样，我却

不能接过你们的制度，然后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并期望它奏效。我们要屏弃旧制度，并给人们一段适应时期。我只能利用现有的人和物，我不可能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历史。

对于我们要走的路，虽然我有大致的轮廓，但从未有人给我一张图纸，告诉我如何达到目标。前面可能会有无数的曲折和错误。不要以为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得到了许多帮助。

大多数国家或者不理解或者反对，尤其是与旧体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我将不得不改变或战胜后者，教育前者，这样会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怪异。我希望我能争取到足够的共产党员而缓解我们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共产党将不得不让位。我必须加倍小心，以免被它围困。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有时我不得不左右逢迎，但不要把它想得太坏。

那么，我究竟需要你们做什么呢？首先是理解，理解和尊重。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做资本主义，但我想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556〕

我决心成就这番事业，不是因为你们要我这样做。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它。如果它不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也许它还不过是个跛子——如果它真能熬过来的话。如果问这个世纪真正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具有竞争力。我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才这样做的，但你们不得不承认，它客观上确实于你们有利。想想过去

45年里你们耗费了多少金钱来抵抗苏联的威胁？(对了，顺便说一下，尽管有时你们夸大其辞，但它的确是个威胁。)

当我说理解和支持时，我的意思是不要视我为战败的敌人。别再说什么赢得冷战了，如果你们把我当作一个输家，你们又如何能指望我领导我的国家向前艰难地迈进呢？此外，我难道真的不该得到一点点夸奖吗？是我降服了苏联的军官们，并且强迫他们、有时甚至耍点小手段欺骗他们做些非做不可的事。我不让他们成为威胁东欧的力量。我创造了一整套的哲学解释为什么结束冷战对我们有利。在此方面，我想我未得到丝毫的帮助。让我们面对现实，乔治，是你、里根和我共同结束了冷战。没有必要为谁赢了而趾高气扬，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吗？

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我清楚地知道我到底该往那里走。我毕竟是学过法律的，虽然这法律有点可笑，可他们毕竟教会了我"资本主义法律"的原则。我可能并不总是显示出这一点，但我知道在此方面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但经济却另当别论。老实说，我知道我们得改变现有体制，但我不愿承认的是，我不知该如何去改，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们的制度在你们的国家是很管用的，但搬到我的国家就不灵了，除非是人也发生了改变。

不过，说句实话，当我说我需要帮助时，我不单是指钱。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想一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人民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年前，他们还在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但现在他们却说每件事都不对头，但只要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我把他们中的25人集中在一个屋里，我会

得到39种建议。

你们想要作壁上观，想管的时候就出出主意，直到我们有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体系，然后你们才知道你们能做些什么。你们本该是个银行家，我听说你们的金融机构从来不随便借钱给别人，除非借钱者能证明其实他不需要这笔钱。但我认为政治家就不同了。我认为他们是领导，而并不仅仅是在玩〔557〕一场胜券在握的赌博。难道你们不愿意冒点风险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

好吧，告诉我当前的计划不会奏效。我知道你们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如此急躁的原因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暗示我们会采纳一些建议。我不想听"如果这样做很痛苦，那么就快点做"之类的废话。远在与吉姆·贝克会面之前，我就从马奇亚维尔利那里获得了这个建议。你去年派了一大批商人来见我，他们支持我拒绝沙塔林计划，但现在呢？每个人又都说我应该接受它。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真见鬼，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可能会说，即使形势恶化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是，如果你们让我知道你们会帮助我——哎，那么情况就会大不同了。

请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该做些什么。而且，我当然也不想你们从此后开始教我们该如何做。你们的制度在这里可能不会奏效，除非对它做很大改变，这件事要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也相当傲慢，不习惯外国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不会自诩我们是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但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我们的一场悲剧，但同时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如果我们的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政权，你们

每年到哪里去找那多余的四五百亿美元做国防开支呢？现在我们还有三万多枚核弹头，你们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给发动战争者准备的。

推行市场经济，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但是很清楚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个社会。在此方面，为什么我们不携起手来呢？两家联合共同解决一个难题。1947年，杜鲁门和马歇尔在西欧问题上找到了办法，我们的人民也告诉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制度、合作的习惯以及知识的集中。我们属于不同的情况，但原则不会不同，难道你们不会想想办法，集中智慧，加上七大国，大家共同协作，想出些适当的办法来？如果方式得当，我会采纳你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但我要你们保证如果我在采取了你们的建议后陷入困境，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一把，不要寻找借口——即使是不错的借口——而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遇，我们的形象在历史书本里可能就会显得不够光彩。我指的是你们和我。

痴心妄想吗？当然是。千真万确吗？我敢打赌是这样的。

有什么话布什本该说却没有说吗？也许是吧，但也许已经太〔558〕迟了，即使说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了。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私下场合，布什能够通过给戈尔巴乔夫提一些大胆的建议更有效地表示友好——而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会郑重采纳他的建议。

当我陷入于想象世界之中时，我能想象出当饭后甜食端上来时，布什会将戈尔巴乔夫请到旁边屋子里私下聊聊，当时只会有翻译在场，也用不着做什么记录。特别是他很相信屋子里不会有

克格勃的窃听装置，我想，他很可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大致如下所述：

“米哈伊尔，我能理解你的处境。我们没有做一些本该做的事情来帮助你，你有权利指责我们。但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你。我们确实想帮助你，但老实说，是你将事情搞得棘手了。我没有搞到资金，就算我搞到了，如果把它投到国营企业的无底洞里，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这样做不会奏效，而且只能让人们很快放弃帮助你的念头，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尽管后来你给了我一个很合理的计划。

“我知道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成什么，但你得寻找途径发动各种力量，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帮助你进入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自上而下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你必须从这些官僚手中夺回经济大权。留一点缝隙给私营部门，让人们自由运作。是的，起初可能会有一点混乱，但我猜想贵国的人民会比你想象得更富责任心和创造力。如果你能下个果断的决定而带来一个成功的前景，那我一定会团结我周围的人为你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但你的计划一定要具有可行性，而且要依附具体的项目。我没有办法筹集资金去支撑那些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

“我坦白承认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但是我有一种忧虑，我感觉你现在做得不对。我们也许该想一想是否应该将我们欧洲和日本的两个朋友团结起来，共同寻找一个答案。如果这想法你赞成，那你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努力尽快把事情办好。

“还有，我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因私人感情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建议你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告诫你，你们的总理是个

祸害，那么我也称不上是你的朋友了。除非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或者你亲自来领导内阁（我就是这么做的），你要让人们相信你对经济改革是认真的肯定会费一番周折。

〔559〕 “我很高兴6月份议会里没有发生问题，但我仍不免有些担忧。我希望你能重视我给你的那份报告。我知道，你可能觉得那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仍有点不安。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掌握在中央情报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手中，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把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某个机构的手中是不明智的。还有，顺便说一句，好像有人在向你灌输一些关于我们的胡言乱语。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他们骂回去。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你捣乱或伤害你的国家，如果有谁这样说，他就是个骗子。你应该设法找到这些人这样说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说的对你没有好处。”

我的臆想就此打住。我所想象的没有发生，就算它发生了，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领袖的私人关系曾十分融洽，以至他们之间可以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直言不讳地进行谈话，而且这种谈话能够对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所作所为产生重大影响。

想真正奏效，布什就得做出某种许诺，但他不愿意那样做。1991年，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无限同情，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回避帮助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发雷霆的原因在于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挪威议会授予戈尔巴乔夫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未能如期到奥斯陆去发表受奖演说，却不得不留在国内处理紧急事务。当他终于在1991年6月11日来到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而在当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560〕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了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

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27]

苏联《独立报》以恰如其分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对此作了报道。戈尔巴乔夫迫使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

1991年7月25日通过了新的党纲草案，并获准于11月或12月举行一次党代会。在很多人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走上了分裂共产党的道路。他的拥护者们将支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那些顽固派则被迫要么退出，要么赶走这些改革者。

7月20日，即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叶利钦反对共产党机构的斗争开始升级。他颁布了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28]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

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561〕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

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29]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

同时，改革创始者中的几个人开始在党外组织政治运动。其中，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仍是正式党员。另外有些人，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最近刚离开了党，组建了名为“民主改革运

动"（许多人知道它的俄语开头字母为ДДР）组织。这一组织吸引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以前的知己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他曾于1989年接受了管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这一出力不讨好的任务；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众议院的发言人伊万·拉普季夫，《消息报》的前任主编，都加入有一时期像是一个政治名人集会的"民主改革运动"。

许多人曾怀疑组织这次运动是为了在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失去地位时，给他提供另一个选择，虽然他不赞扬这个团体，但他也不轻意贬低它，就像他过去对待"民主俄罗斯"运动那样，后者的许多领导者已和新建立的"民主改革运动"结成了联盟。当然，有些组织者是要显示，在共产党外组织起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成功了，如果行将召开的党代会导致分裂，那么他们的行动将为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而分裂的势头在1991年夏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恰好是共产党内保守分子所害怕的。他们极力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虽然他们仍是共产党员。谢瓦尔德纳泽6月初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社采访时曾提出有必要成立"民主党"来和苏联共产党相抗衡，保守派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最高纪律监察机构——出面调查。谢瓦尔德纳泽不想坐以待毙，于〔562〕是立即宣布脱党。加夫里尔·波波夫则相反，他等着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他。而就在曾有权驱逐党内成员的基层党组织做出反应之前，雅科夫列夫自动辞职，并当众抱怨说"一个强有力的斯大林主义团伙"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3]

7月末，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久，我曾和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莫斯科市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讨论民主运动的前途。他对"民主分子"能否统治这个国家三到五年表示怀疑。他

们散漫、缺少组织纪律性是其中的原因，但同时，他还感觉到苏联的高压经济机构仍丝毫未损，被共产党内的官员所掌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对军队、法律执行机构和传媒机构的控制。这当然是叶利钦法令的目标之一，但除非是戈尔巴乔夫能签署类似的法令，否则很难对军队和克格勃产生任何影响。

波波夫看到民主改革运动有可能团结民主力量，但他对其领导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成立一个政党而感到气愤。他个人认为它或者组织一个政党、或者解散。他觉得“民主分子”内部虽然存有分歧，但却占有天时。他说，他最大的忧虑不在于共产党内保守分子的活动，而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类狂热的反动分子的潜在威胁。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恶化，像他们那样的投机党派不仅会赢得大量的选票，还会争取到军队和警察组织的支持。

虽然波波夫作为政治领袖有其局限性，但事实证明他不愧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分析家。

布什的莫斯科—基辅首脑会晤

1991年7月29日晚，乔治·布什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莫斯科。正如布什上任伊始我所建议的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两国〔563〕每年都有互访。在第三国的其他会议，如果有必要或者机会方便，也时常召开，比如1990年9月在赫尔辛基以及两周前在伦敦的会议，现在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他们会轮流在彼此国家每年举行一次“全方位的高级会议”。

去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现在大多数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经过10年的谈判，

终于做好了签署准备。苏联已经同意了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总统也已经将它送交参议院审批。苏联议会终于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移民的权利，总统已经将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送交国会。美苏贸易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无任何歧视性关税。

留待讨论的有争议的双边问题已经不多了。当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签署时，最初由里根总统于 1984 年和 1985 年提出的四方协议已经得到完全实施。实际上，到 1991 年，我们已经超越议程上升到合作领域。这些在 80 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甚至在 1989 年，布什总统还执意不肯研究此问题。即使如此，要谈的还很多。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国家显然正在走向崩溃。两位总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两位总统都极其关注各共和国首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布什在正式拜访叶利钦并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后访问了基辅，并借此机会邀请了几个共和国首脑参加他的国宴。戈尔巴乔夫则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与布什共进工作餐，以此组成苏联代表团参加讨论。

纳扎尔巴耶夫特意从阿拉木图赶到莫斯科，结果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问题成了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叶利钦却坚决回绝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并声称他宁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布什，而不愿意参加与其他人的小组会议。

在就职俄罗斯总统的前几周，叶利钦已经进驻克里姆林宫内戈尔巴乔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工作过的办公室，他特意在这里接待布什，而不在俄罗斯“白宫”里他自己的办公室。我希望他最近的政〔564〕治胜利能使他不再像个衣衫不整的受压迫者那样行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喜欢出风头和在一些小事上胜人一筹的毛病并没有改变，会谈开始前布什等了他差不多10多分钟，会谈时间又大大超过了

原先的安排——尽管他所讲的并无多少实际的内容——而且他不通知他的客人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宴上，他差遣妻子越过接待人员，等所有的客人都进入房间后，试图陪伴芭芭拉·布什入座，仿佛他才是此间的主人。[31]

叶利钦的行为未免粗鲁和孩子气一些，由于他有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使得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很不自在。过去，他在使用这类伎俩时总是说，为了防止他的对手阻碍他和公众的联系，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我很痛苦地注意到，在他赢得了直接的政治目标、这种借口已不复存在之时，他却继续使用这一伎俩。然而，这些社交中的不协调微不足道，只是在它们暗示更深一层的问题时才值得一提。

7 月 31 日，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中会晤时，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美国大使馆接到报告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夜间袭击了立陶宛海关署，有六位官员死于非命。美国大使馆官员通知了别墅的有关人员，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这一事件。乍听到这个消息，戈尔巴乔夫极为尴尬，不仅因为发生了此种暴行，而且因为首先获悉的是他的客人。看起来，这一暴行好像是某些人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戈尔巴乔夫在与布什的会谈中难堪。而实际上，这也表明他的权力在削弱，他手下的人员正变得越来越不中用。[32]

布什产生访问基辅的念头十分自然。去年访问美国时，戈尔巴乔夫曾访问了明尼波利斯—圣保罗教堂、旧金山以及海湾地区。随着所有的共和国都变得越来越自主，布什认为不仅应该在莫斯科拜访叶利钦，而且至少应该在某个共和国的首府逗留一下。借此机会，他将发表演说，提请人们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文化和民族性给予注意，欢迎他们加入到民主运动中来，因

为它正波及很多——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国。

基辅首当其选。它是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首府，其民主进程〔565〕比中亚许多共和国快得多，也没有发生类似高加索地区的那种冲突。而且这也很方便，布什于8月1日在此停留几个小时后，仍可以在同一天回到华盛顿。

我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访问基辅的想法，他们不反对。于是我们又开始和乌克兰官员讨论行程安排，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曾在基辅安排了几个外交官，准备建立一个总领事馆。访问计划顺利进行着，但令我吃惊的是，7月21日，星期六下午，埃德·哈韦特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说，苏联驻美国代办来到白宫，带来了苏联总统办公室的信息，说基辅目前局势紧张，布什最好别去那里，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旅游区度过这一天。

显然，如果戈尔巴乔夫建议布什不要去基辅，布什就不能再去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取消他的行程肯定会给公共关系带来极大不利。因为事前我们已经与乌克兰方面就此次访问联系过，现在就得告诉乌克兰方面为何要取消它，说戈尔巴乔夫不允许去，无疑会成为此次首脑会晤的重要新闻题材。考虑到公共关系，这样肯定会给其他每件事都罩上一层阴影，必将破坏此次会晤的目标。

为了故意让克格勃和有关官员知道这件事，我们在公开电话上讨论了取消此次访问的后果，然后我通知外交部说我明晨得见见别斯梅尔特内赫。当他见到我时，他坦诚地告诉我说对于华盛顿的消息他一无所知，不过他答应他会调查此事。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布什总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按计划访问基辅。后来，他解释说他向戈尔巴乔夫询问，虽然后者有些不悦，但还是同意布什应该去他想去的地方。[33]

这样，布什和他手下的人更加谨慎，避免在访问中发生任何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设想如何能够“帮助戈尔巴乔夫”。演说起草人认真检查稿件，删除可能〔566〕使戈尔巴乔夫不悦的言词。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做得有些过了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或者基辅的外交官员商量如何来翻译这篇演说词。

在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的旅行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演说稿的全文。我们乘坐的是新的空军一号——一架宽敞豪华的波音-747飞机，它和以往总统乘坐的狭窄的波音-70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向报界传播，布什向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说也被重新修改。我又匆匆扫了一遍，发现有很多出色之处，尤其是它警告说独立和民主其实是两码事。

但是，其中有几处堆砌起来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也不太合适。对他开创民主制度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表示赞同会更好些。只要人们觉得戈尔巴乔夫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那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赞扬。大张旗鼓地夸奖他可能会令他本人很高兴，但在政治上对他没有丝毫好处，因为批评家们已经攻击他，说他是布什的仆人，再这样大加赞许只会给批评家们提供更多攻击他的材料。

在演说中特别称赞新联盟条约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条约无疑是多方政治妥协的成果，有些地方很微妙，有些地方还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外国政治家，搅和在其中不仅是胆大妄为，而且也很危险，会造成与设想相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或者法国的首脑在1789年和1790年的宪法辩论中建议美国如何投票，美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布什总统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而且仍可以坚持他的重要原则，他只要强调各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协议

而不是强迫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协议采取何种形式得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外人。

我把一个撰稿人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文章中大部分我是赞赏的，但有些语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特别指出了其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和对条约的称颂。“他不该使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这类将事件私人化的措词，”我说，“他也不该暗示我们反对独立，”我又加上一句，“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你的观点，”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们不可能修改了，〔567〕因为复印件已经送给报社了。而且，这些是总统本人加进去的，他想这么说。”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该降落了，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但我还是再一次提出建议：“我看到你在行文中多次写到‘这个乌克兰’，你应该确保总统不用‘这个’，他应该说‘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美国人会认为加上‘这个’，就使乌克兰像个地理名词，而不像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提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冠词，对吗？”他反问道。

“请别介意，”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逻辑问题，我只是说许多人会对此有强烈反应。如果总统说‘这个乌克兰’，那么白宫下周就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抗议信件或者电报。”

他最后同意在提到乌克兰时，不再加上定冠词“这个”。后来，布什总统来到我们这边问候时，我相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图。

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安排此次访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乌克兰人的感情，这篇演说可能会更加困扰我。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7月初科尔总理访问基辅时，戈尔巴乔夫不让乌克兰人参加其间的几次会议，对此乌克兰人极其愤怒。所以我们同意布什总

统私下会见其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其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其他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将不出席。所有的演说和祝酒词都将使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总统也将使用一名乌克兰翻译（虽然克拉夫丘克谙熟俄语）。简单地说，我们已经有点儿出格了，以往的来访者从未像我们这样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鉴于有这些安排，我认为总统的演说中即使有一两处辞令不当也无大碍。

我不该自鸣得意。甚至在我们到达基辅前，一些民族主义的乌克兰领袖就对我们为安排此次行程所付出的努力采取明显的漠视态度，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乌关系上，向美国记者批评布什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鲁克的主席伊万·德拉奇声称“布什总统像是被戈尔巴乔夫施了催眠术”。列夫科·卢卡年科〔568〕更令人费解，他声称美国总统“一向藐视发生在各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除这次访问外，他（布什）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止一次与三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袖会面，和叶利钦也有三次，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数次，一年前布什总统在华盛顿还拒绝会见乌克兰共产党总理，原因是布什认为他不能够代表乌克兰民意。考虑到三年来美国官方代表和鲁克领袖们频繁接触，他们也不应该提出如上指责。实际上，鲁克领袖们收到美国的邀请远远多于乌克兰境内其他政治运动派别加起来的总和，而他们在乌克兰却只获得不足 1/4 的选票，所以如果要指责美国偏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本不该给鲁克那么多的关注。

鲁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也很反常。当一个人在政治上进行垂死挣扎时，他可能就不记得过去了，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乌克兰共产党施加压力，大多数的鲁克领袖们可能还在监狱里，更不用说参加竞选、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参加为美国总统举行的正式宴会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们，如谢尔比茨基，竭力反

对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自由化。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丢下鲁克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反抗80年代末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将永远也不会取得他们现在的成就。

这次访问本身就将过去和现在许多新的因素串联起来。

在基辅波里斯波尔机场的欢迎仪式让人想起了过去。精心挑选的一群人欢迎总统的到来。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同时也挥舞着乌克兰苏维埃官方旗帜——由苏联国旗稍加修改，红底，接近底部有一条细细的蓝色条纹。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用乌克兰语致欢迎词。布什用英语致谢。接着，就是拍摄数张照片，麦克风中传来乌克兰语的翻译。我记得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基辅时情景很相似，只是当时讲的只有英语和俄语。

我们的车队一离开机场，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很多人聚集在〔569〕机场广场前，手中挥动着蓝黄相间的乌克兰独立运动旗帜，呼喊着独立口号，向布什总统舞动着控诉当前共产党政府和共产主义的条幅。在去市区的路上也有类似的示威游行，甚至在城内也随处可见。这种气氛与尼克松访问时以及在不久前1988年国务卿舒尔茨访问时形成的对照让人瞠目结舌。1988年时，道路专门为车队清理干净，人们甚至不许站在两侧的人行道上！

布什总统和克拉夫丘克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当中我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在旁边的房间里一边等候一边聊天。福金特别忧虑，害怕今年冬天粮食会短缺。虽然乌克兰一直是闻名的苏联的“粮仓”，但斯大林强行采取的国有化政策曾于30年代引起过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令许多人丧生。现在日益加剧的经济混乱已经威胁到从那时起就不能满足需要的农业生产。共产党政府仍不愿意打破斯大林的集体化农场，恢复

私营农业，尽管国有体制已名存实亡了。福金像一个绝望的人谈论着未来；鉴于当前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他似乎仍看不到任何避免经济崩溃的妥善办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会停止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活动；他们首先要独立，然后才考虑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继与克拉夫丘克会面之后，布什总统对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他的讲话虽然中途未被掌声打断，但结束时议员们纷纷起立欢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精心布置的巴洛克式的玛林斯凯皇宫中举行了正式宴会，参加者有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其中包括五名鲁克领导人。祝酒词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没有人翻译成俄语。坐在丽贝卡旁边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说，幸亏他懂英语，否则他还真的不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离开皇宫，总统接着访问贝比亚。这是当年纳粹德国施行残[570]酷暴力的遗址。在这里，布什和克拉夫丘克都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然后，他们回到机场，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空军一号起飞，从基辅直返华盛顿。

整个访问只持续了五个小时，但对于一个了解过去的观察家来说，它却是史无前例的。自从17世纪初期以来，这是一个大国的首脑首次来到乌克兰，待其领导人犹如元首，而且特意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坚持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都加入到他的访问中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什曾赞扬戈尔巴乔夫，并赞同联盟条约（乌克兰人也参加了条约的起草），这个事实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布什来访本身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毕竟，他强调说未来要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对于乌克兰朋友来说至关重要，对苏联其他的共和国也是如此。

拙于政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未能抓住主要问题。他们

忽略了这次访问的实质因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一篇演说中几个不当的辞令上，他们错过了推进他们最终目标的机会：使乌克兰被视为一个有别于俄罗斯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主权国家来定义与周边国家、包括与俄罗斯共和国的关系，这比谈论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联盟条约的优缺点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显示出乌克兰有权自己作出决定。

当然，美国报界报道了鲁克领导人的抱怨。他们没有对官方态度的历史性转折进行哲学家式的讨论，而是制造出了更好的新闻。专栏作家威廉·塞法尔一向喜欢让布什难堪，这次他抓住布什在乌克兰议会演讲时的某些不当辞令，然后给他的演说起个绰号叫“软弱的基辅”。这个玩笑从性质上讲不准确，但这并不防碍人们记住它。[34]

塞法尔的文章可能讨美国人喜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对于乌克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却无丝毫作用。鲁克领导人的前途显得更加渺茫，他们是否会将国家的表面形式置于民主和改革之前呢？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将继承了一个软弱分散的国家，它将难于维持他们所要的独立。他们将依靠外来者的恩赐来得到他们所渴望的未来，还是将共同努力在乌克兰缔造一个健康的全民一致的社会？

布什总统讲话中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独立和民主自由不是一回事。对它的公众来说，一个压制性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帝国一样糟糕。首要的目标应该是民主，因为只有有了民主，独立才会令人向往，人们也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联盟条约保留了各成员国退出联盟的权利，而且确保独裁的中央机构无法剥夺这个权利。〔571〕

民族主义者经济上的主张也着实让我吃惊，他们企图在经济

上维持官僚控制，并从莫斯科发起的改革趋势中分离出来。它或许很快会带来国家外表的独立，但结局将只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内部凝聚力来推进必需的基本改革，这最终只会威胁国家统一。而独立的允诺最终也将化为灰烬。

我的许多乌克兰朋友们对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无动于衷，我对此十分担忧。

布什夫妇在基辅的波里斯波尔机场重新登上空军一号，我和丽贝卡向他们道别。然后，我们走到将把副总统亚纳耶夫送回莫斯科的苏联民航客机上。他请我们和他一起回去，随行的还有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和他的妻子阿拉。

我们五个人在这个中型客机的贵宾舱中坐定后，鱼子酱、熏鲑肉、香槟和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就端了上来。我们为这次看似成功的美国总统来访而干杯。亚纳耶夫似乎对自己在基辅所受的冷遇毫无愠色，反而很高兴，因为乌克兰人似乎很满意。

丽贝卡把话题从闲聊中转移开来。"告诉我，副总统阁下，"她说，"你们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纳耶夫沉思起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人们很不安，"他说，"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就会有人站出来，答应给他们稳定、伏特加和香肠，而我们呢，都得滚蛋。"

〔572〕

一个更加松散的联盟

从5月到7月，曾经签署了新奥加廖沃（9＋1）声明的9个

共和国的谈判者（通常是总统们本人）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一直在商讨可接受的联盟条约文本。有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曾希望条款在他赴伦敦与七大国成员会面之前达成，但这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7 月 7 日，《消息报》登载了对格里戈里·列文科的采访（他受戈尔巴乔夫之托掌握谈判的进程），他提出了一个比 5 月份的设想更实际的时间表，他说目前的草案要在 6 月份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 7 月份将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在他看来，这些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他认为在年底前可以签订条约。

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并没有坐等协议的签订，而是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刊登着对列文科采访的同一期《消息报》还报道说，乌克兰苏维埃已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共和国接管乌克兰境内迄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的所有的公司和组织，并拒绝给中央任何补偿。

乌克兰议会是根据他们去年公布的《国家主权独立决议》采取这个行动的。他们解释现在开始行动的原因时说，中央各部已经开始将各企业转为股份公司，而事先却并未将其产权转交各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未能打破垄断进行私有化，也未能把转变过程的控制权转交各共和国，现在他们正为此付出代价。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削弱，各共和国要求控制其国内国有资产的呼声愈来愈强。与其他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容易使当地的共产党经济官僚与迄今一直充满敌意、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推动的独立运动联合起来。在此之前，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力量还在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则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专制的中央政府。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一切极有可能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发生。

7 月 18 日，列文科宣布草案将被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573〕虽然有些问题尚存争议，其中包括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税收制度、军事力量的控制、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鞑靼斯坦。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它曾宣布主权独立，并要求与其他各联盟共和国拥有平等地位，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它将退出联盟。

乌克兰议会于6月26日星期三讨论了草案。在发言的35名代表中，24名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听取了这些意见，但没有发言。议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决定，以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审查草案，并于9月1日提出报告，政府和学者将就中央被授予权力的法律影响提出报告，由大会主席团评估这些报告，于1991年9月15日将其观点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许多支持独立的人显然对此程序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各方面的报告必将暴露联盟条约的各种缺点，这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它的实行。[30]

至少从4月份起，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深深感觉到拖延条约会使许多其他事情被束之高阁：经济改革、外国援助、中央政府重新改组……这只是其中的几个。列文科在6月初所说的延长期限是戈尔巴乔夫不能接受的。整个7月份他在拼命催促，以便在夏末之前能完成关键性的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于7月12日在原则上同意了其中的条款，但建议有些地方需要改动，这遭到各共和国领导人的拒绝。戈尔巴乔夫已经与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在月底达成协议，正如他告诉布什的那样，他认为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安排。

8月2日，即布什离开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条约可于8月2日“开始签订”，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于当天签署。[31]其他共和国要稍后一些，因为它们必须先满足国内

法律的要求。

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称此条约公正地反映了各方利益，它将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各主要国家自愿联合的同盟[38]”奠定基础。

除戈尔巴乔夫外，对条约表示热心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它赋予了各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权力，抛弃了国名中“社会主义”和〔574〕“苏维埃”这两个词，这肯定会激怒党内保守分子以及帝国的拥护者，将近7月底时，在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之前，现存帝国的许多声援者便开始发表公开信，呼吁他不要接受拟定的条约草案，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苏联解体。[39]

其他人则因为草案中保留了太多的苏维埃国家的成分而反对它，虽然草案实际上包含了他们几个月来的所有的建议，但一些较激进的改革者仍持反对态度。8月8日，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及其他著名民主人士给叶利钦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不要签署草案。[40]第二周，民主俄罗斯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提出只有包括下列条款，条约才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草案中没有这些条款：

1. 草案至少要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加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乌克兰加入，草案无效）。

2. 最后条款须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公众事先讨论。

3. 删除允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批准新宪法的条款。

4. 包含明确的退出条约的程序。

5. 条约中要有明确条款规定新联盟中的成员不得侵犯

人权或者实施种族屠杀。

鉴于叶利钦最有组织的支持者给他施加了这么大的压力，有些人怀疑即使戈尔巴乔夫赶回来参加签字仪式，叶利钦8月20日是否会真的签署条约。[41]但不管怎么说，当叶利钦和纳扎巴耶夫8月18日在阿拉木图会面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好了要在条约上签字。

我和丽贝卡把离开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10天，以便在斯帕索别墅接待布什夫妇的来访。我们8月1日从基辅回来后，就开始打点行装，计划8月11日星期日离开。我们在莫斯科任职的最后〔575〕10天被一系列的活动所纠缠：除了收拾东西外，就是参加一系列的告别宴会，每天接受几家新闻单位的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一次是用俄语对苏联记者，一次是用英语对美国记者。

通常，我是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英语、俄语轮流进行。大部分属于背景情况介绍，不允许记者们公开地引用我的话。如果他们想采用我说的东西，他们会说"一位资深的西方外交家这样说"。

我们接到了参加最后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邀请，这样，我对过去四年半经历的评论将会被记者们引用。开始我有些犹豫，我知道我得应付关于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微妙问题。假如我说我们认为有人在搞阴谋，企图推翻他，那我就不应同意搞公开的记者招待会。[42]美国大使不能被报界引用他的话说，他估计戈尔巴乔夫会离职。否则到处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信号，说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这只会鼓励反对他的企图，因为它暗示美国将默认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我一直认为背后搞阴谋的人不可能推翻他，但他们可能会试一试。由于外面盛传戈尔巴乔夫会被赶下台，我认为如果

我能找到某种方式警告——有可能发生政变，但如果政变真的发生，它很可能失败——将是有益的。于是，我同意去参加公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定于8月5日举行，有几十名记者参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名记者问道，在联盟条约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如何。我回答说，只要他和叶利钦保持合作，直到下届的选举，他的前景会很不错。选举大概在一两年后举行，到那时形势如何，我就无从预料了。

另一名记者问我是否认为民主变革已经深入社会而不可逆转。这倒给我开了个头，我于是做出如下回答：[39]

> 我认为改革的势头和程度已经使苏联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或者独裁统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人会做这样或者那样的努力，而且我怀疑一些企图这样做的人正在背地里活动，但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能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方式回到计划经济？我将回答"不"。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企图在这里或者那里施加压力，也只是使事情的进程慢一点……但制度已经被摧毁了，我看不出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得到恢复。
>
> 至于以独裁方法统治，就更不必说了。我知道存在这样一股势力，他们要求和呼吁其他治理方式……然而，我认为应该禁止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真有这种企图，那么天理难容；如果真的有，我想，他们最终会土崩瓦解。我不是说不存在篡权的企图，不难想象有可能存在这种企图，但我想它们终将失败。

[576]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报道，就算有报道也都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不错”，只是他们没有提及我那个表达虽然有些笨拙、但却是经过仔细推敲的限制条件。没有人报道说，我曾说过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企图不会得逞。

用空话无法解释当时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但如果谁不讲空话，得到的反应通常是一个哈欠。当然，批评家们后来毫不迟疑地批评我们根本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夜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夜。谢尔瓦德纳泽夫妇邀请我们赴晚宴。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成年人，我们想这是结束我们在这个国家任职11年的最好方式。

当然，我们谈论了政治。谢瓦尔德纳泽仍担心右翼会篡权；他认为去年12月他警告的那种危险并没有消除。但假如他知道谁会篡权的话，他的态度似乎过于谨慎了。我想他只是有一个总的预感，而并不知道具体的阴谋。

〔577〕尽管谈论了一些政治，但这是一个充满了浓厚家庭气氛的夜晚。谢瓦尔德纳泽不像我曾拜访过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的住宅里通常充满了矫饰的奢华。而这里更像一个典型的格鲁吉亚上流社会的家庭。谢瓦尔德纳泽语气温和，举止文雅，表现出他是一位富有深刻文化内涵、情感丰富的人。

在我们入座前，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孙女，从第比利斯来。她刚学会了一点俄语，讲话大部分还用格鲁吉亚语。他和我们一起就座，谢瓦尔德纳泽的夫人问我们是否介意孩子做个祈祷。我们当然赞成。于是我们颔首直立，她用格鲁吉亚语祈祷。祷告不是像我们美国孩子们那样只是简单地背诵“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赐予我们食物。

阿门"，而是我们在格鲁吉亚教堂里通常听到的那种祷告，它持续几分钟，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结尾。当她结束时，我们的主人画了一个十字，我们都低声说"阿门"，然后就座。

30年了，我和丽贝卡一直和这个国家打交道，亲眼目睹了它的传统文化遭受毫不留情的破坏，共产党统治集团用尽办法使丰富的传统文化变成一个众人相似的"新苏联人"。但在那个星期六晚上，1991年8月10日，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还被人铭记，这个用格鲁吉亚语吟诵祷告的稚童向我们显示出过去的价值观在将来还有一席之地。

这实在令人振奋。但我并未因此而陶醉，我不禁想道，随着优秀传统的复兴，那些既为这个警察国家所利用，又为其所限制的丑恶的、破坏性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重新泛滥呢？

第二十章

失败的政变

〔578〕

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不能行使苏联总统之职……我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的职务。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政令①

鉴于一些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我在这里宣布如下命令：这个委员会的言论违犯了宪法，其组织者的行为已构成图谋军事政变的犯罪行为。

鲍里斯·叶利钦政令　1991年8月19日②

如果他（戈尔巴乔夫）签署《联盟条约》后再去度假，事情的发展将会对他有利。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　1991年8月17日③

我认为历史将这样记载：20世纪实际上结

束于1991年8月19—21日。

鲍里斯·叶利钦　1994年④

1991年7月29日，也就是布什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汇聚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他们同意定于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坚持要对苏联政府进行重大改革。根据叶利钦的建议，戈尔巴乔夫同意签署条约后不久撤换克留奇科夫、普戈和帕夫洛夫。⑤虽然会议是在他们三人认为非常隐秘的状况下举行的，但是后来却在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他们谈话的记录。⑥

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度年假。克留奇科夫于是马上派一小组人到郊区马斯基诺村的克格勃秘密活动场所制定一个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相当于实施军事管制）。⑦但当8月8日这些人向克留奇科夫报告说情况还没有达到非要这样做不可时，这位克格勃主席反对说此事不得耽搁，理由〔579〕是一旦联盟条约签订就不可能再宣布紧急状态。

第二周，克留奇科夫叫这些人回到马斯基诺村继续筹划紧急计划。他这样做的同时，又告诉他们当中的一个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叶戈罗夫，鉴于戈尔乔夫从心理上不能应付当前这种形势，所以将不通知他而宣布实施紧急状态。⑧

8月16日，星期五早晨，宣布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实施军事管制的计划草案摆到克留奇科夫面前。他马上命令克格勃副主席派技术人员到克里米亚去切断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⑨但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个应急计划。几个主要人物尚未同意。

浴室里的交易

在美国政治中，曾有一个阶段政治上的决定都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达成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个传说。在俄国，与之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一个不仅可以放松、饮酒、聊天的地方，而且可以讨论大事，特别是秘密的事。8 月 17 日，克留奇科夫邀请了几位同仁去克格勃在莫斯科的一处秘密场所洗蒸汽浴，这个地方的代号为“ABC 小屋”。“ABC 小屋”拥有豪华宾馆的所有康乐设施，比美国政治家通常光顾的宾馆还要奢华。

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接受了邀请。波波夫 6 月份曾给我一份指控阴谋者的花名单，他们和克留奇科夫都是列在名单上的人物。另外，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负责军事工业的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兰诺夫、负责人事的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也在其中。

根据政变后俄罗斯大检察官的证词，这伙人用过蒸汽浴后一同去冷却间，那里摆放着饮料和各种便餐。亚佐夫、舍宁和帕夫洛夫挑选了伏特加，其他人和克留奇科夫挑选了苏格兰威士忌。克〔580〕留奇科夫对帕夫洛夫说，他很快要被撤职了。话题就此打开。“我现在正准备辞职呢！”帕夫洛夫虚张声势地嚷道。然后，他便嘟嘟囔囔地谈起了目前国家的形势，说这几乎是场大灾难，马上就会闹灾荒了。所有的纪律都消失了，没有谁再愿意听话。他认为只有宣布紧急状态才能挽救国家。

帕夫洛夫的抱怨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他的帮腔。克留奇科夫同意他的见解，而且补充说，他过去一直向戈尔巴乔

夫报告国内的困难状况，但戈尔巴乔夫一直不很积极。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不想听到真理，每次当克留奇科夫在这个问题上启发他时，他总是打断讲话，然后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

有鉴于此，克留奇科夫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实施紧急状态，然后派一个代表团去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如果他拒绝，那么就让他留在克里米亚并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就说他无能为力。亚纳耶夫将成为代总统，之后，在克留奇科夫的帮助下，最高苏维埃将召开会议，使整个程序合法化。

伏特加酒喝完了，一直致力于应急计划的克格勃官员叶戈罗夫被派去再多搞些酒来。当他回来时，话题集中在谁去见戈尔巴乔夫（看来大检察官所用证词是由叶戈罗夫提供的）。

一些重要人士当时都不在场，当亚佐夫建议军队、克格勃和民兵团结起来采取行动时，克留奇科夫告诫大家说，普戈对这个计划还一无所知。亚纳耶夫呢？他也不在圈内，但是舍宁坚信他肯定会合作的。对于卢基扬诺夫，他们还不能确定，就像舍宁说的，他还在举棋不定。[13]

下午6点钟多一点，当这群人散会时，阴谋的主线条已确定。但就在那时——他们一行人将在不到48个小时内去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之时，他们还未得到一个关键人物的同意，要使这次行动具有法律效果，这个人物的加入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亚纳耶夫拒绝合作，不承担代总统之职，该怎么办呢？策划者们显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他肯定会接受的。

〔581〕

阴谋集团成立

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下午5点钟之前，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说，有伙人来看他，现在正在克里米亚海滩的总统度假室中。戈尔巴乔夫没有约过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伙人未经他的允许就能进来感到很吃惊。他听人说他们之所以能进来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和他们在一块儿”。尤里·普列汉诺夫负责克格勃第九局，肩负保护总统以及其他政府要员的人身安全的职责。大致地说，在美国和他角色相当的就是美国秘密机构的头头。

为了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戈尔巴乔夫拿起电话寻问。没有声音。他又面带恐惧地匆忙试拨桌上的其他电话——每部专用电话都连接着不同的设备，没有一部可以用。他把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召集到跟前，告诉他们说他们被禁闭了，有人可能打算要他们的命。[11]

直到那时，戈尔巴乔夫才看到这些不速之客，他们未经通知就闯到他楼上的书房里。除安全总长普列汉诺夫外，这行人中还包括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两名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和奥列格·舍宁，以及苏联陆军司令瓦连金·瓦连尼科夫，苏联军界中著名的大嗓门、好战的顽固派之一。当波尔金在浴室会议上被选派担此任务时，亚佐夫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一见他准会嚷嚷；其实，波尔金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为信任的下属之一。

起初，这群人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赞成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将权力交给亚纳耶夫，当他拒绝时，瓦连尼科夫愤怒地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说，他曾竭力和他们讲道理，预言他们是不会

成功的，而且可能会导致一场残酷的内战。但是，当他发现木已成舟时，他便骂他们退下。[13]

当“代表团”成员们飞回莫斯科时，他们的同伙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汇合。根据检察官后来搜集的证据，帕夫洛夫来晚了，他〔582〕在星期日傍晚就已经有点儿醉了。亚纳耶夫更迟一点闯了进来，他醉得更厉害。接着是卢基扬诺夫，当他进来时，克留奇科夫让出他坐的上首位置，坐到了桌子的旁侧。

虽然克留奇科夫做出服从的姿态，但会议仍由他主持。首先，他向到会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不听从到克里米亚去的“那群同志”的建议。然后他又补充说，总统已无法行使他的职责，因为他患病了。

“如果他真的病了，应该有医生诊断书或由他自己宣布出来。”卢基扬诺夫面带焦虑地说。

“稍后，我们会拿到诊断书的，”克留奇科夫回答，“而且，那些同志回来时，他们会把他们的印象说给我们听。”

接着，卢基扬诺夫提出他不想加入紧急委员会了。作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认为他那样做不太合适。其他人便开始与他争辩，直到10点15分，巴克拉诺夫、舍宁、波尔金和普列汉诺夫走进来（瓦连尼科夫当时去了基辅以争取使乌克兰当局加入）。他们几个都醉醺醺的。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描述了他们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以及戈尔巴乔夫如何断然拒绝成立紧急委员会或宣布紧急状态。

焦点于是转移到亚纳耶夫那儿，刚才他一直没怎么发言。他还没有签署文件行使代总统权力，而且看起来他还在犹豫。据传说，克留奇科夫曾告诉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如果我们不去收获，就会发生灾荒，几个月后，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内战。”

亚纳耶夫没有被说服，他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没有病，因为在同一天（戈尔巴乔夫的联系被切断之前），他还和戈尔巴乔夫就其第二天计划返回莫斯科的事通过电话。他然后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阅读那份准备让他签署的文件。

“我不会签字的，”他突然宣布。屋子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亚纳耶夫接着说，“我相信总统休完假后会回来的，病会好的，他会康复的。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道义上的权利也没有必要履行他的职责。”

〔583〕 发表这篇证词的检察官后来评论说，现在回顾起来，很难说当时亚纳耶夫是真的有疑虑，还是故意推托一下以免以后有人控诉他追逐权力。但无论如何，他不久之后还是垮下来了。其他的同谋者们都安慰他说，他们都将各自承担责任，而且总统病情一旦好转就将回来重掌局面。

直到11点后，亚纳耶夫才颤抖着拿起笔，在宣布履行代总统职务的文件上签下了他歪歪扭扭的名字。亚佐夫、普戈、克留奇可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即刻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命令，宣布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

正在白俄罗斯度假的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被召来参加会议。当他进来时，文件刚好签订。当时他正身着牛仔裤和斜纹布夹克衫。

一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后，别斯梅尔特内赫抓起笔将自己的名字从紧急委员会名单上划掉，抗议说将他的名字写在那上面，真是荒唐。如果他真的那样做，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会再同他打交道了。

所有的文件都签订后，克留奇科夫说还准备拘留一些民主领袖，并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10多个人的名单。“你应该抓1000个。”帕夫洛夫用嘲弄的口吻大声建议说。

午夜过后不久，一些策划者回家了。亚佐夫后来证明说，当他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大门、面对红场时，他看了看塔楼上的钟，当时已是凌晨12点16分了。[13]

政务会接管

塔斯社大约于5个小时后，即莫斯科时间8月19日上午5点半钟前首次宣布接管。[14]接下去还有各种宣言，主要内容包括：亚纳耶夫将履行总统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都要服从于它，否则就中止其活动。还有，紧急委员会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政治党派及公共团体停止其活动，禁止罢〔584〕工和上街游行，对舆论工具重新实行监督，不管何时何地如果有必要将实行戒严。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又有命令封闭了最具独立性的报纸的发行。

虽然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成为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允许外交部向驻在各国的苏联大使发出命令，让他们以紧急委员会的名义向其所驻国政府送交一份公文。这一公文由亚纳耶夫以代总统身份签署，并由塔斯社公开发表。它向外国政府保证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是暂时的，他们不会影响苏联在国际上的承诺。

卢基扬诺夫实际上给了紧急委员会更强有力的隐蔽帮助。在他发表的关于第二天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草案的一个重要声明中，他指出草案没有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初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被各共和国领导人拒绝），他坚持认为在签署前应该经“最高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进一步讨论。[15]虽然卢基扬诺夫并没有把这一声明和紧急委员会扯在一起，但是它紧随紧急委员会

的第一个声明之后，并作为一系列声明的一部分由塔斯社发表，其目的无疑是为拖延 8 月 20 日签署联盟条约提供借口。[16]

另外，又有两个人于 8 月 19 加入紧急委员会，一个是工厂经理亚历山大·济贾科夫，他数月以来一直谋划以一个政务会取代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瓦西里·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领导着苏联农民工会，它是一个游说团体，但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营和集体农庄主的利益。他们都不是政界要人，但是他们却能够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出现。

一些组织和政界领导很快同意了政务会的成立。这些组织和个人包括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17]——他不该把他的党叫自由民主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分裂后，他们一直忠于莫斯科（而且他们也曾参〔585〕与今年初民族救亡委员会的活动）[18]。还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从度假地克里米亚匆匆赶回莫斯科为紧急委员会出力。

整整一天，军事装备从四面八方被运往莫斯科。但除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和跑马场上的示威者，执行宵禁的军队不过就是站站岗而已。许多民主运动的政治领袖都被置于监视之下，其中有两个被抓了起来，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逮捕。

但紧急委员会及其支持者并非那天唯一的积极活动者。

叶利钦采取行动

8 月 18 日，叶利钦正在阿拉木图与纳扎尔巴耶夫磋商。他原定于下午 5 点乘苏联政府飞机离开，但纳扎尔巴耶夫逼着他留下来吃晚饭，所以直到晚上8点他才登机离开。负责后勤的哈萨克斯坦官

员不太熟悉叶利钦所乘飞机的通知程序，所以苏联空军保卫队未接到修改的飞行计划。[19]后来便谣传飞机时间的突变挫败了政变策划者们欲将飞机射下来的命令。[20]至今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曾颁布过此命令，但有一点属实，政变策划者的确发布过命令，将叶利钦的飞机转向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飞机一到马上就逮捕并将把他监禁在莫斯科以北扎维朵夫的政府狩猎处。但在飞机到达前，大概是克留奇科夫改变了命令。飞机同往常一样降在民用机场，叶利钦则驱车回到他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

克留奇科夫没有马上逮捕叶利钦，而是吩咐克格勃监视他。他似乎已下定决心等叶利钦违反紧急委员会颁布的命令，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抓起来。

第二天早晨，叶利钦被女儿塔尼娅叫醒去看一个电视公告。他说他当时马上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俄罗斯政府成员陆续到达他的别墅的同时，叶利钦开始和其他各共和国的首脑进行电话联系。〔586〕7点刚过，他便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但被告知亚纳耶夫工作了一夜，正在休息。然后，他又竭力和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但等了一会儿后，被告知克里米亚的官员不给他接通戈尔巴乔夫。费了好大的劲，他终于和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以及白俄罗斯领导人尼古拉·德蒙特伊通了话，但令他吃惊的是他们都不愿意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以前表态。[21]

俄罗斯议会的代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当时还没有被确定接替叶利钦的位置，他不久后便到了别墅。陆续到达的还有其他俄罗斯政府官员：谢尔盖·沙赫赖，根纳季·布尔拉茨基，伊万·西拉耶夫，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维克多·亚罗申科。[22]他们集体起草了一篇告俄罗斯人民书，他们先写下来，然后又给每个人复印了几份留待分发。这时，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

恰克顺道来看望叶利钦，呆了一小会儿便匆匆赶回去了。

一起草完呼吁书，他们便决定迅速赶回白宫，那幢面临莫斯科河的俄罗斯政府所在地。他们意识到别墅已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但他们不清楚保安部队究竟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凌晨一两点钟，驻守在叶利钦别墅的克格勃分遣队显然只是被命令监视这幢房子。所以，他们眼看着叶利钦和其他俄罗斯官员离开别墅赶往市里，未采取任何行动。[23]

大约10点钟，他们到达白宫，公布了刚刚写好的呼吁书，然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哈斯布拉托夫召集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叶利钦接见了请来的各国驻苏外交人员。中午刚过，他得知来自于塔曼的坦克已到达白宫而且很友好（他们接到命令驻守白宫）。他于是走出来，和士兵们谈话，然后登上其中一架坦克，创造了10年来一次最佳摄影镜头。

苏联的大部分新闻媒介已向俄罗斯领导人关闭，但后来证明由于还有别的渠道，只产生了一些很小的不便。独立的新闻社[587]"国际文传电讯"像外国记者一样，立即报道了他们的全部声明，对外的电话线路以及电视线路仍保持畅通。如果由克拉夫琴科控制的塔斯社和奥斯坦金诺频道拒绝报道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市民们仍可以从国外广播中获知详尽的事实。就连被困于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也已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自由之声"听到了全部消息。

俄罗斯政府呼吁举行总罢工，但一开始好像没有人太在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在白宫。中午，还只有几千人的队伍到傍晚时已壮大到几万人。中午，库兹涅茨克盆地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电告亚佐夫让军队将他们抓起来，但亚佐夫未采取任何行动。他后来告诉调查人员说，他认为帕

夫洛夫一定是喝醉了。[24]而实际上，帕夫洛夫主持了 8 月 19 日下午的内阁会议后，便回到他的别墅，以后在政变中再没有听说过他。

虽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摩尔多瓦新当选政府立即对政变进行了谴责，但仍有几个共和国领导人，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丘克，白俄罗斯的德蒙特伊，赞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其他人最初看起来还有些犹豫，但等到 8 月 20 日星期二早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已都宣布这场阴谋政变是非法的。但乌克兰共产党却表示同意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

沉闷的反应

布什总统正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度假，这时传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已被免职。据消息可靠人士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勃特的说法，国家安全顾问伯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午夜塔斯社报告前已通知布什此事。意识到明日凌晨布什就要发表宣言，他们讨论了布什该说些什么。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斯考克罗夫特说这次政变很可能会成功。鉴于我们或许要和政变领导者们打交道，他说，我们不该“不留一条后路”。所以，他建议不要使用像“不合法的”、“非法的”或者“不符合宪法的”等字眼。〔588〕布什同意他的建议，最后他们认为用“超越宪法”或许更合适些。[25]

第二天早晨，布什打电话给一周前接替我的驻苏联代办吉姆·科林斯，得知科林斯已见过叶利钦，后者表示要决心抵制这次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给过布什一份分析报告，告诉他这次政变计划得很糟，但斯考克罗夫特好像说：“在这点上，该报告不

过是推测，无疑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成份。"所以，当布什总统向报界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听起来似乎他认为政变已经成功了，而且他有意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交往。当他谈到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时用的是过去时态，他希望政变领导者们能履行苏联的国际义务，将其显然是非法的行为轻描淡写为"超越宪法"。

虽然当晚他会发表一个更为严厉的讲话，但是他的第一次讲话却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尤其在苏联。8月19、20日，政务会在他们控制的传媒中反复引用布什的话，丝毫不考虑布什后来作的修改。19日，关键的一天，布什一直回避直接与叶利钦联系，即使叶利钦曾通过科林斯请布什打电话给他。[⑱]布什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显得他已放弃了戈尔巴乔夫，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叶利钦一直公开地争取恢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与叶利钦直接联系将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虽然布什8月19上午的错误后来得到纠正，最近事情的发展也证明这个错误并未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但是它表明了白宫对苏联事态判断的缺陷，这一点在布什的整个任期都让布什一班人烦恼。

首先，鉴于苏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解释它的第一个标准不应该是"历史上的经验"。在许多方面，苏联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她最不可能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然而，斯考克罗夫特猜测政变会成功，并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的政变领导者组织不当不过是异想天开恰恰是基于这个原因。

〔589〕 但这不是唯一的错误，而且也不是最严重的错误。布什讲话后面所隐含的更深刻的错误在于他对政变领导者的评价以及他应采取什么策略同他们打交道。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帕夫洛夫是

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赞成用铁腕政策中止苏联的解体，他们显然都在阻挠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期望他们会继续改革过程简直是愚蠢至极。

而且，他们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同美国及整个西方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达成的妥协。克留奇科夫编造了一整套的无稽之谈诋毁美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削弱苏联。亚佐夫则用尽手段违反欧洲裁军条约，以其不妥协的立场使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订被拖延多年。而帕夫洛夫呢，从他上任的第一周就一直责备西方银行家、工业界人士以及西方政府使苏联面临种种难题，并明确提出他反对与西方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就算这伙人能执掌政权一段时期，美国总统难道就有必要与他们周旋吗？给政变领导人留情面，美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最后，避免阻断联系渠道——其实从来也不存在——的做法忽视了美国的声明和政策对苏联形势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领域，因为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领会某些话，但毫无疑问，美国能够推进有利形势和阻止不利发展。一个明显例证就是罗纳德·里根使用了“罪恶的帝国”这个词。尽管因此惹恼了苏联统治者，但它却有力地动摇了苏联帝国自封的合法性——尤其是因为里根看到了那里发生的有利变化。

正像政务会的第一个宣言所表明的，政变者不准备大规模动用军队及警察以武力夺权，他们指望给政变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使得其行为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人们自然会归顺过来，那些不能保持中立的也可以以违法为借口抓起来。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得不到人们对其合法性的承认。〔590〕与外界同他们建立联系的需要相比，他们更需要外界的认可，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认可。

那么，总统究竟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问到我，我将会建议他简单阐述三点：1. 夺取权力的企图是非法的；2. 我们继续承认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3. 如果无法取得和苏联总统的联系，我们将努力与选举产生的各共和国政府联系，因为根据苏联宪法，他们有权与外国缔结关系。

这样的声明将使政务会惊恐万状，如果其他西方领导人愿意仿效的话就更是如此。他们也不会痴心妄想西方会默许他们篡权，更重要的是，应该警告他们，除非戈尔巴乔夫复职，否则我们将和各共和国直接交往，就当苏联政府不存在。这才是我们反抗莫斯科那个反西方小团体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运用这一武器就意味着以实力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去祈求他们。

从 8 月 19 日晚上开始，布什总统开始正确行事。他的第二个声明已开始谴责政变是非法的、违宪的，这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叶利钦，之后一直和他保持紧密联系，直到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整个星期二政务会一直播放第一个声明，而不理睬第二个。

尽管政府对莫斯科局势的理解已逐渐抓住了重心，但布什似乎仍然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政策和利益的前景来看待那里的政治对抗。他一直不能摆脱曾诱使他发布 8 月 19 日凌晨那不幸声明的本能。

这些本能反映了布什和里根工作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人们滥用“保守派”和“自由派”，或是更肤浅的“左派”和“右派”这类错误对比没有关系。但它肯定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有关。

〔591〕 里根认为，会有好的变化出现，而且他将起到有影响的作用，所以他不大可能犯布什 1991 年 8 月 19 日早晨所犯的错误。他将

有一种本能的自信，相信他的讲话将导致局势发展的不同，他将设法不求宠于不受欢迎的政权，而是把它拉下来。他将有信心应付一个动荡形势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局面。

另一方面，布什则对变化感到不舒服。即使是一种好的变化，他最初也将很难认识到这种进步。他似乎总是落后一步，一个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致命危险、却足以让他坐失良机的一步。而里根则很可能抓住机会。布什不相信他可以塑造未来，于是他集中力量搞好现在，不重蹈覆辙。里根因为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根基很自信，所以他愿意抓住机会，而布什却总是左顾右盼。

这次布什总统很幸运。这个自封的莫斯科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第二天就开始分崩离析，不是来自外界压力，而是由于它自身的虚弱和无能。

政变垮台

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在俄罗斯白宫内度过了最为痛苦的两夜，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闯过这一关。然而现在看起来，政变的失败命运在第一个宣言发表后十四五个小时就已确定了，此间，他们未能马上监禁叶利钦，叶利钦公开反抗，众多军队不愿向自己的人民施用武力，大城市示威者的人数不断壮大，最后，政变领导者在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亚纳耶夫、普戈、巴克拉诺夫、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和济贾科夫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没有出席很明显是为了强调政务会的非军事特征。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个灾难。因为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心怀恐惧，亚纳耶夫的手不停地颤抖着。亚

纳耶夫似乎心怀歉意，翻来覆去地许诺说他们的统治是暂时的，他〔592〕们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回来。当问及戈尔巴乔夫到底患了什么病时，亚纳耶夫则闪烁其辞，只是说“他现在正在休息，接受治疗”。

随着记者招待会的进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严肃了，甚至有些无礼。《独立报》的塔基亚娜·马尔金娜问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商人报》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和皮诺切特将军协商过。最后，从侧影看让人想起希区克克的亚历山大·鲍文用亲近的口气问他从上学时起就很熟悉的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政变发生时，我们的儿子戴维和他的妻子为了写一本书，正在亚库特旅行，收集关于西伯利亚自然方面的资料。他们告诉我们，最初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放逐，他的苏联朋友们是何等的恐惧，但看完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令人惊奇地轻松地笑了起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自信的领袖，也不是可以恐吓一个国家臣服的暴徒，他们不过是胆怯的、竭力自保的官僚，他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

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却永远不能容忍他们的软弱和懦弱。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被鄙视对象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不会跟随他们，他们也没有强迫人们那样做的意志和手段。大多数人们似乎在 8 月 20 日星期二早晨已经感觉到了这点，虽然很多人仍担心他们会孤注一掷，对白宫进行军事袭击，这样可能会造成几千保卫者遭杀害的惨案。

当天，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已开始瓦解：帕夫洛夫因“病”离开，亚纳耶夫不久后也不见了。苏联宪法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关

于紧急状态委员会合法性的严肃问题。卢基扬诺夫星期二早上报告说，通过星期一与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磋商，他确信他不可能得到 2/3 的选票来使他们的委员会具有合法性。他们许诺的关于戈尔巴乔夫身体情况的医生报告也没有兑现。

直接的反抗也逐渐升级。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都是被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取消的戈尔巴乔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政变是非法的，科学工业联盟的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主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28]共产党的青年附属团体共青团的领导人也谴责这场政变，他们要求面见戈尔巴乔夫，并呼吁士兵们不要用同胞的血玷污他们军人的荣誉和良心。〔593〕

群众们不仅在莫斯科的白宫周围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其他城市聚集。外国首脑们也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心怀恐惧，害怕他们可能会在 8 月 20 、21 日夜里进攻白宫。关于 8 月 19 日进攻白宫的报告已证明是假的，[29]但军队仍然包围着这所建筑，随时有可能轻而易举攻下它，尽管可能会有许多人丧生，因为那么多人聚集在它的周围。

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经过一天的踌躇不决，克留奇科夫终于下令逮捕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亚佐夫尽力一个接一个地劝说军队指挥官们进攻白宫。有些人，如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和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断然拒绝了。沙波什尼科夫甚至威胁说如果有人进攻白宫，他就炮轰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只是到了半路就停下了。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从莫斯科南部的图拉调兵过来，但他马上告诉叶利钦他不会进攻白宫。他手下的一些士兵甚至一度加入到叶利钦的队伍里来保卫白宫。

克格勃特种部队、曾于1月份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网的鼎鼎有名、极具威慑力的阿尔法小组也不准备向他们的同胞开火。当他们得知三名副指挥官中有两名反对动用武力逮捕叶利钦时，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他们对1月份他们采取行动以来所受到的待遇不满，特别是他们之中的一名遇难士兵的家属未得到任何帮助。除此之外，打击立陶宛“叛军”是一回事，进攻一个民选的俄罗斯政府却是另一回事。就连克格勃精英也不想参与一场内战。

精通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学家、国会图书管理专家杰姆斯·布林顿当时正在莫斯科，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绪。[30]整个城市都谣传下午4点钟白宫就会遭到袭击。但4点钟什么也没有发生。于[594]是他们确信晚上肯定会发生。那天晚上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但这并未阻止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白宫周围向政变者们挑战，看他们究竟有没有胆量杀害他们。在圣彼得堡集结起来反对政变的群众更多。但莫斯科更紧张些，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反抗的焦点是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群众不仅包括许多年轻人，还有很大数量的中老年人。女人和男人一样多，正像一位年老的图书管理员8月20日晚动身到白宫去对布林顿讲的那样。他们这一代加入其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保持沉默很久了”。[31]1989年12月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灵柩上留下“原谅我们”、“永远不要再这样了”字样的那种感情好像又复苏了。

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当然也在那些用自己的身体来捍卫俄罗斯政府的人们之列，同她一样的还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他带着他的大提琴从巴黎飞来。很多保卫者曾严厉谴责过戈尔巴乔夫，他也曾严厉责骂过他们，同时还为那些要将他赶下台

的人找借口。人们不会忘记这些分歧，但一个比个人更重要的问题正摆在面前：俄罗斯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还是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正如叶琳娜·波纳对与她一起保卫白宫的伙伴所说的那样：

> 戈尔巴乔夫是我们的总统。只有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有资格评论他。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统治我们，指使我们……但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人，真正的人，而不是牲口。[63]

人们担心的对白宫的袭击没有发生，但是夜里，还是留下几具尸体。三名年轻人，德米切·科马、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乌索在美国使馆旧楼前面的街心花园与坦克兵遭遇，结果被打死。虽然这次事件不是军事袭击造成的，但它使示威人群明白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同时它也使军事指挥官们知道：只要存在重型军事装备，而且操纵者又是一大群未经训练的士兵，那么就会有更严重的流血牺牲的危险，即使士兵们并不是按照命令对示威者采取行动的。 [595]

星期三凌晨3点钟，也就是阴谋者决定性的克里姆林宫会议结束后还不到51小时，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已看到成功无望。亚佐夫命令军队撤离莫斯科，回到驻地，克留奇科夫则电告叶利钦说不会再进攻白宫了。

几小时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还可以行动（帕夫洛夫和亚纳耶夫晚些时候被逮捕，烂醉如泥），他们飞往克里米亚，显

然是想向戈尔巴乔夫弥补过失。戈尔巴乔夫拒绝见他们，并于深夜回到莫斯科，随行的有苏联政府的官员以及他的随从，如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巴卡金和普里马科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活跃的同谋者都被逮捕，其中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者，最高苏维埃先投票取消他们的议会豁免权，然后再将他们逮捕。有几个人自杀：当官员们去逮捕内务部长普戈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开枪自杀了。两天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他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并给家人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之后便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自缢了。他还极具个性地留下 50 卢布支付他在食堂的饭费。[33]

戈尔巴乔夫的双重磨难

在克里米亚经历了 72 小时的磨难，8 月 21 日星期三晚上，戈尔巴乔夫和家人在由俄罗斯政府组织、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指挥的人员陪同下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没有做公开讲话。当他面对着摄影机镜头走下客机的梯子时，他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赖莎则是被搀扶下来的。

〔596〕 第二天，他举行了一个很长的记者招待会。三周前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他曾接待了布什。[34]他详细叙述了他在福沃斯的经历，然后开始回答问题。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很明显的：同以往相比，他的回答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有时竟在中途突然转变思路。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诚恳是毫无疑问的。

这使得他对国际文传电讯新闻社记者瓦拉迪斯拉夫·特里克

霍夫所提问题的回答更加令人吃惊，也更加令人忧虑。特里克霍夫注意到，共产党在其领袖被非法监禁的三天里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他问道："难道您不认为现在应该认真注意苏联共产党的问题吗，作为一个工具和政治组织，它总是不能跟上当前形势。"

人们可能会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会回答，共产党近几天的活动将受到认真审查，以确定它的构成、组织和结构是否适合一个民主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

相反，他却从整体上维护共产党，并重申他珍视已久的期望，将它变成改革的工具：

> 我知道我的职责——我将履行它直到最后，只要我有力量，我就会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牵制、阻止甚至铲除反动势力，将他们赶出苏联共产党。我认为在我们提出的新纲领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团结所有进步人士，所有思想正确的人士……
>
> 我们必须尽力确保改革我们的党，使其成为改革的有生力量。[55]

接着，一位墨西哥记者问他会不会将"拥护新路线的力量"领出苏共，他反驳道："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56]虽然他继续争辩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组织"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一定要废除。像西方的许多人士一样，改革者们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从最近的经历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从福沃斯回来后，戈尔巴乔夫重新取得权力的渺茫希望被这次记者招待会留下的印象彻底毁灭了。[57]

〔597〕 同一天下午9点，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讲话中他丝毫未提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称赞那些敢于站出来维护他的人，同时承认他的某些错误，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他说人民代表大会拒绝接受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正确的，他不该坚持第二次投票，说到未来，他建议继续他的既定路线：签订联盟条约，采纳新宪法，举行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与他早期的计划（反对变换人选）相比，有一点微小变化，即他评论说：国家的安全体系已经证明是"不太可靠的"，需要对它进行"最痛苦的研究"。

就在第二天，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当众以最屈辱的方式，面对他的政府及共产党领导层中大部分人的背叛行为。

当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出现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时，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宣读会议记录，那上面记载着他最亲密的部下曾支持政变。内阁中直接反对政变的只有环境部长尼古拉·沃龙佐夫。不巧的是，他又是内阁成员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员。[33]

叶利钦很快转向反对共产党。他禁止《真理报》和其他党报的发行，命令封闭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那里保存着最敏感的档案），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戈尔巴乔夫则不支持禁止共产党本身。在俄罗斯立法人员再三追问下，他顽固地认为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将是一个错误。

但无论如何，第二天，即8月25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好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作为苏联总统签署〔598〕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按照苏联及共和国法律处理它。第二个是停止军队、民兵、克格勃、其他执法机关和所有党政机关中政治党派的一切活动。[34]

戈尔巴乔夫随后解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所有成员，任命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掌管苏联经济。改革派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个月前他的建议遭到唾弃——现在成了西拉耶夫的助理。这样俄罗斯政府就控制了苏联残余的经济机构。

一天前，即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让巴卡金掌管克格勃，并命令他对其进行彻底改组。与此同时，疯狂的人群挤满了克格勃总部所在的捷尔任斯基广场，捣毁了克格勃前身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克格勃总部里，官员们在巴卡金上任前疯狂地毁坏显示罪证的文件。[46]

于是，从本周开始的准备搞垮戈尔巴乔夫、恢复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的努力，到周末时已使得共产党不能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继续存在。虽然有几个成员仍然有权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组建新党派，情况和以往却再也不会相同了。

苏联共产党并非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汇时的含义，它不是一个政党，它一直是政府的工具，或者反过来说，是控制政府的工具，它有权支使整个国家机构。即使一些类似共产党的组织，不管叫不叫共产党，在苏共残存的基础上再建起来，它也不可能再把触角伸向国家和共和国各个组织中去发挥作用了，它也不会成为国家施行强制统治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将被迫成为一个普通含义上的政党。

他们为什么失败?

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 〔599〕

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失败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们的失败在于自身的无能，他们匆忙组织政变，在开始时没有采取逮捕叶利钦这类必要措施，后来又缺少成就一桩事业所需要的冷酷无情。

显然，紧急状态委员会既没有效率又优柔寡断。但大多数的苏联机构都缺乏效率。它的敌手也缺少周密组织；他们有热情和决心，但没有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有组织进攻的机构。直到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夺权的那天，他们还在争吵不休，而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后没几天，他们又开始了争吵。

政变组织得太糟糕了，但这不是它失败的原因。它失败是因为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场非法夺权。组织者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他们认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60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人们会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数都不会太在意。只要答应他们生活会好起来就行了。他们信不信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对左右局面无能为力。

政变领导者们是其自身偏见的牺牲品。克留奇科夫一直争辩说，只有用铁的手腕才能恢复秩序，保证苏联完好无损，而且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也许曾以捏造或者歪曲了的“证据”来证

明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想要相信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个国家再也不是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想象得那样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错。大多数人对政变不会公开反抗。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因为莫斯科有足够的人坚决反对回到过去，阴谋家不经战斗就休想夺取胜利。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决定而产生的民选机构，使政变在许多共和国未得到轻易的默认。对政变的反抗就是以许多地区领导人为中心展开的，叶利钦不过是他们之中最突出、所处地理位置最具战略意义的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走上街头表示反抗，只要能向阴谋家们显示，他们必须流很多血才能执掌政权就足够了。 〔600〕

"共产主义者什么时候害怕过流血呢?"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问，回答是：当要流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血时。1991年8月19日、20日，莫斯科的事件显示了那些早就该明白的道理：苏联的军队不是用来镇压俄罗斯民众的可靠工具（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可能会进攻非俄罗斯共和国，一年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直被这种威胁困扰着）。军队里的应征士兵被训练抵抗敌军而不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指挥官们会找尽借口不进攻白宫。令人吃惊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竟认为他们的命令会被执行。

很明显，如果政变领导者们坚持的话，他们可能会找到某支军队愿意执行那个很简单的军事任务。但那又会怎么样？想一下在其他城市聚集起来的民众。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辅、利沃夫和基什尼奥夫到处都是。但又有多少军队或者克格勃成员可以信任呢？有多少会加入到另一方去？如果事件发展下去，世界上其他国家又会如何对待呢？1918年德国人曾攻到基辅，当然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内战并不是政变阴谋者们所希望的选择。当这种前景出现在

他们面前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

一 个 意 外？

〔601〕 每当政府或者共和国感到意外时，它们就会指责说“情报不利”。然而，政治上出现意外往往不是由于情报不利，而是因为判断失误。

既然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可以合理地断定它为什么发生和怎么发生，我们可以判断出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哪些不能预测。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之前的几个月里，共产党、军队和克格勃中已有多种势力制定应急计划，对经历政治动荡的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统治”或者“总统直接治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选举产生的议会尤其令他们担忧，但他们知道，从总体上讲，民主运动对他们个人来说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必须镇压。随着共产党的失势，军队在中欧和东欧已失去资源、特权和基础。警察则面临着结束过去滥用权力、服从法律的压力。这些群体一度曾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权决定每一件事”，而现在如果他们所害怕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他们就要面临失业。

最初，他们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宣布总统直接治理，“中止”选举产生的机构，授权他们采用必要的高压政策，将社会引入正轨。起初，他给他们的印象是他有可能采取合作态度——这是他们从他 1990 年秋“转向右翼”得到的暗示。1991 年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塔并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夺权的演习，而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逼迫戈尔巴乔夫使诉诸武力合法化，以便铲除立陶宛政府。

不知是因为信仰还是怕失去西方帮助，或许两者都有，戈尔

巴乔夫拒绝了。但他没有完全排除实行总统治理的可能性，只要在他看来形势需要。因此，他身边的那些亲信——克留奇科夫、巴卡金以及帕夫洛夫（一度曾担任总理）——便竭力使他相信确有这种必要。1 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屈从了他们的愿望，他命令军队进驻莫斯科，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

同时，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每次他们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从 1990 年夏季开始——他们都发誓将迫使戈尔巴乔夫要么授权实行铁腕统治，要么退位。每次他都能出奇制胜，一方面他暗示他们他正在认真考虑实行总统治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选票来免除他的职务。1991 年 7 月，叶利钦为戈尔巴乔夫扭转了局面。由于叶利钦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国家机关设立组织和进行活动。这样，他比总书记给共产党官员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602〕

毫无疑问，在济贾科夫的文件中，期望采取的行动和类似的紧急计划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但地方党的书记们、下属的军事或者克格勃指挥官们不可能自己组织一场成功的政变。要阻止对共产党机构的严重威胁，需要这些关键机构的领导者的赞同，还要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足够的帮助。

1991 年 6 月，当帕夫洛夫向最高苏维埃要求更多的权力时，阴谋集团的核心已固定了下来。但他们的计划仍然似乎是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而不是要将他一脚踢开。给他的选择是，或者自动交权，或者被监禁起来。当小集团的重要人物得知不久后戈尔巴乔夫将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签订联盟条约，而他们将因此而被免除职务时，“倒戈”意识愈来愈强烈了。

驻在莫斯科的消息灵通的各国大使馆对动荡的局势心领神

会。西方政策上也相应作出反应。西方一年来一直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不让他实行总统统治。这被看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抵御他从克格勃、军队和许多共产党书记那里感受到的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谁会站在哪边，而且我们的预感总是要比戈尔巴乔夫的好些。

但我们是否知道8月18—19日晚会发生政变呢？不，当然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比阴谋家们更了解当时的情况，而他们的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做出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足以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策来。

首先，我们知道某些重要势力决心对这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管制，但他们的计划却受到越来越大的挫折，因为戈尔巴乔夫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孤注一掷，采用强制手段，但会采取哪种形式却难以预测。社会新的开放性使阴谋计划不可能停留在一个肯定会成功的小规模〔603〕范围内。任何一个范围广泛的重要计划总会泄露的，波波夫能于6月份得知他们的阴谋就证明了这一点。不与指挥官们进行高层协商，就不可能保证克格勃军队的可靠性。所以，阴谋者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最佳的机会来实行他们的计划。

在福沃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如果他拒绝他们的要求就囚禁他，这个想法似乎只是在8月16日星期五才形成。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准确计划只是在福沃斯遭遇后才定形。实际上，在亚纳耶夫于8月18日莫斯科时间晚上11点签订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文件之前，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计划会继续实行下去。

除了知道可能有一场酝酿中的政变外，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也很重要。秘密情报对形成这样的判断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的是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透彻了解。

1991年夏天，我们的大使馆就反复评论说，尽管逼戈尔巴乔夫退位的企图有可能成功，但一场非法的暴动却不可能成功。这也是我1991年8月5日在莫斯科向美国记者们竭力解释的一点。

如果说8月19日早晨白宫显得惊愕和毫无准备，那么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歇斯底里地惊呼戈尔巴乔夫"被放逐"，好像这已成为定局了（即使是政变领导人也只是宣称这不过是暂时的），星期二的报纸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而其截稿时间是在莫斯科灾难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小时，此时政变瓦解的势头已初见端倪。

例如，《纽约时报》，比其他报纸登载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它在8月19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宣称：

戈尔巴乔夫被放逐，显然是发生了政变
发起者是苏联武装部队和强硬派
戈尔巴乔夫被控将国家引入"死胡同"

标题中有两处歪曲了事实：第一，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放逐"（虽然它可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最终目标）；第二，政变不是"苏联武装部队"的杰作——国防部长并不等于"武装力量"。至少，一个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纽约时报》的这些歪曲——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用了"戈尔巴乔夫显然已被放逐"这样的词句——但是大多数地区的报纸没有这样定位。〔604〕

第二天，8月2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再一次宣称：

克格勃以及军事统治者们强化统治

但那时，很明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统治并不像头一天人们想象得那样紧张，虽然传媒被严加控制，还是有大量消息传出来。

虽然存在着上述失误，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比美国的其他大多数报纸还要好一些。《圣路易斯邮报》使用“放逐”一词时不带任何限定性修饰，不仅是在8月19日，而且在20日至少在4篇不同的报道中用了这个词。它的分析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变已经取得成功；其中一人甚至宣布它已经“把美国政府的最高愿望抛到地狱去了”。两天后，读到政变已被“挫败”，它的读者们一定吃惊不已。

而电视从总体上讲消息也不够灵通。8月19日，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采访时说，政变不可能成功，所有的评论员都表示怀疑：他们不仅排除了形势逆转的可能性，而且暗示克格勃或者军队不能按自己希望的去控制局面的想法是愚蠢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军队，都不是坚如磐石，两者在不得不应付民众反抗时，都可能变得不可靠。

很少有观察家意识到苏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在许多时候，他们观察他们、写他们，实际上，他们往往犯政变者所犯的错误。

第二十一章 [605]

帝国的解体

我们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旧的权力结构。我想到了国家的官僚主义……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决定性的民主变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1 年 8 月 26 日
于苏联最高苏维埃①

今天，我比几个星期前，即失败了的叛乱之前，更信任戈尔巴乔夫。

鲍里斯·叶利钦 1991 年 9 月 4 日②

很难说会有多少共和国加入联盟，但我确信联盟将继续存在。

鲍里斯·叶利钦 1991 年 11 月 14 日③

是的，他们现在说：我们要创立一个邦联。

停顿了一下他们又补充说：但是我们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可能吗？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991年11月26日[④]

到1991年8月25日傍晚——在根纳季·亚纳耶夫同意行使总统权力之后仅仅一周——他和他的所有共谋者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丧了命，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大多数共和国开始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后尘，纷纷脱离联盟。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更糟的是，苏联中央政府处于全面的混乱之中。内阁被解散，克格勃受到了冲击，担忧着自己的命运，并被一位改革分子所领导，军事指挥受到了全面的震动。

叶利钦利用政变的机会，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以前曾属于中央或联盟权限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期间，他只能批准叶利钦所做的一切，因为这对于拯救他自己是必要的。但其结果是，政治主动现已完全由叶利钦所掌握。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由于对是否反对共产党并否认他同“社会主义”的联系犹豫不决，叶利钦的政治主动地位更趋加强。

〔606〕如果没有叶利钦的帮助，戈尔巴乔夫就不能够挽救他的总统地位，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叶利钦的积极合作，戈尔巴乔夫此时也就不再能够维护任何类型的联盟。幸而这时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放心的是，叶利钦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声明，即他相信联盟条约将会签署并得到履行。

但是，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莫斯科。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将缩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选择范围。

独　立　热

政变策划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实行军事戒严令，中止其立法机构，结束那里煽动独立的活动。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后，第一批举动随之而来，当时，波罗的海军区司令费奥多尔·库兹明将军宣称，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应服从他和持强硬路线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并宣布成立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军队和警察部队占有很多通讯设施，并占据着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其他许多战略要地，但暴力行动很少，在他们采取反对共和国政府及其立法机构的行动之前，政变就失败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议会和政府没有被 8 月 19 日和 20 日的力量显示所吓倒。它们立即谴责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中两个尚未明确宣布独立的国家迅速地宣告独立，爱沙尼亚于 8 月 20 日宣布独立，拉脱维亚于 8 月 21 日宣布独立。[5]当然，立陶宛早在一年前就宣告了独立，而恰好在政变发生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立陶宛订立条约，承认了它的独立。[6]当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告独立后，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

戈尔巴乔夫对是否批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仍感到犹豫不决，他坚持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但他批准采取步骤，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再受到苏联军队军事干预的威胁。库兹明将军被撤换，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务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公民被遣散，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克格勃的财产由选举出来的政府接管。8 月 24 日，拉脱维亚当局以参与政变罪逮捕了卢比克斯。

〔607〕 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内阁一致通过，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尽管有许多事务留待谈判解决，包括从该地区撤出苏联军队的时间表等，但三国的分离是正式的和最终的。很多国家已经对三国的独立予以承认，在苏联承认之后，它们的独立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承认。[7]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联合国的下一届大会上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退出苏联一事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苏联第一次允许共和国行使斯大林宪法伪善地给予它们的脱离权。假如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就宣布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而它们能够以一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方式脱离苏联，那么这种先例很可能会减弱其榜样作用。在那个时候，他也很可能有权谈判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保持军事基地，并保护在该地区的其他苏联利益。由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戈尔巴乔夫被迫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一种从总体上最有损于苏联的情况下脱离：除了鼓励了其他国家之外，它还表明，中央不再有权力违背一个共和国的意志而留住它。

在一段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世界上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虽然有许多共和国宣告独立，但是否所有这些宣告都代表一种取得完全独立的认真意愿，目前还不清楚。其原因，不同的共和国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宣告独立是在公众的压力下作出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宣告代表了当地共产党统治者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他们想使自己同莫斯科可能决定进行的改革隔离开来。

无论原因是什么，政变刚刚失败，各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便几乎每天出现。8月24日，乌克兰宣告独立，并有待于12月1日的

公民投票。8 月 25 日，白俄罗斯宣告了“白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独立”。8 月 27 日，摩尔多瓦议会批准了它的独立宣言。8 月 30 日，阿塞拜疆宣告独立。8 月 31 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告独立。格鲁吉亚早在 4 月份第比利斯大屠杀两周年纪念〔608〕日的时候就宣布了独立，9 月 6 日它宣告，鉴于苏联没有将其独立宣告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它断绝同苏联的一切联系。塔吉克斯坦因纠缠于内部权力转移问题，直等到 9 月 9 日才宣告独立。亚美尼亚推迟了独立宣告，9 月 21 日，它进行了久已计划的公民投票。近 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8] 亚美尼亚议会遂正式宣布独立。

这样，到1991年9月底，在苏联的所有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他共和国都宣告了独立。土库曼斯坦于 10 月也宣告独立。尽管如此，多数共和国仍继续参加现存的苏联各个机构的活动，并同戈尔巴乔夫就新的联盟条约进行谈判。

骚动中的共和国

流产的政变加强了那些同莫斯科的中央当局有关的所有共和国领导人的地位，同时，它所激起的冲击波改变了许多共和国的内部政治。有些共和国领导人——通常是那些反对政变的领导人——得分；其他领导人则失分。

白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杰缅捷伊[9]没有谴责 8 月 19 日和 20 日的未遂政变，8月21日，恰好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前，白俄罗斯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它。由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领导的议会温和派加入了国民阵线反对派，他们要求召开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8 月 24 日星期六，该会议召开。

杰缅捷伊出席会议，并因他在 8 月 19—22 日的行为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为自己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说他的行动被曲解了，但在当天晚间，压倒多数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然而，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足法定人数，因而该投票没有法律效力。第二天，会议重新召开。

恰在此时，政治气氛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星期六的会议休会后，代表们得知，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总书记职务，并且中止〔609〕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政变期间，党组织的活动将受到调查。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突然意识到，宣布独立是阻止莫斯科对其活动进行含有敌意调查的唯一途径。星期天重新开会，他们行使了其正常的反对权，投票选举了国民阵线，赞成独立。杰缅捷伊被迫辞职，让位于他的第一副主席舒什克维奇。[10]

其后，在9月18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们将国家更名，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舒什克维奇是一位物理学家，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多年从事专业工作，1989 年他 55 岁左右时才进入政界，当时他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1992 年，他在一次谈话时告诉我，他对共产党随意处理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粗暴方式感到愤怒，这迫使他在竞选一旦成为可能时，立即进入政界。[11]

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的那些共产党代表很可能认为，他有着温和改革者的名声，能够对继续已往的生活方式提供某种保障。如果这样，他们就看错了。虽然他举止文雅，说话温和，但他努力推进着——尽管是无效的——市场方向的改革，并在摧毁

苏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领导人曾反对政变,[13]这两个国家的权力转移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摩尔多瓦领导人米尔恰·斯涅古尔后来都掌了权，因为那些曾反对主权运动和独立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垮台了。

克拉夫丘克之所以安然无恙，得益于事态的转变，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能够对事变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做出预测。1990年春天时，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居于第二位，但在6月份他被选为议会主席后，在有关乌克兰主权问题的谈判中采取了更激进的路线，从而开始同共产党保持距离。1991年2月，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古连科的辩论，引起了公众对其独立态度的注意。甚至在政变发生前，他已开始领导民族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大派系同鲁克和其他民族主〔610〕义领导人建立同盟。流产的政变终止了这种关系，在共产党解散时，民族共产主义者能够幸存下来，因为他们支持脱离莫斯科。

在摩尔多瓦，早在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共产党之前，当地的共产党就被禁止了，那里出现了类似的趋势，那些支持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幸存下来（尽管他们要为他们的党起另外的名字），而那些受到怀疑的和支持苏共政策的人则被清除出政治舞台——至少是被清除出基什尼奥夫，它现在的正式的罗马尼亚名称是基希纳乌。

然而，在摩尔多瓦有一点与乌克兰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其领土上，即在德涅斯特以东地区发生了起义，那里的城市居民中多数是斯拉夫人，并有很多退役军人居住在那里。在地方军事当局的默许下，该地区的一伙共产主义者宣布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

“德涅斯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此相似，在德涅斯特以西地区居住的讲土耳其语的民族加告兹人也试图建立一个自治地区，但他们只是一个较小的威胁。

8月事件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响。高加索地区有太多的自身麻烦，不允许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转移其注意力。

当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周末试图在莫斯科接管权力时，格鲁吉亚正处于民主政治危机之中。5月份，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获胜，此后他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专横作风，使得其同盟中的主要成员同他疏远。1991年8月17日，他因强迫温和派离开其政府而引发了一场危机，他粗暴地将总理田吉兹·西谷阿及副总理、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解职。[13]8月19日，他继续其清洗，将格鲁吉亚国家卫队司令田吉兹·基脱瓦尼解职。然而，国家卫队成员的反应是转而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至于莫斯科，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还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都失去了对格鲁吉亚局势发展的影响力。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依然支配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活。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可能希望在这一斗争〔611〕中得到莫斯科的更多支持，因而最初赞成政变企图，但当政变流产后，他支持宣布独立，以免自己遭到莫斯科的惩罚。他的突然转变，以及他未能按照阿塞拜疆的条件解决有关卡拉巴赫的争端，削弱了他的地位，并使他易于遭到阿塞拜疆国民阵线的攻击，1月份，苏联军队镇压了阿塞拜疆国民阵线，但它的力量现在重新集结起来。此外，穆塔利博夫还要同海达尔·阿利耶夫进行竞争，阿利耶夫曾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被排挤

出去，后以他的家乡纳希切万为基地重新确立了其地位，纳希切万是位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与此相反，亚美尼亚保持着国内的政治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1990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正领导着国家有秩序地脱离苏联，他在政变刚刚发生就表示坚决反对政变。然而，该国在运输问题上经受着长期的联合抵制，承受着从1989年地震灾害后重建家园和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未宣布的战争的双重负担，经济上一片混乱。它的未来将继续陷于有关卡拉巴赫的冲突中。

中亚各共和国对莫斯科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差异最大。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都在政变刚发生时就对它加以谴责，随后，阿卡耶夫支持宣布独立。与此相反，纳扎尔巴耶夫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忠诚，并且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

南方的三个共和国仍处于旧的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它们对政变曾持欢迎或者默认的态度。政变流产后，它们宣告独立，以免被莫斯科吹来的自由主义浪潮所波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姆·卡里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还由此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开始对抗在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反对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一直有压力，民主反对派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土库曼斯坦，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微不足道，对莫斯科试图建立的更自由的标准，它从未保持一致。

从常规经济指标来看，塔吉克斯坦是各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612〕它也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该国有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主反对派，他们强迫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卡哈尔·马

赫卡莫夫辞职，因为他曾支持政变。然而，他们对共产党政治机器的胜利为时很短。马赫卡莫夫的继任人卡德林金·阿斯洛诺夫上台后立即取缔了共产党，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由共产党所控制的立法机构否决了禁党令，并帮助马赫卡莫夫的前任拉赫曼·纳比耶夫重新掌权，纳比耶夫是在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撤职的。在随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纳比耶夫取得了胜利，但是外国观察家发现了广泛作弊的证据。

结果，“民主派”开始同两个穆斯林派反对党联合起来，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由于穆斯林集团得到了阿富汗穆贾迪迪派的支持，局势更加险恶，穆贾迪迪在战胜了苏联所支持的喀布尔政权后，有多余的武器可提供给边界那边的朋友。

苏联的转变

莫斯科不愿卷入这些地方斗争，尽管叶利钦曾同纳扎尔巴耶夫一起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作短期停留，试图调解那里的冲突。首都的注意力集中在试图支撑风雨飘摇的苏联政府，稳固地扩展俄罗斯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以及为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而进行的狂热谈判等等问题上。

9月第一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因流产政变而引起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议案，满足了参加新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的10个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人们认为，这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终结。

虽然某些人认为在几周内将签订联盟条约，因为反对建立松

散联盟的派别已经崩溃，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建立了一个新的苏联政府组织，它将维持到新的联盟条约或新的宪法生效。其主要机构为：国务会议，它由那些希望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总统组成，苏联总统任主席；经过重组的最高苏维埃，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政策的跨国经济委员会。然而，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实际上，各共和国已经宣布控制位于其领土内的国家财产。〔613〕

辩论极为激烈，因为多数代表并不愿意投票通过设立现存机构之外的新机构。他们最终被收买了，保证让他们享有现在的工资和特权直到 1994 年底其最初的任期届满为止。

尽管许多人认为，匆忙设计的新的国家结构只能维持很短的过渡时期，但如果在更顺利的环境下，它所包含的某些妥协折衷，本来能够使它解决在 8 月份之前拖延了联盟条约谈判的某些争论。例如，作为立法机构的上议院，拥有对下议院所通过法律的否决权，其组成成员为：每个参加联盟的共和国各出 20 名代表，再加上每个前自治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由于多数前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一规定给予俄罗斯比其他共和国更多的席位。然而，每个共和国在上议院只有一票表决权，因此，额外的代表只不过给俄罗斯提供了更大的声音，而不是更多的票数。

另一项革新是，即使那些不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也可以参加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如果签订了联盟条约，该机构能够为各独立共和国提供协调经济政策的途径。一年以前，它还会被看作对各种独立运动的一项根本让步。当时，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争辩说，独立同经济合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1991 年秋天的政治气氛改变了，以至拟议中的机构改革方案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戈尔巴乔夫还以一个新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

员会。这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他的主要顾问班子所采用的第三种形态。总统委员会存在了近一年后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组建，其领导人又试图夺取戈尔巴乔夫的权力。〔614〕这一次，戈尔巴乔夫不再虚假地容忍党内的保守派和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任命了一些他最信任的顾问进入国家委员会，例如瓦季姆·巴卡金、经济学家尼·彼得拉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还包括一些激进改革派，例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长期支持叶利钦的尤里·雷若夫、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莫斯科新闻》的编辑、刚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负责人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还提名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入该委员会，但他拒绝接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能够听从与此类似的委员会的劝告，他或许可以避免他所犯的某些最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些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摆设，而不是实在的机构。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咨询，而只是与个别的顾问打交道，并凭一时的兴致，接受或者拒绝其意见。在这方面，政治协商委员会并不比其前任的境况更好，从它成立时起，苏联政府中已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对事变进程施加影响了。

多数人不大注意新的政府机构，而是注意两个老的机构，克格勃和武装力量。这两个机构的首脑都曾参与未遂政变一事，使他们很容易遭到清洗，虽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武装力量）并未一致支持政变的策划者。

最初，克格勃比陆海军的组织变化更剧烈。未遂政变刚刚结束，保卫部门、总统通讯部门和阿尔法小组就脱离了克格勃的管辖，转归总统直接控制。接着，在10月11日，国务委员会决定

解散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并建立三个独立的机构：边界保卫机构、外国情报机构和跨共和国内部安全机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外国情报部门的首脑，瓦季姆·巴卡金则负责在克格勃剩余人员的基础上重组新的国家安全部门。继起的跨共和国安全机构的俄文缩写是MSB，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周才正式组建，后同俄罗斯安全部门合并。

尽管克格勃的某些高级官员因直接参与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而被逮捕，但其大多数雇员仍留在剩下的机构中。巴卡金坚持认为，他所领导的部门的活动是在执法机构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反对进行普遍清洗，反对开放克格勃的档案以确定谁曾经是告密者。他认为，后者将导致对无辜者的不公正的和常常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615〕

巴卡金同各共和国进行了充分的合作，以切断中央对其领土上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控制，他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将位于各共和国领土上的克格勃财产转交给它们。他还与俄罗斯当局合作，建立了俄联邦的联邦安全局。[14]

武装力量不像克格勃那样遭到解散，但对其高层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到10月份，国防部各口[15]半数以上成员被更换。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曾拒绝同政变领导人合作，现在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曾拒绝进攻莫斯科叶利钦所在的白宫，现在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尽管沙波什尼科夫、格拉乔夫及其他高级军官表现出忠于宪法秩序，但是没有人怀疑，自1990年以来所采取的削减军队举动将加快进行。前军队领导人曾对削减军队的做法加以抵制，为了阻止或至少是延缓这种削减，他们对大规模的军官复员一事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准备。新的国防部领导将被要求处理其前任因怠

工所造成的问题。

10月初，格拉乔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他个人认为至少应削减120万部队人员。当时，苏联军队达350万人，因而这一削减约占总数的35%，然而没有制定出任何安置军官的计划，他们在刚退役时不得不转入民用经济。即使军队不从东方及中欧撤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军队的撤回则使情况更趋恶化。从德国撤军还将持续三年时间。

即使如此，人员削减也并不是苏联军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616〕题。由于政治变化无常，年轻人开始抵制征兵。目前还不清楚，苏联军队是否会保持在格拉乔夫所建议的减少了的部队水平上。此外，越来越多的共和国计划建立它们自己的军队，有些共和国坚持，在苏联军队中服役的该共和国公民应该回去，在其本国的独立军队中服役。鉴于苏联军队不是按单一民族特性而组织——军官和应征士兵常常被派往远离家乡的单位，并有意将所有人员混合起来，以防出现具有民族特性的军事单位——这种做法将影响各地苏联军队的效能和准备就绪的待命状态。

乌克兰的抱负对于苏联军队来说似乎特别不利。10月23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以驻扎在该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为基础，建立45万人的乌克兰军队和3万人的国家卫队。

乌克兰的观点是，除非签署联盟条约，否则苏联军队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中没有存在的必要。统一的苏联军队应划分为更小的军事组织，它们可以彼此合作，或者与此相反。即使最大的一部分军队无疑将留在俄罗斯，其现有的原则和基础理论也必将改变。

俄罗斯登上舞台中心

9月9日，鲍里斯·叶利钦正式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手中取得对武装力量、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控制权——政变期间他曾就此颁布法令，并在其后不久突然休了三周假。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正在为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俄罗斯究竟是应该支持建立一个由共和国自愿参加的有意义的联盟呢，还是宣布独立，并在双边基础上处理同其他共和国的关系，或是通过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一类的有限多边组织来处理这种关系。

当叶利钦组织其权力机构时，他从三个主要方面获得人员：(1) 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机构中的前同事，例如该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尤里·波波夫，他成为叶利钦班子的头；(2) 国家经济管理官僚，其中多数人来自军界—工业界联合体；(3) 民主运动的政治家，其中多数为三四十岁的人，由于其年龄和比较激进的态度，他们常常被外界称为“激进派”。[16] 〔617〕

最初，叶利钦让前两个方面的人控制俄罗斯政府，而让“激进派”进了顾问班子国务委员会，他们在那里不能够直接管理俄罗斯政府。那些掌管俄罗斯政府的人，包括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赞成保留联盟，而“激进派”认为，俄罗斯最好获得完全的独立。他们感到，同其他仍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共和国建立联盟，可能妨碍俄罗斯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而且将把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耗光。一个独立的俄罗斯还将为他们提供更重要的工作。例如，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将不再居于苏联外

交部长之下。

对这一团体的许多人来说，实际考虑因如下观点而产生或得到加强，他们确信，俄罗斯在建立帝国时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错误，现在必须像其他20世纪的宗主国那样摆脱其属地。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那些反对“激进派”俄罗斯独立主张的人并不都是老人、共产党人或具有帝国思想的人。很多民主改革派，包括阿那托利·索布恰克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都力求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他们争辩说，如果俄罗斯离开联盟，特别是让出它的现有边界，它就将丧失部分领土。

哲学家亚历山大·茨普科，作为公开性的早期试验，曾在苏联新闻媒介上第一个著文直接抨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此时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反对俄罗斯任何破坏联盟的企图。他在1991年10月的《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 一个联盟，如果没有其财产，得不到对其总统和作为联盟各种制度象征的宪法的尊重，没有共同的联盟军队，它对任何人都是毫无用处的。只要俄罗斯作为统一的要素而存在，联盟就能够存在。但是，俄罗斯使自己离开了核心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成为分裂的因素……
>
> 苏联在其现有内部边界内的解体，不仅将导致苏联帝国的死亡，而且将导致国家历史核心的瓦解。几世纪来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地区现在将位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之外。[17]

〔618〕

茨普科把离心倾向归因于共和国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野心。他们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权力的愿望肯定很强烈，但这并不是起作用

的唯一因素。随着联盟结构的力量日趋衰微，人们开始看到，继续进行改革的唯一途径是不理睬联盟，并在共和国或地方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要求俄罗斯进行政府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叶利钦离开莫斯科期间，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辞职，他因俄罗斯政府未能有效地进行改革而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在未遂政变失败后，西拉耶夫又担任了苏联临时经济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在辞去俄罗斯的职务时，西拉耶夫实际上已将其命运与联盟绑在一起。无论如何，他辞去俄罗斯总理职务一事，造成了俄罗斯政府高层的真空，“激进派”很快便利用了这一状况。

10月中旬，当叶利钦从其度假地返回莫斯科时，政治不满情绪正在上升。8月底的欣快气氛烟消云散，国家又陷入政治阴谋的纠纷之中。新闻媒介中充满了这样的评论，认为由制止政变所创造的机会已经因争吵和优柔寡断而丧失。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后，在很多地方，共产党的官员公开接管了地方和州的政府，使很多共和国蒙上了反改革的色彩。

灰色、阴冷的10月天气宣告冬天即将来临，但是经济衰败如此严重，饥荒和寒冷已经伸手可及。最终，激进改革派的声音开始引起叶利钦的注意。

10月下旬，叶利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使俄罗斯能够据以从联盟政府和其他共和国独立出来。10月28日，他向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并要〔619〕求给予他一年的权力，以便依法实行经济改革及任命各州的领导。很多代表反对这一要求及改革计划，但是代表大会最终批准了它。它还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宪法法院，并选举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8月份之前，哈斯布拉

托夫在几次选举中失利，没有得到多数票，但在政变后的气氛中，叶利钦的强有力支持使他当选。

11月4日，苏联国务委员会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同意将国防部、外交部、铁道部、电力部及核工业部以外的苏联各部废除。

11月6日，叶利钦颁布法令，任命他自己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他还任命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布利斯以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马列主义教员，曾主持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议会主席的竞选班子，被人们认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其他副主席有叶戈尔·盖达尔——他是一家经济研究所的领导，深受芝加哥学派货币金融经济理论的影响，以及曾任劳动部长的亚历山大·索辛。

每个副主席将监督若干特定部门，布尔布利斯负责监督外交、司法和新闻媒介部门，盖达尔负责监督经济部门，索辛负责监督社会福利部门。叶利钦本人则负责监督国防、安全和执法部门。

这些任命使激进改革者掌管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机构。他们不再仅仅是顾问，作为顾问，他们的意见很可能被忽视。但是，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即国家的关键性金融工具仍被联盟政府所控制。叶利钦迅速采取措施对此加以纠正，11月15日，他颁布了10项法令，宣称实际控制所有的苏联金融机构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产的石油、黄金和钻石的出口许可证。

一周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开会，接管了苏联国家银行。由俄罗斯议会控制银行，而不是让银行从属于行政部门（像苏联时期那样）或独立（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或德国联邦银行那样），在日后将激起巨大的反响。

〔620〕为了抑制对其计划进行的改革的有组织的抵抗，叶利钦还颁布法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较

早发布的中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非通过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律禁令[13])。叶利钦在11月6日这天宣布对共产党的禁令很可能并不是巧合，根据惯例，这一天应由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表讲话，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恰好在四年之前的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纪念革命节的讲话，中央委员会曾讨论其内容，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并要求把他从政治局除名。1987年11月6日，叶利钦曾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坐在议会大厅内的椅子上，情绪激动，他完全知道大厅中充斥着他将被撵走的窃窃私语。现在，他进行了全面的复仇。共产党力图扼止他的政治生命，现在，他以自己的笔使共产党遭到了同样命运的打击。[14]

到11月底，联盟的政府机构已经所剩无几：一片混乱的陆海军，正在经受着肢解阵痛的安全部队，没有明确权限的法院和检察官，总统的办公室，以及刚刚更名为对外事务部的外交部。

与西方的共同事业

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受到了攻击，并因给予西方，特别是美国过多的优惠而遭到更多的攻击。某些反对者甚至指责他与美国共同策划肢解苏联。

对任何尊重事实的人来说，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显然是辉煌的成功。从改革一开始，其目标就是减少苏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以便把它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内部的改革上。戈尔巴乔夫达到了这个目标，他的方法是制定一种政策，使之符合苏联和其以前西方对手的共同利益。

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

程的失败。当苏联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其外部环境是宽松的。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人们都愿意帮助苏联渡过它所选择的困难的过渡期，而不是利用其困难并使它更糟。

〔621〕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对于苏联的好处，在1991年秋季国家处于分裂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以它所理解的方式表示了善意，而不是敌意，这就为苏联人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能够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不能弥补苏联政治过程的缺陷，但是这一因素并未改变下述事实，即当苏联处于衰落的时期，当时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国际环境使它受益匪浅。

在未遂政变之后的几个月内，苏联外交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被指控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时表现得“过于消极”，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不久就辞职了，并由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潘金接替该职，这是对潘金的奖赏，因为他是在政变破产前公开谴责它的少数几个苏联大使之一。很多被认为曾不恰当地同情并执行政变政府命令的大使被召回，外交部裁减了大批人员。

尽管苏联外交部在这段时间内很忙——它是9月份一个重要的人权会议的东道主，要接待很多外宾，[20]还要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即10月30日在马德里召开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同乔治·布什担任联合主席——但是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正在转移到各共和国。若干共和国的领导人到国外旅行，并且都受到当地政府首脑的接待：10月份，叶利钦访问德国，纳扎尔巴耶夫访问英国。11月，阿卡耶夫和捷尔-彼得罗相访问美国。12月，叶利钦再次

去国外旅行，这次是去意大利。与此同时，当外国政治家前往苏联时，他们通常要同叶利钦会面，并经常在某些共和国的首都略作停留：当美国国务卿贝克9月份访问苏联时，他去了阿拉木图和莫斯科（以及当时已独立的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10月份，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奇·金克尔访问了基辅。这里仅仅是举一部分例子。

尽管苏联的各共和国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注意，但是外国的外交部长们仍然更重视莫斯科。在七国集团的催促下，国际机构加快了提供援助的速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都宣布了重要的方案。然而，苏联公众并不理解，这些方案只是为了促进成功的改革措施，在任何情况下其作用都不会持续多年。 [622]

由于主张军事强硬路线的人现已不再受宠，戈尔巴乔夫迅速解决了美苏关系中的少数遗留问题：当贝克9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他最终与苏联达成协议，终止向阿富汗各派提供武器。戈尔巴乔夫还同意从古巴撤回剩下的苏联军队。几星期后，作为打算建立信任关系的姿态，瓦季姆·巴卡金向我的后任罗伯特·斯特劳斯提供了图表，标明克格勃在新建的美国大使馆设置窃听器的地点。当然，我们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些窃听器，但是巴卡金的姿态仍然是值得欢迎的，它表明，我们现在已能更坦率地进行相互交往。[21]

11月中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终于被说服，回到已变更名称的苏联对外关系部就任部长，此时已是该部的最后几周了。当时，叶利钦正强迫该部削减80%的工作人员，但削减还未进行，苏联对外关系部已经同安德烈·科济列夫领导的俄罗斯外交部合并，不久前，科济列夫还是谢瓦尔德纳泽手下的一个低级官员。

一个独立国家的联盟?

直到1月中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退出后仍留在苏联的12个共和国似乎还有可能组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也许仅仅是一个过渡类型的国家。9月初，10个共和国[④]的领导人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原定于8月20日签署条约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打算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决定建立邦联制国家。政变前，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邦联是行不通的；现在，他的地位十分虚弱，〔625〕以至于认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就是他所希望的最好选择。叶利钦也指出，他现在反对关于新联盟构成的想法。他认为，对于新的联合体来说，联盟条约将建立在完全合法的基础上。

然而，并没有立即就此进行谈判。假如经济混乱状况加剧，那么国务委员会首先关注的是达成协议，以调节跨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它表明，从一开始，各共和国就决心从中央手里夺走大部分权力。

9月份，在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主持下准备了最初的协议草案，并把它提交给若干共同机构，其内容包括：建立中央银行和外贸银行，许诺促进私有财产，保持共同货币，开放边界，分担苏联的债务，协调财政政策，等等。然而，当来自各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审核该草案时，他们删除或削弱了很多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款。

例如，当乌克兰对协调联合伙伴的预算和税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时，俄罗斯代表也否决了将卢布区扩展到拟议中的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正式成员的议案。各共和国还否决了建立一种具体机制

以确保向苏联支付欠款的规定（即通过从出口所得的硬通货收入中征税来支付），而代之以各共和国分担应支付苏联债务的一般性义务，并将这笔钱应如何征收留给各共和国去决定。很多共和国对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在经过一轮谈判之后这一议案被撤消，但它以后又被重新采纳。[23]

亚夫林斯基对于各共和国正在施行的外科手术感到十分悲伤，他公开表示，他不知道他“将要医治的病人”（即苏联）是否仍然活着。

尽管有这样的阻碍，8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在 10 月 19 日签署了一个建立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条约。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时拒绝签署该条约，但在几周后也签署了。然而，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一直没有签署。

尽管签署条约时大肆夸耀，欢呼它是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实际上该经济条约只不过是继续进行谈判的一个保证。尽管它声称建立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但在真正的经济共同体产生之前，还需达成 24 个附加协议。某些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经济共同体各机构的地位和权力，联盟银行的章程，所有权，人员跨边界的流动以及外债机构。所有这些很可能都是有争议的。[24] 〔624〕

有关经济条约的经验表明，政治联盟——它是一个比经济合作更敏感的问题——如果最终能够建立，也只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10 月末，叶利钦在未征求戈尔巴乔夫意见的情况下宣布其改革计划，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叶利钦试图摧毁苏联，但是叶利钦仍说他赞成保留联盟。实际上，在 11 月 4 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讲话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宣称，俄罗斯无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叶利钦说这番话之前，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在报告中预言，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苏联将变成“一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公国的混合体”。[25]

叶利钦第一个对沙波什尼科夫所做的预言加以评论。他说，不管其他共和国可能干什么，俄罗斯决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军队。他以强调问题时总是那样洪亮的声音宣布：“我们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这就是俄罗斯对那些担心它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人的回答。”接着，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常用的语言，补充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既然我们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主权国家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武装力量。”[26]

在讲话中，叶利钦不仅赞成戈尔巴乔夫对武装力量所持的立场，而且当他谈到创建一个“新国家”时，还使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一措辞表示，联盟将是一个拥有真实权力的国际法主体，而不仅仅是个讨论和协调的联合体。

叶利钦反复无常，人们不能肯定他对自己的观点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而实际上，当国务委员会 11 月 14 日在新奥加廖沃的别墅——4 月份曾在那里达成了 9 加 1 协议——再次聚会时，叶利钦公开提出了新的联盟是否应作为一个“国家”的疑问。

〔625〕 叶利钦在发言中反对创建一个“统一国家”，他的讲话得到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支持，但是使其他与会者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叶利钦更愿意把这一国家简单地称做邦联。戈尔巴乔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对此提出反对，认为尽管他们在建立邦联制国家上已取得一致，但它的结构不应是松散而杂乱无章的；戈尔巴乔夫试图恢复“联盟”一词，但叶利钦和其他人都拒绝接受它。

对于那些从事过有关学习的人来说，这些定义是模糊的，因而这种争论似乎毫无意义。但它并非如此；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要创立的联盟是否是一个拥有总统（或者是由总书记而不是总统管理官僚机构）和立法机关的国家，是否能够派出和接待大使，是否属于若干或者某个国际组织，是否是其成员的唯一依靠。戈尔巴乔夫可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正在崩溃，他顽强地争辩说，任何有用的联盟都必须具有国家资格的属性。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拒绝屈服，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命运攸关的挑战：

> 如果不准备建立任何有效的国家结构，我们何必还要总统和议会呢？如果你们作出那样的决定，我准备辞职。[27]

根据格拉乔夫的记录，叶利钦对这一声明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于是戈尔巴乔夫站起来，坚持他不对一个不定形的国家负责，然后突然转过身来，直接朝着叶利钦，间接提到了布尔布利斯和"激进派"，愤怒地发出了挑战：

>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一想那些希望俄罗斯甩掉每一个人而独自前进的人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28]

叶利钦十分惊讶地转过身，咕哝着："我并不支持过激分子。我的主张是建立一'邦联制国家'，它已诚实地记载下来。"[29]

经过进一步讨论，该委员会达成共识，决定将新的联盟称做邦联制国家，但它没有任何宪法，而是以他们将要签署的条约及9月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权利宣言为唯一基础。

会议结束前，舒什克维奇建议再次开会草签条约，以承诺在 [626]

各共和国立法机构审核该条约时对它持支持态度。人们普遍赞成在年底前签署该条约，但纳扎尔巴耶夫以半开玩笑的态度提到了8 月 20 日：“这一次，我们不要预先规定时间了。”

与会者鱼贯而出，汇集在明亮的电视灯光和不耐烦的新闻记者面前，这些记者在另一个房间中已经等了几个小时。

戈尔巴乔夫请叶利钦第一个讲话，叶利钦宣告：“很难说将会有多少共和国参加联盟，但在今天的讨论后，我确信一定会产生一个联盟。”[30]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哈萨克斯坦一贯赞成建立联盟，但决不是旧的那种，而是“今天确实存在的联盟，是独立与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联盟”。他又说，只有未来才能告诉人们，这个联盟究竟是“邦联制的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

舒什克维奇也认为很可能会建立一个联盟，来自中亚的三位总统同意他的判断。

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叶利钦就当天的协议做了更明确的回答，他说他们赞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邦联制国家，并根据签署该条约国家的授权发挥作用”。[31]

各共和国总统证实，在该文件签字之前，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同各自的立法机构进行讨论，并可能做某些小的修改。

然而，该文件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它在某一段指出：“主权国家联盟根据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行事，该联盟是国际法主体，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者。”但在后面的条款中它又宣称：“构成联盟的这些国家是国际法的充分资格主体。”换句话说，它们将拥有外交部，可以任命外交官，是国际组织的独立成员——这表明它们可以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即使它同联盟的外交

政策相冲突。很难知道在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条款。

同武装力量有关的条款看来也叙述得很模糊，很可能引起争议。各共和国有权建立军队，但其规模和作用留待以后的“跨共和国协议”来决定。主权国家联盟将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及对战略力量，包括核导弹力量的集中指挥”。假如多数共和国都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国防部和军队，那么显然，除了对核力量负有重大责任之外，在其他方面不会达成任何具体协议。毫无疑问，对各共和国的军队规模和归属问题将会发生进一步的争论。〔627〕

戈尔巴乔夫设法保留了总统一职及由总理领导的大大压缩了的政府。联盟也将设有最高法院、仲裁法院、国家检察官，但是大部分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了各共和国，所以，上述机构所拥有的权力，比起原苏联各相应机构的权力大为缩小。少数未引起争议的权力留给了中央当局。[33]尽管留待戈尔巴乔夫去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但他仍尽可能从各共和国的领导人那里去打听消息。

戈尔巴乔夫计划，当国务委员会 11 月 25 日在新奥加廖沃再次聚会草签条约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他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安排了很多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在身边，以便记载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

然而，这一会议并未像他所期望得那样进行。

戈尔巴乔夫刚刚召开会议，叶利钦就宣布，他不能在那天草签该文件，因为他在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磋商后，感到不能根据该文件的现有形式批准它。他又说，俄罗斯的议员们不喜欢统一国家的想法，他们甚至也不接受一个邦联制的国家。因此，他建议使用“民主国家邦联”的措辞。

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指责叶利钦从其早期立场上后退，但是

舒什克维奇支持叶利钦。尽管正是他提议在这次会议上草签条约的，但他现在争辩说，既然他的议会中的有关委员会尚未完成对条约文本的审议工作，因而草签工作不妨推迟进行。使所有人都感到很惊讶的是，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也表示同意推迟草签。

〔628〕 争论趋于白热化，在争论中，叶利钦又说，在乌克兰的选举之前草签条约是不明智的，因为那可能使乌克兰人对联盟更持否定态度。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与此正相反，重要的是向乌克兰表明无论怎样都要建立联盟。他争辩说，如果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计划，那么乌克兰除了参加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舒什克维奇试图使戈尔巴乔夫确信，他们很可能准备在10天之内草签该条约，他不必对此感到焦虑，但戈尔巴乔夫知道，推迟很可能是致命的。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看来是别有用心。

最后，戈尔巴乔夫恼怒地告诉那伙人，他们不再需要一位总统了，他站起来，像以前对待不顺从的共产党下属那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格拉乔夫引述了他的话："我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当你们建立一个贫民窟、而不是统一的国家时，你们将使人民遭受苦难。事实上，我们正在谎言中窒息！……如果你们拒绝邦联国家的想法，那么你们干吧，我走！"[84]

他说完便昂首阔步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他的所有随行人员。

与会者对戈尔巴乔夫的退场有不同的解释。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诸如巴卡金、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拉乔夫等人认为，尽管他很生气，但他宣布了休会，因为他想给那些共和国总统们一个机会，趁他不在场时整理一下他们的想法。格拉乔夫解释说，当戈尔巴乔夫在那次会议那一时刻说"你们现在不需要总统"时，他心里就是那么想的。当请他去总结讨论时，他是希望回去的。戈

尔巴乔夫的盟友还认为，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一定事先策划好了他们的行动；依靠提出编造的问题，他们设法使谈判中断，以便为其后来的行动找到正当的理由。[35]

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的说法则不同。他们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暴怒使他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尽管谈判延长了时间，但它毕竟正在取得进展。舒什克维奇一年后告诉我，他和叶利钦感到，他们正在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他们在同各自国家的议会磋商的基础上总是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戈尔巴乔夫只能听得进〔629〕他愿意听的话，并总是藏着一份有条件的协议，好像那就是最后协议。他说，他和叶利钦都表示要拟订出一份乌克兰能够接受的协议，但戈尔巴乔夫总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他们的关心，并提出乌克兰所不能接受的协议。结果，当11月25日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退出会议时，他们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该有个了结了。戈尔巴乔夫离开房间后，他们决定不久在白俄罗斯召开会议，并邀请克拉夫丘克参加。[36]

当戈尔巴乔夫在楼上的书房里等待时，各共和国的总统们讨论了该做些什么。新闻媒介的代表们正在等候着，他们仍希望能够亲眼目睹草签条约的情况。各共和国的总统们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该条约应提交各共和国立法机构批准，并在年底前签字并通过。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被委派将这个坏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

当他们走进楼上戈尔巴乔夫的书房时，叶利钦开玩笑地说，他们是被派来向“沙皇磕头”的，戈尔巴乔夫则把称他做“沙皇鲍里斯”进行回击。两人的话都很尖刻，叶利钦想让人们注意戈尔巴乔夫的帝王作派，而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沙皇鲍里斯”则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俄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沙皇鲍里斯，但许多人认为他篡夺了皇位，他的下场很悲惨。[37]

不过，戈尔巴乔夫似乎很欢迎叶利钦帮助他打破僵局，他们一起下楼，重新开会，迅速同意了各共和国总统拟定的公报。但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拒绝一起会见新闻记者，就像他们在以前的会议上所做的那样。这一次，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单独面对照相机和速记员的笔记簿。

戈尔巴乔夫并未试图掩盖他的不满，他说，各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了从联盟条约后退的步骤。

这是一个巨大的后退步骤。自此，国务委员会再未开过会。

第二十二章

〔630〕

致命的打击

俄罗斯决不会带头使苏联解体。

鲍里斯·叶利钦　1991年10月18日[1]

苏联的三个创始共和国已终止了自发的解体进程……我们找到了在新的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行途径——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即将结束。

鲍里斯·叶利钦　1991年12月12日[2]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背着总统，决定不理睬联盟条约……我们本来可以找到打破同乌克兰谈判僵局的办法——例如，建立一种伙伴成员的关系。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的形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1年12月12日[3]

尽管在11月25日已经宣布，将把联盟草案送交各共和国议会审议，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托词，以避免不得不宣布会议因陷入僵局而结束。戈尔巴乔夫急于尽快了结此事，他仍然不赞成这种解决办法，因为那将剥夺中央所拥有的真正权力，并使他失去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国的领导者们——特别是叶利钦——并没有如此急切；他们在确切了解乌克兰的做法之前，很难确定哪种联合是适宜的。

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构成中，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单元和若干小得多的单元，那么一定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比现有的那些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的问题要大得多。罗得岛同阿拉斯加的面积相差甚远，阿拉斯加同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也相差悬殊，但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差别比起来，这些差异便相形见绌了。俄罗斯毕竟占整个苏联领土的 3/4 以上及其一半人口。〔631〕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只有一个州，而所有东部各州保持其现有的边界，那么就很难使联邦制顺利运转。而苏联的情况比之更甚：在那里，大多数共和国里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对其他国家实行帝国统治。

在某些人看来，努力创建一个单一国家就等于让一条巨大的鲨鱼、一对金枪鱼和半打小鲤鱼在一起游泳。不管这个单一国家以何种方式构成，不管那条大鲨鱼可能提供多少保证，其他人都只能感到心惊胆战。

只要乌克兰还是联盟版图的一部分，建立联盟看来就更为可行。乌克兰的人口为俄罗斯的 1/3，它有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同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中，它能提供反对俄罗斯控制的坚实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参加，任何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

联合都不能同俄罗斯的规模和权力相抗衡。

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一个缺少了乌克兰的联盟必然缺少号召力。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资源正从俄罗斯流向中亚各共和国，并以较小的规模流向白俄罗斯。人们认为，同那些共和国结成的联盟将是一个俄罗斯资源的输送管，这是不能允许的，很多人反对它。

乌克兰做出了选择

乌克兰已决定于1991年12月1日就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一事举行全民公决；后来又决定在同一天举行乌克兰第一任总统的选举。直到8月的未遂政变之前，在乌克兰，除了西部几个州外，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不占压倒多数。当我在春天访问基辅时，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全民公决将会反对独立，而选择尊重乌克兰主权的联盟条约。大多数人在3月份毕竟还是投票赞成保留联盟的。

然而，在春末和夏季，主张完全独立的情绪迅速膨胀。正在[632]恶化的经济状况，加之莫斯科不肯放弃对经济的控制，不能执行一项前后一致的经济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感到，避免经济崩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离联盟。到了8月1日，当我陪同布什总统访问基辅时，高级官员——并不是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赞成独立——告诉我，他们认为，很快将会就独立问题举行投票。

莫斯科的未遂政变加速了这一进程。乌克兰共产党曾大力支持维护联盟，但它在政变流产后瓦解了并遭到禁止。大多数人，包括讲俄语的人，都不愿意把他们的未来同莫斯科政治稳定的机会

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足一打的一伙官员们试图控制整个苏联，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脱离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投票和总统选举，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独立并选举了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然而，选票的比例和分布却使观察家感到很惊讶。84%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0%以上的人投票赞成独立。即使在居住着众多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东部各州、克里米亚和敖德萨市，大多数人也投票赞成独立。

克拉夫丘克的胜利就不是如此一边倒了，他在全部七位候选人中得到了近62%的选票。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是位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得到了23%的选票，占第二位，其中多数来自他的故乡乌克兰西部地区。

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12月3日得知了乌克兰公民投票的结果后，立即正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各国和加拿大（那里的人口中有很多乌克兰人后裔）也迅速予以承认，但是俄罗斯政府的承认是最重要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不再坚持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承认并非没有政治代价。许多俄罗斯人情绪激动，不想接受乌克兰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一事，叶利钦因此而受到指责，说〔633〕他背叛了居住在乌克兰的1000万俄罗斯族人——尽管那里的大多数俄罗斯人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

在乌克兰8月份宣布独立之后仅仅几天，我同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两人都参加了布达佩斯的会议，在吃饭时他把我拉到一边，表示了对乌克兰独立的关注。“这是很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他说，“我们该如何对待？”

我告诉他，我认为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乌克兰人民投

票赞成独立，那么俄罗斯或者承认它，或者陷入一场不可能取胜的长期政治斗争，并因此而大伤元气。"如果那是他们的决定，"我指出，并加强了语气，"尽量对他们宽厚些。不要像戈尔巴乔夫对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样对待他们。你们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合作，而只有当俄罗斯真正接受乌克兰独立时，这一合作才有可能。"

然而，因形势需要，俄罗斯所做的远不止一般的宽宏大量。它也同叶利钦一直遵循、或至少从11月中旬以来一直遵循的政治斗争计划相吻合：以乌克兰拒绝参加联盟为借口，放弃不倡导联盟解体的长期承诺。现在，他可以争辩说，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乐于发挥其作用。12月15日，乌克兰立法机构通过法令，退出导致建立苏联的1922年条约，第二天又投票决定不签署任何联盟条约，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受到这些行动和他本人选举获胜的鼓舞，克拉夫丘克接受了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的邀请，准备在第二周周末与他们在白俄罗斯会晤。离开基辅前，克拉夫丘克明确阐述了他对联盟条约草案的态度，他指出，乌克兰将"与共和国联盟建立政治联系"，但它决不参加任何具有中央统治机构的联盟。④这当然意味着乌克兰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能够接受的任何联盟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联盟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在11月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一再提到的那种含义。

狩猎小屋的会议

〔634〕

在布列斯特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沿着白俄罗斯同波兰的边界，有一片禁猎的森林，它是残存的欧洲野牛后代的栖息地。在俄语

中它称做“白俄伏茨基森林”或“野牛森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喜欢在这里打猎（他的目标很可能是动物而不是受保护的野牛），在他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时，禁猎区里建起了一座精美的狩猎小屋。自那时起，这里就常常由白俄罗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使用。

鉴于那里偏僻、质朴和舒适，舒什克维奇认为，在11月25日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退出国务委员会会议后，它是同叶利钦举行所商议过的会议的理想地点。但为了使会议能够不受打扰地秘密举行，事先宣布的会议地点是明斯克。

尽管会议秘密举行，但三位领导人将会晤一事并不是秘密。一周前，新闻界已经报道，叶利钦将前往明斯克同舒什克维奇会晤，克拉夫丘克很可能也参加。最初，记者们认为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协调经济政策，俄罗斯宣布将于12月16日放开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一事，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遇到了很大麻烦。⑤然而到12月7日星期六早晨，情况清楚了：三位领导人将就联盟的前途进行讨论。当天《消息报》的通栏大字标题是：《在明斯克会议前，他们缔结三国同盟了吗？》。⑥

叶利钦通报了他在离开莫斯科前往白俄罗斯之前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他们两人都认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乌克兰的联盟。显然，他们都还不知道克拉夫丘克那天所说的话，因为戈尔巴乔夫仍然认为，乌克兰最终将签署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的话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欺欺人，他说，乌克兰投票赞成独立一事，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以便在未来的联盟中确立同其他共和国的平等基础。“我确信，”他继续说，“在今天的乌克兰，人民所考虑的是联盟，正像在我们宽广的国土上其他地方的人民所想的一样。”⑦

〔635〕 12月7日星期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及其若干助手在明斯克一下飞机，就被送到野牛森林。每位领导人由该共和国总理——

俄罗斯则由新任命的第一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及少量其他助手陪同。那所狩猎小屋不能接纳大的代表团。会议也没有邀请任何新闻记者。

三位领导人都否认事先知道该会议将会产生的结果。[8]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说，他们不能肯定，克拉夫丘克能否被说服接受任何类型的联合，因为乌克兰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独立，克拉夫丘克在总统就职的典礼上还发表了那种讲话。至关紧要的是弄清楚它们同乌克兰的边界是否仍然开放，这对白俄罗斯来说尤为重要。乌克兰不参加联盟，边界开放就不再能从联盟条约中得到保证；只有同独立的乌克兰缔结单独协议才能达到这一点。

自从1990年秋季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对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联邦进行了自由的讨论，这也是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商内容。两国那些反对联盟条约的政治家认为，该条约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乌克兰或俄罗斯的主权，因而他们制定了联邦协议草案。在俄罗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他的助手们也试图起草松散的协议，以便为俄罗斯找到借口，吞并苏联各机构，成为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当布尔布利斯随叶利钦参加狩猎小屋的会议时，他带来了这些草案。

叶利钦后来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最初，他问克拉夫丘克，是否能够对正在同戈尔巴乔夫谈判的联盟条约做某些修改，以便使乌克兰能够接受。当克拉夫丘克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时，他们转而讨论如何起草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协议。它意味着，联盟不能是一个国家或国际法的“主体”，不能具有任何可能限制其成员主权的政府属性。

工作人员整晚工作，当他们准备好星期天上午签字的文件时，三位主要领导人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了联系，邀请他前来参加会议，纳扎尔巴耶夫当时刚刚飞抵莫斯科，一个多小时后可能飞往布

列斯特。最初，他答应来，但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后他又变卦了。他后来说，他感到不再能够对谈判施加影响，而且不想被人们看作是同谋。

〔636〕 然而，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并未得知纳扎尔巴耶夫不来开会的消息。他们让人为签字仪式准备了一张大桌子，邀请了新闻记者，并去机场等候纳扎尔巴耶夫。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来，他们仍按原定计划，签署了联合声明及建立独联体的协议。尽管某些评论家认为它是一个"斯拉夫联合体"，但它显然不是。联合声明规定，它向所有前苏联成员国以及其他"承担协议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开放。[9]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舒什克维奇被委派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并将所发生的事情通知他。叶利钦自愿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并第一个接通了电话。舒什克维奇后来对我说，那样做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他说，他并不想通过公开的电话线路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而在狩猎小屋中也没有保密的政府电话，所以直到返回明斯克后，他才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不管这样做是否事先计划好的（很多人认为，舒什克维奇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政府小屋中一般要安装保密的电话设施），可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得知首先通知了布什时，他感觉受到了伤害。

舒什克维奇告诉我，当他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后，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我怎么办？"[10]

是"联合体"，不是国家

在野牛森林小屋中建立的联合体不设任何总统、总理或总书

记。实际上，该协议没有规定任何永久性机构，而只决定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立一个“协调机构”。[11]

协议只规定了一般原则或协调义务，联合体本身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威，而只有其成员的共同意愿。如果其成员决定不再承担它们以前曾承担的义务，不得强迫它们。独联体也无权征税。

然而，某些承诺是重要的。其中最具体的一项是“保留和维〔637〕持对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及核武器的统一指挥”。但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尚未拟订出有效的办法。

还有一项承诺也很重要，即“承认和尊重联合体内各国的领土完整及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直到八九月份，某些俄罗斯发言人还声称有必要修改边界，把那些居住着讲俄语人口的地区并入俄罗斯。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的州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就是与此有关的敏感地区，因而这一条款是俄罗斯领导人为了让其他共和国加入联合体而向它们付出的代价。尽管今后若干年这一条款在俄罗斯仍要引起争议，但既然它主张放弃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一直宣称拥有的领土，它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保护人权的承诺也是值得注意的，该协议借用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9月宣言的话，指出在保护人权方面要“根据公认的国际准则”。尽管它无法由独联体来加以实行，但它承认国际标准适用于国内法律，提供了一种据以判断各成员国人权状况的衡量尺度。然而，独联体协议中的人权条款远不如苏联人代会的宣言那么明确。

协议还指出，其成员国将“保证履行前苏联所签订的那些条约和协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其措辞指的是一个一个成员国去承担这些义务，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独联体，各成员国将决定它们自己应承担哪些义务。因此，与各国在独立宣言中所承担的义

务相比，该协议没有增加多少承诺。

协议的其他条款看来大多是值得称赞的抱负，而不是义务：各党派将就外交政策、经济战略、运输和通讯、环境保护、移民政策和防止犯罪等问题进行合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任何一国只需提前 12 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便可以退出独联体。

〔638〕三位总理也签署了一个简明的经济合作协议，承诺进行协调与合作，但这些承诺很空洞，缺乏协调机制，事实上不能保证各种政策的协调一致。

例如，政府领导人同意“实行同步的根本性经济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改变财产所有关系，保护自由企业制度”，但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到叶利钦已经宣布而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拒绝进行的那些改革。

同样，独联体准备缔结一个“银行间协定”，以控制货币发行，确定预算赤字的上限，但这一承诺也缺少一个一致同意的政策准则。

总之，在野牛森林举行的会议对很多问题都未做决定，而决定了的事情则较少。不管独联体实际上达成了什么协议，它都有赖于今后的谈判。由于没有任何强制机制，这些协议不能保证履行任何承诺。然而，该协议有一点是明确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不复存在。签署该协议的三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这一点，而且也只能保证这一点。

无益的抵抗

叶利钦受其两位同僚的委托，在12月9日返回莫斯科后向戈

尔巴乔夫解释了该协议。他还在有纳扎尔巴耶夫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解释。与此同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安德烈·科济列夫在一次国际性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有关独联体协议的问题。他们争辩说，该协议是"拯救苏联仍能被拯救事物的唯一途径"，因而并不是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恰恰相反，它阻止了在其领土上的政府机构的进一步瓦解。[12]

人们本来并不指望戈尔巴乔夫接受这一解释，但他最初的公开评论与他私下的反应相反，他并没有对此加以否定。在12月9日星期一晚间的新闻广播之后，他来到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讲话，他指出，该协议有积极的方面，但它宣称苏联不复存在一事是不合适的。他承认，每个共和国都绝对有权利退出联盟，但他认为，"一个由众多共和国组成的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他建议，独联体协议和联盟条约草案应由各共和国议会及苏联最高苏维埃进行讨论，或许应该举行全民投票。[13] 〔639〕

无论如何，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应更为重要。在共和国领导人中，他是联盟条约的主要拥护者，并始终反对取消新联盟的国家地位属性。他也是最后一位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担任政治领袖的人。他将就独联体一事挑起争论吗？

他最初提出了慎重的批评，那是在同一个星期一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的。他指出，他事先对斯拉夫领导人达成那样一个协议一无所知，他认为应该由所有共和国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进行讨论。他并未完全封死哈萨克斯坦参加独联体的大门，而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赞成联盟条约，并相信独联体协议不过是三个缔约国的一项建议，可以同联盟条约一道讨论。[14]

还有许多人也反对独联体协议，其中不仅有顽固守旧的帝国

主义分子，例如工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前共产党机关组织成员，也有受人尊敬的民主主义者，诸如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民主党人尼古拉·特拉夫金以及民主改革运动的多数领导人。

然而，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很快批准了独联体协议，三国政府命令其代表不得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这就使上述机构的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使反对独联体的人失去了法律依据。纳扎尔巴耶夫立即认识到他于12月9日在莫斯科所提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他开始鼓励中亚各共和国接受独联体协议，唯一的条件是作为其创始成员。哈萨克斯坦议会最终于12月16日宣布独立，以便在最后谈判中与其他共和国享有同等地位。

《消息报》每天以大字标题介绍有关情况：

〔640〕

12月11日：

独联体协议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批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军事问题寻求共识：俄罗斯总统保证军事与社会安全

12月12日：

支持独联体发展的人：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

中亚各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打算支持独联体

白俄罗斯代表团脱离联盟议会

12月13日：

阿什哈巴德会议的参加者准备成为独联体成员，但需享

有平等权利

联盟议会从对抗退缩

华盛顿承认苏联已不复存在

12月14日：

阿什哈巴德会议的结果使国家和世界松了一口气

武装部队服从最高统帅和国防部长

12月16日：

詹姆斯·贝克开始从苏联到独联体的旅行

民族自决斗争可能威胁俄罗斯的完整

12月17日：

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

12月18日：

俄罗斯议会接管克里姆林宫

苏联议会成为历史

12月19日：〔641〕

通向独联体之路：明斯克—阿什哈巴德—阿拉木图

未能达到法定人数：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了不可避免的死亡

五个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斯坦的议会批准

12月20日：

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

11 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独联体宣言

国家领导人把武装部队指挥权交给沙波什尼科夫，直至军事改革进程确定

1991年12月21日，所有前苏联共和国——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签署了加入独联体宣言。

11 月和 12 月，除了军事基地和军队之外，俄罗斯有条不紊地接管了在其境内的苏联机构，其他共和国也对其领土上的苏联机构如法炮制。到 12 月 23 日星期一，尚未决定的唯一一件重要事情是：戈尔巴乔夫何时辞职。

它 合 法 吗？

不久，戈尔巴乔夫在评论独联体协议时就不再保持最初的节制态度了。显然，他既不能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也不能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更不用说举行公民投票了，他变得越来越爱骂人。他开始把野牛森林会议称做非法政变，就像紧急状态委员会在 8 月份的所作所为。他认为，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失败而后者成功。

〔642〕政治家和法律专家仍在就那一问题进行辩论，而历史学家无疑将在未来几代人中继续争论。那些为苏联的终结感到哀痛的人，自然倾向于把虚弱的独联体看作阴谋的非法产物，而那些不希望对共和国主权施加任何实际限制的人，将认为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

不管宪法法律专家做出何种裁决，它显然都不同于8月政变的性质，当时政变的组织者发布了欺骗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在生病，制造了合法的假相，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都有清楚的病历。他们都是各自共和国的首脑，是经符合宪法的程序由各自的共和国所选出，其中两人是经公民投票选举的。这三个共和国都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其中两国是完全独立。它们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始国。[15]苏联宪法规定各成员国有权退出，联盟条约的创始国因而也有权终止它，特别是当条约中保留了共和国主权的原则时。

某些人确实承认这种权利。各共和国可能的确拥有退出苏联的固有权利，但是，那些参加野牛森林会议的领导人并未被授权作出这一决定。毕竟，这三个共和国的公民在3月份的公民投票中赞成保留联盟。

然而，3月份的公民投票被认为过于混乱，难以产生合法的结果。就乌克兰的情况来看，后来占压倒多数的人投票赞成在法律的基础上完全独立的主张，议会也禁止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同联盟条约保持联系。而在白俄罗斯，议会的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叶利钦的授权不太明确，但是，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一样，他后来也使独联体协议得到了俄罗斯议会的批准。多数俄罗斯公民可能更愿意有一个包括乌克兰的联盟，而不愿意独立，但如果没有乌克兰，多数人可能就不会支持联盟了。

然而，无论对导致苏联终结的秘密会议怎样辩护，独联体的创立者们显然并不在意是否符合苏维埃的法律程序。野牛森林会议的秘密状态，在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上没有在各个共和国进行全民投票，拒绝就联盟条约和独联体协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论、图谋阻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结束自身存在和废除苏联宪法而召开 〔643〕

最后一次会议，这一切为攻击 1991 年 12 月 8 日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提供了批评弹药。

苏联议会最后一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最初认为独联体协议是非法的，他在 1992 年 3 月告诉我，他相信，如果各共和国总统提出直接的要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本来能够以无可指责的合法方式终止苏联的存在。代表们已经认识到，面对来自各共和国的反对，无论如何遗憾，他们已不能继续行使职责了，他们应该同意这种要求。作为专业法律教授，留本琴科认识到，被迫解散苏联国家结构的悲剧逐渐损害着人们对法律准则的尊敬，这一问题仍然是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薄弱环节。此外，他认为它也为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合法性蒙上了污点，并为不满现状的人以违犯宪法的方式进行活动提供了论据和鼓励。[19]

俄罗斯独自去干

先不谈合法性——因为，关于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结束苏联时使用的方法是否恰当，永远也不会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支持独联体设想的人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说，实际情况使得共和国的领导人除这样做之外已别无选择。

苏联立法机构和苏联政府的表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制定一个有效的改革方针。但只要联盟机构存在，它们就会反对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改革努力。与此同时，经济不再仅仅是下降；而是开始走向崩溃。如果俄罗斯还想在外表上维持其改革政策的连贯性，它就不得不解决联盟机构。否则，管辖权限问题将会产生无休无止的

争论，而且苏联的官僚政治将会阻挡任何真正的变革。此外，九十〔644〕月间进行的有关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已经显示出，除俄罗斯外，各共和国政府都反对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联盟政府将向它们提供各种手段，使它们能够据以改变甚至摧垮俄罗斯的努力。

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及其当时领导的"激进派"的这种论点很有道理。即使在11月签署了联盟条约，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它是否能坚持六个月，也是值得怀疑的，与独联体相比，它同床异梦更多，合作的义务更少，很可能因此而崩溃。

如果新的俄罗斯政府能够在俄罗斯贯彻一个有效的改革计划，在许多人看来，它就进一步证实终结苏联的确是合理的步骤。然而，如果俄罗斯的改革努力证明更具有破坏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那么，旧有的不满将会充斥于新的生活之中。

尽管叶利钦设法成功地使苏联不复存在，但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也开始表现出分歧，它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由叶利钦于11月任命的俄罗斯政府支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反对改革计划的人，反对派表现得意外强大。叶利钦最终得到了他一年来一直追求的依法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如果他的政府方案不能迅速产生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摩擦。

12月初，正当叶利钦准备前往野牛森林时，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宣布，他反对叶利钦刚刚任命和正式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他在8月曾坚定地站在叶利钦和俄罗斯白宫保卫者一边。他嘲笑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沙赫赖是缺乏经验的"理论家"，他们的政策将产生无法预见的并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他特别谴责了放开零售价格的决定，该决定最初预定于12月16日实施，后来延期到1992年1月2日。

鲁茨科伊的口头攻击很猛烈，但当人们问他是否打算辞职时，他说他决定留在政府中，同那些他认为对俄罗斯有害的政策进行[645]斗争。小道消息猜测，如果发生反对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的政变，一定是由鲁茨科伊所领导。[17]

因此，俄罗斯即将获得独立，摆脱陷入自身政治危机的苏联政权。该政权仍在根据旧的苏联宪法运转，然而，这一宪法最初制定时的情况与现在相比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当然，该宪法已经做了100次左右的修改，但结果只产生了一个充满矛盾和解释模棱两可的大杂烩，把每次政治性争论都引入到宪法斗争中。

1991年秋季，当政变后的震荡使得有可能就俄罗斯新宪法迅速达成协议时，叶利钦决定不去起草新宪法并为之而努力。他把精力用于摧毁联盟政府。尽管他达到了这一目标，但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充满政治陷阱的国家。今后如果政治改革失败，就再也不能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了。

最 后 一 幕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命运，他保持着尊严，但并非没有抱怨。实际上，直到他辞职，他每天都发表讲话，举行会谈，就废除联盟国家后可能出现的危险提出警告。他预料将出现民族冲突、经济混乱、俄罗斯及其他共和国将瓦解，并很可能出现内战。

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他的，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是不了解，就是不在意。即使当他辞职一事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仍然对共和国总统们高谈阔论。然而，除了偶尔会见叶利钦之外，他的高谈阔论已经没有什么重要对象了：他会见新闻记者，传播塔斯社发布

的消息，对访问团体发表讲话。各共和国的总统们明确拒绝邀请他参与他们的聚会。

12 月 17 日，我参加了由伊利·威斯尔和维塔利·科罗季奇所组织的讨论民族仇恨的莫斯科会议，并和其他代表一起拜访了戈尔巴乔夫。当他一个一个地欢迎我们时，他称我为“大使先生”，并补充说，“我们有一个习惯，一个人一旦当过大使，就永远是大使”。

“我们也有同样的习惯，”我说，“只不过它是‘一个人一旦当过总统，就永远是总统’。”

他平静下来，显然对他的命运感到无可奈何，他告诉我们，他还没有确定辞职的日期。他想先了解预定于 1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的情况。他显然希望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但他看来已认识到他不可能受到邀请，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要给他们发去贺信。 〔646〕

在同我们的会晤中，戈尔巴乔夫首先详细地谈到了他写的书在国外受到的欢迎。他知道该书印行了数百万册，并对它仍在带来的巨大版税感到自豪。不是因为他个人得到了那些钱，他赶紧补充，因为他已将这笔钱全部捐给了慈善组织，而是因为他乐于看到人们对他的书感兴趣，并注意他的意见。当他反复考虑他暗淡的政治前途时，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他显然是重要的安慰。

他在发给阿拉木图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若干适度和有潜在价值的建议，它们包括：必须加强保护人权、拥有共同的国籍、由中央保持对核武器的控制。在结尾，他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宣布苏联的终结，他对其建议的解释如下：

我们应该庄严地并以合法的标准开始国家历史的新时

> 代。我们的人民之所以遭受历史性灾难，原因之一在于严重地缺乏连续性、毁灭性的革命以及施之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一个民主政治结构中做事，既需要民主的前提条件，也需要民主的经验。[18]

就阿拉木图会议来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在白俄罗斯签署的独联体协议的主要精神没有改变。

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前途的谈判是他所进行的唯一有实际意义的谈判。他在私下就此与叶利钦进行了谈判，会谈延续了10余小时。叶利钦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要价太高，但某些西方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得到的待遇与一位国家元首并不相称。戈尔巴乔夫可以支配一幢楼房用作公共事务基金会，它曾是某个共产党机构的所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因为，俄罗斯第一次允许一位领导人在退休后继续参与公共事务。〔647〕

尽管叶利钦曾同意，苏联将在1991年12月31日午夜正式终结，戈尔巴乔夫将在1月中旬辞职，但他后来很不耐烦，催促早些移交权力。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他经常举行重要会议的房间对着电视摄像机发表了辞职演说。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命令把发射核武器所需要的密码移交给叶利钦派来的沙波什尼科夫将军。

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去办公室参加预定同外国来访者的会见时，他停在半路，并说，叶利钦的工作人员已经占用了那些办公室，此时，俄罗斯的三色旗正飘扬在克里姆林宫议会大厦的圆顶上，那里设有俄罗斯总统的办公室。

第二十三章

〔648〕

对某些答案的思考

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自有它发生的道理，但这决不意味所有其他联合是不可能的……

亚历山大·赫尔岑　1851年[1]

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2年3月[2]

在1991年，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帝国和旧的权力，而我代表俄罗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在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失去帝国形象，苏联就不能存在。如果没有暴力形象，帝国形象也就不能维持。

鲍里斯·叶利钦　1994年[3]

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导致了世界上三个深刻的变化：结束了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统治，结束了苏联本身。这三个事件在时间和逻辑上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由列宁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注定要灭亡，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的基础上。只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离的警察国家才能让这种类型的政府存在几十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了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明显依据，正像它为共产主义政权提供了内部和外部敌人。非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成分的存在威胁着苏联的统治制度。

因此，只要主要大国不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649〕界大战后的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

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相反，苏联的国家则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但它在形式上却是主权共和国的自愿联邦。戈尔巴乔夫对此进行了挑战，他要使之名实相符，把帝国国家转变为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国家。当这一努力失败时，这个国家本身也就解体了。

当戈尔巴乔夫 1985 年掌权时，苏联的经济正面临危机，虽然其政治制度看来还非常稳固。感觉敏锐的观察家们自信地预测，苏联经济将不能同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进行竞争，由于它排斥根本改革，它将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必将加剧，并伴有潜在的爆炸性压力。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

事件究竟发生在10年内，还是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中。

对于那些强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并不令人乐观，更不用说那些比苏联的强制手段远为逊色的国家。在凯末尔及其“青年土耳其党”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称做“欧洲病夫”的时间有一个多世纪。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拼凑帝国受到1848年革命的剧烈动摇后，它延续了80年。在它同匈牙利达成重要妥协、建立了奥匈帝国后，它又延续了50年。中国的王朝在度过了兴盛期后，一般还要苟延残喘一个多世纪。

为了理解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而不是在2089年，为什么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不是在2091年，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发生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而并未伴随大规模的暴力，我们必须考虑人民所做的实际决定。人们做决定的环境受到社会和经济趋势的影响，而与个人感情因素无关，但政治领导人所做的决定，却可以规定事件的时机和性质。

谁？什么时候？

〔650〕

在苏联解体以后三个月，我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并分别会见了10余位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我把有关过去事件的特定问题拟了一个目录，但我更想深入了解的是，对于苏联解体如何发生，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因此，我每次谈话都以两个问题开始：“谁是苏联解体的关键角色？”“决定性的事件是什么？”后来，我还访问了其他人，并以若干回忆录中的内容加以补充。

当然，我并不期待人们，特别是亲身参与其事的人们对如此复杂的事件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意见所涉及的范围是

惊人的。

一些人认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苏联的制度注定要被忘却，因为把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阻止那种使它能够生存发展的变革。尽管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最终能够拯救它，但多数人愿意指出某些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决定加速了该制度的解体。其他人则认为，把苏联转变为近代民主国家并使其领导人对人民完全负责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关于关键的角色，至少有五种意见：有人认为是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还有人认为是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或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最后，一两个人把这个荣誉（或罪名）归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每个人对其回答都有充足理由。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是克拉夫丘克，因他领导乌克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致使任何可能的联盟都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乌克兰，他们认为，联盟就难以运转，因为俄罗斯与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在面积和人口上都相差太大。要在联邦甚至邦联中建立一种平衡，至少要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共和国。

其他人，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651〕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不同意这个逻辑。他们认为，即使没有乌克兰，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以及或许一两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就能构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联盟。只有一个共和国是不可替代的，那就是俄罗斯。因此，叶利钦是关键角色。如果不是他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协力建立了独联体，那么，为了共同的利益，就可能拼凑出某种邦联。

“不对。”其他人说，这些人包括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

夫和谢尔盖·斯坦凯维奇，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刚愎自用，不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忠诚于一个已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其个性具有独裁主义特点，这使他不能自愿地把各共和国领导人所要求的那种权力移交给他们。总之，他领导上的失利决定了他所领导的国家的解体，没有其他任何政治人物能够拯救它。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永远忠实于主人，他对上述说法都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在8月份不发生那次未遂政变，就有可能签署联盟条约。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关键角色，毕竟是他组织了那次政变，没有他的合作，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动政变。

斯塔尔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主要的罪犯，他还指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在他任苏联领导人期间，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及民族问题，允许地方"黑手党"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在苏联许多共和国里攫取关键性权力，这一切为瓦解苏联提供了条件。

当我问到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事件时，意见依然不一。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认为，1989年11月推倒柏林墙是关键事件。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并使用了他特有的夸张语气："砸在柏林墙上的第一锤宣告了苏联的终结。"[④]然而，这并不是他在1990年或1991年初的判断，而似乎是后来的追述。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是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俟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652〕就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正式从属于俄罗斯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可原谅的。

伊万·拉普季夫认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0年夏季批准成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关键事件。由于新的俄罗斯共产党为党内保守分子所控制，使党严重分裂，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

其他人，包括前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根据他的辞职演说来判断）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秋季"转向正确方向"一事是决定性事件。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背弃了他同叶利钦的协议，不再执行沙塔林计划，也不同那些后来背叛他的人组成政府，他为持续到第二年的戏剧性事件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亚美尼亚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认为，关键性转折点是在1991年1月1日，当时各共和国开始控制税收，并开始限制移交给中央预算的税款。[5]

"不，那些的确是严重的问题，但在1991年初，还是有可能拯救国家的。"另一派意见指出。有些人认为，1991年1月在立陶宛使用武力一事是不可逆转的关键性时刻。"半心半意"地使用武力使每个人都感到不满：那些主张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和杀人，而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苏联完整的人认为他背叛了他们，因为他后来也谴责使用武力。

维塔利·特雷季雅科夫是影响很大的《独立报》的编辑，他认为，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一事是转折点。"当1991年6月即将过去时，"他在一年后写道，"苏联的解体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6]

其他人认为，那个时间仍不准确。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从立陶宛的1月暴力和把军队开进莫斯科的3月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迅速采取行动加以改正，那么，建立不同类型的联盟还不算太迟。如果他在1991年夏初就同9个共和国缔结联盟条约，并以诸如索

布恰克甚至亚夫林斯基那样的人来取代帕夫洛夫，并迫使共产党组织成为反对派，他本来能够重新恢复改革势头，并阻止那次未遂政变。

对那些持同样看法的人来说，8月政变注定要使苏联解体。当时已绝对不可能返回到从前；以后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维持联盟。

然而，有些人认为甚至在1991年8月的最后1周，完全解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许多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政治野心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对抗，某种形式的联盟——或许是部分邦联，部分联邦——仍是行得通的。在他们看来，直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的狩猎小屋中进行了成功的“密谋”之时，建立一个松散而又民主的邦联仍是有希望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长期积怨，解体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历史中的个人因素

到1991年12月，即使不谈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个人积怨，俄罗斯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摧毁苏联。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全部遗产，由于俄罗斯基本上是由中央各部直接控制，所以俄罗斯或者利用联盟的机构；或者摧毁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机构。否则，行使权力的竞争只能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对抗。

然而，这种考虑以及人们所提出的其他理由很难说是最终的。有些人也提出了若干有充分根据的论点，主张俄罗斯仍作为一个更大的联邦或者邦联的一部分，即使它不包括乌克兰。首先，一

个更大的国家将更容易处理大量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如果由联邦控制核武器，就能够避免经年累月的谈判和不确定性。联邦也将有权保卫其边界，而同时不会刺激俄罗斯，使其重新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此外，联邦所保持的开放的内部边界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联邦制度也可以提供一个〔654〕途径，以便更好地处理各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冲突，如果所有共和国都是完全独立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更好些，叶利钦完全可以选择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政府。事实上，是否让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舞台，很可能取决于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的某些朋友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决不可能进行合作，因为叶利钦一直想取代戈尔巴乔夫，他绝不满足于处在从属地位。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能够同叶利钦合作，利用他的能量和对公众的感染力，以支撑改革努力。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力图加快和扩大改革的努力反应过度，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需要领导层中有叶利钦这样热情支持改革的人，以保持对保守派的压力。然而，个人因素战胜了政治考虑：戈尔巴乔夫不希望与一位有感染力的同事分享明星的荣耀。他只有同沉默和平庸的伙伴在一起才感到舒服，这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不但对叶利钦是这样，而且通常对他所挑选的所有人员都是这样。

很难相信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一直非常憎恨。直到1989年春，他在私下和在公开场合还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队伍中。他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从不满足于充当一个

小伙伴。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在1988、1989或1990年都没有得到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当时是存在的。

即使叶利钦证实他无疑在公众中很受欢迎，他有能力推销戈尔巴乔夫想推行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仍继续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反对他，甚至仍在利用克格勃的卑鄙伎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确曾暂时停止批准对叶利钦有人身危险的行动）。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后，他决不会再被漠视，每当他们俩达成协议，总是戈尔巴乔夫违约，他总是指责叶利钦玩政治游戏。叶利钦的滑稽动作和哗众取宠的嗜好无疑令人厌烦，但〔655〕他从不违背主要协议，而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0月有关沙塔林计划的问题上，以及1991年5月有关亚夫林斯基改革尝试的问题上，都违背了原来的协议。

看一看公开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像叶利钦这样自傲的人是怎样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发自内心的憎恨的。

说到那一点，人们必须承认，叶利钦常常以不负责任的要求来使关系恶化，他的观点常常前后矛盾。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的行为，特别是1990年和1991年的行为通常是有意尽可能向戈尔巴乔夫展现他最恶劣的一面。他知道该如何从心理上激怒戈尔巴乔夫，并善于选择时机。1991年2月，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循例辞职：叶利钦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将试图利用党内强硬分子来赶走他。但这种展现在电视摄像机前的企图，正是叶利钦所需要的，为他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未意识到，正是他反对叶利钦一事，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使得叶利钦受到公众的欢迎。对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豪而且——直率地说——因其智力而傲慢的人来说，这无

疑是令人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如果误入歧途，羞辱其潜在对手，然后他所采用的策略又使其对手深受公众欢迎，那么他便不可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以引导国家渡过艰难的危机。

苏联能够和平地(或者比较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实际希望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能够及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合作。直到 1991 年 7 月 29 日为止(在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意将帕夫洛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解职)，他们并未开始进行合作，应该为此受到更多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而在 1991 年 8 月 21 日以后，正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帝国变为联邦或邦联国家的希望破灭。就个人关系来看，两个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关系方面，历史将把他们两人都视为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们都让个人因素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他们竞争的政治后果。

[756]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竞争，尽管在1991年12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但它决不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从 1985—1990 年年中，叶利钦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超越他的个人关系。

俄罗斯人目前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很大，并常常受到评论者同戈尔巴乔夫个人关系的影响。如果撇开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付钱或不付钱的“代理人”的歇斯底里和非常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种不同的思想派别：

1. 戈尔巴乔夫只是"俄罗斯历史表层的一个脓包"，[7]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增加其权力，如果这些事情导致了改革，那也只是其他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2.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确进行了改革，但他后来迷失了方向。社会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们的能力。因此，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他所发动的改革的牺牲品。[8]

3. 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改革者，无论如何，他不得不对付党的领导，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如果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改革，党就会剥夺他的权力。因而他采取了战术上的妥协，并设法使自己不受党的控制。他认识到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并变得越来越激进，如果他再能得到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成功地摧毁共产党，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并保持一个以苏维埃共和国为核心的邦联制联盟。[9]

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彻底的改革者。他在1992年3月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每一个在其统治初期试图进行改革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其统治的末期都变成了反动分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为一例：亚历山大最初支持国务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宪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对面前，他自己也把宪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动，逐渐变成反动分子，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改革者就是那样因环境的压力而改变！从而开始反对他们当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对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大声说。[10]接着，他否认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

始终维持道义立场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决不放弃我最重

> 要的政治选择。这是道义的选择。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我把这些话放在引文中)，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11]

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慕尼黑讲话中所说的是正确的。有些人否认他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其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正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1989和1990年初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有可能逐渐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他支持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变革，但这一支持并不总是无条件的，有时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是，只要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就决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变化。与他的大多数政治局同事不同，从1988年起，戈尔巴乔夫通常支持民主变革，而不是仅仅维护共产党的狭隘利益。当这样做不成功时，戈尔巴乔夫首先避免被剥夺权力，然后再推行其计划。

当然，他的判断并不总是无可指责，他的许多错误——我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其内容，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他在1990—1991年的冬天同反对改革的人结成了暂时同盟，但他始终拒绝授权使用武力来维持其权力。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如他在慕尼黑演说中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所有具有改革思想的执政者，当他们发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时，都放弃了改革的努力。在1990或1991年，戈尔巴乔夫有好几次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并将苏联社会中被压制的力量重新集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尽管

他有时已经极为接近这样做，但他最终还是拒绝镇压处于萌芽状〔658
态的民主组织和民主活动。为了这种贡献和这种先例，俄罗斯向他表达了他应得的敬意。

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不过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的、苏联偏狭观念的教条主义卫道士，变成了一个为人类普遍价值而战的战士。他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这对克服由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孤立、敌对和同外部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他并未制订出结束冷战、消除东西方分裂的特别方案。但他逐渐认识到，苏联能够因加入世界大家庭而获得好处，当他为了与世界和平相处、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依据以论证自己的行动时，他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的声明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声明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因为戈尔巴乔夫根据它们重新确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他依据他所宣布的新的原则行事：同意最终在平等的基础上削减武装力量（而不是按比例削减，以保持苏联的优势），终止苏联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允许东欧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反对它在中东的前保护国的侵略行动。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

在自命为“现实主义者”的人看来，建立在“普遍人类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某种感情用事的色彩，但这是不正确的。任何外交政策，如果建立在使邻国贫穷的基础上，或以牺牲他人来获取单方面利益，从长远来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往往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就出现了毁灭性冲突

的危险，它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可能得到的任何正当利益。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经过精心拟订，以便不违背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外交政策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它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应该忽视其自身的利益，而是认为，其利益不应理解为只是单一的阶级、集团、意识形态或民族的排他性利益。国际社会将不会因冷战结束所创造的机会而得到好处，除非它找到一种方式，能把这种哲学原则应用到正常的国际活动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新秩序。

戈尔巴乔夫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并没有抹煞这一事实，即他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更宏伟目标——把苏联转变为依据法治进行管理的自愿的国家联盟，建立起按照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标准运作的市场经济。对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梦想。要走的路太远，障碍太多，范围太模糊，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完成这一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朋友认为，如果在 1989 年或 1990 年初，他就能够提出他在 1991 年夏天愿意接受的那种邦联，他本来可以维持苏联，至少以一种缩小的规模，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但包括其他多数共和国。他们指出，各共和国领导人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有以这个“礼物”做交易——当他们就各自共和国经济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仔细的考虑时，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中央机构。

1992 年 9 月，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我向他提出了该问题。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没有更快地准许各共和国享有真正的独立是犯了错误。

"杰克，可以看出你现在是教授，因为你的问题书生气十足。"他回答，"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走得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让我问你：如果我在 1989 年提出邦联，对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中央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罢免你。"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们将会提前开会，毫不迟疑地把我赶走。甚至可以说，直到 1990 年初我开始谈到邦联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反对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终与他们进行斗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动，不应该以我有行动自由的假定作为评判我的依据。"⑬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观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改革派评论家对此都不赞成。他认为，对于党的领导强烈反对的政策，他不能〔660〕公开表示支持。他在进行改革时，必须经过精心准备，有时还要采用欺骗手段。他必须设法掌握权力，迫使或者欺骗共产党去做它一直反对的事情。有时，甚至他的错觉也能起某种作用，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

戈尔巴乔夫误认为，苏联共产党能够变为进行根本变革的工具，这种错觉搅乱了他的政治判断力，直到叶利钦迫使他公开面对共产党背信弃义的证据。但客观地说，该错觉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它对采取步骤降低共产党的权威，并最终使之解体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步骤恰好需要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认可，而其权力又正在遭到逐步削弱，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能使共产党的官员确信，尽管在进行改革，党仍然能够继续掌权，他就不能采取这些步骤。

撇开他的错觉不谈，戈尔巴乔夫的策略也常常不是根据明确

的战略考虑。他不应以共产党组织机构需要安抚为借口，在1987年那样处理叶利钦。他未能使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从而不得不使自己摆脱其控制，而他没有寻求尽早——比如说，1989年的某个时间——实行总统普选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鼓励改革派在1990年党的大会之前脱离共产党，允许反对派在俄罗斯共产党组建时控制该党，这些完全是自拆台脚。即使他不能公开支持诸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等改革派，他也可以避免侮辱他们，并提供暗中的保护，而不是进行恶意的公开批评。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对于改革的成功是关键的，但从1990年起，戈尔巴乔夫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就改革策略进行的争吵毁坏了本应很默契的战略联盟。

戈尔巴乔夫还低估了自1989年以来公众态度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私下里，他抱怨不能使改革的速度超过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实际上，公众的认识走在了他的前面。正是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没有跟上前进的步伐，当戈尔巴乔夫推迟改革的时候，他便疏远了社会的大多数人。当民意测验结果显示，60％以上的群众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时，他却仍在坚持捍卫“社会主义”。由于不了解（也很可能是拒绝了解）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戈尔巴乔夫把一个又一个问题留给叶利钦利用。[661]

我们该怎样解释戈尔巴乔夫那种似乎是故意视而不见的现象呢？如果他真诚地赞成改革，他怎能在判断人民时犯如此多的错误？他掌握着一切消息来源，他怎能对社会的变化和其本国人民的看法一无所知？

我认为，他的个性因素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

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这使他很难建立有效的顾问和咨询机构。他既没有正式的顾问班子，也没有

非正式的顾问班子。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其成员进进出出，不时同他会面。但它们从来不是有效的顾问班子，原因有两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共事；第二，他从不把它们看作是真正的顾问班子，定期向它们咨询，认真对待它们。此外，他总是对它们说，而不是听它们讲。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生活似乎不是从事官方活动和公众事务，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能够为他提供同更大范围的人联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纽带。赖莎是他唯一的亲密朋友，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他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她的心理支持支撑着他，但是，她不能提供亲密的朋友圈所能够给予的广泛而深刻的咨询。此外，如果像瓦列利·波尔金一类奸诈的助手的确是靠拍马屁来维持其地位，那么她对人的判断力也像他的丈夫一样有毛病。[13]

人们注意到，除了外国同僚，他没有任何私人朋友。1991 年，若干苏联高级官员分别单独对我谈到，戈尔巴乔夫感到，与外国人相处比同本国人相处更自在。“他对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你比对我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亲密。”某个人说，“你可以与他进行更坦率的谈话，我们则不行。他在这里确实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也在于他总是任命二三流人物担任关键职务。由于他的形象日益退色，他对〔662〕任何比他更受公众瞩目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特别是当他的权力衰落和他更不受欢迎的时候。因而他总是任命像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一类虚弱无能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即使不谈他们在 1991 年 8 月的背叛，他们的无能也导致了他的垮台。

最后，他对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信任和对克格勃错误消息的轻信，都证明是致命的弱点。他不仅没能摆脱克格勃对其

个人安全的控制——在 1988 年克留奇科夫取代切勃里克夫时他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还因相信对国家真实情况的歪曲报道而误入歧途。任何国家首脑都可能偶尔被虚假报道所欺骗，但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发现和纠正长期存在的固定模式的虚假报道，他就不能做好他的工作。

列举戈尔巴乔夫的缺点很容易。更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是弄清在各种不同时期，在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不能肯定他在哪方面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他的改革进程走得更快，一个与 1991 年 8 月形成的阴谋团伙类似的小集团很可能更早发难，即在 1990 年秋天发动政变。那时的政变很可能有着比 1991 年 8 月政变更好的成功机会。叶利钦还没有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人还没有从立陶宛人那里学会如何亲自去保护议会；人们还不那么担心内战的可能性；比起九个月以后，“民主派”的人数还不是太多，组织得还比较差，也不那么自信。

在 1990 年，由于没有一位副总统和一位抱合作态度的总理的参与，没有任何一次叛乱自认为具有 1991 年的政变领导人所追求的那种合法性。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预防措施：更换国防部长，分流克格勃的某些关键性岗位，任命一个有能力的忠诚的总理，对任何人来，要组织政变本来都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在 1991 年之前面临被罢免的严重危险，他将因未能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受到责备。

然而，这些错误和错误判断不应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663〕不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他所继承制度的勇气。如果像某些批评者所称，他的唯一目的是积聚更大的权力，那么，他所做的所有改革努力就讲不通了。只要继续使国家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下，他就

能够保持他的个人权力。他改革这一制度，建立有限权力的代议制政府的努力，不应被解释为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改革是真诚的，尽管这些改革产生了他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说，俄罗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体制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出现了由他所倡导的变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我相信，俄罗斯最终将会承认，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领它摆脱了奴役和束缚。而他未能到达希望的彼岸则是次要的。

叶利钦的记录

在写作本书时，鲍里斯·叶利钦仍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他作为政客和政治家的记录仍在继续写。但我们对他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能说些什么呢？

同时代人对他作为苏联政治家的政绩意见分歧，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唯一不变的追求就是对权力的渴望，他的活动方式保持一个州级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特点。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粹派分子，是随风转舵的政客。其崇拜者否认上述特点，并指出，从1987年起，他始终支持最初的自由化和后来的民主化。他是前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同共产党完全决裂并彻底反对它的人。他们还指出，尽管他具有共产党的经历，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不回避直接选举的考验。[30]

无疑，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戈尔巴乔夫更有思想，更能谋划，叶利钦则更多地凭直觉，更为冲动。戈

尔巴乔夫受过更好的正规教育，他享受了国家第一流大学所提供的很多有利条件，超过了叶利钦进入的州级建筑学院。但两人都因在共产党组织机关中长期和成功的工作而获得了专门的经验；〔664〕他们最初都是因为担任州的第一书记而出名。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他的父亲是个拖拉机司机，但他有幸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的出色记录——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作为共青团领导人的，使他在回到家乡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先是担任共青团领导人，然后担任党的领导人，他迅速地而且似乎是自动地晋升到一个个要职。

叶利钦没有从最初的有利条件中得到好处：他不得不靠着他的智慧、意志甚至蛮劲奋力向上爬。其结果，两个人对权力有着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认为那是他应得的，而叶利钦则认为那是他争取到的和赢得的。

叶利钦确实是一名斗士。但他是根据规则来战斗。人们认为，他的竞选运动，他在议会中的策略，直到他 1991 年 6 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在任何民主国家中都是正常的。他当然也攻击其对手的弱点，利用他们的错误，有时还作出他不可能完成的许诺，但是，只有那些仍拘泥于一党专政思想的人，才认为这种行动是反常的。

1990—1991 年冬，当戈尔巴乔夫正在为是否授权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而踌躇不决时，叶利钦的坚定立场及西方的警告，可能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避免了一个将造成悲剧和流血的错误。尽管叶利钦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捍卫民选议会，反对武力解散，但他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一事，不但要有政治上的勇气，也需具备自身的勇气，正像他对8月政变进行迅速而明

确的谴责时所需要的。

如果不是因为叶利钦，那些企图在1991年8月罢免戈尔巴乔夫的强硬分子很可能已在戈尔巴乔夫勉强的默许下，于当年控制了苏联。他们掌握权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们的政策将会毁灭新的民主制度，破坏经济，并有造成广泛流血的危险。

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是鲍里斯·叶利钦拯救了俄罗斯的民主（因为俄罗斯的民主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毫不夸大地说，1991年8月，当民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时，正是叶利钦的行动保护了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可能性。

8月政变后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叶利钦虽有机会，却没有去全力从事制度建设，例如起草和采用新宪法，改革和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帮助建立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等等。相反，叶利钦竭力同中央斗争，毫不客气地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破坏了法治的尊严，而且把很多以前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俄罗斯政府。此外，他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引入国际社会并没有经过人民的明确授权，而是根据一个不起作用的宪法。这些成为改革的严重障碍，如果叶利钦愿意更谨慎地进行转变工作，这些障碍本来可以减轻。〔665〕

鲍里斯·叶利钦在1991年的工作无疑将同他后来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经历综合起来加以评价。如果国家能够确立民主政体，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那么没有什么人想去仔细研究他的缺点。他将被视为适应21世纪及其以后时代的新俄罗斯的创立者。但是，如果国家进一步分裂，逐渐陷入犯罪和腐败的困境，并因蛊惑人心、要求恢复帝国的呼吁而深受折磨，那么，他将作为悲剧性的沙皇鲍里斯第二被拉下台，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它将导致困难的时代和民族的耻辱。

破坏者克留奇科夫

如果由我来回答我对俄罗斯政治家提出的问题，即谁应对苏联的解体负有最重要责任，那么我的回答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他是1991年8月夺权企图的组织者，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并使至少在帝国的部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愿的联邦变得更为困难。如果没有克格勃首脑的支持，就难以发动任何有把握的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有预料到政变的原因之一。他完全错误地相信了克留奇科夫的忠诚。

克留奇科夫对总统的背叛，证明他就是最直接破坏苏联的人，但他声称拥有这一权力却并非仅仅基于行动本身。

〔666〕他始终没有履行他的基本职责，即向总统提供准确情报。他的报告故意歪曲事实，以利于他所支持的特定政策。此外，当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同僚不赞成他的看法时，他便用彻头彻尾的谎言破坏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没有看到公众对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憎恶，他应负重要责任。他对虚构的外国干预的强烈警告，或许有助于维持一个膨胀的情报预算，但它转移了人们对苏联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而他所赞成的那些"解决办法"无疑将使问题更严重。

认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够变为民主国家那种法律执行机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它习惯于超出法律范围行事，并庇护其特工人员，使之不须对外界做任何说明，这种习惯如此之深，即使有一位有决心的主席也难

以完全克服。

在这点上，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决不是一个有决心的主席。尽管他不具备其前任贝利亚和尼古拉·叶若夫那种真正残忍的习惯，他领导的克格勃也没有犯下对无辜者大规模屠杀的罪行，但他却使这个组织超过法律范围行事，服务于他所偏爱的政策而不是合法当局。此外，他继续从事已明令禁止的活动（例如暗中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有的时候，他的活动显然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批准。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应为此承担责任。例如，本来不应该对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监视，但叶利钦却似乎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下，包括在其住宅中安置窃听设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有关叶利钦的报告，他不可能不知道消息的来源。例如，叶利钦曾问我，如果出现违宪夺权之事，美国会做何反应，有关此事的报告只能是来自向克格勃告密的人或者窃听器。

如果不使用这种做法也能使戈尔巴乔夫了解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那么他是会同意甚至鼓励克格勃那样做的。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屈从于这些习惯的克格勃主席也能使戈尔巴乔夫本人受到监视，甚至在他的私人工作班子中招募特务。[15]

〔667〕瓦季姆·巴卡金说，在他任职期间，戈尔巴乔夫一直对克格勃有种敬畏感，就像州的共产党首脑那样。[16]每天早晨，当他拿到标有“仅供总书记阅”的文件夹时，他都很激动，他确信，他所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情报。他在1986年尼古拉·达尼洛夫被捕时表现出来的容易受骗的弱点，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去做，即使这样做不利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例如，当奥列格·卡鲁金在1990年与克格勃决裂并谴责它继续进行非

法活动时，戈尔巴乔夫却非法地剥夺了卡鲁金的退休金和他以前的奖品，而不是利用卡鲁金的指责，迫使克留奇科夫改变他的做法。[17]等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克格勃的忠诚时，已为时太晚。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如果以为任何克格勃主席会彻底改革该组织，那是白日做梦。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推测，如果克格勃由不同的人来领导，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例如，如果在1990年和1991年由瓦季姆·巴卡金而不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负责克格勃，肯定就不会发生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同时也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监视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将会终止，阿尔法分队也不会被用来对维尔纽斯的电视联合企业发动猛攻，有关国家情况的报告很可能更为客观。巴卡金指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并不喜欢克留奇科夫篡改证据的嗜好，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更准确的报道。

西方的作用

在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中，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作用，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像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一样。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依据他们个人对有关政治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依据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审核。那些对里根、布什、撒切尔夫人或科尔持好感的人认为，当时发生的多数事件应归功于他们的政策。而那些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丝毫也不承认这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例如，挪威议会似乎就属于

〔668〕

这一派，它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一人。

为了清楚地考虑责任问题，我们必须区别三种转变：结束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尽管三者有明显的联系，尽管结束冷战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另外两个事件，但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

冷战按照美国所确定的条件结束，从开始美国对此就有所考虑，1984年1月，里根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想伤害一个和平的、实行改革的苏联的真正利益，尽管它涉及苏联统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无疑将改变苏联政权的性质。

从担任苏联领导人之时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只要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他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内部改革。最初，他试图仅靠军备控制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它没有奏效（转折点很可能是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于是他便开始全面响应美国的四点议程。然而，这根本不是对美国的让步：国内的事件使他确信，如果他设想的改革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苏联社会，并开始民主化进程。这样，美国及西方的议程便开始与他的计划不谋而合。

由于就议程的四个主要问题取得了进展，具体问题便非常迅速地解决了——那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加以鼓励的事情。移民更加自由；新闻媒介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举行真正的选举；而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取消中程核导弹，以促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并帮助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的各方调解当地的战争。某一地区情况的改善有助于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

如果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切还能够以这种形式和这种速度发生吗？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莫斯科做出决定时的处境，便不会说一切仍将如此发生了。〔665〕

有些人主张更软弱的武器政策：冻结或单方面削减核武器，拒绝以在欧洲部署军队来对付SS—20导弹，这决不会鼓励苏联减少军备。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此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政策也将会逐渐破坏很可能是唯一的论据，使苏联军方难以相信应该削减核武器。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而它必须找到结束这种竞赛的方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付持强硬路线的批评者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鸽派"将使他丧失这个武器，并很可能延长冷战，增加那些以为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苏联将军发动不计后果的战争行动的危险。

某些西方政治家想用武力控制国际关系及一切有关的事情，如果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冷战也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结束。军备控制协议有可能更快地签署（尽管这一点并不肯定），但是，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可能要推迟数年，直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仅靠减少军事负担并不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可能会变为进一步争论的源泉，而不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

怀疑论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达成并遵守一个合理的协议，如果让这些人来制定政策，也会阻碍冷战的迅速结束。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缔结协议，那么，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妥协的努力就会停顿下来，他将被迫更早地中止改革，并变得比他最终显示的更加强硬。

总之，我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一致性：(1) 西方进行公平谈判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力量、决心和愿望；(2) 苏联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苏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570〕了，它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但它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里根以及美国的盟国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值得受到称赞。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使之成功，绝对不可能。方案是在华盛顿制订的，但它未必能在莫斯科制订出来，即使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足智多谋的领导人。

当里根政府明确表达了结束冷战的战略时，它并没有计划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这并非因为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是因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里根总统希望苏联停止威胁他国，并相信，掌握了情况的苏联公众对其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制止苏联的侵略倾向。他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他没有试图为苏联人民规定政治结构。那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如果共产党政权能够逐渐演变成一个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的政府，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某些人可能立即表示反对，如果的确是那样，美国政府就是难以置信的天真。一个共产党政权怎能逐渐演变为它的对立物吗？美国人民一定知道，民主政治、自由迁移和自由获取信息与维持共产党统治是不相容的。或者新的自由是个骗局，或者共产党统治垮台。

是的，从理论上我们懂得这一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我们也如此。没人能说出需要有多少自由（假如自由能够测量）才足以推翻这一制度，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一制度根本不会显示出它改变其自身的意外能力。那些发动改革的领导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受到西方政策的鼓励，但他们之所以采取改革路线，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利益。

愤世嫉俗的人一直不相信，受到苏联制度制约的领导人能够理解〔671〕真正的改革，更不用说坚持改革了。很多愤世嫉俗者拒绝承认所发生的变化。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出现了，其他许多改革者也出现了。像杰斐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是难以产生的，但是很多人更接近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约瑟夫·斯大林。

改革——如果可行的话——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不会有损于美国或西欧，即使他们希望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

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这与其说是苏联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其生活状况造成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富裕和自由与大多数苏联人晦暗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不断增加的接触和信息使得这一对比更加明显，对现存制度的支持就会逐渐消失。

事实证明，苏联制度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满足其人民所渴望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竞争的要求。苏联人常常看到，外国的情况比严格的新闻检查下的报道要好一些，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数十年谎言的一个后果是，人民已习惯于相信与他们被告知的情况相反的消息。

然而，如果我们要确认某一个人应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负责，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他所坚持的改革最终把共产党从统治地位拉下来，他拒绝同意使用武力去维护旧制度。在相继发生的危机中，他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苏联第一位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领导人，

也是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领导人。这难道不是很恰当的吗？

当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显然将要结束时，美国和大多数（或许是全部）其他西方国家希望，戈尔巴乔夫将成功地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当然，它不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许也不包括诸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其他几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已开始注意以前不太在意的叶利钦，但他们仍认为叶利钦反复无常，不太可靠，不如他们所熟悉的戈尔巴乔夫。 [672]

个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显然，就有关核武器一类问题同1个国家达成协议，比同12个国家要简单得多。很多制定政策的人担心，苏联的解体可能导致类似南斯拉夫的那种民族冲突。

如果美国和西欧有权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联盟，它们一定乐于做这件事。但这当然不会由它们负责。所以，当苏联帝国分裂时，它们只能沮丧地看着，然后匆忙地竭力设法同那些意外出现的共和国建立联系。

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正如我所指出的，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很可能应就此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这令人啼笑皆非，但也许又是恰如其分的。

结 束 与 开 始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我没有为它的灭亡感到哀痛，但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也没有感到特别想庆祝一下。束缚在一个帝国中的15个国家终于解放了，所有自由的朋友们难道不应为此而欢欣鼓舞吗？我认为应该如此，但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声音又说："不，等一等。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两者不能画等号。我们怎能知道人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好呢？"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我喜欢熟悉的东西，对新的不熟悉的东西感到困惑。苏联制度中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在大声疾呼改革。到1991年9月，它们被改变了。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将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那里的决定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673〕任何国家的领导都不可能直接做这样的事。政治领导人不必再假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自愿站到一边，允许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建立文明社会，确立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如果政治家们能够设法鼓励这种变革，事态发展就会更好。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那些曾管理过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人阻碍新事物。然而，各共和国多数政治领导人是旧的国家机器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们自愿把权力交给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支持独立，恰恰是因为那能够使他们更牢固地控制权力。

除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者已经取得独立——没有一个苏联共和国在任的政治领导人想实行真正的

经济改革。即便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尽管经过几年的讨论，却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从国营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保护平民百姓。

如果在 1991 年能够真正实现过渡时期的安排——例如联盟条约，使政治经济改革得以持续进行，使得新机构有时间适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它比实际已发生的苏联的突然解体更为可取。然而，到 1991 年底，渐进的变革在长期推迟之后，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只有激进的改革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革肯定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政治骚乱。除非那时管理俄罗斯的“民主派”极为灵活和幸运，否则，大多数人将对民主政治丧失热情，并对旧的帝国产生新的感情，记忆力的选择性就像哈哈镜，它在人们头脑中美化了旧帝国的形象。

尽管突然的独立意味着不适应改革需要的中央机构被多数前苏联共和国继承下来，但无论如何，到 1991 年底，渐进的变革已不再可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比，这些机构在个别共和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小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或经济是为独自运转而建构的。

以后的发展如何，我将拭目以待。

由苏联帝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国家今后要为它们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为重〔674〕要的。如果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满足于在其现有边界内生活，集中精力开发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那将有助于所有继承苏联遗产的国家的发展。反之，如果俄罗斯沦为独裁统治或恢复为帝国，那么对其他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发

展可操作的民主政治，建立健康的经济将是极为困难的。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非殖民化的痛苦。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要为自己重新定位。苏联帝国是否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如果是，那么俄罗斯便失去了一半人口及大片领土。俄罗斯曾是共产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吗？如果是，那么它现在便避免了一位帝国统治者，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实际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身兼二任，既是宗主国，又是殖民地。在1991年12月，叶利钦的行为就像俄罗斯是个殖民地，他坚决放弃了迫使其他共和国加入一个新帝国的努力。他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了其他所有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和它们的边界。

为了理解那件事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也要考虑如果俄罗斯的领导人在1991年坚持这一传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记录是一部帝国强权的记录。从14世纪初，当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第一次开始记载很小的莫斯科公国的活动时，国家统治者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热情。首先，莫斯科吞并了其他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公国；接着，它又占有了在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非俄罗斯人居住的疆土。它在19世纪的最大疆域，西到瑞典、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边界，东达太平洋。它在西半球也曾占有土地，拥有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赞扬帝国的扩张。有些人曾对专制行为加以批评，但他们却赞扬领土扩张，赞成加强国家权力。甚至像伊凡雷帝那样残酷的暴君，也因其增强了俄国的实力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民族的尊严、荣誉、安全、甚至幸福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帝国。

〔675〕 苏联宣称它不是俄罗斯帝国，但其领导人聪明地利用了这种

帝国情结，它成为俄罗斯政治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沙皇后没有几年，苏联领导人就把帝国的传统攫为己有。历代沙皇获得的领土成为苏联历史中的光荣篇章。

这就是被叶利钦及其政治伙伴在1990年和1991年12月所抛弃的传统。1990 年，他们正忙于宣布俄罗斯的主权；1991 年 12 月，他们强迫俄罗斯尊重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边界。

假如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方针，会对事态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看南斯拉夫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在 1990 年或 1991 年都决定解散联邦，走各自独立的政治道路，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塞尔维亚愿意承认现有边界，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也愿意承认，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发生某种经济混乱，但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将会出现政治斗争，而不是流血冲突。

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各共和国独立，苏联将会陷入内战的地狱之中。但这并没有发生。独立后进行的民族斗争，在苏联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发生在边远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带。为什么苏联的解体比较和平？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没有仿效塞尔维亚的做法，没有企图重新划定边界，或把所有俄罗斯人都集中在大俄罗斯，并把非俄罗斯人都从该国赶走。如果他们那样做，苏联很可能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一个非常大的南斯拉夫，因为，与南斯拉夫不同，苏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它们很可能脱离负责任的控制。

叶利钦对俄罗斯含义的重新定位是历史性的决定，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维持其统治同样重要。如果它能够保持下去，如果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逐渐接受它，它将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它像结束冷战、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

独裁统治一样，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1991年12月，人们还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将如何确〔676〕定其新的特性。比较聪明的俄罗斯领导人知道，帝国将不再是荣誉和权力的源泉，而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看法不是很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相信帝国的意义。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会把经济上的贫穷和失去帝国一事联系起来呢？肯定有很多顽固守旧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会怂恿和利用这种失落和被出卖的情绪，正像本世纪早些时候，德国法西斯以指责其敌手在德国的背上刺了一刀而赢得了权力。

从感情和精神上来看，民主政治要想获得一个机会，俄罗斯仍需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当俄罗斯民族满足于居住在其现有边界之内，建立同其邻国的平等关系，它才能够获得发展和繁荣。如果它试图重新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自身的独裁，这对它的每一个邻国都是悲惨的。

认识到前面仍有如此严酷的斗争，使我在1991年圣诞节没有去庆祝苏联的终结。

分 析 报 告

回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并成为历史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份死亡鉴定书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一概括。

苏联的死亡

死者曾是一位有恶习的病人，医生开始为他治病。他们设法减轻病人的偏执狂，控制他的侵略行为，但是所用的药

逐渐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他最终死于感染扩散。这种疾病不会威胁到健康人的生命。

鉴于该病人的恶习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并继续威胁着几十亿人的生命，显然，医治那种习惯比拯救那个病人更重要。此外，该病人长期滥用强权，这已使他建立起一个对治疗最不敏感的僵化系统。因而，人们认为，有责任心的医生已经达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该病人未被治好一事，是他自身疾病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治疗不当。〔677〕

15个子女（其中3个是不合法的）幸免于难。他们都表示，一定要避免那种逐渐损害死者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确实深受其害。然而，应该指出，这些子女很可能携带着某些致病基因。实际上，恶性肿瘤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医务当局应该对幸存的一代进行仔细的但又是同情的观察。

〔678〕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苏联并未完全死亡。它只是缩小到和俄罗斯一样大。

维塔利·特雷季亚科夫　1992年7月①

在俄罗斯,从没有一次改革努力被贯彻到底。

鲍里斯·叶利钦②

不实行改革,俄罗斯就不具备帝国的力量。实行改革,俄罗斯就失去了帝国的愿望。

小杰克·F·马特洛克　1995年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预言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作为一体化机构或者协调机构是无效的,至少在其最初四年如此。那些留待以后谈判解决的问题,不是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达成的条件过于笼统,仍需继续争论。即使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所以独联体不过是为其成员国及其政府首脑定期开会的一种

安排。他们的确举行了会议，但他们回去后，通常继续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除了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外，其他前苏联共和国需要立即为它们自己定位，决定其民族形象和地位，决定它们将建立哪种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它将重新确定它在世界和历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都必须决定，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否有利，或者说国家能否依法对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提供平等的保护和权利。〔679〕

即使经济能够平稳过渡，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易于造成分裂。但是经济并未平稳过渡。国家身份的定位——对俄罗斯来说是重新定位，恰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情况提供了进行蛊惑宣传的炮弹和避免做出向必要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决定的借口。在中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仍然为共产党的官僚所控制，虽然共产党已经正式取消或者更改了名称。官僚机构的腐败却从未消除过，现在它像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一样迅速蔓延，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利用了官僚，两者常常同流合污。

最初的独联体协议规定，其成员国将“维持和支持一支共同拥有和共同指挥的军事战略空间部队”。③但是，统一的指挥结果只维持几个月。在阿拉木图签署了独联体条约后仅仅一周时间，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对指挥方式发生了争执，到1992年1月初，乌克兰坚持要求拥有在其领土上的所有多用途部队和黑海舰队。④到夏天，实际上所有独联体成员国都开始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1992年5月，俄罗斯建立了它自己的国防军，在这之后，它接受了留下来的独联体指挥系统。⑤从那时起，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就取决于双边谈判，虽然有几个成员国仍坚持由俄罗斯发起的独联体集体安全协定，允许俄罗斯军队在其他前苏联国

家以多国部队的“名义”进行军事活动。由此看来，独立国家联合体并不是一个实体。

独联体在维持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方面，并不比保持一支统一的军队所取得的成功更大。每个前苏联共和国都宣称拥有对其边界之内所有财产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赞成俄罗斯在 1992 年 1 月推行的激进的改革计划。经济政策实际上五花八门，各国鼓励采取保护措施，并给相互间的贸易——现已变为国际性贸易——设置障碍。

所有前苏联成员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保持共同国籍的建〔680〕议，这个建议是他最后一次对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提出的。谁有资格确定国籍已成为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之间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曾经被苏联所占有的领土上的历史，从1991年起，成为不是由 1 个国家，而是由 15 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在试图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时，它们要同巨大的内在压力做斗争。1995 年，在苏联解体四年之后，独立国家联合体仍然只是个概念。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其成员国似乎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实体，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采取渐进的步骤，因为真正的行动还不存在。

俄罗斯的阵痛

叶利钦最初把政府交给了年轻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这些人乐观地认为，只要采取自由价格、取消对企业的补贴、实行有节制的预算等，他们就能使俄罗斯迅速建立起市场体系。他们最初的

政策后来被称做“休克疗法”，特别是批评它的人这样叫。波兰早些时候曾使用过“休克疗法”，一些有严重财政金融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也曾这样做，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存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许多要素。因而，把俄罗斯政府最初的经济改革政策称做“休克疗法”属于用词不当。

不管该政策的恰当名称是什么，它的确引起了震动。1992 年元旦，当许多日用品的价格放开后，一夜之间价格暴涨，不到一个星期，很多商品的价格比以前上涨了 10 倍以上。工资并未同步增长，存款已经一钱不值。

然而，失控的价格并没有引起竞争，因为大部分生产仍然由国家所垄断。除了最小的零售企业之外，私有化推迟了一年，由于毁灭性的高税率和官僚机构的敌意，新的企业步履维艰。官僚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改革或缩减，它仍然阻碍着私人的努力，共产党时代的规章成为腐败的温床。

俄罗斯议会从未同情过改革计划，它很快成为活跃的反对派。〔682〕立法机构行使其宪法权利控制了中央银行，任命前苏联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管理它，并坚持继续向国有企业和农场发放大量补贴。税收减少了，这一政策仅仅有助于增加预算赤字，加剧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尽管日用品价格在 1992 年 1 月的初次暴涨中上升了 245%，但它继续上涨，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500%，接着，1993 年在此基础上又上涨了 847%。[8]货币贬值甚至更迅速，到 1995 年初，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为 4500 比 1，而我在 1991 年 8 月离开莫斯科的职务时，这一比价为 27.6 比 1。

很多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仍由国有部门管理，这意味着，缺少一个政府管理的保险网，需要对公共事务给予大量补贴，不允许工业和农业中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破产和进行结构性重组。

甚至在苏联正式解体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就已经宣布，他反对经济改革计划。由于1992年经济混乱更为严重，他同叶利钦的不和加深了。当我于1992年3月拜会鲁茨科伊时，他仍然表示忠于叶利钦，但是他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到夏天，他开始公开反对政府，并参加了“中间派”联盟，他们要求向市场经济进行渐进的过渡。曾经是戈尔巴乔夫忠实信徒的阿卡尔基·沃尔斯基也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领导着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该组织把中国看作市场改革的样板。他们欣赏中国所实行的那种保持政治稳定，推行渐进改革，迅速发展经济的做法。但是，俄罗斯不可能不加改变地实行中国的这种做法，即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实行自由化，同时实行最小限度的政治变革。俄罗斯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维持、即使暂时维持这种做法的政治结构。

叶利钦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是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对叶利钦的改革计划也有不同意见。他和议会中持批评态度的人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他开始公开反对叶利钦在1992年全年的政策。⑦

叶戈尔·盖达尔是35岁的经济学家，叶利钦曾让他负责经济政策，他最初担任第一副总理，然后是代总理，他成为反对激进改革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人们公认他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人。他身材矮胖，长着一张娃娃脸，因而不具备在选举政治中十分有用的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他在阐述其政策时所使用的术语，也使那些对市场经济很不了解的公众难以听懂。他信奉“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创立的货币金融经济学，但他对管理官僚或管理使市场运转的机构毫无经验。

〔683〕

结果，当盖达尔政府宣布某些显著的成就，诸如放开价格、使多数私人经济活动合法化、允许卢布自由兑换、颁布适应市场经

济的新法律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垄断组织的欺骗榨取，公众的骚动不安也在不断地增长。此外，议会控制的国家银行无限制地印刷钞票，逐渐破坏着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即改革的关键举措。私有投资得不到什么保护，税务负担过重，以致企业家在交税后不能做到收支平衡。由于人们隐瞒收入，潜在的投资基金逃到国外，国家的税收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到1992年秋天，据熟悉情况者的估计，流出的资金达到180亿美元以上。⑧

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批评，叶利钦在199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支持盖达尔及其政府。9月份，叶利钦在一次私人谈话时告诉我，他认为盖达尔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并断然拒绝“将他解职”。⑨但是到了12月，叶利钦屈服于议会的要求，以温和的行政官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他曾管理庞大的国营天然气垄断集团。

叶利钦总统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多数派的让步，并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议会拒绝扩大他依法统治的权力，并试图推翻某些已经推行的改革措施。在他们的压力下，叶利钦进行了谈判，但是，他同哈斯布拉托夫及最高苏维埃的其他领导人达成的每一个协议，都是还没有贯彻实行就不了了之。叶利钦希望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实行“总统制”共和国，而不是由立法机构享有最终权威，采用新的宪法，并批准提前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一贯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冲突变为各倾全力的政治斗争，议会威胁要弹劾叶利钦，叶利钦则威胁要在新的选举期间中止议会。

1993年4月，就叶利钦同议会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所确定的〔684〕四个问题举行了全国性投票，结果显示，叶利钦仍然得到国家大多数人的支持，对他的改革政策，赞成者多于反对者，大多数人

希望举行新的选举，特别是议会的选举。[19]

叶利钦试图利用公民投票，迫使最高苏维埃提前进行选举，授权宪法会议采用新的宪法。一方面，他提议进行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他又提议选举新的议会。然而，俄罗斯议会继续进行抵制，不仅拒绝提前举行选举，而且让宪法会议准备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草案于1993年7月完成，但是，只有获得各州和各共和国的批准，新宪法才能生效，这一过程至多也就需要几个月，但因不够法定数量，它从来没有被正式通过。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3月以他的政治前途为赌注举行公民投票一样，叶利钦希望1993年4月的公民投票授权他继续其改革政策，制服难以驾驭的立法机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夏季，叶利钦同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分歧扩大了，此时，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已能控制大多数选票。实际上，分歧已演化为全面斗争，每一方都力图摧毁另一方，成为俄罗斯的最高权力机构。俄罗斯那个拼凑的宪法不适于解决权力斗争问题，在新宪法应如何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划分权力的问题上，双方继续进行争论。

行政一立法之争的双方开始违犯现有的宪法。诞生不到两年的俄罗斯宪法法院已证实它毫无能力处理这一危机，因为其首任主席瓦列里·佐尔金超越了法官权限行事，并企图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佐尔金不明智地去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问题，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他同议会中的过激分子站到一起，而坚决抛弃了合乎法官身份的不偏不倚和法定的程序。拘于党派偏见，他甚至宣称，叶利钦宣布的法令在得到议会批准和详细条款公布之前是违宪的。佐尔金把宪法法院牵涉到政治斗争中去，超出了这〔685〕个羽翼未丰的法院的能力，实际上摧毁了这个机构，阻碍了在俄罗斯建立起司法制度并确立法治的努力。

与此同时，由鲁茨科伊副总统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共同领导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过激分子，从激烈的言语转向暴力行动。哈斯布拉托夫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一再裁定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他还不顾在投票时所发生的公然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电视摄像机也拍摄到这样的情况：在同伴缺席时，许多代表篡改桌子上的电子投票器。这就使少数派代表变成了多数，从而赢得了真正的多数派未必同意的选票。

最后，它导致了全面的战争，当叶利钦于 1993 年 9 月 21 日解散了最高苏维埃时，残余的议会（其成员远少于必需的法定人数）在俄罗斯的"白宫"设置了路障，投票选举了鲁茨科伊取代叶利钦，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并以这些非法行动为借口，建立了一支主要由反对苏联解体的无赖和强盗组成的私人军队。10 月 3 日星期天，鲁茨科伊派遣他的"杂牌军"去占领莫斯科的重要建筑。他们迅速占领了议会大楼对面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并几乎成功地占领了几英里外莫斯科奥斯坦金诺区的电视广播大楼。他们还没有控制电视塔，就被忠于叶利钦的军队挡住了，但是已经有许多人死于战火之中。

俄罗斯议会的过激分子把政治斗争转变为武装起义，在几个小时内，他们似乎成功地控制了莫斯科。警察不是接到命令不得抵抗，就是因过于胆小而不敢抵抗；他们对星期天的进攻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抵抗。午夜前不久，叶戈尔·盖达尔在电视上呼吁莫斯科市民挺身而出，保卫他们的合法政府，就像他们在两年前所做的那样。

叶利钦莫名其妙地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他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克里姆林宫，据传说，他经过几个小时的说服，使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确信，应使用军队对付那些在议会大楼设

置路障的议员。第二天，1993年10月4日黎明，军队和坦克包围〔686〕了俄罗斯白宫，正像他们在1991年8月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他们进攻了大楼，迫使残余的议员们出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像机拍下了全部过程，向世界展示了坦克向大楼上层开火以及穿着肮脏衣服的议员们在军队的警戒下从大楼里鱼贯而出的情况。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被逮捕。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人民得到了选举新议会的机会，但是要根据新的章程，而不是苏联时期的老章程。叶利钦在挫败了旧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后，提交了一个新的宪法以供全民投票来批准。它基本上是宪法会议制订的那个宪法草案，但删去了给予前"自治"共和国的某些特殊优惠。新的立法机构有不同的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下面的最高苏维埃由两院制立法机构所取代，一个是下议院，它像沙皇时代一样称做俄罗斯国家杜马，一个是上议院，即联邦院，它有些类似美国的参议院，但它的权力要小一些。

选民们以近60%的多数票通过了新宪法，但是国家杜马的选举却使俄罗斯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国家杜马的半数议员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另一半则按地区选出。使大多数国家感到震惊的是，由自由民主党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提出的选举名单，得到了比其他政党名单更多的选票，而该党的党纲看上去更像是法西斯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尽管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最终比自由民主党赢得了更多的议席，因为它在个别地区的选举中更为成功，但是自由民主党、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激进改革的政党——农民党和俄罗斯妇女党——的选票加起来足以使各种改革政党处于少数地位。[11]

各"民主主义"政党未能赢得国家杜马的多数议席，有几方面因素。"民主派"内部分裂、进行愚蠢的争斗。[12]叶利钦回避选举

运动，拒绝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的共产主义政党能够利用经济困难。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困难是改革者而不是以前的共产党制度造成的。

根据1993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俄罗斯议会所享有的权力要小于前届议会，一些批评叶利钦的人谴责该宪法专制。但在我〔687〕看来，他们的指责夸大其词：1993年宪法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性总统职位，但它也规定了许多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防护措施。实际上，它所包含的特点，几乎都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某个或者更多的宪法中找到。例如，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至少是名义上的权力——并不比法国总统的权力更大。

俄罗斯国家杜马成立后所通过的首批法令，包括同意赦免1991年8月未遂政变和1993年10月议会起义的所有参加者，这实际上是宣布它独立于行政首脑。叶利钦试图说服检察官否决议会的大赦，不要释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亲密伙伴，但是没有奏效。检察官阿列克谢·卡扎尼克将军命令将他们释放，然后提交了自己的辞呈。卡扎尼克不仅是由叶利钦所任命的，而且恰好也是前苏联人代会的议员，他在1989年曾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议席让给叶利钦。

国家杜马不再依法起诉前阴谋者的行动，使俄罗斯的法治可作两种解释。释放违犯前宪法的人，便难以增强法律的权威，但与此同时，杜马拥有宪法权利，可以批准大赦或赦免，而叶利钦不能否决杜马一事，强调了新宪法所提供的权力分立。此外，卡扎尼克拒绝屈服于行政的压力和杜马的决议，体现了司法独立，尽管他随后的辞职表明，这种独立性今后不可能再采用。然而，新宪法通过了它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一部宪法如果想产生效力，仅仅作为一个正式文件是

远远不够的，1993年俄罗斯宪法实施的时间还不长，因而目前还无法检验其活力。在 1994 年，叶利钦同国家杜马的关系，不像同其前任那样有那么多的风波，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不理睬杜马。宪法允许他根据政令管理国家，只要这些政令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撤销，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个权力。

然而，依法治理并未加强叶利钦对国家的控制，因为这些政令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实际上，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日益脱离了莫〔688〕斯科的直接控制。尽管叶利钦任命了大部分地区的官员，但他们总是自行其是，只要符合他们个人的或者地区的利益，他们就反对莫斯科。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一个联邦，不仅在理论上是联邦，在实际上也是如此。

到1994年底，大多数俄罗斯国有企业都正式实行了私有化，[13]但是，使很多人感到惊恐、少数人感到惊讶的是，新的所有者多数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经理。一些人非常迅速地学会了在新的准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有利可图的管理，他们常常只是把国有财产转为个人使用。其他人，特别是国家和集体农庄的经理和国防工业的经理，仍然在国家控制并享受国家补贴的旧体制中举步维艰，继续要求从预算中得到救济或施舍。

官方统计显示，如果它可信的话，生产的下降已经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在 1994 年 9 月底，工业生产仅仅相当于 1990 年 1 月的一半。然而，这个数字是有疑问的，因为很多生产数字对税务检查人员及统计人员隐瞒了。其他资料，例如通常与生产相关的电力消耗的资料，则显示生产并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下降。[14]

苏联之后的统计数字看来被人为地缩小了，就像苏联时期的生产数字被人为地抬高一样。此外，某些种类工业生产的下降不会减少日用品的供应：如果国家生产更少的坦克、导弹和潜艇，在

这些行业工作的工人的收入可能会受影响，但是人民作为一个总体并没有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

事实上，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是多数俄罗斯人仍设法克服了困难，某些人还干得十分出色。从 1994 年第一季度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情况，它显示出，有 112.7 万人每月的收入在 2.5 万美元以上！他们只占人口的 0.7%，但是统计部门认为，人口的 10%是富裕的，大约 30%属于“中产阶层”。但还有约 27%是“贫穷”的，即他们的收入在购买食品之后所剩无几，约 30%的人属于赤贫，几乎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15]

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抱怨，但当民意调查人员在 1994 年向人们询问其家庭状况时，50%以上的人回答不错或更好。然而，在同一份抽样中近 70%的人认为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16]分析人员指出，认为自己或者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的人，在 1993 〔689〕年 12 月大多投了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

到1995年初，甚至官方的统计数字都指出，工业生产的下降减慢了：1995 年 1 月，工业生产只比去年同月降低了0.7%。[17]

遗憾的是，向市场经济和法治转变的缓慢步伐，不仅因生产下降、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意识形态的多变而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因为两种社会痼疾而深受其害，这两种恶性肿瘤不但发展迅速，而且开始相依为命，相互影响：他们就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在合法职责缩小的情况下反常膨胀的官僚主义。

犯罪活动深深植根于苏联的制度之中，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只要苏联仍是一个警察国家，这种情况就不会为公众所清楚了解，尽管周期性丑闻——它通常因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而曝光——仅限于影响政府政策，或扩大

在社会边缘的夹缝中活动的范围。

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这些限制因素不再存在。但同样重要的是，人民不了解使自由经济运转的观念、惯例和道德。几十年来，苏联公民被告知，贱买贵卖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而现在，俄罗斯人却被告之，这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认识到，所有束缚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

国有财产从未像个人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它是每个人的财产，那么它就谁的财产也不是。在整个苏联时代，小偷小摸行为很普遍。但是，大规模的盗窃和贪污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还要处以死刑，因而不是很普遍。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在 1989 年和 1990 年，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军官开始把国家财产转归自己使用，开展自己的业务，并在执法部门和税务部门建立起保护网。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这个有害的过程加快了速度，政府对控〔690〕制它看来无能为力。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用法律来控制因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18]结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他们只知道，如果他们同有权势的人关系良好，他们就不可能遭到清算。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是彻头彻尾的贼，但是，国有企业的经理组建同一类型的私人公司，然后再利用其官方地位为该公司获得有利可图交易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不仅政府公务员，而且选举出来的官员、军官和警官也常常一方面继续履行公职，一方面也从事第二职业。

官方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完成哪怕是最基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履行商业合同几乎从没有提供任何保证，甚至不能保护企业家不受勒索。其结果是，提供武装警卫和其他安全服务的企业在 90年代初发展得很快。那些不能负担安全服务费用的企业便成

为绑匪勒索的对象，勒索者常常同更大的犯罪组织有关系，开始时他们要求获得利润分成，如果公司发展了，他们的要求便逐步升级，先是要求得到部分所有权，最终要求全面控制公司。

像其他社会的情况一样，不同的犯罪组织之间为控制地盘相互厮杀。被暗杀行刺的人数不断增加，某些著名人物也牵涉进去，新闻媒介对此很重视。人们常常不清楚，受害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同犯罪组织有关系，还是因为他们反对这种关系。有关的官方资料很少，也不可靠；暴力犯罪问题显然很难解决。

政府看来对解决不断增长的犯罪活动无能为力。部分原因是，杜马迟迟未能通过确认敲诈勒索为犯罪的法规，但更重要的是，犯罪团伙已经渗透到了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中。尽管政府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不再管理所有的经济活动，但是文职人员的数量却增加了。俄罗斯不仅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还增加了这些机构的人数，而前苏联管辖地区的人口要两倍于俄罗斯。总统办公室成为官僚机构膨胀的一个突出例证：到 1994 年春天，叶利钦的办公室有 2 万名雇员，其中很多人的职责与政府其他机构重叠。

在多数政府部门中，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时候，在预算紧缩期间，文职人员连续几个月得不到工资。由于常〔691〕常得不到好的指导和清楚的指令，即使很诚实的官员也禁不住尽量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谋取私利。

此外，腐败现象并未局限于政府的中下层官员。尽管证据只是一些趣闻轶事，但是多数寻求投资机会的西方商人发现，关键部门在其申请获得必要的批准和颁发执照前，通常要求他们向幕后的“顾问”付出大笔好处费。一个在州里管理一家中型国营公司的俄罗斯朋友告诉我，1992 年曾让他去莫斯科担任部长职务，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把那家公司看成是他私人的，他想完成由公

到私的转变。六个月后，一位新任命的内阁部长找到他，要求在他的公司投资 100 万美元。

“我认识‘萨沙’（即提到的那个部长，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名）已有些年了，”我的朋友说，“在他到莫斯科工作前，他一个戈比投资也没有。但在 6 个月内他就拥有了 100 万美元的现金。许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切尔诺梅尔金和叶利钦很可能不是这样。”

普遍的腐败和暗中投资还导致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严重堕落。卫生保健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很好，而现在就更糟了，某些已近乎绝迹的流行性疾病又开始流行，婴幼儿死亡率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日益下降。政府的教育、科研和文化资金严重削减，使许多知识分子不知所措，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工作保障也不复存在。在以前由国家给予补贴的部门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迅速适应由市场重新定价的局面。

俄罗斯民主发展和经济体制中的缺陷极为惹人注目，并被广为宣传，以致很多观察家都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某些良性事态发展。政治上混乱无序，但公民能够成立政党和团体而不受当局的横加干预。尽管有政府的压力，资金不足，新闻界仍保持着自由。到国外旅行最终不再受到政府的限制，虽然它取决于每个公民的财力。尽管在 1993 年 10 月发生了流血冲突，但仍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并举行了选举，由反对总统的政治反对派所支配的议会也建立起来。甚至释放了那些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并允许他们恢复其政治生活。新的宪法为人权提供了基本保证，尽管司法制度还无法为履行这一保证提供充分依据，警惕的新闻界和有献身精神的人权战士保证，有组织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可能再被秘密掩盖。

〔692〕

甚至极为糟糕的经济也出现了某些光明。几个月时间内，价格放开了，商品短缺的现象无影无踪，仿佛有魔力似的，在城郊的商业中心，人们实际上发现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而且不需要排队等候。按照传统标准来看，价格很高，很多人买不起新的奢侈品，但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积极主动的那些人是买得起的。当我们在 1992 年 9 月访问莫斯科时，丽贝卡的一个俄国朋友抱怨说，新鲜菠萝的价格太贵。丽贝卡说，她在莫斯科住了 11 年，但直到我们一年前离开时，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卖菠萝的。她的朋友笑了，并说："看看我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什么都买不着的时候，我们从不为价钱着急，而现在价钱却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

尽管俄罗斯人对广泛的经济混乱、失去工作保障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感到焦虑，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适应了新的环境。虽然只有少数人——最多占人口的 1/3，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但是根据民意调查，赞成回到过去的人甚至更少。人们所进行的真正争论是改革的速度、方式和公平程度，而不是其方向。

1994 年秋天，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诞生近 3 年时，在很多人看来，它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仍存在大量问题，但多数问题看来正在逐渐得到解决，或至少是有所改善。尽管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既不亲密也不热乎，但已不像一年前那样一触即发了。资金从国家流出的情况似乎有所缓和，一些资金已开始回流。在 1994 年的春天和夏天，外国投资开始增长，人们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实际支持以稳定卢布，〔693〕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减少 1995 年预算赤字的话。

1994年夏天的谨慎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整个秋季，卢布都在急剧贬值，资金开始重新流出。[19]恰在此时，在 12 月，当叶利钦总统命令俄罗斯军队进攻车臣时，国家陷入一场政

治和道德危机，主张分离的车臣政权宣布了独立，武装其人民，并抗拒莫斯科的命令达三年时间。但在考察那场冲突的根源和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苏联统治下的另外14个共和国中发生的事件。

波罗的海国家情况

在所有脱离苏联的国家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显然为独立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它们以前曾是独立国家，一旦它们在1989年决定坚持恢复独立，它们便开始有组织地重整或建立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机构。

然而，经济转轨并不是很容易，特别是在立陶宛，它的经济没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么发达。经历了一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之后，前共产党——它现在更名为拉脱维亚民主劳动党——控制了议会（塞马斯）。接着，在1993年2月，那个曾经公然反抗戈尔巴乔夫，领导多数立陶宛共产党人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在直接选举中当选为立陶宛总统。[20]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曾领导国家取得独立，他成为保守的反对党家乡联盟的领导人，该党由非共产党的萨尤季斯残存分子所组成。虽然有些报纸声称，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一事是“回到共产党统治”，但这是不公正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更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前苏联的共产党。

不久，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经济开始好转，而立陶宛则依然如故，但这并没有及时地阻止那里的政治转变。独立后不久举行的[695]自由选举选出了由更年轻更激进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许多曾推

动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落选。1992年1月，爱沙尼亚议会以前运输部长季特·维亚希取代埃德加·萨维萨尔任总理，但他只担任了9个月总理就被32岁的马尔特·拉尔所取代，拉尔是一位历史学家，领导着基督教民主党。到1992年秋天，爱沙尼亚采用了新宪法，根据其规定进行了议会选举，以更年轻更激进的伦纳特·梅里取代阿诺尔德·吕特尔任国家元首，他成为新爱沙尼亚的第一任总统。[21]以前的共产党在新的议会中没有得到一个席位。

拉尔担任了两年总理，在这段时间内，他稳定了货币，撤除了多数关税壁垒，减少了补贴，以此促进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拉尔的党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他的两个盟友抛弃了他，选举之后几个月，即在1994年10月，爱沙尼亚议会迫使他辞职，并以看守政府取而代之，直到1995年3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22]通过那些选举，更关注社会保护而不是改革速度问题的政党控制了爱沙尼亚议会，并使季特·维亚希重新担任了总理。[23]

尽管个别党派的命运起伏不定，但是，爱沙尼亚的基本政策路线已经确立，政坛上党派结盟情况的变化不可能使之有很大的改变。

拉脱维亚直到1993年才举行了它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并也由此导致了政府的变化。只有战前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及其后裔才有资格投票，因而34%的拉脱维亚居民不能参加选举。即使如此，选票也分散到了很多小的党派中，由两个最大政党组成的联盟仅仅控制了议会（塞依马）中的微弱多数，即100个议席中的51席。其结果，新任总理瓦尔迪斯·比尔卡夫斯仅仅担任了一年总理，他在第二年夏天被迫辞职，以支持曾担任其副总理的马利斯·盖利斯。

爱沙尼亚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并成功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它同芬兰和北欧国家密切合作去做这些事情。爱沙尼亚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第一个建立了本国的货币克朗，并成功地使它同德国马克相关联。虽然在1992年曾出现短时间的通货膨胀，但不久物价上涨率就降到每月4－5％，这一上涨率在西欧是非常高的，但比起其他前苏联国家达两位数的每月物价上涨率来说，它还是适中的。〔686〕

拉脱维亚的变化过程类似于爱沙尼亚，但它同芬兰没有那种特殊关系，其大型工业设施的私有化速度也比较缓慢。它使其货币与美元相关联，但它的通货膨胀率比爱沙尼亚更高。然而到1994年，两国经济调整中最糟糕的情况看来已经过去。爱沙尼亚该年同芬兰的贸易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同俄罗斯的贸易。俄罗斯仍是拉脱维亚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但拉脱维亚与西方和北欧国家的贸易在增长。甚至有着更多麻烦问题的立陶宛，也显示出经济更为稳定的某种迹象。

苏联解体时，苏联军队仍旧驻扎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基地中。说服俄罗斯撤走这些军队成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交界最重要的目标。立陶宛与莫斯科迅速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在1993年撤离。然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得不进行更长时间的谈判，这是由于两国拒绝让苏联占领时期移居于此的俄罗斯人自动享有公民权，从而遭到俄罗斯的抵制。协议最后终于达成，驻扎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最后一批苏联军队于1994年9月30日撤离。

公民身份问题继续影响着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北面两个国家的关系。立陶宛的人口中只有20％的非立陶宛人，它对所有居民都给予了公民权；而很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感到，他们的

民族太小，不能同化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并保持其民族特点。因此，一方面，他们没有把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赶走；另一方面，他们剥夺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并使加入所在国国籍一事极为困难。

在拉脱维亚，公民身份问题特别尖锐，因为拉脱维亚族人只占人口中的微弱多数。1992年出台的法律使1940年之后来拉脱维亚定居的非拉脱维亚人很难获得公民身份，甚至连他们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后裔也是如此。这个法律障碍激怒了很多曾捍卫拉脱维亚的权利并追求独立的俄罗斯族民主派。它也震动了西方的人权拥护者，欧洲议会推迟接纳拉脱维亚，直到它放宽了公民身份法的限制。1994年底，塞依马修改了这项法律，允许大多数现有居民在〔697〕2003年年底之前享有拉脱维亚公民身份，几个月后，拉脱维亚加入了欧洲议会。

到1995年，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似乎都渡过了最艰难的转折时期。然而，它们决不是无忧无虑。所有三个国家继续为贸易不平衡问题所困扰，俄罗斯在1994年拒绝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使这一问题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的货币在外国的交易市场上已经比较稳定了。多数人的生活标准继续下降，或停滞在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准上。虽然犯罪问题和腐败现象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是两者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逃税现象很普遍，税收日益下降，为减少预算赤字，采取了克扣养老金和政府雇员工资的办法。

然而，比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前苏联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管其内部的政治运作如何，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看来都知道其归属和目标。总的方向是西方，而对爱沙尼亚来说则是北方。不要多久，它们大约就

能达到其目的地。

乌克兰:新的东西方斗争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西部,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他们的联盟使他们在 1991 年秋天有关独立问题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票,但这种联盟是不合常理的,他们很快便分裂了。其结果是,乌克兰在它独立的头三年内没有就改革战略取得一致意见。它在经济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同俄罗斯完全一样,但在形式上更为夸张。它的通货膨胀甚至比俄罗斯更严重。乌克兰发行的代金券——打算在使用新的货币格里夫纳前当作临时货币——在 1991 年与卢布等值,但是 3 年后,它贬值为不到卢布的 1/20,此时,10 余万代金券才值一美元。

乌克兰的经济因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深受打击。俄罗斯是其主要供应者,乌克兰独立后,俄罗斯立刻开始要求乌克兰以世界市场价格支付其能源产品。每隔一定的时期,乌克兰便会积攒过多的未支付账单,致使俄罗斯中断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并总是在经过若干谈判,并支付了部分欠账后才恢复供应,但到这时候,能源供应的中断已经损害了乌克兰的工业生产,造成了消费品的短缺。

〔699〕

与此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就政治和军事问题的争论正在逐步升级。苏联军队解体时,乌克兰不仅要求得到驻扎于其领土内的陆军和空军——俄罗斯立即答应了这一要求,尽管交换军官和士兵的工作需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而且要求得到黑海舰队。

俄罗斯人一直把黑海舰队看作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也把他们自己看作俄罗斯人，但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后，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便位于乌克兰的领土之内。一开始，俄罗斯拒绝了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要求，但是后来它又同意由两国分割该舰队。谈判进行了约两年，双方达成了解决办法。乌克兰同意只拥有远少于一半的舰艇，而俄罗斯则购买乌克兰的部分所有权。然而，就使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一事的谈判在1995年继续进行。[24]

驻扎在乌克兰的苏联核力量，成为乌克兰与苏联和美国的另一个争论焦点。苏联解体时，这些核力量形式上由独联体指挥，但是叶利钦控制着"黑盒子"，并于1992年代表俄罗斯承担了正式的有效控制。尽管乌克兰政府早些时候曾同意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但是乌克兰议会拒绝授权把核武器转移到俄罗斯。

乌克兰议会企图控制核武器一事，[25]造成了它与美国之间的不和。美国在承认乌克兰独立时有一个谅解，即乌克兰遵守它与苏联所签订的战略武器协议，承担核不扩散条约的责任。1994年1月，该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双方达成了协议，乌克兰同意将导弹交由俄罗斯销毁，俄罗斯则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核电站所需燃料。[26]随后，乌克兰议会批准了该协议，1994年底，乌克兰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经常加剧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它发出了帝国主义的叫嚣，许多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700〕仍然不承认乌克兰有权获得独立，他们鼓吹由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舰队，并使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1993年7月，俄罗斯议会甚至批准了一个议案，宣称塞瓦斯托波尔"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俄罗斯联邦领土的一部分"。这就直接违背了1991年9月它通过投票所做

出的选择，当时，俄罗斯议会批准了独联体条约，承认所有独联体国家的现有边界。[27]

乌克兰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胡闹在俄罗斯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使乌克兰与俄罗斯很难进行合作，虽然这种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乌克兰不仅拒绝加入独联体的集体安全条约，而且在一开始还反对所有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1992 年 9 月，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告诉我，他甚至反对乌克兰参加非官方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如果俄罗斯也参加的话。一年后，乌克兰继任的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他曾任乌克兰东部一家导弹工厂的领导人——对修复与俄罗斯破损的关系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在基辅做东道主召开了一次会议，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协调机构。然而，他还没有做多少事就辞职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经济继续滑坡，公众的不满情绪上升了。由于随之而来的地方主义，局势变得特别危险：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各州，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许多原有的乌克兰人在文化上也俄罗斯化了，他们比住在乌克兰西部的人更为不满。然而，除了克里米亚之外，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次要因素：重工业大部分位于乌克兰东半部。那里巨大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它们不但人员严重超编，管理混乱，而且技术落后。很多企业污染严重。需要进行改革，在乌克兰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不可避免地使东部地区人民的负担格外沉重。某些观察家开始怀疑，如果地区之间相互疏远的趋势继续下去，乌克兰是否能够维持统一。

1994 年 6 月，我去基辅参加乌美联合举办的有关国家安全决定因素问题的讨论会，我发现，乌克兰的官员和学者们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是指能够有效地抵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乌克兰人则关注来自内部的威胁。他们对我们

说，民意调查显示，政治态度出现了危险的两极分化。他们感到，对 〔701〕 乌克兰独立更直接的威胁，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不是俄罗斯，尽管他们也抱怨，俄罗斯人倾向于把他们看作任性的亲戚，而不是地位平等的邻居。

最尖锐的地区问题发生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占该地区人口的 2/3 以上，在过去 200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外，它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的旅游业和黑海舰队。尽管该地区大多数人在 1991 年 12 月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但他们只是赞成从苏联获得独立，而并不赞成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人。当乌克兰经济迅速恶化、比俄罗斯更严重时，乌克兰要求得到黑海舰队一事，疏远了许多现役和退休的海军家庭，俄罗斯旅游者不再去克里米亚的旅游胜地度假，克里米亚人选举了一个要求自治的立法机关和一位要求独立的总统——很多人认为，这是它同俄罗斯重新统一的过渡步骤。

基辅政府处理克里米亚的独立倾向很成功，比它进行经济改革更为有效。它准许克里米亚在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中享有自治地位，但拒绝克里米亚脱离基辅的最终控制。在 1994 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辅和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间进行了一场"法令之战"，但是基辅当局尽力不使用武力，实际上，当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尤里·米什科夫——他于 1994 年 1 月当选为克里米亚总统——卷入与克里米亚议会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时，独立倾向似乎烟消云散了。到 1994 年底，地方议会剥夺了米什科夫的大部分权力，大大削弱了推动克里米亚独立的力量。此外，俄罗斯政府认识到克里米亚问题的潜在煽动性，他们开始设法冷却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发热的大脑。无论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拒绝同米什科夫打交道，并且重申，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1994年7月，当

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宣布该城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时，俄罗斯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正像辛菲罗波尔的克里米亚政府所做的那样。

〔702〕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克里米亚人都愿意脱离乌克兰的管辖。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的30%以上，其中包括被斯大林流放到中亚，后来大批返回故乡的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宁愿由乌克兰控制该地区，而不愿受俄罗斯的统治。

1995年3月，库奇马总统利用克里米亚的政治分裂，取消了克里米亚的总统一职，解散了地方立法机关，并命令举行新的选举。他清楚地表明，克里米亚宪法必须进行修改，删除与乌克兰宪法相抵触的条款。他的行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激起了一阵愤怒的抨击，有个右翼议员甚至在争论中焚烧了一面乌克兰国旗，但是，叶利钦政府断然拒绝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者。俄罗斯同车臣已经有很大麻烦，它不想再对公认的国家边界提出异议。

尽管在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爆发了春季危机，但是在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而相互大打出手危险比1992年和1993年要小。如果乌克兰能够解决有关黑海舰队的争端，制止其经济的下降，吸引俄罗斯游客回到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克里米亚想获得独立或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愿望很可能落空。

在1994年选举期间，乌克兰的地区紧张状况变得明显了。1993年乌克兰东部的劳工骚动，特别是顿巴斯煤矿工人的长期罢工，迫使政府准备于1994年3月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比宪法所要求的提前了一年。东部地区选举的议员主要是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人士，而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则在西部地区的所有竞选中获胜。

有七位候选人参加了6月份的总统竞选。克拉夫丘克总统的形势最为有利，但是，观察家对他能否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感到怀疑。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计票结果，克拉夫丘克得到的票数最高，但并没有过半数。他不得不同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再进行一次角逐，库奇马也得到了超过30%的选票。竞争十分激烈，克拉夫丘克的支持者指责库奇马想使乌克兰回到俄罗斯，库奇马的支持者则指出克拉夫丘克要为乌克兰的经济困境负责。7月11日，公民们参加了第二轮投票，库奇马居于领先地位。他赢得了[703]所有票数的52%，取代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然而，两人的支持者地域分明：库奇马所获票数的80%以上来自东部地区，而克拉夫丘克所获票数的87%来自3个西部省份，这3个省份中只有4%的选票投给了库奇马。

尽管在竞选期间出现了政治和地域的两极分化，但是从克拉夫丘克到库奇马的权力交接进行得很顺利。克拉夫丘克及其支持者输得很有风度，证明他们尊重民主程序。就库奇马来说，他很快使全国团结起来，决心加快经济改革，并保证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乌克兰，并且不损害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此，他反对建立任何超国家的独联体协调组织，担心俄罗斯将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应由双边协议来决定。

库奇马还立即着手改善同西方的关系。1994年11月，他正式访问了美国，强调他所保证的改革，决心实现乌克兰成为无核国家的承诺。回到基辅后，他说服议会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给予他广泛的权力以推行改革计划。他还设法筹集了大笔贷款，并从美国、欧共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了提供经济援助的保证，不久之前，所有这三方还因为乌克兰的核政策和它缺少一个可靠

的改革计划，而对是否提供援助踌躇不决。

在1995年初，乌克兰仍因依赖进口能源而负担沉重。它欠俄罗斯25亿美元，欠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款7亿多美元，但它仍未找到以出口商品归还欠账的措施。但是，乌克兰实行真正经济改革的前景十分光明、超过了它独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如果乌克兰继续进行改革，外国援助将能有效地减少其困难。

虽然在1994年的选举中出现了分裂，但其结果实际上有助于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最不忠诚的地区选举了新的总统，但这反而促使他进行经济改革，而东部的各派势力到当时为止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提醒了住在西部的乌克兰〔704〕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希望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必须避免乌克兰化的政策，并建立一个以各民族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乌克兰国家。因而在1995年，一个客观的观察家可以说，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乌克兰挺过了它独立后的最初三年，经受住了第一次民主考验。如果在乌克兰人民中能够确立一种信念，即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民族，而是忠诚于乌克兰国家，那么它肯定能够维持其独立，并最终成为重要的欧洲国家，享有与此相称的地位。

白俄罗斯：难道你想让我们走回头路？

白俄罗斯的独立看来近乎偶然，尽管少数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决心获得独立，认为独立是恢复民族生机的先决条件。白俄罗斯[28]共产党的许多官员，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领导人，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独立问题，直到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失败使他们突然失去了莫斯科的庇护人。那一打击促使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告独

立，并屈服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以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拼写白俄罗斯的国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俄语拼写国名。

然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人并不赞成独立。实际上，他们继续像从前一样统治国家，并焦虑地注视着莫斯科的所有变化，期待这种变化能使老大哥认识到应把他们拉回到大家庭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是议会主席和国家首脑（直到1994年选举出一位总统），他认为白俄罗斯应该独立——毕竟，他是独联体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但他既不能控制最高苏维埃，也不能控制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总理，克比奇是他的政治对手，他还忠实地代表着旧的官僚阶层的利益。

在1992年9月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舒什克维奇向我抱怨说，他无法迫使经济官僚采取哪怕是最初步的经济改革步骤。民族主义反对派试图以请愿书的方式——这是宪法所准许的——敦促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遭到议会的断然拒绝，议会直接违犯宪法的规定，干脆裁定该请愿书非法。然而，反对派对议会的违宪行〔706〕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对那些按照苏联时期的方式继续管理白俄罗斯经济的人，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挑战。

但尽管如此，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俄罗斯不愿再像苏联政府那样向白俄罗斯的国有工业提供补贴，尽管白俄罗斯人敦促缔结一个使它与俄罗斯结为一体的一揽子协议：建立军事同盟，建立经济协调委员会，订立有关边境地区政权的协议——它看来是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以前，外部补贴曾使白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得以运转自如，缺少外部补贴，使白俄罗斯经受了同俄罗斯一样的损伤，但却没有导致任何改革。1992年，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而这仅仅是开始。1993年，生产继续暴跌。当俄罗斯开始要求它以世界市场价格支付进口的能源产品时，白

俄罗斯像乌克兰一样，经受了债务问题的困扰。1993 年 8 月，它欠俄罗斯的债务达 3.5 亿美元，俄罗斯削减了近 2/3 的天然气供应。

白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反对改革路线，但它小心地不去得罪西方国家，就像它小心翼翼地讨好俄罗斯那样。白俄罗斯很快便同意从其领土上撤走所有核武器，甚至比协议所要求的更迅速。然而，没有进行私有化进程，使白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不那么有吸引力，它同西方的贸易受到了其支付能力的限制。

1992 年和 1993 年形成的政治紧张局势到 1994 年初达到了顶点，当时白俄罗斯议会投票罢免了议会主席舒什克维奇。随之进行了总统选举，因为最高苏维埃已经修改了宪法，设置了总统职位。舒什克维奇和他的竞争对手克比奇总理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泽农·帕赞亚克都是候选人。然而，他们都未获得成功。人民对政治争斗和经济管理不善感到厌烦了，他们投票选举了候选人中的黑马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是 1991 年白俄罗斯议会中唯一投票反对独立的议员。他作为反腐败战士和俄罗斯的朋友参加竞选，虽然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过半数票，但在与克比奇的决定性投票中，他得到了 80%以上的选票。

[707] 尽管卢卡申科善于利用公众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一旦这种情况变得明显，他所任命的人遭到批评，他就开始实行新闻管制。曾在竞选中支持他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成员辞职了，白俄罗斯在 1995 年再次陷入政治混乱之中。

很多白俄罗斯人认为，同俄罗斯更紧密的结合能够拯救他们。在总统选举前不久，克比奇总理与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签署了白俄罗斯加入卢布区的协议；俄罗斯将控制货币政策，并无偿使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但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按1比1的比

价用他们的某些地方卢布兑换俄罗斯卢布。鉴于白俄罗斯卢布当时仅值俄罗斯卢布的1/10，这种兑换显然是非常有利的。然而，由于来自两国的反对，这种谅解很快就瓦解了：多数俄罗斯经济学家和财政官员都认为，这样做代价太高，而且可能控制不住俄罗斯的货币发行量。许多白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为了有限的和一时的好处，而让俄罗斯控制其货币政策。该协议在达成一年后也未能得到履行，而且看来决不可能履行了。

难点在于，俄罗斯不愿意承担同白俄罗斯结成经济同盟的代价，因为白俄罗斯仍保持着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白俄罗斯战略地位重要，它位于历史上从西方入侵俄罗斯路线的两侧，即使如此，它也不值得俄罗斯把其资源投入一个没有竞争力的经济中。当然，渴望白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接受从属于俄罗斯的地位，刺激了俄罗斯“爱国者”的自豪感。但是，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到自豪的结果，这种喜悦便消失了。

1990年和1991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曾进行了几乎是无望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它没有成功，后来它突然看到其梦想出乎预料地实现了，然而它在政治上继续表现出无能。尽管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并不是人民阵线成员，而是个温和的而非激进的改革者，但他献身于维护白俄罗斯独立的斗争，成为人民阵线中有政治影响的希望之星。然而人民阵线从未与他携手合作，在总统选举中，人民阵线反对他当选，从而分散了改革派的选票。像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一样，人民阵线似乎总是把一个可以得到的好人变成理论上最厉害的敌人。

白俄罗斯无论如何需要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尽管那些现在从政治上控制着国家的人亟盼与俄罗斯结成更紧密同盟，但他们首先必须创造出条件使俄罗斯值得这样做。他们不可能靠莫斯科的 〔708〕

补贴来维持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因为莫斯科已经付不起了。但如果白俄罗斯建立一种有价值的伙伴关系，进行经济改革，使之能够吸引投资，它将不再需要俄罗斯——除了作为一个好邻居。

摩尔多瓦：第五纵队与老大哥

自从摩尔多瓦独立以来，在它德涅斯特河以东的领土上就发生了起义，起义从它与乌克兰接壤的北部边界不规则地延伸到其东部边疆地区。甚至在独立前，一个由俄罗斯族人所领导的分离主义政权就对摩尔多瓦"左岸"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并宣称它是独立的。[29]无论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承认这个"德涅斯特共和国"，[30]其原因，至少因为它看来只代表了该地区人口中的少数，那里的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在人数上都超过了俄罗斯人。但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第14军的领导人支持分离主义政权，并有效地阻止了摩尔多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

俄罗斯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德涅斯特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它不仅没有采取行动，控制随心所欲的第14军，甚至还对蒂拉斯波尔政权提供了经济支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就此与莫斯科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到1995年初，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将在三年内从摩尔多瓦领土上撤走。然而，虽然俄罗斯遵守了这个时间表，但此时那个分离主义政权已经为它所拥有的人数众多的军队获得了武器，这支军队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抵抗西摩尔多瓦军队占领该地区的任何企图。

尽管德涅斯特共和国的领导人声称，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摩尔多瓦俄罗斯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摩尔多瓦

"右岸"俄罗斯人的支持，那里的俄罗斯人更愿意同基希纳乌的摩尔多瓦政府打交道。他们的主要目标看来是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权，他们无情地镇压了控制区域内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文化。然而，这块飞地的经济状况在1994年迅速恶化了。地方货币很快就变得一钱不值，许多工厂关门，德涅斯特政权的困难日趋严重，甚至不能向当地的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710〕

基希纳乌和蒂拉斯波尔都有充分理由达成协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对此给予强有力的推动，1994年它倡议召开和平会谈，并建议给德涅斯特河以东地区以特殊地位。斯涅古尔总统经常与德涅斯特政权的领导人伊戈尔·斯米尔诺夫会晤，但直到1995年初仍未达成协议。然而，多数观察家认为，如果俄罗斯就此施加压力，斯米尔诺夫将不得不达成协议。

对于摩尔多瓦南部讲土耳其语的加告兹人所发动的较小的分离主义威胁，摩尔多瓦政府处理得更为成功。有一段时间，加告兹领导人曾同河对岸德涅斯特共和国的斯拉夫人政权进行合作，但是在1994年，他们与基希纳乌取得了谅解，决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摩尔多瓦领导人一方面要应付俄罗斯人和加告兹人的反叛，一方面还不得不设法回绝某些摩尔多瓦人提出的同罗马尼亚结盟的要求。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曾在1990年控制摩尔多瓦的政治生活，但在独立前它已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少数派想同罗马尼亚重新统一，但是多数摩尔多瓦人，包括较年长的人民阵线领导人更赞成独立。然而，要求与罗马尼亚重新统一的少数派运动为企图从摩尔多瓦分离出去的"德涅斯特共和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借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尔多瓦政府在1994年3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有95%反对同罗马尼亚合并。[30]公民投票使

情绪冷却下来，并使斯涅古尔和斯米尔诺夫得以进行后来的谈判。

由于受到少数派分离主义运动和收成不好的困扰，摩尔多瓦政府开始时实行经济改革的步伐很慢，尽管这看来无疑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尽管存在着国家资格问题的压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力——它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除了中亚各共和国，它是前苏联共和国中领导独立的领导人中仍然在位的少数国〔711〕家之一：米尔恰·斯涅古尔总统的地位似乎特别牢固，但他是靠政治领导，而不是靠镇压来保持这种地位。

摩尔多瓦现任总理安德烈·桑盖利领导着一个多民族的联盟，他从1992年年中开始担任总理职务。议会发言人彼得·卢钦斯基在1989年和1990年是共产党第一书记。他从1991年起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苏联共产党解散后，他回到摩尔多瓦。在1994年的选举中，他的民主农民党得到的票数最多。尽管他过去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他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但他证明是一位坚定支持市场改革的人，1994年选举后，这一改革进程加快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摩尔多瓦的改革步骤，于1994年和1995年向它提供了大笔贷款。摩尔多瓦货币从1993年底开始使用，它出人意料地坚挺，在1994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从1月份的45%下降到12月的约5%。

自1991年以来，摩尔多瓦政治领导层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面对着敌对军事挑衅和反摩尔多瓦人的暴行，它仍设法在它所控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因而，摩尔多瓦正在多民族的基础上确立它的国家资格。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因为摩尔多瓦政府不希望用军事手段击败德涅斯特河对岸的分离主义者。然而，如果领导人心胸狭隘、手段笨拙，他们的反应很可能

是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煽动民族仇恨，赶走少数民族居民，就像跨高加索地区和前南斯拉夫的情况。斯涅古尔总统及其同事们应受到称赞，因为他们坚持和解和不歧视政策。如果摩尔多瓦经济复苏，他们就可能用和平手段控制德涅斯特的分离主义者——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就把分离主义者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

格鲁吉亚:分裂的代价

格鲁吉亚分裂而争吵不休的政治派别，它的难以驾驭的少数民族，它的越来越独裁和乖戾的总统，使它自苏联解体以来陷入到内战之中。

自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于1991年5月以压倒多数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他便开始逮捕其政治上的反对派，并继续〔713〕试图以武力压服南奥塞梯人。这就导致了1991年8月的政治危机，并使他同若干主要支持者关系破裂，其中包括总理西谷阿和国防部长基托瓦尼。到1991年12月，除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家乡明里利亚之外，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起义。人们聚集到第比利斯，要求他辞职，由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人所控制的武装组织支持他们，反对派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包围了格鲁吉亚议会大厦，那里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避难所。1992年1月4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它已在“反对罪恶政权的民族民主起义中”夺取了政权，两天后，加姆萨胡尔季阿飞离格鲁吉亚，他先飞往亚美尼亚，接着又飞到闹独立的俄罗斯省份车臣，从格鲁吉亚到那里要飞越高加索山脉。[32]

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返回格鲁吉亚，组成协调委员会以统治

国家，直到举行新的选举，军事委员会设法阻止了这一企图，尽管如此，格鲁吉亚仍然因意见分歧和政权不可靠的合法性而备受折磨。尽管美国和欧共体在苏联解体时曾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由于那里的政治混乱状况，它们推迟了与它建立外交关系。在进行了几个星期反复而无效的谈判后，反加姆萨胡尔季阿派的领导人邀请住在莫斯科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回来组织新政府。1992年3月初，谢瓦尔德纳泽回到第比利斯，他赞成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各政党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10月份如期举行了格鲁吉亚的议会选举，谢瓦尔德纳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获得了总票数的近96%，当选为议会主席。

谢瓦尔德纳泽尽力团结格鲁吉亚的各个派别，并与各少数民族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然而，他没有控制两个反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缺乏约束的行动逐渐破坏了他使国家实现和平的努力。事实上，国防部长基托瓦尼未经授权，便于1992年夏天进攻了苏胡米的阿布哈兹议会，发动了一场格鲁吉亚军队难以支撑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指挥官们对谢瓦尔德纳泽心怀怨恨，因为他在任苏联外交部长期间，支持削减军备，所以他们像〔714〕某些北高加索领导人那样，支持阿布哈兹的叛乱分子，到1993年9月，格鲁吉亚军队及20多万格鲁吉亚族难民被赶出了阿布哈兹。[33]当谢瓦尔德纳泽试图结束冲突、同意从苏胡米撤走格鲁吉亚军队及其重炮以换取停火和谈判时，格鲁吉亚遭到了最终的失败。格鲁吉亚的重炮和大部分军队撤离后，阿布哈兹人违反了停火协议，对尚未撤走的格鲁吉亚军队横加蹂躏。

格鲁吉亚军队逃离阿布哈兹后，加姆萨胡尔季阿再次发动进攻，迫使谢瓦尔德纳泽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要求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允许俄罗斯有权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在此之

前，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俄罗斯帮助格鲁吉亚军队打败了加姆萨胡尔季阿，并维持了阿布哈兹边界的原状。

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谢瓦尔德纳泽领导地位的威胁随着1993年的结束而终结：1994年1月，他的遗孀宣布他已自杀。其他报道认为，他是被他的某些随从所杀，或死于其他方式，除了他的某些最狂热的支持者，人们都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死亡。然而，阿布哈兹的挑战仍然存在：阿布哈兹的民族主义者控制着整个地区，继续阻止格鲁吉亚的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政治斗争摧毁了格鲁吉亚的经济。在90年代初的混乱状况下，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1992年的工业生产实际上已经崩溃，几乎不到两年前水平的1/3。[34]1993年的经济崩溃继续发展，尽管第二年的下降不那么明显——实际上，格鲁吉亚已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准——但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

在加姆萨胡尔季阿死后，格鲁吉亚的政治仍然处于骚动之中。谢瓦尔德纳泽设法击退了逼迫他辞职的多次尝试，并逐步削弱了迄今一直实行自治的军事组织的影响。1993年，田吉兹·基托瓦尼和杜扎巴·约瑟利亚尼——他们两人都拥有私人军队——被体面地解除了在国防委员会中的职务，基托瓦尼所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也被别人取代。后来，基托瓦尼于1995年1月被逮捕，当时他未经批准，就试图率众进攻阿布哈兹。武装盗匪——名义上归政府控制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控制住的武装——的活动渐渐减少了。当丽贝卡于1994年8月访问格鲁吉亚时，她发现人民因战争和经济混乱而感到精疲力竭，但他们对局势的好转仍抱有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起来并维持下去。〔715〕

事实上，在1995年初，局势似乎就显示出了某种光明的前景，比苏联解体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光明，尽管困难问题仍然不少。阿布哈兹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实体，它仍然阻止格鲁吉亚难民返回家乡，但是俄罗斯的和平调解人强制实行了停火，在联合国调停人倡议下举行的对话也对解决问题提供了某种希望。格鲁吉亚货币就像20年代初通货急剧膨胀时期的德国马克一样，几乎毫无价值：1994年底，1美元可以购买100多万格鲁吉亚"息票"。犯罪团伙和腐败的政府官员仍在掠夺经济中所剩无几的财富。政治活动继续保持反复无常和高度个人化的特点。然而，战争停止了，并存在着开始重建过程的机会——如果能够避免再次爆发严重的自相残杀的冲突。

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面临的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比他就苏联军备问题与西方达成协议、以便使戈尔巴乔夫获得改革机会的工作更为艰难。但是，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宽容和他所具有的礼貌的美德引入他的国家，那么，他将名垂青史，不仅是作为结束冷战的政治家，而且是作为近代格鲁吉亚国家之父。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民族仇恨的代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不仅支配着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关系，而且支配着两国的国内政治。亚美尼亚武装在该飞地的行动日益左右事态的发展。亚美尼亚政府支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但它发现它的政策和经济愈来愈取决于该地区的事件。尤其是，亚美尼亚政府不能迫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的好斗分子同阿塞拜疆人讲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都不能使它们的经济恢复正常。

军事成功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领导人敢于抵制要他们妥协的呼吁。苏联解体时，该飞地的战争加剧了，几个月时间内，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就击败了被派去对付他们的阿塞拜疆 〔716〕 军队，并强迫阿塞拜疆族人逃走。他们还经阿塞拜疆领土开辟了一个走廊，以保持同亚美尼亚的陆地联系。这些行动迫使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族人离开了家乡，这还不算以前被从亚美尼亚赶走的那些人。[33]

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失败，导致了不止一届巴库政府的倒台。独立后不久，1992 年 2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村庄发生了大屠杀，阿亚兹·穆塔利博夫总统被迫辞职。在 6 月份进行新的总统选举前，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混乱。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布尔法兹·叶尔切贝是位大胡子的东方学专家，他获得了 60%的选票，人民阵线在 1991 年 1 月曾被苏联军队赶下台，现在重新控制了阿塞拜疆政府。

然而，叶尔切贝担任总统职务只有一年，就被迫逃离巴库，以免遭到其政治对手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阴谋策划，盖达尔·阿利耶夫——他曾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在 80 年代离开了苏联领导层——在叶尔切贝离开后终于在 1993 年 6 月控制了巴库政府。几个月后，他安排了另一轮总统选举，并宣布他获得了 98%以上的选票。[34]

阿利耶夫靠着镇压和灵活的策略维持其地位。他试图动员多数派别支持他，但却压制政治反对派和新闻媒介。他舍弃了作为共产党人的过去，宣布了市场改革政策——然而，这一改革难以实现。尤其是，他把阿塞拜疆的经济前途押在了某个国际财团数

十亿美元的合同上，这家由外国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打算开采里海下面的石油蕴藏。然而，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宣称拥有里海海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还要求任何输出石油的管道都应经过俄罗斯领土。1995 年仍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和谈判。

正当石油交易为阿塞拜疆的未来展现出某种希望的时候，其经济自独立以来却一直在急剧下降，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复苏的迹象。

〔717〕 亚美尼亚甚至经历了更加灾难性的经济混乱。由于阿塞拜疆的抵制，陆路运输路线大多中断，再加上格鲁吉亚的混乱以及国家还没有从 1988 年毁灭性的地震中恢复过来，所有人都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然而，私有化和其他改革措施在亚美尼亚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官方资料显示，亚美尼亚经济在 1994 年开始恢复。据说，工业生产比前一年上升了1.8%，国家收入上升了2.6%。但要使人民感受到他们凄惨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改善还需假以时日。[57]

然而，比起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亚美尼亚在独立的头三年在政治上十分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 1991 年当选为总统，此时他仍是总统，尽管到 1994 年亚美尼亚的反对党派变得更为活跃，并开始要求他辞职。他也开始使用高压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例如，在 1994 年 10 月的政治危机期间，他对反对派达什纳克党颁布了临时禁令，借口是它包庇从事政治暗杀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达什纳克的领导人否认这一指责。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之前，人们很难看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使它们的经济或政治得到稳定。1995 年初，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开始生效，但此前的所有的调解努力

都失败了。早些时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接受了一项建议，但它却遭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的亚美尼亚领导人的拒绝。因而对抗仍在继续，对于数百万跨高加索地区的人民来说，对抗不停止，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中亚：实行改革的国家

民族问题困扰着所有前苏联共和国，而哈萨克斯坦所存在的问题是其中最严重的。哈萨克人在独立后控制了权力杠杆，但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中却是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数量几乎同哈萨克人一样多，这个国家也是其他许多民族的家园，例如伏尔加日耳曼人、维吾尔人、乌克兰人和朝鲜人。毕竟，这里在斯大林时代是被流放民族的主要收容所之一，赫鲁晓夫曾将数百万居〔718〕民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北部从事农业，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牧场。其结果是，多种民族最终散布在这个国家，俄罗斯人口在北部占优势，而哈萨克人口则在南部和东部占优势。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敌视确实很可能使国家分裂。

1992年，我问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什么因素使他领导中亚各国加入了独联体，尽管他强烈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条约。他回答说，一俟三个斯拉夫共和国决定脱离苏联一事变得明显，他就意识到，如果苏联分裂为一方是斯拉夫语民族，一方是突厥语民族，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尽管他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联盟，但他仍敦促中亚各共和国加入独联体，以防止形成排他性的斯拉夫—基督教集团和突厥—伊斯兰教集团。

他没有说出来、但却很明显的因素是，这种两极分化将使哈萨克斯坦极其难于保持它的国家统一。某些俄罗斯人已经煽动并吞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1990年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已提议将它作为斯拉夫人联合体的一部分。[38]纳扎尔巴耶夫继续成为赞成加强独联体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并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之有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从未从属于俄罗斯。

在国内，尽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自己是哈萨克人的领导人，但他一再向非哈萨克人，特别是俄罗斯人保证，他们在哈萨克斯坦也不是外人。然而，一些人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开始离开那里，因为实际上，政府倾向于在关键岗位上更多地任用哈萨克人，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人。此外，纳扎尔巴耶夫热情地鼓励散居在国外的哈萨克人返回故乡。不仅邻近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而且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新疆也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在集体化所导致的饥馑中，许多人逃离了新疆。1992年，纳扎尔巴耶夫主办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哈萨克人会议，阿拉木图的名称现在正式采用哈萨克语来拼写，而不是俄语拼写的旧名。鉴于该会议已经为哈萨克人所了解，年轻的哈萨克斯坦显然十分鼓励哈萨克人移居该国。

实际上，在俄罗斯人离开后，哈萨克族的人口继续增长。独[720]立时，哈萨克族人口仅略高于俄罗斯族人，但是三年后，官方统计显示，哈萨克人约占44%，而俄罗斯人只占40%。

尽管哈萨克斯坦拥有广阔的领土，拥有在前苏联共和国中仅次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但它所经历的经济困难与其他共和国是相同的：高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普遍的混乱。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进展比俄罗斯更缓慢，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比其他共

和国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寻求外国的投资。外国投资比他所希望得要迟缓，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但也是因为哈萨克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合作，便难以建立起出口工业，而俄罗斯并没有始终进行合作。例如，哈萨克斯坦西部油田的开发推迟了，当时俄罗斯就建设输油管道的问题提出了不合情理的要求。

尽管有这些问题，哈萨克斯坦仍然保持了政治稳定，比多数前苏联共和国更稳定。纳扎尔巴耶夫保持着国家权威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尽管他在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方面更开明，超过了中亚各国多数领导人所能允许的程度。然而，哈萨克斯坦的新闻界却不像俄罗斯那么自由，许多报道反映在 1994 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有欺诈、操纵和篡改行为。新议会甚至比其前任更不接受纳扎尔巴耶夫的意见，1995 年 3 月，宪法法院裁定 1994 年的选举无效，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议会，并宣布举行新的选举。直到 1995 年，纳扎尔巴耶夫似乎更多地是靠着机敏的政治策略和掌握舆论的能力来进行控制，而不是用压制的手段，但他在 1995 年的行动使很多人怀疑他已渐渐趋向于经常使用南方国家所共有的独裁方式。

尽管纳扎尔巴耶夫竭力扩展哈萨克斯坦与前苏联以外国家的联系：他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与土耳其和德国的直接航线，发展了与美国政界和企业界领导人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认识到，他的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一考虑不仅仅是 [721] 由于其地理位置及该国的俄罗斯人。问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能够取代俄罗斯的地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38]除了民族问题的考虑之外，这一因素还促使纳扎尔巴耶夫一再试图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的资

格。显然，哈萨克斯坦宁愿同作为更大组织一员的俄罗斯打交道，而不愿使两国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排他性的双边关系基础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纳扎尔巴耶夫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地位的建议，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拒绝或者忽视。但是到1995年，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看来正在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逐步明确其关系。1995年1月，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了16个双边协议，其范围从军事关系一直到经济合作。[39]协议规定，俄罗斯可以继续租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试验区。原则上，这种做法近似于将两国军队合并，它在哈萨克斯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为军事协议做了辩护，他指出，哈萨克斯坦不能够单独操作那些试验设备，而且它从租借中得到的收入有助于改善其经济状况。此外，他知道，敌视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新设立的军事机构也没有好处，毕竟它的多数军官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忠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分为二。

协议还规定设立关税同盟（在最初的独联体协议中就包括这一规定，但一直没有实行），但还不清楚何时开始实施，因为它规定“如果双方相互提供无条件保证，使‘单一关税空间’的外部边界得到有效和可靠的保护”，将取消对它们共同边界的控制。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附带条件，为其控制加盟国家的外部边界辩护。

1995年1月，协议朝着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迈出了一步，但纳扎尔巴耶夫无疑是想以此巩固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如果能够实现，它们将消除俄罗斯人占优势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不满。在关键问题上，纳扎尔巴耶夫毫不退让：他拒绝允许双

[722] 重国籍，这是俄罗斯的主要要求之一。反之，他提出了合理的两

国公民登记程序以及保护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居民如果选择了俄罗斯国籍，就将被作为侨民对待。

在莫斯科签署协议时，纳扎尔巴耶夫说，这些协议证明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欧亚联盟”的想法是可行的。[41]我没有那么自信。在我看来，这些协议（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经谈判所达成的其他协议）似乎证明，在前苏联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双边协议，而不是超国家组织。

哈萨克斯坦东面的小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也不再使用俄语拼写国名，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最出色的改革者，尽管它比多数国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更多。它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基础设施尚未发展到苏联欧洲部分各共和国的水准。与它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是俄罗斯，而不是其中亚邻国，它的经理和行政官员几乎都不是吉尔吉斯人。但它也是唯一一个不是由前共产党官员担任领导的中亚共和国：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1990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当选为总统，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曾多年在科学研究院工作。

阿卡耶夫为吉尔吉斯斯坦设计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它可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俄罗斯的方案相媲美，但是他的任务更为困难。该国的立法机构更感兴趣的是维持旧的制度，而不是改变它，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大部分掌握在前共产党官僚的手里，他们对吉尔吉斯人的民族抱负很冷漠。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哈萨克斯坦更受局限：它位于景色优美但是难以进出的山区，夹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它远离通常的海上贸易路线。古代有从欧洲到中国

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旅行，它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角落，但是它同现代贸易关系不大。

[723]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各共和国中第一个发行自己货币的国家，但是它的货币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货币那样有实力，甚至比俄罗斯的卢布贬值得更快。它欢迎外国进行投资，认为金矿业和旅游业很有前途——吉尔吉斯斯坦常被称做中亚的瑞士——但它距有希望的市场过于遥远，妨碍了出口的发展。

独立前，吉尔吉斯斯坦就存在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在南部地区发生过流血暴乱，但是自从独立以来，一直保持着民族间的和平。实际上，阿卡耶夫一直坚持给所有居民以公民权，并且平等地对待他们，这使吉尔吉斯斯坦某些主张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然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有些俄罗斯族人开始离开。但多数人没有走，如果得到适当的经济机会，大批人出走的情况似乎不会出现。在1992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以前的伏龙芝）期间，我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管理着一家出租车公司。他说，俄罗斯的亲戚劝他离开吉尔吉斯斯坦，但他决定不走。"我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国家。"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情况不是很好——共产党人仍然拥有太多的权力——但是俄罗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而且我在这里的事业正在取得进展。"

几个月前，他从德国买了一辆用了五年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并把它一直开回比什凯克。"你能买到备用零件吗？"我问他，我知道直到1991年，即使苏联汽车的零件在莫斯科也很难买到，而外国汽车的零件根本就买不到。

"没问题，"他回答，"如果我需要某种零件，我就打电话给在

德国的朋友，他就在下趟飞机把它捎来。”显然，他用德国马克支付货款也不成问题，因为吉尔吉斯货币是可兑换的，尽管它在贬值。

在 1992 年，俄罗斯的企业家可能已表现出过早的乐观，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困难则加剧了，经济困难在 1994 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作为阿卡耶夫追求民主的酬劳，外国同意提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不足以补偿普遍的生产崩溃。阿卡耶夫指责议会阻挠必要的改革，并安排于 1995 年初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随着经济继续恶化，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开始攻击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新闻自由。一项新的国家秘密法律甚至禁止报道有关物价上涨、牲畜死亡和道路状况的消息。[42] 〔724〕

1995年2月和3月，吉尔吉斯斯坦公民选举了新的议会，但是新议会看来几乎不可能比旧议会做得更好。在一个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国家里，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简直太陡峭了，以至于代议制机构不可能攀登到顶点。

中亚：独裁专制制度

其他三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反对任何试图建立民主政体的努力。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独裁者所控制，他们采取了比苏联后期的统治者更加严厉的高压手段。塔吉克斯坦遭到内战的破坏，结果使那里也出现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

乌兹别克斯坦是三国中最大的国家，它由伊斯兰·卡里莫夫统治，他在担任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开始确立自己的权威。1990 年，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向我保证，他欢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负责的反对党”，并以意志党作为例证。然而，乌兹别克

斯坦独立后，他镇压了所有与共产党竞争的党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共产党自1991年也改名为人民民主党。意志党和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不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受到折磨和监禁，而且在1994年，乌兹别克特工人员还开始在其他国家绑架乌兹别克人权活动分子和反对党领导人，并把他们带回塔什干审问。

尽管在1994年进行了新议会的选举——它现在称做最高议会，而不是最高苏维埃——但是唯一允许存在的“反对党”也在卡里莫夫的控制之下。新议会看来根本不可能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卡里莫夫的确已宣称乌兹别克斯坦将向市场经济迈进，并于1994年开始对小商店实行私有化，但是国家继续实行从前那种管理方式。在外交事务方面，它力求与前苏联以外的国家建立联系，只要这种关系不影响卡里莫夫的独裁统治，它还同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一起，组成了很多经济联盟，其中多数没有什么影响。

[725] 经济统计数字表明，乌兹别克在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经济衰退没有它的邻国那么严重，但是那些统计数字很值得怀疑。官僚们一贯捏造棉花生产数据，他们在整理汇总统计数字时，决不可能受事实的约束。独立的观察家能够发现，没有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乌兹别克的经济比它邻国的情况更好。

与此同时，对苏联时期的生态破坏，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整治措施。咸海日益干涸，化学工业和棉花生长对它造成了损害。虽然5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在1994年1月和1995年2月两次开会研究咸海的未来，但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土库曼斯坦——它们两国抽走了需要留在咸海中的大部分水——都不愿意减少水的消耗量。[43]棉花单一经营——民族主义者对此曾长期加以反

对——仍然是经济的支柱。

土库曼斯坦保持着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僵硬的专制独裁制度——甚至在莫斯科已宣布改革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仍阻止任何反对派的发展——并且在那里搞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总统的画像随处可见，鼓励人们佩带有他的肖像的毛式徽章。任何萌芽状态的反对活动都被警察行动迅速镇压下去。1994 年，尼亚佐夫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据报道，99.9%的人投票赞成不需要举行原定于 1997 年的改选，而是让他的总统任期延长到 2002 年。

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状况比其多数邻国要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有更出色的管理。巨大的天然气蕴藏使土库曼斯坦具有现成的出口产品，尼亚佐夫用出售天然气的所得来支撑经济。1994 年，他宣布了在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方案，但它进展缓慢，看来不可能允许发展真正的私营经济，因为那将减弱尼亚佐夫对国家的控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尼亚佐夫对许多俄罗斯人想在土库曼斯坦得到特殊优惠的企图加以抵制，反之，他建立了与伊朗及西方的联系。例如，土库曼斯坦是第一个成为北约和平伙伴的中亚国家。然而，这种联系不太可能转变为普通民众更大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状况。尽管除了俄罗斯之外，土库曼斯坦比其他前苏联共和国赚取〔726〕外汇更容易，但尼亚佐夫政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是，它足以避免可导致起义的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的状况。

塔吉克斯坦是苏联最穷的共和国，也是运气最坏的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不久，它就陷入内战，数万人伤亡，数十万人成为难民，屠杀取代了经济发展。

内战开始于1992年，交战双方一方是一直统治着国家的共产党官员，一方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联盟。共产党的军队最终赢得了战争，它得到了应政府要求而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某些帮助，但是反对派继续在国外进行政治上的反对活动，并从阿富汗——很多支持伊斯兰复兴党的人在那里避难——进行武装袭击。

现在，俄罗斯的边防军继续保卫着它同阿富汗的边界。战斗是零星的和小规模的，但它继续存在。1994 年，联合国倡议塔吉克政府代表与在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举行会谈。尽管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反对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不能在 1994 年 11 月的总统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而它拒绝承认埃莫玛利·拉赫莫诺夫当选为总统的合法性。因此，当塔吉克斯坦进入 1995 年时，它的停火协议很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打破。

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要完全依靠俄罗斯，才能继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存在。俄罗斯军队保卫着它与阿富汗的边界，俄罗斯还是它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尽管数量很少。在非俄罗斯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只有塔吉克斯坦继续使用俄罗斯卢布，某些官员还谈到将俄罗斯与塔吉克的经济合为一体。然而，莫斯科对承担维持塔吉克生存的负担持怀疑态度，它鼓励尽力找到一种办法，以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

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在其近邻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政府以〔727〕及某些中亚国家的政府常常以此为例，说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行为对于该地区的稳定造成的威胁。更靠近那里的人们对此坚信

毛拉统治持怀疑态度。因此，指责他们代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该地区的进攻，似乎主要是共产党官员的一种借口，以利于他们牢牢掌握权力，并把穆斯林的信徒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即在塔吉克斯坦，穆斯林抵抗组织在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斗争中与倾向西方的民主党派结成了同盟，

就塔吉克斯坦而言，战争看来难以停止，国家也难以得到再生的机会，除非现在的统治者听从劝告，同这个国家的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俄罗斯军队或许能够阻止全面内战再次爆发，但它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该国的战争。如果俄罗斯能以撤走军队、取消经济支持——除非现政权与其对手达成妥协——相威胁，那么，俄罗斯就能够最有效地维护它自己的利益，维护该地区的利益。

俄罗斯的少数民族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在推翻了苏联的统治之后，在其少数民族的处理方面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曾鼓励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要求更大的自由，以削弱叶利钦的权威，利用这一契机，俄罗斯联邦的很多地区开始要求享有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区领导人更关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征税权以及在俄罗斯议会上院中的地区代表形式，但有些人也企图获得独立。

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位于伏尔加河流域，是人口最多的自治共和国，也是最富裕的共和国之一，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和发达的工业基础。它的首都喀山一度曾统治俄罗斯，但自从伊凡雷帝占领喀山后，它就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然而，讲土耳其

〔728〕语的穆斯林鞑靼人既想保持他们的语言，又想——直到苏联时期仍然如此——保持他们的宗教，尽管莫斯科定期进行俄罗斯化和反伊斯兰教运动。1989 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鞑靼斯坦的 360 万人口中，48％是鞑靼人。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鞑靼斯坦都比 1991 年独立的某些联盟共和国更大。

苏联解体时，鞑靼斯坦最初拒绝签署联盟条约，它所选择的地位是"与俄罗斯联邦有联系的主权国家及国际法主体"，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与俄罗斯有特殊联系的独立国家，而不是其组成部分。为了强调其特殊地位，该共和国领导人控制了鞑靼斯坦的国有资产，甚至拒绝将税收交给俄罗斯联邦。

叶利钦政府在同鞑靼斯坦打交道时，交替使用威胁和谈判两手。最后，在 1994 年，叶利钦与鞑靼斯坦总统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鞑靼斯坦得到近于完全自治的地位，但是要求它交付若干联邦税，并收回它关于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声明。该条约在俄罗斯和鞑靼斯坦都引起了争议。在俄罗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拒绝接受同俄罗斯的一部分订立条约的想法，而在鞑靼斯坦，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仍然为彻底脱离俄罗斯而斗争。但是条约没有改变，它看来为同那些仍对其地位感到不满的其他俄罗斯地区解决争端提供了一个样板。

不幸的是，莫斯科用来处理与喀山关系的方法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它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发生在车臣，高加索一个很小的共和国。1994 年 12 月，莫斯科试图用军队重新控制该地区，致使那里变成了血腥的战场，并动摇了整个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人们仍将目睹其后果，并对它加以评价。车臣冲突是苏联之后俄罗斯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应对它进行更认真的而不是草率的分析。

车臣:政治的巨大失误还是独裁的复活

1991年事件恰好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开始于一连串的战斗和抵抗，并最终导致了1994年12月和1995年初的大屠杀，当时数千人被杀害，数十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车臣—印古什是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它的人口在〔729〕1989年约为130万人，它迫切要求在联盟条约的谈判中获得联盟共和国的地位，它是俄联邦中提出这种要求的政治单元之一。它也有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它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很相似。1990年，若干“非正式的”组织建立了车臣人民国民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了德佐卡尔·杜达耶夫为主席。杜达耶夫是车臣人，他在苏联军队中晋升为中将，当时他负责驻爱沙尼亚的空军基地。1991年，该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杜达耶夫开始组织和武装“国民卫队”。当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愚蠢地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8月未遂政变时，杜达耶夫取代了他们。

俄罗斯政府同意,应取代政变前的车臣—印古什政府,但它坚持应该在选举的基础上从事这项工作。然而,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为进行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用武力接管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接着,几乎没有预先通知,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竞选,就举行了“选举”,显然,那只是一个骗局。在控制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后,杜达耶夫很快就宣告独立。

叶利钦的反应是宣布车臣—印古什处于紧急状态,并派遣数百名内务部军队前往格罗兹尼,他们很快就被车臣人抓获并驱

逐。与此同时，仍然担任着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卷入到这场争端中，他命令负责内部事务的俄罗斯内务部停止在该地区的行动，说服俄罗斯议会取消叶利钦的法令。尽管俄罗斯议会拒绝了杜达耶夫企图脱离联邦的要求，坚持应保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要求严格控制该地区的武器进口，但它规定只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那里的紧张局势。

杜达耶夫则重申了他的独立要求，并且拒绝与俄罗斯当局进行任何谈判，除非它承认该共和国的独立。他继续努力武装车臣人，俄罗斯政府对执行议会通过的武器禁令似乎无能为力。车臣武装包围并封锁了车臣境内的军事基地。基地的士兵纷纷开小差，到〔730〕1992年春天，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军官还留在驻地，俄罗斯当局撤走了这些军官，并将武器留给了杜达耶夫。

杜达耶夫不仅缴获了部署在车臣的苏联武器，而且开始从其他地方得到武器。到1992年夏天，车臣已成为武器和毒品交易的主要中心。莫斯科每次试图禁止与车臣作买卖都证明是无效的，武器、毒品和钱自由地穿过防卫很糟糕的边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车臣匪帮加强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勒索商务企业，汇集违禁交易的收入，敲诈那些表面上合法的挂名老板，并用典型的黑社会方式同其对手和叛徒打交道。俄罗斯警察注意到，在杜达耶夫占领了格罗兹尼后，车臣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狂，而且组织得越来越好，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由于俄罗斯议会的阻挠以及俄罗斯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的干扰，两年多来，叶利钦试图不理睬车臣日趋恶化的局势。俄罗斯政府从未承认车臣所宣称的独立，也从未承认杜达耶夫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它的确也做过谈判的尝试。格罗兹尼的答复似乎总是同样的："只有首先承认我们的独立"，才有可能进行谈判。

然而，杜达耶夫的所作所为，仿佛就是个独立国家的首脑。他的影响扩展到车臣边界以外；他是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迫离开格鲁吉亚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避难的地方，当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重新掌权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当阿布哈兹人起义反对格鲁吉亚的控制时，他也向他们提供武器，可能还提供了战斗机。他设法在俄罗斯境内寻求盟友和"业务伙伴"，特别是在军事部门寻求，他在收买和操纵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方面通常十分有效，超过了叶利钦对它们的控制。

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既丧失了军事选择的自由，也不能施加经济压力，1994 年，俄罗斯政府试图利用车臣内部的分裂，它暗中支持杜达耶夫的对手乌马尔·阿夫土尔汉诺夫，阿夫土尔汉诺夫企图用武力推翻杜达耶夫。虽然他们得到了克格勃的继任者联邦反情报部的支持，但是阿夫土尔汉诺夫的非正规部队在离格罗兹尼很近的地方，被忠于杜达耶夫的军队所阻挡。这一挫折表明，叶利钦在控制车臣的反叛者方面并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事实上，他已开始退却，因为他的失败加强了杜达耶夫的地位，并使杜达耶夫确信，不需要与莫斯科进行谈判。〔731〕

1994年12月9日，叶利钦签署了"恢复车臣秩序"的法令，两天后，俄罗斯军队对该分裂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曾预言将迅速而轻易地获得胜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指挥官最初投入战斗的是新征召的士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车臣人似乎不费力就击退了他们的进攻，面对着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和炮击，他们保卫格罗兹尼足有两个月，军队伤亡达数千人，平民死亡或负重伤的更多。仅在格罗兹尼一地，就有10多万居民逃走，潮水般涌入邻近的共和国，

隆冬的寒冷加深和扩大了他们的痛苦。

当战争开始造成重大的伤亡、报刊和电视使俄罗斯和世界看到了凄惨痛苦、令人伤心的画面时，显然，叶利钦决定授权在车臣使用武力一事，使俄罗斯处于危机的边缘。它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虚弱，国内行政管理部门的无能以及国家的分裂。它再次使人们注意到，叶利钦易于感情冲动，缺乏权威的手段。实际上，他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误，而且为犯罪暴行开了通行证。

随着民主派在1993年12月的选举中失败，以及叶利钦受公众欢迎的程度逐渐下降，他中断了与很多早期支持者的直接联系，退到了只有少数老朋友的圈子中，其中多数人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据说，这个圈子里的人相信，在车臣的胜利能够提高叶利钦正在下降的权威，他们说服他发动了对车臣的战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他的顾问们就犯了大错，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地征服车臣，而且表现在他们错误地估价了发生在俄罗斯自身的流血杀戮的社会影响。到199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只有9%的人赞成叶利钦行使其职权的方式，只有4%的人认为他处理车臣问题是得当的。

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即叶利钦与其计划〔732〕实施者所结成的表面同盟，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至1991年的冬天“转向正确方向”一事。某些人预言，叶利钦即将下台，甚至俄罗斯也将要解体。其他人认为将会出现专制政治，从而毁灭俄罗斯来之不易的而且仍很脆弱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如果车臣人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城市搞恐怖活动作为回应，那么俄罗斯当局就可以、而且很可能以此为借口，逮捕并驱逐所有可疑分子。他们认为，俄罗斯公民所得到的少数防止任意逮捕的保障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对言论、集会

和政治活动的限制。即使这些事情不发生，很多人也担心，叶利钦的同事很可能以车臣灾难之后的政治混乱为借口，推迟或取消原定于1995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

随着1995年春天的临近，俄罗斯看来很可能向更糟的方向转化，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从国家总体来看，车臣的悲剧不仅产生了恶棍，也产生了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俄罗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科瓦廖夫，当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格罗兹尼并停留在那里时，他前往车臣，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暴行，并为此作证。从整体来说，俄罗斯的新闻媒介曾长期受到苏联政权的压制和束缚，但它在车臣问题上真正成熟了，它报道有关的事实，驳斥虚伪的政府声明。《消息报》以前是虚夸不实的宣传机器，现在它的头号标题倾向性鲜明，比大多数西方的报纸更大胆，例如"军事狂热与蓄谋的牺牲品"，"在这种战争中，甚至胜利者都将受到审判"。

只要俄罗斯还有新闻自由，政治领导人还能够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民主政治就还有机会。但是，车臣战争所激发的情绪，导致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批评叶利钦者的新的压力。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谴责了新闻媒介和谢尔盖·科瓦廖夫一类人权发言人，他的言论就像国家杜马中的某些右翼议员。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打击来自对利斯特耶夫的暗杀，弗拉基斯拉夫·利斯特耶夫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他最近受命负责俄罗斯主要的电视网，1995年2月，当他离家前去工作时，中弹身亡。没有很快找到暗杀者，但是暗杀利斯特耶夫一事，使日益严重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994年和1995年初，国家杜马的两名议员、几个著名的商人以及至少一名新闻工作者被谋杀，没有逮捕任何最终应对此负责的人。

叶利钦对利斯特耶夫被谋杀一事的反应，是罢免了莫斯科的 〔733〕

警察局长和首席检察官，并打算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然而，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反对将他们罢免，认为那是不合理的，他指责叶利钦企图用那些诚实正直的专业人员作替罪羊，而同时却放过真正的罪犯。许多民主派人士也对侵犯公民自由的倾向感到焦虑，他们不赞成以同犯罪作斗争的名义，取消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担心，独裁主义势力正在利用公众对日趋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无比义愤建立警察国家。他们甚至隐约暗示，诸如弗拉基斯拉夫·利斯特耶夫一类引人注意的暗杀很可能不是犯罪组织干的，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证明镇压是合理的，正像斯大林曾经以谢尔盖·基洛夫（许多人相信是斯大林策划的，尽管没有得到证实）被谋杀为借口，在30年代发动了血腥的肃反运动那样。

这些问题到1995年春天仍没有得到解答，但是，入侵车臣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对著名人物的暗杀，标志着苏联之后俄罗斯领导者的重要失败。俄罗斯民主派尽管勇敢地挺身而出，反对当局使用武力，但他们已普遍证明没有能力从事必要而枯燥的制度建设工作。当他们在1991年底和1992年掌权时，他们未能采取有效的步骤改革官僚体制——包括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并开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更有效的执法机构。他们企图以宏观经济学公式为指导来改革经济，而没有创立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没有考虑民意。在1993年12月的选举中，他们过分自信，把时间都用于在他们之间争论秘密计划，而没有直接而且切合实际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俄罗斯人民。

〔734〕 叶利钦总统对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习惯于避开日常的管理问题，而且从1994年起，他在少数密友的怂恿下作出了缺乏充分依据的决定。到了1995年，人民要问，他是否仍然能够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像他在过去所做的那

样——或者他是否将在耻辱中结束总统任期。不幸的是，他对选择继任人问题没有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他倾向于同他的支持者保持距离。

为了说明叶利钦在1995年的立场，我回忆起他在1992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许多人声称要为他辩护，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我避免与他们亲近，”他解释说，并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了一个圆圈，接着又从圆圈放射状地画了许多条线，就像车轮的辐条。“这样，”他继续说，“我就能在我希望的时候利用他们，但是他们不会控制我或者做我的代言人。”

在1991年和1992年，这种态度使叶利钦那些成分杂乱的追随者中的任何一派人都不能够控制他，但它也逐渐损害了他的同事们建设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党、以开展和支持改革的努力。接着，他同很多最初的伙伴分道扬镳——在1994年出版的书中，他公开贬低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叶戈尔·盖达尔等忠诚于他的人——他似乎受到一伙人的影响，他们倾向使用武力，而不是以说服和合法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的影响不但使俄罗斯的民主主义改革者感到焦虑不安，而且在国外也使叶利钦作为谈判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特别是车臣战争增加了俄罗斯再次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它将毁灭1992年和1993年所发展起来的伙伴关系计划。

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

1992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蜜月之中，它在同美国就削减战略武器的第二个协议进行谈判，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

与西方国家协调一致，国际贷款机构许诺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财政和经济援助，尽管它是有条件的。但在1993年，当俄罗斯议会中〔735〕主张强硬路线者开始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造成了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时，这种美好的感情开始破灭。

这些批评者中的某些人，例如联盟的前领导人——联盟是议会中的一个派别，曾试图迫使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利用克留奇科夫在1991年兜售的那些克格勃的虚假情报，来“证明”美国的恶毒意图。某些人甚至相信克格勃的胡言乱语是真实的，但其他人则是故意利用这些假货，并重新使用苏联宣传机器所制造出来的持敌对态度的西方形象，来挖苦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1992年，俄罗斯没有任何外国敌人，所以反对改革的人不得不制造出敌人。

俄罗斯议会1992年的议长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1990年和1991年，他是使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的推动者之一。他在1990年时曾使我感到震惊，当时他乐观地预言苏联不久就将消失，并被类似联合国那样的松散组织所取代。但是在1992年，当他看到反对叶利钦政府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他就开始指责美国伙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策划了肢解苏联的阴谋，他有一次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曾允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200亿美元以肢解苏联，但布什又违背了诺言，没有提供这笔钱。

1993年，反西方的主题受到了“右翼”“爱国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强有力的宣扬，两者的方案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论点是，前苏联地区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是西方的阴谋造成的．西方企图收买或者欺骗俄罗斯领导人肢解苏联，然后使残存的俄罗斯处于衰弱状态。他们打算断绝同西方的联系，重申由俄罗斯控制前苏联领土，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

国家，并为此使用所需要的一切手段。

俄罗斯民主主义改革者一方面拒绝使用武力，拒绝进行领土扩张，但其中一些人也开始打出了一直为“爱国主义者”所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牌。他们关注居住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内的俄罗斯族的地位，要求俄罗斯政府承担保护他们的明确责任，既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也避免因俄罗斯人大批返回造成经济和社会负担。他们特别关注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因为多数人承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并没有不公正地对待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族人，尽管那两国也宣布了最终权利。

由于超级爱国主义者的煽动，以及来自自己营垒的意见，叶〔736〕利钦开始对相邻的前苏联共和国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常常就像是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1993年选举后，民族主义者的突出表现使叶利钦的夸张言辞变得更加刺耳，但甚至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鼓励、至少是允许俄罗斯对某些国家进行恐吓。

在就俄罗斯军队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出问题举行谈判期间，叶利钦一再将撤军问题与居住在那两国的俄罗斯族人的地位问题相联系。他要求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允许其公民享有本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如果他们本人希望这样的话。他没有对驻摩尔多瓦的第14军支持分离主义的“德涅斯特共和国”的行动加以阻止，他默认了在阿布哈兹的俄罗斯指挥官对局势的干预，为了证明干预阿布哈兹是合理的，最初的理由是保护当地的俄罗斯人不受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战争的伤害。他批准了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干预，有效地保护了执政的独裁政权。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国防部还是俄罗斯外交部，都表现出相同的思想，赞成在前苏联领土范围内保持俄罗斯的霸权。在1994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叶利钦看来支持宣布俄罗斯有权在独联体国家进行

单方面干预，他当时说，俄罗斯与它们的关系不仅是“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血缘关系”，并且宣称“俄罗斯联邦肩负着主要的调解责任”。

尽管俄罗斯的某些行动已处于侵略的边缘，但是叶利钦始终拒绝对俄罗斯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尽管俄罗斯议会敦促他这样做。到1994年8月底，俄罗斯军队撤离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虽然俄罗斯仍对那里的国籍法感到不满。俄罗斯政府通过谈判，与摩尔多瓦达成了撤出第14军的协议。俄罗斯一再重申尊重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完整，不仅在双边会谈中这样表示，而且在有联合国等第三方参加的会议上也这样表示。

然而，进攻车臣一事看来表明叶利钦已改变了政策。虽然车臣在法律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使俄罗斯总统有权采取进攻行动，而如果承认车臣独立，他就无权那样做——但他诉诸武力一事表明，如果争论变得激烈，他很可能乐于在边界之外采取同样的行动。

〔737〕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可能是不必要的。要征服车臣是很困难的，这场战争在整个俄罗斯极为不得人心，这就使今后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不经受可怕的损失和破坏，俄罗斯军队甚至无法使一个小小的造反省份屈服，它怎能被用来有效地对付一个决心抵抗的独立国家呢？事实上，它在这样做时不可能不威胁到俄罗斯自身的领土完整。

1995年，俄罗斯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在俄罗斯的政治机构、经济和整个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倾向，难以有把握地预测它的短期发展。可能的事态发展是：或者当局采取进一步的镇压行动，那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自由；或者社会将经历另一次改革的阵痛。由于当局正尽力解决随着俄罗斯帝国、共产党权

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产生的错位和混乱，或许以上两者仍旧是兼而有之，

然而，有两件事情看来就像是人类的本性一样确定无疑：

1. 苏联制度不可能重建。从前允许这一制度存在的环境已经消失了，甚至在其鼎盛时期，它也竞争不过自由经济。试图走回头路——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必将失败，最终它将变为前进的压力。

2. 俄罗斯帝国不可能重建，即使俄罗斯人民在感情上依然留恋那个难以理解的过去，并受到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周期性的欺骗。只有健康的俄罗斯经济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帝国，但如果俄罗斯又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它的经济创伤就不能治愈。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对于第二种主张的反对意见，因为我从很多我尊重其判断的朋友那里听到过这种意见。他们通常这样说："你一定是又瞎又聋。难道你没有听到很多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和——甚至更为不祥的——军事领导人所说的话吗？他们不仅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而且正在为此而策划，并且愿意使用任何所需要的手段。他们不必侵略其他国家。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开始全面干预前苏联地区的事务：在塔吉克斯坦驻扎军队，鼓励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起义，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继续交战，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作出它们不可能接受的让步。他们谋求在〔738〕前苏联共和国充当唯一的'执法者'，甚至厚颜无耻地要求其他共和国为此付钱，事实上，他们当时所想的是在国外获得免费的军事基地。他们的经济政策同样是帝国式的，即要求独占从殖民

地征收的贡品。俄罗斯反对阿塞拜疆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尽管俄罗斯的公司也参与了这项交易。它把里海看作俄罗斯的内湖，而不是由若干主权国家所环绕的水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始终想重建帝国。"

这些事情大部分是真实的，但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它忽略了某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俄罗斯已经支撑不起一个帝国了，无论这个帝国是怎样建立的。如果20世纪教会我们什么事情，那就是使我们明白，帝国是一个昂贵的负担。当英国和法国抛弃了它们帝国的属国时，它们的经济得到了改善。虽然俄罗斯的顽固分子仍在唱着重建帝国的高调，但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达到这个目的财力了。正如白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所了解到的那样，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负担另一个属国，即使这个国家自愿成为它的属国。

此外，俄罗斯欺侮其邻国的大多数举动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行动使独联体成为一个国家实体变得更加困难，并使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放慢。即使俄罗斯的某些邻国被迫同意俄罗斯有权在其国内保留军事基地，享有其他特殊优惠，但它们很可能也不允许俄罗斯直接控制其内政和外交。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人指出，俄罗斯可以成为帝国，也可以成为民主国家，但不可能同时身兼二任。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俄罗斯的长期选择是处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独裁所威胁的不是其邻国，而是俄罗斯自身。试图重建帝国更可能的结果是俄罗斯的分裂，而不是对邻国的征服。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对所有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内部民族问题是主要的挑战。外部因素可能使局势复杂，也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创造它自己未来的手段。它们将保持独立，只要它们真正渴望独立，但

只有当它们决定了其身份和方向、建立起得到其人民忠诚的国家、而不是使国家变为单一民族或政治和经济小集团进行压制的工具[749]时，它们才可能繁荣兴旺。

当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推动后者的是内部改革的需要——在一条道路上汇合时，冷战结束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社会的开放，为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扫清了道路；但它只是扫清了道路，而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某些继承者，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建设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民主社会。其他国家，例如中亚的几个国家，倒退并且蜕变为僵硬的专制政权。还有一些国家因冲突和内战而分裂。但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它们拒绝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样进行迅速的转变，并且有着很多困难的问题，但它们仍有潜力加入世界经济，建设文明社会和民主制度。如果它们取得成功，它们将对其邻国产生强有力而积极的影响。

至于俄罗斯，从长远来看，它必将进行改革或者走向解体。真正的改革将需要时间——估计很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而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改革无疑会遇到挫折，但是俄罗斯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能够仅仅作为这个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实现它的潜力。与它所不能控制的世界隔离很可能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遗产，但是俄罗斯的历史遗产中并不是只有这些，如果俄罗斯想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决不能允许继续保持隔离和孤立状态。

那个开始了这一切的人现在的情况如何？从1991年12月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担任设在莫斯科的社会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的主席，它通常称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它是叶利钦强迫戈尔巴乔夫辞职时所提供的特别补偿。但即使是苏联的消失和戈尔巴

乔夫的辞职也没有停止两个人之间的竞争：戈尔巴乔夫偶尔公开提出批评，叶利钦的反应是在几个月内剥夺了基金会的大部分财产，撤消了前总统的汽车和保安人员。

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就社会问题发表他的见解，不过，他在 1992 年断然拒绝了法院要求他为一个案件出庭作证的传票，在该案件中，叶利钦对共产党的禁令受到了挑战。有时候，他甚至暗示，他可能参加预定于 1996 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竞选。〔740〕然而，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不要参加竞选，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机会。1991 年时，多数公众对他抱有敌意，现在则认为他无足轻重，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可能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莫斯科的《独立报》每月对政治观察家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评出 100 名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1994 年，戈尔巴乔夫并列第 86 名，1995 年，他根本没有进入排名。

戈尔巴乔夫的大多数朋友发现，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容易适应一个骚动的新社会。在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的震动下，年轻的外交官戴维·切克瓦伊泽曾仔细考虑自己的前途，现在他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处理维和问题，他的这一职位属于格鲁吉亚在联合国的配额。

致　谢

1989年在一次吃午饭时，纽约卡内基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维·江伯格先生第一个向我建议，在我卸任驻苏联大使后，写一本有关苏联改革的书。他的想法很合我的心意，我首先考虑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作一番评论。1991 年 10 月，我离开了莫斯科，退出了外交部门，开始筹划此书的细节。但就在此时，事态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显然，要想将它们概括进一本实用的书籍已不可能，甚至连一些日报也难以跟上这些千变万化的变革。几个星期之后，苏联终于垮台了，起初曾被认为是对当代事件进行分析的东西现在已变成明日黄花，成为对最近的过去的判决报告了。

本书对我本人经历的描述已超过了实际的需要，我本人希望如此。唯有我才能将这些经历准确而详尽地记载下来，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经历“证明”我是这些事件的中心(当然，我不是)，我只想以我个人对这些重要事件的所见所闻，尽力提供一些内幕信息。

许多人帮助我加深了解了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由于人数太多，我无法在此一一向他们致谢。尤其是我的那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 1983—1986 年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同事，他们不断地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实际的支持。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我曾经

和最优秀、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外交官员组成的集体为了唯一的使命在一起工作过，这是我的殊荣。他们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工作，然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最自信的幻想家的想象。我将此书奉献给他们，有些人对我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我未能列出他们的名字，那将是我的疏忽。我的助手理查德·库姆斯、约翰·“迈克”乔伊斯、约瑟夫·赫林格和詹姆斯·科林不仅管理着驻莫斯科使馆，使我能以大部分时间与苏联的公民和官员们交往，而且不断地向我提出明智的建议。欧内斯廷·芒西、凯·托马斯和玛丽·弗朗西斯·威尔逊先后担任我的行政秘书，他们安排日程，使我能有效地利用时间，对各项活动做充分的准备。作为助手，迈克尔·克列切斯基、伯纳丁·乔斯林和西奥多·林特别擅长组织旅行、检查社会职能方面的计划是否妥当、帮助我进行新的联系。我希望能用更多的笔墨描述这一时期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样，我将更充分地向使馆的许多其他杰出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还要对苏联最高层官员们给予我的信任表示感谢，由于这种信任，他们在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与我交往，其后，我对撰写此书还特地去访问了他们。戈尔巴乔夫总统、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前总理雷日科夫、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许多其他官员，诸如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波波夫和索布恰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博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先生，他们不仅在我从外交部门退休后答应接见我，而且还慷慨地允许我描写与他们早期的谈话。

来自卡内基公司的补助金使我有可能集中精力研究此书，并且能到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于1992—1993 年相继独立的独联体国家作几次旅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不仅是我

早期学习苏联知识的地方，而且在我调研此书期间，像款待高级研究学者那样，为我提供了一套住房。达特茅斯大学的迪基基金会（当时由伦纳德·里塞尔博士主持）在1992年夏季拨给我一笔迪基补助金，这笔钱使我在撰写前几章时处在田园诗般的幽雅环境中。

我遇到南希·卡尼特别幸运。她很早就在我们驻莫斯科的使馆里工作，任研究助理。我还要感谢阿曼达·莱内斯，他于1992年替代南希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期。

当本书写成时，许多同事给予了鼓励并提出建议：赫伯特·S·奥肯大使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赫伯特·埃利森、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歇尔·舒尔曼、罗伯特·莱格沃尔德、理查德·埃里克森、亚历山大·莫泰尔和我一起讨论了本书的发行问题，有几个人还通读了原稿或阅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他们以及我的长子詹姆斯·G·马特洛克的意见使本书的定稿生色不少。

撰写此书所花的时间比我当初设想的要长。但是，我的文字助手菲菲·奥斯卡德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支持时时给我以帮助，使我完成了这项看上去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任务。

我得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他向我指出，我的文字中存在着比我想象得还要多的缺点。他的敏锐意见改善了此书的结构，他的蓝铅笔则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如果他准许我不时地使用那种久已渗透到我的职业环境之中的绕弯子的官僚语言的话，这无疑能证明我从前的确曾为政府工作过。

丽贝卡·马特洛克是这个故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稿编写和需要提供大量照片时，她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没有她，大部分章节不可能产生，而本书也肯定永远不能写成。

名称与音译

对苏联及其继承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叙述，总会有两件事令作者感到头疼：（1）选择和运用一种合理而又前后协调一致的音译方法，去翻译那些不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2）明确表达经常正式改变的地名和民族群体名称的概念。

关于俄语音译，我遵循一种注重实效而不是学究式的方法，我认为只要两种语言的发音许可，单词的实际译音要尽量接近。让我们来举例说明其含义。当西里尔字母“e”在字首或在元音字母之后出现时，我就把“e”音译为“ye”，因为这就是它的发音。反过来说，我通常忽略西里尔语中的“软音符号”(ь)，经常在音译时把它译成撇号(')，然而该符号在英语里是有不同含义的；同时也不可能指望不是专家的读者去知道该符号只不过是表明在其前面的辅音字母要用舌头顶住上腭发音。懂俄语的人知道“软音符号”应该在哪里；那些不会使用撇号的人就会搞错。现举一例说明两种不同的情况，即第一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姓名的拼写：我称他为“Yeltsin”，而字面上的音译却是“El'tsin”(叶利钦)。

其他在文字翻译上的例外情况包括用“y”来翻译形容词结尾的“ий”和“ый”；用“ovo”和“(y)evo”来表示“ого”和“его”的发音；在一些人的名字里，用“x”发“kc”的音——尽管在更多的文字拼写

中那些名字并不是众所周知的。我处处努力设法把独特性尽可能减低到最低的限度，有时甚至不顾文字的稳定性。例如，在拼写常见的名字“Alexander”(亚历山大)时，不拼写为“Aleksandr”。在特殊单词和名称的音译中，我在全书尽力设法做到统一。

在注释和条目索引中，我较多地使用了音译表，正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

从俄语进行音译看上去似乎很复杂，实际上，这也许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因为此书有许多名字是由其他语言而不是由俄语构成的。一些作者为了使事情简单化，把所有译名全部译成好像是用俄语写成的，这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而且会使许多不愿其文化和语言被俄罗斯化的人生厌。不同的字母表不仅能成为一个有选择性的过滤器（在归宿语言中并不省略发音），而且也能成为一个歪曲形象的哈哈镜。例如：俄语里根本没有完全与英语里的“h”相同的送气音。按照传统，这个字母就被译成“g”。但是这就意味着英国人的姓“Garrison”（加里森）和“Harrison”（哈里森）在西里尔语中是一样的，而“Harry Hopkins”（哈里·霍普金斯）则变成了“Gary Gopkins”（加里·戈普金斯）。

当提到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多瓦的人名和地名里(经常使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我决定尽力使用原来的拼写，而不用西里尔文音译。有的名字用西里尔语音译也能看得懂，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指出其替代的名称。有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的公民的名字是原先的斯拉夫人的名字，因此具有正确的西里尔语的词形，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说明。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他(她)自己是一个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或摩尔多瓦人，我就遵照他们的优先选择，采用非西里尔语的形式音译。于是，“Igor Gräzin”(爱沙尼亚语)就不是“Gryazin”(被音译的西里尔语)；“Anatolijs

Gorbunovs"(拉脱维亚语)就不是"Anatoly Gorbunov";"Petru Lucinschi"(摩尔多瓦语)也不再是"Pyotr Luchinsky"了。

对于乌克兰人的名字,我采用了乌克兰的地名形式(用"Lviv和Kharkiv"来代替"Lvov和Kharkov"),因为自从乌克兰独立以来,这些名字已开始普遍使用了。可是,基辅(Kiev)这个地名外国读者非常熟悉,我认为把它译成"Kyyiv"将是一种愚蠢的强求一致。至于人名,我努力设法用个人所喜爱的形式;但是如果拿不准的话,我就采用比较熟悉的俄语形式。

白俄罗斯语(Belarusion,以前的拼法为Belorussion)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白俄罗斯语还没有普遍纳入拉丁字母标准的音译中:一些作者使用波兰文表音法,其他作者用德文表音法,还有一些作者使用纯属个人的表音法。而且,白俄罗斯语和俄语的语音变化,在未受过东斯拉夫语训练的读者看来差异很大。例如:一个于1991年8月政变以后被迫辞职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在俄语里是"Dementei(或Dementey)",但在白俄罗斯语里就变成"Dziemyantsiei(或Dziemianciej),或者可能还有半打其他的译法。有鉴于此,我勉为其难地用俄语形式保留了大部分白俄罗斯人的名字,如果这种做法得罪了我在那里的朋友,本人在此表示歉意。

在近代,既不用西里尔语,也不用拉丁字母(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书写的名字,或者用一种以上的字母(如突厥语)拼写的名字,引起了另外的纠纷。我一般采取以下的做法:

- 对于格鲁吉亚语,我采用西里尔语音译,因为除了格鲁吉亚语需要增加区别符号这一点不容易被英语读者理解外,一般说来,这种音译和用格鲁吉亚语音译没有很大的不同。
- 对于亚美尼亚语,我也基本上用西里尔语音译。但涉

及一些在亚美尼亚的活跃人物时，就要同一些与亚美尼亚表音法结合的变化来音译。由于亚美尼亚语有"h"这个音而俄语没有，我就在人名中应该有的地方加上这个字母。而且，在亚美尼亚语中，一般的亚美尼亚名字的结尾都拼写为"—ian"，而在西里尔语中则被译成"yan"。因此，1989年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就被叫做"Harutiunian"而不是"Arutyun-yan"。如果此人不是活跃于亚美尼亚而是活跃于俄罗斯，我就用西里尔语来翻译，即使这个名字是亚美尼亚人原来的名字。"Abel Aganbegyan"这个名字的译法将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 突厥语的问题更为复杂。本世纪以来，突厥语用三种字母来书写（即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突厥语中的很多语言正处在从西里尔字母回归拉丁字母的过程之中。我以为最好不要试图去预测未来，而需用俄语音译，除了那些情况以外，即当我知道特定的人宁愿选择不同的形式时，或者要把俄语里的"g"矫正为原来的"h"，就像在"Heidar Aliev"这个名字中，是"Heidar"而不是"Geidar"那样。

阐述我对不断变化的地名的处理方法要容易得多。我尝试用我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通用的地名。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而现在则是圣彼得堡市长，工作没有变动。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但是如果他的寡妇要去看看他们在那里的公寓时，她必须去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市旧称）。斯摩棱斯克的西面是白俄罗斯，过去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称为Belorussion，现在则是Belarus。摩尔达维亚甚至在独立前就已变成摩尔多瓦，但是在1991年许多人仍继续使用摩尔达维亚这一旧称。如果这些情况使读者感到混淆不清的话，我只能申明这也曾

给我带来不少迷惑。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已具有政治的重要性，它们没有歪曲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受到忽视。

我使用“Baltic”（波罗的海的）和“Balts”（波罗的海国家）这两个词来表达地理概念而不是表达人种学或语言学的概念。因此，“Baltic states”（波罗的海各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速写名称。在语言学和人种学的观念上，只有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才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属于芬兰乌戈尔族。可是，这种差别不是我所讨论的有关政治话题，因此我让自己把“Balts”作为集合名词使用，代表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而不把它们写作“Balts and Estonians”（波罗的海国家和爱沙尼亚），这样将会更准确一些。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提到官方的头衔时，我交替使用了“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部长会议主席）和“Prime minister”（总理）这两个头衔。它们都与苏维埃共和国或苏联解体后相继独立的国家的政府首脑有关。从另一方面来说，直到1990年初为止，国家元首通常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统办公室首先是在苏联开始设立的，尔后许多共和国也设立了总统办公室，尽管不是在所有的共和国。甚至1990年在苏联创建总统办公室以前，许多新闻记者就把戈尔巴乔夫叫做“总统”，但这并不是他的官方头衔。由于总统办公室的设立通常具有改变政府机构的含义，所以在涉及国家元首的头衔时，我尽量小心谨慎，保留“主席”和“总统”之间的区别。为了避免与政府首脑混淆，我一般把后者称为“总理”，而不是“主席”，要不然我就使用全称——部长会议主席。

大　事　记

1985 年

3 月 11 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3 月 13 日： 美国副总统布什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转交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举行首脑会晤。

3 月 25 日： 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回信送抵华盛顿，其基调是和解的，但并无多少具体内容。

4 月 23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一项改革经济管理制度的决议，推选切勒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4 月 26 日： 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华沙就华沙条约正式延长 20 年达成协议。

5 月 1 日： 美国宣布与苏联达成协议，两国将就地区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

5 月 1 日： 里根致信戈尔巴乔夫，敦促和谈。

5 月 14 日：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外长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会晤。

7月1日：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罗曼诺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叶利钦被提名进入书记处。

7月2日： 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任外长；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7月3日： 美苏宣布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7月29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9月27日： 谢瓦尔德纳泽会见里根，就日内瓦会晤进行磋商。在莫斯科，雷日科夫取代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2—5日： 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一次使用了“合理足够”一词，宣布与中导协议脱钩，反对把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11月19—21日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就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达成共识。

12月24日： 叶利钦取代格里申就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1986年

1月1日：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交换新年贺辞。

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建议到2000年前全面销毁核武器。

2月11日： 苏联最有名望的政治犯之一安纳托利·沙兰斯基获释，并被驱逐出境。

2月18日： 叶利钦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2月25— 苏共二十七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其方向

3月6日：　与前届大体相似。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心病”。

4月26日：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放射性物质大面积扩散。随后几天，对直接受害地区的群众进行疏散工作。

4月29日：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中断的美苏商业航空业务开始恢复。

5月23日：　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主持会议，讨论“新思维”。

7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发表演讲，谈“政治体制改革”。

8月23日：　美国记者尼古拉·丹尼洛夫在莫斯科被捕，这是对美国逮捕一名苏联间谍作出的反应。

9月15—18日：　苏联媒体报道了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举行的“肖陶夸”会议，会上美国发言人阐述了不承认政策。

9月17日：　美国驱逐25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以示对逮捕丹尼洛夫的抗议。

9月29日：　丹尼洛夫离开苏联；被捕的苏联间谍根纳季·扎哈罗夫获准离开美国，此前他保证对间谍罪“供认不讳”，同时苏联政府同意释放政治犯尤里·奥罗夫并允许他出境。

10月11—12日：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晤，就大部分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但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

10月19日：　苏联驱逐五名美国外交官，以报复美国驱逐苏联

驻联合国使团外交官。

10 月 21 日： 美国驱逐 55 名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外交官，并确定各馆的名额限制。

10 月 22 日： 苏联驱逐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撤出了在美国使馆和总领馆的苏方雇员。

12 月 16—18 日： 当地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被一位俄罗斯人取代之后，阿拉木图爆发骚乱。

12 月 19 日： 戈尔巴乔夫在高尔基召见萨哈罗夫，通知他及妻子叶琳娜·波纳可返回莫斯科。

1987 年

1 月 15 日： 美国解除了向苏联出口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的禁运。

1 月 20 日： 苏联干扰“英国广播公司”转播站。

1 月 27 日： 推迟了三次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集中讨论了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激进主义出人意料，提出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取代“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议举行真正的选举和秘密投票。

3 月 28—4 月 1 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苏联；她强调人权，并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4 月 14 日：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莫斯科，以推动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谈判。

4 月 16 日： 舒尔茨接受苏联电视台采访。

5 月 6 日： 美苏就在对方首都建立减少风险中心问题达成协议。

5月23日：　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
5月28日：　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塞斯纳飞机突降红场。
5月30日：　亚佐夫取代索科洛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空军总司令和许多将军被解职。
6月25—26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挂钩；雅科夫列夫进入中央政治局。
7月6日：　克里米亚鞑靼人在红场游行，争取从中亚的流亡地返回克里米亚。
8月23日：　纳粹—苏联协定周年纪念日，波罗的海首府举行游行示威。
9月10日：　切勃里科夫指责西方情报机构挑动少数民族动乱。
9月10日：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发生冲突。
9月12日：　叶利钦致信戈尔巴乔夫抱怨利加乔夫并提出辞呈
10月21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与叶利钦发生冲突。
11月1日：　明斯克举行示威，纪念斯大林时期发生的库罗帕蒂大屠杀。
11月11日：　莫斯科市委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解除了叶利钦的职务。
11月18日：　叶利钦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1月23—24日：　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完成中导协议谈判。
12月7—10日：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华盛顿首脑会晤，签署了中导条约。

1988 年

2 月 8 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他计划从阿富汗撤军。

2 月 13 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动乱。

2 月 18 日： 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

2 月 24 日： 塔林举行了 4000 人参加的游行，庆祝爱沙尼亚独立 70 周年。

2 月 28 日： 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发生反亚美尼亚人的暴乱，有几人被打死，但谣传夸大了伤亡人数。

3 月 13 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信，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对改革提出了批评。

4 月 14 日：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协议在日内瓦签署。

5 月 21 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解职。

5 月 27 日： 提倡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苏共十九大"论纲"发表。

5 月 29—6 月 1 日：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会晤；里根还接见了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向学生们发表了赞扬自由的演讲。

6 月 5—12 日： 在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堂庆祝基督教在俄罗斯建教 1000 年。

6 月 9 日： 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的规定得到简化。

6 月 13 日： 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拒绝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立法院关于把其疆域划入亚美尼亚的要求。

6 月 14 日： 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各首府举行游行，纪念大规模迁徙 47 周年。

6月15日：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6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十九大讲话中建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包括公开选举和成立新的立法机构。

7月1日：　叶利钦在党代会上关于“政治重建”的建议被否定。

7月4日：　苏共代表大会公布支持政治改革的决议。

7月7日：　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发表原则声明，要求恢复乌克兰的国家地位。

7月12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最高苏维埃表决赞成脱离阿塞拜疆，改名为阿尔特萨克。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此举无效。

7月18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会议上驳斥了亚美尼亚在卡拉巴赫问题上的立场。

7月23日：　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分别爆发群众游行，抗议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7月25日：　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会议上，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8月5日：　利加乔夫在高尔基市的一次演讲中捍卫阶级斗争学说。

8月12日：　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一次演讲中宣扬“人类的共同利益”。

8月19日：　爱沙尼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计划草案。

9月8日：　拉脱维亚报纸发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行动纲领。

9月21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动乱后，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9月30日：　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获得新任命，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中央国际部。

10月1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取代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任国家名誉主席。

10月12日：　“萨尤季斯计划”在立陶宛发表。

11月16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并控制国家财产。

11月22日：　巴库发生反亚美尼亚骚乱。

11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爱沙尼亚控制该共和国国有资产的行动无效。

12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立法，准许公开选举和无记名投票。

12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宣布单方面裁军，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自由选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12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总督岛会见里根和当选总统布什。

12月7日：　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戈尔巴乔夫提前结束了对纽约的访问。

1989年

1月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置于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阿尔卡基·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临时行政长官。

1月17—　欧安会观察会议在维也纳闭幕，决定开始裁减欧

19 日：　洲常规武器谈判。

1 月 18 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将爱沙尼亚语定为国语。

2 月 1 日：　拉脱维亚语被定为拉脱维亚国语。

2 月 15 日：　最后一批苏军撤出阿富汗。

2 月 24 日：　独立的爱沙尼亚国旗于战前共和国独立日在塔林升起。

3 月 6 日：　北约和华约关于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

3 月 12 日：　里加举行群众游行，支持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3 月 26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选举；叶利钦在莫斯科大获全胜。

4 月 9 日：　苏联军队镇压第比利斯和平示威，至少打死 20 人，伤百人。

4 月 14 日：　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被撤换。

4 月 25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开除了 74 名委员。

4 月 25 日：　苏军开始撤离匈牙利。

5 月 15—19 日：　戈尔巴乔夫访华，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

5 月 18 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立陶宛成为独立国家。

5 月 25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国家主席。

5 月 29 日：　阿列克谢·卡扎尼克退出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便由叶利钦补缺。

6 月 3—15 日：　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冲突中，死伤数十人。

6 月 4—　波兰大选揭晓，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取得压倒性

18日： 多数票。

7月1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对民族冲突发出警告。

7月6日： 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发表演说，宣称苏联不会阻止东欧改革。

7月10日： 煤矿区爆发罢工浪潮，逐渐扩大并持续几个星期。

7月28日：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

7月30日： 叶利钦、萨哈罗夫和其他改革派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里组建"跨地区集团"。

8月22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宣布1939年纳粹—苏联秘密协定自即日起无效。

8月23日： 200多万人参加了"波罗的海之路"大游行。

8月24日： 以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非共产党政府在波兰组成。

8月26日： 中央委员会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出警告。

8月31日： 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将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用拉丁字母代替西里尔文字母。

9月4日： 阿塞拜疆爆发大罢工，要求承认人民阵线，恢复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控制。罢工中断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美尼亚的主要铁路干线。

9月8—10日： 鲁克在基辅举行选区代表大会，并竖起了遭禁的独立乌克兰国旗，即蓝黄旗。

9月11日： 匈牙利宣布不再阻止东德公民越过边境进入奥地利。

9月22—23日： 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赫尔市举行会晤。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苏联不再将削减战略导弹与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挂钩。

9月23日：　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指定阿塞利为国语，恢复对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主权，重申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的权力。

9月24日：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议会分别指定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为国语。

10月2日：　雷普兹格爆发大规模反共示威。

10月6日：　戈尔巴乔夫会见昂纳克，敦促东德加快改革。

10月8日：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确认独立的目标。

10月10日：　匈牙利执政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党被改组。

10月11日：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辞职；随后由埃贡·克伦茨接任。

10月23日：　匈牙利在1956年起义23周年之际被宣布成为一个共和国。计划于1990年举行选举。

10月27日：　华沙外长会议谴责“勃列日涅夫主义”。

10月31日：　克伦茨访问莫斯科，表示支持改革。

11月9日：　东德解除旅行限制，东德人越过柏林墙涌入西德。

11月10—17日：　保加利亚党首日夫科夫和其他强硬派领导人被解除领导职务。

11月12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1940年爱沙尼亚议会请求并入苏联的行动无效。

11月16日：　基希讷乌骚乱后，摩尔多瓦党的第一书记西门·哥罗素被彼特·卢钦斯基取而代之。

11月19日：　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宣布主权独立，1921年苏联占领格鲁吉亚违反了1920年的格俄条约。

11月27日：　政治局发表声明谴责立陶宛共产党企图脱离苏联控制。

11月28日： 西德总理科尔提出两德统一计划。

11月28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不顾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代表的反对，投票决定结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直接统治。

12月1日： 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二世；承诺以立法形式保障信仰自由和乌克兰天主教合法化。

12月2—3日：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会晤；戈尔巴乔夫承诺不以武力保持对东欧的统治；布什同意取消对美苏贸易的大部分控制。

12月3日： 埃贡·克伦茨和东德民盟（共）党集体辞职。

12月9—10日： 捷克斯洛伐克为期几周的街头示威之后，古斯塔夫·胡萨克辞职，非共产党主导的政府上台。

12月12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拒绝讨论废除宪法第六条，并将萨哈罗夫逼下讲台。

12月14日： 安德烈·萨哈罗夫逝世。

12月20日： 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

12月22—25日：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反共革命中垮台并被处死；苏联拒绝了反齐奥塞斯库势力要求调解的请求。

12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纳粹－苏联协定无效，但维持根据协定吞并波罗的海和其他领土的现状。

12月25—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开会，否决了立陶宛共产党获得独立的要求。

12月28—29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提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主席，瓦茨拉夫·哈维尔宣誓就任捷总统。

1990年

1月11—13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未能说服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人继续留在苏共里面。

1月13日：巴库爆发反亚美尼亚人大屠杀。

1月19日：苏军进攻巴库，解除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武装。

1月22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威胁说，如果苏军不在48小时内撤出，将就分离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2月4日：改革派组织的群众示威吸引了10万人参加。

2月5—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纲草案，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消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2月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就德国统一谈判提出2+4方案。

2月12日：西德、东德和"四大国"(美、英、法、俄)外长在渥太华会议上同意就德国统一问题开始正式会谈。

2月24日：萨尤季斯赢得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多数议席。

3月4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在共和国立法机构选举中初战告捷，但未能赢得多数。

3月11日：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恢复立陶宛独立，选举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为最高委员会和国家主席。

3月13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正宪法，建立总统制，修订宪法第六条，以消除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3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

3月18日： 东德保守的“基民盟”赢得大选。

3月30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决定开始恢复爱沙尼亚独立进程。

4月3日： 苏联正式承认对1940年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负责。

4月18日： 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发出最后通牒后，莫斯科急剧削减对立陶宛的石油天然气出口。

5月1日： 红场“五一节”游行变成反戈尔巴乔夫示威。

5月4日： 立陶宛议会认可独立的目标。

5月29日：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5月30—6月4日： 戈尔巴乔夫与布什举行华盛顿会晤，然后访问了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旧金山。

6月8日：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宣布主权独立，其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

6月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新闻自由。

6月19—23日： 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改革政策的批评家伊·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书记。

6月30日： 立陶宛议会投票赞成暂时中止实施独立宣言之后，苏联恢复向立陶宛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7月2—13日： 苏共“二十八大”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但遭到强烈的抵抗。新的政治局成员大多是平庸之辈。

7月12日： 叶利钦在党代会上以富有戏剧性的演说提出退出苏共。

7月15— 戈尔巴乔夫和科尔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举行会

16 日： 晤，就两德统一的剩余问题达成协议。

7 月 16 日： 乌克兰宣布独立。

7 月 23 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为主席。

7 月 27 日： 白俄罗斯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同意共同制定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并联合组建一个由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领导的委员会来草拟计划。

8 月 1—2 日： 谢瓦尔德纳泽在伊尔库茨克会见贝克国务卿。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8 月 3 日： 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8 月 4 日：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选举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为主席，共产党候选人落选。

8 月 9 日： 苏联部长会议宣布私有企业和雇佣工人合法化。

8 月 15 日： 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恢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其他著名政治流放犯的公民身份。但索尔仁尼琴拒绝接受。

8 月 22 日： 土库曼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25 日： 塔吉克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25 日： 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

8 月 31 日： 戈尔巴乔夫命令将雷日科夫政府计划和沙塔林计划结合起来。

9 月 2 日： 第拉斯波尔俄罗斯民族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建立一

个“德涅斯特苏维埃共和国”，并从摩尔多瓦独立出来。

9月9日：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同意联合采取行动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9月11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沙塔林213—1计划。

9月12日： “2＋4协定”在莫斯科签署，终止了四大国在德国的权力。

9月20日： 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格鲁吉亚议会立即宣布此举无效。

9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给予戈尔巴乔夫18个月的紧急状态权力，以便推行经济改革。

10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信仰自由法。

10月3日：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开始生效。

10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确立多党制。

10月1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它是否行得通感到怀疑。

10月20—21日： “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10月23日： 乌克兰总理维塔利·马索尔在群众抗议的压力下辞职。

10月25日： 哈萨克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10月27日： 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被一致选为土库曼斯坦总统。

10月28日： 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选举反共领导人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为共和国总统。

10月28日： 格鲁吉亚支持独立的政党赢得议会选举。

10月28日： 在基辅召开的代表大会将乌克兰独立定为明确目标。

10月30日： 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

11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红场进行革命日检阅时险遭暗杀。

11月13日： 叶利钦宣布，没有中央政府的合作，俄罗斯联邦不能完成沙塔林计划。

11月16日： 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递交的报告受到冷落。

11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建议大规模地改组苏联政府。

11月19日： “欧洲常规武器条约（CFE）”在巴黎签署。

11月24日： 联盟草案公布。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对它吹毛求疵。

11月29日： 联合国安理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性投票，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强行执行联合国有关科威特问题的决议。

12月1日： 鲍里斯·普戈取代瓦季姆·巴卡金任苏联内务部部长。

12月20日： 谢瓦尔德纳泽辞职，警告“独裁正在形成”。

12月25日： 雷日科夫总理因心脏病而离职。

12月26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修正案，改组政府，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

12月27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二轮投票中选举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

1991年

1月10日： 戈尔巴乔夫命令立陶宛政府恢复“宪法秩序”，否

则后果自负。

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成立。

1月13日：克格勃阿尔法小分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塔，这一事件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

1月14日：瓦连金·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

1月15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在海湾地区实施。

1月20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对立陶宛的镇压。

1月24日：美国大使转交布什致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宣称如果继续在立陶宛实施暴力，将中断经济联系。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采取行动是为了避免内战。

1月29日：戈尔巴乔夫不顾共和国和地方领导人的反对，发布命令使军队和警察的联合巡逻合法化。

1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遭到严厉批评。

2月1日：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实行经济封锁。

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以上的选民赞成独立。

2月19日：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2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

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发表演说攻击民主派。

2月28日：多国部队停止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3月1日：顿巴斯地区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并波及其他地区。

3月3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78%的爱沙尼亚人投赞成票，74%的拉脱维亚人支持独立。

3月14— 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波罗的海沿岸和

16 日： 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

3 月 17 日： 大多数参加全苏全民公决的人支持自愿联盟，但并非每一个地方都进行了公决，有些地区并不支持投票结果。

3 月 28 日： 军队开进莫斯科以阻止支持叶利钦的示威游行，但游行照常举行。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军队于第二天撤出。

3 月 31 日： 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4 月 1 日： 苏联零售价格大涨。

4 月 4 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票授予叶利钦巨大权力。

4 月 4 日： 明斯克开始大罢工。

4 月 9 日： 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4 月 22 日： 帕夫洛夫总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反危机计划"。

4 月 23 日： 9 个共和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9+1 协定）。

4 月 24 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总统选举法。

4 月 24—25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扬言辞职。

5 月 20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国外旅行和移民权。

6 月 12 日： 叶利钦在大选中以 57.3%的多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6 月 17 日： 帕夫洛夫不经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就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赋予特殊权力，此举得到亚佐夫、克留奇克夫和普戈的秘密支持。

6月20日： 美国大使警告戈尔巴乔夫提防一次夺权阴谋。
6月21日： 最高苏维埃拒绝帕夫洛夫特别授权的请求。
6月30日： 最后一批苏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7月10日： 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7月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原则批准"联盟条约"，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7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但得到的经济援助甚少。
7月20日： 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政府机关里的党派活动；共产党官员将此举视为致命的威胁。
7月28日： 戈尔巴乔夫通知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8月20日"联盟条约"签定以后，他将解除克留奇克夫和帕夫洛夫的职务。
7月30—31日： 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并单独会见了叶利钦。
8月1日： 布什总统访问基辅，私下会见了克拉夫丘克。
8月2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联盟条约""公开签署"。
8月4日： 戈尔巴乔夫赴克里米亚度假。
8月17日： 克留奇克夫、帕夫洛夫和亚佐夫与几名高级党政官员达成协议，要求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暂时让出权力，如遭拒绝，将对他实施隔离控制。
8月18日： 戈尔巴乔夫拒绝一特派代表团劝他授权采取严厉措施的要求。午夜前夕，副总统亚纳耶夫同意接管政权，签署命令接管总统权力。
8月19日： "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掌权。叶利钦声明此种接管是非法政变。

8月21日：　政变企图失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共产党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8月24日：　乌克兰宣布独立，定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全民公决。

8月25日：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政治和经济独立”。

8月27日：　摩尔多瓦宣布独立。

8月30日：　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月31日：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

9月6日：　格鲁吉亚宣布与苏联断绝一切联系。

9月6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支持它们加入联合国和欧安会。

9月6日：　列宁格勒市民投票赞成恢复该市原名圣彼得堡。

9月9日：　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21日：　亚美尼亚宣布独立。

10月11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解散克格勃，并更改其名。

10月19日：　八个共和国签署“独立国家经济区协定”。

10月28日：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叶利钦实施经济改革的权力，期限为一年。

11月4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废除苏联各部委，只保留国防、外交、铁路、电力和核能等部。叶利钦通知会议，俄罗斯不打算组建自己的军队。

11月6日：　叶利钦自任俄罗斯总理，提名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索辛为副总理。

11 月 6 日：叶利钦命令取消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

11 月 14 日：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在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同意新的国体应是一个邦联。

11 月 15 日：叶利钦颁布 10 项命令，实际控制了在俄罗斯境内所有金融和经济活动。

11 月 22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接管苏联国家银行。

11 月 25 日：叶利钦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拒绝在已议定好的邦联条约上签字。

12 月 1 日：乌克兰公民投票，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独立，选举克拉夫丘克为总统。

12 月 5 日：乌克兰议会正式撤消对创立苏联的条约的认可。

12 月 7—8 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布列斯特的一个狩猎场举行会晤，决定结束苏联，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12 月 10 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批准“独联体”协定。

12 月 11 日：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定。

12 月 12 日：中亚国家领导人在阿什哈巴德开会要求承认其在独联体内的创始国地位。

12 月 22 日：11 个共和国（除格鲁吉亚外的全部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独联体声明”。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辞职演说，俄罗斯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

人物简介

以下为本书所涉及的来自苏联及其继承国的人物。

（仅列入与本书内容有关的职务和活动）

阿艾斯提，哈尔多（生于 1951 年）：1990—1991 年任塔林市市长；“爱沙尼亚人民阵线”领导人。

阿巴尔金，列昂尼德（生于 1930 年）：经济学家，苏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雷日科夫政府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帕拉特（生于 1940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1990 年和 1991 年任撒马尔罕州党委第一书记。

阿朱别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死于 1993 年）：记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60 年代主编《消息报》，曾采访过肯尼迪总统。

阿法纳西耶夫，维克多·格里戈里耶维基（1922—1995）：记者。1976—1989 年任《真理报》主编，1987 年以后所持态度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1976—1990 年，任苏联记者协会主席；他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34年）历史学家。改革时期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现任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校长。

阿甘别吉扬，阿贝尔·格则维奇（生于1932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起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所长；80年代末、90年代初，任国家经济学会会长；曾协助戈尔巴乔夫起草1990年的雷日科夫与沙塔林改革计划妥协方案。

艾特马托夫，欣吉兹（生于1928年）：吉尔吉斯作家，其作品因曾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专横和道德败坏提出挑战而著称。他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1990年被任命为苏联驻卢森堡大使。

阿卡耶夫，阿斯卡尔（生于1944年）：物理学家、政治家。1990年当选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此前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

阿赫罗梅耶夫，谢尔盖（1923—1991年）：苏联将军。1988年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此前任苏联将领委员会主席。曾参与过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随后自杀。

阿列克谢二世（利基格尔，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929年）：1990年起任苏联东正教教父。

亚历山大洛娃，塔玛拉·阿列克谢耶芙娜：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助手。

阿利耶夫，盖达尔（生于1923年）：阿塞拜疆苏共官员。1987年戈尔巴乔夫将其开除出苏联领导层，后于1993年在阿塞拜疆东山再起，继埃尔奇贝自巴库飞回之后，阿利耶夫当选为总统。1976—1987年为政治局候补和正式委员；1969—1982

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共高级官员之前，他曾是克格勃及其前身安全局的职业官员。

阿尔克斯尼斯，维克多·伊曼托维奇（生于1950年）：军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1991年要求实行直接总统制的"联盟"成员。

安德烈耶娃，尼娜：教师。1988年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撰文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914—1984年）：苏共官员。1967年起任克格勃主席，1982—1984年间继勃列日涅夫之后任苏共总书记。

安塔纳第斯，维多塔斯·维托（生于1928年）：森林学教授，立陶宛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早期领导人之一。

安塔纳维丘斯，卡兹米拉斯·安东诺（生于1937年）：经济学家，立陶宛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安东诺维奇，伊万·伊万诺维奇（生于1937年）：苏共官员和政治学家。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92年移居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阿尔巴托夫，格里戈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生于1923年）：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现为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斯洛诺夫，卡德林金（生于1947年）：1990—1991年，任塔吉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一度出任塔吉克斯坦总统。

阿夫土尔汉诺夫，乌马尔（生于1944年）：车臣武警军官，后来从政。1991年12月，曾在苏军和内务部供职的阿夫土尔汉诺

夫作为德佐卡尔·杜达耶夫的政治对手当选为车臣一地区的地方领导人。随后，他立即以所在地区为据点开始向杜达耶夫提出挑战。1994 年，他的军队得到“俄罗斯反间局”（前身为克格勃）的支持。尽管一开始取得胜利，但最后于 10 月在格罗兹尼郊区被杜达耶夫武装击溃。

巴卡金，瓦季姆·维克多罗维奇（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政治家。1988—1990 年，苏联内务部长；1990 年为苏联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 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1991 年，任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

巴克兰诺夫，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生于 1923 年）：作家。自 1986 年起任文学期刊《旗帜》编辑。

巴克拉诺夫，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32 年）：苏共官员。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领导人之一。曾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主管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别洛诺哥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31 年）：外交官。1990—1991 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别斯梅尔特内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3 年）：外交官。1991 年接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曾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比斯考斯卡斯，埃及迪由斯（生于 1955 年）：立宛外交官。1990—1991 年，任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随后任立陶宛驻俄罗斯大使。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萨尤季斯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比斯卡夫斯，瓦尔迪斯（生于 1942 年）：拉脱维亚政治家。“拉脱维亚之路”党的领袖，1993 年议会选举中该党赢得未过半数的多数票。1993 年 7 月，比尔卡夫斯出任拉脱维亚总理，但

一年后辞职改任外交部长。

比舍尔斯，普马斯（生于1930年）：拉脱维亚律师，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布洛欣，尤里·维塔利耶维奇（生于1944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联盟"领导人之一。

波察罗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41年）：企业经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济改革计划起草人；1990年竞选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未获成功。

波格莫洛夫，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生于1927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现与尼古拉·特拉夫金合作组建俄罗斯民主党；1994年起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波古斯拉夫斯卡亚，卓娅·鲍里索芙娜：小说家、作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故事、几部小说以及一本关于美国妇女的畅销书。

波尔金，瓦列利·伊万诺维奇（生于1935年）：记者、苏共官员。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参与领导了1991年8月政变。

波纳，叶琳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生于1922年）：儿科医师，政治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夫人；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鲍文，亚历山大（生于1930年）：记者。曾撰写评论对改革派表示同情。1991年苏以恢复外交关系后出任苏联驻以色列大使。

勃拉科夫，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7 年）：企业经理。1989 年任吉尔汽车厂厂长，是新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莫斯科国土区”的共产党候选人，由于得票率不足 7%而败于鲍里斯·叶利钦手下。

布拉藻斯卡斯，阿尔吉尔达斯（生于 1932 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 年 12 月他任立陶宛第一书记时，该党脱离苏共；1991—1992 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1992 年 10 月—1993 年 2 月，任立陶宛“塞马斯”主席；1993 年 2 月起任立陶宛总统。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1906—1982 年）：苏共官员。1964— 1982 年，任苏共第一书记，然后是总书记。

布尼奇，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经济改革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

布尔布利斯，根纳季·艾德瓦尔多维奇（生于 1945 年）：哲学家、政治家。1989 年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选苏联人民大会代表；叶利钦的政治亲信，1991 年被任命为俄罗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协助起草“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

布尔拉茨基，费德罗·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27 年）：记者、编辑。1986 —1991 年任《文学公报》编辑；1989—1991 年苏联人大代表。

比科夫，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24 年）：白俄罗斯作家、政治活动家，苏联人大代表，“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领导人。

休帕提斯，维尔吉利尤斯（生于 1937 年）：立陶宛政治家。1989 年任萨尤季斯总书记；1990 年入选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任该委员会“民权与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

切物里科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23 年）：苏共官员。

1983—1989年任苏共政治局委员，1982—1988年，克格勃主席。

切霍耶夫，阿纳托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生于1950年）：奥塞梯苏共官员。苏联人大代表，"联盟"成员。

契尔年科，康斯坦丁（1911—1985）：苏共官员。1978—1985年，苏共政治局委员；1984—1985年，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第一书记。

切尔诺梅尔金，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生于1938年）：企业家、政治家。1992年12月起，任俄罗斯总理；1985—1989年，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长；1989—1992年，任国家天然气专营公司"瓦斯普罗姆"总裁。

切尔尼琴科，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1929年）：作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运动成员；1992年起任"农民党"主席。

切尔尼亚耶夫，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21年）：苏共官员。1986—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外交事务助理，现掌管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切克瓦伊泽，戴维：外交官。80年代后期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供职；1991年调回莫斯科外交部，任苏联总统办公厅礼宾司官员；现为联合国驻纽约秘书处维和组官员。

乔尔诺维尔，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生于1938年）：记者。1967年因民族主义活动被捕，获释后，开始发行日报《乌克兰先驱报》，报道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及当局对异己分子的迫害；1972年再次被捕；1985年获释。与人合作组建"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以及"鲁克"；1989年当选为利沃夫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90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

埃；1991 年 12 月竞选乌克兰总统失败。

杰缅捷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7 年）：白俄罗斯共产党官员。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 年 8 月被解职。

多勃雷宁，阿纳托利·费奥德罗维奇（生于 1919 年）：外交家。1962—1986 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86—1988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1988—1991 年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

多古泽夫，维塔利·胡赛伊诺维奇（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1991 年任苏联第一副总理。

德拉奇，伊万（生于 1936 年）：乌克兰诗人、政治家。80 年代任乌克兰作家联盟主席；鲁克成立后任该组织主席；1990 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他是乌克兰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杜达耶夫，德佐卡尔（生于 1944 年）：空军军官、车臣政治家。1990 年，当时为苏联空军中将的杜达耶夫当选为非官方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991 年 8 月莫斯科未遂政变后，他割据车臣—印古什首府格罗兹尼，宣布从俄罗斯独立，拒绝官方支持的选举。1992 和 1993 年格罗兹尼成为武器及毒品走私中心，许多俄罗斯官员认为杜达耶夫与犯罪团伙有牵连，是非法贸易的受益者。1994 年 12 月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奋起抵抗，重创俄军。车臣城市失守后，他们转入山区、农村继续战斗。

杜比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0 年）：外交官。1978—1986 年，苏联驻西班牙大使；1986—1990 年，驻美国大使；1990—1991 年，驻法国大使。

久巴，伊万（生于 1931 年）：乌克兰哲学家。1965 年提交题为

《国际化还是俄罗斯化》的报告。该报告在国外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后，他于1972年被捕，判处5年徒刑，另5年流放；1973年他同意收回以前的作品因而获释。

叶尔切贝，阿布尔法兹（生于1938年）：阿塞拜疆东方学者、政治家。1992年以"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领导人的身份当选为阿塞拜疆总统。1993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变后被迫辞职。

法林，瓦连金·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926年）：外交官、苏共官员。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

费尔申，格托尔德·英诺肯基耶维奇（生于1931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最高苏维埃改革小组成员。1990年任俄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福金，维托尔德·帕夫洛维奇（生于1932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90—1992年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费奥德罗夫，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1958年）：经济学家。1990年任俄罗斯财政部长；1991年及1992年初负责"欧洲重建开发银行"苏联方面的工作；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和财政部长；1993年大选中是"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之一；1994年起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盖达尔，叶戈尔·铁木罗维奇（生于1956年）：经济学家。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后任代总理。他被视为倡导俄罗斯经济改革计划的总设计师。1993年9月—1994年1月，再任第一副总理。1993年12月大选中领导"俄罗斯选择"。

盖利斯，马利斯：立陶宛政治家。1994年起任总理，此前曾任副总理和国家改革部长。

加姆萨胡尔季阿，兹维阿德（1939—1993年）：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但1992年1月被反对派

赶下台。1992—1993 年旅居车臣。

盖叶尔，叶夫多季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生于 1934 年）：民族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马里坦州代表，她是民主运动的成员，安·萨哈罗夫的积极支持者。

格德连，特尔曼·霍雷诺维奇（生于 1940 年）：刑警侦查员。1989—1991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前曾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共和国的腐败案提起公诉，1989 年公开起诉几起苏联高级官员渎职罪。他及助手尼古拉·伊万诺夫被指控在他们的调查中使用了非法和逼供的手段，但最高苏维埃拒绝解除使他们免于起诉的议会豁免权。

根泽利利斯，布罗尼斯拉夫斯（生于 1934 年）：立陶宛哲学家、政治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早期支持者。

格拉什琴科，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7 年）：经济学家。1989—1991 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92—1994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

基连科，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36 年）：苏共官员。1990 年之前任克里米亚州党委第一书记，后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戈德曼尼斯，伊瓦尔斯（生于 1951 年）：拉脱维亚物理学家和政治家。1990—1993 年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独立运动期间任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副主席。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31 年）：苏共官员、政治家。1985—1991 年，苏共总书记；1988—1989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 年，苏联总统；1991 年 12 月起，任莫斯科"社会和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

戈尔巴乔娃，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生于1931年）：戈尔巴乔夫夫人。自80年代中期赞助苏联文化基金，直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

戈尔布诺夫，阿纳托利（生于1942年）：拉脱维亚政治家。1988—1993年，拉脱维亚议会主席；自1991年起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戈里亚乔娃，斯维特拉娜·彼得罗芙娜（生于1947年）：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1年3月，提出弹劾叶利钦的议案。

格拉乔夫，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45年）：将军。1991年苏联空降部队指挥；1992年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金，伊戈尔（生于1951年）：爱沙尼亚律师、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组织者之一。

格列奇科，格奥尔基：宇宙学家。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莫斯科国土选区候选人，后退出提名大会，以便让叶利钦在投票中赢得一个席位。

格里申，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1914—1992）：苏共官员。1971—1986年，苏共政治局委员；1967—1985年，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1985年12月被叶利钦取代。

古本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841年）：演员、戏剧导演。1989—1991年苏联文化部长；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古本科（胡连科），斯坦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生于1936年）：苏共官员。1990—199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纳迪尔萨，伊翁（生于1949年）：摩尔多瓦作家。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早期领导人，1990年后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

主席。

哈雷丘年（阿鲁丘年），苏连（生于1939年）：苏共官员。1988—1990年，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霍尔巴尔（戈尔巴尔），穆科拉（生于1941年）：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组成员，70年代和80年代因其反政府活动不断被判刑。

霍林（戈林），米哈伊尔（生于1930年）：乌克兰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65年因民族主义活动被捕，监禁6年；1981年再次被捕；1987年获释；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组组织者之一；鲁克的创始会员；1990年被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

伊吉济扬，根里赫（生于1932年）：亚美尼亚博物馆馆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集团创始会员。

伊格纳坚科，维塔利·尼季奇（生于1941年）：记者。1990—1991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新闻发言人。

伊斯康德尔，法吉尔（生于1929年）：阿布哈兹讽刺散文作家。

伊万诺夫，尼古拉·维尼亚明诺维奇（生于1952年）：刑事侦查员。80年代，他作为苏联总检察院的警官，与特尔曼·格德连合办"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贿赂案"；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被指控为在办案过程中滥用职权，但苏联最高苏维埃动用议会豁免权使他免于刑事起诉。

伊万斯，戴尼斯（生于1956年）：拉脱维亚政治家。拉脱维亚人民阵线领导人；1990—1992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伊瓦什科，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932—1994年）：苏共官员。1989—1990年，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年，苏共副总书记。

卡布尔，努拉利：乌兹别克作家；埃尔克反对党创始人。

卡尔宁斯，奥加尔斯（生于1948年）：外交官。1985—1991年，拉脱维亚—美国协会公共事务部主任；1986年，随"肖陶夸小组"赴拉脱维亚尤尔马拉开会。1992年后，任拉脱维亚驻美国大使。

卡鲁金，阿列克·达尼洛维奇（生于1934年）：克格勃官员，1989年脱离克格勃；1990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卡里莫夫，伊斯兰（生于1938年）：乌兹别克苏联共产党官员。1990年作为乌兹别克共产党领导人当选总统；1991年12月起任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卡舒宾，根纳基：苏联将军。苏国防部发言人，1991年1月13日，发布了有关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塔的误导性消息。

卡斯帕罗夫，加里（生于1963年）：国际象棋大师、政治家。1981、1982年两度获苏联象棋冠军；1985年，击败安东利·卡尔波夫获世界冠军；民主运动早期领导人，一开始与尼古拉·特拉夫金联袂，后倒向阿尔卡迪·穆拉舍夫。

卡西莫夫，加尼：哈萨克外交官。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助理。

卡乌尔斯，阿尔伯特（生于1938年）：拉脱维亚一家农垦企业的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卡扎尼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生于1941年）：律师、法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其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了叶利钦。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

克比奇，维亚切斯拉夫·弗朗特塞维奇（生于1936年）：苏共官员。独立前后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斯丹尼斯拉夫·舒

什克维奇的政治对手；1994 年两人角逐白俄罗斯总统，都败给了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哈斯布拉托夫，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生于 1942 年）：1990—1991 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 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基里尔，阿尔比索普：俄罗斯东正教牧师。1990 和 1991 年任俄罗斯东正教对外关系部主任。

基塞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生于 1940 年）：经济学家。来自新库兹涅茨克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基托瓦尼，田吉兹：格鲁吉亚军官。1991 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警卫队队长，曾配合推翻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的行动；随后，担任格鲁吉亚国防部长，未经授权就指挥对苏呼米议会大楼进攻，导致格鲁吉亚失败。1995 年由于派散兵游勇进攻阿布哈兹而被捕。

科尔宾，根拉季・瓦西里耶维奇（生于 1927 年）：苏共官员。1986 年 12 月取代库纳耶夫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为日后的暴乱埋下了隐患。1989—1991 年任苏联人民管制委员会主席。

科马尔，德米特里（死于 1991 年）：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中一位被坦克击毙的年轻人。

科姆普列托夫，维克多・格奥尔谢耶维奇（生于 1932 年）：外交官。1991 年苏联驻美国大使。

科姆普列托娃，阿拉：80 年代"国际旅行社美国处处长。

科罗季奇，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6 年）：乌克兰诗人、编辑。1986—1991 年任《机关报》编辑。他还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活动家。

科尔扎科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安全官员。鲍里斯·叶利钦的私人保镖，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保安总监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

科瓦廖夫，阿纳托利·加夫里洛维奇（生于1923年）：外交官、诗人。1986—1991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科瓦廖夫，谢尔盖·亚当莫维奇（生于1949年）：人权活动家，1975年因发布反政府文章而被捕入狱。获释后，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俄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他曾是叶利钦的早期支持者，1994年12月俄军进攻车臣后，成为叶利钦尖锐的批评者。

科济列夫，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1951年）：外交官。1991年后任俄罗斯外交部长。

克拉夫琴科，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生于1938年）：记者。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末，负责中央电视台工作。

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生于1934年）：苏共官员、乌克兰政治家。1990—199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运行主席；1991—1994年，乌克兰总统。

克里切夫斯基，伊利亚（死于1991年）：1991年8月未遂政变中3位死难者之一。

库奇马，列昂尼德（生于1938年）：乌克兰企业家、政治家。1992年被任命为乌克兰总理，当时他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家大型导弹厂的厂长，他在那里工作了大半生。1993年9月任总理近一年就宣布辞职。1994年，他赢得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压倒性多数选票当选为总统，开始强有力的经济改革。

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24年）：情

报官员。1988—1991 年，任克格勃主席；此前负责外国情报收集；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991 年 8 月被捕，1994 年俄议会予以特赦。

库纳耶夫，丁穆哈迈德（1912—1993 年）：哈萨克籍苏共官员。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1986 年为根拉季·科尔宾取代，次年被开除出政治局。

库拉什维利，鲍里斯（生于 1925 年）：法学家。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提倡多党制观念，倡议发起运动来支持改革。

库兹米卡斯，勃罗纽斯（生于 1935 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 年后，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库兹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37 年）：将军。1989—1991 年，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91 年 8 月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

克维特辛斯基，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6 年）：外交官。1990 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拉尔，马尔特（生于 1960 年）：爱沙尼亚历史学家、政治家。1992—1994 年爱沙尼亚总理；此前曾是“爱沙尼亚传统协会”（1988）和“爱沙尼亚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始人；1992 年起为伊沙马（祖国）党领导人。

兰茨贝吉斯，维陶塔斯（生于 1932 年）：立陶宛音乐家、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主席；1990—1992 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

拉普季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34 年）：记者、政治家。1986—1990 年任《消息报》编辑；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

劳利斯庭，马留（生于 1949 年）：爱沙尼亚哲学家、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创始人之一；1990 年起，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列别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陆军将领。1989—1991 年任图拉空降师师长；1992 年后任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第 14 集团军司令。

利加乔夫，叶戈尔·库兹米奇（生于 1920 年）：苏共官员。1965—1983 年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83—1990 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85—1990 年为政治局委员。

利哈乔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06 年）：哲学家、历史学家。1987—1990 年任苏维埃文化基金会主席；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洛勃佐娃，柳德米拉：1990 年任基什尼奥夫普希金博物馆馆长。

留本琴科，库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45 年）：法学教授。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委员。

卢钦斯奇（卢钦斯基），彼得（彼奥特）（生于 1940 年）：苏共官员、摩尔多瓦政治家。1989—1990 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 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1994 年后，任摩尔多瓦议会主席。

卢卡申科，亚历山大·里加尔耶维奇（生于 1954 年）：白俄罗斯政治家。1994 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总统；1990 年后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成员。1991 年 12 月他是唯一投票反对白俄罗斯加入"独联体"的代表。

卢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生于 1937 年）：学者、外交官、政治家。1990 年后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际关

系委员会主席；1992—1994 年任俄驻美大使；1994 年后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卢卡年科，列夫科·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27 年）：接受过律师培训。1961 年因涉嫌从事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捕，在劳改营中度过 15 年；1976 年获释后，帮助组建“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1977 年再次被捕，判处 10 年监禁；1988 年获释；恢复后的“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的创始人之一。1989 年创建乌克兰共和党；1990 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1991 年 12 月竞选乌克兰总统失败。

卢基扬诺夫，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0 年）：律师、苏共官员。1989—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0—1991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鲁日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政治家。1990 年鲁兹科夫为莫斯科市行政官员，当时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他竞选市委——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92 年波波夫辞职，鲁兹科夫继任市长。他是一个有魄力的行政长官，到 1995 年他在俄罗斯已被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马卡晓夫，阿尔伯特·米希洛维奇（生于 1938 年）：军官。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 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

马赫卡莫夫，卡哈尔（生于 1932 年）：塔吉克苏共官员。1985—1991 年任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 年任塔吉克斯坦总统。

马尔金娜，塔基亚娜：记者。对 1991 年 8 月 19 日政变领导人提出尖锐问题。

马纽基昂，瓦兹根（生于 1946 年）：亚美尼亚政治家。1990—1991 年任亚美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马奇安，阿曼：乌兹别克作家。反对党“埃尔克”创始人之一。

马季诺夫，弗拉德佐（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1989 年后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马斯柳科夫，尤里（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1987—1991 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

梅德维捷夫，尼古拉：俄罗斯族。1990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时他在维尔纽斯的群众集会上支持立陶宛独立。

梅德维捷夫，罗易·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25 年）：作家、历史学家。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视为异端分子；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梅德维捷夫，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苏共官员。1988—1990 年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 年为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梅里，伦纳特（生于 1929 年）：爱沙尼亚制片商、小说家、政治家。1992 年后任爱沙尼亚总统；1990—1992 年任爱沙尼亚外交部长。

米哈伊洛夫，阿列克谢：经济学家。1991 年与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结盟。

莫伊塞耶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9 年）：陆军将领。1989—1991 年任苏维埃军委主席。

莫季耶卡，卡兹米拉斯（生于 1929 年）：立陶宛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 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穆拉谢夫，阿尔卡基·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50 年）：物理学家、政治家。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92 年，任莫斯科“武警”司令。

穆塔利博夫，阿亚兹（生于1938年）：阿塞拜疆政治家。1989—1990年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1990—199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2年任阿塞拜疆总统。

纳比耶夫，拉赫曼（生于1930年）：塔吉克籍苏共官员。1982—1985年，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91年秋东山再起，赢得总统大选胜利；但是反对派指控竞选有舞弊行为，1992年春内战爆发，几个月后纳比耶夫辞职。

纳扎尔巴耶夫，努尔苏丹（生于1940年）：哈萨克政治家。1984—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年哈萨克斯坦总统。

涅纳谢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生于1925年）：传媒主管官员。1990年前任国家电视台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

尼萨诺夫，拉费克（生于1926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1988—1989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

尼亚佐夫，萨帕尔穆拉德（生于1940年）：土库曼共产党官员。1985—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第一书记；1990年后任土库曼斯坦总统。

诺瓦兹洛夫，维克多（生于1939年）：将军。1989—1991年任苏远东军区司令官。

奥波林斯，亚历山大·米特罗法诺维奇（生于1943年）：矿业工程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与戈尔巴乔夫角逐主席之职。

奥布霍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37年）：外交官。1990—1991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国事务；此前为

战略核武器谈判专家。

奥尔洛夫，尤里·费奥多罗维奇（生于1924年）：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1976年因组织“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团”而被捕入狱，1986年获释，以换回在纽约被捕的克格勃官员。

奥西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于1931年）：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90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奥斯科茨基，瓦连金：民主运动政治活动家。

奥佐拉斯，罗姆阿尔达斯（生于1939年）：立陶宛政治家。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创始人之一；1990—1991年，立陶宛副总统。

帕尔姆，维克多（生于1926年）：化学家、爱沙尼亚政治家。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团”创始人之一。

潘金，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1931年）：外交官。1990—1991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抵制“八月政变”，事后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

帕提亚舍维利，朱姆贝尔（生于1939年）：苏共官员。1989年4月他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发生暴力游行事件，许多人被打死；因调动军队干预而成为替罪羊，几天后被解职。

帕夫洛夫，瓦连金·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37年）：经济学家。1989—1991年任苏联财政部长；1991年任总理；1991年8月未遂政变后被捕，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彼得拉科夫，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生于1937年）：经济学家。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年任“市场

研究所所长；1990 年任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顾问；1991 年 1 月因对戈尔巴乔夫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而辞职。

彼得罗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991—1992 年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1993 年后任国家投资公司总裁。

彼得卢申科，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生于 1950 年）：军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入“联盟派”，反对实行总统制。

皮亚谢娃，拉里莎·伊万诺芙娜：经济学家。积极倡导经济改革；1992 年起在莫斯科市政府主管私有化问题。

普列汉诺夫，尤里·谢尔盖耶维奇：克格勃将军。1989—1991 年任克格勃人事保护局局长；1991 年 8 月与政变组织者合作，将戈尔巴乔夫软禁于克里米亚。

波洛兹科夫，伊万·库兹米奇（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1990—1991 年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

波尔托拉宁，米哈伊尔·尼基法罗维奇（生 1939 年）：记者、编辑。1986—1987 年任《莫斯科新闻》编辑；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叶利钦的非正式政治顾问；1990—1991 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传媒部长。

波波夫，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生于 1936 年）：经济学家。《经济问题》编辑；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91 年当选为莫斯科市长，但于 1993 年辞职；现为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

波特尼科夫，维塔利：记者、政治观察家。

普里马科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生于 1929 年）：政治学家、苏共官员。1985—1989 年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90—1991年为政治局候补委

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委员会委员；1992年后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

普列汉诺夫，亚历山大（生于1938年）：记者、作家，专写针砭时弊的文章，特别是自1990年后，鼓吹以武力维持苏联；1995年主编右翼报纸《明天》，其前身为《今天》。

普隆斯基涅，卡兹米拉（生于1943年）：经济学家、立陶宛政治家。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年任立陶宛总理；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被攻占前夕被解职。

普戈，鲍里斯·卡尔洛维奇（1937—1991年）：苏共官员。1984—1988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90—1991年任苏联内务部长；1991年未遂政变后自杀。

拉希多夫，沙拉夫（死于1983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拉斯普庭，瓦连金·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1937年）：作家。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

列文科，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生于1936年）：苏共官员。1989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顾问，负责联盟条约谈判。

罗基昂诺夫，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将军。1989年4月指挥军队进攻第比利斯和平示威群众，造成严重伤亡。

罗曼诺夫，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生于1923年）：苏共官员。1970—1983年任列宁格勒市党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3—198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他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对手，戈尔巴乔夫任

苏共总书记后不久即被迫退休。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生于 1927 年）：导演、大提琴家。1974 年由于支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迫出国，此后他成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团长；1989 年后不断回国在俄罗斯举办音乐会，包括 1991 年 8 月政变期间的一次戏剧性插曲。他赶回莫斯科，为聚集在俄罗斯白宫周围的叶利钦支持者演奏大提琴曲。

卢比克斯，阿尔弗莱兹（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立陶宛共产党强硬派领导人，反对独立运动。1991 年 8 月因支持政变而被捕。

鲁茨科伊，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47 年）：空军将军。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支持叶利钦为主席；1991 年 6 月当选为俄罗斯副总统，1992 年开始反对叶利钦，1993 年企图在俄罗斯夺权；1993 年 10 月俄罗斯议会大楼遭炮击后被捕；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吕特尔，阿诺尔德（生于 1928 年）：爱沙尼亚政治家。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独立运动期间直到 1992 年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

雷日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9 年）：经理、苏共官员。1985—1990 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1991 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

里诺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0 年）：教授。1989 年以莫斯科奥将尼基兹航空研究所所长身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团”创始成员、叶利钦早期盟友。1992 年后出任俄驻法大使。

萨格捷耶夫，罗阿尔德·吉纽罗维奇（生于 1932 年）：航天科学

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89年作为一航天研究所所长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安·萨哈罗夫的亲密盟友、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萨哈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1922—1989年）：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1986年12月从高尔基流放地获释后，发挥了日益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于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逝世前，他是"跨地区代表团"创始人之一，民主运动中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

桑盖利，安德烈（生于1944年）：摩尔多瓦政治家。1990—1992年，任摩尔多瓦农业食品部长；1992年组建"全国共识政府"，此后一直任摩尔多瓦总理。

萨维萨尔，埃德加（生于1950年）：爱沙尼亚哲学教授、政治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2年任爱沙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中心党领袖。

沙赫赖，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956年）：俄罗斯政治家。1990年当选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叶利钦的早期盟友；1992年起任俄罗斯副总理；1994年前任国家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1993年任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1993年12月大选中该党赢得了俄国家杜马19个席位。

沙波什尼科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生于1942年）：空军将军。1991年8月反对政变企图，事后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长，后成为独联体武装部队司令。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34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1990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8月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经济改革计划。由于该委员计划未被采纳，他抛弃戈尔巴乔夫，成为叶利钦的谋士。

谢尔巴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生于1949年）：经济学家。1991年任苏联副总理。1991年6月随普里马科夫和亚夫林斯基赴华盛顿解释经济改革计划。

谢尔比茨基，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1918—1990年）：乌克兰共产党官员。1971—198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71—1989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舍宁，奥列克·谢苗诺维奇（生于1937年）：苏共官员。1990—1991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人事工作。曾支持1991年8月未遂政变。

谢瓦尔德纳泽，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生于1928年）：格鲁吉亚政治家。1985—1990年及1991年11—12月任苏联外交部长。1992年3月起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首脑。

什梅列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于1936年）：经济学家、作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推动民主运动，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

索辛，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51年）：经济学家、政治家。1991年起任俄罗斯政府负责社会政策的副总理；俄统一和谐党领导人；1994年起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索斯塔科夫斯基，维亚切斯拉夫：1989年任高级党校校长，民主运动活动分子。

舒什克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弗维奇（生于1934年）：白俄罗斯物理学家、政治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年担任白俄罗斯议会副主席；1991年8月未遂政变后，当选为白俄罗斯议会议长，并以这一身份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宣言，随后成为独立的白俄罗斯国家元首。1994年初被迫辞职，年底竞选白俄罗斯总统

失败。

西古阿，田吉兹（生于 1934 年）：格鲁吉亚政治家。1990 年 11 月起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1991 年 8 月被加姆萨胡尔季阿解职。此后他加入了反对派联盟，将加姆萨胡尔季阿赶下台，邀请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执政。

西拉耶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生于 1930 年）：工程师、企业家。1990—1991 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八月政变"后负责苏联经济部门和共和国间经济协调委员会，直到 1991 年 12 月。

西塔里扬，斯捷潘·阿拉马伊索维奇（生于 1930 年）：经济学家。1989—199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年起任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

斯科里夫，拉里莎·帕夫洛芙娜（生于 1939 年）：乌克兰戏剧导演、政治活动家。1990 年她作为"鲁克"会员从基辅区入选乌克兰议会；1991 年 12 月支持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取代鲁克领导人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出任总统。

斯涅古尔，米尔恰（生于 1940 年）：摩尔多瓦政治家。1989 年通过语言法案时，他是摩尔多瓦议会议长。1990 年，当选为摩尔多瓦总统。

索布恰克，阿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7 年）：法学教授、政治家。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团"和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1991 年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1991 年起任"民主改革运动"（DDR）主席团成员。

索科洛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生于 1911 年）：陆军将领。1987 年鲁斯特驾驶"塞斯纳"飞机突降红场之后被解除苏联国防部长职务。

索洛缅采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13年）：苏共官员。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理；1983—1988年任共产党管制委员会主席；1971—1988年间先任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

索洛维约夫，尤里·菲利波维奇（生于1925年）：苏共官员。1985—1989年任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失败后，以上两职位均被解除。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生于1918年）：俄罗斯作家。1973年发表《古拉格群岛》，批评由列宁创建、由斯大林将其塞满的劳改营，因此被剥夺苏联公民权，被迫流亡。从1976年起直到1994年回到俄罗斯之前，他一直住在美国。1990年他以《重建俄罗斯》为题发表长文，建议解散苏联，创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北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斯拉夫国家。

斯坦凯维奇，谢尔盖·鲍里索维奇（生于1954年）：历史学家、政治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筹组"跨地区代表团"，推动民主运动；1990—1991年任莫斯科市委副主席；1992年起任俄罗斯政府国务秘书，1994年起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斯坦凯维休斯，谢斯洛瓦斯（生于1937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1992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斯塔尔科夫，弗拉基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生于1940年）：记者。《论据与事实》编辑；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支持新闻自由。

斯塔罗杜勃茨耶夫，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31年）：农

业经济学家。图拉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苏联农民联合会主席。1991年8月未遂政变期间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月被捕，随后获释，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斯塔罗伏伊托娃，加利娜·瓦西里耶芙娜（生于1946年）：民族学家、政治家。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团”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任叶利钦民族问题顾问；“过渡经济研究所民族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欧洲》报编辑。

斯捷潘诺夫，特伊姆加兹（生于1934年）：1985—1990年在苏联外交部任爱·谢瓦尔德纳泽的私人助理；自1992年供职于格鲁吉亚总统办公室。

苏霍德雷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932年）：外交官。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为苏联外交部美国司高级官员。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经常担任苏联领导人的英语翻译。

苏来曼诺夫，奥尔扎斯·奥马罗维奇（生于1936年）：哈萨克诗人。1989—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协会”抗议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核试验；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劲敌。

塔拉申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生于1937年）：外交官。1987—1991年任外交部总秘书处处长；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秘密联络员。

捷尔-彼得罗相，列翁（生于1945年）：亚美尼亚政治家。1990年当选为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任亚美尼亚总统。

特雷霍夫，弗拉基斯拉夫：记者。国际电讯社代表，1991年8月政变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共产党的前途向戈尔巴乔夫提

出质问。

特雷尔亚．伊奥西普（生于1943年）：宗教活动家。1962年因多项罪名被捕入狱。80年代初组建“先行团”，呼吁“乌克兰天主教”合法化；后再次被捕，判处有期徒刑。

济霍诺夫，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生于1934年）：经济学家。1989年从塔吉克斯坦某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盟”派积极分子。

吉洪诺夫，尼古拉（1905—1993年?）：苏共官员。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被雷日科夫取代。他在政治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对手。

济贾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生于1926年）：企业家。199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卡里宁机械加工厂总经理，苏联国有企业、工业、建筑、通讯设备协会主席；1991年8月未遂政变期间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当月被捕，随后获释，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特拉夫金，尼古拉，伊里奇（生于1946年）：俄罗斯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989年3月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1991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供职；1993年12月当选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特雷季亚科夫，维塔利：记者。1990年起任《独立报》编辑。

则雷特利，朱拉勃·康斯坦丁诺维奇（生于1934年）：格鲁吉亚艺术家、雕刻家。他是一位多产艺术家，曾把一件雕刻作品捐献给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附近一个公园里。许多其他作品屹立于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主要城市。

茨普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生于1941年）：作家、哲学家。

图列耶夫，阿曼格尔基（生于1944年）：哈萨克族。1990年任克莫

罗沃州苏维埃主席；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 年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失败。

乌尔马尼斯，冈基斯（生于 1939 年）：拉脱维亚经济学家、政治家。1993 年 7 月被拉脱维亚议会选为拉脱维亚总统。

巫安努，伊翁·斯皮里顿（生于 1935 年）：摩尔多瓦戏剧导演、舞台设计家。1990 年任摩尔多瓦文化部长，摩尔多瓦人民阵线领导人。

尤斯曼霍扎耶夫，伊纳姆宗（生于 1930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1983 年接替拉希多夫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1988 年 1 月被解职，随后被指控犯有贿赂罪。

尤素夫，弗拉基米尔（死于 1991 年）：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中死难的一位年轻人。

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1908—1984 年）：苏共官员。1976—1984 年任苏联国防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

维亚希，蒂特（生于 1947 年）：爱沙尼亚一工厂经理、政治家。1989—1992 年任爱沙尼亚运输部长；1992 年任爱沙尼亚总理；1995 年 4 月他领导的联合阵线赢得了爱沙尼亚议会大选，从而再度出任总理。

瓦西多夫，艾尔金：乌兹别克诗人。乌兹别克艾尔克的创始人之一。

瓦利亚利，瓦伊诺（生于 1931 年）：爱沙尼亚籍苏共官员。1989—1991 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瓦连尼科夫，瓦连金·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3 年）：陆军将领。1991 年他作为苏联陆军司令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为 1991 年 8 月 18 日在克里米亚围困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小组成员。

维利霍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生于 1935 年）：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戈尔巴乔夫科学政策顾问之一；1989—1991 年

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

维吉罗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利尔·奥格利(生于1930年)：阿塞拜疆籍苏共官员。1990年1月"人民阵线"掌权时，他是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随后被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取代。

维什涅夫斯基，谢尔盖（死于1988年）：记者。70、80年代《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家。

弗拉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1932年）：苏共官员。1990年5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败给了叶利钦。1988年后，他曾经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此前为苏联内务部长。

沃尔科高诺夫，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生于1928年）：陆军将领、历史学家。1990年当选俄罗斯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支持叶利钦的第一位苏联将军。1991年8月未遂政变后，他领导一个委员会审查、公开秘密档案。

沃尔科夫，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生于1929年）：政治学家。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3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及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成员。

沃尔斯基，阿尔卡基（生于1932年）：苏共官员、政治家。1989—1990年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管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1991年为"民主改革运动"组织者之一；1992年后任"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主席，是"平民联盟"政党的领导人。

沃龙佐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34年）：生物学家。1991年被任命为苏联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当时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中唯一的非共产党成员。1991年未遂政变中他是反对紧

急状态委员会夺权企图的唯一的内阁部长。

沃罗特尼科夫，维利·伊万诺维奇（生于1926年）：苏共官员。1975—1979年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2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1983—1988年任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88—1990年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83—1990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

沃兹涅先斯基·安德烈（生于1893年）：俄罗斯诗人。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指责他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但他始终拒绝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写诗；在共产党掌管下的文化机构中积极支持改革。

乌尔夫松斯，马夫里克斯（生于1918年）：拉脱维亚政治学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员。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23年）：苏共官员、外交官、哲学家。1973—1983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87—1990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1990年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1991年为“民主改革运动”创始人之一；1993年后任奥斯坦尼克电视公司经理。

雅科夫列夫，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1930年）：记者、编辑。1986—1992年任《莫斯科新闻》编辑；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92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亚库宁，格列勃·帕夫洛维奇（生于1934年）：俄罗斯东正教牧师、政治犯。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叶利钦的早期盟友。

亚纳耶夫，根纳季·伊万诺维奇（生于1937年）：苏共官员。1990年12月当选为苏联副总统，此前担任过共青团和贸易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991年8月参与政变领导层，之后被捕。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亚林，维尼亚明·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40年）：尼知尼·塔吉尔的一位工人，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1991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活跃分子。

亚罗申科，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46年）：经济学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支持叶利钦出任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

亚夫林斯基，格里戈里（生于1952年）：经济学家、政治家。1989—1990年供职于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1990年任俄罗斯副总理；1991年9—12月任苏联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后，任莫斯科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席；1993年参与创建亚博卢集团；1994年后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亚佐夫，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生于1923年）：陆军将领。1987—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91年8月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企图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权；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获释；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准予特赦。

叶戈罗夫，阿列克谢：克格勃官员，1991年8月受克留奇科夫之命，负责制定实施军事管制法的紧急计划。

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931年）：苏共官员，后为俄罗斯政治家。1985—1987年任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年3月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当选为俄

罗斯总统。

叶利钦娜，奈娜·约瑟伏芙娜：鲍里斯·叶利钦的夫人。

叶夫图申科，叶夫根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933年）：诗人、政治活动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叶若夫，尼古拉（1895—1939年）：1936—1938年"大肃反"高峰时任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领导人。

扎多尔诺夫，米哈伊尔：经济学家。1990—1991年为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的副手，1991年1月两人合写文章批评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

扎格拉金，瓦季姆（生于1927年）：苏共官员。1967—1988年任苏共国际部副部长，后升任第一副部长；随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

扎哈罗夫，根纳季：克格勃官员。1986年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雇员，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扎利金，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生于1913年）：作家、编辑。1986年后任《新世界》编辑。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环境问题活动分子。

扎斯拉夫斯卡娅，塔基亚娜·伊万诺芙娜（生于1927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全苏社会经济问题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扎斯拉夫斯基，伊利亚·伊奥西伏维奇（生于1960年）：纺织工程师、政治家。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1993年后为"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1994年后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日里诺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生于1946年）：俄罗斯政治家。自由民主党创始人；1991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但

1993 年 1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他的党居第二位。

佐林，瓦连金·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25 年）：记者。1987 年代表苏联电视台采访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定期播出的“谈话”栏目的主持人。

佐尔金，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43 年）：律师、法官。1991—1993 年任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1993 年 10 月进攻俄罗斯白宫事件发生后辞去了院长的职务，但仍保留法官团成员资格。

注　释

第　一　章

1. 在布朗大学的演讲，1993 年 5 月 4 日。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并未说此说法系出自原文，但他也不了解初次引用的是谁。

2. 尽管叶利钦已同意其他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的总统对于动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都有发言权，但并不清楚一旦需要做决定时，这三个共和国的意见如何得到体现。无论如何，前苏联大多数核武库是坐落在俄罗斯，并处在俄罗斯人的有效控制之下。

第　二　章

1. 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告见艾伦・J・埃伦德 A Report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Operations, 1961: U. S. S. R., Japan, Taiwan, Hong Kong, South Vietnam, Laos, Cambodia, Thailand. 参议院第 73 号文件，第 87 届国会，第 2 次会议（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62 年）。

2.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例外。在赫鲁晓夫为提高苏联小麦生产而发起的“开发不毛之地”运动期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量涌入了北部平原地区。

3. 约·维·斯大林：著作选。第五卷（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3 年），第 269—270 页。

4.《苏共的中央全会、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第 7 版，第一部分（1898—1925）（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文献，1953 年），第443 页。

5. 有关这些事件的细节描述参见波丹·纳海洛和维克多·斯沃伯达所著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纽约：自由出版公司，1990 年）。

6.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 Harvest of Sorrow（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 年）一书中对这一人类悲剧进行了最彻底和精确的研究。

7. 其正文由美国政府于 1948 年发表，见 R·J·桑塔格和 J·S·贝迪编辑的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48 年）。参加这一谈判的德国外交官之一在其回忆录 Hans von Herwarth, Against Two Evils (NewYork: Rawson, Wade, 1981）中也描述了这样的内容。

8. 这是 30 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早期曾允许将俄罗斯的扩张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道路。但斯大林上台后，开始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同苏联的爱国主义溶在了一起（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特别明显），早期的提法即成了禁忌。

9. 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2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10. 例如，请参见默里·费施巴赫和小艾尔弗雷德·弗伦德利，Ecocidein the USSR: 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 (New

York：Basic Books，1992）。

11. 有些西方学者同意这种分析。例如，杜克大学教授杰里·霍夫在1989年写道："夸大近期苏联种族动乱的潜在性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表现的非常善于避免这方面的问题"；Russia and the West：Gorbachev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9），第4页。

12.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New York：Harper & Row，1987），第105和107页。

13.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论改革和党的干部》，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讲话和文章选集》第4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第　三　章

1. 鲍里斯·叶利钦：Against the Grain：An Autobiography（纽约：首脑会议文件，1990年），第139页。

2. 米·谢·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年），第140—141页。

3. 马基雅维里：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阿伦·吉尔伯特译（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4. 剧作家米哈伊尔·沙特洛夫是首先公开散布这一消息的人之一，1987年他在同法新社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此事。后来，其他人也谈到这个事情，其中包括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他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Eyewitness：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Unraveling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Random House，1992年）中一再提到它。

5. 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记载了会议的情况，这是迄

今为止与会者所发表的最详尽的有关报道。见尼古拉·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年)和叶戈尔·利加乔夫: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纽约:Pantheon,1993 年)。

6. 如同仪式的主人在 1985 年华盛顿国旗俱乐部的聚餐会上所评论的那样,副总统的题辞似乎是“你去世,我飞来”。

7. 根据回忆录。准确反映了讲话的尖锐和风格,但并非都是原话。

8. 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第 140—141 页。

9. 叶利钦:Against the Grain,第 140 页。

10. 作者 1992 年 3 月 4 日与雷日科夫的谈话。

11. 作者 1992 年 9 月 23 日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谈话。

12. 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第 243 页。对于 1986 年与 1985 年生产的比较,他所引用的实际数字是:伏特加和其他烈酒:从 2.8 亿公升下降到 1.46 亿公升;葡萄酒:从 4.01 亿公升下降到 1.40 亿公升;啤酒:从 7.18 亿公升下降到 4.88 亿公升。

13. 引自科罗季奇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镜子》。

14. 见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1985 年 11 月 3 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的讲话》,《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2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32 页。

15. 《真理报》,1987 年 6 月 26 日。

第 四 章

1. 米·谢·戈尔巴乔夫:《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3 卷(莫斯

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

2.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纽约：自由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3. 官方通知于7月3日收到，次日就透露给华盛顿的记者；The New YorkTimes，1985年7月3日，第1、6页。

4. 这是指奥列格·卡鲁金，他后来在华盛顿和纽约从事间谍活动。1990年，他在晋升为少将后，与克格勃决裂，谴责克格勃，并进入政界，在苏联议会得到一个席位。他出版了一部有关其生涯的著作，The First Directorate：My 32 Years in Intelligence and 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4年)。

5.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反历史主义》，《文学报》，1972年11月15日；见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Union，第24卷，第7号，第1—7页的摘译。该文还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对有关历史的阐述进行了辩护，他后来抛弃了那种观点。

6.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Muki prochteniya bytiya（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第60—62页。

7. 同上，第63页。

8. A·N·雅科夫列夫：Ot Trumena do Reogana（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4年)，第394页。

9. 例如舒尔茨所作评论，见他的回忆录Turmoil and Triumph（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兄弟出版社，1993年)，第166—167页。

10. 苏联领导人不仅利用公开的宣传机器中伤里根，还命令克格勃进行伪造文件的秘密战。其中某些情况反映在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基夫斯基的著作中，Comrade Kryuchkov's Instructions：Top Secret File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1975—1985（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8—103页。

11. 舒尔茨：Turmoil and Triumph。

12. 按照国际惯例和苏联自己的法律，对于入侵的飞机，在使用致命武器之前，应对它发出警告，并采取一系列迫降措施。但在1983年（和1978年）的韩国飞机事件中并未这么做，当时一架韩国飞机误入俄罗斯北部摩尔曼斯克地区。

13. 之所以将其放在引文中，是因为我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内问题；然而，苏联当局当时的确把它们看作国内问题，反对在谈判中把它们列为正式议题。

14. 这一部分牵涉到相互关系，它在讲话公开发表前已经删除，但在后来的声明和美国总统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函中却包括了类似思想。

15. 这部分内容发表在Weekly Complic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1984年1月23日，第40—45页。

16. 同上，1984年6月28日，第944—946页。

17. 对于空间防御计划的这些批评并没有指出，如果美国不存在这种计划，什么因素才能促使苏联同意大规模削减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18. 同15，1985年10月18日，第1291—1296页。

19. 同15，1985年11月18日，第1399—1402页。

20. 同15，1985年11月25日，第1422—1424页。

21.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讨论军备控制以外的其他问题的工作小组中，苏联代表团接受了有关人权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用语，第一次承认人权是双方所关注的适当问题。

22. 舒尔茨国务卿匆忙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因为他必须在当

晚飞往布鲁塞尔，向盟国作简要介绍。他的表情向聚集的新闻记者透露了他的失望，他没有强调会谈已经解决的许多重要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后来告诉我，苏联人本来准备以肯定的口气向新闻界作简要介绍，但是当舒尔茨以悲观的态度介绍了会谈的结果后，他们也只好照此办理。

23. 沃尔克格诺夫于1990年选入俄罗斯议会，他是1991年之前支持叶利钦的唯一一名苏联将军。

24. 1992年9月21日，作者会晤了德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

25. 我们现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依靠里根关于达尼洛夫无辜的证词。当时，克格勃已经收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奥尔德里奇·艾姆斯，艾姆斯定期向克格勃提供有关美国特工人员的情报。达尼洛夫当然不在其中。

26. 在Turmoil and Triumph一书中，舒尔茨介绍了对于这些事件的不同观点。从他的叙述中可知，他的下属显然没有向他提供许多有关事实，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官僚机构之间的敌意。

27.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防止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所造成的损害，艾姆斯是克格勃安插在中央情报局里面的"鼹鼠"，他已经被苏联的、然后是俄罗斯的特工机构所收买，并一直为它们工作，直到于1994年2月被逮捕。

28. 负责组织会议的苏联官员后来告诉我，该会议已经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批准，该部当时由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领导，他在担任了多年苏联驻美大使之后刚刚返回莫斯科。他们说，克格勃同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一样，对是否召开该会议感到犹豫不决，但是多勃雷宁的看法占了上风。

29. 其他一些应邀发言的美国人，包括罗伯特·麦克法兰、理查德·珀尔、杰恩·柯克帕特里克和助理国务卿艾伦·凯斯，最

后都倾向于参加会议。

第 五 章

1. 这是戈尔巴乔夫回应叶利钦 1987 年 10 月份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的一段话；参阅苏共中央的公报，1989 年 2 月，第 285—286 页。

2. 摘自利加乔夫回应叶利钦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的讲话；1988 年 7 月 2 日的《真理报》。

3. 参阅叶戈尔·利加乔夫的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纽约：先哲祠出版社，1993 年），第 105 页。

4. 根据作者 1987 年 4 月 17 日在大会期间作的笔记。

5. 据作者 1992 年 9 月 23 日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会谈内容。

6. 参阅鲍里斯·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An Autobiography（顶峰出版社，1990 年），第 178—181 页。

7. 1992 年 9 月 23 日，波尔托拉宁在一次会谈中对我说，他已经相信对叶利钦的攻击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阴谋，即使叶利钦不上台发言，他也在劫难逃。

8. 有关阿尔巴托夫对会议的记述可以参阅他的著作 The System（纽约：泰晤士出版社，1992 年）第 330 页。

9. 参阅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An Autobiography，第 199—202 页。

10. 它最终登载在 1989 年 2 月份发行的中央委员会月报上，据苏共中央的公报，第 209—287 页。

11. 事实上，这篇文章早在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就已经见诸报端了，由于那天他正在南斯拉夫逗留，所以推迟了

对它的反应。

12. 参见1988年3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第3页。

13. 意大利共产党报纸 L'Unita 驻莫斯科记者朱利亚托·切耶萨与苏联共产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他曾出版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论述了这封“信”是如何炮制并登载的。据1988年3月23日的 L'Unita；它的英文件可参阅对外广播信息服务社1988年3月31日出版的 Daily Report：Soviet Union，第55—58页。

14. 参见利加乔夫的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301—303页。

15. 根据作者1992年9月30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内容。

16.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Gipfelgesprache：Geheime Protokolle aus meiner Amtszeit（柏林：罗夫霍尔夫，1993年），第223—245页。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本书的任何俄文版本或英文版本，只有一本法文的译本，书名为 Avant-memoirs，由奥迪勒·雅各编辑，1993年在巴黎出版。

17. 作者1992年9月30日与阿尔卡基·沃尔斯基的谈话内容。

18.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1988年6月6日，第703—708页。

19. 民意测验结果登出后，作者在日志中作了记载，但没有标明资料来源。

20. 理论上说这里应写作“他或她”，但实际上任党的书记一职的女性少得可怜。

21. 电视对各位代表的发言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不过，报道叶利钦的讲话时，却省略了他一半的发言内容，包括他的讲话所引起的掌声，而利加乔夫的讲话却全部予以了转播，包括听众的掌声。

22. 参阅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An Autobiography，第222—224页。

23. 以前称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第 六 章

1. 见1988年7月26日的《真理报》。

2. 见1988年8月6日的《真理报》。

3. 见1988年12月8日的《真理报》。

4. 见1988年8月13日的《红星报》。

5. 见1988年8月13日的《真理报》。

6. 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7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8页。

第 七 章

1. 参阅由查尔斯·F·弗塔多和安德烈亚·钱德勒编辑的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Publics：Document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科罗拉多，波特兰：西方观点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2. 见1987年1月28日的《真理报》。

3. 见1988年7月5日的《真理报》。

4. 参阅玛尔塔·布里尔·奥尔科特的文章"The Collectivization Drive in Kazakhstan"，Russian Review，1981年4月，第136页；以及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著作 Harvest of Sorrow（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2—197页。

5. 纳扎尔巴耶夫所写的著作《没有左右派之分》（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91年）以问答的方式记录了许多事实。

6. 他45岁时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

7. 见 1988 年 7 月 26 日的《真理报》。

8. 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有关我的时代》（阿拉木图：RGZhI "Deuir," MP "Yntymak," 1992），第 265 页。

9. 比如说，有一名驻莫斯科的英国记者马丁·沃克就曾于 12 月 30 在伦敦的一家出版物 The Guardian 上登发了一篇报道。他写道，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至少有 20 人丧失了生命，200 人受伤，多达 1000 人被捕入狱，然而，事后的调查表明死亡人数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只有三四个人），只是受伤与被捕的人数没有大的出入。

10. 可参阅 1987 年 1 月 9 日 The Washington Post 上的一篇文章，"Soviet Leader Criticizes Rioters"，见 A—25 页。后来，雷日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阿拉木图的骚乱进行了精确的描述，并且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对此次事件予以重视而大加鞭挞；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年），第 200—201 页。

11. 比如，在 1987 年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参阅 1987 年 2 月 19 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12. 参见塔斯社 1988 年 7 月 29 日所发布的消息、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的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0 年），第 303 页。

13. 参见 1988 年 3 月 29 日的《消息报》。

14. 以文学的手法描述这场悲剧的作品以弗朗茨·韦费尔写的 The Forty Days Musa Dagh 最为著名。

15. 英译本见弗塔多和钱德勒的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第 65—66 页。

16. 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的 Soviet

Disuion，第 297—298 页，第 313 页。

17. 参考作者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992 年 3 月 17 日的会谈。

18. 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7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42 页。

19. 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Soviet Disuion，第 221—223 页。

20. 参考作者与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于 1992 年 9 月 29 日的会谈。

21. 见 1988 年 7 月 26 日的《真理报》。

第 八 章

1. 参见 1989 年 1 月 22 日美国 ABC 广播电台“This Week with David Brinkley”节目里的一段话。

2. 卡特的命令通常称之为“粮食禁运”令。不过，用这个词欠妥，因为卡特还允许每年出口 800 万吨的粮食，根据两国签订的《长期粮食协定》，苏联有权获得这部分美国粮食；但是协定中有关由美国政府批准的应急粮的供应的出口遭到了禁止。然而，美国农民们认为总统禁止出售额外的粮食使粮食价格大为下跌，这对于许多濒临破产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里根总统 1981 年上台后不久，很快就取消了这项禁令。

3. 事实上，也有些右翼人士如《保守文摘》的编辑理查德·维古里尔曾经在里根任职最后一段时间里指责过里根总统，不过，没有在政治上产生什么有意义的影响。

4. 迈克尔·贝施劳斯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合写了一本书，名为 At the Highest Levels（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93 年）。

这本书有关布什时期的美苏关系的资料非常详实。根据两名作者在书中的描述，布什 1987 年 12 月份曾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他将来会时常因不得已而发表一些反苏言论，不过，戈尔巴乔夫对此不应大惊小怪。两位作者的此番描写似乎是基于布什本人有关这次谈话的回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人在场（不包括有可能在场担任秘密任务的保镖）。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帕维尔·帕拉日琴科却对这场（与作者的）谈话有着不同的记述。他回忆说，布什当时对戈尔巴乔夫说，里根不得不时常发表一些反苏联的言论，布什本人则愿意从中进行一些调节。帕拉日琴科不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唇读家，他有可能误读了布什的本来的意图，误认为布什在谈论里根。如果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对布什的意思的领会与理解就只能是通过帕拉日琴科的俄语翻译了，因为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使他听懂布什的真正的意图。另一方面，布什也不知道他的话是如何被翻译成俄语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在 1989 年整个春天对美国政策是否能延续下去似乎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

5. 令人奇怪的是，许多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权势的人也常常发表这种言论。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要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被剥夺权力，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他会反过来对付我们？

6. 在这件事情上，布什推翻了由官僚机构提出的最初的那种谨慎的提议，坚持要求进行富有实质意义的军备削减。

第　九　章

1. 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7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558 页。

2. 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的《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3. 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请求之下，萨哈罗夫于1988年12月走访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和国，但在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一些争议问题上，他在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调解工作没有取得成功。4月份的第比利斯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他便赶往出事地区，并为那些受伤的示威群众寻求外界的帮助。

4. 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的《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第284页。

5. 这是我当时的猜测。1993年2月18日布尔布利斯曾在一次谈话中向我肯定这一点，他说正是本着这个目的，事先早已对这种提名与撤消进行了安排。

第 十 章

1. 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合编，《苏联加盟共和国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布尔多，科罗拉多：西方观点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2. 同上，第203页。

3. 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参加者并非波罗的海民族，不过他们支持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国际阵线”并不能代表该地区所有非波罗的海民族说话。

4. 《真理报》，1989年8月26日。

5. 我个人强调的重点，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和安德烈·钱德勒：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第95页。

6. USA Today，1989年9月16日。

7. 1992年9月19日，作者对鲍里斯·叶利钦的采访记录。

第十一章

1. 《我们共同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米·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文件集》，1990年1月11—13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2. 《苏共中央全会文件》，1989年9月19—20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

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声明中有一条竟然颇有预见性。它是这样的："联邦经久不衰的保证，是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在一个单一联盟国体内完全出于自愿的结合。"如果那真是保证的话，就根本不曾有过保证！

4. 1989年12月21日，作者与瓦连金·法林的会谈记录。

5. 这个问题由叶利扎维塔·斯戴格问及，她代表《论据与事实》来采访，但她是根据斯塔尔科夫的明确指示来提问的。

6. 10月14日，《真理报》报道了会议已经召开这一事实，但没有发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一个更为翔实的报道随后见于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放慢摆针建交就是停止时间前进》，《莫斯科新闻》，第43期（1989年10月22日）。

7. 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和安德烈·钱德勒合编：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布尔多，科罗拉多：西方观点出版社，1989年），第134—135页。

8. 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大量会议记录摘要，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Gipfelsprache：Geheime Protokolle aus meiner Amtszeit

（柏林：罗沃尔特，1993），有关“西方价值观”的讨论见第125—129页。

9. 对外广播新闻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89年12月14日，第63页。

10. 对外广播新闻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89年12月19日，第37页。

11. 同上

12. 对外广播新闻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89年12月29日，第38—39页。

13. 《真理报》，1989年12月26日。

14. 1992年9月23日，作者对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的采访记录。

15. 据叶利钦说，文件原本是在苏联解体后从当时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攫为已有的文件中找到的。

16. 1992年9月28日，作者对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采访记录。

17. 《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第十二章

1. 《真理报》，1990年1月1日。

2.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1月12日，第49页。

3. 出自阿姆斯特丹“Elsever”报记者Rene de Bok和William Wansink采访时的讲话，转引自随后出版发行的《新闻报》（都灵），1990年1月24日。

4. 奥齐罗·马吾罗：La Repubblica，1990年2月2日，第

11 页。

5.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1 月 12 日，第 47—49 页。

6.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1 月 16 日，第 117—120 页。

7. 不久又恢复该城市最初的名称甘杰。

8.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悲惨的中央集权主义》，《俄罗斯文学报》，1990 年第 1 期，第 1 页。

9. 《俄罗斯文学报》，1989 年第 52 期，第 2—3 页。

10. 贝纳德·格特："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催促他与保守派决裂"，《世界报》（巴黎），1990 年 1 月 31 日，第 1—2 页。

11. La Repubblica，1990 年 2 月 2 日，国外广播信息服务转译，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2 月 7 日，第 91—92 页。

12. 他打算把热气球飘到红场上空，虽然这一要求被否决，但是允许他把热气球飘到靠近国际旅馆的莫斯科河岸。不过，尽管官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莫斯科的气候使他无法将热气球飘起来。

13. The New York Times，1990 年 2 月 5 日。

14. 《真理报》，1990 年 1 月 15 日。

15. 《苏共中央全会文件》，1990 年 2 月 5—7 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第 9 页。

16. 同上，第 162—166 页。

17. 同上，第 67—69 页。

18. 作者对瓦季姆·巴卡金的采访，1992 年 10 月 6 日。

19. 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第 8 号公报，1990 年 2 月 27 日，第 137—139 页。

20. 同上，第 143—144 页。

21.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2月28日，第30—32页。

第十三章

1.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13日，第57页。

2.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15日，第44页。

3.《晚邮报》(米兰)，1990年3月9日，转引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13日，第76页。

4. 雷日科夫在两年后，即1992年3月14日接受我的采访时告诉我，他退出竞选只是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后来他觉得自己是一种愚忠，他确信如果他参加竞选的话，他会在选举中获胜。我对他是否能赢得选举表示怀疑，但考虑到他在工业经营者和共产党机关中的声誉，他可能会在秘密投票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5.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19日，第44—45页。

6.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20日，第99页。

7.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3月22日，第87页。

8. 转引自莫斯科美国大使馆收到的呼吁原文。

9.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4月13日，第56页。

10. 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贸易修正案"禁止与苏联签署任何没有经国会批准的贸易协定。所以，没有得到参议院的认可，

政府当局无权签署执行协定的条约。

11. 90 名代表投票赞成，3 票弃权，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4 月 19 日，第 83 页。

12. 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合编：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博尔德彩色出版社，1989 年，第 102—103 页。

13.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4 月 20 日，第 88—89 页。

14.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4 月 13 日，第 57 页。

15. 《消息报》，1990 年 4 月 6 日，英文版的有关内容见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编：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第 36—40 页。

16. 《真理报》，1990 年 4 月 11 日。

17.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4 月 19 日，第 47 页。

18. 《消息报》，1990 年 3 月 1 日。

19.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 年 3 月 16 日，第 60 页。

20.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共同看法，大使馆的人员继续鼓励我通过具有挑战性的观察和信息来论证我的观点。

第十四章

1.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 年 3 月 25 日。

2.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议会主席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年3月31日。

3. 苏联宪法第76条。

4.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年3月25日。

5. 同上。

6. 在交涉中并没有公开地争论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所有投票赞成主权独立声明的代表都完全理解主权声明的言外之意。但是，从逻辑上讲，他们的投票得不出其他的结论。

7. 作者1992年9月25日与伊万·安东诺维奇的会见。

8. 这次会议正式称之为“协商会”，但是会议召集以后，代表们赞成把这次集会改为议会的成立大会。

9. 安东诺维奇还说，他相信如果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不同的候选人，将能够阻挠波洛兹科夫当选；作者1992年9月25日与安东诺维奇的会见。

10.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0年4月19日，第24页。

11. 同上，第25—26页。

12. 当然，这种看法是把美国驱逐出欧洲的苏联传统目标的180度大转弯。但是，这一目标与“阶级斗争”理论一样都悄悄地抛弃，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此前仍然怀疑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可能对苏联不利的话，那么在1989年12月雅尔塔美苏首脑会议上，这种怀疑也消失了。

13. 选票是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真理报》，1990年7月11日。

14.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真理报》，1990年7月11日。

15. “Moldavia”(摩尔达维亚)一词是从俄语衍生出来的。它独立后选择了罗马尼亚语名称“Moldova”(摩尔多瓦)。同样，摩尔达维亚首都的名称也从俄语的“Kishinev”(基什尼奥夫)改为“Chisinau”(基希纳乌)。

16. 我回到莫斯科后，正式询问了负责地方事务的国家委员会不给发进口许可证的原因，随后进口允许证就发了下来。

17.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随后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的通过，其中的一部分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

18. “自由之声电台”在1990年10月31日出版了这些主权声明的目录。安·希伊编:《主权声明资料集》, RFE/RL研究所, Report on the USSR, 1990年11月9日，第23—25页。

第十五章

1. 加夫里尔·波波夫,《怎么办?》(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9页。

2.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1990年8月8日。

3. 选自一首针对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的讽刺诗;《图书评论》, 1990年2月9日，第10页。

4. 苏联学者分为在共产党机构中的官员(例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以及这一体制下的工厂或农庄经理(如雷日科夫)两种。两个集团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但是他们的心理是不同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主要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官僚，他们不再拥有权力和人手来监视或猜测经理们。而在另一方面，经理们随着共产党的监护的日益下降而获得了权力。

5. 见他刚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对报界发表的声明;《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0年5月

25 日。

6. 当然，他描绘的是最初载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安排，而不是 1993 年演变后的安排。

7. 《消息报》，1990 年 9 月 4 日。

8. 同上。

9. 同上。

10. 我们的五大湖有好几个面积都很大，但是它们都不太深。

11. 《共青团真理报》，1990 年 11 月 4 日。这封信是由总统委员会中的斯坦尼斯科夫·沙塔林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弗拉德伦·马季诺夫、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中的两名高级成员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等共同签署的。

第 十 六 章

1. 《真理报》，1990 年 11 月 21 日。

2. 引自《莫斯科新闻》1990 年第 47 号，第 5 页。

3. 发生在 1990 年 9 月 24 日；《消息报》，1990 年 9 月 25 日。

4. 苏联法律允许军方人员选入立法机关，在他们服役期间继续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

5. 《红星报》，1990 年 11 月 15 日，第 1—4 页。

6.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90 年 11 月 19 日，第 15 页。

7. 作者与瓦季姆·巴卡金的会面，1992 年 10 月 6 日。

8. 尼古拉·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第 20 页。

9. 《消息报》，1990 年 11 月 17 日。

10.《莫斯科新闻》，1990 年 11 月 16 日。

11.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会议录《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文化和进步出版社，1993 年）一书中描绘了戈尔巴乔夫的私下反应；德文译本：Anatoli Tschernajew，Die Letzten Jahre Einer Weltmacht：Der Kreml von Innen（斯图加特：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93），第 333 页。

12. 瓦季姆·巴卡金：《丢掉幻想》（克麦罗沃：图书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页。

13. 同上，第 91 页。

14. 作者与弗拉基米尔·伊万申科的会面，1990 年 11 月 23 日。

15. 在乌克兰的"休列科"。

16. 译自莫斯科电视 1990 年 12 月 20 日播送的他的讲话。

17. 莫斯科电视，1990 年 12 月 20 日。

18. 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向他的个人助手特伊姆加兹·斯捷潘诺夫吐露心事。斯捷潘诺夫 1994 年 3 月 7 日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前的某个时间，戈尔巴乔夫曾经问他是否有兴趣担任副总统。斯捷潘诺夫还说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他希望自己继续留在他的阵营里，自己希望还当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斯捷潘诺夫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这个主意，他提起这件事，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减少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政策的支持这一事实。

19. 为了规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量的方面的限制，乌拉尔山以东的军事装备正在进行悄悄的转移。苏联军队企图把明显受到条约管制的某些部队排除在已达成的限额以外，并且在谢瓦尔德纳泽所进行的战略核武器谈判上倒退。

20. 同注 11，德文译本第 336—337 页。

21. 亚纳耶夫在第一轮投票中并没有得到确认，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再次递上他的名字坚持要通过他的时候，他才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22. 叶利钦稍后向这些数字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税收项目，包括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使用或出口的产品征收的赋税。

23. 同注 11，俄文本第 388 页，德文译本第 328—329 页。

24. 同上。

25. 同上，第 387 页。

26. 同上，第 404—405 页，德文译本第 341 页。

27. 《莫斯科新闻》，1990 年 11 月 11 日。

28. 阿列克谢·列文索恩，《年度三位风云人物》，《独立报》，1991 年 2 月 28 日，第 2 页。

第十七章

1. 引自作者在当时所写的日记。

2. 根据彼得拉科夫给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的内容记载在作者的日记中。

3. 引自作者在当时所写的日记。

4.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 月 11 日，第 43 页。

5. 这是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控制下的电台节目广播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 月 14 日，第 95 页。

6. 前一天，联邦委员会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访问立陶

宛，并且发回当地局势的报告。

7.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1月14日，第94页。

8.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1月15日，第78页。

9. 《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月16日。

10.《政府瘫痪或瘫痪的政府？》《独立报》，1991年1月15日。

11. 《真理报》，1991年1月23日。

12.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通常被称做“左派”，而强硬派共产党人则被称做“右派”。鉴于这两个词的含义在西方有所变化——在西方共产党人通常被认为代表站极左——所以我一直尽力避免使用这两个词，只有在直接引述苏联的评论和描述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秋抛弃改革知识分子这两种情况下才用。

13. 同注2。

14. 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会议录《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1993年，第416—418页）中对这段谈话的部分记录作了修改。他删去了我的大部分话，而增加了戈尔巴乔夫评论的概要，并删去了他当初所作的有关苏联处于内战边缘的评论。

15. 《劳动报》，1991年2月12日。

16. 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华盛顿，1991年2月13日。

17. The New York Times，1991年2月15日，A—34页。

18. 《消息报》，1990年12月25日。

19. 民意测验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关于私人财产的问题、关于对苏联不信任的问题以及关于废除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问题，但是在3月17日民意测验上只包括了选举总统的问题。

20.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2月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该委员包括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帕维尔·布尼奇、格里戈里·阿尔巴托夫、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尤里·里若夫和其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91年2月7日，第66—68页。

21. 苏联电视，1991年2月21日。

22. 同注14，第408—412页。

23.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2月28日，第74页。

24. 同上，第76页。

25. 《消息报》，1991年5月26日。

26. 当我在1992年10月6日的一次面谈中同瓦季姆·巴卡金谈起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指出："这样一个报告只可能出自克格勃之手。"

27. 《消息报》，1991年3月9日；1991年3月9日。

28. 《真理报》，1991年3月8日。

29. 同注14，第427页。

30. 1991年2月15日，委员会主席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这个总统令存在着"实质上的错误和其他缺点"；《消息报》1991年2月16日。

31. 在对检察长们的演说中，戈尔巴乔夫指出："为了大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独裁统治——法律的独裁统治。"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2月14日，第20页。

32. 《选择报》，1991年4月6—7日；英文译文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4月10日，第32页。

第十八章

1. 《真理报》，1991年4月10日。

2. 《莫斯科新闻》，第16期（1991）。

3. Financial Times，1991年4月20—21日。

4. 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格鲁及亚和摩尔多瓦领导人拒绝参加；叶利钦继续度假，派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代表他参加。

5.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增补版，1991年4月11日，第13—15页。

6.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增补版，1991年4月23日，第23页。

7. 《消息报》，1991年4月24日。

8. 《消息报》，1991年4月9日。

9. 我们被告知“联盟”激进派的两名成员——“黑人上校”之一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和爱沙尼亚犹太人后裔的俄罗斯发言人叶夫根尼·科根——将出席午宴，但他们没有来，而我们的客人也未对他们缺席作出任何解释。

10. 一些未出席午宴的联盟领导人因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一场摧毁苏联的运动而声名狼藉。

11. 由会议电视广播的录相带翻译而成。

12. 投票中588票赞成，292票反对，75票弃权。

13. 《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4月5日。

14. 80年代在接受一家外国新闻社采访时，戈尔巴乔夫说他在婴儿时便接受了洗礼，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

15. 在1992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叶利钦告诉我，自从他在1991年8月的政变企图中幸免于难后，他开始相信上帝和祈祷的

价值。

16.（法）《世界报》，1991年4月17日，第4页。

17. 晚间新闻节目“时代”把报道拖延到为期四天的访问中的最后一天，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4月18日，第37—38页。

18. 例如，参看1991年4月17日席尔维耶·考夫曼对叶利钦的采访。

19.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4月18日，第36—37页。

20.《真理报》，1991年4月24日。

21. 1991年4月4日，由苏联第一任代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他曾主管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与曾陪同立陶宛总理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会见国务卿贝克的克斯罗瓦克·斯坦克维克斯率领的代表团开始谈判。

22. 罗曼·索尔琴科，“The Draft Union Treaty and the ‘Big Five’”，RFE/RL研究机构，Report on the USSR，1991年5月3日，第16—18页。

23. 1990年党代会后，由于领导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不再像1964年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那样有权免除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了。

24.《真理报》，1991年4月23日。

25. 引自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1993年），第442页。

26. 瓦连金·斯捷潘科夫和叶夫根尼·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年）第76—77页。

27. 作者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晤，1991年4月

29 日。

28. 这些法律见尤里亚・帕斯帕罗瓦和列夫・西加尔编："Law on Russian Presidency Breeze Through Parliament", Commersant，1991 年 4 月 29 日，第 2 页。

29. 雷日科夫心脏病康复后不久，在接受《星期日电讯报》（伦敦）（1991 年 4 月 7 日，第 17 页）的采访中表露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恶。

30. 他在后来出版的书中透露，他得到的消息是误传，xenophobic populist；阿曼・塔利耶夫：《叛乱的长久回声》：《今后该如何生活》（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2 年）。

31.《俄罗斯报》，1991 年 7 月 11 日。

第十九章

1. 出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讲话，其内容后来发表在《日报》，1991 年 12 月 15—21 日；以及《红或白？》《1991 年 8 月的悲剧》：《事实、冲突和见解》（莫斯科，塔拉，1992 年），第 42—45 页。

2.《真理报》，1991 年 6 月 22 日。

3. 作者与波波夫的谈话。1991 年 7 月 22 日。

4. 据别切尔尼亚耶夫说，德国总理曾告诉他，如果 1991 年戈尔巴乔夫能以客人身份出席伦敦会议，那么 1992 年他肯定可以完整的成员资格参加。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1993 年）第 445 页。

5. 例如，The Times（伦敦）1991 年 5 月 20 日头版头条登出《受困的总统转向西方：秘密使节帮助戈尔巴乔夫寻求援助》。

6.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91 年

5月24日，第19—22页。

7. 俄语短语“Шанс на со Ласие”的意思是“一致的机会”，但在英语里“机会之窗”更为贴切。

8.《真理报》，1991年6月18日；《消息报》，1991年6月18日。

9.《独立报》，1991年6月19日。

10. 由于我没有记录，这些引语以我的记忆为基础。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关键的部分是正确的。

11. 实际上，这件事流传得要广泛得多。几周之内，作家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时代》杂志华盛顿分部的总编斯托伯·泰尔伯特便得到了这一消息。泰尔伯特当时正为一本关于布什政府时期美—苏关系的书收集材料，他已经掌握了基本材料，借我在华盛顿之机，向我询问了1991年9月事件的情况。

12. 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1页。

13. 这次谈话的记录(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做了复述)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他在我们谈话时，只作了部分记录，后来是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的。例如，他引用我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获得消息说，明天有人企图罢免你。”实际上，我从未提到它是情报机构的报告，而只是说“报告的主要根据是传闻而非可靠的情报”。并且，我也没有明确说在第二天就会采取行动。虽然波波尔给叶利钦报信说这种企图迫在眉睫，但他也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许多人，尤其是苏联人，在提到“报告”时总是自动地联想成情报，但实际上，如果它是一个政治话题，它可能只是一个外交报告。我已经预见这种可能的误解，因此有意用了一个短语以暗示它不是一个秘密情报。但从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看，我的苦心白费了。

切尔尼亚耶夫还误解了我的另一个声明。不知怎么，他认为

我不相信消息的内容，其实，我说的只是我们不能肯定消息是否属实，当然它的确是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它是准确的，但它没有指出牵涉者的姓名，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参看切尔尼亚耶夫的《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0—452 页。

14. 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2—453 页。

15. 别斯梅尔特内赫向 8 月政变的调查者所做的声明，瓦·斯捷潘科夫和叶·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 年），第 79 页。

16. 作者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莫斯科，1992 年 3 月 20 日。

17. 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伯特在 At the Highest Levels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在华盛顿召开的这些会议（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93 年），第 384—391 页；切尔尼亚耶夫在《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地位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第 448—450 页。

18. 斯克罗斯和塔尔伯特，At the Highest Levels，第 391 页。

19. 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0 页。

20. 根据 1994 年 6 月 1 日在莫斯科与亚夫林斯基的讨论；亚夫林斯基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这段经历，见莫斯科的周报《星球回声》第 44 期（1993 年 10—12 月），《一致的机会》，第18—21 页。

21. 当时布尔布利斯是叶利钦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但他已经在敦促俄罗斯宣布独立，而不是去签署联盟协定。

22. 亚夫林斯基：《一致的机会》，第 20 页。1990 年秋，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与政府计划相协调，“500 天计划”中“所有好的

部分”都将被保留。

23. 尽管“七国集团”同意给予苏联联系成员的地位，使苏联能够得到技术性援助，但戈尔巴乔夫不愿意接受在他看来是这些组织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因此，它在1991年7月23日提出的申请是要求完整成员资格，虽然西方大国认为苏联经济还不符合成员条件，但还是接受了苏联的请求。

24. 这些引语出自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5—457页。

25. 贝斯克罗斯和塔尔伯特，At the Highest Levels，第407页。

26. 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7页。

27. 切尔尼亚耶夫描述了如何在最后的修改中删去了“社会主义的选择”一词，而这是共产党教义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73—475页。

28.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7月22日，第71页。

29. 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394—395页。

30.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1日，第17—19页。

31. 布什夫妇在斯帕索别墅举行的午宴会进行得很顺利。叶利钦夫妇、纳扎尔巴耶夫夫妇和亚美尼亚的捷尔-彼得罗相夫妇都参加了。席间，曾任协调人的纳扎尔巴耶夫来到叶利钦和捷尔-彼得罗相桌前，邀请他们到主桌前集体向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敬酒。

32. 立陶宛当局后来的调查表明，袭击是由“黑色贝雷”的里

加支队干的，虽然被莫斯科称为非法的立陶宛边界口岸还遭到了其他的袭击，但都与7月31日的谋杀无关。调查者认为，这次野蛮行动主要是为了阻止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晤。《消息报》，1991年12月19日，第3页。

33. 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是谁批准了最初的消息，但我怀疑它直接出自戈尔巴乔夫，因为我认为一名助手，即使是高级别的，在未与戈尔巴乔夫核实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提出和戈尔巴乔夫一同去斯塔夫罗波尔。

34. 除了揶揄布什外，塞法尔还要补偿一下他早些时候对乌克兰民族情绪的冒犯。在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发言撰稿人时，他曾接受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建议，让尼克松在到达后称基辅为"俄罗斯的城市之母"。多勃雷宁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而塞法尔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俄罗斯人用来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上的联盟的。乌克兰痛恨这一称呼，将其视为企图剥夺乌克兰特性的俄罗斯沙文主义。不过，塞法尔不必为此事的后果负责，而我作为当时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则不得不答复来自愤怒的乌克兰的抗议。

35. 例如，1991年7月乌克兰议会采取行动，将财产置于乌克兰政府管辖之下，而不是让莫斯科去将其私有化。

36. 参看罗曼·索尔琴科的《乌克兰和联盟协定》，RFE/RL研究所，Report on the Soviet Union，1991年7月26日，第22—24页。

37. 在莫斯科的电视台的讲话，1991年8月2日。译文可见于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5日，第35—36页。

38. 他选用的объединение一词有时译成"联盟"，但不像用于

“苏维埃联盟”中的“союз”一词，前者表示一般种松散一些的联合。从政治上而言，他的用词意义重大，在3月份的全民公决中受欢迎的是 союз，而不是 объединение。

39.《俄罗斯文学报》，1991年7月19日。

40.《独立报》，1991年8月8日。

41. 例如，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在1992年9月23日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他认为叶利钦不会签字。

42. 在背景问题上你可以说“无可奉告”而不会被人引用；但在记录中，拒绝评论则会被视为对所提出的问题予以默认。

43. 引自1991年8月5日新闻发布会的录音带；省略号表明不清楚的地方。

第二十章

1.《真理报》，1991年8月20日。

2. Rossiisky nezavisimy institut sotsianykh i natsinalnykh problem, Krasnoe ili Beloe? Drama Avgust-91: Fakty, Gipotezy, Stolknovenie mnenye（莫斯科：塔拉，1992年），第73页。

3. 引自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

4. 鲍里斯·叶利钦，The Struggle for Russia（纽约，朗德门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5. 同上，38—39页。

6. 同上，39页。

7. 关于1991年8月政变准备工作的这些细节以及后来披露的细节来自政变失败后公布的调查记录；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

8. 同上，84 页。

9. 同上，85 页。

10. 同上，85—86 页。

11.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The August Coup 一书中的描述（纽约：哈伯克林斯出版社，1991 年），第 18—19 页。

12. 戈尔巴乔夫的话："我用俄罗斯人在这种环境下通常使用的最有力的语言，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同上，19—24 页。

13. 对克里姆林宫会议的描述，包括所有的直接引语均以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一书为基础，第 89—91 页。

14. 随着时间（格林尼治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宣言可在对外广播信息服务中找到，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8 月 19 日，9—13 页。

15.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8 月 19 日，19—20 页。

16. 虽然标明的日期是 8 月 16 日，但《消息报》后来报道说，给塔斯社的原始材料日期是 8 月 18 日。后来把日期"更正"为 8 月 16 日，是为了使声明看起来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被命名之前就已签署了的。

17. 对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8 月 19 日，第 15 页。

18. 例如，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紧跟莫斯科的共产党书记阿尔弗莱兹·卢比科斯所做的反应是，宣布当地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由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弗雷德·库兹明领导；对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8 月 19 日，第 34 页。

19. 作者在阿拉木图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官员助理加尼·卡西

莫夫的会见，1991年10月1日。

20. 在1992年9月19日的一次会晤中，叶利钦亲口告诉我，延期离开“挽救了他的生命”，因为在下午5点离开后不久，就下达了击落他的飞机的命令。据叶利钦说，由于起飞推迟，导弹基地指挥官因不知命令是否还有效；也无法从莫斯科得到时间改到晚上8点的确切消息，因而没有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要击落叶利钦的飞机的命令，看来它们只是在政变后的调查中才发现的。

21. 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110—111页。

22. 叶利钦，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57页。

23. 克格勃阿尔法小组一些官员的证词见《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117—121页。

24. 同上，第132页。

25. 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伯特，At the Highest Levels，(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93年)，第422—423页。

26. 同上，第433页。

27. 文章的译文刊登在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20日，第2—8页。但其用词没有抓住电视图像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的形象。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视广播中制作了录像带，由此作出判断。

28. 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年)，第14—15页。普里马科夫和巴卡金请别斯梅尔特内赫(也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他们的宣言，但他拒绝了。如果他在宣言上签了字，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他可能就不会被免职了。

29. 巴卡金的报告中说，他被从白宫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里叫

出来，并被要求利用他对亚佐夫的影响阻止伞兵部队的袭击。但是亚佐夫否认有任何袭击白宫的企图，而巴卡金认为这是实话。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15页。

30. 杰姆斯·比林顿，Russia Transformed：Breakthrough to Hope（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49—59页。

31. 同上，第54页。

32. 尤里·S·西多连科，《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天》（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顿河期刊出版社，1991年）。

33. 后来有些人对于像阿赫罗梅耶夫这样自豪的官员竟会自缢表示怀疑。军人传统上把手枪作为自杀的工具，但阿赫罗梅耶夫在退休时上交了他的左轮手枪，他别无选择，只有用绳子了。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236—244页。

34. 英译本见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23日，第20—30页。

35. 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23日，第28页。

36. 同上，第29页。

37. 同上，第30—32页。

38. 讲话的英文译本见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人的讲话：《一次政治力量的重大重组》，The New York Times，1991年8月24日，第6页。

39. 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和法令见《戈尔巴乔夫关于共产党的声明》，The New York Times，1991年8月25日，第14页。

40. 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59页。

第二十一章

1.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8月27日，第3页。

2. 《消息报》，1991年9月4日。

3. 同上，1991年11月15日。

4. 同上，1991年11月26日。

5. 以前已接近于宣布立即独立。1990年，爱沙尼亚宣布"走向独立的过渡时期"，1991年初，它恢复了其战前宪法的某些条款。拉脱维亚宣称，在法律上，拉脱维亚共和国仍然存在，但它准备就取得事实独立的条件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6. 1991年7月31日缔结了条约，当时布什总统正在莫斯科；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7月31日，第70页。

7. 应戈尔巴乔夫的请求，美国的承认推迟了几天。布什总统当时为此受到批评，但是短时间推迟并不是不合理，它也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政府造成损害。

8. 赞成独立的票数实际上是94.39%，反对票为0.46%；伊丽莎白·富勒：《亚美尼亚压倒多数票赞成独立，脱离苏联》，RFE/RL研究所，Report on the USSR，1991年9月27日，第18—20页。

9. 根据白俄罗斯语言的发音，它也拼作Dzemyantsei和Dziemianciej。

10. 根据作者1992年9月24日在明斯克同人民阵线领导人泽诺恩·帕兹尼亚克和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的谈话。同沃尔特·斯坦凯维奇详细地讨论了所有事件，"作为白俄罗斯独立宣言背景的事件"，RFE/RL研究所，Report on

the USSR，1991 年 9 月 20 日，第 24—26 页。

11. 作者与舒什克维奇的谈话。1992 年 9 月 24 日。

12. 某些人指责克拉夫丘克态度暧昧，但即使如此，他也仅仅犹豫了几个小时。在 8 月 19 日晚间，他同意发表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在乌克兰境内无效。

13.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将外交部长解职的原因，是后者在布什 7 份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没有使他同布什总统会面。实际上，布什拒绝会见加姆萨胡尔季阿，因为他公然侵犯人权，特别是在南奥塞梯。

14. 1991 年 11 月 26 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命令建立了俄联邦安全局。对于巴卡金在帮助建立该机构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担任克格勃主席时期与其他共和国的交往，参见瓦季姆·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年），第 91—128 页。

15. 内阁中的高级成员有部长、副部长及各军区司令。

16. 亚历山大·拉赫尔对执政的"俄罗斯'激进派'"的这些派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RFE/RL 研究所，Report on the USSR，1991 年 11 月 22 日，第 20—23 页。

17. 同 2，1991 年 10 月 1 日。

18. 戈尔巴乔夫表示，像那样禁止共产党是不合适的。然而，在 1992 年 9 月 30 日同他会晤时，他告诉我，他同意禁止"共产党组织"，即共产党用以统治国家的特殊组织形式。

19. 叶利钦的禁令遇到了俄罗斯法院的挑战，一年后，宪法法院只部分批准了该禁令。它判决，总统可以解散共产党组织，但是不能禁止以同样的名称组建新党。

20. 切尔尼亚耶夫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所会见的约 80 个外国政界人士，某些人会见了不止一次；阿纳托利·切尔尼

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1993年)，第496—497页。

21. 尽管采取了技术措施，保护大楼不受窃听器影响，但是国会在几年内仍禁止国务院完成该工程。参议院完全拒绝为使用该建筑拨款，而愿意拨款修建另一所大楼。反之，众议院拒绝授权修建另一所大楼，除非那所尚未完工的大楼能够被使用。结果，美国的外交官不得不在莫斯科拥挤、危险、防火设施很差的地方办公。不幸的是，即使巴卡金的姿态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22. 只有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拒绝参加新国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23. M·伯杰对谈判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消息报》，1991年9月27日，第2页；《消息报》，1991年9月30日，第2页；英译本发表在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第43卷，第39号(1991年)，第5—7页。

24. 条约原文发表在《俄罗斯报》，1991年10月22日。英译本发表在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第43卷第42页(1991年)，第4—9页。

25. 安德烈·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总统的离职》(莫斯科：进步出版集团，1994年)，第123页。

26. 有关情况的引文和描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他出席了会议并担任记录员；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123—124页。

27. 同上，第145页。

28. 同上，第145页。

29. 同上，第148页。

30.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年

11 月 15 日，第 26 页。

31. 同上，第 27 页。

32. 自从联合国成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就和苏联一样，被准许单独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斯大林达成的交易（斯大林曾请求让苏联的这两个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独立成员国），该交易之所以生效，是因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投票时总是同苏联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一安排是设法向斯大林在该组织中提供两张额外的选票。除了这个仅有的事例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即接受其成员国的组成部分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33. 条约草案的全文发表在《消息报》，1991 年 11 月 26 日。英译本发表于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1 月 26 日，第 21—25 页。

34. 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4—165 页。

3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年），第 11—15 页；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4 页；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 218—219 页。

36. 1992 年 9 月 24 日，作者与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的谈话。

37. 格拉乔夫在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交易；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 页。

第二十二章

1. 全俄法官代表大会演讲，莫斯科，1991 年 10 月 18 日；《俄罗斯报》，1991 年 10 月 19 日。

2. 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言，1991 年 12 月 12 日；《真理报》1991 年 12 月 13 日。

3. 《共青团真理报》，1991 年 12 月 13 日。

4. “乌克兰听到了其总统的宣誓，脱离了联盟”，《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6 日。

5. 例如，参见《明斯克准备召开三个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会议》，《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5 日，第 1 页。

6. 《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7 日，第 1 页；“三国同盟”也可以译作“三国联盟”。

7. 《苏联总统与俄罗斯总统的对话》，《俄罗斯报》，1991 年 12 月 7 日。

8. 1992 年 9 月，我与他们每个人分别进行了讨论。

9. 《白俄罗斯、俄联邦和乌克兰三国首脑的宣言》，《俄罗斯报》，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1 页。

10. 1992 年 9 月 24 日，作者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的谈话。

11. 该协议及野牛森林会议（所有文件都指出正式的签字地点是明斯克）后所发表的其他宣言的俄文原文，见《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10 日；《俄罗斯报》，1991 年 12 月 10 日。英译本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56—57 页。

12.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32 页。

13. 《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2 页；英译本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Soviet Union，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15—16 页。

14.《消息报》，1991年12月10日。

15.以及已不存在的跨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后来分裂为三个联盟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16.1992年3月13日，作者与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在莫斯科的谈话。

17.例如，参见《俄罗斯严重的政府危机：鲁茨科伊不辞职，而将继续进行攻击》，《消息报》，1991年12月5日。

18.《消息报》，1991年12月19日。

第二十三章

1.亚历山大·赫尔岑：《俄罗斯革命思想的发展》，《作品集(三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4—1965年，第7卷，第31页【法文本】，第160—161页【俄文本】)。

2.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再次发表的慕尼黑演讲，《1991年12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年)，第195—196页。

3.鲍里斯·叶利钦：The Struggle for Russia（纽约：Random House，1994年)，第35页。

4.同上。

5.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纽约，1994年9月26日。

6.《独立报》英译本，第3卷，第6—7号(1992年)。

7.这是1992年3月17日，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在与作者的谈话中所使用的措辞。斯塔尔科夫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苏联的制度，而是“在其中游泳”。他是该制度的产物，苏联解体时他处于执政地位，这只是历史的命运，他本人对于苏联的解

体并没有作出任何个人贡献。

8. 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保守的和改良主义批评家的判断，尽管这些集团所反对的观点，反而是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诸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这样的保守派认为，他应该保持 1985 年和 1986 年的政策，不应试图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特别是那些削弱共产党的变革。另一方面，叶利钦和其他改革派指责他在进行政治改革方面过于谨慎，始终低估改革在苏联社会所得到的支持程度。

9. 这种看法带有某种个人局限，它是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等戈尔巴乔夫亲密助手的见解。

10. 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第 195 页。

11. 同上，第 195—196 页。

12. 1992 年 9 月 30 日，作者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谈话。

13. 赖莎·戈尔巴乔娃在向人民表达她的意见方面不甘寂寞。1987 年，她对叶利钦的敌意对她丈夫抛弃叶利钦起到了强烈的影响。她在讨论他丈夫的同僚时也并不总是很谨慎。1990 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她就在外交招待会上对外国人批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建议政治局委员应该在 65 岁退休。她显然认为，雅科夫列夫是在暗示，戈尔巴乔夫应该在 65 岁退休——大约六年以后——而当时，雅科夫列夫只是为他没有重新入选政治局一事，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解释。

14. 这是指正在讨论的时期，直到 1991 年 12 月。后来，在 1993 年他同俄罗斯议会的斗争之后，叶利钦撤消了预定于 1994 年春天的总统选举。

15. 有关证据表明，瓦列里·波尔金在担任戈尔巴乔夫部属的领导人期间，也是克留奇科夫的特工人员。早在 1977 年 12 月，

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个奇怪事件就与波尔金有关。虽然没有指派波尔金参加会议，但他溜进了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秘密会议，坐在边上，进行记录。美国的与会者不大看重此事；显然，戈尔巴乔夫请他在起草完目录后进来。但后来，苏联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告诉我，波尔金参加会议一事，使他们也感到很惊讶。之所以没有把他赶走，是因为他们不想引起骚动，但是，苏联官员不知道他怎样越过他们自己的安全官员进来的。在1991年8月的政变失败后，该事件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它不能用波尔金个人的好奇心来解释；他虽然是苏联代表团成员，但并不属于参加会议的人员，他一定是由克留奇科夫派去以报告戈尔巴乔夫说了什么话。这就解释了克格勃的警卫人员为什么让他进入会议室，尽管他的名字并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内。

1991年1月，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期间，克留奇科夫与波尔金在波尔金的办公室聚会，未遂政变后，在波尔金的办公室发现了他们监听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副本。这些事实说明，他们两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16. 1992年10月6日，作者与瓦季姆·巴卡金在莫斯科的谈话。

17. 一家苏联法院后来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法令无效。卡鲁金本人仅仅靠着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获得了议会的豁免权，从而设法逃脱了刑事诉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在保守派领袖伊万·波洛兹科夫的选区当选，当时后者放弃了议席，接任了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职务。

第二十四章

1.《独立报》，英文版，1982年7月。

2. 这是叶利钦经常进行的评论；它一再出现在其回忆录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纽约：Random House，1994 年)，第 145 页。

3. 《俄罗斯报》，1991 年 12 月 10 日；译文见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Union，第 43 卷，第 49 号（1992 年 1 月 8 日），第 10—11 页。

4. 苏联的海军力量由四个舰队组成：北海舰队，基地在摩尔曼斯克；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在喀琅施塔得；太平洋舰队，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黑海舰队，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除了最后一个，其他基地都在俄罗斯领土之内，自动为俄罗斯所控制。

5. 叶利钦的法令发表在《红星报》，1992 年 5 月 9 日。有关讨论组建俄罗斯军队的最初动议，见斯蒂芬·福耶：Post-Soviet Russia: Politics and the New Russian Army，RFE/RLResearch Report，第 1 卷，第 33 号(1992 年 8 月 21 日)，第 5—12 页。

6. 本·斯莱：《迅速面对渐进的经济转型》，RFE/RL Research Report，第 3 卷，第 31 号（1994 年 8 月 12 日），第 37 页。

7. 某些了解政治内幕的人认为，哈斯布拉托夫与叶利钦的疏远并非因为有关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未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实际上，哈斯布拉托夫以前曾支持他在 1992 年开始加以谴责的政策。

8. 例如，1992 年 11 月，阿卡尔基·沃尔斯基在由 Financial Times 在莫斯科所主持的讨论会上说，那一年前 10 个月的资金流出在 160 亿到 180 亿美元之间。

9. 1992 年 9 月 19 日，作者与叶戈尔·盖达尔的谈话。

10. 那四个问题和它们的票数是：(1) 你信任俄罗斯联邦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吗？〔信任—58.7%，不信任—39.2%〕；(2) 你赞成自 1992 年以来由总统和政府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

吗？〔赞成—53%，不赞成—44.6%〕；（3）你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吗？〔有必要—49.5%，没必要—47.1%〕；（4）你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吗？〔有必要—62.7%，没必要—30.1%〕。这些结果显示，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中的支持者几乎是其反对者的两倍。见温迪·斯莱特：《俄罗斯公民投票中没有任何胜利者》，RFE/RLResearch Report，第2卷，第21号（1993年5月21日），第10—19页。

11. 从全部席位来看，俄罗斯选择占96席，自由民主党占70席，但共产党位居第三，占65席，而由集体农庄经理控制的农民党占47席，位居第四。见维拉·托尔兹：《俄罗斯议会选举：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RFE/RL Research Report，第3卷，第2号（1994年1月14日），第3页。

12. 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是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94年1月告诉我，他很自信能够取得轻易的胜利，以至于不耐烦去投票！

13. 根据叶利钦1995年2月16日有关“国家状况”的讲话，在1994年俄罗斯国内总产值中，私有经济成分占62%；公开资料研究所，Daily Digest，第35号，1995年2月17日。

14. 例如，资料显示，电子消费产品从1990年到1994年底下降了14%，而同一时期的工业生产估计下降了44%；彼得·拉特兰：《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曲折道路》，Transition，1995年2月15日，第12页。

15. 《论据与事实》，第24号，1994年6月。

16. 同上，第31，1994年8月。

17. Goskomstat announcement，1995年2月15日，引自公开资料研究所，Daily Digest，第35号，1995年2月17日。

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同我就该问题进行了严肃讨论的苏联官员是奥列格·巴克拉诺夫，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国防和重工业的书记，他帮助组织了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那一年1月，他向我了解美国立法中有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况。我从华盛顿得到了一部有关的法规，让人送到他的办公室，但我从不知道，是否有人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去明确规定，对于日益增长的私有经济成分，文职人员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能够做什么。

19. 交互传真新闻机构引用了一位内务部官员的话，他在1995年2月26日报告，1994年，从俄罗斯非法流出的资金总数达500亿美元，并仍以每月15亿到20亿美元的速度上升；公开资料研究所，Daily Digest，第35号，1995年2月28日。

20. 布拉藻斯卡斯击败了斯塔赛斯·拉佐雷蒂斯，后者成为移民已经有50年了。1993年2月1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是立陶宛举行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以前，塞马斯的主席就是国家首脑。

21. 在1992年9月20日的总统选举中，吕特尔赢得了相对多数票，即42.7%的选票，但是爱沙尼亚宪法授权议会，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票，由议会选举总统。1992年10月6日，爱沙尼亚议会选举梅里为总统，他只得到28.8%的选票。

22. 前环境部长安德烈斯·塔兰德被任命为总理。

23.《在以投票为标志的较慢改革中，爱沙尼亚政府被取代》，The New York Times，1995年3月7日，第A—10页。

24. 根据协议，乌克兰将从舰队的833艘船中只得到164艘。见乌斯蒂纳·马库斯：《乌克兰：政治变动中的稳定性》，Transition，1995年2月15日，第69页。

25. 乌克兰的核导弹仍然有效地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因为只有俄罗斯总统掌握着装载和发射导弹的手段。然而，如果未得

到乌克兰的批准，这些导弹不得移出乌克兰。

26. 见约翰·W·R·莱平韦尔：《有关核武器的三方协议》，RFE/RL Research Report，第3卷，第4号（1994年1月28日），第12—20页。

27. 苏珊娜·克劳：《俄罗斯议会坚持控制塞瓦斯托波尔》，RFE/RL Research Report，第2卷，第31号（1993年7月30日），第37—41页。

28. 在1991年9月白俄罗斯的名称正式改变之后，我在提到那个国家和它的民族时，使用的是“Belarus”和“Belarussian”，而在提到独立之前的时期时，则仍使用“Belorussia”和“Belorussian”。

29. 与德涅斯特西部“摩尔多瓦右岸”不同，这一地区在1922年苏联成立时曾经是它的一部分，并且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自治单位。在德苏两国于1939年签订了纳粹—苏联秘密议定书后，苏联吞并了比萨拉比亚，比萨拉比亚与另外两个地区组成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活在“摩尔多瓦左岸”农村地区的人口主要是摩尔多瓦人，而城市人口则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其中大部分是在40年代以后迁入该地区的。

30. 有时译作“跨德涅斯特共和国”。

31. 鲁道夫·A·马克：《危机中的进步》，Transition，1995年2月15日，第57页。

32. 伊丽莎白·富勒：《跨高加索地区：民族斗争威胁着民主化》，RFE/RL Research Report，第2卷，第1号（1993年1月1日），第22页。

33. 阿布哈兹族人口不到阿布哈兹总人口的18%。格鲁吉亚

族人和俄罗斯族人远远超过他们。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委员会估计，在1992年8月到1993年10月之间，阿布哈兹54万人口中，有高达35万人逃离了那里；Refugees，第98号（1994年），第22页。在其他地区，“民族清洗”通常都是由地方当局或者实际上的多数民族来进行。或许只有在阿布哈兹，是由全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迫使其他所有人离开那里。

34. 富勒：《跨高加索地区》。

35. 1994年，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委员会估计，“内部逃难的阿塞拜疆人”至少有63万人，来自亚美尼亚的——主要是1988年——难民达22.8万人，两者人数超过了阿塞拜疆全部人口的10%；Refugees，第98号（1994年），第25页。

36. 伊丽莎白·富勒：《跨高加索地区：战争骚乱，经济解体》，RFE/RL Research Report，第3卷，第1号（1994年1月7日），第54页。

37. 伊丽莎白·富勒：《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之间》，Transition，1995年2月15日，第60—61页。

38. 《我们该如何对俄罗斯进行设备安装?》《力所能及的考虑》，文学出版社，1990年9月18日（第15页特别补充）。

39. 中国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但是哈萨克更担心中国的霸权，而不是俄罗斯的霸权，而且它与中国的通讯和运输的联系状况很差。

40. 《今天》，1995年1月21日，第2页；英译本见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第47卷，第3号（1995年），第27页。

41. 《今天》，1995年1月21日，第2页。

42. 贝斯·A·布朗：《中亚：践踏经济》，Transition，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55 页。

43. 它们也没有答应为该地区提供发展基金。在 1995 年会议期间，纳扎尔巴耶夫说，尽管国际组织正在作出它们所允诺的贡献，但是该地区的国家却无动于衷。他说，乌兹别克斯坦只支付了它保证提供资金的 2%，而土库曼斯坦更是一毛不拔；公开资料研究所，Daily Digest，1995 年 3 月 6 日。

44. 参见《独立报》和《今天》中的文章，英译本见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第 46 卷，第 7 号（1994 年 3 月 16 日），第 11—12 页。

45. 尽管杜达耶夫声称，符合条件的选民有 77%的人参加了投票，他得到了 85%的选票，但是据观察家报道，多数投票站甚至没有开放，而且对于票数没有进行中立的监督。参见安·希伊，《车臣—印古什的权力斗争》，Report on the USSR，第 3 卷，第 46 号（1991 年 11 月 15 日），第 24 页。

46. 戈尔巴乔夫最后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认为，叶利钦对发生于 199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之间的这次干预很生气，它很可能促使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最后决裂；安德烈·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总统的离职》（莫斯科：进步出版集团，1994 年），第 134 页。

47.《消息报》中详细地介绍了杜达耶夫的军队如何接收该地区俄罗斯的武器装备，1995 年 1 月 10 日，文章题目：《谁武装了德佐卡尔·杜达耶夫?》作者尤里·贝斯帕洛夫和瓦列里·雅科夫，第 1—2 页。

48. 1991 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印古什人与车臣人有亲缘关系，与车臣人一样，他们也曾遭到斯大林的放逐——结合在同一个共和国中，即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然而，在杜达耶夫夺

取了首府格罗兹尼的权力后，印古什人投票脱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1992 年，联邦政府批准了这一分离，曾经是一体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成为单独的车臣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有大约 80 万人，印古什共和国有 50 万人。

49. 斯蒂芬·汉德尔曼发表了对苏联解体后的犯罪行为进行仔细研究的著作，他对杜达耶夫集团在其中的作用总结如下：

"无论杜达耶夫政府是否从非法的武器交易中直接获利，它都没有作什么努力来制止这种交易。在莫斯科，警方发现，车臣人在苏联之后的黑社会中的权力迅速崛起，这与他们在毒品和武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有关。在杜达耶夫担任总统的两年间，车臣人是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居首位的武器商。他们在首都拥有 500 多套公寓，约 140 家商店、赌窟和烟馆，以及 6 家旅馆。尽管没有人能够就犯罪组织与格罗兹尼政府之间的联系提供确凿凭据，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车臣帮从一个进行小笔敲诈勒索和以偷汽车为业的小团伙，发展成从事武器交易和毒品买卖的大犯罪帮派，在时间上恰好与车臣作为金融和政治势力的崛起一致。"斯蒂芬·汉德尔曼：Comrade Criminal：Russia's New Mafiy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20 页。

50. 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参见公开资料研究所，Daily Digest，1995 年 2 月 24 日。

51.《消息报》，1995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

参考书目

Abalkin, Leonid. *Neispol'zovanny shans: Poltora goda v pravitel'stve*. Moscow: Politizdat, 1991.

Afanasiev, Yuri. *Ya dolzhen eto skazat': Politicheskaya publitsistika vremen perestroiki*. Moscow: PIK, 1991.

Afanasiev, Yuri, ed. *Inogo ne dano: Perestroika: glasnost', demokratiya, sotsializm. Sud'by perestroiki; Vglyadyvayas' v proshloe; Vozvrashchenie k budushchemu*. Moscow: Progress, 1988.

Aganbegyan, Abel. *Inside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Aganbegyan, Abel, and Timor Timofeyev. *The New Stage of Perestroika*. New York: Institute of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1988.

Allworth, Edward A.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a Cultural Histor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Altstadt, Audrey L. *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 under Russian Rul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2.

Andrew, Christopher, and Oleg Gordievsky. *Comrade Kryuchkov's Instructions: Top Secret File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 1975—1985.*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3.

Arbatov, Georgy A. *Zatyanuvsheesya vyzdorovlenie (1953—1985 gg.): Svidetel'stvo sovremennika.*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Aron, Leon, and Kenneth M. Jensen.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U. S. Institute of Peace, 1994.

Aslund, Anders.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1.

Attali, Jacques. *Verbatim: Chronique des années 1981—1986.* Vol. I. Paris: Fayard, 1993.

Bahry, Donna. *Outside Moscow: Power, Politics, and Budgetary Policy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7.

Bakatin, Vadim. *Izbavlenie ot KGB.* Moscow: Novosti, 1992.

——. *Osvobozhdenie ot illyuziy.* Kemerovo: Kemerovskoy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2.

Beschloss, Michael R.,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Bialer, Seweryn, ed.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Bialer, Sewery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eds. *Gorbachev's Russ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Billington, James H. *Russia Transformed; Breakthrough to Hope; Moscow, August 199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Blacker, Coit D. *Hostage to Revolution: Gorbachev and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85—1991*.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3.

Blaney, John W., ed. *The Successor States to the USSR*.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5.

Boldin, Valery.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The Gorbachev Era as Witnessed by His Chief of Staff*. Translated by Evelyn Rossi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Borisova, N. M., ed. *Glasnost': Mneniya. Poiski, Politika*. Moscow: Yuridicheskaya literatura, 1989.

Brement, Marshall. *Reaching out to Moscow: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91.

Bremmer, Ian, and Ray Tara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reslauer, George W. *Can Gorbachev's Reforms Succee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90.

Brown, Archie, ed. *The Soviet Unio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0.

Brumberg, Abraham, ed. *Chronicle of a Revolution: A Western-Soviet Inquiry into Perestroik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Brzezinski, Zbigniew. *Game Plan: How to Conduct the U. S. -Soviet Contest*. Boston, New York: The Atlantic Press, 1986.

——.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Carpenter, Russell H. *Red Carnations: A Report on the March 1989 Soviet Election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Group, 1989.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Decline of an Empire: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79.

Chernyayev, Anatoly S. *Shest' let s Gorbachevym*. Moscow: Izdatelskaya Gruppa Progress, Kultura, 1993. German translation: Anatoli Tschernayew. *Die letzten Jahre einer Weltmacht; Der Kreml von inne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3.

Cohen, Stephen F., and Katrina vanden Heuvel. *Voices of Glasnost: Interviews with Gorbachev's Reformers*.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89.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 S. Congress. *Soviet Diplomacy and Negotiating Behavior, 1988—90; Gorbachev-Reagan-Bush; Meetings at the Summit*. Special Studies Series on Foreign Affairs Issues,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XIX Vsesoyuznaya konferentsiy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yuz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Politizdat, 1988.

Connor, Walter D. *The Accidental Proletariat: Workers, Politics, and Crisis in Gorbachev's Rus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1.

Conquest, Robert.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6.

Crawshaw, Steve. *Goodbye to the USSR: The Collapse of Soviet Power*. London: Bloomsbury, 1992.

Dallin, Alexander,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From Crisis to Collapse*. Rev.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Dawisha, Karen, and Bruce Parrott.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4.

Denber, Rachel, ed. *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 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Desai, Padma.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The Design and Dilemmas of Soviet Re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9.

Dyker, David A. *Restructuring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Dzyuba, Ivan.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2n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Falin, Valentin.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Munich: Droemer Knaur, 1993.

Felshman, Neil. *Gorbachev, Yeltsin,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Feshbach, Murray, and Alfred Friendly, Jr. *Ecocide in the USSR: 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Furtado, Charles F., Jr., and Andrea Chandler, eds.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2.

Garthoff, Raymond L.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Brookings, 1994.

Goldman, Marshall I. *Gorbachev's Challeng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87.

——. *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2.

Gorbachev, Mikhail S. *Avgustovskii putch: Prichiny i sledstviya.* Moscow: Novosti,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August Coup: The Truth and the Less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 *Dekabr'91: Moya pozitsiya.* Moscow, Novosti, 1992.

——. [Gorbatschow, Michail]. *Gipfelgespräche: Geheime Protokolle aus meiner Amtszeit.* Berlin: Rowohlt, 1993.

——. *Izbrannye rechi i stat'i.* 7 vols. Moscow: Politizdat, 1987—1990.

——. *Perestroika i novoye myshlenie dlya nashei strany i dlya vsego mira.* Moscow: Politizdat, 1987. English translation: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Grachev, Andrei. *Dal'she bez menya...: Ukhod prezidenta.* Moscow: Kultura, 1994. English translation: *Final Day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Gromyko, Andrei. *Pamyatnoe*. 2 vols. Moscow: Politizdat, 1988. Abridged English translation: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Gwertzman, Bernard, and Michael T. Kaufman, ed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Handelman, Stephen. *Comrade Criminal: Russia's New Mafiya*.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95.

Hazan, Baruch A. *Gorbachev and His Enemies: The Struggle for Perestroik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Hewett, Ed A., and Victor H. Winston.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The Economy*. Washington: Brookings, 1991.

Hogan, Michael J., 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Hosking, Geoffrey.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0.

Hosking, Geoffrey, Jonathan Aves, and Peter J. S. Duncan. *The Road to Post-Communism: Independent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Soviet Union, 1985—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2.

Hough, Jerry. *Russia and the West: Gorbachev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Human Rights Watch/Helsinki. *Azerbaijan: Seven Years of Conflict in Nagorno-Karabakh*.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4.

Hyland, William G. *Mortal Rivals: Superpower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Ivashov, L. G. *Marshal Yazov (Rokovoi avgust 91-go)*. Moscow: Bib. zhurnala Muzhestvo, 1992.

Kaiser, Robert G. *Why Gorbachev Happened: His Triumphs and His Fail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Kalugin, Oleg. *The First Directorate: My 32 Years in Intelligence and 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Karaulov, Andrei. *Vokrug Kremlya*. 2nd ed. Moscow: Slovo, 1993.

Karklins, Rasma.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Latvia*. Washington: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4.

Khasbulatov, Ruslan I.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edited by Richard Sakw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Kuleshov, S. V., O. V. Volobuyev, E. I. Pivovar, et al. *Nashe Otechestvo: Opyt politicheskoi istorii*. 2 vols. Moscow: Terra, 1991.

Kunayev, Dinmukhamed. *O moem vermeni*. Alma Ata: RGZhI "Deuir," MP "Yntymak," 1992.

Kutsyllo, Veronika. *Zapiski iz Belogo doma: 21 sentyabrya-4 oktyabrya 1993 g*. Moscow: Izdatelskii Dom Kommersant, 1993.

Kvitsinsky, Yuli[Kwizinskij, Julij]. *Vor dem Sturm: Erinnerungen eines Diplomat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3.

Lapidus, Gail, and Victor Zaslavsky, ed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Laqueur, Walter. *Black Hundred: The Rise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Ligachev, Yegor.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 *Izbrannye rechi i stat'i*. Moscow: Politizdat, 1989.

Luzhkov, Yuri. *72 chasa agonii: Avgust 1991 g.; Nachalo i konets kommunisti-cheskogo putcha v Rossii*. Moscow: Magisterium, 1991.

Malia, Martin.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Mandelbaum, Michael, ed. *Central Asia: Kazakh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Kyrgyzstan, Turkmenistan, and the Worl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4.

——. *Western Approaches to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8.

McFarlane, Robert C. *Special Trust*. New York: Cadell & Davies, 1994.

McFaul, Michael. *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Medvedev, Grigori. *The Truth about Chernoby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Medvedev, Roy, and Giulietto Chiesa. *Time of Change: An Insider's View of Russia's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Medvedev, Zhores. *Gorbachev*.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86.

Menges, Constantine C.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Mesbahi, Mohiadd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ynamics*. Gainesville: Univ. Press of Florida, 1994.

Mezhenkov, Vladimir, and Eva Skelley, eds. *One Way Ticket to Democrac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9.

Morrison, John. *Boris Yeltsin: From Bolshevik to Democrat*. New York: Dutton, 1991.

Motyl, Alexander J. *Dilemmas of Independa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3.

——.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0.

——. *Will the Non-Russians Rebel? State, Ethnic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87.

Nahaylo, Bohdan,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Nazarbayev, Nursultan. *Bez pravykh i levykh: Stranitsy avtobiografii, razmyshleniya, pozitsiya...; Otvety na voprosy izdatel'stva*.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91.

Nenashev, Mikhail F. *Posledneye pravitel'stvo SSSR: Lichnosti;*

Svidetel'stvo; Dialogi. Moscow: Krom, 1993.

Nitze, Paul H. *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 A Memoir*.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9.

Oberdorfer, Don. *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83—1990*. New York: Poseidon Press, 1991.

Odom, William E., and Robert Dujarric. *Commonwealth or Empire?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the Transcaucasus*. Indianapolis: Hudson Institute, 1995.

Olcott, Martha Brill. *The Kazakh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Parker, John W. *Kremlin in Transition*. 2 vols. Boston: Unwin Hyman, 1991.

Pavlov, Valentin. *Gorbachev-putch: Avgust iznutri*. Moscow: Delovoi Mir, 1993.

Pechnev, Vadim. *Gorbachev: K vershinam vlasti: Iz teoretiko-memuarnykh razmyshlenii*. Moscow: Gospodin Narod, 1991.

Peck, Merton J., and Thomas J. Richardson, eds. *What Is to Be Done? Proposals for the Soviet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91.

Pipes, Richar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Knopf, 1993.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90.

Piyasheva, Larisa. *Mozhno li byt' nemnozhko beremennoi?* Minsk: Polifakt, 1991.

Popov, Gavriil Kharitonovich. *Chto delat'? O strategii i taktike demokraticheskikh sil na sovremennom etape.* Moscow: Izdanie gazety Pozitsiya, 1991.

——. *Eti chetyre goda.* Moscow: Moskovskiy rabochiy, 1989.

——. *Puti perestroiki: Mnenie ekonomista.* Moscow: Ekonomika, 1989.

Pozner, Vladimir.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Unraveling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 *Parting with Illusions*.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0.

Rahr, Alexander (compiler).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100 Leading Soviet Official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Raun, Toivo U. *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Reagan, Ronald.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Remnick, David.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Rorlich, Azade-Ayse.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sta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RSF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Chetvertyi s"yezd Narodnykh deputatov RSFSR.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4 vols.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RSFSR, 1991.

——. *Spisok Narodnykh deputatov RSFSR, na 12 fevralya 1991*

g.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RSFSR, 1991.

Rossiisky nezavisimy institut sotsialnykh i natsionalnykh problem. *Gorbachev-Yeltsin: 1500 dnei politicheskogo protivostoyaniya*. Moscow: Terra, 1992.

——. *Krasnoeilibeloe? Drama Avgust—91; Fakty, Gipotezy, Stolknovenie mneniy*. Moscow: Terra, 1992.

——. *Nesostoyavshiisya yubilei; Pochemu SSSR ne otprazdnoval svoego 70-letiya?* Moscow: Terra, 1992.

Ryzhkov, Nikolai Ivanovich. *Perestroika: Istoriya predatel'stv*. Moscow: Novosti, 1992.

Saikal, Amin, and William Maley. *Russi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5.

Sakharov, Andrei. *Memoirs*. Translated by Richard Lourie. New York: Knopf, 1990.

——. *Moscow and Beyond: 1986 to 1989*. New York: Knopf, 1991.

——. *Progress, Coexistence & Intellectual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8.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Awakenin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estanovich, Stephen, ed. *Rethink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Shane, Scott.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4.

Sheehy, Gail. *The Man Who Changed the World: The Lives of Mikhail S. Gorbachev*.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0.

Shevardnadze, Eduard. *Moi Vybor: V zashchitu demokratii i svobody*. Moscow: Novosti,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Shlapentokh, Vladimir. *Sovie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Post-Stalin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0.

Shultz, George P.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3.

Shmelev, Nikolai,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Sidorenko, Yuri Sergeyevich. *Tri dnya, kotorye oprokinuli Bol'shevizm (Ispoved' svidetelya, pokazaniya ochevidtsa)*. Rostov-on-Don: Periodika Dona, 1991.

Simons, Thomas W., J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Sobchak, Anatoly. *Khozhdenie vo vlast'*. Moscow: Novosti,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a New Russia: The Mayor of St. Petersburg's Own Story of the Struggle of Justic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Sontag, R. J., and J. S. Beddie.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Starr, S. Frederick, ed.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Stepankov, Valentin, and Yevgeny Lisov. *Kremlyovsky zagovor*. Moscow: Izdatelstvo Ogonyok, 1992.

Sukhanov, Lev. *Tri goda s El'tsinym: Zapiski pervogo pomoshchnika*. Riga: Vaga, 1992.

Suny, Ronald Grigor.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3.

Szabo, Stephen F. *The Diplomacy of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Taagepera, Rein.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Tatu, Michel. *Gorbatchev: L'URSS va-t-elle changer?* Paris: Le Centurion, 1987.

Thatcher, Margaret.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Tuleyev, Aman. *Dolgoye ekho putcha: Kak zhit' dal'she?* Moscow: Paleya, 1992.

Urban, George R. *End of Empir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American Univ. Press, 1993.

US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Chetvertyi S" yezd narodnykh deputatov SSSR; 17—27 dekabrya 1990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3 vols.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1991.

——. *Narodnye deputaty SSSR, po sostoyaniyu na 1 oktyabrya 1990g*.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1990.

——. *Pervyi S" yezd narodnykh deputatov SSSR; 25 maya—9 iyunya 1989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5 vols.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1989.

——. *Vtoroi S" yezd narodnykh deputatov SSSR; 12—24 dekabrya 1989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6 vols. Moscow: Izdanie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1990.

von Herwarth, Hans. *Against Two Evils.* New York: Rawson, Wade, 1981.

Voslensky, Michael.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84.

Yakovlev, Alexander Nikolayevich. *The Fate of Marxism in Russia.*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93.

——. *Muki prochteniya bytiya: Perestroika nadezhdy i real'nosti.* Moscow: Novosti, 1991.

——. *Ot Trumena do Reigana.* Moscow: Molodaya gvardia, 1984.

——. *Predislovie; Obval; Posleslovie.* Moscow: Novosti, 1992.

Yeltsin, Boris.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Michael Glenn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 *Zapiski Prezidenta.* Moscow: Izd. Ogonyok, 1994.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Zaprudnik, Jan. *Belarus: At a Crossroads in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Zinoviev, Aleksandr. *Gorbachevizm.* New York: Liberty Pub. House, 1988.

索　　引